文 献

【穿鼻草约】鸦片战争中英国代表私拟的一份议和草约。鸦片战争爆发不久，道光皇帝由主战转向主和，于1840年（道光二十年）11月派钦差大臣琦善到广州与英军谈判。在谈判进行中，英国侵华全权代表义律于1841年1月7日突然指挥英军攻占沙角炮台（即穿鼻炮台）和大角炮台，逼迫琦善接受英方的议和条件。并拟就这项草约，主要内容是：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国；赔偿英国政府600万银元；开放广州为通商口岸；英军撤出沙角、大角炮台，归还定海。义律于1月21日单方面公布了这项草约。但事实上双方未正式签约，因为琦善未得到道光皇帝关于割让土地的谕令，不敢签字。事后，中英政府都不承认这项草约。道光皇帝以琦善擅自割让香港，令锁拿解京问罪，英国政府认为草约索取的权益太少，将义律撤职。

【广州和约】鸦片战争中的一项休战协定。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5月下旬，清靖逆将军奕山在广州与英军作战失利，被迫向英军求降。27日双方缔结这项和约，主要内容是：奕山等所率外省军队退出广州城60里以外；7日内交出600万银元供英方使用；款项付清后，英军撤回虎门以外，并交还横档及江中所有其他各要塞；赔偿英国商馆和西班牙帆船“米巴音奴”号的损失。奕山不敢如实向朝廷奏报这项和约，谎称英国人“向城作礼，乞还商欠”，结果得到道光皇帝“准令通商”的批谕。但英国在勒索到巨款后，旋即撕毁和约，扩大侵略战争。

【南京条约】中国近代史上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于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派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会谈，完全按照英方提出的条件，签订这项条约，以结束鸦片战争。条约共13款，主要内容是：（1）割让香港岛；（2）赔偿鸦片烟价600万元（银元）、商欠300万元、军费1200万元；（3）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英国可以派驻领事官；（4）英商应纳的进出口货税、饷费，由中英双方秉公议定则例；（5）废除公行制度，准许英商与华商自由贸易。这项条约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损害了中国的关税和司法主权，初步确立了西方列强掠夺和奴役中国的恶劣制度。从此，中国的门户被打开，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虎门条约】《南京条约》的补充条款，包括《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善后事宜清册附粘和约》）。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6月26日，清钦差大臣耆英在香港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举行《南京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其间，双方商谈了通商章程和输税事例。7月22日公布《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主要内容是：（1）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即英国在华侨民享有特殊的权利和豁免，有不受中国法院审判而受英国领事裁判的权利；（2）商定进出口货物税率为值百抽五。10月8日，耆英与璞鼎查在虎门签订《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并附《小船定例》。主要内容是：（1）英国取得片面最惠国待遇，即今后任何国家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在中国取得侵略权益时，

英国均可分享；(2) 英国军舰有常驻中国港口的特权；(3) 允许英人在条约口岸租地建屋居住。上述条款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望厦条约】中国近代史上美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美国看到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及其附约在中国攫取了一系列特权，起而效尤。1844年7月3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美国专使顾盛用军事恫吓与外交讹诈的手法，胁迫清两广总督耆英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这项条约。共34款，附有《海关税则》。它攫取了中英《南京条约》中除割地、赔款外的全部特权，并进一步扩大，主要有：(1) 扩大领事裁判权，即美国人在中国与中国人或与其他各国人之间发生的一切诉讼，均由美国领事审理，其范围不仅包括刑事方面的争斗、词讼、交涉，也包括民事方面财产或人身权利的诉讼等；(2) 进一步加强协定关税权，即中国日后变更关税税则，必须先与美国领事等官员协商；(3) 美国军舰可以到中国沿海各港口巡查贸易；(4) 美国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租地建楼，设立医院、教堂。

【黄埔条约】中国近代史上法国迫使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后，法国看到英国通过《南京条约》、美国通过《望厦条约》在中国攫取了一系列特权，也起而效尤。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10月24日，法国专使拉萼尼以恫吓和讹诈手段，胁迫清两广总督耆英在停泊于广州黄埔的法国军舰“阿吉默特”号上签订这项条约。共36款，附有《海关税则》。它攫取了中英《南京条约》中除割地、赔款外的特权以及中美《望厦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主要是：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

国待遇，可以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等。条约签订后，拉萼尼又迫使清政府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准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从此，西方各国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

【上海租地章程】英国强行在上海建立租界的约章。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第一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以《南京条约》、《虎门条约》有关允许英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的规定，胁迫苏松太道宫慕久同意租出一块地段，供外人长期占据。经反复交涉，双方议定此章程，并于同年11月29日由宫慕久以道台名义和告示形式公布。共23款。章程规定，将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庄（今北京东路）以南之地，租与英人使用。最初，东以黄浦江为自然界限，西界未曾明定。次年9月24日，又议定西以边路（今河南中路）为界。全部面积为830亩。在此界内，实行“华洋分居”，对外人对土地有“永租权”。章程还规定英国领事对居留地内的外国人有专管之权，无须中国官吏过问；可以设立消防机关，雇用更夫维持秩序；如有必要修改，由双方官员随时商议。由此，英国在中国勒索到第一块租界。

【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西方列强为扩大其在租界内之权势而强迫清朝上海当局签订的不平等协议。早在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胁迫苏松太道议定了《上海租地章程》，取得西方列强对在中国大陆强占的第一块“租界”的管理权。从这个章程全部内容来看，中国政府对“租界”还有一定的权力。为了达到完全控制“租界”的目的，英、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在1854年（咸丰四年）趁清政府忙于对付小刀会起义之机，擅自将原订《上海租地章程》作了重大修改，拟定了此章程。共14款。于7月

5日强迫上海道台接受。3天后在《北华捷报》上公布。章程取消了原来“华洋分居”的规定，允许“华洋杂居”，增加了对华民的歧视性规定。进一步强调了领事的权力，规定在租界内设置巡捕、征集税收、设立“经收处”即工部局，对中国居民行使征税权和司法权，完全排除了中国对租界所应有的主权。7月11日，英、法、美三国领事召开了租地人会议，通过了此章程及其他10多项决议，主要有解散道路码头公会，组织统治三国租界的市政机关——工部局，选举首届工部局董事，组织巡捕房等。从此，中国对租界内的行政、司法等不再有干预权。租界完全为西方列强所控制，成为“国中之国”。

【中俄璦琿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皇俄国凭借武力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1858年（咸丰八年）5月，英法联军进攻天津，威胁北京，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趁火打劫，突然率兵舰直趋璦琿，用武力威胁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在俄方事先拟定好的条约上签字。5月28日，奕山被迫在条约上签字。全文共三条，主要内容是：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仅江东六十四屯仍准原中国民人永远居住，由中国政府管辖；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原属中国内河的黑龙江、乌苏里江准许俄国船只航行。这个条约使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受到损害，清政府拒绝批准，直至1860年订立《中俄北京条约》方予认可。

【中俄天津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58年（咸丰八年）5月，沙俄趁英法联军进逼天津、形势危急之际，以“调停人”名义诱骗威逼清政府。6月13日，清

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被迫与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在天津签约。全约共 12 款。主要内容是：（1）俄国得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等口岸通商，并停泊兵船，若别国在沿海增开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2）俄国得在原定中国陆路通商点扩大贸易，对俄国商人数和货物本银数不得限制；（3）俄国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领事，在华俄国人享有领事裁判权；（4）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可以入内地自由传教；（5）俄国在中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6）中俄两国派员查勘“从前未经定明边界”。这个条约不仅扩大了沙俄在中国的侵略利益，还为以后在勘界的名义下进一步侵吞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

【中美天津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美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58 年（咸丰八年）5 月，美国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进逼天津之际，以“调停人”身份诱骗威逼清政府。6 月 18 日，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被迫与美国公使列维廉在天津签约。全约共 30 款。主要内容是：（1）清政府倘准许其他国家公使驻京，应准美国一律照办；（2）增开潮州（后改汕头）、台南为通商口岸；（3）耶稣教传教士可以自由传教；（4）美国人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5）美国在华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这个条约是美国依仗英法的侵略势力和狡诈的外交手段，不费一兵一卒攫取的，极大地扩展了美国在华的侵略利益。

【中英天津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58 年（咸丰八年）5 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进逼天津。形势危急，清政府急派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天津谈判议和，6 月 26 日，被迫与英国全权代表额

尔金在海光寺签约。全约共 56 款。主要内容是：(1) 英国公使驻北京，在通商各口设领事官；(2) 增开牛庄、登州、台南、潮州、琼州、汉口、九江、镇江、南京为通商口岸（后牛庄改营口、登州改烟台、潮州改汕头）；(3) 允许耶稣教、天主教教士在华自由传教；(4) 英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可在各通商口岸任意租地造房，设立教堂、医院、仓库等；(5) 英国商船可在长江各通商口岸往来；(6) 修改关税税则；(7) 英国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8) 中国对英国赔款 400 万两白银。另附专条，广东地方政府向英国赔偿商欠、军费等 400 万两，款项还清，英国将广州城交还中国政府管理。11 月 8 日，桂良、花沙纳与额尔金在上海签订了中英通商章程，为《天津条约》的补充条款，规定中国聘请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进口货按值百抽五纳税和纳 2.5% 的子口税后免交内地厘金等。条约使英国的侵略势力自东南沿海扩大到广大长江内地，税则的修改便利了英国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

【中法天津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58 年（咸丰八年）5 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进逼天津。形势危急，清政府急派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天津谈判议和。6 月 27 日，被迫与法国全权代表葛罗在天津签约。全约共 42 款。主要内容是：(1) 法国公使驻北京，在通商口岸设领事馆；(2) 增开琼州、潮州、台南、淡水、登州、南京为通商口岸（后潮州改汕头，登州改烟台）；(3) 允许天主教传教士入内地自由传教；(4) 法国人可往内地游历，可在各通商口岸任意租地盖房，设立教堂、医院、学校、坟地、仓库等。中国人如触犯、毁坏教堂、坟地，地方官应严加惩处；(5) 中国与

他国议定的税则、税率，法国都可均沾；（6）法国兵舰可在中国各通商口岸港口停泊；（7）法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8）中国对法国赔款 200 万两白银。另附《和约章程补遗》，规定将西林县知县张鸣凤革职，广东海关赔偿法国兵费 200 万两，6 年偿清。这个条约使法国的侵略势力从东南沿海进入长江内地，严惩中国人民反抗法国宗教侵略的规定，则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中英北京条约】 又称《中英续增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末期英国侵略者强加给清政府的不平等条约。1860 年（咸丰十年）10 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在焚毁圆明园之后，扬言要炮轰北京城，捣毁皇宫，威胁清政府“立即同意联军的一切要求”。10 月 24 日，清廷钦差大臣奕訢被迫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签订此约。全约共 9 款。主要内容是：（1）中国对英国赔款增至白银 800 万两；（2）增辟天津为商埠；（3）英国可招募华工出国；（4）割让广东地方九龙司一区，并归英属香港界内；（5）确认中英《天津条约》有效。这个条约进一步扩大了英国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获取的侵略利益，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中法北京条约】 又称《中法续增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末期法国侵略者强加给清政府的不平等条约。1860 年（咸丰十年）10 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在焚毁圆明园之后，扬言要炮轰北京城，捣毁皇宫，威胁清政府“立即同意联军的一切要求”。10 月 25 日，清廷钦差大臣奕訢被迫与法国全权代表葛罗签订此约。全约共 10 款。主要内容是：（1）中国对法赔款增至白银 800 万两；（2）赔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财产，充当译员的法国教士还擅自在中文本

加上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样；(3) 增开天津为商埠；(4) 准许法国招募华工出国；(5) 确认中法《天津条约》有效。这个条约进一步扩大了法国侵略者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获取的侵略利益，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中俄北京条约】 又称《中俄北京续增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末期沙俄侵略者强加给清政府的不平等条约。1860年(咸丰十年)10月底，沙俄驻华公使伊格那提耶夫自称“调停”有功，向清廷钦差大臣奕訢提交了一份新的中俄条约草案和俄国单方面绘制的中国东部边界地图，宣称“一字不能更易”，否则“兵端不难屡兴”。11月24日，奕訢被迫在条约上签字。全约共15款。主要内容是：(1) 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俄国；(2) 中俄西段界自沙宾达巴哈起经斋桑淖尔、特穆尔图淖尔(今伊塞克湖)至浩罕边界“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住卡伦(哨所)”为界；(3) 增开喀什噶尔(今喀什市)为商埠，俄国可在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市)、张家口等地免税贸易，设立领事并享有领事裁判权；(4) 确认中俄《璦琿条约》有效。沙俄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获利最多的国家。通过这个条约，沙俄割去了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还为以后割占中国西部边界大片领土制造了“根据”，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割占中国西北地区领土的不平等条约。1864年(同治三年)10月7日，沙俄代表巴布科夫、扎哈罗夫等，在沙俄出兵强占中国西北大片领土的情况下，援引并曲解中俄《北京条约》中有关中俄西段边界走向的原则规定，迫使清钦差勘办西北界事宜大臣明谊等，在塔尔巴哈台

(今塔城) 签订。共 10 条。具体划定自沙宾达巴哈山口到浩罕边界为止的边界。就连中俄《北京条约》规定的界湖特穆尔图淖尔(今伊塞克湖) 也被划为沙俄的内湖, 沙俄由此割占中国西北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淖尔(今斋桑泊) 南北 44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中日北京专条】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74 年(同治十三年) 4 月底, 日本利用琉球国渔民与台湾高山族居民发生冲突一事, 然派兵侵略中国台湾。清政府一面向台湾增兵布防, 一面派代表与日本会谈。在日本代表的讹诈和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等的压力下, 恭亲王奕訢与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于 1874 年 10 月 31 日在北京订立此约。共计 3 款, 另附“会议凭单”一件。其主要内容是: 日本从台湾撤军; 中国付给日本“抚恤”银 10 万两, 赔付其在台“所有修道、建房等件”银 40 万两; 中国承认台湾高山族居民曾将“日本国属民(指琉球渔民) 等妄为加害”, 日本此次侵台为“保民义举, 中国不指为不是”。此条约给日本日后正式吞并琉球以口实。

【中英烟台条约】又称《芝罘条约》。英国利用马嘉理事件迫使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马嘉理事件发生后, 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英国政府指令下, 向清政府提出了许多极为苛刻的要求。经过一年半的谈判, 清政府代表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于 1876 年(光绪二年) 9 月 13 日在烟台签订此约。共分三大部分 16 款, 并附有《另议专条》。主要内容是: (1) “昭雪滇案”(即马嘉理案)。
1. 总理衙门应通行各省, 张贴清帝有关滇案的谕旨及处理的文告;
2. 中国派信任大员携带对滇案表示惋惜的国书赴英致歉; 3. 对

英赔款 20 万两。(2)“优待往来”。1. 总理衙门应与各国驻京公使会同商定中外官员礼节条款；2. 在通商口岸或内地各省发生涉及英人生命财产案件，英国可派员前往观审。(3)“通商事务”。1. 各口岸租界内的洋货免征厘金；2. 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允准外轮停泊，上下客商货物；3. 英国有权再次派员赴滇查看通商事宜并订立通商贸易章程等。1886 年 5 月 6 日，中英双方在伦敦交换批准书。此约实现了英国多年来企图扩大其在华通商、外交等特权的野心，使其获得了入侵中国西南地区的所谓条约依据。

【中俄伊犁条约】当时称《中俄改订条约》，又称《圣彼得堡条约》。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71 年（同治十年）7 月，沙俄利用阿古柏侵略新疆的混乱之机，出兵强占中国新疆伊犁地区。清政府出兵驱逐阿古柏后，派遣出使俄国头等钦差大臣崇厚谈判收回伊犁问题。崇厚在沙俄代表的威逼诱骗下，于 1879 年（光绪五年）10 月 2 日在黑海之滨的里瓦几亚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同时还签订了《瑗珲专约》、《陆路通商章程》和《兵费及恤款专约》。主要内容是：(1) 中国收回伊犁城，而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特克斯河流域割让给沙俄；(2) 允许沙俄在蒙古、新疆免税贸易；(3) 沙俄增辟至天津、汉口的两条陆路商道，可在嘉峪关等 7 处设立领事，建造行栈；(4) 中国赔偿沙俄各种费用 500 万卢布（合白银 280 万两）。消息传出，举国大哗。清廷以崇厚所议条约“多有违训越权之处”，“窒碍难行”，不予批准。1880 年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赴俄商改《里瓦几亚条约》。次年 2 月 24 日，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等签订此约，代替《里瓦几亚条约》。主要内容是：(1) 中国收回伊犁地区和特克

斯河流域，而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割归沙俄；（2）俄商在蒙古境内免税贸易，在新疆境内暂不纳税；（3）允许沙俄在嘉峪关、吐鲁番两地增设领事；（4）赔付沙俄各种费用 900 万卢布（合白银 500 余万两）。中国虽争回了部分利权，但国家主权和领土仍受到很大损害。沙俄后又根据此约的某些条款规定，自 1882—1884 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 5 个勘界议定书，割占了中国西北部 7 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中日天津会议专条】 又称《中日天津条约》或《中日朝鲜撤兵条约》。中日两国为解决朝鲜“甲申政变”问题而签订的条约。1884 年（光绪十年）12 月 4 日，朝鲜亲日派在日本支持下，利用汉城邮政总局新厦落成典礼之机，发动“甲申政变”，引导日军攻入王宫，挟持国王。驻朝清军在朝鲜的要求之下击败日军，平定叛乱。日本政府遂乘机对清政府进行外交讹诈。1885 年 4 月 18 日，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西乡从道等与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等在天津签订此约。共 3 款。主要内容是：自签约之日起，中日两国军队在 4 个月内同时从朝鲜撤退；“将来朝鲜国内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行行文知照”。此后，日本虽从朝鲜撤兵，但却获得可再向朝鲜派兵的特权，为发动甲午战争提供了“根据”。

【中法新约】 又称《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或《越南条款》，也称《李巴协定》。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同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于 1885 年（光绪十一年）6 月 9 日在天津签订此约，以代替 1884 年 5 月 11 日所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共 10 款。主要内容是：（1）清政府承

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2)在中越边境指定两处通商处所，一处在保胜以上，一处在谅山以北，法国可在此设领事馆，居住法商；(3)法国在广西、云南的进出口货物应该减税；(4)若中国日后修筑铁路，应向法国商办；(5)法国从台湾、澎湖撤兵。从此，中国的西南门户被法国打开。

【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英国侵占印度后，多次派人赴藏，利诱八世达赖和六世班禅与其通商，皆遭失败。1888年（光绪十四年）3月，2000余名英军在格兰将军指挥下，突袭驻防西藏隆吐山的藏兵，悍然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藏族军民誓死抵抗。清政府任命升泰为驻藏帮办大臣（1890年升任驻藏大臣），赴藏与英议和。1890年3月17日，升泰与英印总督兰士顿在印度加尔各答订立此约。共8款。主要内容是：清政府承认哲孟雄（锡金）归英国保护；划定西藏地方与英属哲孟雄边界；有关双方游牧、通商等问题。“容后再议”。由此，英国侵占了同中国西藏关系极为密切的哲孟雄，并不断向西藏发动侵略战争。

【中英会议藏印条款】又称《中英会议藏印续约》或《藏印议订附约》。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解决《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中的遗留问题，清驻藏大臣升泰与英方代表柏尔（又译保尔）继续谈判。1892年（光绪十八年）升泰病逝。清政府命参将何长荣代替升泰继续谈判。1893年12月5日，何长荣与英方代表柏尔在哲孟雄（锡金）的大吉岭签订此约。共12款。主要内容是：开放西藏的亚东为商埠，英印政府可派员在此驻扎查看贸易；自亚东开埠之日起，中国西藏与英属印度边界贸易互免关税；限制

西藏人民在哲孟雄的传统游牧权利。从此，英国打开了中国西藏大门。

【马关条约】 又称《春帆楼条约》。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清政府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钦差全权大臣李经方，与日本全权办理大臣、总理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日本马关（今下关）春帆楼签订。共11款。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主要内容是；（1）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辽东半岛后由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3）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2亿两，分8次在7年内交清；（4）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船可沿内河驶至上述各口，搭客载货，日本可在此设立领事；（5）日本人可在中国通商口岸及城邑设立工厂；（6）中国不得逮捕曾为日军服务的汉奸；（7）本约互准互换后，两国速派全权大臣会同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次年，日本迫使清政府与之订立《通商行船条约》，攫取了在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此约适应了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资本输出的要求，极大地破坏了中国国家主权，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

【中俄密约】 又称《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或《防御同盟条约》。沙俄诱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5月初，清政府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李鸿章赴彼得堡，庆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沙俄以中俄共同防日为名，利诱贿赂李鸿章与其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拔诺夫秘密谈判，并于6月3日签订此约。

共 6 款。主要内容是：（1）如果日本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领土，中俄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2）缔约国一方未征得另一方同意，不得与敌方签订和约；（3）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对俄国军舰开放；（4）为使俄国便于运输军队，中国允许俄国通过黑龙江、吉林修筑一条铁路至海参崴。铁路的修筑和经营，交华俄道胜银行承办；（5）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皆可在此路运送军队和军需物资；（6）本约自铁路合同批准之日起，有效期 15 年，期满前双方可商议是否续约。从此，中国东北三省逐渐变为沙俄的势力范围。

【胶澳租界条约】 又称《德租胶澳专条》。德国强迫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1897 年（光绪二十三年）11 月，德国借口其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出兵强占胶州湾沿岸地区。1898 年 3 月 6 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翁同龢与法国驻华公使海靖在北京签订此约。主要内容是：（1）胶州湾租与德国，租期 99 年，租期内胶州湾完全由德国管辖；（2）胶州湾沿岸 100 里内，划为中立区，但德国军队有自由通行权；（3）允许德国在山东境内修筑两条铁路，一条由胶州湾经潍县、青州（今益都）、博山、邹平等地达济南，另一条由胶州湾经沂州（今临沂）、莱芜至济南；（4）德商享有铁路沿线两侧 30 里以内的开矿权；（5）山东境内开办各项工程，需用外国人员、资金、器材时，德商有优先承办权，此后，胶州湾成为德国的殖民地，山东全省变成德国的势力范围。

【旅大租地条约】 原称《中俄会订条约》，又称《中俄条约》。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97 年（光绪二十三年）12 月，沙俄借口抵制德国，协助中国，派遣俄太平洋分舰队军舰强入旅

顺口，接着向清政府提出租借旅顺、大连的无理要求。1898年3月27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张荫桓与沙俄驻华代办巴甫洛夫在北京签订此约共9款。主要内容是：（1）清政府允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与俄国，租期25年，期满前可由两国相商是否展限延长；（2）租借地内地方行政由俄国主掌，中国不得在此驻军；（3）租借地以北设立“中立区”，其行政由中国官员管理，中国军队经俄国同意后始得入内；（4）沙俄可由中东路某站（后选定哈尔滨）修一支线至旅顺、大连；（5）旅顺口仅由中俄两国船只使用，他国军舰与商船不得入内。同年5月7日，清政府代表许景澄同沙俄代表莫拉维诺夫在彼得堡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共6款。主要内容是：（1）清政府不得将中东铁路支线所经地区的铁路权让与他国；（2）不经俄国同意，清政府不得将“中立区”及沿海口岸让与他国，亦不得将“中立区”内的铁路、开矿及其他工商利益让与他国。此后，旅大地区成为沙俄的殖民地，东北三省成为其势力范围。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强迫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4月13日，即清政府同意法国租借广州湾后的第三天，英国照会清政府，要求租借九龙半岛作为“补偿”，以抵制法国，“保卫”香港。6月9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与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在北京签订此约。主要内容是：将九龙半岛（包括大鹏湾和深圳湾）租给英国，租期与法国租借广州湾相同，为99年；租期内租借地归英国管辖。此次英国租借之地即所谓“新界”，比原“旧界”面积大10余倍。

【订租威海卫专条】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98年

(光绪二十四年)上半年,俄国强租旅大以后,英国借口抵制俄国,向清政府提出须以同样条件租借山东的威海卫。1898年7月1日,清政府代表庆亲王奕劻、刑部尚书廖寿恒与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在北京签订此约。主要内容是:将威海卫及附近水面和全湾沿岸10英里以内的地方租给英国,租期与俄国租借旅大期限相同,为25年;租借地内归英国管辖,英国可在此驻兵设防;中国兵船无论战时、平时、均可在威海卫停泊。

【广州湾租界条约】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3月,法国驻华代办吕班向清政府提出照会,要求中国答应不把云南、广东、广西等省让与他国;中国将来设立邮政局,须聘法国人襄办;法国承建越南至云南昆明的铁路;法国在中国南部海岸设立“屯船”之所。1899年11月6日,法国军舰直逼广州湾,迫使清政府代表广西提督苏元春与其远东海军司令高礼睿正式订立此约。共7款。主要内容是:广州湾租给法国,租期99年;租界内归法国管辖,法国可在此驻兵设防,中国船只驶入广州湾须向法国交纳各项税钞;允许法国修筑自广州湾赤坎至安铺的铁路,架设电线等。由此,广州湾实际上成为法国的殖民地。

【辛丑条约】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经过几个月的磋商与争吵,于1900年12月24日向清廷提出《议和大纲》12条。慈禧太后看到“大纲”并未将她列为祸首,大喜过望,命奕劻、李鸿章如议签约。此后,列强在中国赔款总数、偿付方法及各国所占赔款比例问题上

又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全权代表奕劻、李鸿章同英、法、美、俄、德、日、意、奥、荷、比、西11个国家代表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共12款，另有19个附件。主要内容是：（1）中国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9.8亿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2）将北京东交民巷划定为使馆区，中国人不得在界内居住，各国可在此派兵驻守；（3）拆除大沽炮台及其至京沿途的所有炮台，外国军队可在自山海关至北京的12个战略要地驻扎；（4）中国人民不得成立或加入任何“与诸国仇敌”的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员必须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否则立予革职，永不叙用。凡发生反帝斗争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5年；（5）清政府分派王公赴德、日两国“谢罪”，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之处建立牌坊，对被杀的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必须用优荣之典”；（6）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外务大臣须由皇族亲贵担任。此约使帝国主义各国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加强了对中国的掠夺与控制，标志着清政府已变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交收东三省条约】 又称《俄国撤兵条约》。清末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同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沙俄除派数万军队参加八国联军进攻京津地区外，还单独出兵16万余人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辛丑条约》签订后，沙俄仍拒绝从东北撤兵。这一赤裸裸的侵略行径，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和反抗。英、美、日等列强为了各自利益，也纷纷反对沙俄独霸东北。1902年4月8日，沙俄驻华公使雷萨尔同清外务部大臣奕劻、王文韶在北京签订此约。共4款。主要内容是：（1）东三省“一如俄军未经占据以前，仍归中国版图及中国官治理”；（2）俄军分三期全部撤

出，每期6个月；(3)俄军撤退前，清政府驻东三省军队的数目、驻地，须与俄国军官商定；俄军撤完后，清政府增加兵力，应随时知照俄国；(4)沙俄交还山海关、营口、新民厅等沿线铁路，但清政府要给予“赔偿”。1903年4月，沙俄在第二期撤兵期满时，不仅违约拒不撤兵，反而向清政府提出7项新的条件。消息传出，中国人民掀起拒俄运动。为争夺中国东北，日、俄两国矛盾渐趋激化尖锐，终于导致了1904年2月的日俄战争。

【中英续订印藏条约】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12月，英国发动侵略中国西藏的战争，次年9月7日强迫西藏地方当局签订非法的《拉萨条约》。规定：非经英国事先同意，不得将西藏土地租让给外国；他国不得享有西藏设铁路、架电线、采矿等权利；不得派员或代理人进入藏境和干涉西藏一切事务，开辟江孜、亚东、噶大克为商埠，英国在商埠派驻官员；赔偿英国军费50万英镑；拆毁从印度边界至江孜、拉萨的防御工事等。这一条约严重损害中国主权，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清政府也未予承认，并派代表与英国重新交涉。1906年4月27日由清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与英驻华公使萨道义在北京签订本约。正约共六款，规定英国“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英国不得不在事实上确认中国政府对西藏地方的领土主权。但又规定《拉萨条约》作为本约附约，英国从中仍取得许多特权。

【二十一条】民国初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秘密文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列强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独占中国的侵略步伐。1915年1月18日，日本

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递这一秘密文件时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暗示可以此作为支持恢复帝制的交换条件。共 5 号 21 条。主要内容是：（1）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允许日本修筑从烟台连接胶济线的铁路，开辟山东省其他主要城市为商埠等；（2）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铁路租借期限延长为 99 年。日本人在南满、内蒙东部有居住、购地、经营工商、修建铁路、开采矿山等权利；（3）中国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未经公司同意，他人不准开采附近矿山；（4）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他国；（5）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拥有武昌经九江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和潮州的铁路修筑权，日本拥有在福建省内投资修筑铁路及开采矿山的优先权等。袁世凯为争得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命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与日本代表秘密谈判。5 月 9 日，袁世凯在日本最后通牒下，除声明第 5 号条款可日后另行协商外，接受了其他条款。22 日，由陆征祥和日置益以逐条签字和换文的形式确定下来。后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坚决斗争，国会未予批准，未能实际生效。

【中俄蒙协约】民国初年中国北洋政府同沙俄签订的有关外蒙古的不平等条约。沙俄早就对中国蒙古地区抱有野心。1911 年（宣统三年）下半年，沙俄，曾策动外蒙古少数封建王公实行所谓“独立”。次年又支持外蒙古的所谓自治，擅自同外蒙地方当局签订《俄蒙协约》激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袁世凯政府为换取沙俄的援助和承认，屈从沙俄的胁迫，于 1913 年 11 月 5 日与之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5 条和《中俄声明另件》4 条。沙俄虽表

面上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中国政府承认了《俄蒙协约》的内容和外蒙古的“自治”，并不得在外蒙古设治、驻军、移民等，实际承认沙俄对外蒙古的控制权。根据上列声明，中国全权专使毕桂芳、沙俄驻蒙外交官兼总领事亚力山大密勒尔及外蒙古代表希尔宁达木定两国三方代表，经过 48 次正式会议和 40 次私下会晤，于 1915 年 6 月 7 日在恰克图签订此约。共 22 条。主要内容是：（1）外蒙古承认民国二年（1913）11 月 5 日《中俄声明文件》及《中俄声明另件》；（2）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俄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3）自治外蒙无权与外国订立关于政治及土地关系的国际条约；（4）中俄承认外蒙自治官府有办理一切内政之权；（5）中国商民之货入自治外蒙古，无论何种出产，不纳关税，但须按照自治外蒙古人民所纳自治外蒙古已设及将来添设之各项内地货捐一律交纳。通过这一协约，中国在外蒙古仅取得了徒有其名的“宗主权”，而沙俄则保持了在策动外蒙“独立”时所攫取的各种殖民特权。

【四洲志】书名。清林则徐主持编译。一卷。1839 年（道光十九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广州，在严禁鸦片的同时，积极探求域外大势，派人收辑、翻译外文资料，以备参考。《世界地理大全》是英人慕瑞所著，1836 年伦敦出版。林氏组织幕僚将此书全文译出，并采加润色而成。译作简述世界 5 大洲 30 多国的地理、历史、政情，是当时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在近代史上具有开风气的作用。书称四洲者，乃沿佛书旧称。后魏源受林氏所嘱，以此为蓝本，编著成《海国图志》。据西人记载有道光二十一年（1841）刊本。通行有《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本。

【海国图志】书名。清魏源编著。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魏源与林则徐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会见。林把自己在广州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及其他资料交给魏源，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编撰《海国图志》。魏欣然接受，潜心编著，经年而成。1842年刊出刻本50卷，1847年刻本增订为60卷，1852年（咸丰二年）又扩编为100卷。此书除引用《四洲志》外，参考书籍100多种，其中包括外国著作20种。不仅详尽叙述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及政情，介绍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武器方面的知识，而且总结了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及一系列加强国防，抵御外侮的具体措施。歌颂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业绩，谴责投降派的误国行为和顽固派盲目排外的昏愤。是当时国人自编的最详备的世界史地志，对中国近代政治学术思想有重要影响。19世纪50年代传入日本，对开通日本风气起了积极作用，并对明治维新有一定影响。

【瀛环志略】书名，清徐继畲编著。10卷。徐受鸦片战争以后风气影响，有用世之志。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曾在厦门向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借摹世界地图册，任福建巡抚后，乃广搜西人著述，钩摹地图，编纂世界各国志，于1848年成书。以战国时驺衍所论中国之外有大九州，有大瀛海环之，故取是名。各卷、篇首均附有地图。所引诸书未注出处。地名、人名皆标点钩出。书中全面而扼要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沿革，政情民俗，经济状况。被视为《海国图志》的姊妹篇，为较早的世界史地著作。是近代先进人物向西方学习的启蒙读物。传入日本，产生积极影响。后人多有补正，著名者有何秋涛《瀛环志略辨正》、薛福成《续瀛环志略初编》、佚名《瀛环志略续集》等。

【劝世良言】基督教新教派最早的中文布道书。由中国传教士梁发著于1832年（道光十二年）。全书共9卷（或分四卷、三卷），约9万字，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修改校订在广州付印刊行。书中多半集《圣经》章节而成，余则结合中国人情风俗，借用某些儒家言论，阐发基督教新教基本教义，“劝人勿贪世上之福，克己安贫，以求死后永享天堂之真福”，让人崇拜上帝“独一真神”，“安于天命”，“安贫守分”。宣称人民受奴役蒙罹苦难，是上帝给予的惩罚。称颂西方传教士为“善人君子”。抨击儒、释、道三教，但认为“儒教所论仁义礼智之性，至精至善之极，与救世真经圣理，略相符合”。它是西方殖民主义文化和中国封建主义文化早期结合的产物，对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起过重要影响。后来作者在马六甲改订，将9本分印成单行本；在新加坡又将其中四本再版，改称《拣选劝世要言》，并把九本小书编成名叫《求福免祸要论》一书出版。

【万国公报】近代英美来华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原名《教会新报》，美国纽约监理会教士林乐知于1868年（同治七年）9月在上海创办，以中国知识界和官员为对象。周刊。专言宗教，影响不大。从1874年9月起改名《万国公报》，除宣传宗教外，也报道时事，发表政论。1883年（光绪九年）8月停刊。1889年2月复刊，改为月刊，成为广学会的机关刊物，是一份有关宗教、时事、政治、文化的综合性刊物。所宣传的改良思想对康有为等维新派有很大影响。戊戌变法期间（1898）发行量达3.8万多份。以后影响渐微。1907年底停刊。

【点石斋画报】画刊名。1884年（光绪十年）5月8日在上海创刊，旬刊。由《申报》附设的点石斋书局石印。随《申报》附送，也单独发售。主编吴有如。张志瀛、周权香、顾月洲、马子明等参加编绘，其均为长于苏州式年画的名手。所载画图，笔触细致，刻划入微，兼中西画法之长。配合《申报》国内外时事新闻，发表有关政治、时事、社会生活的图画。出版时期正值中法、中日战争爆发，先后刊载上百幅时事画，有《法败详闻》、《谅山大捷》及中越人民和台湾人民抗击侵略者斗争的作品，极受欢迎。也有一些内容低级庸俗的图画。开近代画报之先河。其后《飞影图画报》、《新世界画册》等相继告世，涌现出一批“专画新闻”的画家。1894年停刊。

【盛世危言】书名。清末郑观应编著。19世纪70年代郑氏写成《易言》，主张改革。后在此基础上增删扩充，编著成此书。1894年（光绪二十年）刊出5卷本。后作者又根据形势变化，两次增订，1895年出版增订14卷本，1900年出版新编8卷本。书中尖锐抨击时弊，批评洋务运动，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求设立议院，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提出了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对清末的思想启蒙、维新运动影响颇大。出版后，风行海内。除作者手定的3个版本外，坊间自行翻刻的版本在20种以上，卷数、编排均有差异。今人夏东元对此书作了校点整理，收入《郑观应集》中。辛亥革命后，郑观应又另编《盛世危言后编》。

【中外纪闻】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的报刊。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11月，康有为等在北京创立强学会，12月出版机关报《万国公报》，因与外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重名，故

从第 46 期起改名《中外纪闻》。梁启超、汪大燮主笔。双日刊。设有阁抄、照译路透电、选译西报、录各省报、译印西国格致有用诸书等栏目，偶有论说。意在开通风气，介绍西学。因遭御史杨崇伊奏劾，于 1896 年 1 月被封禁，共出 18 期。

【时务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的报刊。1896 年（光绪二十二年）8 月 9 日创刊于上海。汪康年任总理。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先后任主笔。旬刊。设论议、谕折、京外近事、中西报译等栏目。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宗旨。文章议论风发，观点新颖，触及时弊，影响广远。数月之间，风靡海内，销行至 1 万多份。为维新派主要舆论阵地之一。后张之洞以论说太新，频加干涉，梁启超被迫离去，渐失生气。百日维新后期，御史宋伯鲁奏请改为官报，得旨允行，派康有为督办，因戊戌政变发生，康未能到任。1898 年 8 月 8 日出至第 69 册后改名《昌言报》，仍为民办，汪康年主笔，至同年 11 月停刊。

【知新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的报刊。康广仁、徐勤等创办于澳门，1897 年（光绪二十三年）2 月 22 日创刊。初为 5 日刊，后为旬刊，至第 112 册起为半月刊。设论说、上谕、京外近事、各国情况、农事、工事、商事、矿事、中外交涉、各省新闻等栏目。徐勤、何树龄等为撰述。宣传西学，倡言变法，尤注意报导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和活动。戊戌政变后继续出刊，停刊时间不详。出刊于 1901 年 1 月 20 日。

【国闻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的报刊。严复、夏曾佑、王修植等创办于天津，1897 年（光绪二十三年）10 月 26 日发刊。

日报。次月增出旬刊《国闻汇报》。设告白、上谕、直隶制台辕门抄、社论、中外新闻等栏目。以开启民智为宗旨，鼓吹维新变法、救亡图存。是维新派主要舆论阵地之一。1898年12月售与日本人。

【湘学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的报刊。江标、唐才常、蔡钟濬等创办于湖南长沙，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4月22日发刊。旬刊。初名《湘学新报》，自第21册起改名。设史学、时务、舆地、算学、商学、交涉、格致等栏目。唐才常、易鼐、陈为镒等为撰述。主要介绍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维新变法。对于开通湖南的社会风气起了很大作用。戊戌政变后停刊。至1898年8月8日共出刊45册。

【湘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的报刊。谭嗣同、唐才常等创办于湖南长沙，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3月7日发刊。日报。设论说、奏疏、电旨、公牒、本省新政、各省新政、各国时事、杂事、商务等栏目。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樊锥等为撰述。宣传“爱国之理”、“救亡之法”，倡导变法维新，尤注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改革的历史和社会学说，对封建顽固势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戊戌政变后被迫停刊。至1898年10月15日共刊出177号。

【仁学】清谭嗣同著。撰写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至1897年间。2卷，5万余字。戊戌政变后，分别连载于1899年1月至1901年12月的《清议报》（梁启超主编）和1899年1月至1900年2月的《亚东时报》（唐才常主编），文字有不同。1901年10月在日本

东京出版单行本。书中杂糅儒、释、道、墨、基督以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构成一种庞杂的哲学体系。认为世界的本体是“仁”，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而“仁”就是物理学上的“以太”。猛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和“三纲五常”，号召冲决君主、伦常、利禄、俗学、天命、佛法等封建网罗，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

【劝学篇】清张之洞著。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春写成，由其弟子黄绍箕进呈给光绪皇帝。光绪阅后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诏令各省广为刊布，一时风靡。全书4万余言。分内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主要阐述封建纲常名教的重要性；“外篇务通，以开风气”，说明可以变通学习外国，举办工商，开学校、报馆等。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了洋务派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纲领，抨击维新派的民权主张，受到洋务派和封建顽固派的称赞。1900年美国纽约出版此书的英译本，题为《中国唯一之希望》。同时有法文译本。

【天演论】书名。清末严复译。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所著，1894年（光绪二十年）出版。1895年严复将此书译出，1898年出版，以“天演”名。“天演”即进化。译著分上下卷，计35篇。卷首有严复序，书中夹译者按语29条，以引伸阐发其意。系统介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阐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原理，认为这一原理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不仅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人类社会。严复的目的在于说明中国如能顺应“天演”规律而变法维新，就会由弱变强，否则将沦于亡国灭种。这种观点为当时学界普遍接受，鼓舞了国人爱国救亡

和变法维新的信心，成为社会进步势力的思想理论武器，对中国近代的思想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

【清议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的报刊。梁启超创办于日本横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12月23日发刊。旬刊。设论说、名家著述、文苑、外论汇译、纪事、群报撷华等栏目。梁启超任主编。以开民智、振民气为宗旨。一面抨击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一面颂扬光绪皇帝。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影响尤为广远。因火灾于1901年12月21日停刊。共出100期。其后横滨新民社曾汇出《清议报全编》26卷，内容多有增删，编次也有变动。

【楹书】书名。章炳麟著。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冬在苏州付梓，次年出版。收录了作者于戊戌变法前后所撰政论文章52篇。后受义和团运动影响，对内容作较大变动，删去主张改良的文章13篇，增加宣扬反清革命的文章24篇，编为65篇，于1904年重印于日本。内载《客帝匡谬》、《分镇匡谬》、《序种》、《原教》、《尊史》、《哀焚书》、《哀清史》、《解辫发》诸篇文章，包涵了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当时产生巨大反响。后两度增删，1914年更名为《检论》出版，凡9卷，63篇。《章太炎全集》第三册，收有初刻本、重订本和《检论》三种。

【中国日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最早报刊之一。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酝酿筹备，次年1月25日在香港创刊。馆址在士丹利街24号。陈少白、冯自由、谢英伯、卢信等先后主编，陆伯周、黄鲁逸、郑贯公、张继、胡汉民、汪兆铭、朱执信等参

与编撰。初为香港兴中会机关报，后成为同盟会的言论机关，并出10日刊《中国旬报》，刊载长篇时论和译稿，合称《中国报》。开辟栏目有论说、评论、国内新闻、外国新闻、广东和香港新闻、要闻、来稿、来件、电报等。另辟文艺附刊“鼓吹录”专页。初每月四开一张半，共6页，后增至两张8页，横排短行。创办初期以“救国保民”、“复兴中国”，成“维新之盛治”为宗旨，言论较温和，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后渐趋激烈。鼓吹民族主义，揭露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罪行，介绍欧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人权学说，宣传三民主义，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反对君主立宪。与改良派的《商报》、《岭海报》、《新民丛报》长期论战，有力地配合了革命派的政治斗争。文艺附刊“鼓吹录”分小说、杂文、词苑、史谈、博物等栏，以生动活泼，诙谐幽默的文字，讥刺时政，抨击时弊，深受读者欢迎。辛亥革命后报馆迁至广州，成为国民党的宣传机关，反对袁世凯政治独裁，维护共和制。“二次革命”失败后，被龙济光查封。

【新民丛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刊物。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2月8日在日本横滨创刊。半月刊。署冯紫珊编辑兼发行，实由梁启超、蒋观云先后主编。主要撰稿人有马君武、韩文举、欧榘甲、蒋方震、麦孟华、徐勤等。设论说，学说、政治、短评、中国近事、海外汇报、史传、地理、教育、学术、兵事、宗教、名家谈丛、小说、文苑等栏目。初期着重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鼓吹君主立宪，并激烈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把持的清政府，深受读者欢迎，影响广远。但后来把资产阶级革命派作为主要敌手，大肆攻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坚持立宪保皇立场，影响渐衰。1905年以后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展开论

战，以失败告终。1907年11月自行停刊。共出版96期。

【游学译编】清末湖南留日学生创办的进步杂志。1902年11月16日（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在日本东京创刊。月刊。由湖南留日学生组成的东京游学译编社编辑。熊野萃主编，长沙矿务总局发行。杨度、周家树、陈润霖、周宏业、曾鲲化、黄兴、张孝准等编译。共出12期，每期50余页。以“输入文明，增益民智”为宗旨。所设栏目有：学术、教育、军事、实业、理财、内政、外交、历史、地理、时论、新闻、小说等。刊载稿件，以译述为主，兼刊论著。除介绍域外新知，世界大势外，还鼓吹发展实业，推行近代文明教育。1903年拒俄事件后，言论日益激烈。所刊《满洲问题》、《民族主义之教育》、《19世纪欧罗巴历史之壮观》等文，公开宣传反满，主张“下等社会”与“中等社会”结合起来，实行民族民主革命。1903年11月停刊。

【浙江潮】杂志名。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2月17日在日本东京创刊。月刊。共出12期，每期60余页。由中国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主办，孙翼中、蒋方震、马君武、蒋智由、王嘉榘等任编辑。以“输入文明”，“发其雄心”，“养其气魄”，“汹涌革命潮”为主旨，设有社说、论说、学说、大势、记事、杂录、小说、文苑、谈丛、时评、专件、调查会稿、浙江文献录、图画等栏目。宣传反清的民族革命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批判改良派的“和平立宪”主张，鼓吹“革命造反”，积极传播西方社会政治学说。

【革命军】书名。邹容著。1903年5月（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上海

大同书局刊行。1册，2万余字。作者以浅近通俗的语言，揭露和抨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腐朽和黑暗，论证在中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提出明确而系统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全书以“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的口号结尾。刊行后，受到热烈欢迎，风行海内外，销量达110万册。对于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猛回头】书名。陈天华著。撰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夏。全书分4章，2万字左右。书面印有黄帝像。以通俗的唱词形式，描写了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宰割瓜分的民族危机，抒发了亡国哀痛，号召人们发扬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结合起来，同时主张学习西方，建立完全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本书初刊于日本东京，后几度重版，广为发行，对于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曹亚伯撰《武昌革命真史》前编将本书全文收录。后辑入《陈天华集》。

【警世钟】书名。陈天华著。撰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秋。全书2万余字。以通俗浅显的文字，激昂饱满的爱国热情，痛陈当时中国面临瓜分豆剖的险境，愤怒控诉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沉痛指明清廷的卖国政策和腐朽统治是造成民族危机的祸根，呼吁各阶层人民警醒，团结起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腐朽卖国的清政府，用武装斗争的手段共同担负起救国的重任。本书初刊于日本东京，后一再重版，广为散发，成为当时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最大的宣传物之一。曹亚伯撰《武昌革命真史》前编全文收录本书初刊本。后辑入《陈天华集》。

【黄帝魂】书名。黄藻（署名“黄帝子孙之一个人”）编。一册。辑录了清末报刊有关反清革命的论著，较重要者有《国民报》的《亡国篇》、《正仇满论》、《中国灭亡论》；《开智录》的《义和团有功中国说》（即《义和团与中国之关系》）；《苏报》的《驳革命驳议》；《国民日日报》的《黄帝纪年论》、《王船山史说申义》等。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由上海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刊行初版，时有29篇。此后一再重刊，篇目互有增删，1911年（宣统三年）增至44篇。现有台北《中华民国史料丛编》本。

【新湖南】书名。杨笃生（署名“湖南之湖南人”）著。写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线装一册。全书分为六篇，主要有“绪言”，“湖南人之性质及其责任”，“现今大局之危迫”，“湖南新旧党之评判及理论之必出于一途”，“破坏与独立”等。书中主要批判了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言论，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卷首附有湖南省全图。初版刊行于日本，1910—1913年曾两次重刊，对当时思想界影响颇大。

【中国白话报】清末报刊名。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12月在上海新闻创刊。初为半月刊，自13期起改为旬刊。1904年10月出至24期停刊，最后4期合一册发行。设有论说、历史、地理、传记、新闻、时事问答、科学、实业、小说、戏曲等栏目。每期60至80页，约3万字，32开本，采用洋式装订。主办人林獬（又名少泉，后改名白水），福建侯官人，留日学生，自号白话道人，撰写了大量稿件。刘师培也是主要撰稿人。内容以“鼓吹爱国救亡”为宗旨。载有《黄黎洲》、《说君祸》、《白话扬州十日记》等

文章，揭露列强侵略罪行及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激发人民的反清革命热情。提倡白话文。所刊文章通俗易懂，生动形象，深受读者欢迎。是当时出版的白话文刊物中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一种。

【国粹学报】清末国粹派的机关刊物。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2月23日正式创刊于上海。旬刊。1911年（宣统三年）9月停刊，共出82期。由邓实任主编。主要撰稿者有章炳麟、刘师培、黄节、马叙伦、黄侃、陈去病、柳亚子等人。分社说、政篇、史篇、丛谈、撰录等栏。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主要发表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训诂学等研究国粹的学术论文，并附有明末遗民撰著和图片，宣传国粹和反清思想。

【民报】中国同盟会机关报。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创刊。其前身是《20世纪之支那》。社址设在同盟会总机关所在地——东京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署名“群智学社”）。初为月刊，因经常脱期，改为不定期。主编先后有张继、章太炎、陶成章、汪精卫。经常撰稿人有朱执信、廖仲恺、陈天华、宋教仁、黄侃等。设图画、社论、时评、译丛、谈丛、小说、纪事、说林、来稿等栏目。以宣传同盟会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宗旨，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舆论阵地。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刊物《新民丛报》等进行论战，鼓吹暴力革命和共和制度，反对改良和立宪，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扩大了同盟会的政治影响。1908年10月出版第24号时，日本政府以其“激扬暗杀”为词封禁。1910年初秘密印刷两期后停刊。

【中国女报】清末妇女刊物。月刊。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1月14日创刊于上海。社址在上海北四川路厚德里91号。寄售处有上海、北京、武昌、绍兴等地。著名女革命家秋瑾主编，陈伯平任编辑。主要撰稿人有吕碧城（曾任天津女子师范总教习）、燕斌（同盟会员）、黄公、徐双韵、陈志群、白萍等。内容分论说、演坛、译编、传记、文苑、小说、新闻、调查、唱歌等栏目。“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所刊文章多鼓吹民族民主革命，主张男女平权，反对包办婚姻和缠足，批判纲常名教。共出两期。秋瑾就义后，与《女子世界》合并，改名《神州女报》。

【民立报】清末民初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1910年（宣统二年）10月11日在上海创刊。日报。于右任主办。宋教仁、范光启、景耀月、章士钊等先后任主编，徐天复、吕志伊、杨千里、叶楚伦、马君武、张季鸾、王无生等参与编撰。以提倡国民独立精神，培植国民独立思想、建立独立之民族和保卫独立之国家为宗旨。编辑部分论说、批评、纪事、杂录、图画五部。设社论、外论、译论、谕旨、宫门抄、专电、译电、新闻、大陆春秋、上海春秋、杂录（小说、文苑、新剧、世界丛谈、诗话）、科学丛话、东西南北等栏目。以刊发新闻为主。日出三大张。针砭时弊，揭露君主立宪骗局，批判封建专制制度，谴责帝国主义侵略，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号召推翻满清政府。辛亥革命时，积极报导各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反对南北议和，鼓吹北伐，倡言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并发起社会主义的讨论，刊登了宋教仁的《社会主义商榷》等文。1913年，“宋案”发生后，率先公布袁世凯刺宋真相。9月4日被袁世凯查封，于右任逃亡日本。此报发行3年多，共出

1036号。

【中华民国公报】辛亥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的机关报。1911年（宣统三年）10月16日在武昌创刊。日报。张芸天、牟鸿勋先后任社长，牟鸿勋、张越、蔡良村、胡捷先后任主编，任素（岱青）、张祝南（肖鹄）、韩玉辰、邢伯谦、朱峙三等任编辑。以“开通民智、鼓荡民气、推倒恶劣政府而建共和国”为主旨，以刊发军政府文告、檄文、军法、律令为主要内容。设政论（社论、时评）、新闻、副刊三大部分。报馆机构完整，设编辑、校对、发行、会计、印刷等部门。经费由湖北军政府拨给。1912年1月易名为《临时政府公报》，迁南京出版。1913年底自行停刊。

【大同书】康有为著。大约从1884年（光绪十年）开始酝酿写作，1901—1902年基本完稿，以后陆续修订。在这部书中，康有为继承了古代儒家的大同思想，吸收了佛教、基督教中的平等思想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描画出一个美丽的乌托邦。书中充满宗教情怀，它企图向人们说明，只要信奉孔教，就能够进入到大同世界，在那里人们不仅享有极大丰富的物质生活，人性获得完全解放、得到全面发展，而且还将炼形成仙、炼魂成佛，甚至出入星际，享受“天游之乐”。它是近代中国唯一一部系统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大同书》1913年在《不忍》杂志上发表前两部分，即甲部和乙部。193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康有为弟子钱定安校订的本子。1956年古籍出版社根据抄本并校以其他版本出版了较完备的本子。近年来发现稿本，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孙文学说】书名。又称《心理建设》。孙中山撰写的《建国方

略》的一部分。1918年5月广东护法军政府改组后，孙中山愤而辞职，离粤赴沪。在上海法租界（今香山路中山故居）发愤著书，力图从哲理上总结革命经验教训，启发国民唤醒社会，鼓舞同志，继续奋斗。这部著作写成于1918年12月，次年6月正式出版。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宇宙进化论和生元（即生命现象——细胞）说，并将进化论引入认识论领域。批判了朱熹、陆九渊等“知先行后”或“知行合一”的唯心观点，批评了国民党内存在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畏难苟安思想，提出“知难行易”学说。认为行知相较，行在先，知在后，行是知的基础，“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则”。对于克服革命党人内部轻知怯行的“心理之大敌”，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一学说又存在着某种理论缺陷，如按所谓“天赋才能”的高低，将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类，陷入唯心论。

【光绪朝东华录】书名。又名《东华续录》。朱寿朋编纂。此前，蒋良昧、王先谦、潘颐福等先后辑录成《东华录》、《十一朝东华录》等书，起自清初迄于同治朝。朱氏仿照蒋、王等所编《东华录》体例，收录光绪一朝的朝章国典、军政大礼及列传有关材料辑成。主要依据邸钞、京报，部分采录当时的报纸记载。所述内容起自1875年（同治十三年十二月），迄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共220卷，460万言。按时间顺序编排，逐年逐月乃至逐日记载。较后出的《光绪朝实录》约增四分之一。1909年（宣统元年）由上海集成图书公司铅印出版，共64册。1958年中华书局根据集成图书公司本整理重印，不列卷数，分装5厚册出版发行。与《实录》详略互见。较系统反映了光绪朝的内政、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大事。是一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编年体资料

长编。

【筹办夷务始末】书名。清代官方编纂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汇编。分为道光朝、咸丰朝、同治朝三部长编汇集。咸丰初因协大学士杜授田建议，清廷始谕令设馆编纂。《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80卷，内容起自1836年（道光十六年）议禁鸦片，终于1849年阻止英人入广州，由内大臣文庆等编。《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80卷，内容起自1850年（道光三十年）2月，止于1861年（咸丰十一年）8月，大学士贾桢任监修总裁官。《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100卷，内容起自1861年（咸丰十一年）8月，止于1875年（同治十三年）12月，监修总裁官为宝鋆。各书均按年编次，内容包括上谕、廷寄、内外臣工奏议、中外照会、信函、条约等，保存了清政府在这三朝对外交涉事件中的重要资料，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近代外交史的重要历史文献，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编成后数十年间未行世。1929年故宫博物院先影印《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继将咸丰、同治二朝影印刊行。1964年、1979年中华书局先后出版齐思和等整理标定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咸丰朝）》，书后附索引，便于使用。

人 物

【马礼逊】（1782—1834）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07年（嘉庆十二年）9月到中国广州。来华后刻苦学习中国语文。1809年起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任职25年，充当翻译，并行医传教。编

有《汉语语法》、《华英字典》、《广东省土话字汇》，并翻译出版中文的《新约全书》、《新旧约全书》等。1815年与另一传教士米怜一起，在马六甲创办一份以中国人为读者的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1816年担任英国来华使节阿美士德的翻译到过北京。1824年（道光四年）回国，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26年再度来华。1833年担任英国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的中文秘书，为律劳卑出谋划策，向广东地方官员施加压力，进行挑衅。曾多次建议英国政府在中国自设法庭，取得治外法权。所搜集的有关中国情报和提出的对华政策建议，对英国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有很大影响。

【律劳卑】（1786—1834） 英国贵族，上院议员，海军大佐。曾参加1805年英法特腊法耳加海战。1833年（道光十三年）12月被任命为英国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任务是在中国开辟商埠和获取海军据点。次年7月到达广州，要求直接会见两广总督卢坤。遭到拒绝后，仍坚持驻在广州。卢坤为迫使他离去，于9月2日下令封舱，停止中英贸易，命令所有买办、翻译及仆人离开商馆。他立即进行武力恫吓，命令两艘英舰闯入珠江，轰击虎门炮台，遭到岸上清兵的炮击。被迫退驻澳门，不久病死。这一事件对后来英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加速了对华战争的准备。

【许乃济】（1777—1839） 清末官员。字叔舟，号青士。浙江仁和（今杭州）人。1809（嘉庆十四年）中进士。历任御史、广东按察使、太常寺少卿等职。在鸦片走私泛滥时，主张弛禁鸦片。1836年5月向道光皇帝上《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建议允许鸦片按药材进口纳税，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听任民间种

植和吸食鸦片。这一建议得到广东地方大吏的支持，但受到严禁派的抨击。礼部侍郎朱崧、兵科给事中许球、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先后上折列举鸦片的种种危害，全面批驳他的弛禁论。1838年11月，道光皇帝采纳黄爵滋等的严禁主张，决心禁绝鸦片，重治吸食者，同时惩罚弛禁论者，他被降为六品顶戴，罢官告退。

【关天培】（1781—1841）清末将领。字仲因，号滋圃。江苏山阳（今淮安）人。出身行伍。历任江苏太湖营水师副将、江南苏松镇总兵、署江南提督。1834年（道光十四年）任广东水师提督。时值鸦片走私猖獗，他增修虎门诸炮台，认真操练军队，警惕西方侵略。1839年，全力协助钦差大臣林则徐查禁广东鸦片走私，查拿烟贩，收缴鸦片。11月穿鼻海战时，指挥官兵发炮，击伤英舰，迫使其败逃。又调集官兵进攻尖沙嘴、乌涌，驱退盘踞在那里的英国侵略者。1840年11月，钦差大臣琦善到广东，裁撤江防，裁减水师。1841年2月，英国舰队乘虚进攻虎门炮台，他率军死战，创痕遍体，血透衣襟，与将士400多人壮烈战死。著有《筹海初集》。

【葛云飞】（1789—1841）清末将领。字鹏起、凌台，号雨田。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1823年（道光三年）中武进士。历任守备、总兵。治军严明，与兵士共甘苦，甚得军心。1838年（道光十八年）任定海镇总兵。次年，丁忧回籍。行前，上书建议加强海防，防备外国人利用查禁鸦片为借口而用兵。1840年7月，英军攻陷定海后，奉浙江巡抚乌尔泰之召，返回原任，筹划收复定海。1841年3月，根据琦善与义律在广州商议的《穿鼻草约》的有关规定，和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率兵渡海，接

收定海。得到两江总督裕谦同意，在定海修筑一道土城、一座炮台，加强防务。建议增设营船，以备水战，但不被采纳。9月，英军再犯定海时，与王锡朋、郑国鸿协力抗敌，血战6昼夜。王、郑牺牲后，独自率领200多亲兵，持刀冲入敌阵，短兵相接，受伤40余处，仍拼死奋战，不幸中炮牺牲。著有《名将录》、《制械要言》、《制药要言》、《水师缉捕管见》、《浙海险要图说》及诗文多卷。

【龚自珍】（1792—1841） 清末思想家。又名鞏祚、易简、自暹，字璦人，又字爱吾、伯字，号定庵、羽琨山民、观实相之者。浙江仁和（今杭州）人。1812年（嘉庆十七年）由副榜贡生考充武英殿校录，后任内阁中书。1829年（道光九年）中进士，历官宗人府、礼部主事。1839年辞官南下，两年后病逝于丹阳云阳书院。少时从外祖父、著名汉学家段玉裁治文字学。在京师尝从今文经学大师刘逢禄讲习公羊学，接受今文经学派的思想观点，并提倡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从青年时起，对清朝统治的黑暗、腐败不满，著文赋诗，抨击时弊，讥讽流俗，借古讽今，开清末士大夫“慷慨论天下事”的风气。在针砭时政的同时，向统治者发出“更法”、“改图”的呼声，并提出一系列改革的具体主张，如改八股文为策论、兴修水利、限制豪强兼并土地、加强西北边疆建设、在北方栽种水稻、废除妇女缠足等，企图以社会改良的办法“补天”。林则徐赴广州禁烟前夕，他撰文相赠，痛斥英国鸦片侵略，支持林则徐采取坚决措施禁绝鸦片，严惩破坏禁烟的官吏绅商；建议修整军备，加强防御。擅长诗文，自成一家。其散文导源于周秦，纵横奇诡；诗词植根现实，深沉含蓄，瑰丽奇肆，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许多诗文都能为他在政治、经济上的改革思想和揭露

时弊服务，打破了清代中叶以来为文拘于桐城派“义法”的僵化局面，首开关心国事民情的风气，成为后来文学改良的先驱。提倡“尊史”，以变易和进化的观点研究历史。著有《明良论》、《西域置行省议》、《春秋决事比》、《己亥杂诗》、《乙丙之际箸议》及诗文集多种。今人辑有《龚自珍全集》。

【裕谦】（1793—1841） 清末官员。原名裕泰，字鲁山、衣谷，号舒亭。博罗忒氏。蒙古镶黄旗（今锡林郭勒盟商都镶黄旗）人。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中进士。历任礼部员外郎、湖北荆州知府、武昌知府、江苏按察使等职。为官清廉，体察民间疾苦，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对于鸦片泛滥问题尤为关注，主张严禁。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时，署两江总督，反对妥协，坚持抗战。次年2月，受命为钦差大臣赴浙江办理海防，上书奏劾琦善“违例擅权”，反对杨芳对英妥协。10月英军攻陷定海后，又进攻镇海，他亲自擂鼓督战，严辞拒绝提督余步云向英军投降的请求，誓死抗敌，终因势孤力单，镇海失陷。悲愤不已，自沉洋池，以身殉国。

【陈化成】（1776—1842） 清末将领。字业章，号莲峰。福建同安县（今属厦门市）人。出身行伍，历任把总、参将、总兵等职。1830年（道光十年），升任福建水师提督。从1832年起，多次击退英国军舰的武装挑衅。以英勇善战闻名，人称“陈老虎”。1840年调任江南提督，积极在吴淞练兵设防。1842年6月，英军进犯吴淞口时，两江总督牛鉴要他向英军求和，被严辞拒绝。亲自在西炮台指挥作战，负伤七处，仍坚持战斗，亲自燃放大炮，击伤英舰多艘，使英军遇到侵华以来最猛烈的炮火。后因牛鉴和苏松

镇总兵周世荣溃逃，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力战不支，以身殉国。

【伊里布】（1772—1843） 清末官员。字莘农。爱新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1801年（嘉庆六年）中进士。历任通判、知府、按察使、巡抚等职。1838年（道光十八年）任云贵总督。次年调任两江总督。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受命为钦差大臣，赴浙江筹办进剿，但慑于英军船炮，主张妥协。定海被英军侵占后，竟派人去犒赏英军，并私自与英军订立浙江停战协定，承认英军继续占据舟山及附近小岛，因此获罪，旨令革职逮问。1842年春，道光皇帝决心与英军议和，他被重新起用，赏七品衔，跟从两广总督耆英与英军议和。8月和耆英一起代表清政府和英国代表璞鼎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9月，受命为钦差大臣、广州将军，赴粤办理中英交涉事宜，千方百计压制广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逮捕爱国知识分子钱江、何大庚，结果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1843年，在广东人民反侵略斗争的高潮中，惊忧病死。

【查顿】（1785—1843） 又译查甸。英国鸦片贩子。苏格兰顿弗里郡人。1803—1814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上当外科医生。1819年脱离东印度公司，留在孟买，专门从事对华鸦片走私。1822年（道光二年）到广州，1827年加入老牌鸦片贩子在广州开设的莫克尼亚克洋行。1832年，与另一大鸦片贩子马地臣一起把莫克尼亚克洋行改名为“怡和洋行”，使之成为最大的鸦片走私公司。除在广州销售鸦片，还租飞剪船出驶上海、天津进行走私。靠走私致富，拥有财产100万英镑。1836年，许球在一道禁烟奏折中检举他的种种劣迹，要求查办。道光皇帝谕令查明驱逐，他以“清理帐目”为借口，又逗留两年。1839年1月，见中国禁烟形势

日益严峻，逃回英国，到处奔走游说，煽动对华战争。10月，两次致函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提出对华作战的具体计划和战后要求：五口通商、赔偿烟价、订立条约。建议大体为英国政府采纳。1841年，当选为下院议员，更狂热地鼓吹侵华。

【邓廷桢】（1775—1846） 清末官员。字维周，号嶰筠。江苏江宁（今南京市）人。1801年（嘉庆六年）中进士。1826年（道光六年），任安徽巡抚，整顿吏治，兴修水利，赈济灾民，颇有政声。1835年任两广总督。时鸦片走私猖獗，为害深巨，引起朝野忧虑。他从堵塞白银外流的角度出发，曾赞成许乃济提出的弛禁鸦片的主张，后受严禁派的影响，转而主张严禁，上奏支持黄爵滋的严禁主张，并在广州地区严厉查禁鸦片。1839年初，负责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抵粤，他积极配合，厉行禁烟，整顿海防，屡挫英军挑衅。1840年1月，调任两江总督，后又调任闽浙总督，锐意整顿海防，加强守备。8月，闻报英军进犯厦门，立即赶赴泉州，指挥抗敌。10月，受投降派诬陷，与林则徐同时被革职，并奉诏赴广东以备查问原委。1841年6月，因靖逆将军奕山在广东战败，牵连获罪，发配伊犁（今伊宁市西）。1843年释还，任甘肃布政使，清查甘肃荒地，招募垦荒，颇有劳绩。1845年升任陕西巡抚，旋又署理陕甘总督，镇压甘肃少数民族起事。次年病逝。生平好诗词。遗著有《双砚斋诗钞》、《妙吉祥室词》等。

【旻宁】（1782—1850） 清代第六位皇帝。爱新觉罗氏。满族。年号“道光”。庙号宣宗。史称道光皇帝。1820—1850年在位。在位期间，一直为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和国内农民的反抗斗争所困扰。屡次下诏，申禁鸦片，却因吏风腐败，禁而不止。1838年（道光十

八年)，命各省将军、督抚讨论鸿胪寺卿黄爵滋的《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确立严厉查禁鸦片的方针。12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负责禁烟，禁烟运动由此蓬勃开展。1840年8月，英国舰队抵达天津白河口，投递照会，使他对禁烟发生动摇，派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军谈判，许诺严办林则徐。9月，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继续与英军谈判，同时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1841年初，闻报琦善私自与英方签订丧权辱国的《穿鼻草约》和英军强占香港，即命将琦善锁拿解京，并先后派皇侄奕山、奕经率军抗击入侵的英军，均遭失败。英舰队进入长江水面，兵临南京。1842年8月，派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军议和，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后又与美国、法国分别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国从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国内阶级矛盾更加尖锐，特别是湖南和广西不断爆发民众起义，他竭力进行镇压。

【清宣宗】 见“旻宁”。

【道光皇帝】 见“旻宁”。

【林则徐】（1775—1850） 清末政治家。字元抚，又字少穆，晚号谿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谥号文忠。1811年（嘉庆十六年）中进士。历任江西乡试副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江苏按察使、江宁（今南京）布政使等职。1831年（道光十一年）任河东河道总督，主持修治黄河。1832年任江苏巡抚，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政绩颇佳。1837年任湖广总督，在两湖地区查禁鸦片，收到实效。1838年9月上书道光皇帝，支持鸿胪寺卿黄爵滋

严禁鸦片的主张，指出鸦片输入造成“兵竭银涸”的后果。12月底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负责查禁鸦片。次年3月抵达广州，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水师提督关天培等查禁鸦片，迫使英美鸦片贩子交出鸦片2万多箱，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同时加强沿海战备，购买外国商船改装战舰，补充水师，招募水勇，屡次击败英军的武装挑衅。为了解外国情况，组织人员搜集外文书报，编译成《华事夷言》、《四洲志》等书稿。1840年1月实授两广总督。6月，与关天培等在广东沿海坚决抵御英国侵华远征军。9月，他感到道光皇帝对抗英发生动摇，便上疏自请治罪，并驳斥战争起于禁烟的诬陷之词，遭到道光皇帝的斥责。10月，被革职，留粤以备查问差委。1841年2月，说服怡良上奏揭露钦差大臣琦善向英军妥协投降的罪行，致使琦善被锁拿解京问罪。4月，奉诏以四品卿衔赴浙江听候谕旨。6月，抵达浙江镇海军营，协助研铸大炮，仿西式设计制造新式炮车和车轮战船。旋因靖逆将军奕山在广东战败，牵连获罪，被发配伊犁。赴戍途中，因黄河在河南祥符决口，奉旨赶赴祥符工地效力赎罪。治河工程竣工后，仍遣戍。1842年12月抵达伊犁（今伊宁市西），留心研究新疆史地，讲求防边之策。1843年秋冬，协助伊犁将军布彦泰办理阿齐乌苏废地垦务。又奉旨勘察南疆垦地，倡导兴修水利，推广坎井和水车。通过实地考察，感受到沙俄的潜在威胁，建议改屯兵为操防，实行兵农合一，以加强边防力量。1845年11月，释还，命以三品顶戴署陕甘总督。1847年4月，任云贵总督，镇压汉、回人民起义。1850年，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天地会起义，行至广东普宁县病死。晋赠太子太傅。生平爱好诗词、书法。著作有《云左山房文钞》、《云左山房诗钞》、《使滇吟草》。今人将其遗著辑为《林则徐集》。

【颠地】 英国鸦片贩子。长期在中国广州从事鸦片走私活动，开办的宝顺洋行是一家仅次于查顿和马地臣开办的怡和洋行的鸦片走私公司。清广州地方大吏将他视为外国不法商人的“渠魁”。禁烟运动开始后，极力进行破坏，在1839年（道光十九年）3月21日“外侨商会”的集会上，怂恿英美鸦片贩子对抗林则徐关于缴烟的谕令，拒绝缴烟。林则徐谕令拿办，他在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的庇护下，企图逃离广州，但被洋馆中雇用的中国工人截住，被迫缴出1700箱鸦片，并被驱逐回国。8月7日，与另外8名鸦片贩子在伦敦召开紧急会议，煽动英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产生不小影响。

【萧朝贵】（约1820—1852） 太平天国领袖之一。广西武宣县东乡上武芝村人。壮族。贫苦农民家庭出身。为生活所迫，迁到桂平隘山下古棚落户，以种山烧炭为生。经冯云山动员，加入拜上帝教。对宣传拜上帝教，动员组织群众极为热心。在实践斗争中，成为武宣、象州广大山民的领袖人物，人们称呼他为“萧将军”。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冯云山被地主团练拘捕入狱，拜上帝会众因失去领导，人心浮动，萧以“天兄”下凡传言身份，安定众心，从此成为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之一。与杨秀清一起实际负责金田起义的策划和组织工作。起义时被任命为前军主将，“勇敢刚强，冲锋第一”。1851年（咸丰元年）3月驻军武宣东乡时，即以战功受封为“右弼又正军师前军主将”。12月封为西王、八千岁。次年4月，从永安突围，参加城东平冲、旱冲、崩冲之战，大败追敌，进围桂林。旋解围北上湖南，占道州（今道县）。和东王杨秀清署名发布《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及

《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三篇檄文，揭露清朝政府的腐败，阐明太平军志在推翻清朝与建立太平社会，号召群众起义响应，将太平天国运动推向高潮。8月中旬，进至嘉禾、蓝山、桂阳州（今桂阳）和郴州（今郴县），随即奉命率部克永兴、安仁、攸县、茶陵与醴陵。9月中旬攻长沙城，破敌连营七、八里，阵斩清官兵2000余人。后又率牌刀手攻打南门，不顾清军炮火，匹马当先，在战斗中中流弹阵亡。

【冯云山】（约1815—1852）太平天国领袖之一。又名乙龙。广东花县人。出身一个富庶农家，自幼学习刻苦，与洪秀全有相同的经历，屡试不第，渐萌反抗思想。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与洪秀全等一起创立拜上帝教。后与洪秀全在广东、广西传教，但成效不大。1844年底洪秀全回广东家乡后，他只身留广西继续传教。不久，进入紫荆山区，先打短工，后作塾师，在农民和烧炭工人中开展宣传组织活动。皈依上帝教者日众，于1846年后创立拜上帝会。到洪秀全1847年8月重返广西时，紫荆山地区已拥有会员3000余人，并开辟了武宣、象州、平南、贵县、博白及广东信宜等根据地。因捣毁象州甘王庙及偶像，被地主团练头子王作新告发入狱。经利用合法斗争，获无罪释放。冯一向尊崇洪秀全的领袖地位，并承认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的传言身份，甘居杨、萧名下。1850年6月团营令发布后，与洪秀全一起转至平南花洲山人村布置起义。1851年（咸丰元年）1月1日，又和洪秀全一起指挥桂平蔡村江之战，击毙清将伊克坦布。参加领导1月11日金田起义。3月封为后军主将，12月在永安（今蒙山）封为南王。太平天国永安建制（包括军制、军律、历法、官制、礼制），多出其手。清方评论他说：“倡乱以来，用兵诡谲，几

于不测，所有伪谕，悉出主裁”。1852年5月攻全州时中炮受伤，6月逝于蓑衣渡。年仅30余岁。

【黄爵滋】（1793—1853） 清末官员。字德成，号树斋。江西宜黄人。1823年（道光三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监察御史，兵科、工科给事中，鸿胪寺卿，礼部、刑部侍郎。与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姚莹等人志趣相投，提倡经世之学，主张刷新吏治，整顿军务，敢于直谏，深负时望。在鸦片走私泛滥时，主张严禁鸦片。1838年6月上《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建议从“重治吸食者”入手来禁绝鸦片，以堵塞白银外流。此折在清廷内部引起论争，得到林则徐等严禁派的支持，促使道光皇帝决心禁烟。禁烟运动开始后，两次被派往福建查办鸦片走私问题，筹设海防。通过实地调查，重新绘成《海疆全图》上下两册，进呈给道光皇帝，作为了解沿海形势的依据。1843年因户部银库案牵连获罪，罢官责赔。后以员外郎候补。著有《黄少司寇奏疏》、《仙屏书屋诗录》、《仙屏书屋文录》等。

【琦善】（1790—1854） 清末官员。字静庵。博尔济吉特氏。满州正黄旗人。袭侯爵。历任郎中、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将军等职。深受道光皇帝的宠信和倚重。1838年（道光十八年）清廷讨论黄爵滋的《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时，他反对黄爵滋关于从“重治吸食者”入手来禁绝鸦片的建议，认为吸食者太多，罚不胜罚，建议封锁海口，断绝中外通商，从而禁绝鸦片。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在直隶（今河北省）总督任上，不作任何战守准备。8月，英军舰船到达天津白河口，以武力要挟谈判，他奉旨与英军谈判，允诺重治林则徐等。9月，受命为钦差大臣、署两广

总督，到广州继续与英方谈判，到广州后，一味妥协，自动撤除海防，遣散水勇，重用汉奸。1841年1月，擅自与英方谈判《穿鼻草约》，表示愿上奏请割让香港。以此获罪，旨令锁拿解京，被判“斩监候”。由于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疏通和道光皇帝的袒护，不久又重新被起用，先后任驻藏大臣、四川总督、陕甘总督等职。1853年（咸丰三年）受命为钦差大臣，专办防务，对付太平军。与直隶提督陈金绶在扬州建立江北大营，威胁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次年秋，病死军中。

【包世臣】（1775—1855） 清末学者。字慎伯，晚号倦翁。安徽泾县人。1808年（嘉庆十三年）中举人。长期担任地方大吏的幕僚，直到64岁时（1838年，道光十八年）才当上江西新喻知县，但仅一年多即被排斥罢官。平时留心经世学问，究心农政、河工、漕运、盐政、货币、战守诸问题，为时人推重。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主张“本末皆富”，建议发展工商业和货币经济，反映了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较早揭露鸦片走私的危害，主张严禁鸦片。鸦片战争爆发后，积极主张抗击英军，曾向林则徐、杨芳建议招募广东沿海渔民丁壮参与作战，要求起用爱国将领，振作士气。1842年8月英舰进逼南京时，连夜写成《歼夷议》，提出击杀英军的方策，但不为当事者所用。著有《小倦游阁文集》、《艺舟双楫》、《齐民四术》等，主要著作别编为《安吴四种》。

【罗大纲】（约1810—1855） 太平天国将领。广东省潮州府揭阳县人。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在广西荔浦马岭以设染房为名，组织天地会，从事反清斗争。后活动于武宣、阳朔、平南、永安（今蒙山）和桂平一带。1851年（咸丰元年）1月率部在大湟江加

入太平军，封左二军军帅。9月率军克永安，后入湖南。次年12月占岳州（今岳阳），擢金官正将军。1853年1月，任殿左一指挥。3月攻占江苏镇江。5月，为殿左五检点。7月，封冬官正丞相。10月，调安庆。1855年1月，同石达开先分割湘军水师为内湖外江两部；2月，从小池口与石达开、林启容等自九江两路合败湘军水师，后留守九江。7月，率部东返，进攻秣陵关，以援安徽芜湖，8月，败退。约于此时重伤，回京后不治身亡。后追封奋王。

【刘丽川】（1820—1855） 清末小刀会起义领袖。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农民出身。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在香港参加天地会。1849年，赴上海，因会说英语，曾为商场经纪人及丝茶栈伙，并充任草药医生，为人治病。同时继续从事天地会活动，成为居沪广东籍天地会成员的首领。1853年（咸丰三年），广东籍天地会与沪其他会党并入“小刀会”，又被推为上海小刀会首领，积极开展组织群众发动起义工作。9月7日，起义军占领上海，他称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旋改为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上书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表示愿意接受太平天国领导。后与清军及英、美、法入侵者坚持战斗18个月。在小刀会内部，以他为首的广东帮与陈阿林为首的福建帮对立，曾一度发生武装冲突，表现了会党本身的弱点。1855年2月17日，刘部弹尽粮绝，率军从上海城突围，阵亡于虹桥。

【穆彰阿】（1782—1856） 清末官员。字子朴，号鹤舫，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1805年（嘉庆十年）中进士。历任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户部侍郎。深受道光皇帝信用。1827年（道光七年）入军机处，1837年为首席军机大臣，权倾一朝。门生故吏遍于中外，

一时号称“穆党”。在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期间，主张妥协政策。对于受命负责禁烟的林则徐深为嫉妒，伺机打击。1840年8月，英国舰队北上天津白河口，道光皇帝对禁烟发生动摇，他乘机攻击林则徐“开边衅”，促使道光皇帝罢免林则徐，改派主张妥协的琦善为议和代表。1842年8月，英军舰队在长江逼临南京，他极力主和，劝说道光皇帝接受英国侵略者提出的全部不平等条款。1850年咸丰帝即位后，将其革职，永不叙用。1853年（咸丰三年），捐军饷镇压太平军，被授予五品顶戴，又3年死去。

【璞鼎查】（1789—1856） 英国侵华分子。12岁参加英国海军。在印度从事殖民活动40年，1840年侵略阿富汗的战争中晋封为男爵。深受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赏识。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4月被任命为侵华全权代表，取替查理·义律，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8月初抵澳门，随后率舰队北上，相继攻占厦门、定海、宁波、乍浦、上海、镇江等地，扬言要把中国沿海各省并入英国女王陛下的版图。8月，逼临南京。迫使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因侵华有“功”，加爵士衔。鸦片战争结束后，出任香港殖民政府第一任总督。1846—1847年改任好望角总督。1847—1854年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

【罗泽南】（1808—1856） 清末湘军头领。字伸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诸生出身。1852年（咸丰二年），在籍倡办团练。次年1月，应曾国藩命率勇赴长沙，协同扩编为湘军。夏，进援江西南昌，被太平军击败。11月，回湖南。后屯衡州（今衡阳），协助曾国藩改定湘军陆营制。1854年7月，与塔齐布等陷岳州（今岳阳），旋夺城陵矶，升知府。继取湖南崇阳、咸宁。10月，参与破

武昌。寻授浙江宁绍台道。11月，据兴国（今阳新）。随合水陆诸军夺田家镇，加按察使衔。又与塔齐布等占广济（今梅川）、黄梅。次年春，攻江西九江、湖口，受伤失利，退南昌。继占弋阳、广信（今上饶）、德兴等地，复取义宁（今修水）、加布政使衔。1856年进逼武昌，中弹而亡。

【秦日纲】（约1821—1856）太平天国将领。原名日昌。广西桂平人（一作贵县）。雇工出身。早年参加拜上帝会，并参加金田起义。1851年（咸丰元年）12月，在永安州（今蒙山）任天官正丞相。1853年10月升顶天侯，旋代石达开守安庆。次年5月，封燕王。10月受命统领湖北田家镇军事，11、12月间同湘军激战失利，退守黄梅、九江；复败，退至安徽宿松、太湖一带。1855年春，领军攻占汉阳、汉口，次年1月援镇江。4月参与击破江北大营之战，5月又与石达开部会师，破江南大营，7月，围丹阳，受挫被革王爵，降为“顶天燕”。8月，撤围攻金坛。1856年8月底，与韦昌辉合谋回天京袭杀杨秀清，并参与屠杀杨秀清部属，又听韦调遣，带兵追击石达开至西梁山。11月28日，继韦昌辉之后被诛，除爵。

【韦昌辉】（1823—1856）太平天国起义领袖之一。原名志正，又名正。广西桂平金田村人。出身地主家庭。科举不成，便入粟捐监。因遭到权势者的诬陷，招来横祸。正当他一家蒙冤难伸，“日悻悻寻仇”之际，于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8月被冯云山说服加入拜上帝会。1849年夏，因受萧朝贵器重，被接纳为拜上帝会领导核心。此后拜上帝会决定将起义指挥机关设在他家，并以金田村为起义大本营。在其家设了十二座铁炉，暗中打制刀枪，为金田起义积极准备。1850年7月团营令发出之后，他“不惜家产，

恭膺帝命”。1851年（咸丰元年）1月11日金田起义以来，更是“不惮劳瘁，尽心竭虑”。始任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12月，在永安（今蒙山）封为北王，六千岁。在太平军胜利进军中的多次战役中，他都亲自指挥，负伤数次。在攻打南京城的战斗中，立下战功。定都后，天王洪秀全深居简出，太平天国军政大事，统由杨秀清主理，他则协助执行，为创建的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以及“开立军伍，整立营规”等项建设，特别是外交事宜，做出了贡献。此后与东王杨秀清渐渐出现裂痕。对杨的欺压心怀不满，却曲意奉承，伺机夺权。1856年洪秀全、杨秀清矛盾激化。他在接到洪秀全的除杨密诏之后，立即从江西前线率心腹精兵3000人，昼夜兼程，于9月1日夜赶至天京，围东王府。9月2日凌晨袭杀杨秀清及其家属和部下文武官吏数百余众。接着尽杀天京城内杨秀清部属约2万多人。当翼王石达开自湖北前线回京，责备他滥杀太过时，又转手欲杀石达开，达开乘夜缒城出走。又围翼王府，将其妻儿老小杀死。随之又派重兵围攻天王府，扬言不交出翼王，将火攻天王府。从而激起洪秀全和全城百姓的愤怒。于是大家同心，打退韦昌辉，并将他及其同党秦日纲、陈承谿捉拿归案，经天王批准，处决。

【杨秀清】（？—1856）太平天国领袖之一。广西桂平人。自幼失去父母，由伯父抚养长大，后在紫荆山区以种山烧炭为生。一度浪迹江湖，深深了解社会，性格坚强，处事机警，富于谋略和组织才能。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接受冯云山宣传的拜上帝教。1846年初，紫荆山团练头子王作新以“阴结党羽，图谋作乱”的罪名捕冯云山入狱。一时间拜上帝会群龙无首，有瓦解之势。在此紧要关头他机智地假托“天父下凡”，稳定会众。从而获得“代

天父传言”的特权，骤然成为拜上帝会主要首领之一。洪秀全、冯云山为顾全大局，承认其代天父传言的身份和拜上帝会中的领导地位。此后，便成为太平天国掌握实权的最高指挥者，与萧朝贵、洪秀全等成功地发动和领导了1851年（咸丰元年）1月11日的金田起义，显示出卓越的军政才能。3月，封左辅正军师，中军主将。12月在永安（今蒙山）封东王，节制受封诸王。自金田起义到攻占金陵（今南京）的胜利进军中，他的正确指挥起了很大作用。曾和西王萧朝贵联名发布《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和《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三篇檄文，揭露清政府黑暗统治，号召群众响应起义，为建立公平的社会而斗争。在战略方向问题上，力排众议，坚持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专意金陵”的主张。定都天京（金陵）后，总揽军政大权，在建设农民政权、制定军政决策中发挥重大作用。在1856年西征取得胜利的基础上，亲自指挥太平军，一举粉碎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解除长达3年之久的天京之围，使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于鼎盛。至此，更加居功自傲，竟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使早已存在的洪、杨矛盾空前激化。在洪秀全密令之下，韦昌辉于9月2日带兵将他及其部属约20000人斩杀。被杀时定为“东孽”，后洪秀全追念其功，定其死日为“东王升天节”。

【魏源】（1794—1857） 清末思想家、学者。字默深，法名承贯，原名远达。湖南邵阳人。青年时随父亲到北京，先跟从胡承珙和姚学塽研究汉学和宋学，后跟从刘逢禄研究公羊学。1822年（道光二年）中举人，捐赀为内阁中书。与龚自珍、林则徐交谊深厚，都讲求经世致用之学。1826年为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辑成《皇朝经世文编》。后又协助江苏巡抚陶澍筹办漕运、水利以及改革淮北

盐政，颇有成绩。鸦片战争爆发后，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中任事，参加浙东抗英斗争。《南京条约》签订后，有感于国势日衰，海疆多事，发奋著成《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希望时人能从中得到启示，振衰起弊。1844年中进士，授以知州，暂时兼理江苏东台、兴化县。1851年（咸丰元年）任高邮州知州。1853年，倡办团练，对抗逼近高邮的太平军。晚年弃官学佛，整理著述，病逝于杭州。一生著述丰富，多所创见，影响深远。所著《诗古微》、《书古微》，以今文经观点研究《诗经》和《尚书》，对后来的今文经学家廖平和康有为有直接影响。所著《默觚》、《老子本义》、《孙子集注》、《庸易通义》等，有着丰富的历史进化观念和社会变革思想。所著《海国图志》不仅详尽介绍世界各国的史地政情，而且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具有启蒙意义。所著《元史新编》，在内容上比旧《元史》更准确，并带动了近代元史和蒙古史研究的开展。此外，还写有大量政论、史论，与龚自珍一道，开创近代政论之风，对封建专制制度多有批判，对近代维新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遗著编为《魏源集》。

【耆英】（1790—1858） 清末官员。字介春。爱新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历任宗人府主事、统领、尚书、都统、将军等职。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任盛京（今沈阳）将军。1842年3月，调署杭州将军，颁给钦差大臣关防。到任后不久，杭州门户乍浦港被英军攻陷，即上奏道光皇帝，请求迅速和英军议和。8月，和伊里布一起作为全权谈判代表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谈判，完全接受英方提出的条件，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后任两江总督，在璞鼎查的压力下，奏请道

光皇帝把坚决抵抗英军侵台的台湾兵备道姚莹和台湾镇总兵达洪阿革职逮问。旋任两广总督，兼理通商事宜。1844年，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黄埔条约》，大量出卖国家主权。对战后广东人民反对英人进入广州城的斗争进行压制和破坏。1847年，私自允诺英人两年后，可以进入广州城。同时积极活动内调。次年入京，擢升文渊阁大学士。咸丰皇帝继位后失宠。1850年，降为五品顶戴，以员外郎候补。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8年被派往天津参与和英法联军谈判，遭冷遇，擅自回京，因此获罪，赐死。

【拉萼尼】（1800—1862） 法国外交官。1834年任驻果奈—达姆施塔特公国公使。1835年任驻希腊公使。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为使华特使，带领8只舰船来中国，于1844年8月抵达澳门。以讹诈手段，胁迫清两广总督耆英签订中法《黄埔条约》。后又迫使清政府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准许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1846年回国，因使华有“功”，封为贵族。1851年因事被捕，结束了政治生涯。

【柏贵】（？—1859）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广州傀儡政权头目。额哲忒氏，字雨田。蒙古正黄旗人。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举人。1824年（道光四年）任知县。1841年升南雄直隶州知州。1852年（咸丰二年）擢河南巡抚。次年初实授广东巡抚。奉命选派水陆精兵驰赴江南周天爵军营救援，疏请雇红单商船充实湘军水师。多次向粤省境内外太平军发动进攻。1854年起协同两广总督叶名琛镇压广东红兵起义，屠杀数十万人。1857年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前即串通广州将军穆克德纳暗中与英军勾结，随后投降。次年初，在

英法侵略者组成的“联军委员会”管制下与穆克德纳等一同供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傀儡政权。同年，代理钦差大臣，署理两广总督。

【叶名琛】（1809—1859） 清末官员。1835年（道光十五年）进士。1838年外放陕西兴安知府，次年擢雁平道。1842年升云南按察使。1846年授广西布政使。1848年实授广东巡抚。1852年（咸丰二年）镇压以凌十八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升任两广总督。1854年起募勇镇压遍及广东各地的红兵起义，屠杀数十万人。1854年拜体仁阁大学士，深受清帝信任。10月，英国利用“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进犯广州城，他不做任何准备，致使英军一度攻入广州城。1857年12月，英法联军再犯广州，依然不做任何战事准备，迷信封建“乩语”，广州终于陷落。次年1月被俘，被押上英舰“无畏号”送往印度加尔各答囚禁。1859年在囚禁中病死。时人讥之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梁廷枏】（1796—1861） 清末学者。字章冉，号藤花亭主人。广东顺德人。1834年（道光十四年）中副榜贡生。历任澄海县训导、广州越华书院、粤秀书院的监院、学海堂堂长、广东海防书局总纂等职。讲求经世致用学问，注意研究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历史。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他积极参与禁烟活动，为林则徐出谋划策，发动爱国士绅以为声援。后受聘于两广总督祁埏和徐广缙幕中，帮助筹办团练。大力支持广东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入驻广州城的斗争。1851年（咸丰元年），赐予内阁中书，加侍读衔。平生著述丰富，约有38种，涉及历史、文字、词章、考据、音律

等众多领域，其中重要的有《粤海关志》、《夷氛闻记》、《海国四说》。《夷氛闻记》记载鸦片走私和鸦片战争的历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海国四说》记述英国、美国等国的历史和政治状况，对于开通社会风气起了积极作用。

【胡林翼】（1812—1861） 清末湘军统帅之一。字润之，湖南益阳人。谥文忠。道光十六年（1838）进士。1847年至贵州，历任安顺等府知府，自练乡勇，镇压各族群众斗争。咸丰四年（1854）擢贵东道员，带兵勇至湖南、湖北与太平军作战。后随曾国藩进攻九江、湖口。兵败，率部回救武汉。不久，武昌被太平军攻占，他署理湖北巡抚，整顿扩充湘军，添置船炮，裁汰溃勇，组建新营，选拔将才，使湘军战斗力逐渐增强。在强行攻城屡遭挫败后，改取挖长壕、筑坚垒之策，内困守军，外击援军，终于1856年冬，乘太平天国天京事变后形势恶化之机攻陷武昌。实授湖北巡抚。尽力结好督办军务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官文，积极整顿吏治，增加厘金税额，革除田赋积弊，镇压境内群众斗争，从而巩固了对湖北的统治，使之成为东进赣、皖的战略后方。1858年夏，攻占九江，进图皖北；冬，因布政使李续宾部在三河之战中全部覆没，东进受挫。1859年秋，与曾国藩商定谋皖之策，遂移营湖北、安徽之交的英山、太湖，全力指挥战事。他以道员曾国荃一军，配以长江水师，坚持围攻安庆；以副都统多隆阿、按察使李续宜两军驻守桐城外围，实行围城打援，从而掌握了安徽战场主动权。1861年初，太平军举行第二次西征，3月陈玉成率北路大军攻克黄州（今湖黄冈），逼近武昌，他在军中惊忧成疾，怨恨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不久，病死武昌。辑有《读史兵略》。其奏稿、书牒收入《胡文忠公遗集》。

【肃顺】（1816—1861） 清末官员。字雨亭，爱新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郑亲王乌尔泰阿第6子。咸丰初年，入内廷供职，表现出机敏多谋、敢于任事的才能，受到咸丰帝赏识。1854年（咸丰四年）授御前侍卫，迁工部侍郎。1857年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兼都统。次年调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主张破除满汉畛域，重用汉族官僚，以后起的地方武装代替腐败的八旗军。庇护左宗棠免杀身之祸，建议破格任用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整顿财政，整肃科场，惩治贪污，持法严厉，颇有成效，但刚愎跋扈。1859年与俄使谈判时拒绝《璦琿条约》。1860年随咸丰帝逃往热河。1861年咸丰遗诏受命赞襄政务大臣。因疏于防范，11月，被慈禧、奕訢合谋政变一举推翻，被斩杀。

【奕訢】（1831—1861） 清朝第七个皇帝。爱新觉罗氏。庙号文宗。道光帝第四子。1850年（道光三十年）3月继位，翌年改元咸丰。史称咸丰皇帝。1月，太平天国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4月，任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至湖南防堵，又命入广西接办军务。1853年，太平军进入长江流域，先后攻克武昌、九江、安庆、扬州等重镇，定都南京，改名天京，分兵北伐。清王朝的统治危如累卵，急起用罪臣琦善，与向荣共为钦差大臣，在天京和扬州城外分别建立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太平天国；令曾国藩等汉族人在籍官绅举办团练，抗拒太平军；令僧格林沁率部阻截太平军北伐；任用肃顺等以捐输、劝借、铸大钱等手段筹措军费，挽救财政危机。1856年，江南、江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又任德兴阿、和春为钦差大臣，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同年10月，英法联军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12月攻陷广州城。命黄宗汉为两广总督，继续任

用已投敌充当傀儡的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和广东巡抚柏贵。1858年，大沽炮台陷落，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赴天津谈判求和，先后与俄、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又至上海与英、法分别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1859年，命僧格林沁率部在大沽口备战。英、法侵略者利用换约机会再次挑起战争，被击败。1860年，英法联军2万余人再次北上，8月，大沽炮台再次陷落。先后命桂良、恒福、载垣、穆荫等与侵略者谈判，又命僧格林沁率部防堵。谈判破裂，防堵失败。9月22日，仓皇出逃热河，命恭亲王奕訢留京求和。南方太平天国战事正酣，江南、江北大营再次被攻破。8月，他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加钦差大臣衔，督办军务，江南四省军务均归节制，对太平军造成极大威胁。10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与英法俄订立《北京条约》，并承认《天津条约》和1858年奕山在黑龙江被迫订立的中俄《璦琿条约》有效。1861年8月，病死于热河行宫，遗诏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襄理政务，辅佐幼主。

【清文宗】即“奕訢”。

【咸丰皇帝】即“奕訢”。

【顾命八大臣】咸丰帝遗诏赞襄政务的8个顾命王大臣。1860年（咸丰十年）9月，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率宫眷、亲信逃往热河行宫（在今河北承德市）。次年8月病危，临死前一日口授遗诏，立年方6岁的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任命御前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额駙景寿、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侍郎匡源、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

卿焦祐瀛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即辅弼幼主的顾命大臣。8人中载垣和端华的地位最高，但主谋是肃顺，掌握大权。8人代表清朝统治阶级中顽固维持封建统治、对外主张抵抗的部分，与主张对内镇压对外“和好”的以恭亲王奕訢为代表的势力发生了尖锐矛盾。奕訢乃与权力欲极强的那拉氏秘密勾结，并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于11月2日一举发动政变，以“造作赞襄名目，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持”为由，解除8人赞襄政务之任，诏令肃顺斩立决；载垣、端华赐自尽；穆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匡源、杜翰、焦祐瀛革职，免遣戍；景寿革职，因系道光帝额驸（女婿）仍保留公爵并额驸品级，免发遣。慈禧、奕訢等人掌握了清中央统治权。

【华尔】（1831—1862）镇压太平军的“洋枪队”头子。美国人。1859年（咸丰九年）来上海，受清苏松太道吴煦委派，招募外国人组成洋枪队，任队长。7月，进犯松江，遭太平军痛击，大败而逃，旋由上海攻占松江。8月，在青浦被太平军击败，受重伤。1861年8月，在松江改组他的军队，以欧美人为军官，招骗中国人为士兵，组成中外混合军，用新式武器装备，并加以新式训练。11月，这支所谓洋枪队发展至2000多人。1862年（同治元年）又将洋枪队扩编为“常胜军”，任副将，在上海、宁波配合英、法侵略军作战，残酷屠杀中国人民。9月21日，同英军进犯慈溪（今浙江慈城），被太平军击成重伤，次日，在宁波毙命。

【陈玉成】（1837—1862）太平天国后期将领。广西藤县人。祖孙三代均为农民。约在1848（道光二十八年）至1849年间加入拜上帝会。1850年秋，团营令下，闻讯随会众至金田，起义时为童

子兵，年纪虽小，行军打仗不甘落后，登高涉险，威猛异常。定都天京后，以功受封为左四军正典圣粮，职同监军。1854年（咸丰四年）随军西征，攻克武昌城有功，越四级升殿右三十检点。1856年升冬官正丞相，参加镇江解围之战，乘小船冲破敌人重围，入城联络，顺利完成内外夹击敌人的计划。随后又一举踏平敌人江北大营，继又参加破江南大营之战。天京事变后，晋封成天豫、又正掌率、前军主将。同新提拔的李秀成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从1858年8月起，连续取得二破江北大营、三河之战和二破江南大营等全歼敌人胜利之战。1859年6月，以功封英王。1860年4月在天京高级军事会议上，针对当时一些领导人重下游轻上游片面的战略指导思想，提出“救安庆”的正确主张，但被洪仁玕、李秀成等否定。为顾全大局，参加开辟江、浙根据地的战斗。这给湘军在长江上游的发展以可乘之机。1860年5月安庆陷入敌人重围，奉命往救。当时洪仁玕提出由陈玉成、李秀成分江北、江南两路西进，会师武汉，以解安庆之围的所谓第二次西征。他按期到达湖北黄州。但李秀成违约误期不到，加之受英国驻武汉领事所骗，未攻武汉，返回援救安庆。从1861年4月起，竭尽全力救安庆，与洪仁玕等率领的天京援军一起，同湘军展开空前的激战，终未奏效。9月5日安庆失守，同洪仁玕一起受革职处分。后退守庐州（今合肥），不思进取，又分军让部属陈得才、赖文光去河南、西北等省开辟新局面。5月，率部从庐州突围，北至寿州（今寿县），为叛降的团练头子苗沛霖诱捕，送至颍州（今阜阳）胜保军营。1862年（同治元年）6月4日，在河南延津慷慨就义，年仅25岁。

【胜保】（？—1863） 清末将领。字克斋，苏完瓜尔佳氏。满洲

镶白旗人。1840年（道光二十年）举人。历任翰林院侍读、国子监祭酒、光禄寺卿等职。1852年（咸丰二年）受命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帮办琦善军务，与琦善一起在扬州郊外建立江北大营，防堵太平军。次年受命追剿太平军北伐军，北上冀中，任钦差大臣。1854年围堵北伐援军不胜，被革职，戴罪自效。1855年在山东高唐州（今高唐县）围攻李开芳部不下，被遣戍新疆。1857年以副都统衔帮办河南军务，镇压捻军，采取剿抚兼施策略，先后招抚苗沛霖等人。1858年以剿捻有功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1860年参加八里桥之战受重伤，主张借助洋兵助剿太平军，受到恭亲王奕訢器重。次年，参予辛酉政变。1862年（同治元年）杀害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旋奉调入陕镇压回民起义。1863年以“拥兵纵寇”、“任性骄纵”、“抽厘肥己”等罪名被革职，逮捕解京，令自尽。

【苗沛霖】（？—1863）清末团练头领。字雨山。安徽凤台人。原为塾师。1856年（咸丰六年）在家乡筑寨积粟，举办团练，与捻军作战，其势渐盛。他截留两淮地区粮款税收和厘卡，控制凤台周围数十州县，实行割据，人数扩充至30余万。次年，投靠清将胜保。1858年，随袁甲三在宿州等地攻捻，官至道员。1860年企图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机，将翁同书、傅振邦、袁甲三等部清军赶出安徽，于次年举兵抗清。太平天国封他为奏王。1862年（同治元年），胜保又在淮北攻捻，他再度降清，诱执陈玉成献胜保，胜保死后，又举兵反清。1863年，在安徽蒙城被清军僧格林沁部击败后，为部下所杀。

【额尔金】（1811—1863）英国外交官和殖民地行政官，先后任

牙买加总督和加拿大总督。1857年（咸丰七年）被英国政府任命为全权代表率军来华，扩大战争。12月攻占广州。次年春北上天津，攻陷大沽炮台，进逼天津城郊。6月26日，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中英《天津条约》。11月，率英舰6艘自上海溯长江而上，考察沿江通商口岸。途经天京和安庆江面时曾向太平军挑衅，受到还击。1859年春回国。不久，再度被任命为英国侵华军全权专使，再度率军来华，伙同法军扩大战争。1860年8月再陷大沽炮台，占领天津。10月，进占北京，下令焚烧圆明园。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次年1月，率军南返。1862年调任印度总督。

【张乐行】（1811—1863） 一作张洛行。前期捻军领袖。安徽蒙城、亳州间雒河集（今涡阳）人。清咸丰初年与龚得树结捻起事，被推为首领。1853年（咸丰三年）曾被清方招抚，参与清军镇压定远捻军。1855年秋，召集各部捻首于雒河集会盟反清，被推为盟主，称大汉永王（一作大汉明命王）、定黄、白、黑、红、蓝五军旗制。他兼领黄旗，严申军制，使捻军成为一支较有组织的反清武装。1856年，雒河集失守，他率部南下。1856年，与太平军会师于霍丘、六安间，并攻克霍丘，以为基地。自此捻军接受太平天国领导。后攻占怀远、临淮、凤阳、五河、定远等城邑，成为太平天国的北部屏障。不久，被洪秀全封为征北主将，派出部队先后参加了再克庐州（今合肥）、二破江北大营、二次西征等重要作战。1861年冬，晋封沃王，奉命挥师北进，围颍州（今阜阳）。1862年（同治九年）皖北根据地丧失，冬，僧格林沁指挥清军围攻淮北捻军基地，他率部抗击受挫。1863年2月初，于雒河集一带再战又败，带余部退至蒙城西阳集，被叛徒李家英出卖，遂在亳州义门集周家营殉难。

【石达开】（1831—1863） 太平天国起义军领袖之一。小名亚达。广西贵县人。出身富裕农民家庭。因常受劣绅豪富欺凌，自幼萌发了对清朝黑暗统治的不满。约在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至1847年间，经冯云山宣传，参加了拜上帝会，成为一方首领。1850年团营令下达后，仅半年间，凭其聪明才智，在复杂而激烈的斗争中，兼容汉壮两个民族、各行各业的群众，组成一支人数众多的起义队伍。约在团营和金田起义时被结纳为拜上帝会领导核心。1851年（咸丰元年）3月，在武宣东乡受命领左军主将。12月，在永安（今蒙山）封为翼王，五千岁。在胜利进军中，身先士卒，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定都天京不久，被派安庆安民，从实际出发，实行了一些诸如按亩输米，设关收税，择有声望者任乡官等政策，政绩卓著，颂声大起。当西征军陷入被动局面时，受命主持西征军务，先后在江西、湖口、樟树镇重创湘军，扭转了战局。1856年4月回援天京，破江南大营，随即西援武昌，乘胜歼敌。正当与胡林翼激战武昌之际，闻天京事变爆发，10月中赶回天京，严责韦昌辉杀人太多，韦不听劝阻，反欲加害，他只身缒城逃出，至安庆起兵讨韦。在天王洪秀全诛杀韦昌辉后，受诏回京辅政，很快稳住大局。但因遭到洪秀全的疑忌和多方牵制，负气于1857年6月率太平军精兵十数万自天京出走，造成太平天国分裂，给起义带来巨大损失。出走后仍使用太平天国旗号，在迂回作战过程中，牵制不少清军，对减少天京压力，以及对太平天国在天京事变后克服危局起了一定作用；但长期孤军作战，没有周密战略计划，始终未能开辟出新局面。1863年（同治二年）初，率所属各支部队先后入川，但三支部队互不联系，形成各自为战。5月，率主力部队进抵大渡河与松林河交汇处的紫打地，不久四川总督骆秉章即

檄调各路兵勇向紫打地扑来，形成对太平军包围之势。太平军辎重尽失，粮食断绝，陷入绝境，无奈，他带着儿子和宰辅曾仕和等赴清营，被解往成都，临刑之际，神色怡然。

【洪秀全】（1814—1864）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广东花县人。农民出身的穷苦知识分子。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饱读经书、奔波科场中度过的。虽多次赶考，均落第，连个秀才都未考中。个人仕途的坎坷，与国家、民族的灾难交结一起，激起了他的反抗思想和改造社会的愿望。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科考再次失败，偶然阅读10年前得到的基督教宣传品《劝世良言》，书中关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崇拜独一真神“皇上帝”等思想，给他很大启发，从而和冯云山、洪仁玕创立拜上帝教。1844年4月先后广东顺德等10数府县传教，应者寥寥；后又去广西贵县赐谷村传教，收效仍不大。遂于年底决意返花县，从事宗教理论创造，先后写出《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诗文。

1847年8月再次到广西，在桂平紫荆山与冯云山会面。冯云山在两年多前与洪秀全分手后，在紫荆山区宣传拜上帝教，发动组织群众，建立拜上帝会，开辟根据地，创造出大好革命局面。洪深受广大贫苦农民反封建热情的鼓舞，坚定了反清斗争决心。写出《原道觉世训》、《太平天日》等诗文，取得上帝次子身份，决心率凡间亿万人民消灭“阎罗妖”及“妖徒鬼卒”即清皇帝及大小贪官污吏。随之，在1851年（咸丰元年）1月11日，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率领拜上帝会众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不久，在武宣东乡称天王。9月率军攻克永安（今广西蒙山），分封诸王，初建军政制度。次年进军湖南取岳州，入湖北取武汉。1853年3月太平

军攻克金陵（今南京），遂奠都，改称天京，建立农民政权，颁布了体现农民反封建要求的纲领文件《天朝田亩制度》和一系列制度政策，推动了农民革命事业的发展。军事上经过曲折的斗争，到1856年上半年已控制皖、赣、鄂等省大部分地区，并击溃围困天京长达3年之久的清江北、江南大营，从而达到鼎盛时期。8月，受杨秀清的逼迫，答应封杨为“万岁”，却暗中密令韦昌辉回京，杀死杨秀清及部众约20000人，后又对主持朝政的翼王石达开“疑忌”，致使石负气率精兵10数万离京出走。此后太平天国形势险恶，他及时提拔陈玉成、李秀成等年轻将领主持军事，又任用辗转来京的洪仁玕主持政务。从而在军事上连续取得三河之战，再破江北、江南大营，开辟江、浙根据地的胜利，初步挽回了危局。但整个局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特别是1860年后，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他却终日深居宫中，宗教迷信思想和封建思想愈加严重，完全丧失了正确处理军政事务的能力。在天京陷入清军团团包围情况下，执意困守孤城。1864年（同治三年）6月1日病逝。19日天京陷落，太平天国灭亡。

【洪仁玕】（1822—1864）太平天国领袖之一。字益谦。广东花县人。洪秀全族弟。出身农民家庭。8岁入塾读书，曾师事洪秀全。成年后，习经史天文历数，担任农村塾师，曾5次考秀才不中。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参加拜上帝教，是洪秀全最早的信从者之一。金田起义时，未及赶上。1852年（咸丰二年）4月去香港，在瑞典教士韩山文处教书，曾口述拜上帝教创立过程，及洪秀全早期传教活动，后韩山文整理出《太平天国起义记》。不久回广东，1853年再次赴香港。1854年春到上海，拟赴天京，因苏常一带道路不

通，未能如愿，只得第三次赴香港。在香港与外国传教士接触较多，在太平天国领袖人物中，为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最多的人。1859年，从广州经由湖北、安徽辗转到天京。受到洪秀全重用，到天京未半年，即封为干王，总理朝正。他一方面针对当时人心散乱，政事不一的现象，加强中央集权，封赏有功文武官员，禁止朋党；一方面调整天历，改革文教考试制度。并向洪秀全提出比较长远的治国立政之策——《资政新篇》。在军事上，1860年春，与李秀成、陈玉成等制定了第二次粉碎清军江南大营的正确战略方针。5月，天京解围后，又建议先“乘胜下取”，再“沿长江上取”的方略，得到天王批准，由是开辟了江浙地区。但毕竟不娴于军事，犯有战略指导片面性错误，开辟江浙地区抵偿不了安徽根据地的丧失，制定的会剿武汉以解救安庆之围的第二次西征仍是二破江南大营的战术的翻版，无法实现战略目的。亲率大军参加安庆破围战，遭失败。安庆失守，受到革职，便一蹶不振。天京陷落后，随幼天王等向江西转移途中被俘。1864年（同治三年）11月23日，在南昌从容就义。

【李秀成】（1823—1864）太平天国后期将领。出身雇农家庭。约于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至1849年加入拜上帝会。1851年（咸丰元年）9月太平军来藤县招集会众，随军出发。参加太平军后，吃苦耐劳，勤学苦练，勇敢善战，受到东王杨秀清的赏识，1853年东王保举为右四军帅，驻守天京太平门外，不久，升为后四监军。10月，随石达开赴安徽带兵安民，后镇守庐州（今合肥）。在镇江解围及攻破江南大营的战斗中，立下战功，升地官副丞相。1856年天京事变后，因招收捻军有功，升地官正丞相。次年10月后晋爵合天侯、副掌率、后军主将，与陈玉成共主军事。1858年

8月以后，与陈玉成协同作战，取得了二破江北大营和三河之战的辉煌胜利。为革新政治，冒死谏请天王“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正朝纲，明正赏罚”，为此受到洪秀全的打击。1859年12月封忠王，旋入京与洪仁玕商定采取“围魏救赵”的战略，一举二破江南大营。又支持洪仁玕提出的“乘胜下取”，攻打苏、杭、上海，开辟江浙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在江浙地区建立地方农民政权，实行轻税轻赋政策，发展了农业生产和工商业，有力地支持了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但渐渐滋长享乐思想，据江浙地区为自己的独立王国，不大关心太平天国全局性战略，与陈玉成、洪仁玕均存有隔阂，不能团结共事。1861年，未积极执行洪仁玕令其与陈玉成会师武汉解安庆之围的第二次西征战略计划，贻误戎机。1862年（同治元年）奉命回援天京，与湘军大战46天，未能获胜。在天京内无粮草外无援军的情况下，向洪秀全建议“让城别走”，遭到怒斥。1864年7月19日天京城破，带幼天王洪天贵福突围，失败被俘。在狱中写了五六万言供词（即《李秀成自述》），记述了天国兴亡史，也流露出乞降之意。

【僧格林沁】（1811—1865） 清末蒙古亲王。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旗（今属内蒙古）人。嗣父科尔沁扎萨克亲王索特纳木多布斋系嘉庆额驸。1825年（道光五年）袭封郡王。自幼在宫中长大，“出入禁间，最被恩眷”。1853年（咸丰三年）为参赞大臣，率兵防堵太平天国北伐军。1855年围歼太平军北伐军于山东，晋封亲王，世袭罔替。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任钦差大臣，督办军务。1859年，在大沽炮台督军力战，挫败英法侵略军。次年，英法联军扩大战争，再守大沽、天津，连战皆败，退至京东八里桥，再败，北京失陷。1860年南下镇压捻军。1862年（同治元年）统

辖山东、河南军务，节制直隶、山西四省督抚、提镇统兵大员。1863年，在皖北击败捻军张乐行部。张乐行被杀。此后捻军改变战术，僧部屡被挫败。1865年在山东曹州（今菏泽）高楼寨被捻军斩杀。

【任化邦】（？—1867） 捻军蓝旗将领。又名任柱。安徽蒙城人。幼年父母双亡，出身贫苦。1851年（咸丰元年）与其叔父任乾在家乡参加捻军。1857年，随捻军首领渡淮河南征，为蓝旗将领。1859年，家乡被清军洗劫，任乾战死，蓝旗部便归他一人指挥，实力大增。1863年（同治二年）初捻军战斗失败后，与张宗禹等部捻军，在湖北、河南、陕西边区活动。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后，与张宗禹等共推遵王赖文光为首领。1866年捻分东西捻军，与赖文光合统东捻军。次年，在湖北安陆府（今钟祥）尹隆河战役中，指挥东捻军击溃淮军刘铭传部。6月，东捻军进入山东，被李鸿章以长墙工事围困于北有黄河、南有六塘河、西有运河、东有胶莱河地区之中，突围不成。11月19日东捻军与清军在江苏赣榆大战时，被叛徒刺杀身亡。

【张宗禹】（？—？） 捻军将领、西捻军统帅。安徽蒙城、亳州（今亳县）间雒河集（今涡阳）人。生卒年待考。初随捻军领袖张乐行起义。初领黄旗。1860年（咸丰十年）初，率部参加袭占江苏清江浦（今淮阴）之战。1863年（同治二年）离开淮北基地，转战皖、豫、鄂，被太平天国封为梁王。1864年在河南内乡与西北太平军会合。后拟援天京（今南京）未果，与赖文光太平军部合并，组成后期捻军。1865年，在山东菏泽高楼寨之战中击毙清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歼敌7000余人。1866年，捻军分作东、西两部，率西捻军入陕。12月在西安东郊取得十里波之战的胜利，歼

灭湘军 3000 余人，进围西安。1867 年，与陕、甘回民起义军联合作战于渭河流域，旋趋陕北。因东捻军告急，遂率部自宜川越黄河入山西、河南，1868 年攻保定逼京师，以解其围。时东捻军已败亡，他率领的西捻军陷入 10 余万清军包围之中，与敌周旋于豫、鲁、直之间。后渡运河，入鲁、直边界，从此受困于运河以东、黄河以北的滨海地区。6 月，在山东茌平广平镇与清军激战失利，转移至徒骇河边，为敌所灭。他下落不明（一说投河殉难）。

【赖文光】（1827—1868） 太平天国将领、后期捻军统帅。广西桂平人。参加金田起义，早年在天朝任文职。1856 年（咸丰六年）秋，改任武职，到江西招兵，保卫天京，后随陈玉成转战皖、鄂。1861 年秋，受封为遵王，随陈得才远征陕西。1864 年（同治三年）率军回援天京，抵鄂东闻知天京已陷。在陈得才由于队伍溃散自杀后，他遂与捻军联合，被推为统帅，以恢复太平天国为宗旨，按照太平军军制整编捻军，采取以走制敌的流动战术，在豫鲁间屡挫清军，阵斩僧格林沁，歼敌 7000 余人，声威大振。此后率捻军继续驰骋中原，冲破沙河、贾鲁河防线，粉碎了钦差大臣曾国藩以静制动、重点设防、聚兵防河的剿捻方略。后命梁王张宗禹率部前往陕、甘，联结回民起义军。捻军分为东、西两支。他自率东捻先后击败提督郭松林和总兵张树珊所部淮军。1867 年初，在湖北京山尹隆河与清军大战，先胜后败，遂率军经河南进入山东半岛。7 月，突破清军胶莱防线。11 月，在寿光战败，突围南下。12 月，在江苏扬州瓦窑铺重伤被俘，从容就义。

【邹伯奇】（1819—1869） 清末科学家。字一鶚，又字特夫、徵君。广东南海人。幼入学塾，于朱子集注略通大概，好经学注疏、

文学音韵。应县试，补诸生。后弃举业，专攻天文历算，通晓天文、数学、物理学、地理学、仪器制造等多方面实用学问。所著《格术补》总结中国有关几何光学方面的成果。用数学的方法叙述了平面镜、透镜、透镜组等成像的规律，对眼镜、望远镜、显微镜等光学仪器的原理也有阐释，发展了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所述的“格术”。另著天文学、地理学方面著作《甲宣恒星表》、《赤道星图》、《黄道星图》、《地球正变两面全图》等书，吸收西学知识。长于发明制造，制成表演地动说的“七政仪”、计算尺、观象仪、浑天仪、时钟、象限仪等器械，并创造性地制成摄影器，此与欧洲银版照相法的发明（1839）几乎同时，潜心研究著述，淡泊功名利禄。同治时，郭嵩焘、曾国藩先后疏荐征聘，坚辞不就。著述甚丰，后人将其部分论著辑成《邹徵君遗书》刊行。

【葛罗】（1793—1870） 法国外交官。早年曾在法驻葡萄牙、西班牙、埃及等国大使馆供职。1857年（咸丰七年）10月被法国政府任命为全权大使率军来华。12月，会同英军攻陷广州。次年春率军北上，5月攻陷大沽炮台，进逼天津城郊。6月27日，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中法《天津条约》。次年春回国。1860年2月再度被任命为全权专使，率军来华扩大战争。7月到达大沽外。8月21日联合英军攻陷大沽炮台，24日侵入天津。10月13日占领北京，率法军与英军一道焚毁圆明园，抢掠大量中国珍宝。10月25日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中法《北京条约》，指使充当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在中文本中偷偷加入“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11月率法军撤出北京，但仍占领天津、广州等地，直至次年11月。1862年（同治元年）调任驻英大使。

【蒲安臣】（1820—1870） 第一个在北京供职的美国公使。184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1855—1861年任美国众议院议员。1861年（咸丰十一年）至1867年任美国驻华公使，积极推行列强联合侵华的合作政策，形式比较温和，因而更富于欺骗性，颇得清政府的信任与好感。1867年（同治六年）底任满。次年被清政府任命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宜钦差大臣，访问欧美国家，但未授权订立条约。抵美后，竟越权于1868年7月与美国政府订立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又称《蒲安臣条约》。条约给予美国在华招收华工的合法权力；重申清政府有保护美国在华传教士的义务；允许两国人民入对方官学受优惠待遇。这个条约是美国控制中国外交的典型事例，反映了美国的侵略野心和清政府的腐败。随后，又率团访问了英、法、德、俄等国。1870年2月病逝于彼得堡。

【马化龙】（？—1871） 西北回民军首领。宁夏金积堡（今属吴忠）人。与其父均为西北地区回教白山派教主。1862年（同治元年）2月，甘肃回民在平凉起义。次年11月，他在金积堡发动起义，杀宁夏道台侯云登、知府吕际韶、知县赵长庚等，攻占灵州（今灵武）及附近各州县。自称两河大总戎，修建王城东府西府，在金积堡周围构筑碉堡，与清军对抗。1868年，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率楚军来西北镇压回民起义。次年9月，刘松山率老湘军从陕北绥德进攻花马池（今盐池），至吴忠堡，围金积堡。他准备投降，1870年初，当刘松山来马五寨受降时，突然被回民起义军反对投降的人开枪击毙，清军顿时阵营大乱，回民军乘势反攻。1871年，刘松山之侄刘锦堂率领湘军向回民起义军发起进攻，1月6日占金积堡，他为保全部众生命赴清营请降，遂被清军处死。

【倭仁】（1804—1871） 清末官员。乌齐格里氏，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道光朝进士。理学家唐鉴弟子。1832年（道光十二年）授编修。1844年升大理寺卿。1855年（咸丰五年）擢侍讲学士。1862年（同治元年）任工部尚书。同治年间以“理学大师”闻名，曾教授同治帝载淳读书。不久改翰林院掌院学士，授文渊阁大学士。1866年底，恭亲王奕訢等奏请在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选用科甲正途官员入馆学习，他上疏坚决反对，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引起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一场大争论。1871年授文华殿大学士。遗著编为《倭文端公遗书》。

【曾国藩】（1811—1872） 清末地主阶级军事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字涤生。原名子城。湖南湘乡人。谥号文正。1838年（道光十八年）中进士，历任内阁学士，礼、兵、刑，吏等部侍郎。太平天国起义后，1852年（咸丰二年）奉命帮办湖南团练，摒除清代八旗、绿营的旧制陋习，仿明代戚继光之营制，招募山乡农民，编练成一支新型的地主武装——湘军。开了近世兵为将有的先河。1854年初，湘军练成水陆师1.7万人，会师湘潭；他特撰檄文，极力诋毁太平天国革命，誓师出战，向西征的太平军进攻。初败于岳州、武汉。继之三路东进，突破田家镇防线，兵锋直逼九江、湖口。后水师冒进，轻捷战船突入鄱阳湖，为太平军阻隔，湘军水师连遭挫败，退守湘北。此后用兵求稳戒躁，谋定后动，宁迟勿速，不用奇谋。1859年，与湖北巡抚胡林翼共谋四路攻皖之策，定计围困安庆。1860年，授两江总督，自率一军驻安徽祁门，策应南岸；命道员曾国荃围安庆，攻其必救，另以副都统多隆阿军、道员李续宜军屯桐城外围拒援，屡败太平军于安庆、桐城间，

终在 1861 年秋攻克安庆。1862 年（同治元年）以安庆为大本营，命曾国荃率部沿江东下，直逼天京（今南京）；命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部自江西进攻浙江；命江苏巡抚李鸿章率部自上海进攻苏南，对太平天国实行战略包围，于 1864 年 7 月攻占天京。因功封一等侯爵。1862 年，特设军械所于安庆，后又和李鸿章在上海设置江南机器制造局，仿造外国军火，装备湘军、淮军，为洋务运动创始人之一。1865 年春，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在山东菏泽被捻军击毙，他奉命督办直隶（约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军务，北上镇压捻军。采取“聚兵防河”方针，即在黄河、淮河间、东凭运河，西凭沙河、贾鲁河，辅以深沟高墙，兼立木栅，驻兵设防，围困捻军，但被捻军突破。1866 年底，清廷命李鸿章继任镇压捻军的钦差大臣。他于 1867 年回任两江总督，旋授大学士。1868 年调任直隶总督。1870 年查办天津教案，因媚外卖国，镇压群众，受到舆论谴责，调两江总督。1872 年病卒。遗著编为《曾文正公全集》。

【张秀眉】（？—1872）清咸丰、同治年间贵州苗民起义军首领。贵州台拱厅仰岗涨绢（今台江县南省乡板凳下寨）人。苗族。雇工出身。1851 年（咸丰元年）金田起义消息传到苗寨，他待机起义。1855 年，苗民数千人冲入台拱城。抗议官府擅提粮钱折合标准，杀死前来镇压的知州杨承照。他认为时机已到，公开领导群众在台拱厅掌梅尼议郎誓师举义。遍告各寨，千里苗疆，同时响应。起义苗民一致举推他为带头人（即为大元帅）。至 1858 年，起义队伍发展数十万，遍及贵州东南数十州县，军威直指贵阳，震撼清朝在贵州的统治。苗民起义军建立政权，蓄发易制，并建立起一支强大武装，有力地配合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他领导起义军在黄平东南的黄飘、都匀以南羊安的战役中，取得两次重大胜利，

击毙清提督荣维善等，使清军不敢与战。后来席宝田率湘军对苗民起义军所据山寨，采烧光杀光的残酷策略，起义军积谷尽焚，陷入绝境。1871年（同治十年）2月，他率各路大军，准备与清军决一死战，不幸兵败被俘。后被解至长沙，于1872年6月27日慷慨就义。

【杜文秀】（1824—1872）清咸丰、同治年间云南回民起义军首领。本姓杨，用母姓。回族。云南永昌府保山县城人。出身商人家庭。14岁考取秀才。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保山县一次由清统治者挑起的回汉械斗中，城内回民8000人惨遭杀害，他虽免于难，但家属均被杀害。于1847年秋，偕被害家属京控，无结果。在太平天国影响下，趁1856年（咸丰六年）大理发生屠杀回民事件再起之机，率回民占据大理府，被众推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宣布起义，建立“平南国”。准备事成归附太平天国，故拒称王。此后多次围攻昆明，均未攻克。据有53个州县，大理政权实行各民族平等政策，采取恢复生产和减轻人民负担措施，建立官制，辖区划为六省，严肃吏治军纪，反对外国侵略。1867年后，镇压贵州苗民起义的湘军入滇增援，又对起义军大施离奸之计，内部发生矛盾，军心大乱。掌握起义军兵权的大将大司衡杨荣叛变，以武力威协他出降，遭严辞拒绝。1872年（同治十一年）12月26日全家108人服毒自尽，以示宁死不屈。

【徐继畲】（1795—1873）清末官员、地理学家。字健男，号松龛，又号牧田。山西五台人。1826年（道光六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后历任广西浔州知府、两广盐运使、福建布政使等职。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授广西巡抚，后

改授福建巡抚兼署闽浙总督。自鸦片战争后，徐氏对中外大势始予注意，尤究心于域外各国史地情形的研究。在福建任职期间，他与外国人多有往来，搜集西人著述，并勾摹地图，编著成《瀛环志略》，对世界尤其是东南亚及南亚各国风土人情、史地沿革与社会变迁详加叙述，内容严谨，出版后风行一时，坊间刻本甚多。此书与魏源的《海国图志》同为近代中国较早介绍世界史地概况的专著，俱传入日本，产生深远影响。1851年（咸丰元年）回京任太仆寺少卿。次年以在巡抚任时逮送罪人迟误受到处分，旋罢归。后奉命在山西督办团练，参与防堵太平军北伐及镇压捻军、回民义军事宜。1863年（同治二年）召诣京师，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补太仆寺卿，并任京师同文馆大臣职。1866年辞职还乡。所著还有《退密斋诗文集》。

【冯桂芬】（1809—1874） 清末思想家。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1840年（道光二十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广西乡试正考官。1853年（咸丰三年）以在籍京官身份奉诏在苏州办团练，升右中允。1860年太平军攻占苏州，逃至上海，继续组织武装力量相对抗。1862年（同治元年）在英、法等国支持下，联络在沪江浙官绅成立“会防局”，主张借用外国军队收复失地。上书屯驻安徽的曾国藩乞讨援军，以解沪上之围。李鸿章率淮军抵上海后，入李幕府，为其用兵出谋划策，曾会松江知府上书大吏，陈述江苏民间受困于租赋浮收之情状，恳请减赋。遂被清政府采纳，诏令苏南部分地区减赋，缓和了社会矛盾。早年受林则徐影响，讲求经世之学，也注重研究西学。凡治河、文教、积谷、天算等事无不悉心考求。著《校邠庐抗议》，批评时弊，倡言改革，整顿内政，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

术”的理论，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学习西方“长技”。这些主张对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都有启发和影响。长于诗文，不满桐城派古文僵化的流弊，要求创造一种内容充实，自由抒写的新体散文。所著《校邠庐抗议》40 篇文笔通俗流畅，见解新颖大胆，在创作实践上开辟了新体政论散文的道路。还著有《显志堂集》、《西算新法直解》、《说文解字段注考证》等。

【李文学】（1826—1874） 清咸丰、同治年间云南彝族人民起义军首领。又名正学。云南弥渡县人。出身彝族佃农家庭。家境贫困，十一二岁卖身为奴。1855 年（咸丰五年）5 月，在哀牢山区天生营毅然率领农民起义，被推为首领，号称“彝家兵马大元帅”。随即惩办一些罪大恶极的“庄主”，没收其浮财。附近的汉、哈尼、白、傣、苗、回、傈僳等族农民纷纷起兵响应，起义群众发展过万人。1856 年后，与杜文秀率领的起义军结成联盟，相互支援，协同作战。哀牢山农民起义军先后控制 10 数州县，在拥有 5 万人口的地区，建立农民政权——“彝家兵马大元帅府”，规定严格军纪，制定一系列政治、军事及经济措施，废除雇佣兵制，没收“庄主”田亩军耕，原种庄主之地，悉归庶民所有，免租薄赋。1870 年后，清军在外国侵略者支持下，调重兵镇压起义军。1872 年（同治十一年）秋，他率军北援杜文秀回民起义军，不幸战败被俘。1874 年 4 月，壮烈牺牲于南涧县牛街。

【义律】（1801—1875） 出身于英国贵族。1815 年参加海军。1830—1834 年在英国殖民地圭亚那充任高级官员，管理奴隶。1834 年（道光十四年）以大佐军衔跟随英国政府派驻广州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来华，任秘书。1836 年升任商务总监督。积极支

持英国不法商人走私鸦片，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1839年林则徐到达广州查禁鸦片时，他多方阻挠破坏，并怂恿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对华使用武力。1840年2月，被任命为英国侵华全权副代表。6月，与侵华正代表懿律指挥英国舰队封锁广州海面，挑起鸦片战争。8月，北上大沽，递交巴麦尊给清政府的照会，并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惩办林则徐。1841年1月，作为英国侵华正代表与清钦差大臣琦善在广州会谈，提出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开放广州等条款的《穿鼻草约》。并于20日单方面公布，同时派兵强占香港。随后又率舰进攻虎门诸炮台。5月，率军攻广州，迫使清将军奕山订立《广州和约》。此前一个月，英国政府认为他草拟的《穿鼻草约》索取的权益太少，改派璞鼎查为侵华全权代表。8月，离华回国。后被派往北美等地任职，封爵士，授海军大将领衔。

【载淳】（1856—1875） 清朝第八个皇帝。爱新觉罗氏。咸丰皇帝子。母叶赫那拉氏。庙号穆宗。1861年（咸丰十一年）被立为皇太子。不久咸丰病死，即帝位，年仅6岁。咸丰遗诏载垣、端华、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改年号祺祥。史称同治皇帝。尊皇后钮祜禄氏和那拉氏为皇太后。同年11月，那拉氏伙同恭亲王奕訢发动宫廷政变，诛肃顺等人，夺取政权。宣布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訢为议政王大臣。改年号同治。载淳由醇亲王奕譞，以及祁隽藻、翁同和等教导学习满、汉文及骑射等。那拉氏、奕訢等人实行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政策，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遍布全国的各族人民起义，保全了清王朝的统治，史称“同治中兴”。1873年亲政，无所作为，却下令修复圆明园，遭群臣反对和两太后干预而止。

【清穆宗】即“载淳”。

【同治皇帝】即“载淳”。

【文祥】(1818—1876) 清末官员。瓜尔佳氏，字博川，号文山。满洲正红旗人。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进士。授工部主事，累迁郎中。1857年(咸丰七年)授太仆寺少卿。历任礼部、户部、吏部侍郎。1859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次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随恭亲王奕訢在京与英法议和。1861年与奕訢、桂良联名奏请改变清政府的外交、通商制度，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咸丰死后，协助慈禧、奕訢发动辛酉政变。1862年(同治元年)连升左都御史、工部尚书，任内务府大臣，兼都统。1865年署户部尚书，率神机营赴东北镇压王达、马傻子起义。1871年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1875年(光绪元年)晋武英殿大学士。任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15年之久，是奕訢推行洋务新政的主要支持者和助手。

【白彦虎】(?—?) 西北回民军首领。又名白素。陕西邠州(今彬县)人。回族。出身贫苦。1862年(同治元年)陕西回民起义时，为首领之一。次年，多隆阿占据陕西回民军基地大荔王阁村、羌白镇，回民军退往陕甘交界董志原，组成新的十八大营。1871年，金积堡起义军失败后，他率军西撤，由金积、海源、静远，过河西走廊，到达西宁，协助马文义旧部马永福军，进行西宁战役。1872年西宁战役失败，马永福降清，他再率部西退肃州(今酒泉)，与当地回民军马文禄部联合，继续抗清。次年，肃州战役失

败，马文禄被清军杀死，他率军西退新疆，先至红庙子（今乌鲁木齐），1876年（光绪二年）8月南退与阿古柏勾结。次年5月阿古柏兵败自杀，12月与阿古柏之子伯克胡里率残部由布鲁特叛逃沙俄。

【阿古柏】（约1825—1877） 19世纪中叶中亚细亚浩罕国的侵华头目。原名穆罕默德·亚库甫。塔吉克族（一说乌兹别克族）。因残酷镇压人民而得到浩罕（原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国王的赏识，从百人长逐渐提升为里亚什凯帕夏（高级陆军军官）。1864年（同治三年）新疆人民举行反清起事，各族封建主乘机各据一方，形成割据混战局面。1865年初，浩罕统治者派遣阿古柏率军入侵中国新疆地区，先后侵占英吉沙尔、疏勒（喀什噶尔汉城，当时喀什由汉城疏勒和回城疏附组成）、沙车、和田、阿克苏、库车和喀拉沙尔（今焉耆）等南疆城镇。1867年悍然建立“哲德沙尔汗国”（七城之国），自称“毕条勒特汗”（意为洪福之王）。1870年又侵占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北疆城镇。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野蛮的压迫和剥削，并同英、俄等国相勾结，签订通商条约等。1876年（光绪二年）3月，清钦差大臣左宗棠督清军入疆讨伐，相继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北疆大部领土。1877年春克复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等城。他退守库尔勒，后因待援无望于5月22日服毒自杀。

【顾盛】（1800—1879） 美国外交官。美国马萨诸塞州人。律师出身。历任马萨诸塞州法官、纽伯里波特市长、众议院议员。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5月，被委任为使华全权公使，率三艘炮舰于1844年2月到达澳门，进行外交讹诈，胁迫清两广总督耆英于7

月3日在澳门附近望厦村签订中美《望厦条约》，扩大了中英《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侵略特权。不久回国，后任州议员、司法部长、驻西班牙大使等职。

【沈葆楨】（1820—1879） 清末洋务派首领。字翰宇，又字幼丹。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谥号文肃。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授编修，迁御史。1856年初（咸丰五年底）任江西九江知府，次年署广信知府。1861年由曾国藩推荐出任江西巡抚，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1866年（同治五年）由左宗棠推荐任福建船政大臣，专主福州船政局。主持船政期间，与洋员的不法行为进行斗争，曾辞退船政监督法国人日意格。同左宗棠等人一起回击顽固派对船政局的攻击和反对，使船政局得以维持并有所发展。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奉命任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率舰船前往台湾，布署防务，遏制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日军撤退后，购买机器，主持开采基隆煤矿。1875年（光绪元年）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督办南洋海防，筹办南洋海军。整顿吏治，修整河堤，开垦荒地等。1879年病逝。有《沈文肃公政书》等。

【慈安太后】（1837—1881） 又称东太后。清咸丰帝奕訢的皇后。满洲镶黄旗人，钮祜禄氏。广西右江道穆扬阿之女。事咸丰潜邸。1852年（咸丰二年）封贞嫔，进贞贵妃。立为皇后。1860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从咸丰帝逃往热河行宫（在今承德）。次年咸丰帝病死，载淳继帝位，被尊为母后皇太后，徽号慈安。与慈禧共同垂帘听政，性情懦弱，权归于慈禧。1869年（同治八年）内监安德海出京，命山东巡抚丁宝楨诛之。1873年，归政于同治帝。

1875年(光绪元年),载湉即帝位,她复与慈禧共同垂帘听政。1881年病死。葬定东陵。谥孝贞显皇后。

【陈澧】(1810—1882) 清未经学家。字兰甫,号东塾。广东番禺人。1832年(道光十二年)举人,六应会试不第,后授广东河源县训导,到官两月即告归,遂弃仕途。主广州学海堂数十年,晚年主讲菊坡精舍。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凡天文、地理、乐律、算术、文词、书法、无不精通。治经主张汉宋学调和。读朱熹书,认为清代汉学,实源出朱熹,不可固守门户之见。又认为汉宋学各有所长,应互相取长补短。所著《汉儒通义》对这些观点多有阐发。对乐律音韵学,作贯通古今的研究,著《声律通考》、《切韵考》。《东塾读书记》论述经学源流、九流诸子以及西汉以后学术,为世所重。此外,还著有《汉书水道图说》、《水经注提纲》《水经注西南诸水考》等地理学著作。

【丁日昌】(1823—1882) 清末洋务派官僚。字禹生,又作雨生,号持静。广东丰顺人。贡生出身。1859年(咸丰九年)任江西万安知县。1861年奉曾国藩札调至安庆军营襄理机要。次年(同治元年)奉李鸿章命,调至上海专管制造火器,先后主持上海洋炮局和苏州洋炮局,参予筹办江南机器制造局。1863年叙功升直隶知州,赏戴花翎。次年,署苏松太兵备道兼管海关,协助曾国藩和李鸿章办理洋务,兼任江南制造局总办。不久,升两淮盐运使。1867年升江苏布政使,次年擢江苏巡抚。1875年(光绪元年)主持福建船政局,12月,兼福建巡抚,例摄台湾提督、学政,主张在台开矿、修铁路。1880年,赏总督衔,会办南洋海防,节制沿海7省水师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有《丁雨生政书》等。

【徐寿】（1818—1884） 清末科学家。字雪邨，号生元。江苏无锡人。厌弃科举，潜心于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于数学、物理、化学皆有深邃研究。1861年（咸丰十一年）与华蘅芳、吴嘉廉等被曾国藩聘为幕僚，参与军械研制修造工作。于1863年（同治二年）研制成中国近代第一艘汽船，次年又在南京制成汽船“黄鹄号”，开中国近代造船业先河。1867年入上海江南制造局，监制船炮枪弹，多所发明。倡议创办翻译馆，致力于翻译西学著作。翻译西书17种168卷，包括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广泛内容，尤以化学译著最为系统。所译《化学鉴原》及续编、补编、《化学考质》等书系统地介绍近代化学的基本原理及各种元素的性质，并创造了以西文第一音节造新字命名元素名称的原则，一直沿用至今。与英人傅兰雅在上海设格致书院，进行化学实验的演示，向社会普及科学知识，声名远扬。大冶铁矿、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筹办之初，曾为之多方筹划。又为无锡乡民改进烘茧、缫丝技术。1884年病逝于上海格致书院。

【左宗棠】（1812—1885） 清末军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字季高。湖南湘阴人。谥文襄。道光十二年（1832年）举人，后3次会试不第，在已故两江总督陶澍家当塾师，遍读群书，钻研军事。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军兴，他先后充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僚，积极参与镇压太平军。1860年6月，被清政府正式任命为兵部郎中、四品京堂候补，随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于长沙编练湘军5000人，赴赣、皖、浙边境地区与太平军作战。1861年底，任浙江巡抚。1862年（同治元年），率部攻入浙江，次年授闽浙总督。1864年，陷杭州，继入闽、粤，在嘉应州（今广东梅

州市)镇压了太平军余部。任内创福州船政局,为清政府最大的新式造船厂,设求是堂艺局,培养造船及海军人才。1866年,任陕甘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制定“先捻后回”、“先秦后陇”方略,先后镇压了西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同时继续兴办洋务,1869年创办西安机器局,1878年创办兰州机器织呢局。1865年间,中亚浩罕汗国军事头目阿古柏入侵新疆,建立伪政权;1871年,沙俄强占伊犁地区。他驳斥放弃新疆的论调,力主收复失地。1875年(光绪元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筹兵筹饷筹转运,准备进军新疆。1876年,设大营于肃州(今甘肃酒泉),制订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方略,命道员刘锦棠率大军进疆,先后取得了古牧地、达坂城和吐鲁番作战的重大胜利,最后直捣喀什噶尔(今喀什),将阿古柏残匪逐出国境。之后,出屯哈密,以武力为外交后盾,收回伊犁。中法战争爆发,极力主战。1884年,任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进驻福州前线整顿防务,部署战守。于1885年8月病逝。遗著辑为《左文襄公全集》。

【巴夏礼】(1828—1885) 英国外交官。英格兰斯塔福德郡人。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来华,在澳门学习汉语。次年被任命为英国驻香港全权代表璞鼎查的秘书兼翻译,参加鸦片战争,并出席《南京条约》签字仪式。1844年起先后任英国驻厦门、福州、上海等领事馆翻译。1856年(咸丰四年)先后任厦门副领事和领事。1856年署理广州领事,制造“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任专员,对广州实行殖民统治。1860年随英国侵华军全权代表额尔金北犯,任翻译主任,参加进攻天津、北京的军事行动。9月18日在通州(今北京通县)张家湾被清军擒获。10月8日释放。极力怂恿联军焚毁圆明园。参与签订

中英《北京条约》。1862年（同治元年）受封爵士。1863年任驻上海领事。次年任驻日兼驻朝鲜公使，在任18年。1883年（光绪九年）任驻华公使。翌年死于北京。

【戈登】（1833—1885） 镇压太平军的“常胜军”头子。1859年（咸丰九年）9月随英国侵略军参加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0月，参与进攻北京和抢掠焚毁圆明园的罪恶行径。1862年（同治元年）5月，至上海，与太平军作战，占青浦、松江泗泾镇和上海七宝镇等，破嘉定。1863年3月，接任“常胜军”统带。4月，攻下常熟福山，解常熟之围，被清政府授为总兵。旋陷太仓、昆山、新阳（今并昆山）、吴江、震泽（今并吴江）。12月，引诱太平天国纳王郜永宽等投降，占领苏州。次年3月，占宜兴、溧阳，在金坛受伤，又败江阴华墅。旋夺华墅。5月破常州，得提督衔。月底在昆山解散“常胜军”。旋赏穿黄马褂。后赴安庆与曾国藩谈军事改革，又见曾国荃，策划进攻天京（今南京），11月离上海。后至印度、苏丹任殖民地行政长官。1885年1月，在苏丹殖民总督任上，被马赫迪·穆罕默德起义军击毙于喀土穆。

【日意格】（1835—1886） 清未来华的法国海军军官。1856年（咸丰六年）来华。次年参加英法联军进攻广州。1861年进入中国海关，历任宁波、上海、汉口等地税务司。1862年（同治元年）参与组织“常捷军”，任帮统，与太平军作战，先后攻陷余姚、奉化、绍兴、杭州等。1866年又在汉口组织“先锋营”对抗捻军。受左宗棠之命筹建福州船政局，任正监督。1868年加提督衔。1877年（光绪三年）会同李凤苞率领一批中国官费生赴欧留学。清廷赏穿黄马褂。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被清政府解职，回国。著有《福

州船政局及其成果》。

【何璟】（？—1888） 清末官员。字小宋。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后选庶吉士，授编修，转迁御史。1860年（咸丰十年）任安徽庐凤道。1863年（同治二年）任安徽按察使，与总兵喻吉三等共同围剿捻军。1865年迁湖北布政使。1870年擢福建巡抚。1876年（光绪二年）升闽浙总督。日本吞并琉球后，他以台湾地当要冲，调船增兵，修筑炮台，以备不虞。1883年中法交涉事起，令提督孙开华等分据台、澎，总兵张德胜等分守各郡。次年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来闽，“事皆专决”，他畏事“不敢为异同”。马尾之战爆发前，以炮列布衙署自卫。马尾战起，欲派关兵援，因无船可用，只得株守省城。战后飞章自劾，加之御史参劾，部议去职。

【汪士铎】（1802或1804—1889） 清末文人学士。字振庵，别字晋侯、梅村，号悔翁、芝生、无不悔翁，原名鏊。江苏江宁（今南京）人。道光举人。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后，逃至皖南绩溪，隐居山林五年，讲读不辍。后胡林翼遣使迎入湖北，研究政事得失，所论多中时弊。1864年（同治三年），湘军攻陷天京（今南京）随即返回原籍。1885年，受国子监助教衔。一生著述甚富，已刊者有《南北史补志》、《水经注图》、《汉志释地略》、《汉志志疑》、《续纂江宁府志》、《同治上江雨县志》和笔记及诗词文集等。他曾在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住过一段时间，对太平天国辖区的情况有所了解，在其《乙丙日记》中，对太平天国史事多有记述。一度受到太平天国“排儒”的影响，对孔孟之学有所批判，因而该书为世人所重。

【岑毓英】（1829—1889） 清末官员。字彦卿，号匡国。广西西林人。秀才出身。1856年（咸丰六年）率乡勇赴云南助剿回民起义，1859年署宜良知县，次年署澂江知府，1862年（同治元年）擢云南布政使。1866年率军赴贵州镇压苗民起义，1868年升云南巡抚，1872年底杀害苗民起义领袖杜文秀，次年署云贵总督。1879年（光绪五年）调贵州巡抚，1883年任云贵总督。1884年奉旨节制粤、楚各军，参加中法战争，1886年从越南撤兵回国，曾会勘边界。1889年病死。

【曾国荃】（1824—1890） 清末湘军将领。字沆甫，号叔纯。湖南湘乡人。贡生出身。曾国藩之弟。1856年（咸丰五年）率湘军二三千人赴援吉安，对太平军作战。次年春，丁父忧回籍。1858年，率部攻占吉安，擢知府。次年，升道员。1860年5月起，围攻安徽安庆。次年9月，占安庆，以按察使记名，加布政使衔。1862年（同治元年），授浙江按察使，迁江苏布政使，合水师东下破巢县等州县，进屯天京（今南京）雨花台。次年，擢浙江巡抚。1864年7月陷天京，纵兵焚掠屠杀，大火7日不熄。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1866年，调湖北巡抚，奉命帮办军务，镇压捻军。次年称病辞职。1875年（光绪元年）后，授陕西、山西巡抚。1882年署两广总督。1884年春，署礼部尚书，调署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寻实授。1889年加太子太保衔。次年，死于任上。

【曾纪泽】（1839—1890） 清末外交家。字劼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1870年（同治九年）由荫生补户部员外郎。1877年（光绪三年）承袭一等勇毅侯。次年充任出使英、法大臣（公使）。

1880年受命兼任使俄大臣，赴俄都圣彼得堡商改清政府出使俄国头等钦差大臣崇厚与沙俄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他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驻华公使布策、外交部高级顾问热梅尼等酌情据理，反复折冲樽俎，于1881年2月24日同沙俄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和《改定陆路通商章程》，代替《里瓦几亚条约》，为中国挽回部分利权。中法战争前，多次对法表示：越南是中国属邦，清政府不能坐视外国对越南的侵略。中法战争爆发后，力主抗法，与法人辩争，始终不挠，向清廷上书，陈述备御方策。后因主战被免去出使法国大臣兼职。不久晋兵部右侍郎，与英国商定洋药税厘并征条约，岁增税银600万元。1885年奉召回国。次年，改兵部左侍郎，任海军衙门帮办大臣。12月受命在总理衙门行走。1887年在英国伦敦杂志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认为“强兵”应优先于“富国”，反映出他的洋务观点。晚年颇不得志，郁郁而终。遗著编为《曾惠敏公全集》。

【郭嵩焘】（1818—1891） 清末驻外公使，洋务派。字伯琛，号筠仙，别署玉池山农，晚更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1853年（咸丰三年）力劝曾国藩出办团练。参与举办厘金、筹建湘军水师等重要决策。1856年到上海，开始接触西学。1858年入京供职。次年奉旨随同僧格林沁办理天津海防，因反对北塘撤防被排挤。1862年（同治元年）授苏松粮储道。次年擢两淮盐运使。旋又擢署广东巡抚，在粤三年，为湘军筹捐济饷，残酷镇压太平天国余部。1866年，因官僚倾轧，被劾解职，居湘中讲学撰述。1875年（光绪元年）授福建按察使，上书力陈西洋立国之本在朝廷政教，一改船坚炮利陈说，抨击官办、官督商办，主张商人自办。随后奉诏以侍郎候补充任出使英国大

使，了结马嘉理案，为中国遣使驻外之始。1878年又奉命兼任出使法国大臣。在外两年多，重视保护华侨利益，潜心考究西方政教、学术和风俗，主张改革教育，修铁路，开矿山，行电报，禁止鸦片，整顿内政。为顽固派所不容，遭到猛烈抨击，奉诏提前回国。再未被起用，居家讲学。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养知书屋遗集》、《郭侍郎奏疏》、《英轺纪程》、《郭嵩焘日记》等。

【何如璋】（1838—1891）清末官员。字子峨。广东大埔人。1868年（同治七年）中进士。后选庶吉士，授编修。1876年（光绪二年）以侍读出任清政府驻日副使，次年升正使。驻日期间，曾就日本侵吞琉球事件与日本外务省及外务卿寺岛宗则多次交涉，据理论驳。向清总理衙门提出解决琉球问题的上中下三策。但李鸿章等仅采其下策行之。1880年回国供职。1883年10月出任督办福建船政大臣。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秉承李鸿章避战求和方针，对闯入马尾港的法军舰队，不但不予拦阻防范，反使之与福建海军同泊一处达40天之久，而且“严谕水师，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马尾之战失败后，借口押银出逃，被清廷革职遣戍。遣戍期满回粤后曾为韩山讲席。不久病死家中。遗著有《使东述略》等。

【奕譞】（1840—1891）清末大臣。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七子。1851年（咸丰元年）封为醇郡王。1861年（咸丰十一年）参与祺祥政变，得慈禧太后信任，历任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等。1872年（同治十一年）晋封醇亲王。1875年初（同治十三年）同治帝死，无子，由慈禧太后立其子载湉入承大统，为光绪帝。1884年（光绪十年）甲申易枢后，受命主持军机处。公开表

示利用湘、淮二系不睦关系以居中控驭。中法战争中先空喊“主战”继转而求和。1885年受命总理海军衙门事务，挪用海军经费，以供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因系光绪生父，也遭慈禧猜忌，因之郁郁而死。

【唐廷枢】（1832—1892）清末洋行买办、企业家。字景星、镜心。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少时入香港马礼逊教科学学校学习，后转入英国教会学堂学习。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受雇于香港一家拍卖行。1851年（咸丰元年）至1857年先后在香港巡礼厅和大审院任翻译。1861年受雇于上海英商怡和洋行，代理该行长江一带生意，两年后升为总买办，直至1872年。在此期间，也经营自己的买卖，有棉花行、钱庄、茶栈等，还附股多家外资企业。1873年（同治十二年）入轮船招商局任总办，扭转了“亏折赔累”的局面，并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保险企业——仁和水险公司。1876年（光绪二年）受李鸿章委托勘察开平矿产资源，力主用近代化手段开矿。次年主持开采。为解决产销的协调，主持修建了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用资本主义近代管理手段经营开平，产量逐年上升，效益显著，企业股票升水，并成功地排挤了天津市场上的洋煤，远销上海等地。又投资于其他矿业、电报业、耕植畜牧垦殖公司、煤气公司等，以及文化福利等事业。

【崇厚】（1826—1893）清末官员。完颜氏，字地山，满洲镶黄旗人。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举人。1853年（咸丰三年）任总兵，随胜保攻打太平军。1858年迁直隶盐运使，协助僧格林沁筹划海防。1861年初任三口通商大臣。1862年（同治元年）以兵部侍郎署理直隶总督。先后与葡、丹、比、意、奥等国订立通商章

程。1866年起在海光寺筹建天津机器局。1870年天津教案结案时，被派为钦差大臣出使法国“赔罪道歉”。1872年回国，擢升总理衙门大臣。1878年（光绪四年）出使俄国谈判关于收回伊犁地区问题。次年在沙俄胁迫下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仅索还伊犁，却丧失伊犁外大片领土，受到舆论遣责。1880年被捕入狱，定为斩监候。1884年助军饷30万两获释，官降二级使用。

【左宝贵】（1837—1894） 清末将领。字冠廷。山东费县人。回族。咸丰初年投身行伍。因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擢游击，迁副将。1875年（光绪元年）随尚书崇实巡视奉天、吉林，晋记名提督。1889年授广东高州镇总兵，仍驻奉天。1891年镇压朝阳金丹道教起义后，赏黄马褂，双眼花翎。中日战争爆发后，率所部6营渡鸭绿江抵朝鲜平壤，驻守平壤城北玄武门，与卫汝贵、马玉昆、丰绅阿等部共同抗击日军。9月14日，日军包围平壤，清军总统叶志超企图弃城而逃，他坚决反对。15日，日军向清军发动猛攻，他登城指挥，亲自开炮，率军拼死抵抗，虽肋下受伤，仍裹创督战。后不幸中炮牺牲。

【丁汝昌】（1836—1895） 清末海军将领。字禹廷，又作雨亭。安徽庐江人。早年投长江水师，后随淮军将领刘铭传镇压捻军，历任参将、提督。光绪初年，赴英国购置兵舰，并游历法、德等国，回国后综理北洋水师。1883年（光绪九年）授天津镇总兵。中法战争爆发，乘舰巡查江平及钦州白龙尾等海口。1888年任北洋海军提督，并任水师学堂总办。1894年赏加尚书衔。面对日军的侵略，多次要求先发制人，攻击日舰，为总署所阻。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率北洋舰队护送清军增援平壤。9月17日回航至鸭绿江

大东沟海面时，与日本联合舰队相遇，双方展开激战。他在旗舰“定远”号的望台上指挥各舰作战，望台被震破裂摔伤后，仍坐于甲板督战。黄海海战后，奉李鸿章“保船制敌”之命，退守山东威海卫海军基地。11月，日军攻旅顺，他赴天津向李鸿章请战援旅，遭到严斥。1895年1月底至2月初，日军围攻威海卫。他指挥将领多次反击，沉毁敌舰艇7艘。后因陆路援绝，突围无望，于2月12日服毒自杀。

【薛福成】（1838—1894） 清末外交家、学者。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1867年（同治六年）入曾国藩幕府，跟随镇压捻军，授为直隶州知州。1875年（光绪元年）应诏上万言书，提出“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其中关于刊印中外约章和国际公法以颁发州县等项建议，为清政府采纳实施。同年，入李鸿章幕府，代拟奏稿、书牍，参预军国大事的谋划。1879年写成《筹洋刍议》，论证洋务运动的必要性主张变法，在社会上发生较大影响。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任浙江宁绍台道，参预击退法国舰船的镇海之战。1889年出任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奏请朝廷废除不准出洋华民归国的禁令，被采纳。成功地与英国议订《续议滇缅界务条款》，收回滇边东里、孟连两大土司的全权。出使期间，思想发生很大变化，羡慕西方君主立宪制度，主张工商立国和发展私营企业。生平好读书写作，文字平易，说理透彻。著有《庸庵全集十种》。

【刘锦棠】（1844—1894） 清末湘军将领。字毅斋。湖南湘乡人。谥襄勤。早年随其叔父刘松山入湘军镇压太平军、捻军及陕、甘回民起义军。1870年（同治九年）湘军统领刘松山于金积堡之战

中被义军击毙后，他以三品卿衔接统其军，迫降义军首领马化龙，又镇压了西宁、肃州（今甘肃酒泉）、河州（今甘肃临夏）一带义军，残酷屠杀回民。1875年（光绪元年）钦差大臣左宗棠受命收复新疆，他被委总理行营营务，授前敌指挥权，其所部为进军新疆主力军。1876年春督率大军进疆，夜袭黄田，再合都统金顺部猛攻古牧地，歼敌数千人，遂克乌鲁木齐。次年春，率大军南下，攻占达坂城，连克吐鲁番、托克逊。匪徒阿古柏暴死，残部南逃。秋，进疆清军分道进击长驱2000余里，连下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城。又分进合击，占喀什噶尔（今喀什）、和阗（今和田），全疆肃清。1884年，新疆建省，他为首任巡抚。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清廷召其进京另有任用，但未行而病卒。有《刘襄勤公奏稿》行世。

【邓世昌】（1849—1894）清末海军将领。字正卿。广东番禺人。少有干略，曾从西人习算学，通英语，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精测量、驾驶。曾管驾“海东云”舰、“振威”舰，历任千总、守备。受李鸿章重视，调北洋海军，随丁汝昌赴英购铁甲舰。1882年（光绪八年）从丁汝昌率舰赴朝鲜仁川，助平兵乱。后迁游击。管“扬威”快船，往来天津、朝鲜之间，并巡台湾、厦门海防。1887年奉命同林永升等赴英、德接收“致远”、“靖远”、“来远”、“经远”等舰，任四船营务处兼“致远”管带。1888年以副将随丁汝昌赴台镇压人民起义，擢总兵。北洋海军建成后，任中军副将。1894年9月17日黄海海战中，指挥“致远”舰冲锋直进，与日舰奋战。见北洋海军旗舰“定远”受敌围攻，急令“致远”开足马力，驶出“定远”之前，代为受敌。激战之中，弹药殆尽，船舰受创，遂令鼓轮怒驶，欲撞击日舰“吉野”号，不幸

中途为其鱼雷击中沉没，与全舰 200 余名官兵以身殉国。

【威妥玛】（1818—1895） 英国外交官。1838 年加入英国陆军。1841 年（道光二十一年）参加侵华的鸦片战争。1843 年任香港英国殖民当局的翻译官。1852 年（咸丰二年）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1854 年英、法、美三国攫取上海海关控制权后，任上海江海关税务司。1855 年至 1871 年，任英国驻华使馆汉文正使（汉务参赞）。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任英国侵华全权专使额尔金的翻译，参与逼签中英《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1866 年（同治五年）向总理衙门呈递《新议略论》，劝告清政府顺应列强侵华形势，“借法自强”，对于洋务运动的兴起有一定影响。1871 年任英国驻华公使。1876 年（光绪二年），以“马嘉理事件”为借口，进行要挟，逼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进一步扩大英国在华特权。1883 年辞职回国，任剑桥大学首任汉语教授。汉学造诣颇深。编有汉语课本《语言自迩集》，所创造的用拉丁文拼写汉字的方法，通称“威氏拼音法”，曾在西语世界沿用。著作有《寻津录》。

【刘铭传】（1836—1895） 清末官员。字省三，号大潜山人。安徽合肥人。1854 年（咸丰四年）组织乡团，对抗入皖太平军。后随清军作战，保荐千总，1862 年（同治元年）被李鸿章编入淮军，赴上海。1862—1865 年，在江苏，浙江等地镇压太平军，由千总、参将，总兵等升至记名提督。攻陷无锡，加头品顶戴，又攻陷常州，赐黄马褂。攻陷南京后，率部追杀幼天王等。所部号“铭字营”，或称“铭军”。1865 年随曾国藩赴山东镇压捻军，后擢直隶提督。李鸿章代曾国藩督师后，他专力镇压东捻军，被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1868 年又镇压西捻军，封一等男爵。10 月率部入陕，

镇压回民起义，为督办陕西军务，旋以病归。1880年（光绪六年）沙俄因伊犁问题以武力相威胁，清廷筹备战防，应诏入京，疏陈兵事，极言修筑铁路之利。1884年中法战起，奉诏以加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条陈整顿海防十事，多被清廷采纳。法军攻台，他指挥清军在基隆、淡水、台北等地，屡挫法军，相持8个月，保住台湾。1885年10月台湾建省，为第一任巡抚。在台期间，丈田清赋，增收茶、盐、金、煤、木材等税，岁入300万两。并修筑炮台、铁路、电线等，开办新式学堂。1890年加兵部尚书衔命帮办海军事务，后因病去职。1895年清廷屡召，以病未出。不久病逝，赠太子太保。著有《刘壮肃公奏议》及《大潜山房诗集》。

【刘步蟾】（1852—1895）清末海军将领。字子香。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少时沉毅，力学深思。曾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1875年（光绪元年）赴欧学习枪炮、水雷诸技，成绩优秀。归国后留福建，任守备。后经李鸿章、丁宝楨保荐，擢游击，会办北洋操防。1885年赴德国购“定远”舰，任副管带。1888年以参将赴欧接领四艘快船，迁副将，擢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兼“定远”管带。职位仅次于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曾参与草拟《北洋海军章程》，治军严整。1894年9月，偕同丁汝昌舰队护送清军赴朝返航时，与日本舰队展开激战。丁负伤后，他代为指挥，击退日舰后率队返回旅顺。黄海海战后，代理提督之职。1895年初，日军水陆合击威海卫，协助丁汝昌谋划战守，奋力抵抗。在威海卫即将失陷，部分贪生怕死将领勾结洋员准备投降之际，炸沉已受重创的“定远”舰，然后自杀殉国。

【徐骧】（1858? —1895）台湾抗日义军首领。台湾苗栗人。年

轻时耕而兼读，好习武，在当地颇有威信。1895年春，日本割占台湾，侵占台北，逼近新竹时，他聚众慷慨陈词，号召“人自为战，家自为守”，组织起抗日义军，任民团团团长。6月中旬，率千余义军协同清军在新竹阻击日军，给日军以沉重打击。8月中旬，率义军与刘永福的黑旗军密切配合，设伏兵于大甲溪，日军半渡之时，将其拦腰斩断，予以痛击。9月初，配合黑旗军反攻彰化，未克。10月上旬，率义军与嘉义守将王德标暗掘地道至日军营地，半夜引发地雷炸死日军700余人。嘉义失守后，日军进犯曾文溪。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他身先士卒，率军冲杀，不幸中炮牺牲。

【陆皓东】（1867—1895）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字献香，原名中桂。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与孙中山同村，有深交。曾就读私塾，后出走上海，入电报学堂，毕业后派至电报局当电报翻译生，擢至领班。1893年底与孙中山在广州广雅书局南园开会筹组兴中会。次年春随孙赴天津，上书李鸿章，要求实行变法，未果。游北京、武汉等地，了解天下大势。是年秋，两人同抵上海，孙中山乘轮往檀香山，他仍回电报局供职。1895年初到香港辅助孙中山联合辅仁文社，建立香港兴中会总部，准备于10月26日（农历九月九日）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设计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因奸人告密，事泄被捕，英勇就义。孙中山赞之为“为共和牺牲之第一人”。

【武训】（1838—1896） 清末名丐。初无名，以排行第七称武七，“训”是清朝嘉奖他的赐名。山东常邑（今属聊城）人。少时孤贫，随母乞于市。稍长，一面作佣工，一面行乞。自恨不识字，发誓积资办义学，将乞讨所得置地放债，并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地

置田数百亩，在柳林庄设立义塾。塾分二级，初级为蒙学，高级为经学。继又资助馆陶等地的学塾。先后得山东巡抚张曜、袁树勋疏请表彰。清政府授以“义学正”，赏穿黄马褂，未接受。病危时，听到塾生的诵读声，还张目而笑。病逝于临清义塾。

【李鸿藻】（1820—1897） 清末官员、清流派领袖。字寄云，号兰孙。直隶（今河北）高阳人。1852年（咸丰二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1861年咸丰帝特诏为皇太子载淳师傅。同治继位后，擢侍讲，累迁内阁学士，署户部左侍郎。1865年（同治四年）任军机大臣。次年授礼部右侍郎。1871年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曾上书反对修葺圆明园。1876年（光绪二年）兼总理衙门大臣。崇厚与沙俄擅订《里瓦几亚条约》后，他鼓动清流派大臣群弹劾李鸿章，力倡改约。1881年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调吏部。中法战争期间，力主援越抗法。1884年4月，因清军在北宁、太原败绩，全体军机大臣被罢职或降调，他也被劾罢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谪迁内阁学士。1887年迁礼部尚书，不久赴郑州督办河工。秋汛西坝失事，河道总督李鹤年被革职后，暂署河道总督。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奉命商办军务，再授军机大臣。与翁同龢皆主战，反对批准和约。次年任总理衙门大臣，礼部尚书。1896年再调吏部尚书。1897年以病乞假。不久病逝，赠太子太傅。

【王韬】（1828—1897） 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字紫诠，号仲弢，别号天南邈叟，初名利宾。江苏长洲（今吴县）人。18岁中秀才，后屡试不中。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受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邀请，在英国教会办的墨海书馆任中文编辑。1860年（咸

丰九年)太平军进攻上海时,帮助上海地方当局组织民团抵御太平军。次年,陪伴传教士艾约瑟等到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南京),结识太平军将领刘肇均。1862年,化名黄畹,上书刘肇均建议太平军向北出击,打击清军,然后攻打上海。事为清政府获悉,遭通缉。在英国领事麦华陀和传教士慕维廉的庇护下,避居上海,帮助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1867年(同治六年)至1870年,由理雅各邀往英国译书,并游历英、法、俄等国。回到香港后,编著《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1873年和黄胜创办《循环日报》。1884年(光绪十年)回到上海,主持格致书院,为《申报》撰稿,并继续写书。主要著作有《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牘》,主张学习西方,发展贸易,兴办近代工矿企业,提倡科学教育,赞慕西方的政治制度。其思想主张对后来的维新派有很大影响。

【奕訢】(1832—1898) 清末洋务派首领。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母静皇贵妃在孝全皇后死后为后宫嫔妃地位最高者,并抚养咸丰长大成人,兄弟二人关系密切。1850年(咸丰元年)封恭亲王。1853年太平军北伐震动京畿,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旋母病死,强行为其上皇太后封号,咸丰怒,罢其官职。兄弟二人矛盾日深。1857年复授都统,1859年封内大臣。1860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行宫,任其为议和全权大臣,分别与英、法、俄签订《天津条约》。与桂良、文祥等逐渐形成政治集团,萌生洋务思想,认为农民起义是“心腹之害”,外国入侵者是“肘腋之忧”,主张对外“和戎”,对内全力镇压“发捻”。认为应变通清的外交、通商和教育制度以适应形势需要,并主持成立了总理衙门和同文馆。1861年,咸丰帝病死,与那拉氏

勾结发动宫廷政变，处死咸丰遗诏赞襄政务的载怡、端华、肃顺等人，夺取政权。任首席军机大臣、总理大臣和议政王大臣，享王爵世袭、亲王双俸等殊荣，总揽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与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相呼应，积极推动购买外国船炮，训练新式海陆军，兴办近代军用、民用企业，推广西学，培养科技和外语人才，派出驻外公使和留学生，为清中枢主持洋务活动的首脑人物。太平天国失败后，受那拉氏猜忌，于1865年（同治四年）被罢去议政王等一切职务，经廷臣求情，不久又复军机大臣、总理大臣等职。1874年，因反对重修圆明园被责召对失仪，降为郡王，次日复亲王爵。然与那拉氏的矛盾并未消除。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被那拉氏以“萎靡因循”为借口罢去一切职务。闲居10年。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被重新起用，授总理衙门大臣，总理海军会同办理军务及内廷行走。又命督办军务，节制各路统兵大臣，并任军机大臣。鼓吹“祖宗之法不可变”，反对维新派的改革主张，不久病死。

【杨深秀】（1849—1898） 中国近代维新人士。字漪邨，本名毓秀。山西闻喜人。1870年（同治九年）中举人。两年后赏为刑部员外郎。勤勉好学，精通经史、术算，旁及绘画。时人称为“山西儒宗”。1889年（光绪十五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1897年底授山东道监察御史，立志以澄清天下为己任，上书建议革旧图新、变法图存。次年3月和御史宋伯鲁发起关学会，讲求变法。4月列名康有为发起的保国会。与康有为过从甚密，不少奏疏是和康有为商量后写成，或是康有为代拟。6月1日，上新政条陈5篇，请明定国是，宣布变法；请厘正科举文体，废弃八股，改试策论；请拟订游学日本章程，派遣近支王公游历；请筹款译书。

百日维新期间，与守旧派展开尖锐斗争，多次奏劾迂谬大臣，向人表示有机会将申讨慈禧太后，被告发。戊戌政变时，欲上书请慈禧太后撤帘归政，为其子劝止。9月24日被捕。与谭嗣同等同时被害。遗著有《雪虚声堂诗钞》、《杨漪春侍御奏稿》、《闻喜县新志》等。

【杨锐】（1857—1898） 中国近代维新人士。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人。1885年（光绪十一年）中举人。入张之洞幕府，属草奏牍。1889年授内阁中书。后充任会典馆帮总纂官，晋侍读。中日甲午战争时，主张集精兵猛将大举北援，保卫津沽。1895年参与发起强学会，开始和康有为等维新派接触。强学会被封禁后，又联合会中志士抗争。清廷在强学会旧址基础上设立官书局，命其参与选书事宜。1898年春，在京创立蜀学会，并办蜀学堂，以张之洞的《劝学篇》为指南，兼习中学和西学。4月列名保国会，而常于集会时当众假寐，表明对维新运动的某种保留态度。8月29日，在光绪皇帝召见时，面奏数百言，陈述用人武备等事，颇得皇帝称许。次日，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与谭嗣同等参与新政。但与康有为、谭嗣同等的变法主张多有不合，声称要对新法“稍加裁抑”，并时有抽身告退念头。9月14日，接到光绪皇帝的密诏，令与谭嗣同等详悉筹议良策，以保住皇位。一时震惊，不知所为，延至19日才转交给康有为等，致使康等措手不及。戊戌政变时被捕，张之洞营救不及，遇害。遗著编为《杨叔峤文集》和《杨叔峤诗集》。

【刘光第】（1859—1898） 中国近代维新人士。字裴村。四川富顺人。1883年（光绪九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为官清廉，不

媚权贵、常闭门读书，而心系时局。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上书建议光绪皇帝严明赏罚，隆重武备，以振积弱。但刑部堂官阅后震恐，不敢代递。1898年春列名保国会。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代皇上批阅奏章，认真谨严。曾与谭嗣同一起批驳守旧派曾廉请杀康有为的奏疏，但又经常依违于维新与守旧之间，处理政事尽量不分新旧畛域，使维新守旧咸得其宜。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著有《衷圣斋文集》、《介文堂诗集》。

【谭嗣同】（1865—1898）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字复生，号壮飞，又号东海寰冥氏，寥天一阁主。湖南浏阳人。出身仕宦之家。少年时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喜好经世之学，长于技击。1884年（光绪十年）到新疆在巡抚刘锦棠幕府任事，曾遍游各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中日甲午战争后，受战败刺激，思想为之一变，从此抵排旧学，倡言西学。在浏阳创立算学馆，开湖南维新风气之先。1896年夏，游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求友访学，探求新知，结识梁启超、严复、黄遵宪等维新人士及翁同龢、徐致靖、文廷式等帝党官员。欣赏康有为的学说、主张，自称是其私淑弟子。同年，其父为纳贖捐得五品衔候补知府，在南京候差。跟从杨文会学佛学，钻研颇深。至1897年春写成《仁学》5万余言，杂糅儒、释、道、墨各家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社会政治学说，构成一种独特的哲学体系，以民主主义观点批判封建专制思想和纲常名教，号召冲决君主、伦常、利禄、俗学、天命、佛法等封建网罗。南京待职期间，经常往来于上海、两湖，为变法奔走呼号。1898年2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回长沙兴办新政。与黄遵宪、梁启超、皮锡瑞、唐才常、熊希龄等创设南

学会，出版《湘报》，办时务学堂，创电信，置轮船，建电厂，筹组机器制茶公司，逐步推行各项新政。又倡设不缠足会、延年会，改革世俗恶习。8月，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举荐，奉诏入京。赏四品卿衔，擢为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共同参与新政，时称“军机四卿”。9月中旬帝后党争加剧，18日接读光绪帝密诏，令设法相救。与康有为等密商后，当夜径赴京郊法华寺访袁世凯，说袁起兵救上。袁佯作应允，暗中却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捕拿维新党人。25日被捕，曾向友人表示愿为变法流血。与林旭等5人同时被害，时称“戊戌六君子”。平生好为歌诗，风格雄健。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康广仁】（1867—1898） 中国近代维新人士。名有溥，字广仁，号幼博。广东南海人。康有为的胞弟。自少鄙弃八股科考，认为八股锢塞人才，导致国家弱亡。曾纳贖为浙江小吏，耻于卑屈官场，挂冠而去。从美国人嘉约翰学西医，计划在上海创设医学堂，未成。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2月，和徐勤等在澳门创办《知新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鼓吹变法。后到上海倡设女学堂和戒缠足会，虽遭顽固分子诋排，仍坚行不辍。同年秋，在上海创设大同译书局，计划译介日本和西方著作，以社会政治学说为主，兼及自然科学；印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1898年春，挟金赴京，协助康有为鼓动变法。认为变法首先在于废八股、开民智，与御史宋伯鲁谋议上书，请变生童岁科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得旨允行。看到光绪皇帝无权，不能举行新政，便屡劝康有为离京南归，收徒讲学，待机变法。戊戌政变时被捕，在狱中说：“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从容就义。遗著编为《康幼博茂才遗稿》。

【林旭】（1875—1898） 中国近代维新人士。字暲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举人出身。好为歌诗。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赴京参加会试，针对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上书请拒和议。旋加入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奔走其间。同年，入赘为内阁中书。1898年春，接受梁启超规劝，幡然戒诗。拜康有为为师，钻研今文经学和经世之学。创立闽学会，与粤、蜀、浙、陕各学会相呼应，推动维新运动。4月参与发起保国会。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戊戌政变前夕，把光绪皇帝的“求救”密诏带给康有为，共商援救的方策。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时，年仅24岁。遗著有《晚翠轩集》。

【戊戌六君子】戊戌政变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大肆捕杀维新党人，维新志士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6人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8日在北京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丁丙】（1832—1899） 清末藏书家。字嘉鱼，又字松生，晚号松存。祖上经营布业，富有资财。好收藏。太平军进攻东南时，曾在战火中抢救出杭州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1万多卷，并负责重修文澜阁。私人藏书甚多。藏书室称“八千卷楼”，另辟“后八千卷楼”，“善本书室”，总称“嘉惠堂”。所藏多为明清两朝书籍，现存在江苏图书馆。著有《庚辛泣杭录》、《善本书室藏书》、《三塘渔唱》、《北郭诗帐》等，另辑有《武林掌故丛编》。

【朱红灯】（1862—1899）清末义和拳首领。原名朱逢明。山东泗水人。家中贫穷，略懂医道。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因避水灾至长清县（今齐河县）李庄其舅父家，以卖药行医为业，并拜村民李开全为师习拳。后因受当地地主武装压迫，率部分神拳会众转移至茌平一带设场练拳，几乎各村都有习拳者。1899年10月，率高唐、茌平、长清等地神拳会众赴平原县杠子李庄，支援当地神拳首领李长水领导的反洋教斗争。在打退平原知县蒋楷率领的前往镇压清军后，将所率队伍改称义和拳，竖起“兴清灭洋”的旗帜，与本明和尚领导的义和拳互相配合，攻打各地的教堂。济南知府卢昌诒、补用知府袁世敦（袁世凯族弟）等率马、步兵700余人前去平原镇压。10月18日，他率义和拳群众2000余名，在森罗殿将清军打得大败而回。不久，因发生内部冲突而受伤，潜回茌平五里庄养伤。11月21日，清军统领马金叙探知其下落后，将其逮捕，搜出义和拳“明年四月初八日攻打北京”的计划书。12月24日，被山东巡抚毓贤杀害于济南。

【心诚和尚】（？—1899）清末义和拳首领。原名杨照顺或杨天顺。又号“本明和尚”。山东高唐后杨庄人。自幼家贫，出家在禹城丁家寺为僧，习练刀枪拳技。后在丁家寺设场练拳，成为当地义和拳首领。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夏与朱红灯率领的另一支义和拳队伍互相配合，支援平原县杠子李庄义和拳首领李长水与当地教会势力的斗争，攻打教堂，惩处不法教民。10月率义和拳击退平原知县蒋楷带领的前来镇压的清军，接着又在森罗殿击退济南知府卢昌诒率领的清军。与朱红灯、徐登第等义和拳首领，在茌平、高唐、平原一带进行反洋教斗争。11月，被清军统领马金叙逮捕，解押济南。12月24日，与朱红灯一齐被即将离任的山东

巡抚毓贤杀害于济南。

【陈宝箴】（1831—1900） 清末官员。字右铭。江西义宁（今修水）人。1851年（咸丰元年）中举人。1860年后入湘军，随从镇压太平军，以功叙知府。历任河北道、浙江按察使、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为政清廉，生活俭朴。忧世感时，留心时政。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受命为赴辽东作战的湘军转饷输粮。得知签订《马关系约》，悲愤欲绝，遂上疏痛陈利害得失。1895年8月，任湖南巡抚，慨然以开化湖南为己任。与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候补知府谭嗣同等倡办新政，设矿务总局、电报局、官钱局、蚕桑局、工商局，支持创办火柴公司、轮船公司、化学公司、水利公司及枪弹厂等，又设立保卫局、南学会、算学堂、湘报馆、时务学堂、课吏堂等，使湖南的维新运动蓬勃开展，居各省之冠。当新政遭到湖南顽固派攻击时，给予有力反击。当康有为遭到诬陷时，特上疏为之辩护。在百日维新期间，不断条陈新政，提出练兵、筹饷、开矿、筑路、振兴商务、改革科举等建议，并保荐杨锐、刘光第等赞襄新政。但变法主导思想与维新派有原则不同，认为民权平等学说伤理害道。戊戌政变后，以“滥保匪人”罪，即行革职，永不叙用。遗有《奏议》、《批牍》、《书牍》、《文集》、《诗集》、《日记》，均未刊行。

【罗荣光】（1834—1900） 清末将领。字耀庭。湖南乾州（今乾城）人。咸丰初年由武童入曾国藩湘军。1862年（同治元年），随李鸿章淮军至上海，在苏、浙一带与太平军作战，以有功擢总兵，赐号果勇巴图鲁。以后多次参加镇压捻军，晋记名提督。1870年补大沽协副将。1881年（光绪七年）在天津创设水雷营，选各营

将士演习，兼授化电测量诸学。1888年授天津镇总兵。1900年擢喀什噶尔提督，未赴任而义和团运动兴起，继而各国军舰相继开至大沽口外示威，乃坚守炮台。6月16日晚，八国联军代表递交最后通牒，限令17日凌晨2时交出炮台，被他严辞拒绝。次日凌晨一时起率大沽守军与敌展开激战，长达6小时。炮台失守后退至天津。天津失陷前服毒自杀。

【刚毅】（1834—1900）清末官员。字子良。满洲镶蓝旗人。1866年（同治五年）以笔帖式叙刑部主事，后历任员外郎、郎中。谙悉案例，以平反杨乃武与民妇葛毕氏冤案得旨嘉奖。1880年（光绪六年）任广东惠潮嘉道。次年迁江西按察使。后历任广东、云南布政使。1885年升山西巡抚，任内颇多建树。1888年调任江苏巡抚，挑浚河道，亦有政绩。1892年再调广东巡抚。1894年补授军机大臣兼礼部侍郎，充方略馆总裁。1896年擢工部尚书。次年调刑部尚书。1898年戊戌维新期间，认为变法有利于汉人不利于满人，顽固反对变法。政变发生后极力请罢新政，参预帝位的废立阴谋，支持军机大臣荣禄立溥儁为“大阿哥”建议。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受命帮办武卫军事务。赴京郊良乡及涿县一带考察义和团的态度与实力后，向慈禧建议利用义和团向列强开战。清廷对列强宣战后，奉命与庄亲王载勋统领义和团。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前夕，随慈禧太后等逃往西安，至闻喜病亡。中外议和时被列祸首，定斩立决，以病故免。

【聂士成】（？—1900）清末将领。字功亭。安徽合肥人。初投袁甲三部，镇压捻军、补把总。后随李鸿章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累迁守备、游击、副将等。镇压东捻军后，擢总兵，镇压西捻军后，

晋提督。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主动请兵率师抵台，屡败法军。战后，驻扎旅顺。1891年参予镇压热河朝阳金丹道起义。次年，实授太原镇总兵，仍驻芦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叶志超率军2500人抵朝鲜牙山。7月，所部在成欢驿顽强抗击日军，旋以寡不敌众，随叶志超退守平壤。清军退入国境后，率部扼守摩天岭、连山关4个多月，苦战不退，撰有《东征日记》，记录亲历战争实况。战后，以战功显著晋升直隶提督，驻军芦台。1898年，所部30营改称“武卫前军”，受直隶总督荣禄节制。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受命保护京津，芦汉铁路。6月中旬率部守卫天津，与义和团配合英勇抗击八国联军。7月9日，在天津城南的八里台战斗中，指挥所部与敌恶战4小时之久，身受7伤，“腹破肠出，犹挥军前进”，壮烈殉国。

【马建忠】（1844—1900） 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出生在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商人家庭，少年时随家人躲避太平军。转徙到上海，入法国天主教徐汇公学。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影响。舍弃科考，研求洋务。1870年（同治九年）入李鸿章幕府。1876年（光绪二年）随郭嵩焘出使英国，担任翻译。次年入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攻读法律、政治、外交。回国后，授道台衔，为李鸿章办洋务，曾去印度、朝鲜处理外交事务。1890年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同年，发表《富民说》，提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提倡商人集股设立公司。在政治上，羡慕西方议院制度。1896年出版《适可斋记言记行》，宣传改良主义，影响颇广。1898年起发愤作《马氏文通》，参考西洋文法，研究中国古代汉语的结构规律，为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一说为马相伯作）。见第四卷中的

“马建忠”。

【许景澄】（1845—1900） 清末外交官。字竹筴，原名癸身。浙江嘉兴人。1868年（同治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曾出任四川、顺天府等地乡试考官。大学士文祥以其明习时事举荐。1880年（光绪六年）受命出使日本，因遭父忧未任。1884年任出使法、德、意、荷、奥5国大臣，后又兼摄比利时使务。当时清政府初创海军，他在德国为购铁甲船舰，作《外国师船表》，介绍各国海军情况，并建议清廷以胶州湾为海军基地，在大沽口增设铁甲炮船，加强海防。1890年充任出使俄、德、奥、荷4国公使。1892年沙俄侵占中国帕米尔萨雷阔勒岭以西地区，他与沙俄反复交涉，相持三载，双方议定边界未定以前，各不进兵，并著有《帕米尔图说》、《西北边界地名考证》等。1897年调任出使德国大臣。沙俄取得在中国东北“借地修路”权后，他曾力阻路线南移，并于1896年9月与华俄道胜银行总办罗启泰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1898年5月7日，又以头等公使的身份，会同驻俄公使杨儒，与沙俄代表莫拉维诺夫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1898年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礼部侍郎，旋又调吏部，充大学堂总教习、管学大臣等。次年，曾力阻意大利索占三门湾。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力主严厉镇压。在清廷讨论对待列强方针的御前会议上，与袁昶等人反对向列强宣战，被载漪等“斥为邪说”。7月28日，与袁昶同时被杀于北京。著有《许文肃公遗稿》、《许竹筴先生出使函稿》及《许文肃公外集》等。

【袁昶】（1846—1900） 清末官员。字重黎，一字爽秋，原名振蟾。浙江桐庐人。少聪慧，厉志读书。1876年（光绪二年）中进

士，任户部主事，1883年充总理衙门章京。1885年随吏部尚书锡珍赴天津，与法国谈判《天津条约》，后迁员外郎、记名御史。1892年授安徽宁池太广道，诚僚属、抑胥吏、清关税、兴水利，多所兴革。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陈抗日之策未被采纳。1898年6月，擢陕西按察使，未赴任旋迁江宁布政使。8月上书清廷，提出有关政治、经济、财政等问题的变法建议，引起光绪帝的重视。戊戌政变后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1899年4月补光禄寺卿，7月转太常寺卿，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力主镇压团民，保护列强使馆，处死支持义和团的徐桐、刚毅、赵舒翘等，反对对列强宣战。7月28日，以“任意妄奏”、“语多离间”罪名，与许景澄同时被杀于北京。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廷对其议恤，许还原官。著有《于湖文录》、《浙西村丛刻》、《乱中日记残稿》等。

【唐才常】（1867—1900）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人士。字黻丞，又字佛尘，自号泚澣子。湖南浏阳人。早年就读于长沙校经书院、岳麓书院、武昌西湖书院、留心经世之学，尤好钻研中西历史、政治。中日甲午战后，认定要挽救国家危亡，非实行变法不可。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和谭嗣同等在浏阳兴办算学馆，提倡新学，开通风气。参加创办《湘学报》和时务学堂，鼓吹变法，开启民智，培养维新人材。1898年参与创办南学会、萌学会和《湘报》，宣传民权思想和君主立宪制度。百日维新开始后，深受鼓舞。9月，应军机章京谭嗣同电召，欲赴北京参与新政，行抵汉口，闻知政变发生、六君子遇难，不得已辗转 to 日本，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商讨救国之策。1899年春到上海主编《亚东时报》，以开拓民智、阐明公理、改革旧习、激发忠君爱国之志为宗旨。秋间，再赴日本，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及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平山周等联络，

酝酿在长江流域起义。年底，在上海发起成立正气会（后改名自立会），秘密策划武装起事。1900年7月，义和团运动高涨时，在上海张园召开中国国会，宣布要“创造新自立国”，拥戴光绪皇帝当政。8月，赶到汉口，在英租界设自立军秘密机关，组织以会党为基础的自立军，准备以“勤王”的名义起义。不幸事泄，与林圭等30余人被捕，英勇就义。遗著编为《唐才常集》。

【林圭】（1875—1900）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人士。字述唐，号悟庵。湖南湘阴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入长沙时务学堂，受到梁启超等的维新思想影响。戊戌政变后留学日本，倾慕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的共和制度，醉心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学说。与唐才常等人往来密切，决定回国组织武装，以“勤王”相号召，实谋革命。行前，孙中山为饯行，并介绍联络人员。1900年初在上海和唐才常等发起成立正气会（后改名自立会），旋与毕永年及日本人平山周到湖南、湖北活动，联络会党，组织自立军。7月，与唐才常等在汉口英租界建立自立军秘密总机关，策划起事，任中军统领，驻汉口。定期举事，不幸事泄，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逮捕，8月22日与唐才常等同时遇害。

【珍妃】（1876—1900） 清光绪帝妃。他他拉氏。满洲镶红旗人。礼部侍郎长叙女。幼聪慧。1888年（光绪十四年）10月选封珍嫔。次年2月入宫，深得光绪帝宠爱。1894年初，晋封珍妃。11月，慈禧以“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为由将其降为贵人。1895年12月恢复珍妃位号。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支持光绪帝变法图强、独揽政权。政变后被囚禁于宫内东北部的北三所。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之际，慈禧携光绪帝西逃前，命太监崔玉贵将其

推入井中溺杀。1901年追赠贵妃位号，浅葬西直门外田村，后移葬崇陵妃园寝。追谥恪顺皇贵妃。

【史坚如】（1879—1900）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字经如，原名文纬。广东番禺人。出身名门，博学多才，读经史，习武艺，喜书法、绘画、史地诸学科。中日甲午战后痛恨清廷专制腐败、丧权辱国，立志革命。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入广州格致书院学习自然科学。次年，经日人高桥谦介绍，至香港结识陈少白、杨衢云等，并加入兴中会。旋东渡日本访谒孙中山，倾吐胸臆、指陈大计，反清革命意志益坚。归国后，积极联络广东、湖南、湖北、福建等地志士，锐意图大举，并变卖家产以赞助革命活动。1900年孙中山派郑士良在惠州发动起义，他奉命在广州策应，先谋联络会党、防营起事响应，未果，于是购置炸药，掘地道轰炸广东抚署，准备炸死署两广总督德寿。后听说德寿未伤，前去察看现场，结果被捕。遭受酷刑折磨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张德成】（？—1900） 天津地区义和团首领。直隶（今河北）新城县人。自幼操船为业，经常来往于直隶静海县（今属天津市）独流镇与新城县白沟河等地，机智多谋，在群众中颇有威信。1900年春夏之际，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京津保地区迅猛发展。他曾在家乡组织坎卦义和团，被推为首领。5月，率部分团员返回独流镇，以“扶清灭洋”为号召，建立起北、中、南三个义和团坛口。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后，天津危急。他亲率团众5000余人分乘数十只木船从独流抵达天津，设总坛口于北门里小宜门。6月29日，与天津地区另一著名义和团首领曹福田猛攻联军侵占的火车站。直隶总督裕禄曾礼迎其入总督衙门，与清武卫前军统帅聂士

成、武卫左军统帅马玉昆及曹福田等共商天津战守事宜。根据会上决议，多次率义和团与聂士成所部清军攻打紫竹林外国租界。7月13日，在抵抗八国联军、保卫天津南门的战斗中负伤。14日，天津失陷后，回到独流、杨柳青等地，准备重整旗鼓再起斗争，不幸被王家口的地主民团杀害。

【林黑儿】（?—?）清末天津地区反帝组织红灯照的首领。又称“黄莲圣母”。自幼行走江湖，“凡各种拳棒及一切戏术皆能之。”成年后嫁给船户李有的儿子为妻。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春夏之际，义和团运动在天津地区迅速兴起。她谎称神灵附体，自称“黄莲圣母”，在义和团坎字团首领张德成建议支持下，设立起红灯照坛口，广收年轻妇女为徒，一时名声骤起。曾指挥红灯照参加攻打老龙头火车站和紫竹林外国租界的战斗，在运河上缉查来往船只是否载运洋人、洋货，以民间土法为义和团众治疗疾病和创伤。7月14日，天津失陷，被联军俘虏，后下落不明。

【李鸿章】（1823—1901）清末军政重臣。淮军首领、洋务运动主要倡导者。字少荃。安徽合肥人。谥号文忠。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1853年（咸丰三年）随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抵抗太平军。1858年入曾国藩幕府。1861年冬，奉曾国藩之命赴皖北募勇。以淮南团练为基础，仿湘军营制，编练成淮军。次年率淮军赴上海，在英、法、美侵略者支持下，与太平军激战。旋擢江苏巡抚。大量购买洋枪洋炮，雇用外国军官，装备和训练淮军。同时勾结英人戈登“常胜军”，攻占太平军苏南根据地。在夺占苏州、常州一带之后，又积极配合湘军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从60年代开始，与奕訢、曾

国藩、左宗棠等倡导洋务运动，在上海、苏州创办小型洋炮局，仿西法制炮弹。1865年（同治四年）署两江总督，将原办洋炮局分别合并扩充为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制造局，依靠进口原料，雇用洋匠，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制造枪炮、弹药、轮船，用新式武器装备清军。1866年，继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赴山东、直隶（今河北）、河南一带“剿捻”。在承袭曾国藩“剿捻”方略基础上，提出“扼地兜剿”的方略，于山东、江苏间镇压了东捻军。1868年，在陕甘总督左宗棠等配合下，集中10余万清军，在直隶、山东之间镇压了西捻军。1870年，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与掌管清政府的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朝统治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此后，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将洋务运动又推进一步，在继续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又大力兴办民用工业，先后设立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与此同时，利用海关税收购买外国军舰，修造旅顺、威海卫（今威海市）军港，在各地办水师、武备、水雷等各式军事学堂，并抽调军官赴德国学习，仿欧式练兵，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编练成北洋海军，建立起一支在当时世界上占第四位的北洋舰队。在外交事务中，一贯主张妥协投降。1878年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出卖大量主权。1884—1885年中法战争中，主张“乘胜而收”，以胜求和，与法国签订屈辱的《中法天津条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幻想“以夷制夷”，避战求和，结果陷于被动挨打，招致陆军惨败和北洋海军覆没。以全权代表身份赴日签订了《马关条约》。甲午战后，在“联俄制日”的思想支配下，于1896年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以中俄共同防止日本侵略为幌子，出卖中国东北三省主权。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主张镇压义和团，支持“东南互保”，后被任命为全权大臣，代表清政府与英、法、

俄、德、意、日、美、奥、西、荷、比 11 国代表签订《辛丑条约》，自此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统治的工具。1902 年 10 月病死。遗著辑为《李文忠公全集》。

【杨衢云】（1861—1901）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字肇春，原名飞鸿。福建海澄（今龙海）人。曾任香港招商局职员、英商新沙逊洋行买办。1892 年（光绪十八年）与谢缵泰等在香港成立辅仁文社，以“开通民智、讨论时事”为宗旨，任社长。1895 年春参与筹建香港兴中会总机关，被推为会长，准备广州起义，负责招募志士和筹划饷械。事败后亡命海外，转徙南洋、印度及南非洲各地，向华侨宣传革命，建立兴中会分会。1898 年移居横滨。1899 年辞会长职，荐孙中山自代。1900 年惠州起义爆发，归香港进行活动，失败后谢绝党人要他出洋暂避的劝告，在香港以教授英文为生。1901 年被清吏遣人刺杀身亡。

【毕永年】（1869—1901）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者。字松甫、松琥。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少年时喜欢阅读王夫之的著作，逐渐产生民族主义思想，萌发反满念头。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维新运动时期，与谭嗣同、唐才常等往来密切，主张在湖南设立议院，并秘密联络会党，酝酿起事。9 月到北京观察政局。戊戌政变前夕，参与康有为等的密谋，计划围锢慈禧太后、捕杀荣禄。戊戌政变后赴日本，加入兴中会。次年回国，与林圭等在湖南、湖北组织自立军，准备武装起事。1900 年 7 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国会，劝说唐才常与坚持改良的康有为脱离关系，唐不从。秋天，参加惠州三洲田起义，失败后赴广州，入罗浮寺为僧，次年园寂。

(一说赴南洋)。

【毓贤】(? —1901) 清末地方督抚。字佐臣。汉军正黄旗人。监生出身。1879年(光绪五年)以同知报捐知府。1888年署山东曹州知府,后实授。1895年授兖沂曹济道。次年,补山东按察使,残酷镇压曹州大刀会反洋教斗争。1898年冬,署山东布政使,旋调湖南布政使,未上任,又令署江宁将军。1899年继张汝梅任山东巡抚。任内,鉴于省内民教积仇甚深,恐袒教抑民激生变端,倾向于对反洋教义和拳民采取招抚政策,奏请将义和拳改为乡团。由是,义和团树起“毓”字旗帜,迅速发展。列强以其纵容团民,不护教堂,迫清廷将其撤职。他离任进京陛见时,向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等“盛言拳民忠勇得神助”,遂于1900年3月调补山西巡抚。任内招集拳民成团,倡言杀洋灭教,捕杀外国传教士70余人。清廷对外宣战后,建议调董福祥军联络义和团拱卫京师,并派军队赴京“勤王”。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率文武西逃。他率众迎于途,为扈从。中外议和中,被列强指为祸首。清廷虽力图保全,拟将其充军新疆,但终在列强压力下,于1901年将其斩首。

【曹福田】(? —1901) 清末义和团首领。直隶静海县(今属天津市)人。游勇出身。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春夏之际,义和团运动在京津一带蓬勃兴起,他先在静海设坛立团,后在南皮、庆云、盐山等地大力发展义和团。6月,率所辖坎字团2000余人进入天津,设总坛口于城西吕祖堂,号称“统带津、静(海)、盐(山)、庆(云)义和神团”,为天津地区与张德成齐名的著名义和团首领。6月18日,率义和团联合部分清军向俄军盘踞的老龙头

火车站发动猛攻，打死打伤俄军 500 余人。直隶总督裕禄邀请他与张德成及清武卫前军统帅聂士成、武卫左军统帅马玉昆等共商战守计划。6 月 27 日，与张德成联合进攻火车站。后又与马玉昆部分兵数路猛攻老龙头火车站击毙侵略者数百名。7 月 13 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率义和团撤出，回到静海，后因受官府追捕只身出走。1901 年初，返回静海后，被捕遇害。

【叶志超】（？—约 1901）清末将领。字曙青。安徽合肥人。早年投身淮军，以末弁随刘铭传镇压捻军起义，累官至总兵，光绪初年，署正定镇总兵，驻军新城，后徙防山海关。以李鸿章保荐，予实授。1889 年（光绪十五年），擢直隶提督。1891 年赴热河镇压人民起义。1894 年 6 月，与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兵 2500 人赴朝鲜牙山，7 月，日军来犯，聂士成在成欢英勇阻击，他却不战而弃公州逃至平壤。谎报战绩，受命指挥驻扎平壤的各路清军，各军不服。9 月 14 日，日军包围平壤，他准备弃城而逃，被左宝贵制止。15 日玄武门失守后，急忙树白旗，请求停战，旋弃军械、粮饷溃逃，渡鸭绿江，退入中国境内。因此被清廷革职。次年械送京师，定斩监候。1900 年被赦。一年后死于家中。

【宋庆】（1820—1902）清末将领。字祝三。山东蓬莱人。出身寒微，在登州镇投清军。1853 年（咸丰三年）随军赴防安徽庐州（今合肥）时，投同乡亳州（今亳县）知州宫国勋。以镇压捻军擢千总，升游击，晋参将。1860 年投钦差大臣、漕运总督袁甲三，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起义，后以攻破苗沛霖营，记名总兵，1862 年（同治元年）裁汰临淮军，统精锐“毅”字三营。1863 年随僧格林沁征剿苗沛霖。1865 年任河南南阳镇总兵。1868 年以镇压捻

军，擢湖南提督。1870年至1874年，多次镇压西北回民起义，赏戴双眼花翎，调补四川提督，未赴任，1875年（光绪元年）调驻潼关。1880年奉命会办奉天防务。1882年徙防旅顺。后赐加太子少保、尚书衔。1894年9月，受命帮办北洋军务，节制在辽各军，设置鸭绿江防线。防线被日军突破后，率部在辽东阻击日军。后因连失牛庄、营口、田庄台，被革职留任。《马关条约》签订后，奏请整军再战，未果，旋率军驻防旅顺。1898年移防山海关，其所部毅军30营改编为“武卫左军”，受荣禄节制。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受命为帮办北洋军务，与直隶总督裕禄筹划天津战守事宜。后在八国联军进攻下节节败退。1902年病亡。

【刘坤一】（1830—1902） 清末地方督抚。字岷庄。湖南新宁人。廪生出身。1855年（咸丰五年）随刘长佑镇压太平军。1857年以知府选用，赏加道员衔。1860年接领刘长佑军。以布政使衔驻柳州。1861年镇压陈开、李文茂等起义后，补授广东按察使。1862年（同治元年，简授广西布政使。1864年残酷镇压广西黄凤鼎等农民起义武装。次年升任江西巡抚。在清廷内部发生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中，支持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1875年（光绪元年）9月擢两广总督，整顿吏治、营伍、盐政、厘金等。1879年12月调任两江总督。1881年清廷召其入京述职，旋免去两江总督，闲居家中。1891年再任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并帮办海军军务。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因以淮军为主的清军不断败退，受命为钦差大臣，驻节山海关，节制关内外各军。在日军进攻下，连连溃败。1896年回任两江总督。曾捐5000两白银，列名北京强学会。1899年慈禧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蓄谋废黜光绪帝。各督抚皆噤不敢言，独其致电荣禄，提出异议。1900年义和

团运动兴起，清政府对外宣战后，与张之洞、李鸿章等同列强订约，实行东南互保。1901年清廷设立督办政务处，受命遥为参预。与张之洞联衔会奏三疏陈请力行新政，即“江楚会奏三折”。三折系统地提出整顿中法，采行西法的各种主张，成为清廷新政的蓝本。1902年10月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著作编为《刘坤一遗集》。

【华蘅芳】（1833—1902）清末科学家。字若汀。江苏金匱人。幼好算学，深研《算法统宗》、《九章算术》等古算书。咸丰年间与徐寿研习西方天算、博物书籍，学识大进。1861年（咸丰十一年）随徐寿入曾国藩幕府，参加军械修造工作。与徐寿等人研制出中国近代第一艘汽船。为江南制造局创办多所筹划。1868年（同治七年）入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译成各种西书多种。先后主讲上海格致书院、湖北自强学堂及两湖书院、长达20年，造就科学人材甚众。长于数学，与英国人傅兰雅等合译《代数术》、《微积溯源》、《决疑数学》、《数学理》等书，介绍了微积分、概率论等近代数学知识。此外，译有《金石识别》、《地学浅释》等，并综合中西算学之长，著《行素轩算学》，多有发明。

【吴大澂】（1835—1902）清末官员、学者。字清卿。号垣轩，又号窳斋。江苏吴县人。1867年（同治六年）中进士，授编修。曾疏请裁减同治帝大婚繁费，直声震朝。后又曾以时事艰难疏请停修圆明园。1878年（光绪四年）授河北道。1880年以三品卿衔。随吉林将军铭安办理边防。次年授太仆寺卿。法、越交涉事起，会办北洋军务，驻防乐亭、昌黎。1884年迁左副都御史。1885年会同副都统伊克唐阿与俄使勘界，争回被俄侵占的珲春黑顶子地区。1886年擢广东巡抚，反对总理衙门将澳门归属葡萄牙管辖。1888

年奉命堵郑州黄河决口，治河功成，实授河道总督。1892年授湖南巡抚。1895年1月，自请督湘军出关赴辽抗战。3月，所部与日军战于牛庄等地，旋以失败被清廷革职留任。1898年慈禧恶其党同翁同龢，复被处以革职永不叙用。罢官后，家甚贫，以售书画、古铜器等自给。书法遒丽，精于金石学和古文字学，著有《说文古籀补》、《古玉图考》、《权衡度量考》、《恒轩吉金录》、《窻斋诗文集》、《窻斋集古录》、《字说》等。

【赵三多】（1841—1902） 清末梅花拳、义和拳重要首领。字祝盛，又名洛珠，人称赵老祝，或赵老朱。直隶（今河北）威县沙柳寨人。青年时扛过活，后以贩卖盆碗为生。擅梅花拳，遍设拳场，广收门徒。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年春，应山东冠县（今河北威县）梨园屯红拳首领阎书勤邀请，改称义和拳，率徒赴梨园屯设厂“亮拳”，支持阎书勤等反对外国教会在梨园屯原玉皇庙旧基上修建教堂的斗争。摆会3天，四乡到会拳民达3000余人。1898年春，山东东临道陶锡祺及冠县知县曹倜等至冠县，召集各乡士绅等，宣布将庙基判还村民。但不久又推翻原议，派兵镇压义和拳。1898年10月，在冠县蒋家庄聚义和拳众3000余人，首举“扶清灭洋”旗帜起义，严令不好淫、不抢劫、不扰民，在直隶山东一带联络各秘密组织进行反洋教斗争。1900年春夏之际，直隶大旱，贫苦农民流离失所，纷纷参加其率领的义和拳队伍。11月，所率义和拳队伍在威县侯家村被袁世凯所部清军包围，率众奋力突围后，转移到直隶南部的广宗县。经过与景廷宾密议，于1902年4月23日在直隶钜鹿县厦头寺宣布起义，被推为主将。6月，起义被镇压下去，他被捕关押于南宫县监狱，绝食7日，英勇就义。

【景廷宾】（1861—1902）清末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的农民起义领袖、直隶（今河北）广宗人。武举出身。《辛丑条约》签订后，广宗知县乘机加倍征收地方赔款，激起当地人民的愤怒，推举其为联庄会总团头，进行抗洋差的斗争。在钜鹿县吉家屯待机再起的义和团首领赵三多，派人与其联系，准备联合行动。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3月指挥联庄会击退前来镇压的清军，击伤武卫左军后营管带鲍贵卿。4月23日，在钜鹿县厦头寺正式宣布起义，寺前树“扫清灭洋”，“官逼民反”两面大旗，联庄会武装群众和义和团余部约4万人参加起义。他被推为“龙团大元帅”，赵三多为主将。他率领起义军攻教堂，抗赔款，破官军、直、鲁、豫三省交界处的饥民，联庄会员、义和团余部纷纷加入，起义队伍扩大至16万（一说6万）人，声威大振。5月，袁世凯派段祺瑞，倪嗣冲率清军在德、日、法侵略军6000余人的配合下，向起义军拒守的件只村发动围剿。他指挥义军多次打退清军进攻，后因弹尽无援，寡不敌众，率义军转战成安，临漳一带。后身陷重围，弹尽粮绝，被捕遇害。

【杨儒】（？—1902）清末外交家。字子通，号迺庵。汉军正红旗人。1867年（同治六年）中举人。1888年（光绪十四年）出为江苏常镇通海道。1891年授浙江温处道，旋调安徽徽宁池太广道。次年2月，奉旨以四品京堂候补充出使美国、秘鲁大臣。1895年擢太仆寺卿，不久晋太常寺卿，旋调宗人府府丞。1896年授都察院左副都御使，不久调出使俄国、奥国、荷兰大臣。1898年升工部右侍郎。次年转左侍郎，仍驻俄。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沙俄出兵强占中国东北三省，诱骗盛京将军增祺与之签订非法的《奉

天交地暂且章程》。1901年1月，他受命为全权大臣，与俄商谈接收东三省事宜。在国内拒俄舆论的支持下，他坚决不承认《交地暂且章程》，并拒绝在俄国提出的“侵我兵权利权”的新约上签字。3月25日，在回使馆途中，不慎跌伤。1902年2月死于住所。其与俄国商谈交还东三省的文电、奏疏、谈话节略等汇编为《杨儒庚幸存稿》。

【冯子材】（1818—1903） 清末将领。字南干，号萃亭，又作翠亭。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1851年（咸丰元年）参加刘八领导的天地会起义队伍，不久转投清军。先后随清将向荣、张国梁追剿、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因功迁升副将、总兵等职。1862年（同治元年）升广西提督，不久赴广东督办东江军务。1875年（光绪元年）调任贵州提督。1881年回任广西提督。次年，称疾回乡。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出任广东高、雷、钦、廉四府团练督办，率部增援广西。次年2月，由两广总督张之洞保荐，出任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到达抗法前线镇南关后，团结湘、粤、桂各军将领，在关前隘修筑长墙、深沟，严密布防。3月23—25日，指挥清军与法军展开激战，歼敌1000余人。镇南关大捷后，率军乘胜出关，连克文渊（今同登）驱驴、凉山等地，重伤法军统帅尼格里。清廷决意对法妥协，严令清军如期停战撤兵，他曾联合王德榜等清军将领致电张之洞，要求“诛议和之人”。后被迫撤兵回国，奉旨督办钦、廉防务，并会办广西防务，晋太子太保。1886年授云南提督，因病未就任。1894年加尚书衔。中日战争期间，奉命率部北援，驻守镇江。战争结束后仍回广西。1896年赴云南提督任。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陈请率兵北上入卫京师。1901年调往贵州提督，次年因病去职。1903年应岑春煊之请，组织地方团练，方

募练成军，突然病逝。

【荣禄】（1836—1903） 清末官员。字仲华，号略园。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1852年（咸丰二年）初以荫生任主事，后升工部员外郎。1862年（同治元年）任神机营翼长。后曾参与镇压奉天人民起义和捻军起义，累迁副都统、总兵、内务府大臣等。以讨好慈禧太后，奉迎醇亲王奕譞，1878年（光绪四年）任步军统领、工部尚书。1891年外调任西安将军。1894年，慈禧六旬寿辰，入京祝寿，授步军统领、会办军务，上书陈战守策，请特设巡防局。1895年授兵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上疏荐温处道袁世凯训练新式陆军。1896年授协办大学士。1897年疏请设立武备特科，以西法教练武生。1898年戊戌维新之前，指使李盛铎、杨崇伊等参劾康有为，破坏保国会。百日维新后不久，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节制北洋三军。百日维新高潮中，他调聂士成军移驻天津陈家沟，董福祥军移驻北京近郊长辛店，伺机扼杀变法新政。戊戌政变后，任军机大臣，管理兵部事务。后奏准设武卫军，聂士成部改为武卫前军，袁世凯部改为武卫右军、宋庆部改为武卫左军、董福祥部改为武卫后军，提督张俊别募万人为武卫中军，北洋五军由其一人统帅。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他极力主张严厉镇压义和团，反对向列强宣战，并同东南各省督抚函电往来，策划东南互保。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先率军撤至保定，后赴西安，曾再三奏请慈禧太后“渐次改革庶政，不事急激，期臻实效”。1902年随慈禧太后回京后，晋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1903年4月病死，追赠太傅，晋封一等男爵，遗著有《荣文忠公集》。

【唐景崧】（1841—1903） 清末官员。字维卿（又作薇卿）。广西

灌阳人。1865年（同治四年）中进士，后选庶吉士，改吏部主事。1882年（光绪八年），自请出关赴越南招刘永福及黑旗军抗击法军。次年，抵保胜，向刘永福陈上中下三策。永福从其中策。中法战争开始后。曾在广西巡抚徐延旭军中总理前敌军务。徐延旭因北宁战败被逮问后，他受张之洞之命入关募勇4营，号景字军。曾率部与黑旗军配合，在西线战场上抗御法国侵略军。中法战争以后，赐号“霍伽春巴图鲁”。1891年迁台湾布政使。1894年任台湾巡抚。中日战争期间，亟起筹防。《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人民反对割台，推举其为“台湾民主国”总统。日军攻台，与帮办台湾防务刘永福分兵各守台北与台南。1895年6月初，日军攻陷基隆后，微服挈子弃台附英轮逃回厦门。1903年病逝。著有《请缨日记》。

【张佩纶】（1848—1903） 清末官员。字幼樵，又字绳庵或篔斋。直隶（今河北）丰润人。1871年（同治十年）中进士。1875年（光绪元年）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曾入李鸿章幕。经常与张之洞、陈宝琛、宝廷、邓承修、黄体芳等指评时政、弹劾大臣，号称“清流党”。面对当时的边疆危机，他多次上疏清廷，建议加强南北海防。1883年法国再次进攻越南北部，他又上疏保荐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出关，联络刘永福及黑旗军共同抗法。不久，擢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再晋侍讲学士。中法战争爆发后，上奏章十数篇，力主武力抗法。1884年以三品卿衔赴福建，会办海疆事务。7月15日，法国舰队闯入马尾港后与福建海军同泊一处。他不作战守准备，致使福建海军全军覆没，船厂被毁，遁逃鼓山彭田乡。旋以战败及保荐徐延旭失当罪，发配察哈尔察罕陀罗海等地。1888年期满释归，娶李鸿章女为妻。1894年中日战争期间，因人劾其

干预公事，被命逐回籍。1900年李鸿章荐其谙交涉，受命助李与八国联军议和。事毕，清廷一度准备重新起用他，但其称疾不出。1903年逝世于南京。著有《澗于集》、《澗于日记》等。

【沈荇】（1872—1903）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字愚溪，原名克誠。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幼狂放不羈，稍长，与人结成十二人社。戊戌变法时，与谭嗣同、唐才常参与筹划，认为要革新湖南，非有一番破坏不行。戊戌政变后东渡日本，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春返回上海，与唐才常等共组正气会，旋改名自立会，任干事，负责交通。后组织自立军，为右军统领，驻新堤。汉口起事失败后走上海，潜入北京，从事反清活动。1903年侦得清廷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公诸报端，激起在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和国内各阶层的义愤，引发拒俄运动。7月被捕，以“泄密”罪杖毙于狱中。

【翁同龢】（1830—1904） 清末官员。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江苏常熟人。谥号文恭。出生官宦人家。1856年（咸丰六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历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为光绪皇帝师傅，帝党领袖。中日甲午战争前思想保守，对于洋务派创办近代企业的活动有抵触。甲午战争时期（1894—1895年，光绪二十至二十一年），积极主战。受战败刺激，思想一变，倾向变法维新。支持维新派康有为等在北京创办强学会，企图打开变法风气。与康有为时常联络，讨论变法事宜。曾命人草拟12道新政诏书，准备通过光绪皇帝次第颁行，为恭亲王奕訢阻挠。1898年1月，奉诏与荣禄等在总理衙门传询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并向光绪皇帝密荐康有为才堪大用。

但与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多有不合，反对民权平等学说和君主立宪主张。其变法活动遭到顽固派的忌恨，百日维新开始后4天，6月15日，慈禧太后迫令光绪皇帝将其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又加重处分，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从此以诗书自遣。书法自成一家，为世所宗。所存《翁文恭公日记》是一部重要史料。另有《瓶庐诗文稿》、《翁松禅手札》等。

【瓦德西】（1832—1904） 德国陆军元帅，八国联军统帅。德国波茨坦人。12岁入波茨坦军事学校。16岁任陆军中尉，后在炮兵部队任职。普法战争后任上校团长。1873年12月任陆军第10军总参谋长。1882年1月，任德国陆军军需总监，晋中将。1888年8月，被德皇威廉二世任命为陆军元帅。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任英、法、俄、美、德、意、日、奥八国联军统帅，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11月进入北京，指挥联军四出攻扰，东占山海关、秦皇岛，西犯娘子关，北攻宣化、张家口，南侵保定、正定、石家庄。1901年6月离京，经日本回国。1904年死于汉诺威。著有《瓦德西回忆录》，中文节译本名为《瓦德西拳乱笔记》。

【文廷式】（1856—1904） 清末学者、诗词家。宁希道，号云阁（又作芸阁），晚号纯常子。江西萍乡人。1882年（光绪八年）中举人，声誉稍著。曾为光绪皇帝的宠妃瑾妃和珍妃授读，得光绪赏识，并成为帝党中坚。1890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日讲起居注官、署理大理寺正卿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慷慨主战，指斥李鸿章贻误军国。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与康有为、陈炽等发起强学会，集会聚讲，宣传维新。1896年遭御史杨崇伊奏劾，被革职，永不叙用。1897年冬德国强

索胶州湾，时局危迫，与康有为晤于上海，密议变法，授康数通秘札，为其疏通内廷。戊戌政变后遭通缉，从此匿迹江南，读经吟诗，多眷怀光绪、忧世感时之作。1900年赴日本考察新政。支持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同情义和团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但脱离政治斗争，息影湖海，放情诗文，专意著述。学问渊博，长于治史，善诗词。著作有《纯常子枝语》、《闻尘偶记》、《补晋史艺文志》等。

【黄遵宪】（1848—1905） 清末诗人、维新思想家。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举人出身。1877年（光绪三年）被任命为驻日本公使馆参赞。有感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发生的深刻变化，悉心考察日本的历史和现状，撰写成《日本国志》，对其在近代发生的变革热情肯定。1882年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曾竭力保护华侨和华工的正当权益。又任驻英公使馆二等参赞，为汉阳铁厂订购机器设备。1891年出任新加坡总领事。经他反复力争，清政府始颁布保护归侨的规定。1894年回国，被命为江宁洋务局总办。戊戌维新运动兴起后，持赞同态度，在上海加入强学会，出资参与创办《时务报》。1897年出任湖南长宝盐法道，代理湖南按察使，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仿西方国家巡警制度，设保卫局，出示禁女子缠足，延聘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赞助南学会，鼓吹维新变法。1898年由徐致靖推荐，受知于光绪帝。旋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以病未成行。守旧派发动政变后受到弹劾，被扣留于上海洋务局，后被贬归家，著书办学，郁郁以终。长于诗词，论诗主张“我手写我口”，以通俗语言入诗，反对崇古卑今的同光体，要求表现真情实感。诗作虽多古体，但不拘形式。选韵颇宽，纵横捭阖，气势酣畅。前期诗歌，揭露了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朽，广泛地描写了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故有“史诗”之称。晚年写的作品，竭力探索诗歌新的形式，创作成就高出其他新派诗人，是晚清“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其诗作辑成《人境庐诗草》11卷、《日本杂事诗》2卷。

【陈天华】（1875—1905）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字星台、过庭，号思黄。湖南新化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入新化求实学堂。1903年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参与《游学译编》的编辑工作。4月参加拒俄义勇队。拒俄运动被清政府镇压后，与黄兴等组织军国民教育会，自荐为“运动员”，准备回国策动武装起义。从初夏至仲秋，撰写《猛回头》、《警世钟》，以通俗的语言号召国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推翻清政府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影响广大。12月返抵湖南长沙，策动反清。1904年2月，和黄兴、宋教仁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策划发动起义，事泄，逃亡日本。1905年与宋教仁等创办《20世纪亡支那》杂志。参与中国同盟会创建工作，为《会章》起草人之一，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撰述员。12月8日，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歧视中国留学生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在日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留下《绝命辞》万余言，勉励留学生“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时年30岁。遗著编为《陈天华集》。

【吴樾】（1878—1905）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字梦霞，后改孟侠。安徽桐城人。好文史，不喜八股文，绝弃科途。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考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结交志士赵声等，阅读《革命军》、《清议报》等书刊，遂萌反清革命之志。曾在保定创立两江公学和《直隶白话报》，任教师兼主笔，宣传反清排满。

于1903年与杨笃生在上海组织军国民教育会，自任保定支部工作，力主以暗杀推动革命。撰写《暗杀时代》，阐明宗旨。把铁良等清军中的顽固分子当成暗杀目标，试制炸弹，策划实施。1905年夏闻清廷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乃潜入北京，伺机谋刺。9月24日怀揣炸弹，乔装混入前门车站，登上五大臣专车。不料车身突然震动，炸弹自爆，不幸牺牲。出洋大臣仅载泽、绍英受轻伤。著有《吴樾遗书》。

【邹容】（1885—1905）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字蔚丹，一作威丹，原名绍陶，又名桂文。四川巴县（今重庆）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在重庆从日本人学习英语、日语，阅读宣传“新学”的书报，同情维新派。1901年考取官费留日生，临出国前，四川总督奎俊以其“不端谨”，取消官费资格。1902年自费赴日本留学，进东京同文书院。大量阅读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政治、历史著作，吸收民主思想，并积极参加留学生爱国运动。1903年春节，在东京留学生团拜会上发表激昂演说，号召推翻清朝统治。3月，偕同几个留学生痛殴破坏革命运动的留学生监督姚文甫。事后，为躲避姚的报复，返回上海，入“爱国学社”。4月底，先后参加在张园举行的拒法大会和拒俄大会，发表演说，反对外国侵略。撰成《革命军》，“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呐喊。章太炎为之作序，誉之为“义师先声”。出版后不胫而走，销售达110万册，对鼓动清末革命运动的高涨起了很大作用。上海《苏报》连续发表介绍《革命军》的文章及鼓吹革命的文字，遂有“《苏报》案”发生。他在得知章太炎被捕的消息后，到巡捕房投案，被英租界会审公廨判刑2年。1905年4月在离刑满两个多月时病逝，时年20岁。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追赠“大

将军”。

【姚宏业】（1881—1906）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号剑生、竞生。湖南益阳人。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入长沙明德学堂，师事黄兴。次年加入华兴会，积极从事策动军队的工作。6月，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宏文学院。不久，国内保路保矿运动兴起，他邀杨卓林等在神田组织路矿学校，以期培养路矿人才。1905年加入同盟会。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后，与留学生商定回国自筹办学，被推为归国设学代表。1906年初，率部分学生回到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任干事。因经费困难，遭人攻击，遂决心以死惊醒国人。3月26日晚疾草遗书2000余言，次日晨投黄浦江而死。时年25岁。

【俞樾】（1821—1907） 清未经学家、文学家。字荫甫，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1850年（道光三十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1855年（咸丰五年）简放河南学政。两年后以御史曹登庸劾试题割裂罢职。侨居苏州，先后主讲苏州紫阳、上海求志、德清清溪、归安龙湖各书院，而主杭州诂经精舍达30余年。当时著名学者戴望、黄以周、朱一新、施补华等俱出其门下。同治中总办浙江书局，精刻子书22种，海内称为善本。又倡议江苏、浙江、扬州、湖北四书局分刻二十四史。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诏复原官职。于经、史、文、辞无不涉猎，博览群籍，勤奋撰著，以治经学为主。其治经以汉学皖派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宗，主张在通文学训诂的基础上探求经义。对群经典籍，诸子各说皆有精深研究，并著书评述，多所发明。诗文不分宗派。作诗多温和典雅，有白居易遗风。且重视小说、戏曲的研究，强调其教化

作用，有笔记小说多种传世。所作笔记搜罗甚广，包括社会史、学术史、文学史方面的丰富资料。著述甚富，主要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茶香室经说》、《第一楼丛书》、《春在堂杂文》及诗编、词录、随笔等多种。著作多收入《春在堂全集》。

【林乐知】（1836—1907） 美国来华传教士。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伯克郡。幼失双亲，上中学时入基督教监理会。1858年他毕业于佐治亚州埃默里大学。次年底由美国监理会派遣来华，于1860年（咸丰十年）6月抵达上海。先在上海、杭州一带传教，并访问过天京（今南京）。1864年到上海广方言馆担任西文教习。1867年被聘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当译员，兼任《上海新报》编辑。译成西书《格致启蒙博物》、《地学启蒙》、《欧罗巴史》、《万国史》等多种。1868年（同治七年）在上海创办《教会新报》（周刊），后改称《万国公报》。根据美国监理会指示在华兴学，于上海开办中西书院、中西女塾，于苏州开办博习书院、中西书院。1901年将以上学校合并改建为东吴大学堂，校址设在苏州。1887年（光绪十三年）与英国传教士韦廉臣、李提摩太等成立广学会，被举为协理。不久《万国公报》恢复出版，仍任主编。编译出版《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策》、《治安新策》、《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中西关系略论》、《列国岁纪政要》等书多种，颇受中国士大夫的青睐。义和团运动后，被召回美国参加基督教各教会联合会议，讨论对中国的传教问题。1906年最后一次回美国，受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接见，建议加强对华的传教和开展教育工作。次年病逝于上海。

【禹之谟】（1866—1907）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字稽亭。湖南湘乡青树坪（今属双峰）人。少年时在店铺当学徒。后弃商从戎，在军营中任文书、军需等职。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襄办向辽东运输粮秣弹药事务，劳绩卓著，赏五品顶戴，以县主簿候选。受甲午战败刺激，赴上海专心研究实业。1897年回湖南，结识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同情维新变法。1900年参与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东渡日本，学习纺织和化工，并接受“革命排满”思想。1903年在湖南湘潭设立近代纺织企业——湘利黔织布厂，次年迁长沙。同时积极倡办新式教育，参与创办驻省湘乡中学、唯一学堂、驻省邵阳中学堂等。1904年参加华兴会。次年参加同盟会，任湖南分会负责人。1906年被推为湖南商会会董和湖南教育会会长。与同盟会员覃振等发动长沙各校学生迎接陈天华、姚宏业灵柩公葬于岳麓山，扩大革命影响。又参加湘乡学界反对盐捐浮收的斗争。8月被清地方当局逮捕，秘密解往靖州（今靖县）。备受酷刑，坚贞不屈。1907年2月6日被绞杀。

【徐锡麟】（1873—1907）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字伯荪。浙江山阴（今绍兴）人。1893年（光绪十九年）中秀才。1901年受聘为绍兴府学堂算学讲师，后升副监督。1903年赴日本大阪参观国际博览会，积极参加留日学生各项爱国政治活动，并慷慨捐金，以营救因“苏报案”入狱的章太炎；受拒俄运动影响，渐萌反清革命思想。回国后，1904年与挚友陈志军在家乡东浦创办热诚学堂，提倡军国民教育，组织学生进行军事操练，暗中培养革命人才。1905年初到上海访蔡元培，加入光复会。亲往嵊县、诸暨、义乌、东阳等地联络会党。8月，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

名义上为小学培养师资,实际吸收各地会党成员入校学习军事。校内仿正式军队编制,学生入学即为光复会员,毕业后仍受光复会节制。1906年他两次赴日本,欲学军事或警政,均因近视被拒。回国后捐道员,企图借以掌握兵权,待机起事。经疏通,分发到安徽安庆,取得安徽巡抚恩铭信任,任安徽武备学堂会办、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1907年春,与秋瑾密议起义计划,决定编组“光复军”,浙江首先发难,安徽响应。不幸事机泄露,形势逼人,遂决定在安庆提前发动。于7月6日乘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机枪杀恩铭,然后率学生攻打军械局,与清军激战4小时,失败被俘。受审时愤然写下矢志“排满革命”的《绝命书》,慷慨就义。

【秋瑾】(1877—1907)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字璿卿,自号竞雄,别号剑湖女侠、汉侠女儿。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出生于一个小官僚家庭,从小学文习武,仰慕英雄豪杰。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依父母之命嫁给湘潭富绅子弟王廷钧。1900年前后两度寓居北京,结识革新派人士吴芝瑛,阅读新书新报,思想大为开阔;目睹清廷腐败、国势危艰,遂有献身救国之志。1904年冲破家庭阻力,自费到日本留学,入东京青山女校速成师范专修科。与陈撷芬成立共爱会,与刘道一等组织十人会,均以反清为目的,参与创办演说练习会,提倡说普通话。创办《中国白话报》月刊,提倡白话文,并宣传反清革命。1905年春回国,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7月,再赴日本,在青山实践女校注册,经冯自由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为评议员、浙江分会主盟人。12月,参加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的斗争,与部分留学生愤然回国,在上海参与创办中国公学,以安置归国学生。1907年1月,创办《中国女报》月刊,推进妇女运动。因

经费困难，只出版两期。萍浏醴起义失败后，与徐锡麟密商，决定在浙江、安徽两地约期起义。1907年2月，到徐锡麟、陶成章创办的绍兴大通学堂任督办，对学生和会党成员进行军事训练，并往来杭沪间，活动军界、学界、会党，组建光复军八军。与徐锡麟约定，7月6日浙江首先发难，徐在安庆响应，然后合兵攻取南京。但起义前夕，事机泄露，被迫延期举事。而安庆方面，徐锡麟仓促举事失败，清政府由此探知她与徐是同党，遂派兵于14日包围大通学堂，经过一场枪战，被俘。面对严刑，坚贞不屈。次日凌晨，在绍兴轩亭口从容就义。年仅29岁。遗著编为《秋瑾集》。

【王文韶】（1830—1908） 清末官员。字夔石，号耕娱，又作赧虞，晚号退圃。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1852年（咸丰二年）进士，任户部主事。以后历任湖北安襄郟荆道、按察使、湖南布政使。1871年（同治十年）署湖南巡抚，镇压以张秀眉为首的苗民起义及其他农民起义。后入值军机，任兵部侍郎。1889年（光绪十五年）授云贵总督。1895年调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曾列名强学会。疏请统筹北洋防务，重修旅顺炮台，加意水师、武备学堂等。开办吉林三姓金矿、磁州煤矿。奏请设北洋大学堂、铁路学堂、育才馆、俄文馆，以储人材。1898年以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入赞军机处。戊戌变法时，受命办理铁路矿务总局，筹议铁路矿务等专门学堂。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力主对外妥协，随那拉氏西逃，授体仁阁大学士。次年任外务部会办大臣，办理交收东三省及铁路事宜。旋任政务处大臣，兼外务部合办大臣，督办路矿总局。转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大学士。为官以圆滑著称。1906年称疾乞休。

【载湉】（1871—1908） 清末具有变法维新思想的皇帝。爱新觉罗氏。庙号德宗。年号光绪。史称光绪皇帝。清咸丰弟醇亲王奕譞次子。1875年初，同治帝死，无子，由慈禧太后指立为帝，年仅4岁。名义上仍由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共同垂帘听政，实则权操慈禧之手。1887年（光绪十三年）亲政，但仍由慈禧训政。1889年，慈禧虽名义上“撤帘归政”，但行政、用人等权仍操诸其手。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他与翁同龢等反对慈禧、李鸿章等对日妥协，与慈禧发生政见分歧，遂生嫌隙。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他企图摆脱慈禧控制，刷新国内政治，振衰起弱。其时在他周围逐渐形成一股不满于慈禧专权的“帝党”势力。经翁同龢及其他帝党成员的举荐，看到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毅然有改革之志”。1898年，接受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建议，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6月16日在仁寿殿召见康有为，垂询变法之策。后又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军机章京，参予新政事宜，罢斥反对变法的礼部六堂官及顽固派御史等，颁布了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的变法上谕100余件。9月21日，慈禧在封建顽固派的要求下发动宫廷政变，将其幽禁于中南海瀛台，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后，几遭慈禧等废弃或谋害，赖列强干预及国内官绅的反对而得保全。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力主镇压义和团，反对向列强宣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之际，在慈禧的挟持下逃亡西安。1902年回銮北京后，慈禧虽迫于国内外压力，允许他与自己一起临朝，但“监视仍严”。1908年11月14日，早慈禧一日死于瀛台涵元殿。

【清德宗】即“载湉”。

【光绪皇帝】即“载湉”。

【慈禧太后】(1835—1908) 清同治、光绪两朝实际掌握朝政者。清咸丰帝奕訢之妃。叶赫那拉氏，满洲镶蓝旗人。父惠征，曾任安徽宁池广太道道员。1852年（咸丰二年）被选入宫，册封兰贵人。1854年晋封懿嫔。1856年生皇长子载淳，封懿妃。次年，晋封懿贵妃，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皇后钮钴禄氏。由于得到咸丰帝的宠幸，“时时批览各省章奏”，开始干预朝政。1860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随咸丰帝逃往热河行宫。次年8月，咸丰帝病死，载淳继位，改元祺祥，与钮钴禄氏并尊为皇太后，徽号慈禧，又称西太后。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位王大臣奉遗诏“赞襄政务”。她和恭亲王奕訢被排斥在朝政枢要之外，心怀不满，遂相互勾结，并得到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于11月发动宫廷政变。八大臣或被杀或革职或流放，同时宣布两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祺祥为同治，奕訢任议政王大臣、军机大臣，管理总理衙门。史称“辛酉政变。”政变后，她奉行对外妥协，保持和局，对内重用地方实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政策。随着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渐次被镇压，野心不断膨胀。为了实行个人专断独裁，先后在1865年（同治四年）、1872年两次借故处分奕訢，取消了议政王大臣的封号。1875年同治帝病死，无子。她不惜破坏祖制，立其侄兼甥载湉为帝，再次“垂帘听政”。1881年（光绪七年）慈安突然死去。3年后又利用中法战争骤起之机，免去奕訢的一切职务，完全掌握了朝政大权。1889年光绪帝亲政，她名为退居颐养，实则仍握大权。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损害国防。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贪图60大寿庆典，无心应战，一味避战求和，

致使战争失败，中国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又极力破坏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于1898年9月21日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帝，捕杀维新志士，废除新政，重新“训政”。并制造舆论，企图废黜光绪帝，另立新帝，遭到部分地方督抚和外国使臣的反对，未得逞。1900年谋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皇储），遭谴责。八国联军侵华初期，处置错乱，同时对英、德、法、俄、美、日、意、奥八国宣战，诛杀阻谏大臣，泄一己私愤。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携光绪帝逃往西安，下令镇压义和团，派庆亲王奕訢、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出面乞和，宣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与侵略者订立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1901年宣布实行“新政”。1906年又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名为立宪，实则继续加强帝制专政。11月14日，光绪帝死。立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为帝，年号宣统。次日病死。统治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董福祥】（1840—1908） 清末将领。字星五。甘肃固原（今属宁夏）人。回族。自幼体格健壮，好弄兵器。1862年（同治元年），乘陕甘回民起义之机，率众自甘肃安化（今庆阳县）起事。后以花马池为据点，队伍达10余万人。1868年（同治七年）底，投降清钦差大臣左宗棠部将刘松山。其精锐编为董字3营，先后随刘松山、刘锦棠等镇压西北回民起义，以临战勇悍，自都司迁游击，升提督。1876年（光绪二年），随刘锦棠进军新疆，参加驱逐阿古柏的南、北疆战斗，名震西域。1886年授阿克苏镇总兵，驻防喀城，后移驻叶尔羌、和阗。1890年擢喀什噶尔提督。1894年北上述职，加尚书衔。次年率军征剿甘肃河州、西宁等地回民起义。1896年加太子少保，调甘肃提督。1897年奉命入觐，屯师蓟

州（今河北藁县）。戊戌变法期间奉调驻京师近郊长辛店，防袁世凯兵变。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在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笼络唆使下，围攻列强使馆，杀死日本驻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扈从慈禧太后等西逃。中外议和中，被列强指为祸首，必欲处以死刑。清廷以戒其手握重兵，“深恐激而生变”，仅予革职。1908年2月10日，病歿于宁夏金积堡。

【杨崇伊】（？—？） 清末官员。字莘伯。江苏常熟人。1880年（光绪六年）中进士。授编修，任广西道监察御史。思想极为守旧，与维新人士为敌。1896年1月（光绪二十一年底）疏劾北京强学会植党营私，贩卖西学，致使强学会遭封禁。3月，弹劾帝党要员文廷式结党议政、勾结太监，结果文廷式被革职，永不叙用。1898年百日维新时期，一无建白，却时时窥测风向。9月，帝后党争激烈时，与守旧派怀塔布等勾结，往来京津，与直隶总督荣禄密谋推翻新政。18日，上密折给慈禧太后，攻击光绪皇帝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吁请太后即日训政。此折是导致戊戌政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变后，不断上折攻击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必欲铲除而后快。1900年外放汉中任知府。经多方疏通，1904年调浙江候補道。1908年丁忧回籍守制，寄寓苏州。横行无忌，滋害乡里，由于持枪抢夺妓女而酿成大案，被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从此淹没不闻。

【张之洞】（1837—1909） 清末官员。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谥号文襄。1862年（同治元年）去河南，先后入督办团练大臣昶熙和署理巡抚张之万幕府，协助抗御捻军并清理漕运事务。1863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先

后任浙东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在武昌设经心书院，在成都建尊经书院，培养和网罗文人士子。1876年（光绪二年）调回京师，历任文渊阁校理、翰林院侍讲、侍读、内阁学士等职。遇事敢言，纠弹朝政，为清流派中坚。1879年上疏请求为四川东乡县地方官员惨杀村民并诬民叛乱一案平反，使多年冤案得以昭雪。1880年就改订中俄条约连续上疏，坚请改变崇厚擅自与俄国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次年补授山西巡抚，开始在地方举办洋务事业。1884年中法战争时，调任两广总督，起用老将冯子材，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此后完全转向洋务派，大力兴办洋务事业。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务局，立广雅书院，以新法操练军队，但无明显成效。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锐意经营两湖，创办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大局，建立两湖书院，筹办芦汉铁路等，颇有成效。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署两江总督，积极加强长江防务，编练江南自强军。得知议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疏反对，主张联英抗日、变法图强。1895年8月，列名康有为等创立的强学会，并捐银5000两，又赞助成立上海强学会。但因与康有为等维新派有分歧，不久下令解散上海强学会，封禁上海《强学报》。1896年2月，返回湖广任所，一度支持创办《时务报》。随着维新运动的开展，与维新派的分歧日益明显。1898年春，写成《劝学篇》，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指斥“民权之乱政”。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力主镇压，并与帝国主义列强相勾结，搞“东南互保”，严厉镇压两湖反洋教斗争和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事。1901年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衔会奏，建议学习西方，改革内政，时称“江楚会奏”，多为清廷采纳，影响颇大。1907年调京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在此前后，为确立中国近代学制颇多贡献。1905年日俄战争后，赞成实行君主立

宪制度，对清廷的“预备立宪”计划有很大影响。1909年（宣统元年）任实录馆总裁官。遗著编为《张文襄公全集》。

【宋恕】（1862—1910）清末思想家、学者。字平子，号六斋，别署不党山人，原名存礼。浙江平阳人。早年居瑞安，迁至上海。曾在上海龙门书院、金陵钟山书院、北洋水师学堂、上海求志书院等处任教。饱览中外书籍，思想大进。1890年（光绪十六年）上书张之洞，吁请变法，次年写成《六斋卑议》，揭露社会弊病，抨击程朱理学，力主维新变法。并提出设立议院，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张。甲午战后兴起维新运动，对维新派持赞同态度。1901年在杭州求是书院任教。1903年游历日本。归国后任山东学务处文案。作文宗法汉魏六朝，无论骈散、说理、叙事、抒情，均回环往复，疏宕有致。作诗不受唐宋的局限，以意境趣味见长。与陈黻宸（介石）、陈虬（蛰庐）并称“浙东三杰”。后期思想趋于保守，主张“专制改进”说。所著还有《津谈》、《历下杂事诗》、《有均文集》等。

【倪映典】（1885—1910）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字炳章。安徽合肥人。1904年（光绪三十年）考入安徽武备学堂。次年加入反清秘密小团体岳王会。又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炮兵科，毕业后任新军第九镇炮标队官。参加同盟会，在军中从事革命活动。1907年调任安徽第三十一混成协炮兵管带，与岳王会会员熊成基等秘议，准备在除夕时发动起义，事泄，潜赴广州。旋投身军队，任炮兵排长。与黄兴、赵声等取得联系，策划发动新军起义。1910年（宣统二年）2月，乘广州警察与新军发生冲突之机，率第一标起义，分路进攻广州城，遭清军袭击，中弹被俘，壮烈牺牲。

【熊成基】（1887—1910）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字味根。江苏甘泉（今江都）人。1904年（光绪三十年）考入安徽武备学堂练军班，接触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并加入反清秘密小团体岳王会。次年入江南炮兵学堂，毕业后在南京新军第九镇任炮兵排长。1907年调安庆，历任马营、炮营队官。同年冬，与倪映典密议，准备除夕发动起义，事泄，倪离去。他主持岳王会安庆分会工作。1908年11月，乘光绪、慈禧相继逝去之机，率部起义，攻打安庆北门，与清军激战一昼夜，伤亡过重，退至庐州（今合肥）解散。1909年（宣统元年）2月流亡日本，加入同盟会。9月奉命潜往东三省活动，被人告发被捕。1910年2月在长春就义。

【赫德】（1835—1911） 清末英国侵华分子，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字鹭宾。英国北爱尔兰人。1854年（咸丰四年）到中国。1855年至1858年先后任英国驻宁波和广州领事馆的翻译和助理。1859年起参加中国海关的税务工作，任广州关副税务司。1861年代理总税务司。1863年（同治二年）任海关总税务司。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休假回国。在中国的将近半个世纪中，在海关建立了总税务司的绝对统治，制定并推行了一套由外国把持中国海关的制度，并由此控制中国的财政权。通过攫取海关行政权，侵夺中国港口的引水权；通过建立海关会审制度，扩大海关税务司对中国海关案件的审判权；利用关税的抵押担保，直接参与中国举借外债的活动；利用总税务司协同洋务派购买军火、建置海军的关系，企图干预中国海防；还企图改组中国币制，控制中国邮政。早在任广州关副税务司时，就为英法联军提供中国军队布署和调动

的秘密情报。多次干涉中国内政外交。1866年向总理衙门提出《局外旁观论》，要求清政府遵守不平等条约，实行某些改革，以利于列强对华的经济侵略。以总理衙门顾问的身份，多次参与清政府与西方国家的各种交涉，有1885年的中法和约草案，1887年的中葡里斯本会议草约，以及80年代中期的中缅交涉和西藏交涉等。插手中国的文教事业，京师同文馆的负责人也要由总税务司推荐。甚至插手中国高级官员的人事变动，干预清政府对高级官员的任命。1901年支持列强胁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1911年（宣统三年）病死于英国南部的白金汉郡，当时仍保有总税务司的头衔。

【杨文会】（1837—1911）清末佛学家。字仁山。安徽石埭（今石台）人。幼年随父居北京。不喜举业，好读奇书，对音韵、历数、天文、地理及黄老庄列之书，无不窥览。1863年（同治二年）始习佛学，并广求佛经，刻印刊行。1866年到南京主管政府建筑工程，创办金陵刻经处。1878年（光绪四年）随曾纪泽出使英法，在英国与日本南条文雄讨论佛学。1886年再赴英国考察。并托友人在日本访求佛经，得古籍300余种，择要刻印。1894年与英人李提摩太一起将《大乘起信论》译成英文。门下高才有谭嗣同、章太炎、蒯若木、欧阳渐等。1907年于刻经处内设僧学堂，名“祇洹精舍”，聘请苏曼殊教梵文、英语。1910年（宣统二年）设立佛学研究会，出任会长，定期讲经。开清末佛教义学重兴之端。遗著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佛教初学课本》、《十宗略说》、《论孟发隐》等13种，凡22卷。门人汇为《杨仁山居士遗著》行世。编刻有《大藏辑要》2000卷。

【徐润】（1838—1911） 清末洋行买办和企业家。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1852年（咸丰二年）随叔父赴上海，入英商宝顺洋行学徒，1861年升买办。1859年起，在洋行做买办的同时，开始自营商业，经营丝、茶、烟叶及鸦片，还与人合伙开了敦茂钱庄，至1864年（同治三年）已有各种行号十余家。进行房地产和其他投机活动，资本积累迅速。1868年离开宝顺洋行，自设宝源祥茶栈，茶号遍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又先后在上海、汉口设立茶叶公所，广泛结纳绅商权贵，名声日大。1873年，受李鸿章札委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与唐廷枢等人共同创办了仁和水险公司、济和水火险公司。参与决策购买美商旗昌洋行轮船。1881年（光绪七年）会办开平煤矿。1884年因挪用招商局公款投机地产失败被革职。转向工矿业，先后参与创办了热河平泉铜矿、建平、永平等处金矿、迁安铁矿等。1902年在上海开办景纶衫袜厂，还在多家企业有股份，总资本在120万余两。参与创办同文书局和广韵宋斋书局，石印《二十四史》和《图书集成》。著有《徐愚斋自叙年谱》等。

【赵尔丰】（1845 或 1846—1911） 清末官员。字季和。汉军正蓝旗人。祖籍山东蓬莱。早年屡试不第，1884年（光绪十年）捐官，后屡经锡良提携，官至封疆大吏。1903年随锡良入川，权永宁道，镇压会党起义。1905年任建昌道。1906年加侍郎衔，授川滇边务大臣，实行改土归流，稳定昌都地区局势。1908年任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1910年（宣统二年）奏请以工布江达为川藏分界线，为筹建西康奠定了基础。1911年调署四川总督，镇压保路运动，屠杀请愿群众，激起全川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后被迫交出政权。12月被新任都督尹昌衡以煽动兵变罪处死。

【端方】（1861—1911） 清末官员。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出任直隶霸昌道，历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署陕西巡抚等。1900年慈禧、光绪西逃时因“护驾有功”，擢升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1904年调抚江苏，署两江总督，寻调湖南。1905年奉旨与载泽等出国考察政治，归国后上《欧美政治要义》，力主实行立宪，建立责任内阁，平满汉畛域。1906年任两江总督。1909年（宣统元年）调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因在东陵拍摄慈禧葬仪被摄政王载沣以大不敬罪免职。1911年起用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四川同志军起义后，率新军一标前往镇压，在资州为反正新军所杀。著有《端忠敏公奏稿》、《匋斋吉金录》等。

【温生才】（1870—1911）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字练生。广东嘉应（今梅县）人。幼家贫，被诱至南洋充童工。后归国当仆役，曾入伍当兵。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复至南洋做工。在霹雳（今属马来西亚）经人引见，与孙中山会晤，表示情愿为“排满”而献身。不久加入同盟会。1909年（宣统元年）秋，与人在霹雳埠锡矿场开办广益学堂，聚众讨论国事，又与华侨李佐汉等组织暗杀团，“誓除民贼”。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前，拟谋刺广州将军增祺，因无炸药而作罢。1911年3月底，由香港再赴广州，谋刺署广州将军孚琦。4月8日趁孚琦外出之机，将其击毙于广州东门外茶馆旁。遂被捕，不屈而死。南洋华侨曾编演《温生才新剧》，以志悼念。

【龙鸣剑】（1878—1911）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字顾

三（顾山），号雪眉，原名骨珊。四川荣县人。秀才出身。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肄业于成都优级师范学堂。旋赴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1908年奉命归国运动革命，在成都创办法政学堂作为秘密机关，旋被选为四川咨议局议员。1911年（宣统三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参与发动五保镇反清武装起义。9月与同盟会员吴玉章宣布荣县独立，并率同志军攻打成都，在仁寿重创清军。后因武器悬殊改攻叙州（今属宜宾）。11月在行军途中病逝。

【赵声】（1881—1911）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民主革命者。字伯声，号百先，别号雄愁子，原名毓声。江苏丹徒（今属镇江）人。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入江南水师学堂，1903年东渡日本考察军政，结识黄兴等革命志士。回国后执教于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因参加拒俄运动，宣传革命，为当局所忌，遂离开南京至长沙，任实业学堂监督。1905年投入新军，多次密谋发动起义，皆未成。先后援引柏文蔚、倪映典、熊成基等入新军为官佐。1906年在南京加入同盟会。1910年（宣统二年）谋广州新军起义，事败后赴南洋筹款，准备再次大举。1911年4月与黄兴领导黄花岗之役，事败后退至香港，旋病死。

【喻培伦】（1886—1911）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字云纪。四川内江人。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东渡日本，先后入东京警监学校、经纬学校、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1908年加入同盟会。不久又入千叶医务学校药科钻研化学，并与黎仲实、黄复生等成立暗杀团，试制炸药，被誉为“炸弹大王”。1909年（宣统元年）到汉口谋炸端方未成，次年在北京谋炸摄政王载沣，事败时正在赴日购药途中，得免被捕。1911年4月，奉命赴粤为广州

起义制造炸弹。起义爆发后携炸弹奋勇作战，弹尽受伤，被清军抓获，英勇就义。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1912年2月，由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追赠为“大将军”。

【林觉民】（1887—1911）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字意洞，号抖飞，又号天外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入福建高等学堂，接受新思潮，参加学潮活动，并创办私立小学、阅报所，热心于公共事业。1907年留学日本，入庆应大学文科，读哲学。不久参加中国同盟会，经常出席集会，发表演说，撰文与保皇派论战。1911年（宣统三年）春，闻讯黄兴等筹备广州起义，遂返福建，组织闽省志士赞助起义。旋去香港，再与林文、陈可钧等入广州。4月24日夜挑灯为家人写绝笔书，感情深挚，愿牺牲自身“为天下人谋永福”。25日复去香港迎接同志，27日晨率全部福建志士潜入广州。当日下午5时，在黄兴统一指挥下百余名革命党人冒死攻打清督署。他怒目奋击，所向披靡，因受伤力尽被俘，从容就义。

【焦达峰】（1887—1911）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字鞠荪，原名大鹏。湖南浏阳人。早年加入洪福会，结纳会党。1904年（光绪三十年）入长沙高等普通学堂预备科，参加黄兴等组织的东文讲习所和同仇会。同年赴日本留学。1906年奉黄兴指示回国，在浏阳策动会党响应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再度亡命日本。1907年入东京东斌步兵学校，加入同盟会，与张百祥等组织共进会，奉孙中山为领袖，策划在中国中部省区发动起义。1909年（宣统元年）回国，在汉口法租界设共进会总机关，旋在长沙设立共进会机关部，在两湖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准备起义。1911年10月武昌

起义爆发后，与陈作新一起组织湖南会党与新军响应，10月22日攻占长沙，成立湖南军政府，被举为都督。旋派主力部队赴武昌支援。立宪派乘长沙空虚发动政变，他与副都督陈作新一起被害。

【李莲英】（？—？） 清末太监。直隶河间（今属河北）人。幼失父母。曾以私贩硝磺被捕入县狱，出狱后以补皮鞋为生，故而得绰号“皮硝李”。咸丰年间经同乡人、太监沈兰玉介绍自阉入宫为宦。以善梳新髻得那拉氏宠信。东太后死后更因宠而无忌惮，由梳头房太监擢为总管太监。权倾朝右，至与慈禧并坐看戏。⁴⁰寿辰，那拉氏所赐之物，与大员等，枢臣疆吏无不为之祝寿。卖官鬻爵，赃私之积，以千万计。干预国政，广植私党。反对戊戌变法，构陷帝党及维新派。那拉氏死后出宫，病死于宣统年间。

【容闳】（1828—1912） 清末社会活动家。号纯甫，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广东香山南屏镇（今属珠海）人。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入澳门马礼逊学校。1847年毕业，随校长布朗赴美，入麻省孟松学校。三年后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咸丰四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为中国第一个留美高等学府毕业生。次年回国，多次变换职业，先后任上海、香港等地海关文书、翻译，充外商洋行书记、采购等。1860年秋访问太平天国，向洪仁玕提出组织精良军队、创立学校、建设善良政府、设立银行、厘定度量衡制度等全面向西方学习的建议，未被采纳，乃回江南继续自营商业。1863年（同治二年）入曾国藩幕。次年受曾国藩委托赴美为江南制造局采购机器。充江苏巡抚丁日昌幕僚。1866年建议在江南制造局内设兵工学校，培养技术人才，得到批准。1872年起受命带幼童赴美留学，任留美学生监督，并任驻美副使，直至1881年

(光绪七年)。1895年返国，积极支持并参与变法维新活动。戊戌政变后曾设法营救康有为、梁启超，未果，逃出北京。1900年在上海参加唐才常筹组的中国国会，任会长。因自立军起义失败被通缉逃往香港。1902年再度赴美。支持孙中山民主共和的主张，积极募款支持革命。1912年4月病逝于美。著有《西学东渐记》等。

【瑞澂】(1864—1912) 清末官员。字莘儒，号心如，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黄旗人。以贡生官刑部笔帖式，迁主事，调升户部员外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后历任九江道、上海道、江西按察使、江苏布政使等。1909年(宣统元年)经两江总督端方力荐，升江苏巡抚，后调任湖广总督，参与预备立宪活动。1911年奉旨会办粤汉、川汉铁路事宜，曾在武昌残杀革命党人。武昌起义爆发后弃城逃往上海。清廷以失守武昌、潜逃出省罪下诏逮京治罪，旋病卒。

【良弼】(1877—1912) 清末官员。字赉臣。爱新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曾留学日本，入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归国后入练兵处，旋充陆军部军学司监督副使，升司长。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任禁卫军第一协协统。为载涛谋主，对清末军制改革、编练新军、创立军校等多所赞划，并注意延揽军事人才。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后，力主镇压民军，反对起用袁世凯。1912年1月与溥伟、铁良等组织宗社党，被推为首领，阻止南北议和，反对清帝退位。1月26日被同盟会会员彭家珍炸伤左腿，越二日而死。

【陶成章】(1878—1912)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字焕

卿，号匍耳山人，笔名汉思、巽言。浙江会稽（今绍兴）人。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留学日本，参加革命活动。1904年回国，与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光复会，负责联络苏、浙、皖、闽、赣会党工作。1905年协同徐锡麟、龚宝铨创办大通师范学堂。1906年光复军成立后任五省大都督，旋因起义败露再赴日本，次年1月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一度在芜湖中学堂任教。徐锡麟、秋瑾起义失败后，遭清廷通缉，潜赴南洋。曾参与新加坡《中兴日报》、仰光《光华日报》笔政。1908年接任《民报》主编。后又赴南洋筹措经费，准备起义。因与孙中山不洽，决计“独自经营”，1909年（宣统元年）初在爪哇建立光复会，不再用同盟会名义。1910年又在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任副会长，与同盟会公开分裂。1911年归国筹划起义，旋因黄花岗起义失败形势不利而再赴南洋。武昌起义后号召江、浙旧部响应，浙江军政府成立后被举为参议员。1912年1月被沪军都督陈其美遣蒋介石设计暗杀。著有《中国民族史》、《浙案纪略》等。

【冯如】（1882—1912） 中国近代机械制造家。字鼎三。广东恩平人。家贫。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随亲戚赴美谋生，入耶稣教纲纪慎会。白天工作，夜晚学习西文，潜心于机械制造。勤学10年，凡36种机器无不通晓，且多有发明创造，成为机械制造专家。从1905年（光绪三十年）起，钻研飞机设计和制造。1908年制成一架试验性飞机，两年后又研制出一架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飞机，得到孙中山的赞赏鼓励。1910年（宣统二年）10月，他驾驶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参加国际飞行比赛大会，在飞行高度、速度和距离等方面均领先，获第一名，遂声名远播。辛亥革命前夕，携带自己的飞机回国。武昌起义后曾同革命党人一起组织飞

机侦察队，配合革命军作战。1912年在广州的一次飞行表演中不幸失事牺牲。

【龚春台】（？—1912） 中国近代会党首领。原名谢再兴，又名章年、张章年。湖南浏阳人。早年做爆竹工人。加入哥老会，渐次成为首领。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潜伏在浏阳一带。1905年被萍、浏、醴一带会众推为洪江会首领。1906年与同盟会员共同发动萍浏醴起义，被推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失败后，避走长沙。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后率数百人响应。1912年南北议和后，回汉口，病逝。

【沈家本】（1840—1913） 清末法学家，字子惇，号寄簃。浙江归安（今吴兴）人。光绪朝进士。1893年（光绪十九年）起，历任天津、保定知府，刑部右侍郎。潜心法学，收集、整理和考订中国古代法律资料，并研究西方法律。1902年清廷设修订法律馆，他以通法学授修订法律大臣。建议废除凌迟、枭首、戮尸及缘坐、刺字等刑。修改《大清律例》为《大清现行刑律》，制定《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刑事诉讼法律草案》、《民事诉讼法律草案》（后四部未及公布），及《公司条例》、《商人通例》、《著作权法》、《法院编制法》等。修定旧律、制定新律，均参照西方和日本的刑律，竭力把西方法律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结合起来。别设法律学堂，培养大批法律人才。先后兼大理院正卿、法部右侍郎等职。1911年任法部左侍郎。著有大量法学论著，多数收于《沈寄簃文存》。又编有《沈碧楼丛书》。未刊书目有《秋谏须知》、《律例杂说》、《文字狱》等。

【宋教仁】（1882—1913）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字遁初，一作钝初、遯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入县漳江书院读书。1903年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与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黄兴结识，经常谈论反清革命。1904年在长沙参与发起成立华兴会，被推为副会长。奉命到湖北活动，与吕大森等创立科学补习所。在常德一带组织反清力量，准备策应华兴会预定在长沙的起义，事泄，东渡日本。1905年入东京政法大学，学习经济学、民法等科目。与陈天华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鼓吹排满革命。参与中国同盟会创立工作，被推为司法部检事长。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名《民报》，作为同盟会机关报，总揽庶务，兼撰述员。1906年代理同盟会庶务干事，主持本部日常工作。1907年潜入辽东安东（今丹东），联络“马侠”，建立同盟会辽东支部，谋划起义，失败。1911年7月，与谭人凤、陈其美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被推为总务干事。确定在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举、在武昌首先发难的方针。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与黄兴赶赴武汉，协助湖北军政府办理外交事务，参与拟定《鄂州临时约法》。旋赴上海，参与筹组中央政府工作。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法制局总裁。4月，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农林总长。6月，随唐绍仪内阁倒台而去职。8月，在取得孙中山和黄兴的同意后，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合并，组成国民党，当选为理事，旋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为组织责任内阁而开展政党竞争。1912年底到1913年初，国民党在初选和第一届国会复选中获胜，他即宣称将组织国民党责任内阁，并声言国民党将选举黎元洪为总统，以真正实行政党责任内阁制。3月20日应邀北上，在上海火车站遭袁世凯所遣特务枪击，22日去世。

【蒋翊武】（1885—1913）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字伯夔。湖南澧州（今澧县）人。出生于农民家庭。在常德师范就学时，因与黄兴等谋划革命被开除。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与杨卓霖等创办《竞业旬报》，鼓吹革命，加入同盟会。1909年（宣统元年）用伯夔名投湖北新军，入群治学社。1911年文学社成立，被举为社长。在新军中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并与共进会合作，准备发动起义。川路风潮起，湖北革命党人决定起义，被推举为总司令。10月9日汉口起义机关失事，遂临时决定当夜起义。因负责发射起义信号的炮队未收到通知，所在起义机关又被破获，被迫逃走。起义成功后担任武昌军政府顾问，后继黄兴任战时总司令及驻汉招抚使等职。1912年坚辞袁世凯所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回湖南任荆豫招抚使，组织反袁活动，事败在金州被捕，9月就义于桂林。

【赵秉钧】（1859 或 1864—1914） 中国近代官僚。字智庵，河南临汝人。书吏出身，早年投左宗棠部，随军驻新疆。甲午战争后追随袁世凯。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创办巡警，被袁世凯委为保定巡警局总办。旋创办天津侦探队和巡警学堂。1905年任巡警部右侍郎。1911年（宣统三年）任袁世凯内阁民政部大臣，次年3月袁世凯就任民国总统后，任内务总长、国务总理。1913年3月，在袁世凯指使下，买通歹徒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宋教仁。事后迫于舆论辞职，旋被调任直隶总督。次年2月被袁世凯毒死灭口。

【陆润庠】（1841—1915） 清末官员。字凤石，江苏元和（今吴县）人。同治状元。光绪初曾督山东学政，迁国子监祭酒，因母

病归苏州，总办苏州商务。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在两江总督刘坤一支持下，以官私合资，创办苏纶纱厂、苏经丝厂。次年开工，不久即出租给商人经营。1898年任内阁学士，署工部侍郎，继充厘订官制大臣。1907年任吏部尚书、参预政务大臣。1909年（宣统元年）为协办大学士，充毓庆宫授读，旋充体仁阁大学士，次年授东阁大学士。1911年皇族内阁成立，充弼德院院长，上书攻击改革“包藏祸心”，反对推行新政。辛亥革命后留宫作溥仪师傅。1915年去世。

【王金发】（1883—1915）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又名逸，谱名敬贤，字季高，号子黎。浙东嵊县人。早年课读于家，中秀才。曾入会党，组织平阳（洋）党。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在嵊县一带组织乌带党，被举为“龙头”，进行反清活动。1905年结识光复会领袖徐锡麟，奉为师，入会。旋随徐东渡日本，入大森体育学校。毕业后返浙，任绍兴大通学堂体操教员。秋瑾等组织光复军后，任军分统，奔走沪杭之间，约集反清志士，准备起义。1907年夏，光复会皖浙起义失败，出逃日本。复往来沪、浙等地，坚持反清斗争。在上海参加同盟会，开设天保栈为革命机关，处死叛徒汪公权。1911年（宣统三年）11月率敢死队员攻打江南制造局，继赴浙江，率先攻入浙江抚署。率军至绍兴，成立军政分府，出任督都，实行新政。1912年任孙中山护卫。绍兴军政分府裁撤后，退居上海。次年初“宋案”发生，以国民党特派员身分参加侦缉凶手工作，迅速侦破，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二次革命”后，招集旧部起而响应。失败后蛰居上海法租界。1915年回杭州，被督理浙江军务的朱瑞拘捕杀害。

【刘师复】(1884—1915) 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者。原名思复。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904年(光绪三十年)留学日本,次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归国。在香山创办隽德女学,提倡女子教育,旋往香港编辑《东方报》。1907年谋炸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事败被捕。狱中著述不断,阐发民族、民主思想。1909年(宣统元年)出狱后赴香港研究无政府主义。次年组织支那暗杀团。武昌起义后发动香山新军响应,号称香军。1912年在广州设晦鸣学社,印行《无政府主义丛刊》等小册子。同年又组织心社,宣称“破除现代社会之伪道德、恶制度,而以吾人良心上之新道德代之”,废姓,易名师复。并发起研究世界语,任环球世界语会广州分会会长。1913年8月在广州发刊《晦鸣录》,1914年7月在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主张政治经济上绝对自由,并与国际无政府主义者联系。信徒誉其思想为“师复主义”。1915年3月病逝。著有《师复文存》。

【荫昌】(?—?) 清末民初政客。字午楼。满洲正白旗人。曾留学德国,学习陆军。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任出使德国大臣,1905年召回,次年署江北提督,旋授陆军部右侍郎。1908年再次出使德国。1910年(宣统二年)归国,任陆军大臣,训练近畿各镇大臣。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奉命率军镇压,屡败。民国成立后,历任袁世凯政府总统府高等顾问、侍从武官长、参议院参政、参谋总长等职。

【丁韪良】(1827—1916) 美国北长老会派赴中国的传教士。字冠西。美国印第安纳州人。1850年(道光三十年)来华,在宁波传教。为美国政府提供太平天国情报。1858年(咸丰八年)任美

国驻华公使列卫廉的翻译，在天津参与起草中美《天津条约》。1862年（同治元年）一度回国，来华后在北京传教。1865年任同文馆教习。1869年升任总教习，直至1894年（光绪二十年）。兼任清政府关于国际法方面的顾问。1885年得三品官衔。1898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得二品官衔。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避居东交民巷。主张“以华制华”，由美国割占海南岛。后返美，不久复来华，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筹建大学堂，未成。1908年回北京从事传教和著述。1916年12月病死北京。著有《花甲忆记》、《北京之围》、《中国的觉醒》等。

【王闿运】（1833—1916） 清末学者、诗人。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湖南湘潭人。1853年（咸丰三年）中举人。先馆山东巡抚崇恩，继应尚书肃顺聘请入京教读，甚受尊礼。遇左宗棠之狱，游说肃顺为左辨解。后为曾国藩幕僚。论事多不合。此后专事讲学，历主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清末，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民国初，出任清史馆馆长。于经、史、诸子百家之书无不诵习，尤服膺公羊学，主张经世致用。所著《春秋公羊传笺》、《谷梁传笺》、《经子笺注》，对公羊学奥义多有阐发，为清末今文经学的著名经师。作诗宗尚庾信、鲍照。自谓不作唐以后诗，风格保守，有拟古主义倾向，是晚清汉魏六朝诗派的首领。曾与邓辅纶、邓绎等结兰陵词社，号称“湘中五子”。所著还有《尚书义》、《诗经补笺》、《礼记笺》、《湘军志》、《湘绮楼诗文集》及日记等数十种。门人辑其著述为《湘绮楼全集》。

【盛宣怀】（1844—1916） 清末官僚买办。江苏武进人，字杏荪，

又字幼勛，号愚斋。1870年（同治九年）入李鸿章幕，甚得信任。1873年被李鸿章委派为轮船招商局会办，后升为督办。1881年（光绪七年）经李鸿章奏请派为电报局总办。1893年任华盛总局督办。为李鸿章所办洋务企业的主要管理者和控制者。1879—1896年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天津海关道、山东登莱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津海关监督等。1896年从湖广总督张之洞处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经办芦汉铁路，1898年又兼办萍乡煤矿。同时受清政府委任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事务，开设中国通商银行。先后向帝国主义出卖芦汉、沪宁、粤汉等铁路路权。1900年主张镇压义和团，参与策划东南互保，订立《东南保护约款》。1902年任工部左侍郎。1908年任邮传部左侍郎。任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总理。1911年（宣统三年）授邮传部尚书。皇族内阁成立，任邮传部大臣，与四国银行团签订币制实业借款合同。又以“铁路国有”为名，将已商办的川汉、粤汉路权出卖，激起保路风潮，为辛亥革命的直接导火索。武昌起义后逃亡日本。1912年秋回国，任汉冶萍公司董事长，轮船招商局副董事长。主张镇压“二次革命”。1913年以汉冶萍财产做抵押向日本举借屈辱性借款，给汉冶萍以后的发展带来恶劣影响。有《愚斋存稿》、《盛宣怀未刊信稿》、《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等。

【袁世凯】（1859—1916）北洋军阀首领。字慰庭，又作慰廷、慰亭，别号容庵。河南项城人。袁少时不喜读书，1878年（光绪四年）捐得一个中书科小官。1881年投淮军将领吴长庆。次年随吴入朝鲜，负责前敌营务处事务，协助朝鲜国王镇压汉城兵变。1884年因镇压朝鲜开化党有功，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次年，升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1894年，受日本驻朝鲜代

理馆务书记官杉村的怂恿，电请清政府派兵入朝鲜镇压东学堂起义。因日本也以此为借口派兵入朝鲜，而引发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经多方钻营，到天津小站编练新式陆军，聘请德国教官，采用新式训练方法，颇有成效。1897年擢为直隶按察使，专管练兵事宜。戊戌变法时期，他表示赞成维新变法。1898年9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赏候补侍郎衔。18日，在帝后党争白热化之际，当面应允维新党人谭嗣同，将拥兵勤王、除旧党，隔日又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导致谭嗣同等被杀。1899年晋升工部右侍郎，署理山东巡抚（次年实授），残酷镇压义和团运动。经营北洋。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他派兵北上勤王，却命令不得与联军作战，又参加“东南互保”。1901年擢升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1903年任练兵处会办大臣，练成北洋六镇，他直接控制五镇，在此基础上形成北洋军阀集团。1907年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1909年（宣统元年）摄政王载沣将其开缺回籍。此后在彰德（今商丘）“养痾”，仍操纵旧部，伺机再起。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袁为清廷重新起用，任总理内阁大臣，节制全军。旋即出兵湖北，攻占汉口、汉阳。以又打又拉的手段，逼革命党人交出政权，又借革命党人力量逼清帝退位，窃得最高权力。1912年3月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建立起地主、买办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1913年派人暗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逼使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1914年下令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取消国务院。为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1915年5月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2月宣布复辟帝制，决定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元旦登极。此举遭到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蔡锷在云南组成护国军，通电讨袁，许多省份相继响应。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

制。6月6日在忧惧中死去。著作有《袁世凯奏议》。

【袁项城】即“袁世凯”。

【黄兴】（1874—1916）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字廛午，号克强，原名轸。湖南善化（今长沙）人。他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中秀才。1898年就读湖北武昌西湖书院，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1902年官费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并留意兵操射击等各种军事知识。与杨笃生、樊锥等创办《游学译编》，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宣传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次年参加拒俄义勇队（旋改称军民教育会），任“运动员”，回两湖地区策动起义。1904年2月，和刘揆一、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为会长。决定联络会党，举行起义，事泄，逃亡日本。1905年8月，他和孙中山等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参加起草会章，为执行部庶务（协理），负责主持本部工作。与孙中山、章太炎一起制订《革命方略》，作为指导党人在内地发动武装起义的纲领性文件。1907—1911年间，指挥或参与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和广州黄花岗之役。1911年8月复信同盟会中部总部负责人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表示赞成他们准备在武汉发动起义的计划。武昌起义爆发后，从香港抵上海，与宋教仁、柏文蔚等商讨光复南京的部署。旋赴武昌，被任命为战时总司令。10月31日汉阳失陷后，辞职赴上海，被独立各省留沪代表先后选为临时政府大元帅、副元帅，未到任，虚位以待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在南北议和中，赞成袁世凯在同意共和的条件下当选总统。临时政府北

迁后，任南京留守府留守，主持南方军队整编事宜。认为南北既已统一，无须保留大批军队，又因军饷无着，军队哗变，遂大量裁遣。6月14日留守府自行撤销。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被推举为理事。12月就任袁世凯委派的汉粤川铁路督办，发现袁世凯无诚意，遂辞职赴上海闲居。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一度主张法律倒袁。7月“二次革命”爆发，即赴南京，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逃往日本。在总结“二次革命”教训时，与孙中山发生分歧，拒绝参加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1914年6月离日赴美。其时，一部分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国民党人组成欧事研究会，他列名其间，并隐为领袖。1915年秋，接到蔡锷将赴西南发难讨袁的密信后，先后命长子黄一欧、秘书石陶钧及张继回国，参与讨袁活动，并亲自在美国为护国战争积极募饷。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回到上海，与孙中山和好，共同致力于讨袁善后，推进民主革命。10月31日病逝于上海，遗著编为《黄兴集》。

【黄克强】即“黄兴”。

【陈其美】（1877—1916）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字英士。浙江吴兴人。早年学习商业。1906年（光绪二十三年）东渡日本，入东京警监学校，加入同盟会。次年转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1908年回上海，联络党人，设立机关。1909年（宣统元年）参与筹划浙江起义，因叛徒刘师培告密，未果。在上海创办《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并协助宋教仁、于右任等办《民立报》，宣传革命。为利用会党，加入青帮。1911年7月，任同盟会中部总会庶务部长。武昌起义后，联络上海商团、青帮和部分清军，于

11月3日发动起义。上海光复后任沪军都督，派人刺杀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参与组织江浙联军会攻南京。1912年3月临时政府北迁后，被任为唐绍仪内阁工商部长，未赴任。7月，沪军都督府被撤销。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投身“二次革命”，任上海讨袁（世凯）军总司令，失败后逃亡日本。1914年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他积极支持，任总务部长，主持日常工作。1915年返沪，组织机关，发展讨袁军事力量，派人暗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12月发动肇和舰起义，失败。1916年5月，被北洋军阀张宗昌派人刺杀于上海。

【蔡锷】（1882—1916） 民国初年讨袁护国军将领。字松坡，原名艮寅。湖南邵阳人。7岁就学，14岁中秀才。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春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事梁启超、谭嗣同等。1899年应梁启超函约，先后入日本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学习。次年随唐才常回国，准备在汉口发动起义。失败后，二次赴日，先后入陆军成城、士官两校学习军事，与蒋方震、张孝准号称“中国士官三杰”。1904年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军事学堂及军队任职。1911年（宣统三年）夏，任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兼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并与同盟会会员保持联系。武昌起义爆发后，被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会员推举为总指挥，于10月30日发动反清起义。云南军政府成立后，出任都督，派军队进入贵州、四川，协助两省独立。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被调至北京，先后担任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议院参政、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虚职。1915年袁世凯企图称帝，他于是年年底以治病为名，摆脱袁的监视，潜赴天津与革命党人及梁启超密商后，化装乘日本轮

船经日本、香港等地抵昆明。12月25日，与唐继尧、戴戡、任可澄等联名宣布云南独立，通电武力讨袁，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首先出兵四川，与曹錕、张敬尧等部北洋军展开激战。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署民政长。他本患喉病，艰苦转战生活使病加剧。先赴上海，再赴日本治疗，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医院。北京政府追赠其为上将，举行国葬。

【蔡松坡】即“蔡锷”。

【科士达】(1836—1917) 又译福士达或福士德。美国外交官。美国印第安纳州人。1855年毕业于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后入哈佛大学学习法律。旋任律师，参加共和党。南北战争中以战功获上校军衔。1872年任哈礼逊总统的第二任国务卿。他与清廷使俄大臣曾纪泽有过交往，又曾受聘于出使美日(西班牙)秘大臣张荫桓，同美国政府交涉华工条约等事。1894年(光绪二十年)12月，被清廷聘为法律与外交顾问，会同张荫桓、邵友濂赴日议和。次年3月，李鸿章赴日议和，再次以顾问身份参与中日谈判。在日本对议和草案稍作让步后，怂恿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后又要求清政府如期交换条约批准书。6月2日，清全权代表李经方按其指示方法，赴日军舰送交有关台湾的割让清单。6月8日离沪返美，仍任清驻美使馆顾问。1907年曾代表中国出席第二届海牙会议。著有《美国百年外交史》、《美国东方外交》、《外交回忆录》等。

【刘永福】(1837—1917) 清末抗法名将。字渊亭，原名义。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8岁随父迁居广西上思州。13岁到滩艇

做雇工，后任导水员，曾向父叔学习拳棒。1857年（咸丰七年）参加广西农民起义，后率所部200余人投效吴亚终。因其所部以七星黑旗为军旗，故被称为“黑旗军”。1865年（同治四年）率所部入越南。1867年在六安州建立“中和团黑旗军”。他机智善谋，“重信爱士”，颇受所部爱戴。1873年，应越南邀请，亲率1000余人抗击进犯河内等地的法军。因大败法军，并致法军头目安邨当场毙命，被越南国王授“三宣副提督”之职。1883年（光绪九年）5月19日，率部与再次进犯河内的法军交战，击毙法军头目李威利（又作李维业）。战后被越南国王实授“三宣正提督”，封义良男爵。从此法人视之如虎，闻其名“心胆俱裂，不敢回首一视”。中法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授以记名提督，赏戴花翎，所部受清廷统辖。在越南西线战场，与清军配合，多次取得抗法战争胜利。1885年4月，在越南临洮大败法军。中法议和后，率所部精税3000人回国，旋任南澳镇总兵。1887年11月赴京，三次谒见光绪帝。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受命帮办台湾防务。9月率兵赴台，驻防台南，所部2营扩充为8营，仍号“黑旗军”。1895年6月初，日军侵占基隆、台北等地。台湾巡抚唐景崧内渡大陆后，团结各部义军，指挥所部黑旗军等共同抗击日军。曾严辞拒绝日军海军大将桦山资纪的利诱，表示“当与台湾共存亡”。是年6、7月间，因军饷无济，乘英商船爹利士号潜回大陆。1898年募兵4营，驻守广州，仍称“黑旗军”。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奉命率师北上，途经湖南被电召回粤。1902年署广东碣石镇总兵。1907年称疾还乡。1911年11月广东独立后，出任全粤民团总长，不久辞职。1915年袁世凯欲接受日本所提出的“二十一条”，曾抗电力争。

【汤寿潜】（1857—1917） 清末立宪派领袖。字蛰先，亦作蛰仙，原名震。浙江山阴（今属萧山）人。青年时曾入山东巡抚张曜幕。光绪朝进士。授安徽青阳知县，不久辞职。曾著《危言》，阐发改良主义思想。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劝刘坤一与张之洞同英美各国议订《东南互保章程》。1903年擢两淮盐运使，旋辞职。次年任上海龙门书院山长，改书院为龙门师范学堂。1905年加四品京堂衔，参加苏浙争路权运动，与张元济、夏曾佑等发起组织浙江全省铁路公司，任总理，主持修建沪杭甬铁路。1906年与张謇等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任副会长，积极参加立宪运动。次年参与浙江官绅杀害秋瑾事件。1909年（宣统元年）授云南按察使，旋改授江西提学使，均未赴任。因参劾盛宣怀误国被革职。浙江谘议局成立，被推为议长。1911年与张謇等联名要求改组皇族内阁。1911年11月浙江光复，被举为督都。次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任为交通部总长，未就职，旋改任赴南洋劝募公债总理。归国后复任浙江铁路公司理事长，不久隐退。临终遗嘱以20万银元捐办浙江文化教育事业。著有《尔雅小辨》、《说文集》、《理财百策》、《三通考辑要》等。

【奕劻】（1836—1918） 清末大臣。爱新觉罗氏。乾隆帝第十七子庆僖亲王永璘孙。1884年（光绪十年）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封庆郡王。次年会同奕譞办理海军事务。1894年封庆亲王。1900年与李鸿章同任全权大臣，与八国联军议和。次年同各国签订《辛丑条约》。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后，任外务部总理大臣。1903年升任军机大臣，总理财政处、练兵处事宜。1907年兼管陆军部。1911年（宣统三年）5月皇族内阁成立后任内阁总理大臣。他为人贪鄙昏庸，揽权受贿，与袁世凯深相结纳，左右朝局。屡为言官弹劾

而恋栈不去。武昌起义后，派兵入鄂镇压，后建议起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自任弼德院总裁。1912年清帝退位后，挟巨款寓居天津。

【瞿鸿禨】（1850—1918）清末官员，字子玖，一作子九，号止庵，晚号西岩老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谥号文慎。1871年（同治十年）中进士。授编修，擢侍讲学士、詹事，晋内阁学士。先后典试河南、福建，出任河南、浙江、江苏、四川学政。迁礼部右侍郎。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上书主战，建议四路进兵，不被采纳。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随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逃往西安。经荣禄推荐，授为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常承旨草拟谕旨。1905年后，参与策划预备立宪。1907年与岑春煊联合，企图推倒在中央擅权的奕劻和袁世凯，引发“丁未政潮”。失败后，被开缺回籍。后寓居上海，以清室遗老终。

【程璧光】（1859—1918）民国初年海军将领。字恒启，号玉堂。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福州水师学堂毕业后，历任超武舰帮带、水师学堂教习、广甲舰帮带、广丙舰管带等职。1894年（光绪二十年）任粤舰领队，率广甲、广乙、广丙三舰北上会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暂编北洋舰队，参加黄海海战。1895年2月，威海卫即将失陷之际，他乘舰向日本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投递北洋海军英美顾问及部分怯懦贪生将领的乞降书。战后解职。1896年以李鸿章奏请，派为清廷监造军舰专员赴英。1899年率海天、海圻二舰回国，调任北洋营务处会办。1907—1910年（宣统二年），先后任清海军处船政司司长、巡洋舰队统领、海军部第二司司长

等职。1911年6月，以副使名义随载振赴英参加英王乔治第五加冕礼。事毕奉命赴墨西哥、古巴慰问华侨，道经美国，谒美总统。1912年回国后闲居上海。次年春任袁世凯政府海军高等顾问，不久又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参议。袁世凯死后，任北洋政府海军总长。在1917年的“府院之争”中，支持总统黎元洪，并与外交总长伍廷芳等四人提出辞职，以表示对段祺瑞专擅的不满。不久，离京抵沪，与海军各舰舰长研究对付段祺瑞皖系军阀的办法，并与孙中山、唐绍仪、岑春煊有所联系。张勋复辟时，曾派三艘军舰至秦皇岛，欲接黎元洪南下，未果。孙中山在广东发动护法战争，他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率海军主力海琛、海圻、永丰等8舰南下广东，提出拥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惩办祸首等三项主张。抵粤后任军政府海军总长。中华革命党人对其撤职查办炮击观音山桂军督署的豫章、同安二舰舰长一事不满，且怀疑其与桂系军阀陆荣廷已有默契，将背叛护法运动，派人于1918年2月将其刺杀。

【汤化龙】（1874—1918） 清末立宪派领袖。字济武。湖北蕲水（今浠水）人。幼入私塾习八股文，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中举人。逾二年中进士，授法部主事，后任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1906年留学日本，入法政大学学习法律，发起成立法政学交通社，并撰成《大清违警律释义》一书。又与同学组织留日教育学会，出版《教育杂志》。1908年归国，任谘议局筹办处参事。次年当选为谘议局副议长、议长，积极参与请愿速开国会议运动。1910年（宣统二年）赴京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推为会议主席，参加立宪派第三次请愿。继与同仁谋划第四次请愿，被清政府禁止。次年6月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抨击“皇族内

阁”，成立“宪友会”。武昌起义后，顺应潮流，参与组织湖北军政府，并通电敦促各省谘议局响应革命。继与胡瑞霖等拟定《都督府组织条例》，任政事部长，旋改为编制部长。汉阳失陷，随黄兴赴上海。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为法制局副总裁，辞不就职。与立宪派要人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拥梁启超为领袖。4月由沪入京，当选为临时参议院副议长。5月加入共和党，10月组建民主党，任干事长。1913年当选为议长，支持袁世凯独裁。与梁启超合组进步党，与国民党相对抗。“二次革命”发生后，与议员孟森等联合通电反对。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和国会之后，任其为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长。次年辞职赴沪，参加护国讨袁。袁世凯死后，拥护段祺瑞政府，先后任众议院议长、内务总长。1916年在梁启超支持下组织“宪法研究会”，为段氏的“督军团”出谋划策，与南方革命党人作对，受到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护法军政府的通缉。1918年出国考察，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遇刺身亡。

【李提摩太】（1845—1919） 英国来华传教士。威尔士人。1870年（同治九年）受英国浸礼布道会派遣来华。先在山东传教，收效甚微。后注意结交清政府上层官员，逐渐打开局面。1890年（光绪十六年），受聘于英国人在天津创办的《时报》，任主笔，每日著论一篇（后汇编为《时事新论》），鼓吹中国仿行西法。次年，出任由英美在华人士创立的文化出版机构——同文书会（后改名广学会）的总干事，大量出版书籍，发刊《万国公报》，宣传基督教文化，传播西学知识，兼论中国政教，影响广远。1895年10月，在北京与康有为会晤，参加强学会，企图对刚刚兴起的维新运动施加影响。向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建议中国应求得英美“保护”、借用英美人才推行新政。百日维新中，被推荐为光绪

皇帝的顾问。1900年春到美国参加环球基督教会议和布道差会会议，预言中国将发生“变乱”，请求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义和团运动。1901年应邀进京会商教案善后事宜。草拟《办理山西教案章程》，提出用“罚款”办学。在太原先后开办中西学堂和山西大学堂，开列强用赔款办学的先河。1908年著文《预筹中国十二年新政策》，建议清政府聘外国人为顾问、借外国款办新政，以使革命党“消化于无形”。1911年辛亥革命后，意态消沉。1916年回国，于病中撰写一系列短文，劝告西方列强不要忘记东方。著有《留华四十五年记》等。

【冯国璋】（1857—1919）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字华甫，又作华符。直隶（今河北）河间人。1884年（光绪十年）投淮军当兵。次年经统领刘祺保荐，入北洋武备学堂步兵科。1890年毕业后留堂充教习。甲午战争中随聂士成转战东北前线。1896年被袁世凯调至新建陆军，任督练营务处总办兼步兵学堂监督。曾随袁世凯赴山东镇压义和团。1903年，经袁保荐任清练兵处军学司司长，并督理北洋各武备学堂，被称为“北洋三杰”之一。1906年署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陆军贵胄学堂总办，与满族亲贵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1907—1911年（宣统三年）任军谘使。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赴湖北接替荫昌为第一军总统，指挥北洋军相继攻陷汉口、汉阳。12月15日北上抵京，任禁卫军总统兼察哈尔都统。袁世凯任总统后，仍统禁卫军兼总统府军事处处长。1912年9月出任直隶都督兼民政长。次年率军南下镇压国民党的二次革命，攻陷南京，任江苏都督。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态度消极。护国战争爆发后，联合江西、浙江、湖南、山东等省将军联名要求袁“速取消帝制，以安人心”。后又提出调解“四省与中央”冲突的

八条办法，试图在反袁与拥袁两种势力之间形成第三种势力，操纵南北政局。袁世凯死后，成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仍以江苏督军名义坐镇江苏，遥领副总统之职。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经常联合北方反皖系势力及西南军阀，共同对抗控制着北京中央政府的皖系。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下野后，他出任代理大总统。1917年，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发动护法战争，他授意进入湖南的直系军队消极怠战，以“和平统一”口号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1918年10月，皖系控制的安福国会将其赶下台，选举徐世昌为总统。1919年春返回河间故里。同年10月再次抵京，试图联络直系军阀势力东山再起。12月病死于北京。

【詹天佑】（1861—1919） 中国近代工程技术专家。字眷诚。广东南海人，原籍安徽。1872年（同治十一年）以幼童考取留学美国预备班，赴美学习，1881年（光绪七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铁路专修科。回国后，先后任教于福州船政局、广东博学馆、广东海图水陆师学堂，并出任潮汕铁路等工程师，参与多项铁路工程的修建。1905年被聘为京（北京）张（张家口）铁路总工程师。他实地勘察，精心设计，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坡度大的线路上行车的难题。1909年（宣统元年）8月，京张铁路提前2年竣工，节省经费28万两银，总费用只抵外商索价的1/5，并培养了中国第一批铁路工程师。他因此名扬中外，被清廷授为工科进士衔。同年秋，以总工程师主持川汉铁路勘定工作。次年任粤路总理，支持川、湘、鄂、粤等省的保路运动。1912年协助孙中山制订修建10万公里铁路的计划，并任汉粤川铁路督办。又组建中华工程师会，设事务所于汉口，被举为会长。1919年初，以交通部技监与汉粤川铁路督办身份，出任美、英、法、日等国组

成的监管西伯利亚铁路及中东铁路特别委员会技术部的中国代表。4月24日病逝于汉口。著有《京张铁路工程纪要》、《华英工学字汇》等。

【谭人凤】（1860—1920）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字石屏，又字符善，晚年自号雪髯，原名有符。湖南新化人。早年中秀才，参加洪门组织。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县城创办小学，自任校长，召集江湖党友，待机起事。事泄，遭当局追捕。1906年东渡日本入同盟会。12月回国策应萍浏醴起义，未果，复至日本，入东京法政学校学习。1908年初赴安南，协助孙中山策动南方起义，参与镇南关（今友谊关）、云南河口等处起义，失败后重返日本。1910年（宣统二年）夏在日本东京召开11省区同盟会分会负责人会议，主张在中国中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次年参与筹划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与湖北同志策划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促进了武汉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又至上海，与宋教仁、陈其美共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任总务部长。武昌起义爆发，赶至湖北协助军政府工作，旋返湖南催湘籍革命党人援鄂。又赴武昌，担任军事指挥。同年11月独立各省代表在汉口召开第一次会议，被推为议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表示反对南北议和，主张继续举兵北伐，并在上海组织北伐机关。1912年先后任粤汉铁路督办、长江巡阅使，授陆军上将。“宋案”发生后回湖南策动反袁（世凯）。失败后逃往日本。时孙中山、黄兴意见分歧，他力促内部团结。1916年回国参加护国、护法运动。后寓居上海养病以终。著《石叟牌词》。

【朱执信】（1885—1920）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原名

大符，以字行。广东番禺人，原籍浙江萧山。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入广州教忠学堂读书，1904年留学日本，攻读法政。1905年加入同盟会，被选为评议部议员兼书记。为《民报》撰文揭露清政府立宪骗局，宣传革命，反对改良。1906年1月写《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思想。同年回国，先后任广东高等学堂、法政学堂及方言学堂等校教员，秘密进行革命活动。1908年与赵声、邹鲁等策划广州起义，事泄未成。1910年（宣统二年）谋划广州新军起事，复败。次年参加广州黄花岗之役，随黄兴攻入督署，事败后避居香港。辛亥革命后先后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广（州）阳（江）军务处督办、广东审计院院长。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日本，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护法运动中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军事联络，掌管机要文书。五四运动后协助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等，并参与创办《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1920年为驱逐桂系军阀赴广东联络民军，被桂系军阀杀害于虎门。遗著编为《朱执信集》。

【严复】（1853—1921）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字又陵，又字几道，晚号愈懋老人，初名宗光。福建侯官（今闽侯）人。1866年（同治五年）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1877年（光绪三年）被派赴英国学习海军。其间，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政治学说发生浓厚兴趣，广泛阅读达尔文、亚当·斯密、卢梭、孟德斯鸠、边沁、赫胥黎等人的著作，调查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制度。1879年回国，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次年，被李鸿章调至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后升任总办。为获得科举出身，从1885年起，奔波于福建和北京两地，9年中参加4次乡试，均名落孙山。甲午战

败，使他深受刺激，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批判封建专制思想和封建文化，主张开民智、设议院、广泛学习西方。又译述赫胥黎的《天演论》（今译名《进化论与伦理学》），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警醒国人，救亡图存，发生极大影响。1897年10月，与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西学，鼓吹维新变法，为维新派主要舆论阵地之一。百日维新期间受到光绪皇帝召见，奏报办理海军及学堂事，并建议采取稳妥变法步骤。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心情悲痛，决心倾力译介西学，开启民智。先后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名学》、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比较系统地传播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文化，起到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翻译态度严谨，所立“信、达、雅”的翻译标准颇得赞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避居上海，为挽救时局，参加组织中国国会，为副会长。1901年赴天津主持开平矿务局。1902年任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总办。1905年在上海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后任校长。旋因开平矿务诉讼赴英国，在伦敦会见孙中山，仍坚持改良，反对革命。1906年任安庆高等师范学堂监督。1908年任审定名词馆总纂。1910年（宣统二年）任海军协都统，又被征为资政院议员。1912年任北京大学堂总监督，后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袁世凯摘录战事新闻数万言。在政治上反对共和政体，主张君主立宪。1915年参与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效命，却又拒绝公开发表鼓吹帝制的文字。在文化上反对新文化运动，主张尊孔读经，认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1921年病逝乡里。临终前手缮遗嘱一通，内言“中国必不亡，旧法可

损益，必不可叛”，概括了晚年的思想。著译有《严复集》、《严译名著丛刊》。

【严几道】即“严复”。

【郑观应】(1842—1922) 中国近代思想家、企业家。字正翔，号陶斋，别号罗浮侍鹤山人，原名官应。1858年（咸丰八年），应童子试未中，旋奉父命赴上海学经商。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担任买办，又自己经营贸易，投资轮船公司等近代企业。1880年（光绪六年）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次年任上海电报局总办。1881年，辞去太古洋行总理职务，到轮船招商局专任帮办，全力同外国人进行“商战”，企图实现“富强救国”的理想。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奉调赴广东会办湘军营务，曾往西贡、缅甸、新加坡等地侦察敌情。后又奉命为支援台湾防御事务奔走。次年隐居上海，在旧稿《易言》基础上扩写《盛世危言》，表述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要求发展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资产阶级文化教育，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度。1891年起，先后担任开平矿务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经营颇为得法。90年代后，思想渐趋保守。拥护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敌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后，赞成共和制度，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主要著作有《盛世危言》、《罗浮侍鹤山人诗草》。今人编有《郑观应集》。

【沈曾植】(1850—1922) 中国近代诗人。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1880年（光绪六年）进士，任刑部主事，迁员外郎，擢郎中。居刑部18年，钻研古今法律书，著《汉律辑

补》、《晋书刑法志补》。后充总理衙门章京。愤于中日甲午战败，与文廷式、陈炽、黄绍箕、徐世昌等聚会北京陶然亭，评议时局，倡导西学，并参与强学会活动，赞助康有为等人变法维新。自请借英款创办东三省铁路，未果。1898年应张之洞聘，主讲武昌两湖书院。1900年与盛宣怀等策划东南互保。旋返京，调外交部。后出任江西广信知府、署督粮道、盐法道，擢安徽提学使，赴日本考察学务。1906年署安徽布政使。在皖5年，推广教育，设存古学堂，兴实业，办工厂。因触怒朝中权贵，1910年（宣统二年）托病辞官。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任，与郑孝胥、升允、劳乃宣等谋图复辟，代拟《复位奏稿》、《行政大略》、《第一诏书》等文件，鼓吹清帝复位。张勋复辟时，授学部尚书。他为学兼综汉宋，而深于史学掌故，后专治辽、金、元三史，于西北舆地、南洋变迁沿革也有涉猎。擅长诗文，强调“因诗见道”，以能通经学、玄学、理学为诗，好用佛典，堆砌词藻。书法亦负盛名。被奉为一代儒宗，同光体的魁杰。著有《海日楼文诗集》、《曼陀罗咒词》、《蒙古源流笺证》等。

【伍廷芳】（1842—1922）中国近代外交家。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生于新加坡。幼随父归国居广州。入香港圣保罗书院。1861年（咸丰十一年）毕业，任香港高等审判厅翻译。1874年（同治十三年）赴英国习法律，后回香港担任律师，并受香港政府聘任为法官兼立法局议员。1882年（光绪八年）为李鸿章幕僚，协助办理洋务。1896年被清政府命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1899年奉命同墨西哥签订《中墨通商条约》。1902年应召回国，授四品候补京堂衔，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与沈家本共同主持修订法律，拟定了

民刑律草案。1907年再次出任驻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公使，两年后回国。武昌起义后，在上海宣布赞成共和，致函清廷，劝告清帝退位。上海光复后，与陈其美、张謇等组织“共和统一会”，又被光复各省推为临时外交代表，与各国交涉。旋任南方民军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派出的北方代表唐绍仪举行南北议和谈判，达成袁世凯迫清室退位，赞成共和，即选袁为大总统的妥协。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司法总长。临时政府北迁，退居上海，先后被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推为首领，并被共和党列为理事，未就职。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1916年出任段祺瑞内阁外交总长，次年代总理，旋因拒绝副署解散国会令解职出京。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时，出任外交部长，兼财政部长。1922年被孙中山命为广东省长。陈炯明发动叛变时，坚持与孙中山合作，适此时，突然病发逝于广州。著有《伍秩庸先生公牒》。

【张勋】（1854—1923）清末民初封建军阀首领。字绍轩。江西奉新人。1884年（光绪十年）在长沙投清军当兵，1891年升为参将。1894年随四川提督宋庆至奉天。次年入袁世凯新建陆军，任工兵营管带。1899年随袁赴山东镇压义和团，升副将、总兵。1902年后，多次充当光绪帝、慈禧太后扈从。1906年调奉天，任奉军辽北总统。1908年任云南提督，旋改甘肃提督，仍留奉天驻防。1910年（宣统二年）接统江防营，驻守浦口。次年8月，任江南提督。武昌起义爆发后，率军与起义新军激战于南京雨花台、紫金山、天宝山等地，搜捕屠杀革命党人。江浙革命联军攻克南京后，他退守徐州，任清廷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不断向革命军挑衅。袁世凯窃得大总统后，所部改编为武卫前军，驻山东兖州，为表示效忠清廷，他

及所部皆保留发辫，时人称之为“辫帅”和“辫子军”。1913年7月，奉袁世凯命率军南下镇压国民党的二次革命，攻陷南京，纵兵焚掠3天，被袁任为江苏督军。12月转任长江巡阅使，移驻徐州。1915年所部改称定武军。次年任安徽督军，所部扩编为57营，约2万人。袁世凯死后，他召集各派军阀会议于徐州，自命13省区联合会盟主，积极策划清帝复辟活动。1917年“府院之争”期间，他以调停为名，率军入京，迫令黎元洪解散国会。6月30日晚，指挥“辫子军”占据北京车站、邮电局等要地。7月1日凌晨拥废帝溥仪复辟，自封为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帝制复辟失败后，于13日逃入荷兰使馆，受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缉。次年10月被北洋政府特赦。1921年被任命为热河林垦督办，未赴任。1923年9月12日病死于天津。

【朱尔典】（1852—1925） 英国外交官。出生于爱尔兰巴罗，毕业于贝尔法斯特皇家学术研究所和皇家学院。1876年（光绪二年）来中国，充英国驻华使馆翻译生。1889年任英国驻华使馆书记官，1896年调赴朝鲜，任英国驻朝鲜总领事、代办。1906年调升驻华公使。1911年（宣统三年）为北京公使团领袖。在任期间积极推行掠取中国路矿权利、入侵中国西藏、干涉和破坏辛亥革命、支持袁世凯复辟等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鼓动北洋军阀对德宣战，又扶植亲英美的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权，扩大内战。1920年奉调回国。

【孙中山】（1866—1925）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在日本时化名中山樵，后以中山为名。广东

香山（今中山）人。

青少年时代 10岁入塾读书。1878年随母亲到檀香山，居兄孙眉家中，先后进英、美教会所办学校读书，初步接受资产阶级文化教育。1884年到香港求学。1886年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校学医。次年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先后结识陈少白、杨鹤龄、尤列，经常聚谈，放言反清。1892年毕业后，先后在澳门、广州行医，结交同志，酝酿反清。

早期革命活动 1894年春赴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改革建议，遭到拒绝。10月赴檀香山，创立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到达香港，与辅仁文社的杨衢云等联络，成立兴中会总会。准备在秋天于广州发动起义，事泄，逃亡日本。在横滨设兴中会分会。后赴美英等国考察。1896年10月在英国伦敦被清政府驻英使馆人员诱捕，幸经康德黎等营救脱险。留居伦敦，研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接触到社会主义运动和有关学说。1897年秋重到日本，广泛结识日本朝野人士，争取其支持中国革命。次年秋，与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谈判合作，因康、梁坚持改良主义立场，未能成功。1900年10月组织惠州（今惠阳）三洲田起义，失败后又远涉重洋。先后到日本、越南、檀香山、美洲、欧洲，在留学生和华侨中宣传革命，组织队伍，并同改良派展开论战，坚持共和革命的立场。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与黄兴、宋教仁等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其他反清团体和革命分子，组成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通过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0月26日《民报》创刊，为撰发刊词，将十六字纲领解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

为建立中华民国而奋斗 同盟会创立后，孙中山一面领导与

改良派论战，一面发动武装起义。论战获得了巨大胜利，使许多人摆脱改良派的影响，转向革命；而起义接连受挫，从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到1911年（宣统三年）4月黄花岗之役，先后7次起义全部失败。武昌起义后，于12月25日从欧洲回到上海，29日被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组织临时政府。由于革命党人的妥协，被迫于2月13日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推荐代表大地主大买办利益的袁世凯接任。4月1日，正式解职。

失败后的探索和斗争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任理事长。9月接受袁世凯任命，任全国铁路督办。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主张武力倒袁。7月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次年7月，鉴于国民党涣散，另组中华革命党，任总理，准备“再举革命”。1916年5月，从日本回到上海，发表讨袁宣言，反对“洪宪帝制”。袁世凯死后，为反对段祺瑞废弃《临时约法》而斗争。1917年8月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护法军政府），任海陆军大元帅，揭起“护法”旗号。次年，因受桂系军阀排挤，被迫辞职。此后寓居上海，继续撰写《建国方略》。

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 1919年10月，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命粤军逐走桂军，重返广州。次年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正式政府，任非常大总统，筹划北伐。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仓促脱险。8月到上海。此后接受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思想发生极大变化。1923年2月在驱逐陈炯明后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并邀请苏联的政治及军事顾问到广州，帮助中国革命。11月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宣言，确认联俄、联共和扶助

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6月在广州创建黄埔军校，组织东征军和北伐军。10月镇压广州商团叛乱。11月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商讨国是。年底到北京，积极筹备召开国民会议。因积劳病剧，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遗著编为《孙中山全集》。

【孙文】即“孙中山”。

【孙逸仙】即“孙中山”。

【张謇】（1853—1926）清末实业家、立宪派领袖。字季直，号啬庵。江苏通州（今南通）人。生于富裕农家，16岁中秀才。后入庆军吴长庆幕中办理公文。1882年（光绪八年）随庆军赴朝鲜。1885年中举人，掌教江苏选青、瀛州书院。1894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甲午战争爆发，他上疏痛劾李鸿章误国，力主“以战求和”。次年弃官，致力于实业与教育。在署两江总督张之洞支持下，在通州招股创建大生纱厂，自1900年起，陆续开办通海垦牧公司、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天生港轮步公司、资生铁冶厂、广生油厂等企业。1902年始办新式学堂。先后创办通州师范、女子师范、南通学院、盲哑学校、伶工学社等各类学校及通州图书馆、博物苑、剧场等文化设施。对南京高等师范、吴淞中国公学、上海复旦大学的创立，皆予赞助。受到清廷嘉奖，被学部奏任为中央教育会会长，颇负时名。在清末立宪运动中居于重要地位。1901年发表《变法平议》，提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方案。1904年代张之洞、魏光燾草《拟请立宪奏稿》，并翻刊日本宪法。1906年与汤寿潜、郑孝胥等江、浙、闽立宪派人士筹组预备立宪公会，任副会长。1909年（宣统元年）当选江苏谘议局议长，联络各省谘议

局，发起国会请愿运动，并两次赴京上书，要求设立责任内阁。1911年5月曾赴彰德与袁世凯晤谈时局。武昌起义后，他见大势所趋，归附共和，支持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被推为江苏临时议会议长。1912年1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旋托词辞职。先后发起建立中华民国联合会和统一党，并联络各方，向孙中山施加压力，支持袁世凯。1913年任熊希龄内阁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至1915年袁世凯推行帝制，辞职南归。此后，在南通地区经营以实业和教育为中心的地方自治。思想趋于保守，抵制新文化运动。著有《张季子九录》、《张謇日记》、《啬翁自订年谱》。

【祝大椿】（1855—1926） 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家。字兰舫。江苏无锡人。1872年（同治十一年）到上海，在铁业作坊学徒。1885年（光绪十一年）开设“源昌”商号，经营煤铁及五金零件，利润丰厚。1888年创办上海第一家机器碾米厂——源昌碾米厂，规模庞大，产品行销华北、东北及国外。购置轮船，来往于新加坡、上海、日本之间。1900年进入怡和洋行充当电光公司买办。与人合资创办华兴面粉厂，日俄战争期间获大利。1904年起，先后创办了源昌缫丝厂、龙章造纸厂、怡和源打包厂、苏州振兴电灯厂、公益纱厂等，在房地产业有大量投资，还握有许多华商银行的股权。1905年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坚持反帝爱国立场，成为上海工商界知名人物，当选为上海商务总会董事。1907年捐得二品顶戴。辛亥革命后又创办多家电灯厂、面粉厂、纱厂等。1926年7月死于车祸。

【孙毓筠】（1869—1926） 民国初年政客。字少侯。安徽寿州

(今寿县)人。孙家鼐族侄孙。秀才出身。曾纳资捐得同知和三品道台。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曾任同盟会总部庶务科总干事。不久奉派回国,在家乡创办学堂,旋又与同乡段云、权道涵等到南京策动新军,准备响应萍浏醴起义。后因事泄被捕,被判以5年监禁。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后获释,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1912年3月任安徽都督,7月赴京任临时参议院议员、总统府顾问等职。“二次革命”失败后,投靠袁世凯。1913年11月任政治会议议员。次年3月任约法会议议长。5月任参政院参政。1915年8月,以“研究学术”为名,与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任副理事长,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护国战争结束后,以帝制祸首被北京政府通缉,避入天津租界。1918年被赦免。晚年信佛。

【赵尔巽】(1844—1927) 清末民初政客。字公镶,号次珊,又号无补。汉军正蓝旗人。祖籍山东蓬莱。同治进士,历任安徽、陕西各省按察使,甘肃、新疆、陕西布政使。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任山西巡抚,次年调任湖南巡抚。1904年署户部尚书。1905年出任盛京将军。1907年改充湖广总督,不久调督四川。1911年(宣统三年)改任东三省总督。辛亥革命爆发后改总督衙门为奉天保安会,自任会长,企图阻止革命。民国成立后任奉天都督,旋辞职,退居青岛。1914年被袁世凯聘为清史馆总裁,主持《清史稿》编纂工作。袁世凯称帝,被尊为“嵩山四友”之一。张勋复辟时被提名为弼德院顾问大臣。1925年任善后会议议长,临时参议院院长。

【李平书】(1854—1927) 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家。号瑟斋,晚号

且顽，原名安曾，更名钟珏。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优贡出身。1883年（光绪九年）在上海为《字林沪报》笔政。1885年以知县用，历官粤、鄂10余年。1903年任江南制造局提调、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上海招商局、江苏铁路局董事等。主持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师局，兼办商团。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后参与领导光复上海之役，任沪军都督府民政总长兼江南制造局总理、江苏都督府民政长。二次革命时任上海保卫团团长，反对孙中山起兵讨袁。不久赴日本，1916年回国，在上海主持倒袁运动。后任上海市公所总董，致力于地方自治。1927年病逝于昆山。著有《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上海论》等。

【李佳白】（1857—1927） 美国来华传教士。美国纽约人。1882年（光绪八年）毕业于纽约协和神学院，受美国长老会派遣来华。先在山东习中文和实习传教。后脱离长老会活动，参加广学会，为督办。1894年任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特约记者。与北京官僚士大夫交结。1895年加入康有为等人组织的强学会，企图对维新运动施加影响。1897年在英美驻华公使窦纳乐、田贝的赞助和李鸿章、翁同龢等的支持下创立尚贤堂，以拉拢中国上层人士，推行文化侵略。1900年出任八国联军翻译，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1902年决定在上海建立活动基地，次年在上海重建在义和团运动中被焚毁的尚贤堂。公开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清朝专制统治辩护。先后组织中外商务联合会、中外教务联合会。1911年（宣统三年）创办《尚贤堂纪事》。武昌起义后，反对推翻清政府。1912年10月被陈焕章等聘为孔教会高等顾问。后竭力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1917年因干涉中国内政被驱逐出境。1921年再度至北京恢复尚贤堂。次年创办《国际公报》（周刊），又组织中外睦

谊会等团体，吸收清末遗老参加。对五卅运动及省港大罢工抱敌视态度。著有《中国排外骚乱的根源》、《中国一瞥》、《中国，被控制的还是自由的？中国纠纷的研究》等。

【康有为】（1858—1927）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字广厦，号长素，原名祖诒。广东南海人。青年时跟从著名学者朱次琦学习理学，讲求经世致用。1879年（光绪五年）游历香港，深感西方人治国有法度，遂留心钻研西学，逐渐产生改良思想。中法战争后，有感于国势日危，于1888年利用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向光绪皇帝上书，建议变法。1890年初，在广州会见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受其影响，信奉今文经学。此后，把今文经学的某些理论、观念——“三世”、“三统”、“素王”、“改制”等和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相糅合，构成维新变法理论。1891年起在广州长兴里收徒讲学，培养了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维新运动骨干。在弟子们的协助下，写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前者宣布古文经典都是伪经，后者宣传变法改制。1895年赴京参加会试，时值《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即联合各省在京举人发起“公车上书”，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7月创办《中外纪闻》，8月组织强学会，不久南下成立上海强学分会，出版《强学报》，积极推动变法运动。1897年11月，闻知德国强占胶州湾，即赶赴北京上书，力陈变法图存。次年1月，应诏上《统筹全局折》，提出“开制度局”等建议。4月，组织保国会，以救国图存相号召，并策动帝党官员上书，敦请变法。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变法诏书。此后，不断上奏和进呈所著书籍，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都提出改革建议，企望逐步变封建主义中国为资本主义中国。其建议多为光绪皇帝采纳，以诏令发布。9

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因被通缉，逃亡日本。1899年7月，在加拿大组织保皇会，继续鼓吹实行君主立宪。1900年乘国内发生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之机，策动组织自立军勤王，终致失败。1902年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美化清帝，诅咒革命。此后遍游欧美亚，考察各国政俗风情，发展保皇会。1906年，为呼应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改保皇会为宪政会。1911年（宣统三年）10月，在日本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赶写《救亡论》和《共和政体论》，反对民主共和，主张“虚君共和”。次年指示门徒陈焕章在上海创立孔教会。1913年回国，被推为孔教会会长，大搞尊孔复辟活动。与张勋秘密联络，准备拥戴溥仪复辟。1917年7月溥仪复辟，受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复辟失败后，退出政治活动，致力宣传孔教。1926年3月在上海创立天游学院，宣讲“天游学”。1927年病死青岛，临终前向清逊帝溥仪谢恩，表示忠诚。一生著述丰富。近年出版有《康有为全集》、《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丛刊》等。

【康南海】即“康有为”。

【叶德辉】（1864—1927）中国近代学者。字奂彬，一作焕彬，号直山，又号郅园。湖南湘潭人。1892年（光绪十八年）中进士，授吏部主事。次年返乡里，从事著述，常干预乡曲，为劣绅。思想守旧。1897年与宾凤阳等肆意诋毁湖南的维新运动。撰成《輶轩今语评》、《长兴学记驳义》、《非幼学通议》、《读西学书法书后》等，逐一批驳维新派观点，攻击康有为的今文经说是“野说”，是“以民主之说倡乱天下”。又与王先谦等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要求整顿时务学堂，斥退在学堂中任教的梁启超等，以端正学术。1900

年，奉新任湖南巡抚俞廉三指派，编成《觉迷要录》，为“康梁逆案之定讞”。1910年（宣统二年）湖南米荒严重，他与其他地主豪绅积囤谷米，激起饥民抢米风潮，被清政府削籍。1927年大革命时被杀。长于史学，尤精版本、目录学。校刊、编著有《元朝秘史》、《观古堂书目丛刊》、《书林清话》、《邨园丛书》等。

【唐继尧】（1882—1927） 民国初年滇系军阀首领。字冀赓。云南会泽人。1904年（光绪三十年）以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振武学校，再入日本士官学校。留日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年（宣统元年）回国后，先后任云南督练公所提调、讲武学堂教官、监督、新军管带等职。1911年，蔡锷等发动云南起义后，被任命为军政府军政、参谋两部次长。1912年3月率滇军攻占贵阳，坑杀大批已缴械的黔军。5月被袁世凯任为贵州都督。1913年10月，蔡锷被袁调京后，他继任为云南都督兼民政长。1915年10月接受袁一等开武侯爵。12月25日，与蔡锷等人联名宣布云南独立，组织讨袁护国军，以都督名义兼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1916年5月，遥领滇、黔、粤、桂、浙五省联合成立的广东肇庆军务院抚军长。护国战争期间，将原护国军3个军扩充为8个军，并向四川扩张。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东发动护法战争，他与桂系军阀陆荣廷勾结，串通非常国会部分议员，改大元帅负责制为七总裁合议制，排斥孙中山的领导。1920年川滇战争期间，因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以士兵厌战为名撤兵回滇，被迫于1921年2月通电辞职，逃至香港。次年春，他以重金收买驻桂滇军及滇南土匪头子吴学显，击败顾品珍，再次控制云南军政大权。鼓吹“联省自治”，自称川、滇、黔、鄂、赣、豫、陕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1926年，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他与吴佩孚、孙传芳勾结，宣传

“反共”、“讨赤”。次年2月6日，其部下昆明、蒙自、昭通、大理四镇守使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廷选联合通电，指责其“全出独裁，势同专制”，举兵进逼昆明，他被迫下台，担任有名无实的省务委员会总裁。不久病亡。

【傅兰雅】（1839—1928） 清末英国来华传教士。出生在英国海德城一个牧师家庭，伦敦海伯雷师范学院毕业。1861（咸丰十一年）年来华，就任香港圣保罗书院校长，并成为传教士。后在北京同文馆、上海英华学堂任教，兼任《上海新报》编辑。1868年（同治七年）受聘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译员。在华20多年间，独译或与他人合作译成的西书共129部。译书涉及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军事科学、社会科学等门类，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天文、地理、数学、理化、医学及交通、航海、工艺制造、采矿、冶金、教育、外交等方面的知识。所译著作的传播，扩大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冲击了社会上的守旧观念。在徐寿等人的帮助下，于1876年（光绪二年）创办上海格致书院，并于1885年开设格致书室（即书店），出售具有实用知识的图书和期刊。主编《格致汇编》，介绍西方科技成就，刊登科技新闻，为中国近代最早的科技期刊之一。1896年辞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职务，应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聘请，担任其东方语言文学教授。其间，继续与中国友人保持联系，为江南制造局再译成14部西书，以私人名义资助在中国开办盲童学校。著有《美国加邦大书院图说》、《接纳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章程》、《教育瞥人理论法》、《中国教育名录》等。

【辜鸿铭】（1857—1928） 中国近代学者。名汤生，以字行。别署汉滨读易者，晚称读易老人。祖籍福建厦门。出生于马来亚华

侨世家。自幼受西式教育，及长留学欧洲，游英、德、法、意、奥等国。获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文学硕士学位。1880年（光绪六年）返马，一度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服务。后居香港，转攻中国语文，治儒家经典，中学遂大进。中法战争期间，经人引入张之洞幕府，任洋文案，历时20年。1905年经张之洞举荐出任黄浦江浚治局督办，后授外务部员外郎，旋晋郎中，擢左丞。1910年（宣统二年）清廷以其“游学专门列为一等”，赏文科进士。不久，辞外务部职，出任南洋公学校长。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仍蓄辫。1917年卷入张勋复辟。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聘为教授，主讲英国诗歌和拉丁语。坚持批评西方文化，宣扬儒教救世论，不满新文化运动。1928年被张宗昌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未及到任而病逝。治学精通中西，学术观点保守，维护儒学体系和中国传统文化。其英译《论语》、《中庸》，汉译《痴汉骑马歌》为当时所称诵。著有《尊王篇》、《春秋大义》、《读易草堂文集》、《紧迫的呐喊》等。近人辑有《辜鸿铭文集》。

【陆荣廷】（1859—1928） 民国初年桂系军阀首领。字干卿，原名亚宋。广西武鸣人。中法战争爆发后，投唐景崧部下当兵。战后被裁汰，不数年成为中越边界地区绿林武装首领。1893年（光绪十九年），所部为广西提督苏元春招抚，任管带。1905年，升巡防营统领。1907年以镇压镇南关起义，升右江镇总兵，旋改左江镇总兵。1911年（宣统三年）晋广西提督。11月7日广西通电独立后附和共和，被推为副都督、都督。他在“桂人治桂”旗号下，网罗旧军官陈炳焜、谭浩明、沈鸿英、莫荣新及旧官僚、立宪派等，逐渐形成桂系军阀集团。镇压了响应二次革命的柳州起义后，被袁世凯授予耀武上将军。他在骗取袁大批饷械后，于1916年3

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讨袁。袁世凯死后，他进兵广东，7月被段祺瑞命为广东督军。次年4月，升任两广巡阅使，操纵两广军政大权，桂系军队扩充至5万人，成为西南地区的最大军事力量。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广东组织护法军政府。陆一面与进入湖南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等勾结，一面与唐继尧勾结并串通非常国会部分议员，将军政府的大元帅负责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排斥孙中山的领导。1921年初，孙中山号召讨陆，桂军刘震寰部首先倒戈，掌握桂军主力的沈鸿英宣布“自治”，他被迫通电辞职，旋逃至上海。1922—1923年，他召集旧部夺取了桂林和柳州，就任北洋政府委任的广西军务督理。1924年5、6月间，桂军李宗仁部和黄绍竑部等通电讨陆，不久，通电下野。

【杨增新】（1864—1928）清末民初官员。字鼎臣。云南蒙自人。清同治三年（1864）正月二十八日生人。幼在蒙自求学，少聪颖，取秀才，24岁时参加会试，考取贡生。25岁时参加殿试举为进士。起初被任命为甘肃中卫知县，河州知府，1900年擢升为甘肃提学使兼武备学堂总办。1907年调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兼督练公所参议官。1911年调任镇迪道兼提法使。中华民国成立后，被任命为新疆都督兼民政长。紧随袁世凯，在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支持袁世凯，是少数几个支持称帝的官员之一，并受封为一等伯爵。作为统治新疆17年的军政首脑，杨基本采取保守的态度，以不变应万变，同时力抗沙俄侵略，维护新疆及中国领土完整。他先用所谓“和平谈判”手段，取消了在辛亥革命中成立的伊犁临时革命政府，以新疆都督兼行伊犁将军事。时值沙俄急剧向外扩张，首要目标即为中国，新疆首当其冲。他作为新疆都督，力主反击，派兵击败沙俄的侵略军，平息边疆叛乱，并改阿勒泰特区为阿山道，

纳入中央行政管理范围，完成了新疆的统一。他统治新疆，奉行“无为而治”的政策，注意整顿吏治，肃清贪官腐败，认为为政之道在于“消患未萌”，体现了一定的为民思想。同时他在新疆针对兵员为多的情况，力主裁减冗员，并学习左宗棠等方法，提倡垦荒，开发荒地，力行做到自力更生，并实行奖励，对于开发边疆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作为一名受封建儒家思想教育出来的官员，思想极为保守，反对新生事物，对于辛亥革命后的新变化，持反感态度。提倡封建迷信，阻挠兴办学校和科学文化的传播，以闭关自守和愚民政策统治新疆。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新疆的发展。对外国侵略力行反抗。1928年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同年7月7日被政敌刺杀。著有《补过斋文牍》、《补过斋日记》等。

【西摩尔】（1840—1929） 英国侵略军首领。英国沃里克郡金沃顿人。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里之侄。1852年入英海军学校及皇家海军学院。1854—1856年参加对俄的克里米亚战争。1857年（咸丰七年）作为海军候补军官来华，在其伯父西马糜各里的旗舰上服役，参加了进攻广州的战斗。次年又参加进攻大沽炮台的战役。1860年被提升为上尉，再次参加英法联军对大沽炮台的进攻。1862年（同治元年）随英军进攻浙江太平军，配合清军攻陷宁波、嘉定等地。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底，任英国驻华舰队司令。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6月10日，他率英、法、美、俄、德、意、日、奥八国联军2000余人，从天津出发，分乘火车向北京进犯。在廊坊、杨村一带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阻击，被迫撤回天津租界。此后一个月中，参与组织联军固守租界和进攻天津城的战斗。9月底至10月初，指挥列强海军占领了秦皇岛、山海关等地。1901年8月卸任返回英国。1910年退役。

【梁启超】（1873—1929）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17岁中举人。1890年（光绪十八年）秋，师从康有为，受改良主义思想影响。1895年进京参加会试，与康有为一起联络在京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又协助康有为创办《中外纪闻》，宣传西学。参与发起强学会，任书记员。1896年8月，赴上海任《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等多篇文章，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宣传维新变法。1897年11月，赴长沙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又和谭嗣同等创办南学会，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1898年春到北京，联络各省在京举人先后上书请求拒俄变法、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协助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保国会，宣传“保国保种保教”。百日维新开始后，被光绪皇帝召见，赏六品卿衔，办理译书局事务。受总理衙门委托，仿照日本学校制度，草定京师大学堂规章。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一度主张联合孙中山，共同反对清朝专制统治，因康有为干预，未成。1898年底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保皇维新。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一面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进行思想启蒙；一面宣传立宪保皇，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论战。他坚持改良，反对暴力革命，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制度，甚至主张“开明专制”，遭到革命派激烈批判。1907年10月在东京创立政闻社，以呼应清政府的“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后回国，先后加入共和党、进步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拥护袁世凯。出任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后改任币制局总裁。1914年12月辞职，避居天津。1915年针对袁世凯复辟帝制阴谋，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变更共和政体。并策动蔡锷起兵反袁。1917年7月，反对张勋复辟，为段祺瑞讨伐张勋起草檄文。1919

年五四运动后，专心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晚年在清华讲学。一生著述宏富，涉猎甚广，举凡政治、经济、哲学、法律、历史、新闻、文学艺术、语言、宗教，无所不论，且多有独见。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任公】即“梁启超”。

【程德全】（1860—1930）清末民初官员。字纯如，号雪楼。四川云阳人。幼随父读书，执教业。1890年（光绪十六年）出川游历，至京入国子监，肄业。次年入黑龙江副都统文全幕，后入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幕。1900年任黑龙江营务处总办，奉派与俄国军队交涉，颇富胆识，升道员，简放齐齐哈尔副都统。1905年署理黑龙江将军，黑龙江建省后改任巡抚。不久以病辞职。1909年（宣统元年）出任江苏巡抚。以革新自命，与立宪派人士张謇等过从甚密，支持立宪派的主张，与其他督抚一起，要求设立责任内阁，从速召开国会。武昌起义后曾镇压江苏民众的反清斗争，与张謇共草挽救时局奏疏，电请清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以抵制革命。上海光复后转谋自保，与革命党联系，宣布独立，出任江苏都督。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内务部总长。旋卸苏督职，与章太炎、张謇组建统一党、共和党。游于革命党人与袁党之间。“二次革命”时先宣布江苏独立，后战事失利，向袁妥协，派人捉拿黄兴，并向袁世凯请求辞职，遂获准许。自此退出政界，寓居上海、苏州，闭门诵佛。1926年受戒于常州天宁寺，法名寂照。病逝于上海。有《程中丞奏稿》、《抚吴文牍》等。

【王士珍】（1861—1930） 清末民初北洋军将领、国务总理。字聘卿，号冠儒。直隶（今河北）正定人。早年入正定镇镇标当兵，后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任随营炮队学堂督办。1894年（光绪二十年）随直隶提督叶志超入朝鲜，参加牙山战役。在平壤之战中，所率炮队射击精确，给日军很大杀伤。《马关条约》签订后，属直隶提督聂士成驻芦台，统领榆关炮队。1895年入袁世凯新建陆军，先后任督操营务处会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右翼第3营步队帮统兼步队学堂监督、工程营管带、德文学堂监督等。与段祺瑞、冯国璋并称“北洋三杰”。1903年以袁世凯保奏，任清练兵处军学司正使。1905年北洋六镇编成，以军学司正使署第六镇统制。后又署陆军部右侍郎。袁世凯被罢黜后，他以病辞职。武昌起义爆发后，出任袁世凯内阁陆军大臣。1914年入京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授陆军上将衔，后任陆军总长。在袁复辟帝制过程中，他态度消极。1916年袁死后，曾任段祺瑞内阁参谋总长、李经羲内阁陆军总长等职。参与了1917年清帝复辟。11月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次年3月，在皖、奉等军阀势力逼迫下解职。在军阀混战时期，多次以北洋元老身份调停其间。

【谭延闿】（1880—1930） 中国近代政治活动家。字组庵，号畏三。湖南茶陵人。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同年回湖南办学，结交士绅。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组织“湖南宪政公会”，积极参与立宪活动。1911年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任主席，并与汤化龙等发起成立“宪友会”。武昌起义后任参议院院长、民政部长。焦达峰、陈作新遇害后被举为湖南都督。1912年加入国民党，任湖南支部长。1913年二次革命中为形势所迫宣布中立，暗中阻挠反袁。1916年被北京政府委为湖南省长兼督军，提倡“湘

人治湘”。1917年9月辞职。1918年在桂系军阀支持下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排挤湘军总司令程潜，集湖南军政大权于一身。1920年被赵恒惕逼下台。192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后依附蒋介石，历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等职。

【杨度】（1875—1931） 中国近现代政治活动家。字皙子，别号虎公、虎禅师等，原名承瓚。湖南湘潭人。光绪举人。曾师从国学大师王闿运。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以自费生入日本弘文书院速成科留学，与黄兴、胡汉民、杨笃生同学，并共同创办月刊《游学译编》，宣传西方政治学说及民族革命等。归国半年后，1903年再次东渡日本，入法政大学速成科。次年被推举为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与梁启超交往密切。1906年曾为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草拟各国立宪情况的报告等。次年1月，与熊范舆、薛大可等创办月刊《中国新报》，任主编，鼓吹君主立宪。1910年（宣统二年）奏请速开国会并赦免梁启超等戊戌党人。曾任清皇族内阁统计局局长之职。武昌起义爆发后，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副大臣，于1911年11月15日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向资政院建议南北双方停战议和，召开临时国会解决国是。12月以北方议和代表参赞名义，参与南北和谈。1914年任袁世凯参议院参政及参议院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15年8月与孙毓筠、刘师培、胡瑛等人发起组织“筹安会”，任会长，为袁复辟帝制制造舆论。1916年7月，讨袁护国战争结束后，被北京政府以帝制祸首通缉，避居天津。1918年3月被赦免。此后，他的思想发生显著变化。1922年后开始追随孙中山，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投身于民主革命斗争。1927年李大钊被捕后，曾设法营救。1929年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不公开党员身份参加了鲁迅、田汉、胡

鄂公等所发起的“自由大同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左翼团体。

【廖平】（1852—1932） 中国近代经学家。字季平，号四益（译）、五译、六译，原名登廷。四川井研人。早年读私塾，通经史。1874年（同治十三年）中秀才。两年后以优等补廪生，入成都尊经书院，从王闿运治今文经学。1879年中举人。1889年中进士，选授龙安教授，历任射洪安岳教谕、绥安府学教授、尊经书院襄校等职。于今文经学多有发明。戊戌政变后，四川学政吴郁生以康有为学出于廖说，乃劾其逞臆说经，革职交地方官管束。锡良出任四川总督，聘请其主讲学堂。1913年代表读音统一会赴北京，归任国学专门学校校长。1921年兼高等师范、华西大学教授。因患中风症，归乡养疾以终。其治经以今文为宗，兼治古今，颇明两汉经师家法，富于创新。一生经学凡六变化：初变分今古学（1883—1886），二变尊今抑古（1887—1897），三变分大小统（1898—1901），四变分人学天学（1902—1912），五变融合天人大小为一（1912—1918），六变发明《诗》、《易》天学哲理（1919以后）。有的见解突破旧经陈言束缚，敢于标新立异，于维新变法运动有启迪的作用；有些则沉迷天学，远离实据，遂流于荒诞。著述甚丰，计成118种。多属经学著作，医学次之。主要有《今古学考》、《孔经哲学发微》、《六变记》、《王制集说》、《地球新义》等，自编为《六译馆丛书》。

【王照】（1859—1933） 清末官员。字小航，号水东。直隶宁河（今属河北）人。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改任礼部主事。经中日甲午战争，感到国势日危，决心办教育救国。1898

年春，与徐世昌等在京创办八旗奉直第一号小学堂。百日维新期间，上书建议光绪皇帝亲奉慈禧太后“巡幸中外”，首先到日本考察。书请礼部代递。礼部尚书怀塔布不肯代递，后勉强代递，却同时上奏攻击他“咆哮公堂”。光绪皇帝阅折后，命将阻挠上书言事的礼部六堂官全部革职，而表彰他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后补。此后帝后党争急速加剧。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与康有为、梁启超多有不合。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秘密潜回。1901年有旨开复原衔。但已无意官场，专心宣传推广他设计的拼音字母，坚持10年之久，传习至13省。著有《方家园杂咏记事》、《小航文存》等。

【岑春煊】（1861—1933） 清末民初政客。字云阶，号炯堂老人，原名春泽。广西西林人。光绪举人。历任光禄寺、太仆寺少卿、广东布政使、甘肃布政使。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率兵“勤王”，护送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至西安，升陕西巡抚。后任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1907年任邮传部尚书，丁未政潮后被解职。武昌起义爆发后起用为四川总督，未赴任，电请清廷组织共和政府。1912年被袁世凯任为福建宣慰使。1913年改任汉粤川铁路总办。“二次革命”中参与反袁，被免职。1916年策动南方各省独立，迫袁退位。1918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与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任主席总裁。1920年被粤军驱逐，退居上海。1933年4月病故。著有《乐斋漫笔》。

【李经方】（1855—1934） 清末外交官员。字伯行。安徽合肥人。原为李鸿章四弟之子，后过继给李鸿章，为长子。举人出身。早年曾赴欧洲各国游历考察。1890年（光绪十六年）任出使日本大

臣。1892年回国后，随李鸿章办理外交，任秘书与翻译。1895年3月，以使团参赞名义，随李鸿章赴日本马关同日方代表伊藤博文等就中日甲午战争议和。李鸿章在日被暴徒枪击受伤后，他出任钦差全权大臣，继续同日方交涉谈判。5月19日，受命为商办割台事件特派全权大臣，与美国顾问科士达同赴台湾办理交割手续。因惧怕台湾人民反对割让台湾，不敢上岸，于6月2日在停泊于基隆海面的日本军舰上，同日本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匆匆在《交收台湾文据》上签字。1896年随李鸿章赴俄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并参与《中俄密约》的谈判与签订。1904年充商约大臣。1907年以候补四品京堂任出使英国大臣。1910年（宣统二年）回国。次年署邮传部左侍郎。

【陈少白】（1869—1934）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号夔石，原名闻韶。广东新会人。1888年（光绪十四年）入广州格致书院，后于香港结识孙中山，拜盟为兄弟，追随孙从事反清革命。1895年参与组织香港兴中会总部，筹备广州起义，未举事败，逃亡日本。1897年至台湾，设立兴中会分会。1899年奉孙中山命回香港创办《中国日报》，任社长兼总编辑，宣传革命思想，与保皇派报刊笔战，并出版《中国旬报》。同时加入会党，联络会党力量，促成哥老会、三合会与兴中会首领在港会晤，共同组成兴汉会，选举孙中山为总会长，他为实际主持人。次年，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他在港负责接济。又组织“振天声剧社”，编排进步剧目，宣传民族主义，并亲自为剧社编写了《自由花》、《鸣不平》等剧本。1905年香港同盟会成立，被举为会长，参加香港各界抵制美货运动和维持粤汉路权的斗争。1906年《中国日报》社改组，辞社长职，又辞同盟会分会长职。热衷于经营企业，曾任香港商工局顾

问及四邑轮船公司司理。1911年（宣统三年）广东光复，出任广东都督府外交司长，未几辞去。后组织粤航公司、上海保险公司。1921年被孙中山聘为总统府顾问，不久辞职返乡。病逝于北平。著有《兴中会革命史要》、《兴中会革命史则录》等。

【蒲殿俊】（1876—1934）清末立宪派领袖。字伯英，又字沚庵。四川广安人。1904年（光绪三十年）中进士，授法部主事，旋赴日本留学。1906年约集四川省留日学生组成“川汉铁路改进会”，任会长，提出川汉铁路改归商办的主张。1908年回国。1909年（宣统元年）四川谘议局成立，当选为议长。次年创办《蜀报》，任社长，鼓吹速开国会。进京参加国会请愿，成为立宪派中颇有影响的首脑人物。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向列强出卖路权，激起民众反对。他与罗纶等发起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领导会众争路权，被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导致保路同志军起义。武昌起义后获释，坚持和平请愿，反对革命，指责保路同志军为“祸毒”。不久，出任赵尔丰在成都成立的“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年底，因赵策划旧军叛乱，民军入城，另组军政府，他被迫辞职。1913年当选众议院议员。后创办并主持北京《晨报》，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1917年7月段祺瑞二度组阁时，任内务部次长兼市政公所督办。12月辞职，从此脱离政界。

【段祺瑞】（1865—1936）北洋军阀皖系首领。字芝泉，晚号正道老人，原名启瑞。安徽合肥人。1885年（光绪十一年）考入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毕业后赴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任北洋军械局委员等。1896年被袁世凯调至新建陆军，任炮队统带兼随营学堂监督。1902年6月任北洋军政司参谋处总办，负责编练北洋军，

曾率兵镇压景廷宾起义。次年年底，任清练兵处军令司正使，加副都统衔，被称为“北洋三杰”之一。先后任常备军第三镇翼长、第四镇统制、河间秋操北军总统、第三镇统制兼督理北洋武备各学堂、保定军官学堂总办、陆军各学堂督理、会考陆军留学毕业生主试大臣等。袁世凯被罢黜后，他于1909年（宣统元年）12月被调充第六镇统制。次年12月调任江北提督，加侍郎衔，驻江苏清江。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任第二军军统。11月署湖广总督并任第一军军统兼领湖北前线各军。次年年初，领衔北洋将领46人致电清廷，“请立定共和政体”，以武力支持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窃夺革命果实。3月任袁世凯北京政府陆军总长。1913年一度代理国务总理，调兵镇压二次革命，后又署理湖北都督兼领河南都督，调兵镇压白朗起义。因对袁总揽大权、复活帝制不满，于1915年5月称病辞职。次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后，先后出任参谋总长、代国务卿兼陆军总长。袁死后，以国务总理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成为皖系军阀首领，以北洋派正统首领自居。1917年围绕对德宣战问题，与黎元洪展开“府院之争”。他一面鼓动皖系督军威胁国会和总统黎元洪，一面策动张勋武力驱逐黎元洪并解散国会。张勋复辟后，他在天津附近的马厂誓师讨伐。张勋败逃后，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自命“再造共和”的功臣，组织安福国会，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以对德参战为名，出卖国家主权，向日本大量借款，扩大皖系的军事实力。1920年直皖战争中，皖军战败，他通电辞职，退居天津日租界，派人联络广东的孙中山和奉系军阀张作霖，酝酿反直三角同盟。1925年2月，悍然召开以军阀、官僚为主的“善后会议”，抵制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次年3月18日，唆使卫队枪杀赴执政府请愿的爱国学生，制造了死伤百余的三·一八惨案。4月20日，被迫下

台，退至天津租界。1933年移居上海。

【章太炎】（1869—1936）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学者。初名乘，后名炳麟，字枚叔，因仰慕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本号绛）和黄宗羲（字太冲），更名绛，号太炎，后以号行世。浙江余杭人。少年时代从外祖父和父亲习诵儒家经典。1890年（光绪十六年）入杭州诂经精舍，从朴学大师俞樾学习经史。1895年受甲午战败的刺激，为挽救民族危机，投身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寄费报名加入康有为创立的强学会。1897年赴上海，任《时务报》撰述，宣传改良思想。尊信古文经学，不赞成康有为提倡的今文经学和孔教，常与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等发生争执。后愤而离开《时务报》馆，往返于沪、杭间，参与《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笔政。次年春到武昌，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筹办《正学报》，因政见不合被逐。遂赴上海，主持《昌言报》。9月戊戌政变发生，他遭通缉，被迫避地台湾，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撰文抨击慈禧太后等封建顽固派。次年夏，赴日本，结识孙中山。1900年7月，参加唐才常发起的中国国会，因反对其既“排满”又“勤王”的矛盾主张，当场剪辮示绝。此后大力倡言排满革命。1902年春再度逃亡日本，与孙中山订交。与秦力山等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手撰大会宣言，号召推翻清王朝。1903年6月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批驳康有为的改良主义观点，指斥光绪皇帝，传诵一时。又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誉之为“义师先声”。《序〈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摘录先后在上海《苏报》发表，引发“《苏报》案”，被捕入狱。1906年6月出狱，赴日本参加同盟会，任《民报》主编，与改良派论战，使革命思想广泛传播。1908年10月

《民报》被日本政府查禁后，居东京讲学和著述，撰有《文始》、《小学答问》、《方言》、《国故论衡》等。因与孙中山在武装起义地点的选择、《民报》经费和续办等问题上有分歧，于1909年（宣统元年）和陶成章重组光复会，与同盟会分道扬镳。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到上海，鼓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求解散同盟会。次年1月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名统一党，5月与民社等合并为共和党，任副理事长。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受聘为总统府高等顾问。次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毅然投入反袁行列，遭到袁世凯软禁。1917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任秘书长。五四运动后渐入颓唐，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救国。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致电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遗著编为《章太炎全集》。

【章炳麟】即“章太炎”。

【赛金花】（约1872—1936）中国近代名妓。原名傅彩云。江苏盐城人。早年居苏州，家境贫寒，被卖为妓。1887年（光绪十三年）被状元洪钧纳为妾。同年，洪钧出任驻俄国、德国、奥地利、荷兰4国公使，她随之出国。1890年与洪钧归国。未久，洪氏病死。1894年潜至上海重新为妓，取名曹梦兰。后到天津，改名赛金花。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居北京石头胡同为妓。世传曾与联军总司令瓦德西有过接触。1903年因虐待幼妓至死被判刑，解至苏州。出狱后一度在上海居住。晚年生活潦倒，病死于北京。其经历颇具传奇色彩，成为小说、戏曲所表现的题材。清末小说家曾朴撰写的《孽海花》便是以她的事迹为素材创作的。

【陈三立】（1852—1937） 中国近代诗人。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光绪朝进士。曾任吏部主事。戊戌变法时期，协助其父湖南巡抚陈宝箴提倡新学，推行新政，父子并主维新。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变法失败，与父均被革职，归居南昌，以诗自娱。1904年参与创办江西铁路公司，后又与汤寿潜等发起组织中国商办铁路公司。民国后，以清朝遗老自居，列名于孔教会、中华民国联合会。日寇侵华后，守民族大义，拒任伪职。1937年七七事变后，忧愤国事，旧病复发，拒不服药，绝食5日而死。作诗初学韩愈，后学黄庭坚，追求生涩，好用奇字深典，喜造僻词拗句，被称为同光体中的“生涩奥衍”派。与夏敬观、华焯、胡朝梁等远承宋代的江西派，以黄庭坚为宗，形成近代同光体中的江西派。著有《散原精舍诗》、续集、别集及《散原精舍文集》。

【熊希龄】（1870—1937）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字秉三。湖南凤凰人。幼颖悟，有“湖南神童”之称。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1897年返长沙，协助陈宝箴、黄遵宪等推行新政，任时务学堂总理，主持校务，参与“南学会”及《湘报》的组建筹划。戊戌政变后，被革职，永不叙用。后经湖南巡抚赵尔巽、端方等奏请，免永不叙用处分，于1905年充任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随行参赞。回国后，先后任奉天农工商总局总办、江苏农工商总局总办、东三省清理财政正监理官、全国农务联合会主席、奉天盐运使、东三省屯垦局会办、奉天造币厂总办等，有“理财能手”之名。辛亥革命爆发后，自奉天赴上海，会见黄兴、宋教仁等，表示拥护共和政体。1912年4月任唐

绍仪内阁财政总长，不久辞职。次年2月赴热河任都统。曾任统一党、进步党理事。1913年7月，出任袁世凯北京政府国务总理，提出选择阁员“不问党不党，只问才不才”的口号，与梁启超、张謇、汪大燮等组成所谓“名流内阁”。他组阁后，虽在政治上主张以法治国，惟法是从，划清国务员与总统府的权限等，在军事上主张建立中央正规军与地方警备队等；在经济上主张改革税制、取消厘金、整顿金融、统一币制、平衡国家预算等一系列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但也曾支持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副署了袁世凯解散国民党的命令，追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徽章等。不久又副署了袁世凯解散国会的命令，充当了袁的工具，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914年2月被解职。1917年初，任平政院长、政务评议会评议员。后曾在直隶京畿从事督办河工，济贫抚孤等。于1920年成立“香山慈幼院”。1928年任国民党南京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1931年九一八及次年一二八事变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与红十字会人员从事救护工作。遗著编为《熊希龄集》。

【唐绍仪】（1860—1938） 中国近代国务活动家。字少川。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父巨川为茶商。幼到上海学习外语及洋务知识。1874年（同治十三年）由清政府选派留学美国，经中学升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1881年（光绪七年）回国，在天津水师洋务学堂读书。1885年任职天津税务衙门。1900年升津海关道。1904年以全权大臣身份两次与英国代表交涉西藏问题，签署《续订藏印条约》，使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地方的领土主权。历任外务部右侍郎，沪宁、京汉铁路总办、邮传部左侍郎等职。1907年出任奉天（今辽宁）巡抚。武昌起义后充任袁内阁全权代表，与民军代

表伍廷芳在上海谈判议和，为达成协议做出贡献。1912年3月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后，任第一任国务总理。为标榜政党内阁而加入同盟会。因愤袁氏专横，辞职离京。寓居上海，任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反对“洪宪”复辟。1917年赴广州参加护法，任护法军政府财政部长。次年被推为七总裁之一。1919年任南方军政府总代表与北京政府代表举行南北议和，未果。对1927年成立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持观望态度。1931年陈济棠、汪精卫在广东成立反蒋（介石）政府时，任常务委员，兼中山模范县县长。1934年被迫离开。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合流，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日寇侵占上海、南京后，欲拉拢其为汉奸，未就，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杀于家中。

【铁良】（1863—1938） 清末官员。字宝臣。满洲镶白旗人。初为直隶总督荣禄幕僚，后任户部、兵部侍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赴日本考察军事，归国后任练兵大臣，继任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曾受袁世凯提携，一度被视为袁氏爪牙，但他深于种族之见，认为汉人久掌兵权非根本之计，竭力设法削弱袁世凯的势力。1910年（宣统二年）后为载涛、良弼所排挤，出任江宁将军。辛亥革命时率张勋所统之巡防军守南京，抗拒苏浙联军，兵败逃匿。后投靠日本，在青岛、大连等地进行复辟活动。

【马相伯】（1840—1939） 中国近代教育家。原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晚号华封老人。原籍江苏丹阳，生于丹徒（今镇江）一个天主教徒家庭。早年进法国人办的依纳爵公学（徐家汇公学），1862年（同治元年）入徐家汇天主教耶稣会小修院，受“神修”训练。1870年获神学博士，经教会授职为神甫。1872年担任徐汇公

学校长，教学之余，研究哲学及数理科学，译书百余卷。1877年（光绪三年）被清政府委任潍县机械局要职，次年又奉李鸿章命调查山东矿务。1881年出任驻日公使馆参赞，旋改任驻神户领事。同年秋以兄病回国，仍在李鸿章手下供事。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1905年创办复旦公学。1907年应梁启超之请，参加立宪派组织政闻社，任总务员。1909年（宣统元年）被选为江苏省谘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后居北京4年，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并担任政治会议、约法会议议员和参议院参政。反对袁世凯称帝活动。1916年与人发起“信教自由会”，著文驳斥定孔教为国教。“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发表抗日言论，被尊为爱国老人。1932年参加宋庆龄、鲁迅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7年抗战爆发后，担任国民党政府委员。后移居越南凉山。所著大多收入《马相伯先生文集》。

【徐世昌】（1855—1939）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总统。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天津人。幼年丧父，家境败落，成年后为家馆教师。1879年（光绪五年）与袁世凯结为兄弟，得资助，北上应试。1882年中举人。1886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1897年12月，经袁世凯奏请兼管“新建陆军”营务处，成为袁的重要谋士。1904年任署兵部左侍郎。次年授军机大臣、督办政务大臣，再调任巡警部尚书。1906年偕同载振赴东北考察后，上《密陈通筹东三省全局折》，主张把东三省改设行省。次年4月，出任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1909年（宣统元年）1月，袁世凯被黜后，被内召为邮传部尚书兼津浦铁路督办大臣。次年复任军机大臣，授体仁阁大学士。1911年5月任清皇族内阁协理大臣。辛亥革命爆发后，力主起用袁世凯，暗中参与袁的逼宫密谋。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于1914年5月出任国务卿。1915年10月辞职，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自称“水竹村人”。1917—1918年，周旋于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张勋之间，于1918年10月被由皖系控制的安福国会选为总统。上台后标榜“偃武修文”，以“文治总统”自命，下令停止对南方作战。次年2月力主召开南北议和会议。1919年“五四”时期，支持亲信创办“四存学会”，发行《四存月刊》，攻击新文化运动，鼓吹尊孔读经。在北洋军阀各派系的混战争斗中，他施展权术，左右逢源，操纵各派，维持权位。1922年6月被直系赶下台。此后，隐居天津英租界。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拒绝日本要其出任华北伪政权傀儡的要求。1939年6月6日病逝。编著有《清儒学案》、《大清畿辅先哲传》、《颜李丛书》、《水竹村人诗集》等，其奏议函牍大多收入《东三省政略》、《退耕堂政书》。

【古德诺】（1859—1939） 袁世凯聘请的外国宪法顾问。美国人。1882年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1891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后又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1913年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宪法顾问。次年11月，在纽约发表题为《中国新约法论》的演讲，攻击孙中山等制定的《临时约法》不合中国国情，认为袁世凯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更为合乎中国历史传统。1915年8月，他在《亚细亚日报》上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认为中国大多数人知识水平不高，没有研究政治的能力，“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公开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出谋划策。

【孙武】（1880—1939）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字尧卿，原名葆仁。湖北夏口（今汉口）人。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入

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后历任湖南新军教练官、岳州威武营管带等职。1900年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避走两广。1903年回鄂，加入革命小团体科学补习所，分工运动军队和会党。事情败露后，1904年10月东渡日本，入成城学校，学习海军。仅3个月，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退学归国，加入日知会。1907年夏再赴日本，入大森军事讲习会。为推动长江流域的反清起义，参与创立共进会，被推为军务部长。次年冬，归国组织共进会湖北分会，任主盟。1909年（宣统元年）在汉口设立共进会总部，联系军、学两界，侧重发动会党。1910年赴香港，加入同盟会。后返鄂，着重运动新军。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后，主张在武昌发难，主动与蒋翊武领导的文学社联合，部署新军起义，被举为起义指挥部参谋长。10月9日配制炸药时，失慎燃爆受伤，避入法租界医院。10日武昌起义后，被举为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长。在谋取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次长时受挫，于是发起组织民社，与同盟会立异。袁世凯乘时授以大总统顾问、中将、上将等虚衔。后转入颓唐，不问政治。

【蔡元培】（1868—1940）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1889年（光绪十五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中日甲午战争后受维新思潮影响，于1898年9月回绍兴，兴办教育，提倡新学，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八国联军侵华后，萌生反清思想。1901年到上海，先后任南洋公学教员、爱国女校校长。与章太炎等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1902年游历日本。回上海后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校，宣传民主思想，鼓吹排满革命。1903年参与创办《俄事警闻》（后改名《警钟日报》），揭露沙俄侵占中国东北的野心，借

以鼓吹革命。1904年与陶成章等创建反清团体光复会，任会长。1905年在上海加入同盟会，任上海分部主盟人。1907年赴德国留学，研究哲学、美学、文学、心理学。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后归国。次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下令学校取消读经课程，要求编写新式教科书。2月，任迎袁世凯南下专使，赴北京未果。临时政府北迁后，继续任教育总长，努力建立新教育体制。7月，因不满袁世凯专权，与同盟会阁员一起辞职，再赴德国留学。1913年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回国参加反袁斗争。后去法国从事译著，并与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华法教育会。1916年冬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兼容并包主义”为办学原则，提倡科学、民主，主张思想自由，反对封建文化，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1919年，支持学生“五四”爱国运动，为营救被捕学生多方奔走。1923年抗议北洋政府非法逮捕北大教授而辞职。旋赴欧洲从事学术研究。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后历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监察院院长、兼代司法部长。1932年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任副主席。1937年移居香港。1939年任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会长。次年在香港病逝。遗著编为《蔡元培全集》。

【蔡子民】见“蔡元培”。

【马君武】（1881—1940）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字厚山，原名道凝。广西桂林人。早年入广西体用学堂习英文，受唐景崧薰陶。继赴广东求学。后得友人协助，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赴日本，入京都帝国大学。次年与章炳麟等在东

京发起组织“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鼓吹排满革命，并译介西书，向国人进行启蒙宣传。1905年参加同盟会，参与《民报》的创刊、编辑工作。1906年回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任教务长。因遭清朝当局通缉，流亡欧洲，入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毕业获工学博士学位，并授工程师职称。武昌起义后，以沪军都督府代表出席各省代表会，与雷奋、王正廷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孙中山任命为实业部次长，因该部总长张謇未到任，代理部务。继被推举为参议员。不久，孙中山主持全国铁路公司，任为秘书长。“二次革命”起，复入德国柏林农科大学，担任一化学工场工程师。袁世凯死后，始返国。历任广州护法政府交通部部长、无烟药厂总工程师、大元帅府秘书长、广西省省长、司法部总长等职。他于教育事业尤为热心，在忙于政务的同时，历长上海大夏大学、北京民国大学、北京国立工业大学、上海中国公学。1927年筹办广西大学，被聘为校长。工于诗文，曾用旧诗格律译拜伦、歌德、席勒等人作品。著有《马君武诗稿》，译著有《矿物学》等多种。

【吴兆麟】（1882—1942）清末新军军官。字畏三。湖北鄂城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投武昌新军工程营当兵，后考入工程营随营学堂、工程专门学校学习。1905年加入革命小团体日知会。次年考入参谋学堂，毕业后任第八镇工程营左队队官。1911年（宣统三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夜，被起义士兵推为临时总指挥，即部署起义军坚守楚望台军械库，进攻总督府。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任参谋部长、民军战时总司令等职。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大元帅府总参谋长。袁世凯窃取政权后，授以陆军中将，并任首义同志会理事会主席。后退出军界，致力于社会事

业。晚年潜心佛法。抗日战争期间，拒绝日本侵略者的利诱，避居乡间。病逝后，重庆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

【欧阳竟无】（1871—1943） 中国近代佛学家。原名渐，以字行。江西宜黄人。秀才出身。早年入南昌经训书院，博涉经史，兼攻天文、历数。甲午战后，专攻陆王心学，期以挽救人心。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南京谒见杨文会，遂皈依佛教。不久在宜黄创办诚志学堂。1906年出任广昌县教谕，因母病故，隐居九峰山守丧。次年南京从杨文会学佛。后东渡日本访求中国古典佚著，学习密宗佛法。归国后在广州优级师范任教。1910年（宣统二年）再到南京从杨文会学唯识、瑜伽宗。杨逝后任金陵刻经处编辑。1912年与李证刚等在北京、南京组织佛教会。长驻南京刻经处，从游弟子有吕徵、黄忏华、陈铭枢等。1918年刻成《瑜伽师地论》。1922年在南京设中国内学院，创讲《唯识抉择谈》。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等皆出其门下。1924年增办法相大学，后因经费困难而停办。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支持抗日爱国救亡运动，发表抗日言论。1937年抗战开始后，迁居四川，设支那内学院蜀院于江津。晚年主要从事有关佛学方面的撰述，为著名的佛教居士。生平著作多已散佚，存者为《竟无内外学》30余卷。

【丁开嶂】（1870—1945）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字小川，号卧龙先生，原名作霖。河北丰润人。京师大学堂第一班毕业。1904年（光绪三十年）日俄战争爆发，潜赴东北，联络志士，创“抗俄铁血会”，袭击俄军。翌年组织“华北救命军”，要求清政府停止科举、革除弊政、速定宪法。1906年加入同盟会，改“华北救命军”为“革命铁血会”。1911年（宣统三年）黄花岗起

义失败后，积极在华北筹谋举事。武昌起义后，被湖北军政府任为铁血军长，策动山海关内外响应革命。滦州起义时曾亲率敢死队赴援，受阻而退。复召集各路将领集议天津，被推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北部民军临时大元帅。清帝退位后，任同盟会本部评议员。1918年赴沪与孙中山晤谈，受命策划北方革命。1932年任国民政府政府议员。著有《中国建国方针》、《收复东北大计划》等。

【李烈钧】（1882—1946）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字协和，别号侠黄，原名烈训。江西武宁人。幼读书习武。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入江西武备学堂，后赴日本，先后在东京振武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07年加入同盟会，并参加留学生组织的武学社、丈夫团等反清团体。1908年回国，任江西混成协第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次年赴昆明，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兼兵备道提调，升任陆军小学堂总办。在学堂和军队中进行革命活动。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后返九江，谋起义，被推为江西都督府总参谋长。布署占领长江要塞炮台，迫使停泊九江的清舰队宣布起义。旋率舰队援安庆，被推为安徽都督。又援武昌，任苏皖粤鄂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攻打北洋军。1912年改任江西都督。1913年3月“宋案”发生后，力主武力讨伐袁世凯，6月被袁撤职，7月12日在湖口起兵，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转赴欧洲。1915年冬返云南，参与发动护国战争，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1917后辅佐孙中山进行护法战争，任大元帅府参谋长。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5年被聘为国民军总参议，表示赞许西山会议派主张。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参院院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

【周学熙】（1866—1947） 中国近代实业家。字缉之、止庵，号松云、斫耕。安徽建德（今东至）人。光绪举人。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奉袁世凯命在天津筹办直隶银元局，1903年赴日本考察实业，归国后在直隶创办工艺局，督办官银号。1905年署天津道。后历任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工商部参丞。1906年在唐山建成启新洋灰公司，次年建成北京自来水公司、滦州官办矿业公司。民国初年任财政总长，1913年奉袁世凯命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在舆论压力下辞职。1915年再次出任财政总长，倡行烟酒公卖及清理官产，倡议中国实业银行与大宛农工银行，还在天津、青岛、唐山、安阳开办华新纱厂等企业。是民国初年北方财政、实业界的著名代表，与南通张謇并称“南张北周”。1925年退出实业界。著有《习古堂丛稿》等。

【柏文蔚】（1876—1947）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字烈武。安徽寿县人。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在南京组织强国会，策划反清，事泄后走安庆，入武备学堂。1905年在芜湖任安徽公学教员，与陈独秀等成立岳王会。不久到南京任第九镇二十三标二营管带，加入同盟会。与孙毓筠等谋炸两江总督端方，事败逃亡关外，任吉林屯田营管带。1911年（宣统三年）与蓝天蔚等策划在东北起义。武昌起义后经上海到秣陵关，联络第九镇新军攻南京。南京光复后任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北伐联军总司令。1912年任安徽省都督兼民政长。1913年6月因反对袁世凯大借外债而被袁免职。7月宣布安徽独立，与江西都督李烈钧及黄兴等发动“二次革命”，旋事败，东渡日本。1915年赴南洋募集军资。1917年归国参加护法运动，任川鄂联军总指挥。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政府委员等职。

【萨镇冰】(1858—1952) 中国近代军事家、政治家。字鼎铭。福建侯官(今福州)人。福州水师学堂毕业。1877年(光绪三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1879年回国,历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海圻舰管带、北洋水师统领。1905年擢升广东水师提督总理南北洋海军。1909年(宣统元年)随载洵赴欧美、日本考察海军事务,回国后任海军统制。1911年武昌起义后奉命率舰队赴鄂镇压,因官兵同情革命,辞职赴上海。1912年任吴淞商船学校校长,1913年改任淞沪水陆警察总办。1917年任北京政府海军总长,1920年一度代理国务总理。1922年起任福建省长。1927年受聘为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高等顾问。1933年支持李济深反蒋,任福建人民政府委员兼省长。抗日战争期间在南洋宣传抗日,抗战胜利后回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载沣】(1883—1952) 清宣统朝摄政王。字亦云,爱新觉罗氏。满族。袭封醇亲王,光绪皇帝之弟,宣统皇帝生父。曾任正白旗汉军都统、正红旗满洲都统、军机大臣等职。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被派充头等专使赴德国。为其驻华公使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谢罪”。1908年光绪皇帝病逝,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年号宣统,他为摄政王,主持朝政。1909年(宣统元年)罢免袁世凯,组建禁卫军,代溥仪任陆海军大元帅,任命弟弟载洵和载涛分别为海军大臣和军谘大臣,集军政大权于皇族之手。1911年5月组成责任内阁,因内阁成员中皇族占多数,被称作“皇族内阁”,引起广泛不满。又重用大买办出身的盛宣怀,以铁路国有为名出卖路权,导致“铁路风潮”,并引发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为镇压

南方革命军，被迫起用袁世凯。12月辞职，退回藩邸，一切大权交袁世凯。清朝覆亡后，1928年移居天津，伪满洲国成立后一度去东北。

【吴稚晖】（1865—1953） 中国近代政治家。原名眺，又名敬恒，别署舐庵，以字行。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早年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任教于北洋大学。次年执教上海南洋公学。1898年元旦上书左副都御史瞿鸿禨，请转呈变法建议。1901年4月东渡日本，就读日本东京高等师范。是年冬同钮永建回国，筹办广东大学堂及广东武备学堂。次年再渡日本，因驻日公使蔡钧不允保送江苏、浙江、江西九名自费生入成城学校，出而力争，被课以“妨害治安”罪名驱逐出境。回上海后，以演说、演戏宣传革命，并参与创办爱国学社。1903年在《苏报》撰文抨击清廷。《苏报》案发后经香港去伦敦。1905年冬参加同盟会。1906年在巴黎参与组织世界社，1907年刊行《新世纪》周刊及《世界画刊》，鼓吹无政府主义。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后归国，授教育总长职不就。1913年任教育部读音统一会议长。同年6月参与创办《公论》日刊，进行反袁斗争。二次革命失败后再赴欧洲。1915年在法国参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提倡以工兼学。1916年回国，任《中华新报》主笔。1921年率学生100余人赴法国，出任里昂大学中法校长。次年任商务印书馆国语传习所所长。1923年8月在上海撰文参与科学与玄学论战。1924年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5年11月出席西山会议，被推为预备会议主席，反对国共合作。1927年2月任国民党上海委员会委员，4月提出“查办共产党案”，并通电“护学救国”，积极参与蒋介石“清党”活动。后历任国民革

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国语推行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53年10月30日病逝于台北。著作编为《吴稚晖先生全集》。

【吴敬恒】即“吴稚晖”。

【王宠惠】（1881—1958）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外交家、法学家。字亮畴。原籍广东东莞，生于香港。父煜初为基督教牧师。早年入香港圣保罗学校，继入皇仁书院。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堂法科。1901年赴日本留学，专攻政法，转赴欧美留学，获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并取得英国律师资格，被德国柏林比较法学会接纳为会员。1904年在纽约晤孙中山，协助孙用英文撰写了对外宣言（即《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揭露清朝黑暗统治，呼吁世界人民支持中国革命。次年加入同盟会，参与筹措经费、发展会员的工作。1911年9月由欧洲回国。时武昌起义发生，赴上海，被沪军都督陈其美聘为顾问，以参赞身份随伍廷芳参加南北和议谈判。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外交总长，继任唐绍仪内阁司法总长，不久辞职，改充外交部顾问。又往上海，任中华书局英文编辑部主任，兼任孙中山所办铁路总公司顾问。1913年受聘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从事法学研究。袁世凯称帝前曾派人收买，被拒绝。1917年后在北洋政府内先后担任法律编纂会会长、大理院院长、法官刑法委员会会长、法理讨论会会长等职。1921年与施肇基等同被派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回国后任司法总长。1922年署理国务总理。次年被国际联盟选为海牙常设国际法庭正

法官，赴荷兰就任。回国后出任北洋孙宝琦内阁司法总长、修订法律馆总裁等职。1926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历任司法部长、政府委员、司法院院长、外交部长、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29年再次被国际联盟选为海牙法庭正法官。1945年代表中国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创立会议，参与制订联合国宪章。1949年至香港，后赴台湾。病逝于台北。著有《宪法平议》、《宪法危言》、《比较宪法》等。

【张元济】（1867—1959） 中国近现代出版家。字菊生。浙江海盐人。1892年（光绪十八年）中进士，由庶吉士改刑部主事，任总理衙门章京。中日甲午战争后，产生改革思想，常和文廷式、陈炽等人在北京陶然亭聚会，议论朝政。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与陈昭常、张荫棠等创设通艺学堂，“专讲泰西诸种实学”。又受总理衙门委派，为光绪皇帝选购新书。百日维新时，受光绪皇帝召见，就办学堂、培养人才等事有所建言。又应诏上书《痛陈本病统筹全局以救亡折》，建议设议政局、融满汉之见。戊戌政变时被革职，永不叙用。遂出京赴上海，在南洋公学办理译书事宜，任公学总理。后加入商务印书馆，任总经理，经营得法，成绩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有《校史随笔》、《涵芬楼烬余书录》等。

【钮永建】（1870—1965）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字惕生。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光绪举人。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入湖北武备学堂，1898年留学日本，入士官学校。1903年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任特派员，回国运动袁世凯对俄作战，遭清

廷通缉而再返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旋赴广西筹备讲武学堂和陆军小学堂，并在上海创办军事学校。1910年（宣统二年）因清廷下令逮捕而走避香港，去德国，入陆军大学。1911年回国，任松江军政府分府都督。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谋次长，代行参谋总长职务。同年8月任国民党荣誉顾问。二次革命时率军攻打江南制造局，失败后逃亡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次长，以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国民政府秘书长、江苏省政府主席、内政部长、考试院副院长、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主席等职。1947年任总统府资政，1949年去台湾。1958年后定居美国。

【熊秉坤】（1885—1969）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字载乾。湖北江夏（今武昌）人。早年在店铺学徒。1904年（光绪三十一年）弃商从戎，在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营当兵，后升为正目。1911年（宣统三年）4月加入共进会，被指派为营代表，在营中发展会员200多人，积极参与武昌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10日夜，在原来的起义领导人因暴露而出走的危急关头，率营首先发难，打响了第一枪，占领楚望台军械局，又组织敢死队攻入总督府。16日，民军扩编，受命为新建第五协统领，参加汉阳、汉口战斗。次年3月任第五旅旅长。10月，袁世凯授以陆军少将。1913年“宋案”发生后，应黄兴约，发起“改进团”、倡言改进政治，反对黎元洪的袁世凯勾结，被黎悬赏缉拿，转入秘密活动，奔走于鄂、赣、苏诸省。1914年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同年秋，由孙中山委任为鄂中司令，潜回湖北组织讨袁军。护法运动期间，任广州大元帅府参军。1927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1929—1931年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委员，一度兼任武昌市长。后长期任国民党

政府参军。1946年辞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事委员会参事、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政协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

中国现当代史

政 治 事 件

【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标志。

运动爆发的基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加紧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残民统治，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27个战胜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讨论处理战后世界问题，实际是由美、英、法操纵的帝国主义分赃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代表出席会议，向和会提出取消帝国在华特权的七项希望条件和废除“二十一条”、归还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各项权利等要求，遭到拒绝。4月30日，和会操纵者在日本代表被邀参加、拒绝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议定了和约中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决定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交给日本。从2月初巴黎和会开始讨论山东问题，中国各阶层人民就展开“保持国权”的活动。巴黎和会的严

酷事实，使中国人民打消了对帝国主义宣扬的“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认识到必须自己站起来“直接解决”问题。

5月1、2日，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出后，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工业学校、中国大学、汇文大学等13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冲破阻拦，齐集天安门，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集会讲演后，举行示威游行，火烧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军阀政府派军警镇压，逮捕32人。5日，北京大专学校宣布总罢课。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19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学生们结成“救国十人团”，开展讲演、抵制日货活动，并组织护鲁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军阀政府一面为曹汝霖等开脱罪责，一面诬蔑学生爱国行动“纵火伤人”、“举动越轨”，声言要对学生进行制裁。6月3、4两日，当局对上街讲演的学生实行大逮捕，捕去近千人。从北京开始的爱国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天津、济南、太原、上海、武汉、长沙、广州、南京等地学生，纷纷举行罢课、集会、示威游行，开展讲演、抵制日货等活动。许多城市召开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大会，声援学生爱国行动。6月5日以后，运动进入新的阶段，由开始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运动，发展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泛的群众爱国运动，运动中心也由北京转移到上海。6月5日，上海工人阶级为营救被捕学生开始罢工，到11日罢工达15万人以上。同时，上海商人在“罢市救国”的口号下宣布罢市。上海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已罢课。从上海开始的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很快扩展到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

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并于6月10日宣布罢免曹、章、陆3人职务。6月28日巴黎和约签字之日，中国代表没有出席会议和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实现了惩办卖国贼和拒签和约两个直接斗争目标而告一段落。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十月革命后中国出现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起了骨干作用。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既是一个政治运动，又是一次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哺育了一代杰出人物，包括中国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后来做出重大贡献的文学家、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五四运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第二次护法运动】孙中山于1920年再次发起的以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为号召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20年10月，孙中山扶植的粤军陈炯明部打败桂系军阀占领广东。11月孙中山由上海回广州重组军政府，宣言护法。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为贯彻护法主张，孙中山提请非常国会通过北伐案，11月至桂林设立大本营，准备次年春假道湖南讨伐占据北京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孙中山的北伐主张遭到陈炯明的反对。陈身兼陆军部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等要职，握有广东实权，以“保境息民”为借口阻挠孙中山北伐，并与直系军阀吴佩孚相勾结，图谋夹击北伐军。1922年5月孙中山发布北伐令，在韶关设大本营改道从江西北

伐。6月14日，陈炯明乘北伐军平定江西之机，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包围总统府，炮击孙中山住所粤秀楼。孙中山脱险后登上永丰舰。8月被迫离粤赴沪，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

【香港海员大罢工】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中重要罢工斗争之一。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因英国资本家拒绝工人增加工资等要求，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苏兆征、林伟民等领导下举行大罢工。至1月底，参加罢工的海员和运输工人增至3万多人。港英当局于2月1日下令封闭海员工会，并玩弄“谈判”骗局，破坏罢工，引起香港各业工人和市民的公愤。3月初，海员罢工发展成为有10多万人参加的总同盟罢工。罢工工人纷纷离港回广州。3月4日，步行回省的工人队伍行至九龙附近的沙田时，英国军警向工人开枪射击，造成死6人、伤数百人的“沙田惨案”。此后，罢工继续扩大，使香港成为“死港”。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广东政府及全国工人支援下，香港海员罢工斗争坚持了56天。3月8日，罢工谈判协约签字，港英当局接受海员所提条件，罢工取得胜利。这次罢工斗争成为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中重要罢工斗争之一。1922年5月1日，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沙分部领导下，江西安源煤矿工人和株萍铁路工人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任主任，朱少连任副主任。同年秋，路矿当局拒发积欠工资，并企图解散工人俱乐部，引起工人强烈不满。9月初，毛泽东来到安源，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为加强对罢工斗争的领导，派刘少奇到安源工作。9月14日，1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并成立罢工总指挥部，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

工人总代表。罢工工人发表罢工宣言，提出保障工人权利、改善工人待遇的 17 条要求。路矿当局勾结军阀企图镇压，由于工人英勇斗争，组织严密，只得与罢工者谈判。18 日，签订了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增加工资、改善工人福利的条约。罢工取得胜利。

【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中的重要罢工斗争之一。开滦煤矿（唐山、林西、赵各庄、唐家庄、马家沟五矿）最初由官僚资本家创办，后被英帝国主义强夺。当时年产煤 400 万吨，占全国煤产量的 1/5，有工人 5 万多人。1922 年 10 月 16 日，开滦矿工向矿方提出改善生活待遇的六项要求。19 日在唐山召开工人大会，正式成立了五矿工人俱乐部。23 日，五矿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罢工开始后，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并发表宣言控诉英国资本家虐待工人的罪状，呼吁各地工人声援、支持。全国各界人士特别是工会团体，纷纷发表通电，进行募捐，对开滦工人的罢工斗争给以精神上的声援和经济上的支持。矿局资本家、直隶省警务处长杨以德、直鲁巡阅使曹锟调动大批武装镇压罢工，制造流血惨案，封闭工人俱乐部，罢工工人仍坚持斗争。11 月 15 日，开滦矿务局和直隶省警务处贴出布告，答应了工人的部分要求后，罢工宣告结束。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中罢工斗争的顶峰。京汉铁路是重要交通命脉，它的收入是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1923 年 2 月 1 日，京汉铁路工人代表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遭到吴佩孚的阻挠。总工会由郑州移至汉口江岸办公。为了抗议军阀的暴行，2 月 4 日在总工会

统一领导下，京汉铁路全线 3 万多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总工会发表罢工宣言，号召工人们为反抗万恶的军阀，争回人权及自由而战。2 月 7 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在汉口、郑州、长辛店等地血腥镇压罢工工人。有 52 人惨死，300 多人受伤，40 多人被捕，1000 多人被开除，造成二七惨案。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共产党员）、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共产党员）被捕后宁死不屈，壮烈牺牲。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工人和各阶层人民、国外侨胞和世界革命人民，纷纷声讨军阀，援助罢工工人。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罢工于 2 月 9 日结束。此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二七惨案】见“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曹锟贿选】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收买议员“当选”总统的事件。1922 年 4 月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控制了北京政权。让黎元洪复任总统，恢复民国初年的国会，标榜“法统重光”，用以欺骗人民，排斥其他派系。尔后曹锟为了攫取总统地位，采取了先驱黎后贿选的策略。1923 年 6 月，曹锟指使直系军人指责黎元洪破坏内阁制，以“国民大会”、“市民请愿”、军警索饷、围困黎宅等手段逼黎下台。黎被迫出走天津，在天津车站被扣留，交出印信并发表辞职通电后，始获放行。当时参众两院常会和宪法会议均因不足法定人数不能成会。曹锟急于“当选”总统，收买和胁迫议员出席会议。以 40 万元的高价收买了国会议长，以每张选票 5000 到 1 万元收买了 500 多个议员。10 月 5 日总统选举会召开，在军警严密监视下，是日出席议员 587 人，曹锟以 480 票“当选”为大总统。10 月 10 日曹锟就职。颁布了一部被人们称为

“曹锟宪法”、“贿选宪法”的《中华民国宪法》。曹锟贿选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受贿议员被人们斥为“猪仔议员”，很多省对该省议员接受贿选投票予以声讨，否认其代表身份，有的宣布开除其省籍。上海、杭州、芜湖等地举行了讨曹集会游行。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警告列强不得承认曹锟政府。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4—1927年国共合作进行的以打倒北洋军阀为直接目标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国共合作。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于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了革命武装，平定了商团叛乱，稳定了广东革命政权。国共合作的建立，直接推动了工农运动和各界群众运动的发展。1925年爆发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在革命高潮中，广东革命势力成立了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举行了两次东征和南征，统一了广东全省。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国民党新右派代表人物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于1926年3月和5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进攻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

1924—1926年间，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各派军阀为争夺北京中央政权和地盘混战不已。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推倒了直系统治，成立了由皖系军

阎段祺瑞任执政的临时执政府。北洋军阀形成奉系张作霖、直系吴佩孚和原属直系后自成一派的孙传芳三大势力。段祺瑞和奉系相结合，对内镇压人民革命斗争，对外向帝国主义屈膝妥协。国共两党在全国发动了反奉倒段群众斗争。1926年3月段祺瑞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

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7月11日占领长沙，8月下旬在湖北咸宁汀泗桥、贺胜桥两次战役中击溃吴佩孚主力，10月10日攻克武昌。11月上旬占领九江、南昌，歼灭孙传芳主力。12月18日占领福州，1927年3月19日占领杭州，24日占领南京，进逼上海。北伐的胜利进军，极大地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到1927年二三月，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20万发展到200万。汉口、九江的工人、市民驱逐英帝国主义者，收回了两地租界。上海工人阶级先后举行三次武装起义，于1927年3月22日解放了上海。与此同时，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到1927年3月，全国农会会员达到500万人。广大农民推倒地主政权，解除地主武装，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开展减租减息减押斗争，猛烈冲击各种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从北伐战争开始不到10个月，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主力部队，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黄河流域，北洋军阀统治走向末路。

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一面增兵上海，炮轰南京，以武力相恫吓，一面分化革命阵营，寻找新的代理人。在帝国主义的拉拢、支持下，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相勾结，1927年4月发动四一二政变，在其控制的地区举行反共“清党”。7月15日武汉汪精卫集团召集“分共会议”，

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最后失败。

【平定商团叛乱】广东革命政府镇压反动武装广州商叛乱的事件。广州商团原为广州商人在辛亥革命后成立的自卫组织，后被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所收买，发展成为以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佛山大地主陈恭受为头目、拥有 10 个团 4000 人的反动武装。1924 年 8 月 10 日，广州革命政府查获并扣留了商团非法偷运的向外商定购的大批枪械。商团出动 2000 多团丁包围孙中山的大元帅府，索取枪械，胁迫广州及全省商民罢市。英国派军舰 9 艘集中白鹅潭进行恫吓。9 月中旬，孙中山率北伐军离开广州到韶关后，由于陈廉伯的煽动，各地买办商人、豪绅地主趁孙中山不在广州，纷纷集会，肆意攻击革命政府，并向国际联盟指控孙中山。10 月 10 日，当广州人民为纪念武昌起义举行游行时，商团公然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袭击游行队伍，打死工团军 20 余人，打伤和逮捕数十人，并构筑炮台，封锁市区，遍贴“驱逐孙文”、“打倒孙政府”等标语，准备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孙中山在工农群众支持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心采取断然措施镇压商团叛乱。10 月 10 日成立镇压商团叛乱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亲自担任会长，特派廖仲恺、谭平山等为全权委员，命胡汉民将广州商团机关一律解散并缴械。同时调北伐军一部回师广州戡乱。10 月 15 日黄埔学生军与滇、桂、湘、粤、豫各军分兵五路进攻商团麇集的西关区，经几小时战斗，将商团叛乱活动全部镇压下去。陈廉伯、陈恭受逃亡香港。商团叛乱的平息，打击了帝国主义、军阀、右派势力，解除了广州革命政府的心腹之患。

【北京政变】又称首都革命。1924 年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北京发动的

政变。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不久被吴佩孚排挤出河南，改任徒有虚名的陆军检阅使，率部驻防北京南苑。冯玉祥是北洋军阀中具有民主思想的人物，从1920年开始与孙中山发生联系。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引起全国人民反对。在反直浪潮中，冯玉祥与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陕西暂编第一师师长胡景翼结成了反直三角同盟。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冯玉祥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与奉军作战。孙岳、胡景翼分别被任命为京畿警备副司令和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正当直奉两军在山海关激战时，冯玉祥由古北口秘密回师，10月22日夜，占领北京城，囚禁曹锟。24日迫使曹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25日，冯玉祥将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1月2日曹锟被迫宣告下台，直系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告终。5日，国民军驱逐清废帝溥仪出宫。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等联名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下旬，冯玉祥会同奉系军阀张作霖成立了由段祺瑞任执政的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北京政变是一次具有进步意义的武装政变，为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卅运动】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爆发的全国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全国反帝斗争迅猛发展。2—5月，上海、青岛日资纱厂工人连续举行罢工，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5月15日，上海内外棉纱厂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10余名。接着租界当局又逮捕开展募捐援助工人的学生，并提出损害中国工商业者利益的四提案。5月30日，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传单，进行讲演，又遭逮捕。聚集在南京路老闸捕房外的万余

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开枪射击，当场打死4人，伤后不久死亡者9人，重伤数10人，逮捕40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斗争扩大到各阶层人民，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开展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3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刘华任正副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宣布总同盟罢工。自6月1日起，上海有20万工人罢工，5万学生罢课，绝大部分商人罢市。6月7日，各界组成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作为公开领导反帝斗争的机关。提出撤退驻华之英、日军队，取消领事裁判权、惩凶、赔偿等17项交涉条件。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全国约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帝国主义采取了分化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上海总商会于6月19日宣布停止罢市，学生因暑期到来纷纷离校。罢工工人为了避免孤军作战，在英、日资本家先后答应“承认中国政府颁布工会条例”所组织之工会、对罢工工人在生活上“予以相当之帮助”、“酌加工资”、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条件后，于八九月间复工。五卅运动显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和革命统一战线的作用，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

【省港大罢工】广州和香港工人为反抗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支援上海人民而举行的大罢工。1925年6月19日，香港10万余工人在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邓中夏、陈延年、苏兆征等领导下，为支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和实现自身要求开始大罢工。半月内罢工人数增至25万，并有10万多工人离开香港回到广州。21日，广州英、美、日商洋行和沙面租界的工人也参加了大罢工。23日，广州和由香港返回广州的罢工工人、市郊农民、学生和黄埔军校学生军约10万人举行集会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废

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游行队伍行至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英、法帝国主义军队向示威群众射击，英、法、葡等国军舰同时进行炮击，当场打死 52 人，重伤 170 余人，轻伤无数，造成沙基惨案。这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积极支援省港大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加强对罢工的领导，于 7 月 3 日正式成立了以苏兆征为委员长、李森（李启汉）为总干事、邓中夏、廖仲恺为顾问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并组织了有 2000 多人的工人纠察队，严密封锁香港和沙面租界，使香港成了“臭港”、“死港”。这次罢工在全国人民支援下，坚持到 1926 年 10 月结束，历时 16 个月，是世界罢工史上罕见的。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锻炼了工人阶级，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北伐战争起了重大作用。

【平定杨刘叛乱】1925 年 6 月广东革命政府讨平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1925 年 2 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时，担左路的滇军杨希闵、中路的桂军刘震寰，观望不战，暗中与陈炯明信使联络，让其专攻右路黄埔学生军与粤军，希图消灭革命军。并且北结段祺瑞，南联唐继尧，调兵遣将，屯集省垣，阴谋颠覆革命政府。5 月初杨希闵潜赴香港与段祺瑞密使商讨了颠覆革命政府的计划。杨从香港返回广州后，即发动了武装叛乱，占领电报局、火车站等要地，6 月 4 日，占领了广东省长署、财政部等机关。对杨、刘叛乱，胡汉民、汪精卫等企图妥协，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则主张讨伐。6 月 6 日，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叛。12 日，黄埔学生军和粤军、湘军在广州工人和市郊农民配合下向滇、桂军发动总攻击，全歼滇、桂军 2 万余人。杨、刘逃往香港。

【郭松龄倒戈】奉军将领郭松龄举兵反对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事件。1925年下半年，奉军第三方面军第十军军长郭松龄因不满张作霖而与国民军冯玉祥联合起来。11月，订立了联合倒奉的《郭冯密约》。11月23日，郭松龄宣布班师回奉，要求张作霖下野，拥护张学良为总司令。25日，率所部7万余人由滦州向山海关进发。27日占领山海关。30日发出通电将所部改编为东北国民军。12月6日攻占锦州。奉军全线溃败。12月20日占领新民。张作霖统治危在旦夕。后日军直接出兵援奉，在巨流河一线与奉军合击郭军。12月下旬郭兵败被杀。

【中山舰事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为打击共产党，进一步篡夺军权而制造的阴谋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向海军局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要海军局速派军舰到黄埔候用。但19日中山舰开抵黄埔后，蒋介石却声称并无调遣该舰之命令。经请示蒋介石，中山舰又开回广州。蒋介石借中山舰的往返开动，诬陷共产党阴谋暴动，要将他绑架到苏联，推翻国民政府，改建工农政府。20日，擅自宣布广州戒严，调动军队断绝内外交通，逮捕海军局代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当时是共产党员），控制中山舰和海军局，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接着又强迫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50多名共产党员退出该军。蒋介石还利用这一事件排斥、打击汪精卫，逼汪离粤出国。由于中共陈独秀等对蒋介石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使其阴谋得以实现。

【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屠杀爱国请愿群众的流血事件。1926年1月，在英、日帝国主义指使下，直、奉军

阎达成“谅解”，联合进攻国民军。3月12日，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入大沽口，炮击大沽口炮台，伤国民军10余人。国民军被迫还击，将日舰逐出大沽口。16日，日本联合英、美、德、意等8个《辛丑条约》签约国公使，以维护《辛丑条约》为由，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间的军事行动，撤除一切防务，限48小时内答复，否则“各国海军当局决采取认为必要之手段”。与此同时，各国军舰20余艘云集大沽口，进行武力威胁。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3月18日，在国民党中央北京执行部和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北京各界人士万余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8国最后通牒国民示威大会。大会通过了驳复8国最后通牒、宣布《辛丑条约》无效、电勉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等决议。会后2000多人前往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请愿，要求拒绝八国最后通牒。当队伍行至执政府东辕内时，执政府卫队向群众开枪射击，并用马刀、铁棍向徒手群众进攻，当场打死47人，伤200余人。鲁迅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整理党务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制造的排挤共产党、谋取国民党党权的政治事件。1926年5月15—22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以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为名，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对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任职与活动做出种种限制。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和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共产党发给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对蒋介石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

民党党权的阴谋，陈独秀等人继续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使这一提案在会上得到通过。会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换上了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垄断了党政军大权。

【五原誓师】1926年9月国民军联军于五原举行誓师典礼。1926年1月1日，冯玉祥在反动势力逼迫下宣布下野，赴苏考察。途中加入国民党。在苏期间，会见了加里宁、伏罗希洛夫等苏联领导人、第三国际负责人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蔡和森，对革命有了进一步了解。1926年8月17日，冯玉祥偕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及中共党员刘伯坚秘密离开莫斯科回国，9月16日抵五原。同部下孙岳、方振武、邓宝珊、张之江等共同组织国民军联军。冯被推为总司令。9月17日，举行誓师典礼。冯玉祥宣誓就职。在誓词中明确宣布：“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誓师后，即组织国民联军总司令部。以刘伯坚为政治部长。并于9月27日召开中国国民党国民军联军全军代表大会，成立最高特别党部。之后接受李大钊的建议，进军陕甘，参加北伐战争。五原誓师标志着国民军走上了国民革命的道路。

【湘鄂赣农民运动】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工农运动迅速高涨，湘、鄂、赣三省尤为明显。这三个省份，首先高涨起来的是农民运动。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11月上旬，中共中央

制定了《农民政纲》，提出推翻农村中的劣绅政权，建立农民的平民政权；武装农民；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土地归农民等主张。11月下旬，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决定以湘、鄂、赣、豫农民运动为重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和国民党左派赞助支持下，湘、鄂、赣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在湖南，北伐前夕有农民协会会员三四十万，北伐军占领湖南后，农民运动迅猛发展，1926年12月召开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70人，代表有统计的会员130多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1000万。大会成立了省农民协会，并建议成立全国农民协会。在湖北，1926年7月农会会员仅有7.2万人，到12月增至28.7万人。1927年3月召开了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省农协。到4月上旬，农会会员发展到100万人。在江西，1926年10月农协会会员仅6000人，到1927年1月达到38.2万人。2月召开了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省农协。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以农民协会代替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做到“一切权力归农会”；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对地主阶级实行专政，对其中罪大恶极的予以处决。农民还从经济上打击地主，开展减租减息减押斗争，废除苛捐杂税。农民对封建迷信和传统恶习也进行了斗争，推翻族权、神权、夫权，禁止牌、赌、鸦片、买卖婚姻。在猛烈冲击农村旧秩序的同时，农会开展了办学、修路、筑塘、组织合作社等乡村建设。农村大革命的开展，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统治的基础。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配合北伐战争，推翻北洋军阀统治而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第一次为1926年10月23—24日。10月16日，浙

江省长夏超宣布脱离孙传芳独立，并向上海进攻。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主席钮永建组织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准备暴动，响应夏超。中国共产党决定与钮永建合作，发动起义，由罗亦农、赵世炎担任总指挥。23日，上海总工会下令工人举行起义。由于夏超为孙传芳所败，工人战斗力量不足，仅有130名武装工人和2000名没有武装的战斗队伍，准备不充分，起义遭到失败。24日晨，中共上海领导机关下令停止起义。第二次为1927年2月22日。2月18日北伐军进占嘉兴，孙传芳准备由上海退却，由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接防，上海政局不稳。中共江浙区委决定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18日晚，上海总工会发出总同盟罢工令，并发表罢工宣言，提出政治经济要求17条。19日大罢工开始，参加罢工人数达到36万。21日晚，工人开始夺取军警武装，同敌展开局部战斗。22日，总同盟罢工转为武装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蒋介石又下令北伐军停止进攻上海，起义处于孤立无援境地，再次失败。第三次发动于1927年3月21日。第二次起义失败后，周恩来来到上海，以中共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委书记身份领导和组织第三次武装起义。他和中共江浙区委负责人罗亦农、赵世炎及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一起，总结了前两次起义的经验教训，做了充分准备。组织了5000名工人武装纠察队，在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工作。对敌人军事部署进行了详细侦察。制定了统一指挥、分区作战的起义计划。起义前10天，发动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破坏张宗昌运兵上海的计划，切断敌人对上海的援助。3月21日，北伐军抵达上海郊区龙华镇。中共江浙区委和上海总工会决定立即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21日中午，上海80万工人举行总罢工，接着转为武装起义，向直鲁联军发起全面进攻。这时进抵上海近郊龙华的北伐军东路总指挥白崇

禧，依照蒋介石的密令按兵不动，以图利用北洋军阀削弱工人力量。上海工人经一天一夜激战，于 22 日下午占领上海，取得了起义的胜利。

【迁都之争】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全国革命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为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1926 年 11 月 8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往武汉。12 月 13 日，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职权。联席会议由徐谦、孙科、宋子文、宋庆龄、邓演达、吴玉章、陈友仁、董必武、唐生智、王法勤等组成，以徐谦为主席，鲍罗廷为顾问。1927 年 1 月 1 日在武汉正式办公。曾力主迁都武汉的蒋介石，这时却提出迁都南昌，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搬到了南昌，以便将总司令部置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之上，实现以军治党、以军治政的军事独裁。12 月底，蒋介石截留了取道南昌前往武汉的第二批人员，于 1927 年 1 月 3 日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移南昌”。迁都之争实质上是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同蒋介石迁都南昌的设想进行了坚决斗争。1927 年元旦，国民政府明令以武汉为首都。7 日，武汉中央联席会议重申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广州作出的原决议，反对蒋介石迁都南昌的主张。2 月 21 日，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宣布结束，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在武汉正式办公。3 月 6 日，蒋介石被迫让阻留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赴武汉。“迁都之争”以蒋介石的失败而告终。

【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1927 年元旦，武汉各界举行集会，庆祝北

伐战争的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3日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前演说，英国军队竟无理干涉，派水兵越界用刺刀驱赶听众，当场刺死中国海员1人，伤30余人，制造了汉口一三惨案。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向英总领事提出抗议，令其从速撤退水兵，由中国政府派兵进驻英租界。4日，武汉工农商学妇各团体代表举行联席会议，提出解决一三惨案的8项条件。5日下午，在刘少奇、李立三领导下，武汉召开了有400多个团体、30多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会后游行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的口号，冲入租界，驱逐了英国巡捕。同时，武汉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决定接管租界。组织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6日，九江发生了英国水兵枪伤中国码头工人和英舰开炮挑衅事件。九江工人和市民奋起反击，冲入租界。10日，国民政府组织了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了租界。2月19日，英国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协议，正式承认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

【南京事件】又称南京惨案。北伐战争中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事件。1927年3月24日，共产党人林伯渠、李富春参加领导的北伐军第二、第六军攻占南京，直鲁联军向浦口溃退。城内的反动分子乘秩序混乱煽动地痞流氓、溃兵进行抢劫，波及到外国领事馆和侨民。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命令其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对入城搜索敌人的北伐军和南京居民进行炮击，打死数十人，打伤百人以上，制造了南京惨案。4月11日，英、美、日、法、意5国又向中国方面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惩凶、道歉、赔偿等无理要求。并以如不满足要求，将“不得不采取认为适当之手段”相威吓。南京事件是帝国主义武装

干涉中国革命的严重事件，也是帝国主义以武力胁迫中国资产阶级右翼叛变革命的信号。

【夏斗寅叛变】1927年5月17日，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乘武汉政府举行第二期北伐，武汉空虚，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在鄂南叛变，通电攻击共产党“以暴民政治扰乱两湖”。攻击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董必武、徐谦、邓演达、李汉俊等“把持政柄，操纵时机”。随即东下沙市、嘉鱼、咸宁、汀泗桥一带。17日进逼距武昌仅40里的白纸坊，武汉危急。同日，武汉政府任命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为前敌总指，率所部及中央独立师（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编成）出城击敌，并急召九江、武穴方面的第二、六军回援。18日，武汉政府以夏斗寅“称兵谋叛”，下令褫职拿办。19日，叶挺部将叛军击溃。

【马日事变】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的武装叛乱。1927年4月底，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在汉口召集一批军官开会，密谋反共清党，举行武装叛变，决定首先在湖南发动。5月初，何健派其军部参谋余湘三到长沙策划，将土匪出身的三十五军三十三团许克祥部从湘西调到长沙。5月17日，许克祥、余湘三等举行会议，决定21日举行公开叛变，由许克祥指挥。21日晚，许克祥率叛军1000余人，分头袭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党校、省特别法庭等机关团体，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共产党人李维汉、夏曦等被抄家，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被杀害。事变后，许克祥与国民党右派组织了“中国国

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继续在长沙及各县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至6月10日，被害者达1万多人。因21日的电报代韵目是“马”字，故称为马日事变。这一事件是武汉汪精卫集团开始叛变，并准备与南京蒋介石集团合流的信号。

【四一二事变】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共清党的政变。1927年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派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镇压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建立其独裁统治，依靠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加紧进行政变前的活动。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帝国主义称赞他是唯一有武力进攻“激烈分子”，维持上海局面的人物，特许其带卫兵自由出入租界，并答应驻扎在上海的外国侵略军帮助他镇压革命。蒋介石在取得帝国主义支持的同时，又同上海的大资产阶级与帮会势力相勾结。上海大资产阶级保证从财政上支持蒋介石，4月1日首先提供300万元。青红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了“中华共进会”和所谓“上海工界联合会”，以对抗上海总工会，充当蒋介石的帮会打手。从3月底开始，蒋介石连日召开“清党”反共会议，部署反革命政变。调动军队控制上海，布置大屠杀。4月6日亲题“共同奋斗”的锦旗，派乐队送给工人纠察队，以麻痹工人的警惕性。一切布置就绪后，蒋于11日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12日凌晨，由“共进会”组织的全副武装的流氓分子，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冒充工人，从公共租界大量出动，袭击闸北总工会和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14处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奋起反击。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即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打死打伤工人300多人。为抗议反动派的血腥屠杀，13日，上海20多万工人举行罢工。上海总工

会召开了有6万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一致决议要求惩办祸首，发还工人武装。会后群众冒雨游行示威，向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当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时，埋伏在各里弄的军队向群众开枪射击，历时十五六分钟，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无数。接着反动派下令禁止罢工游行，解散上海总工会，四处捕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查封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至15日，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等先后牺牲。此后，苏、浙、皖、闽、粤、桂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单广东一地被捕杀的就达2000多人。

【清党运动】1927年4月上旬，蒋介石在上海与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吴稚晖、张静江等多次商谈反共清党问题。4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成立“清党委员会”，从18日起实行反共清党。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典礼结束后举行“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暨国民党恢复党权大会”，通过了《请中央政治会议训令各级党部从事清党运动》的提案。南京政府当日发布《密字第一号令》，明令通缉苏联顾问鲍罗廷、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吴玉章、林祖涵及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徐谦等193人。接着又发布《接受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案处置共产党首要分子及否认武汉党部所发命令通告》，规定对各地党部举发的“中国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应就近由“军警分别看管监视”。5月7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正式成立清党委员会，以邓泽如为常务主席，统一主持全国的“清党”，负责组织各省市县清党委员会。20日，清党委员会颁布《中国国民党清党条例》11条，规定“各县市党部或与县同级之党部于接到清党文告之日起，

即令所属全体党员于半月内填就审查表，呈报当地清党委员会”。“各地清党委员会接到报告及各级党部审查意见后，即将共产分子清除之”。这样“清党”运动由南京扩大到全国，反动派在各地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后于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1927年4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定都南京，否认武汉革命政府，并通过了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案。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在南京丁家桥原江苏省议会举行成立典礼，宣读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关于奠都南京的宣言，并敦请汪精卫、谭延闿来南京行使职权。南京国民政府采取议会制，推举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邓泽如、蔡元培、李宗仁、何应钦、古应芬、柏文蔚、蒋作宾、陈铭枢、甘乃光、陈果夫、叶楚傖等为政府委员，胡汉民、张静江、伍朝枢、古应芬为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钮永建，民政部长薛笃弼，外交部长伍朝枢，财政部长古应芬（钱永铭代），司法部长王宠惠，交通部长王伯群（暂代），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内发布的第一号命令，为“清党”通缉令。明令缉拿鲍罗廷、陈独秀、邓演达、吴玉章、徐谦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等197人。随即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开展“清党”运动，大肆屠杀共产党员。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逐渐由动摇走向反动。1927年4月，汪精卫提出制裁所谓“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在湘鄂赣等省组

织特别委员会，检查各级党部、政府机关及民众团体一切言论行动。5月，武汉政府连续发出通告、训令，不准工农团体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禁止工会、农会逮捕反革命和没收其财产。指责农民协会“幼稚过当”，“骚扰后方”，“扰动人心”。下令解散黄冈、黄陂两县的农民协会。在汪精卫的怂恿下，5月17日，夏斗寅在鄂南叛变。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叛乱。5月29日、6月5日，江西省长兼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将共产党人“遣送出境”。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把共产国际发来的紧急指示不向中共中央传达，直接拿给汪精卫，汪即以此作为“分共”的一个主要借口，召集武汉地区非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开会，策划反共办法。6月10日，汪精卫等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策划反共。19日，蒋介石、冯玉祥等举行徐州会议。密谋“宁汉合流”，共同反共。在革命紧急关头，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继续坚持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下令制止农民没收地主土地，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7月15日，汪精卫不顾宋庆龄、邓演达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讨论“分共”问题。随后，封闭了工会、农会和所有革命团体。大规模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由于蒋介石的“清党”，汪精卫的“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遭到失败。

【宁汉合流】1927年七一五政变后，武汉国民党政府迁往南京，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合在一起，故有此称。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建立了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南京国民政府，造成“宁汉分裂”的局面。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叛变革命，消除了宁汉双方在反共问题上的分歧，使宁汉合流成为可能。此时，手握重兵的冯玉祥，几次致电宁汉双方，提议召集会议，解决争

执。7月24日，武汉的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回电冯玉祥，表示愿意“和平统一”，并同意迁都南京。8月8日，南京的蒋介石、胡汉民、李宗仁等通电欢迎武汉重要分子到南京“柄政”。至此，宁汉均有合流意向，但双方存在着争夺国民党正统的尖锐斗争。武汉方面力主倒蒋，在宁的桂系与蒋介石也是貌合神离。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加之亲自督战的津浦线战事失败，8月13日，突然宣布下野，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南京方面的实权主要落在桂系手中，为宁汉合流提供了有利条件。8月25日，武汉政府宣布迁都南京。8月上旬到9月上旬，武汉的谭延闿、孙科和汪精卫、陈公博先后到达南京。孙科提出成立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的建议，得到宁、汉、沪（原西山会议派）三方同意。9月15日特委会成立。17日，南京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并发表宁汉合作宣言，宣布国民党“统一”完成。至此，宁汉合流正式实现。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又称十年内战或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7年间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国民党统治的革命战争。

四一二后，国民党一方面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镇压，另一方面继续同张作霖争夺对全国的统治权。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打败所有对手，在全国确立了统治地位，对外依靠帝国主义，对内严厉镇压共产党。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率先在南昌起义。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正式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随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湘、赣、粤、鄂、豫、皖、闽、浙、陕等地纷纷举行武装起义，组织工农武装，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27年10月，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队伍到达井冈山，开

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政府，建立地方武装，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等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队伍和湘南起义中组织的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创建了中国第一支工农红军，并进一步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此后，中国共产党相继开辟了湘鄂西、鄂豫皖、陕甘、海陆丰、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红军部队。1930年底到1931年9月，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先后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围剿”。之后，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加剧了中日间的民族矛盾。大敌当前，蒋介石集团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2年6月和1933年10月，蒋介石又相继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五次“围剿”。面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国民党的“围剿”，中国共产党一面号召全国人民武装抗日，一面继续开展游击战争，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左”倾错误领导下也损失严重，被迫撤离根据地，先后参加了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长征中，粉碎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排除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干扰，完成了长征。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加剧了中华民族危机，1935年12月底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国民党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逐渐改变了对日政策。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有力地推动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主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标志着内战的初步结束。

【八一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共政策的起义。四一二政变后，中共中央派李立三等到九江，准备组织党在北伐军中的力量，联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南下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此时，张发奎已实行“清共”政策，李立三便向中共中央提出采取“独立的军事行动”的主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李立三的建议，派周恩来赴南昌，组织前敌委员会领导南昌起义。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召开会议，宣告前敌委员会正式成立。周恩来任书记，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任委员，并决定贺龙任起义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爆发。参加起义的部队有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第一、第二、第三师，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朱德率领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总兵力共约3万余人。起义军经过近5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1万余人，占领了南昌城。8月1日上午9时，在西花厅召开包括起义领导人和各省市及海外华侨代表4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包括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在内的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谭平山任主席。同时对起义部队进行整编，决定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由贺龙代理总指挥，叶挺代理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

下辖三个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党代表廖乾吾；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兼），党代表聂荣臻；第九军军长韦杵（未到任），副军长朱德，党代表朱克靖。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向南昌进攻。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按原计划南下。8月3—5日，起义部队陆续撤离南昌，取道赣南，向东江进发。9月底10月初，起义部队主力到达广东潮州、汕头地区时，遭强大国民党军队围攻，损失严重。剩下的部队，一部分退到广东海陆丰地区，与彭湃领导的农军会合；另一部分则在朱德、陈毅领导下进入湖南，与当地农民斗争相结合，于1928年春发动湘南起义，后到达井冈山地区宁冈砦市，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8月1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秋收起义】大革命失败后，湘赣两省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1927年秋收季节举行的武装起义。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达湖南，具体布署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8月18日，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计划。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在湘东赣西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起义，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召开了军事会议，具体讨论了秋收起义的军事部署问题。正式决定起义的武装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番号，而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4个团。9月9日，湘赣边界起义爆发。当天，起义农民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第一团在修水起义后，准备取道长寿街，进攻平江。因四团叛变，被迫向浏阳方向转移。9月10日，第二团在安源起义，相继攻克醴陵、浏阳，后

在浏阳陷敌重围，损失大部。9月11日，第三团由铜鼓西进，在攻占东门市后被敌人袭击。9月19日，各路起义军退集到浏阳县文家市。毛泽东在此召集前委会议，讨论部队进军方向问题。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向湘赣粤边的农村进军。会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南下，向井冈山进军。

【三湾改编】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的一次整编。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其时，部队减员较大，已不足千人。为巩固和发展这支新生的革命军队，毛泽东在三湾村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改编的主要内容有三：（1）缩编部队，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2）确立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定在军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设党小组，连设支部，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各级均设党代表，整个部队受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3）实行军队内的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经济公开、官兵平等，消灭旧军队的雇佣制度，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三湾改编保证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黄麻起义】中国共产党在湖北黄安、麻城领导的武装起义。1927年11月13日，中共鄂东特委成员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等在湖北黄安、麻城两县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11月14日，起义军攻占了黄安县城，成立了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推曹学楷为主席，同时组成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推潘忠汝、吴光浩

为正、副总指挥，戴克敏为党代表。12月5日，国民党军围攻黄安，潘忠汝牺牲，鄂东军被迫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翌年1月，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为党代表。同年4月，趁国民党军后撤之机，第七军返回黄安。5月，第七军领导人在黄安清水塘开会，决定发动群众创建鄂东北根据地。7月，第七军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师。此后，经过近1年努力，1929年5月终于开辟了以柴山堡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为以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广州起义】1927年1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一次举动。1927年底，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抓住粤桂战争的爆发、广州城内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决定发动广州起义，并成立了以张太雷为委员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同时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部，由叶挺、叶剑英分任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徐光英任参谋长。12月11日凌晨3时，起义爆发。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主要是叶剑英率领的第四教导团和周文雍率领的广州工人赤卫队，大约6000余人。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广州城区。当天上午，广州苏维埃政府——广州公社宣告成立，苏兆征任主席（因病未到任，由张太雷代理）。并颁发了宣言和各项法令，宣布：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革命国民党和各式军阀；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广州起义震惊了中外反动派，他们立即联合起来向广州进攻。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的支持下，国民党军阀集中了5万兵力进攻广州。起义军经过3昼夜的激战，终因力量对比悬殊而失败。张太雷在战斗中牺牲，革命群众七八千

人惨遭杀害。13日，起义军撤出广州市区。一部分在花县改编为红四师，开赴东江同海陆丰农民起义军汇合；另一部分沿西江到达广西左右江，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还有一部分则北上韶关，找到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上了井冈山。

【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济南屠杀中国军民的血腥事件。1928年4月，亲英美的国民政府，打着统一的旗号，开始了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英美势力向中国北方发展，借口保护侨民，于4月下旬，出兵侵占济南。5月1日，国民党北伐军开进济南，日军即寻衅闹事，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5月3日，日军又向国民党北伐军驻地大举进攻，将北伐军7000余人缴械。蒋介石命令各师“约束士兵，不准开枪还击”。日军气焰更加嚣张，把国民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16名外交人员捆绑起来，将蔡公时的耳、鼻、舌、眼剃下，并将17人全部杀害。是日从早到晚，日军任意枪杀居民，尸体遍街。5月4日，蒋介石下令撤出济南，绕道北进。5月7日，日军向蒋介石提交最后通牒，要求严惩北伐军有关高级军官等5项条件，并限12小时以内答复。5月8日凌晨，蒋介石派出代表熊式辉、罗家伦赴济南，准备答复日军。但日军宣称期限已过，下令重炮攻城。5月11日，济南为日军占领。日军进城，再次杀人放火，连续数日。据世界红十字会济南分会查明：“济案”中，死亡6123人，伤1700余人。济南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浪潮，并由此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迫于民众的压力，国民党南京政府于“二次北伐”后，也曾多次与日本政府交涉“济案”问题，但由于日本的抵赖和国民党政府的迁就妥协，直到1929年3月28日，才达成“济案”协定。在中国政府

保证日本人“生命财产之安全”的条件下，日军撤离济南。

【皇姑屯事件】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沈阳近郊皇姑屯火车站炸死张作霖的事件。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扶植起来的奉系军阀首领。随着奉系军阀势力不断扩大和日本索取东北“权益”逐渐加紧，加上美英势力的渗透，奉日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1927年张作霖没有满足日本要求修建铁路和自由出借东北土地等要求，反而引进英美资金，修建大通（大虎山至通辽）、沈海（沈阳至海龙）等铁路和葫芦岛港，引起了日本极大不满。1928年5月中旬，南京政府的“北伐军”直逼京津，张作霖政权岌岌可危。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和高级参谋河本决定乘机谋杀张作霖，制造中国政局混乱，然后借口“维护治安”出兵占领东北。为此，河本制定了杀害张作霖的详细计划，准备在张回沈阳途中炸车。1928年6月4日清晨，张作霖的专车行至沈阳西北郊皇姑屯车站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交叉处时，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在南满铁路吊桥的炸药爆炸。张作霖身受重伤，被急救回沈阳“帅府”，于上午9时毙命。张死后，由于奉系当局秘不发丧，日军未敢轻举妄动。当天，奉军第三方面军军团长、张作霖长子张学良连夜离京“奔丧”。回沈阳后，承袭父职，稳定局势，至21日才正式公布张作霖死讯，使日本侵略者的阴谋未能得逞。

【东北易帜】奉系军阀控制的东北地区归属国民党南京政府统一管辖的事件。1928年4月，国民党新军阀发起讨伐奉系军阀的战争。张作霖迫于形势，于6月3日退回关外，翌日途经皇姑屯车站时被日军炸死。其后，张作霖之子张学良被推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鉴于皇姑屯事件的教训和东北政局的严重，于7月1日通

电全国，表示愿与南京政府妥协。其时，国民党南京政府鉴于济南惨案的“教训”，也决定和平解决东北问题。随后，张学良、蒋介石之间互派代表，多次磋商。张学良的举动曾遭到一直企图独霸中国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对。日本政府首相田中义一为此多次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强行干涉东北易帜。6月下旬至7月中旬，田中义一三次电令日本驻奉总领事林久治郎“警告”张学良，反对张学良与南京政府统一。11月初，田中义一亲自接见东北赴日代表，以6000万元的资助，诱使张学良停止易帜。经过5个月的交涉和斗争，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率东北各军政要员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12月3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至此，国民党南京政府从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改订新约】南京国民政府为博取各国承认、缓和国内矛盾的一项措施。1928年6月15日，在所谓“北伐告成”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要求同各国“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7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宣言，提出“改订新约”办法3条：（1）中华民国与各国间的条约，已届期满者，废除旧约，另订新约；（2）尚未期满者，以正当之手续解除另订；（3）旧约已期满新约未订定者，另订临时办法处理一切。改订新约内容仅限于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两项。关于关税自主，1928年7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首先与美国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条约虽承认中国“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但又规定缔约双方“在彼此领土内享受之待遇，应与其他国享受之待遇毫无区别”，即仍享有最惠国待遇。随后，南京国民政府又陆续同德、

挪、比、意、丹、葡、荷、瑞典、英、法、西班牙、日本等国缔结了关税条约。所有这些条约都援用中美条约之例，规定了最惠国待遇。关于领事裁判权，当时在中国享有该项特权的国家有英、美、法、日等 16 个。其中到 1928 年条约期满者有日、意、比、葡、丹、西等 6 国，除日本外，其他 5 国都在新约中同意取消领事裁判权，但又作了如下保留：中国对此 5 国行使司法权的方式，须经双方同意，并须多数国家同意废除时始行废除。直到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英、美、法、日等国也未表示同意取消领事裁判权，所以，南京国民政府在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上未取得什么成果。

【平江起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平江领导的武装起义。1928 年 7 月 22 日，共产党人彭德怀率原国民党湖南独立师第一团官兵在平江城郊天岳书院广场上誓师起义。经过近两个小时激战，捣毁了平江县城的军政机关，活捉敌县长，释放了狱中所有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占领了平江城。7 月 23 日，共产党人黄公略率领在嘉义镇起义的第三团第三营，贺国中率领在岳州起义的独立师随营学校全体学员赶往平江。为了巩固和扩大起义成果，起义军仿效井冈山的红四军，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下辖十三、十四两个师。7 月 24 日，红五军党组织和中共平江县委召开联席会议，宣布成立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7 月 29 日，国民党以 6 个团的兵力向平江反扑。为了保存力量，8 月 1 日红五军撤出平江县，转战于湘鄂赣边区的平江、浏阳、万载、修水、通山一带，进行游击战争，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12 月 11 日，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转战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留下的部队在黄公略的领导下继续在湘鄂赣边区开展游击战争。

【中东路事件】 1929年7—12月因国民党当局用武力接管中东路而引起的中苏冲突事件。1929年5月27日，东北地方当局受蒋介石的指使，令哈尔滨特警处派军警搜查哈尔滨苏联领事馆，监禁苏驻哈总领事及馆员。中苏矛盾激化。尔后，蒋介石亲赴北平，布置东北军队沿中苏边境布防，作备战姿态。为扩大事态，7月10日，蒋介石又令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下令解除苏方铁路局长、副局长等人职务，派兵将撤职的苏方职员驱逐回国，以武力取得了中苏共管的中东路。从而单方面撕毁了1924年5月签订的中苏合办中东路协定，挑起了“中东路事件”。事件发生后，7月14日，苏联政府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通牒，要求释放被捕苏联人，恢复中东路原状。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华绝交。7月20日，苏军兵分三路，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8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与苏交战宣言。从1929年8—11月，中苏边境战事全面展开，至11月下旬，中国东北边境重镇均为苏军占领。11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呼请各国组织调查团来华。但苏联表示：须由两国直接谈判，反对第三国调停。东北地方当局在蒋介石授意下要求与苏联和谈。12月22日，双方代表在伯力签订了“和谈草约”（又称《伯力协定》），规定：两国立即息争；恢复冲突以前状态，包括恢复苏方人员的一切职务，恢复东三省苏联领事馆及中国在苏联远东领事馆，苏军尽速退出满洲里，彼此释放所俘军民；两国迅速举行中苏正式会议解决两国通商问题等。此草约虽未被南京国民政府所完全批准，但中东路事件引发的军事冲突至此宣告结束。

【百色起义】 中国共产党人在广西百色举行的武装起义。1929年夏，中共中央派邓小平、张云逸等到广西组织工农武装暴动，并

成立了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广西的起义武装和党的工作。11月初，中共中央批准在广西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12月11日，在共产党人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人的领导下，百色起义爆发。参加起义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当地农军在张云逸的率领下开到百色城广场宣告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下辖三个纵队，全军5000多人。同日，起义军在平马镇召开第一届右江地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推举雷经天为主席。翌年2月，李明瑞、俞作豫率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在龙州举行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军长俞作豫，政委由邓小平兼。李明瑞任第七、第八军总指挥，邓小平任总政委。不久红八军被国民党军打散，余部并入红七军。百色起义创建了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先后在12个县的范围内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

【宁都起义】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宁都领导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军的武装起义。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所辖的西北军一部改编为国民党第二十六军。1931年春，第二十六军被蒋介石派往江西参加“围剿”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7月，第二十六军进驻宁都。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该军广大官兵对蒋介石政府对外不抵抗、对内“剿共”和消灭异己的政策极为不满。同年12月14日，该军1.7万余人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发动下，由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率领，宣布武装起义，参加红军。起义后，部队开赴中央苏区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

【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武装侵占中

国东北的事件。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日本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一段南满铁路路轨，诬称是中国军队所为，随即炮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同时，南满铁路沿线日军向沈阳城发起攻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紧接着日军分兵进攻吉林和黑龙江。至19日，日军攻占了沈阳、本溪、鞍山、抚顺、长春、四平 20 多座城市，一周之内，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一再命令东北军要“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迫使19万东北军退避关内。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至此经4个月零18天，东北三省全部沦陷。

【珍珠桥惨案】又称珍珠桥事件。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屠杀爱国学生的血腥事件。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1931年12月17日，北平、天津、上海、广州、武汉、济南、安徽等地的学生到南京与当地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当游行队伍行至国民党中央日报附近的珍珠桥时，遭到国民党军警的血腥镇压，当场有30多名学生被打死，100多人受伤，100多人被捕。当夜，国民党政府又派出大批军警搜捕学生，并武装押送学生返回原地。

【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犯上海的事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转移视线并压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又发动了对上海的侵略。1932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了马玉山路事件。18日下午，受日本特务指使的5个日本僧人在上海马玉山路向上海三友实业社内的中国工人挑衅，在冲突中，双方互有伤者。尔后，日方传出有一受伤日僧死于日本医院。日本公使馆驻

上海武官辅助官田中策动数十名日本浪人于 20 日焚烧了三友实业社总厂，并与中国警察发生冲突，致使中国警察死两人，伤两人。暴徒也有一人死亡两人重伤。事件发生后，日方颠倒是非，反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要求赔礼道歉，惩凶、赔偿。并提出立即解散抗日团体等无理要求，并限“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时前明确作出答复”，国民党政府于 1 月 28 日下午 3 时全部接受日方无理要求。1 月 28 日深夜 11 时 30 分，日本海军陆战队 2000 余人，突然向驻守上海闸北的十九路军发起猛烈进攻，从而挑起了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抗战坚持了 1 个多月，杀伤日军 1 万多人，迫使日军一再增兵，三易主帅而不能有所推进。但国民党政府却坚持不抵抗政策，不仅不给予十九路军以支援，反而停发军饷，滞留全国各地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日捐款。3 月初，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被迫撤出上海。3 月 3 日，在英法等国的“调停”下，中日双方宣布停战。5 月 5 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有损于国家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

【长征】 又称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 年 10 月开始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撤离长江南北各根据地而进行的战略大转移。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突围长征。1934 年 10 月中旬开始，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 8 万余人分别由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雩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长征初期，由于中共中央领导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红军虽浴血奋战，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但是到渡过湘江后，人员已由 8 万减至 3 万。12 月，蒋介石又调集 40 万军队，准备围歼向湘西转移的红

军。在这紧急关头，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原定的向湘西进军的计划，改向敌人最薄弱的贵州前进。1935年1月占领贵州重镇遵义。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采用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接着又顺利地通过凉山地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过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于1935年6月中旬到达川西懋功。继中央红军之后，红四方面军也于1935年3月撤离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并于6月8日先于中央红军到达懋功。两个方面军汇师后，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8月下旬，两军跨过草地后，又挫败了张国焘要挟中央南下，企图危害中央的活动，率领中央红军继续北上。随后又突破腊子口、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率领下也于1935年11月开始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长征，并于1936年6月在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军会师后，红二、红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在朱德、贺龙、任弼时等的斗争下，张国焘被迫北上。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此次长征，前后历经两年，途经11个省，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华北事变】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全面侵占华北而制造的一连串事件。1935年5月，日寇借口天津两家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系中国人所为，同时借口中国方面援助热河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活动，破坏了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具有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调动日军入关，以武力相要挟。7月

6日，何应钦致函梅津，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使中国在河北的主权大部丧失。6月上旬，察哈尔驻军在张北县逮捕了偷绘地图的日本特务，旋即释放。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达成《秦土协定》，满足了日本军队的要求，使中国在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10月22日，日寇在河北省香河指使汉奸暴动，发表所谓“自治宣言”，11月25日日寇又唆使国民党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组织“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采取妥协敷衍的政策。他既不愿意华北五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又慑于日本武力威胁。1935年12月，国民党政府决定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冀察政务委员会”虽没有公开挂出“自治”招牌，但冀察已实际上置于南京政府管辖之外。至此，华北危机达到极点。

【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见“华北事变”。

【国民政府币制改革】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在英国政府经济顾问李滋·罗斯的策动下，决定实行废止银本位制、采行纸币制的货币改革。11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改革币制布告》，规定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后又批准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其他银行原有流通市面的钞票，逐步收回，代之以法币；国内今后一切公私收付款项，概以法币为限，禁止白银流通；凡银行钱庄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限3个月内兑换法币；实行白银国有，作为外汇准备金；法币与英镑挂钩，汇

价为法币 1 元等于英镑 1 先令 2.5 便士。国民政府这次币制改革，对于当时制止白银大量外流，扭转金融紧缩、利率高涨、物价大跌的状况，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次改革，也为国民政府日后滥发纸币打开了道路。

【一二九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 年，日本的侵略势力进一步伸向华北，制造了一系列旨在夺取华北统治权的严重事件，而国民党政府则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并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1935 年 12 月 9 日，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北平五六千名大中学生，在新华门举行了抗日救国请愿大游行。学生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实现抗日。当示威游行队伍行至王府井大街南口时，遭到大批国民党武装军警的镇压，学生百余人受伤，30 多人被捕。次日，根据北平学联的决定，北平全市学生实行了总罢课。12 月 16 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原定成立的日子，当日，北平学生、市民 3 万余人，先后在天桥、正阳门前广场两次举行市民大会，并举行了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之后，北平学生又迅速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人民中宣传抗日救国。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迅速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响应和支援。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南京、杭州、长沙等地的学生先后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各地爱国人士也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实现抗日，从而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七君子事件】国民党政府打击迫害抗日民主人士的事件。1936 年

5月31日，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对此，国民党政府竟以“危害民国”的罪名，于11月23日凌晨，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7人，制造了“七君子事件”。事件发生后，全国各界立即举行各种形式的援救运动。宋庆龄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对爱国志士的无理迫害。1937年春，国民党政府不顾民情，要对“七君子”起诉公审。为此，中共中央于4月12日公开发表了《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要求国民党彻底放弃错误的政策，释放一切政治犯。北平、西安等地都举行了援助救国会领袖的示威运动。同年6月，宋庆龄、何香凝等17人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1937年7月31日，沈钧儒等7人被释放出狱。

【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1936年国民党派系间一次争权夺利的斗争。国民党两广军阀与蒋介石素有矛盾。1936年5月胡汉民死去，两广地方实力派失去重心。蒋介石试图趁机分裂两广，然后各个消灭。广东军阀陈济棠决定联络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打起“抗日救国”旗号，进行反蒋。6月1日，两广军阀组织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呈文南京国民政府，吁请抗日。6月2日，又将抗日主张通电全国。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军政要员数十人联名发表通电支持6月2日通电，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由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副之。接着，两广部队出兵湖南。在此形势下，蒋介石急调部队进

入湖南防御，一场新的内战行将爆发。蒋介石一面备战，一面收买陈济棠部下。7月初，粤方空军司令黄光锐率40余人驾机投蒋，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也通电拥蒋。7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议，撤销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陈济棠于7月18日离穗赴港。两广事变遂告结束。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迫使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事件。九一八事变后，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因东北沦陷怀有抗日的要求；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系陕西地方势力，与蓄意消灭异己的蒋介石有深刻的矛盾。1935年秋，两军奉命在陕甘进攻红军，屡遭失败，伤亡很大，而蒋介石却不予补充。两军上下对蒋借内战消灭异己的作法十分不满，要求抗日的情绪日渐高涨。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部队采取争取其抗日的政策，并取得显著的效果。1936年上半年，红军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但是，蒋介石坚持“剿共”政策。1936年10月蒋飞至西安，逼迫张、杨继续“剿共”。同时加紧部署“剿共”行动，调集重兵，准备向陕甘进发。12月4日，蒋再度到西安督战，逼迫张、杨服从“剿共”命令，进攻红军，否则要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分别调至福建和安徽。12月7日，张学良哭谏蒋介石，要蒋停止内战，但遭蒋严词拒绝。随后，蒋介石又加紧镇压西安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于是张、杨决定实行“兵谏”，迫蒋抗日。1936年12月12日清晨，张、杨下令在蒋的行辕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同时在西安城内逮捕了蒋的军政要员陈诚等10余人。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

日救国主张，这就是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势力的强烈反响。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蒋而代之；亲英美派则主张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反对马上“讨伐”。国民党内部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日本和英美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分析了国内外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应张、杨之邀，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中共和红军代表团到西安参加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25日，蒋介石返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战争的转折点。从此内战基本结束，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制造的事件。1937年7月7日晚，驻北平丰台日军在北平卢沟桥附近举行实弹演习。夜11时左右，日军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诡称“失落日兵一名”，要求进宛平县城搜索。中国方面断然拒绝。日军立即调动丰台驻军，利用夜幕包围宛平城。7月8日晨，日军向宛平城开枪，炮轰卢沟桥。守卫卢沟桥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在团长吉星文指挥下坚决执行师长冯治安下达的“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寸土都不许退，可采取武力自卫及断然处置”的命令，英勇反击。中共立即通电全国，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生路！”再次提出“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9日，中国工农红军通电请缨开赴华北抗日。全国各阶层的爱国群众也纷纷动员起来，共赴国难，要求政府实行抗战。不少国民党将领也

发表通电请求参加作战。虽然二十九军官兵奋力抵抗，但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平津先后失陷。

【八一三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在上海挑起的军事进攻。因发生于1937年8月13日，故称。1937年8月9日下午5时半，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带一水兵，驾军车冲入上海虹桥中国军用机场，被中国军队击毙。日方以此为借口，蓄意扩大事态，对上海发动进攻。日军一方面威胁中国，要求撤退上海的保安队，拆除所有防御工事，并向日方道歉和处罚当事者，另一方面紧急向上海调动两个师团兵力，并将第一和第三舰队30余艘军舰，集中到吴淞一带。13日，日军以租界和黄浦江上的日舰为基地，向闸北一带炮击。京沪警备司令官张治中下令坚决还击，淞沪抗战开始。14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布：“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进入全国性抗日战争。

【日本侵华新方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的侵华方针。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实行大规模战略进攻，拟以“速战速决”的战略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但是开战1年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政府仍保有西南、西北广大地区，拥有很大兵力与日军对抗。日本帝国主义随着战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日军兵力分散，兵源不足，军费开支难以承受，国内人民的厌战情绪增长。在这种形势下，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

州后，被迫停止战略进攻，使战争进入敌我双方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明确修改了《第一次近卫声明》的立场，暗示只要国民政府降日反共，就可根据一定条件进行谈判。12月22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提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招降条件。上述两个声明，日本仍要求国民党“更换人事组织”，坚持把蒋介石下野作为“议和”先决条件。1939年2月，华北日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所拟的“和平计划”中，改变了这个政策。公开声言“尊崇蒋介石上将的地位而给予崇高位置”。3月，日本新任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说中，正式提出“蒋介石将军与其领导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反日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东亚新秩序之建立，则日本准备与之合作中止敌对行为之谈判。”由此可见，此时日本侵华方针已改为对国民党政府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加紧分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集中兵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三光政策】日本侵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实行的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战争之初即推行这一政策，以南京大屠杀最为典型。1938年10月以后，日军执行三光政策较前尤甚。1940年冬，日本政府的军事指挥机关向侵华日军下达命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运输的，亦一律烧毁……”，三光政策在“扫荡”中最为突出。1941年起，除继续在正面战场进攻外，集中在华兵力60%及全部伪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扫荡”，制造了潘家峪惨案、平阳惨案等。仅晋察冀、晋绥等8个根据地，被杀人民群众达304万，被抢粮食达1700多万石，被毁房屋达1780

万间。晋冀鲁豫地区人民，因日军施放毒气和细菌病死者达 1200 万人。制造了许多无人区，使各抗日根据地遭受严重摧残。

【治安强化运动】抗日战争时，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在华北沦陷区的殖民统治而推行的运动。早在 1938 年底，日本即在华北推行“治安肃正运动”，两年毫无结果，遂决定改变措施，把“剿共”作为“肃正”的首要目标，“发挥”日、华、军、官、民的总体力量，进行政治、军事、经济一元化的“总力战”。1941 年 3 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一周年时，由这个傀儡组织出面，发起了所谓“治安强化民众运动”。敌伪将华北分为以下几类地区：（1）治安区。即敌占区。日军的方针是，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建立“治安军”、“保安军”、“警备队”等伪军组织，以镇压抗日力量。（2）准治安区。即游击区。日军的方针是，以“蚕食”为主，怀柔政策与恐怖政策兼施。（3）非治安区。即解放区。日军的方针是，以“扫荡”为主，采取“囚笼政策”和“三光政策”，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从 1941 年 3 月至 1942 年底，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先后共推行了 5 次“治安强化运动”。华北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和反封锁斗争，经历万余次战斗，粉碎了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

【囚笼政策】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对抗日根据地“扫荡”时所采取的一种政策。它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墙，构成网状，从敌占区向根据地进行压缩包围。其用意在于束缚八路军、游击队之行动，便利日军之奇袭捕捉。1940 年以后，日军加紧“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每每利用其占领的城市和铁路、公路交通线分割抗日根据地，而后实行囚笼政策，

配合军事进攻。最典型的是在1942年5月华北侵华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大扫荡。日军将冀中抗日根据地分割成2670个小块，建立1635个据点和碉堡，除原有公路外还另修公路6182里，挖封锁沟3538里，使整个冀中抗日根据地形成为一个“格子网”。随着冀中抗日军民反扫荡斗争的胜利，日军的囚笼政策最后遭到了失败。

【清乡运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在华中地区联合汪伪政权推行的运动。1941年初，日本为发动太平洋战争，在中国敌占区建立一个较为稳固的后方。一面加紧对蒋介石进行诱降，一面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华北进行“扫荡”，在华中实行“清乡”。为统一指挥“清乡”，1941年5月，日本方面联合汪伪政权在南京马台街正式成立了“清乡委员会”，由汪精卫兼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日汪为了在“清乡”中相互配合，还签订了《“清乡”协定》。同年7月，日汪首先在苏南吴县、常熟、太仓、昆山、无锡、江阴、武进、镇江、丹阳、扬中等10县进行“清乡运动”。首先进行军事“清乡”，由日伪军警进行军事扫荡，建立所谓“清乡”区；其次，建立警察保安武装，推行保甲连坐制度等，将“清乡”区变为所谓“和平反共建国模范区”；随即进行经济“清乡”与思想“清乡”，将“清乡”区变成一个庞大的集中营。1941年11月，汪精卫还发起所谓“新国民运动”，与“清乡运动”齐头并行，进一步强化其法西斯统治。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为了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促

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作了极大的努力。从1937年2月中旬到7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林伯渠等,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张冲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举行了四次谈判。但因国民党方面坚持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为早日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于1937年7月15日在庐山交给蒋介石,约定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8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蒋介石等就发表中共宣言和改编红军问题,在南京举行第五次谈判。时值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迫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22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发布了改编命令。9月下旬,国共两党举行第六次谈判,继续商讨宣言发表等问题。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宣告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陶德曼调停】1937年冬德国驻华大使奥斯卡·陶德曼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之间所进行的“调停”议和。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国民党虽然宣布实行抗战,但又同日本进行妥协投降活动。日本帝国主义在速战速决计划落空后,企图通过谈判诱使国民党政府投降,主动请求德国促使中国和日本议和。1937年10月下旬,日本外相广田表示,希望德国劝说国民党政府主动提出和谈。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愿意促使中日直接谈判。11月5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孔祥熙,转达了日

方的七项和谈条件：（1）内蒙古建立自治政府；（2）在华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华北的行政权归南京政府，但须委派一个亲日分子为首脑；（3）上海非军事区扩大，由国际警察管制；（4）停止反日政策；（5）共同反共；（6）减低对日货的关税；（7）尊重外侨权利。蒋介石表示希望“恢复战前的状态”。他对陶德曼说：如果他同意日本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他极力要求德方转告日本对谈判情况保密。调停议和过程中，战局发生了变化。日军连陷上海、南京。日本要求蒋介石投降的条件更为苛刻。12月23日，日本提出新条件：（1）中国必须放弃亲共和反日、反满政策，与日满合作共同反共。（2）在中国必要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及特殊政权。（3）中日满订立密切的经济合作协定。（4）中国须付给日本所要求的赔款。并限期答复。陶德曼将日本的新条件通知国民党政府后，后者要求日方宽延期限，以求与日讨价还价。1938年1月14日，日本决定“不以国民党为交涉对手”，决心以武力征服中国。16日，日本正式通知德国，认为中国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谈判中止。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1月9日，日军占领上海。随后即向沪宁路进攻，直逼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企图迅速结束侵华战争。蒋介石一面仓促备战，一面决定迁都。1937年11月16日，国民党政府决定迁都重庆。自即日起，政府各机关陆续迁往重庆、汉口和长沙。外国大使馆也开始撤退。20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迁都宣言，称：“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26日，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一批官员抵达重庆。政府机关也陆续西迁。12

月 13 日，南京被日军占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于 1946 年将首都从重庆迁回南京。

【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屠杀中国人民的一次极残酷的暴行。1937 年 12 月 13 日，南京被日军攻陷。日本侵略军谷寿夫所率领的第六师团是最早攻进南京城的。同谷寿夫第六师团合攻南京城的还有中岛第十六师团、牛岛第十八师团、末松第一一四师团，共 4 个师团。统率这 4 个师团的是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日军进城后，几乎见到中国男人便杀，见到中国女人便奸，奸后再杀，见到房屋店铺便烧，见到金钱财物便抢。从中华门附近的居民区，到中央路和中山北路的难民区，展开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六代豪华的文明古都顿时变成了人间地狱。其狂虐残暴的程度，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在 1 个多月内，南京军民先后被杀害者达 35 万多人，全城约 1/3 的房屋被焚烧、毁坏。日军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愤怒，更坚定了中国人民消灭侵略者的决心。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侵略者受到了历史的正义的惩罚。指挥灭绝人性大屠杀的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引渡给中国政府处死。

【花园口决堤】1938 年 6 月，国民党政府以挖开黄河大堤造成泛滥区，阻止日军西进以保卫武汉而制造的一场灾难事件。1938 年 5 月日军取得徐州会战胜利后，于 6 月 6 日攻陷开封，控制了陇海铁路，准备从郑州南下，与江西之敌相呼应，会攻武汉，以达到摧毁国民党政权的中枢，逼蒋投降的目的。蒋介石置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下令批准了国民党陆军第一战区长官部建议和

拟定的扒堤决河的计划，企图放出黄河水，造成平汉铁路以东的泛滥区，阻日军于郑州以东，保住郑州，进而“以水代兵”保卫武汉。花园口属河南郑县，在黄河南岸。决堤任务由第一战区所属三十九军的新八师蒋在珍部担任。掘堤前，先把花园口一带的群众赶到10里以外，然后密布岗哨，选出身强力壮的800名士兵，分5个小队，日夜轮流掘堤，6月9日，花园口决堤成功，河水奔腾而出，沿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犯。掘堤部队再用两门平射炮连发六七十发炮弹，决口扩大至370公尺，全河改道。瞬间，滔滔河水，泛滥成灾，豫皖苏3省17县一片泽国，数十万人被淹死，140多万灾民无家可归。花园口决堤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泛滥的河水虽暂时阻滞了敌人沿陇海路两侧西进，但敌人很快改变了进攻方向，将其主力南调，国民党政府“以水代兵”保卫武汉的计划完全破产。

【长沙大火】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政当局以“焦土抗战”为名，下令焚毁长沙市区，造成全城房屋大部烧毁，居民被烧死2万余人的事件。1938年11月11日，日军攻占湘北重镇岳阳，并出动飞机轰炸通城、平江等城，湘北战事日趋紧张。12日上午，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接蒋介石密电“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后，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指示办法，并指定警备司令部负责筹备，由保安处协助。下午4时，酆悌、徐权来张治中处，拿出焚城准备纲要。张指示酆、徐，明日须根据纲要，做好细则，送来核定。13日晨两时许，城内已经起火。大火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居民被烧死2万余人，大火后安置灾民达6万，更多的人逃离长沙，流离载道。市内大部分房屋被焚毁。长沙“焦土抗战”，不仅没有起到“免资敌用”，陷日

军于困境的作用,反而使自己焦头烂额。日军在大火以后 10 个月,才攻入长沙。蒋介石为推卸责任,平息民愤,在长沙举行了“军令会审”,以辱职殃民和未奉命令放弃职守罪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团长徐昆、省会公安局长文重孚处以死刑。长沙大火案遂以酆悌等三人作替罪羊被枪决而了结。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汪精卫集团是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1938 年冬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下,公开叛国投敌。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抗日战争爆发前,汪精卫极力反对国共合作抗日。抗战开始后,他散布亡国论调,宣传“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诬蔑主张抗日的人是“唱高调”,而自称是“低调论者”,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有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等国民党高级官员参加的“低调俱乐部”。1938 年初,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派董道宁到上海、东京会见了日本官员,证实了日本愿意迅速实现对华“和平”的意图后,回国与高宗武到香港与日会谈。7 月初,高宗武去东京会见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和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就由汪精卫出面进行“和平运动”达成谅解。8 月底至 9 月初,高宗武指派梅思平与日方在香港继续会谈,双方在承认伪满、日本在华北和“蒙疆”驻军、取消抗日政策以及汪精卫的具体行动等问题取得口头协议。11 月 20 日,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签署《日华协议记录》,汪精卫集团表示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同意与日本缔结防共协定,承认伪满,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本土有居住营业的自由,日本有开发利用中国资源的特权,赔偿日本侨民损失,与日本共谋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以及经济提携的成果”。日本方面同意汪精卫集团提出的成

立伪政府等计划。12月19日，汪精卫、周佛海、曾仲鸣、陈璧君、陶希圣等人从重庆经昆明转至越南河内。21日，陈公博也逃至河内与汪会合。22日，日本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宣称日本愿与“中国的同感忧虑及其有卓识之人士”合作。29日，汪精卫公开发表“艳电”响应，认为近卫声明是“和平之原则”。1939年5月初，汪精卫等在日本官员保护下离开越南到上海。5月底到日本。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除其一切职务”。6月，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集团。

【远东慕尼黑】远东慕尼黑是指英美等国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企图劝蒋介石国民党与日本妥协议和，牺牲中国利益给日本的阴谋活动。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日本为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利用英、美等国“对于在华权益受损的恐惧心理，以保证和助长他们的在华权益为诱饵”，压迫诱骗英美法等国放弃援蒋，诱胁中国投降，以期灭亡中国。英、美、法为集中力量对付德国和保住东方的利益，避免东西两线同时作战，企图促使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投降，以收买拉拢日本。1938年11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长河与蒋介石密谈7次后，在香港对日本表示“英国很愿作一个调停者”。美国国务卿赫尔宣称美国跟英国持相同步调。1939年初，英美通过报纸大量散布关于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解决中日战争的论调。4月，英大使卡尔从上海到重庆劝说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蒋介石集团表示响应，公开宣传“太平洋国际会议是有益于中国的，这不是什么慕尼黑，这是复兴中国的步骤”等。7月，英驻日大使克莱琪和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完全承认日本武装占领中国的“实际局势”，保证决不

干涉日军在华侵略行为。10月，美驻日大使声明，表示对于“东亚新秩序”，美国“切盼其实现”，但必须反对“排斥美国在华已久之权利”，承认和鼓励日本占领中国，以换取日本承认“美国在华权利”。欧洲战争全面爆发后，英美企图拆散德意日三国同盟，贿赂日本。美国虽于1940年1月废止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但大量的军事物资、特别是石油和铁，仍通过私人企业之手运往日本。5月，英国违反中立原则，与日本成立共管中国政府在天津租界所存白银的协定。7月，英日成立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3个月内禁止武器、弹药及铁道材料经缅甸和香港运往中国。9月，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直接威胁英、美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同月，德、日、意签订军事同盟条约，打击目标是美国，日、美矛盾更加尖锐。美国为对付德国，进行以牺牲中国，向蒋劝降为内容的美、日“谅解”活动。由于帝国主义间矛盾不可调和，特别是由于中国抗日军民的坚决反对和世界舆论的谴责，远东慕尼黑阴谋终未得逞。

【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在1939年底到1940年春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军事上、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攻。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集团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政治和军事双重打击。国民党军队对八路军的军事进攻主要在三个地区。第一是陕甘宁边区。1939年5月，国民党在边区周围修筑了5道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至黄河，绵延千里。12月，胡宗南部袭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5座县城。第二是山西。阎锡山的部队制造了“晋西事变”，向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发动进攻。并以一部兵力配合蒋介石的军队，向晋东南的决死第一、三

纵队进攻，摧毁了沁水等七个县的抗日政权。第三是冀南豫北地区。1940年春，国民党军石友三、朱怀冰部分别向冀南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区发动进攻。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使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着严重危机。各抗日根据地在中共中央指示下，站在自卫立场上，“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对于来犯之敌予以坚决回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被粉碎后，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决定休战，派朱德、肖劲光、王若飞分别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谈判，同他们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定驻地、分区抗战的协议。至此，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第二次反共高潮】1940年7月至1941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新四军发动的军事进攻。1940年7月，国民党向共产党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中心内容是削减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限制作战地点。共产党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国民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皓电”，强令在大江南北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11月9日，朱彭叶项发出致何白的“佳电”，驳斥“皓电”，拒绝华中部队北移的要求，但为顾全大局，同意江南部队可以北移。12月7日，蒋介石将《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下达执行。1941年1月4日，新四军皖南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由安徽泾县云岭出发，6日抵达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七八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军长叶挺前去谈判被扣。全军苦战7昼夜，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1月17日，蒋介石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至此，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中国共产党严厉揭露蒋介石的罪行，斥

责蒋介石破坏抗日、准备降日的阴谋，并提出取消 17 日反动命令、释放叶挺军长、惩办祸首等 12 条解决办法。同时重建新四军军部。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和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和拥护，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陷入被动与孤立。3 月 8 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表示皖南事变“不牵涉党派政治”，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皖南事变】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新四军的事件。1940 年 10 月 19 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朱德、彭德怀正副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发出“皓电”，强令新四军接电报后 1 个月内全部撤到旧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同意将安徽南部的的新四军部队调到江北。中共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对国民党顽固派可能的突然袭击缺乏准备，不按中共中央指示的路线前进。次年 1 月 4 日，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 9000 余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苏南向江北转移。5 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队包围和袭击。6 日，顾祝同所属上官云相等部 8 万多人，在蒋介石密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新四军与国民党军进行了 7 昼夜的奋战，终因众寡悬殊陷于绝境。为挽救危局，保全部队，叶挺致书上官云相，责其背信弃义，表示愿往上官总部协商。叶挺一到上官处即被扣压。14 日，新四军阵地完全被占领。全军除约 2000 人在黄火星、傅秋涛率领下突出重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项英遇害。17 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中国共产党进行回击，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上自卫，在政治上反攻。20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国民政府对日德意宣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日之间实际上已处于战争状态。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同日，美国政府对日宣战。欧亚美许多国家也相继对日宣战。12月9日，国民政府发表《对日宣战布告》（又称《对日宣战的通告》），指责日本军阀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在侵略中国的同时，悍然向英美开衅，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宣布：“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同日，国民政府又发表《对德意宣战布告》，指出自1940年9月德意与日本订立三国同盟条约以来，已成为同一个侵略集团。德意两国始则承认伪满洲国，继复承认南京伪政权，最近又与日本一起扩大侵略战争，“实为国际主义之蠹贼，人类文明之公敌”，因此，中国政府正式宣布：“自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午夜十二时起，中国对德意志、意大利两国处于战争地位，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或中、意之关系者，一律废止。”国民政府对日、德、意正式宣战，表明中国的抗日战争与各国的反对日德意法西斯的战争汇合在一起，中国人民与世界反法西斯各国人民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国共两党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谈判】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1942年夏和1943年冬两次派代表到重庆，就解决全国政治问题和国共关系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由于蒋介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谈判未获结果。1944年5月，中

共中央代表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在西安再次进行商谈。林伯渠提出在全国实行民主政治和循民主途径公平合理地解决国共关系问题，国民党代表反对实行民主，主张先谈军事问题及边区问题。关于编军数目，共产党方要求提出应先给6个军18个师编制，国民党只同意给4个军12个师。5月17日后，双方到重庆继续谈判。21日，林伯渠奉命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20条，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保障人民自由、承认中共及各党派合法、释放政治犯、实行地方自治、停止反共等。国民党代表称这些要求无异于暴露“国民党之罪状”，拒绝转达。6月，国民党代表向中共提出“国民政府提示案”，强调所谓“军令政令之统一”，要求把八路军、新四军4/5以上限期取消，接管各解放区人民政权，此要求被中共拒绝。4个多月的谈判，没有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之后，美国为调解国共关系派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华。11月7日，赫尔利到达延安。次日，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进行谈判。赫尔利提出自己起草的并经蒋介石首肯的《为着协定的基础》的文件，作为谈判的基础。经过商讨，最后于11月9日双方达成《中共与中国政府的基本协定》草案5条，决定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并重建中国；改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所有各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颁布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文化的新民主政策，组成联合军事委员会；联合国民政府遵循民有民治民享之原则，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各党派平等合法等。中共中央授权毛泽东在文件上签字。但当周恩来等到重庆后，蒋介石拒绝签字，而是抛开《协定草案》，另提3条反建议，拒绝实行民主联合政府。12月7日，董必武、周恩来回延安。1945年1月中旬，赫尔利电邀周恩来赴重庆进行再次商谈。1月24日，周恩来抵重庆，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建立民

主联合政府的立场，并提出召开党派会议以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方针。2月13日，蒋介石宣称“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拒绝继续谈判。2月16日，周恩来飞返延安。3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公开宣布不能结束党治，不能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并决定在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党操纵的“国民大会”。这是国民党采取的一个严重步骤，它断绝了国共谈判建立联合政府的一切希望，国共谈判告一段落。

【新疆三区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北部伊犁、塔城、阿山地区各族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1942年，盛世才投靠国民党，在新疆逮捕、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并成立国民党省党部。之后，国民党政府开始直接统治新疆，调进军队，建立自卫团、特务组织，强制推行保甲制度。1944年3月，新疆省政府发布为国民党军队捐献骏马1万匹的命令，并勒令以高出市价1/2的马价折收现款，激起伊犁、塔城等地牧民的强烈不满，掀起反献马斗争。9月，尼勒克境内的哈萨克、维吾尔等族人民，在包尔汉领导的秘密组织发动下，首先举行反对献马的起义。10月初攻占尼勒克县城。11月7日，伊宁人民也发动起义，12日，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到1945年1月，歼灭了艾林克巴的国民党军队，控制了伊犁全境。3月8日，将起义部队1万余人组成正规的革命武装民族军。5月，民族军开始向新疆政府展开全面进攻。7月，占领塔城。9月，占领阿勒泰。9月中旬，塔城地区全部解放。同时，民族军在阿山起义军配合下东进，围攻阿山，占领了布尔津，控制了阿山全境。至此，起义人民完全控制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政权。之后，各地起义群众代表在伊宁市召开会议，改组临时革命政府，正式组织了伊、塔、阿三区革命政府。

【第三次反共高潮】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为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而发动的反共高潮之一。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指责共产党“破坏抗战”、“妨碍统一”，必须铲除。同时调动华中的国民党军队，向新四军的豫皖苏和淮北抗日根据地进攻，并准备进犯山东根据地。6月，又乘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机，发动反共的舆论攻势。军统特务机关拟定了《解决中共问题之方案》。接着，陕西的国民党军队连续召开作战会议，订出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作战计划，大量抽调河防部队，会同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7月间，以先头部队发动了数十次试探性进攻。还操纵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反共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政治上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5月，毛泽东作了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谈话。7月上旬，朱德分别向蒋介石、胡宗南发出抗议电。同时《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质问国民党》等一系列社论和文章，批驳《中国之命运》所鼓吹的政治思想和政策。解放区军民也充分动员起来，保卫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打退了向冀鲁豫和鲁南进攻的李仙洲部，新四军全歼进攻淮北的韩德勤部，并击退了顽军对苏南和鄂豫皖的挑衅。第三次反共高潮遂告终止。国共两党重新恢复了谈判。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5月，德国战败投降，欧洲战争结束。同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为讨论欧战结束后的具体问题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会谈。三国领导人为迫使日本政府早日投降，决定以中、美、英三国政府名义发表促

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7月26日公告正式发布。次日，日本政府决定观察苏联动静后再作处理，对公告发表了“不予理会”的声明，拒绝无条件投降。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了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宣布赞成《波茨坦公告》。8月9日百万苏联红军在海空军支援下分4路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造成重大伤亡。在此情况下，日本统治集团连忙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研究接受波茨坦公告问题。8月1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在“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于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的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同时日本政府通过瑞士、瑞典两个中立国向中、美、英、苏4国发出“乞降”照会。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8月15日，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美、英、苏4国同时宣告，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美、英、苏4国同意任命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统帅接受日本投降，并负责占领日本本土。9月2日，在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战区，9月9日在南京举行签字仪式，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重庆谈判】1945年8—10月，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的谈判。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于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陪同下，飞抵重庆，同国民政府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举行谈判。谈判从8月29日开始，至10月10日结束。谈判的主要内容：关于和平

建国的基本方针；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关于人民自由问题；关于党派合法问题；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关于奸伪问题；关于受降问题等 12 个方面的问题。在此期间，毛泽东直接同蒋介石就两党关系重大问题进行过多次商谈。9 月 3 日，中共代表提出关于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 11 项提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结束国民党的党治等，并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9 月 8 日，国民党政府代表根据 4 日蒋介石亲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对中共的 11 项提要提出书面答复。蒋介石对这次谈判的方针是，准备在政治上作出一些关于开放民主自由的空头许诺，但一定要在“政令军令统一”的名义下取消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存在。因此，国民党方面对于中共代表提出的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党派合法平等、结束党治、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项方案，表示接受；但对于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地位，却坚决不予承认。经过谈判，10 月 10 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予以发表。10 月 11 日，毛泽东等在张治中的陪同下飞回延安。重庆谈判和《会谈纪要》的发表，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

【一二一血案】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为镇压昆明学生的民主运动而制造的惨案。1945 年 10 月《双十协定》签订后，国民党政府背信弃义，调集军队向华北、东北解放区进攻，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国统区人民掀起反内战运动。1945 年 11 月 25 日，在西南联合大学，昆明 6000 余名大、中学生、教师和各界人士，举行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时事讨论会。国民党当局包围了会场，并鸣枪

进行威胁，同时还派特务进入会场捣乱。次日，爱国学生游行示威，联合罢课，抗议当局反人民、反民主的行动。28日，昆明31所学校学生联合发表《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提出了制止内战、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撤退驻华美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等口号。12月1日，国民党出动军警、特务暴徒数百人，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毒打学生，投掷手榴弹，致使4名师生遇难，重伤20余人。惨案发生后，重庆、成都、延安、上海等地学生举行游行示威，通电抗议，要求严惩凶手。在全国各界人民抗议下，蒋介石让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自请处分”，将云南省代理主席李宗黄调离省外。

【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1945年11月25日，以乌兰夫为首的蒙汉各族领导人在张家口主持召开了内蒙古各盟旗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作为统一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机关，并在各盟建立分会。内蒙古东部地区，自治运动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封建上层分子手中。1946年1月16日，内蒙古东部地区，成立了“东蒙古自治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1946年4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东蒙古自治政府在承德召开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即“四三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主要决议》，确定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针是平等自治（即区域自治），而不是独立自治；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领导机关，撤销东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改造内蒙古武装，并分别直属人民解放军各军区统一领导和指挥。乌兰夫当选为自治运动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其后，于1947年4月24日，在乌兰浩特召开了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盟

旗、各民族、各阶层的代表 393 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成立内蒙古自治区和选举内蒙古自治政府等问题。大会上乌兰夫作了政治报告。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施政纲领规定，自治政府是内蒙古地区的蒙族联合其他民族实行区域自治的民主政府，自治区是祖国不可分离的一个组成部分。代表会议选出了临时参议会；参议会选出了内蒙古自治政府，乌兰夫当选为自治区政府主席。1947 年 5 月 1 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它标志着蒙、汉人民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下关惨案】1946 年 6 月中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上海市学生和平促进会联合发起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又称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推派马叙伦、胡厥文、龚延芳、阎宝航、吴耀宗、盛丕华、雷洁琼、包达三等 10 数人为代表，以马叙伦为团长，于 6 月 23 日赴南京请愿，呼吁制止内战，实现和平。是日上午，上海各界人士数万人为代表团送行，并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当天下午，请愿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伪装成“难民”的国民党特务、暴徒的包围毒打，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等请愿代表多人被打伤。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闻讯后，当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赶赴医院慰问受伤代表。这是国民党当局在发动全面内战前精心策划的又一惨案。

【较场口事件】即较场口血案。1946 年 1 月 31 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为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和促使政协五项协议的贯彻实施，2 月 2 日，由陪都协进会等 19 个团体发起，定于 2 月 10 日上午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大会邀请李德全为总

主席，李公朴为总指挥，并由郭沫若、马寅初、李公朴、施复亮、章乃器等 20 余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是日上午，当参加大会的群众团体陆续进入会场时，国民党特务和暴徒进入会场，抢占主席台，打伤大会主持人李公朴及在场的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章乃器、陶行知等和新闻记者 60 多人。

【李闻惨案】李公朴、闻一多同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民盟西南支部负责人、西南联大教授。1946 年 6 月，民盟和昆明各界人士发起反内战要和平的万人签名运动，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仇视。南京国民政府密令昆明警备司令部、宪兵 13 团等军警机关：“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对于该党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宜处置”。昆明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奉令后，拟定了逮捕、暗杀民盟负责人名单，李公朴、闻一多均被列入其中。7 月 11 日晚，李公朴在回家途中遭特务杀害。7 月 15 日下午，闻一多出席为李公朴被害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后，在回家途中亦被特务暗杀。李闻惨案发生后，引起国内各阶层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极大愤慨。西南联大和云南昆明各校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罢课，要求严惩凶手。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均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

【国民党政府接收日伪财产】抗战胜利到 1946 年 7 月，国民党政府接收的敌伪财产总值不下 4 万亿元法币。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急剧膨胀达到了高峰。国民党政府把全国划分为 7 个接收区：苏浙皖、湘鄂赣、粤桂闽、冀热察绥、鲁豫晋、东北、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官方接收机构资源委员会，从南京、上海、武汉、山东、海南、北平、天津、台湾、东北接收的日伪企业合计 292 个，改组

单位 64 个。据美国政府估计国民政府经济部接收的日伪财产总值达到 18 亿美元，合法币 5400 亿元。资委会接收的日伪企业合并组成 111 个总公司或总机构。金融业方面：四大家族控制的“四行二局”（即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中华邮政储金汇业局），接收了日伪大批金融机构和财产。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仅伪中央储备银行库存黄金就有 553492 两，白银 7639323 两，银元 371783 枚，外币 550 万美元；伪中国联合银行库存黄金 17 万两，外币 10201460 美元，26544 英镑。这些全部被中央银行接收。蒋介石兼任四行联合办事总处主席，总揽一切。四行二局完全统制全国金融。工业方面：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全国接收的工矿事业及公司企业总数，截止 1947 年 9 月，共计 3255 个单位。交通运输业方面：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敌伪全部交通运输。到 1946 年底，国民党统治区的铁路达到 12788 公里；水运为 20203 公里；民航拥有飞机 84 架，航线 22 条。商业方面：接收的日伪商业共有 355 个单位（东北地区除外）。其中属于敌伪产业的 335 家，资产总值 4.77 亿元（法币）；属于盟国和其他国家产业的有 19 家，属于本国民营产业的只有 1 家。除后二者发还给原主经营外，前者 335 家全部归官僚资本所有和经营。国民党政府战后的所谓“接收”，正如李宗仁所说，“实在是‘劫收’”。蒋介石也承认：“由于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上海摊贩斗争】抗战胜利后，上海靠地摊为生的小贩约达 10 万人，主要是破产或半破产的中小商人、城市贫民、失业工人、职员和由乡村来上海谋生的农民。所贩卖的主要是走私美货、国民

党官吏倒卖的“劫收”物资，破产工厂、商店的存货和破产家庭出售的旧货等。1946年9月，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生计，以“妨碍市容”、“妨碍交通”为名，下令取消摊贩，并抓捕摊贩，没收货物。黄浦区摊贩代表16人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收回不许设摊成命，发还没收的物资等要求，并组织请愿游行，但毫无结果。10月，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将摊贩完全驱散。11月，国民党上海市政府采取了更为严酷的手段，凡属摊贩一律取缔，警察上街巡视，仅黄浦、老闸两区被抓摊贩达千人。11月30日，上海3000名摊贩及家属向上海市参议会游行请愿，并包围了黄浦、老闸警察分局，要求释放所有在押摊贩。上海市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打死小贩7人，多人受伤。市长吴国桢下令从12月1日起，“全市戒严”，违者“格杀勿论”。12月1日，示威群众增加到5000人以上，他们用石块、木棒同镇压的警察搏斗，群众被打死10余人，伤百余人，300多人被捕。于是激起更大的反抗。全市公共汽车、电车停驶，商店停业，参加斗争的群众达5万余人。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收回了取缔摊贩的命令，允许黄浦、老闸两区摊贩继续营业，撤换了黄浦区的警察局长。上海摊贩斗争遂暂告结束。

【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简称抗暴运动。1946年12月24日晚，圣诞节前夕，北京大学女生沈崇在看完电影返校途中，行至东单广场附近，被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强行奸污。事件发生后，激起北平市民的强烈愤慨。12月26日，北大女生集会，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提出强烈抗议。12月30日，北大、清华、燕京、中法、辅仁、师大、朝阳等大学教授、学生和一些中学学生近万人宣布罢课，游行示威，高呼：“抗议美军暴行！”“美军滚出中国去！”等

口号，并成立了“北京大学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1947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响应北平学生反美反蒋运动的指示》，充分肯定北平抗暴运动是爱国运动，要求各大城市中共地下党组织群众响应，并坚持下去。国民党当局却歪曲事实，为美军的罪行辩解。从而使北平开始的抗暴运动，很快波及到全国，南京、天津、武汉、重庆、杭州、台北等数十座大中城市，先后有50万以上的学生罢课，示威游行，并得到各界人民的支持。3月8日，全国学生抗暴联合会上海成立。抗暴运动在全国持续3个月之久。推动了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1947年2月27日，台湾省专卖局武装缉私队和警察，在台北市殴打一名女烟贩，抢走6000元现金，并开枪打死在场围观的一名市民。这一事件，成为台湾人民起义的导火线。2月28日，台北人民举行罢市、游行请愿，提出惩凶、赔偿、撤销专卖局等要求，国民党军队开枪打死、打伤请愿群众各3人，从而激起全省人民的愤慨，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国民党政府暴政的人民武装起义，起义群众夺取广播电台，呼吁台湾人民起来反抗暴政。抗暴斗争迅即从台北扩大到台湾全省。到3月8日，起义群众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同一天，从大陆赶来的国民党援军，在基隆登陆，由白崇禧指挥，对台湾人民进行镇压和屠杀。至3月13日，将起义群众镇压下去。据不完全统计，被杀害的群众达5万人以上。

【国民政府改组】1947年3月15—24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一方面申明要结束一党训政的局面，“还政于民”，另一方面，却表示要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4月17日，蒋介石主持召开

国民党中央会、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通过了国民政府改组名单。4月18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改组国民政府委员会”。国府委员名额分配为：国民党12席，民社党4席，青年党4席，社会贤达4席，五院院长（均为国民党员，为当然委员）5席。国民党实际占17席，超过半数。蒋介石还声称给共产党（条件是放弃武装）和民盟保留11个席位。“改组”后的国民政府组成人员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副主席孙科，行政院院长张群，立法院院长孙科（兼），司法院院长居正，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蒋介石宣称：“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已完成多党之政府，政府权力以往属于国民党负责，此次改组以后，将由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共同行使。从形式上看，“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和行政院的组成人员是所谓“多党政府”，但在实质上仍是国民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统治，所不同的是以青年党、民社党做陪衬，变成“一党训政，多党做官”的政府。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1947年5月初，上海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提出“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运动扩大到全国各地。5月19日，上海7个大专学校学生7000余人，不顾政府的威胁，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5月20日，在南京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大会开幕的当天，京沪苏杭地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6000余人，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示威大游行”。提出增加伙食费和全国教育经费等5项要求，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当游行队伍行至珠江路口时，遭到国民党武装军警宪特用水龙、木棍、铁棒、皮鞭等凶器的冲击和毒打，并进行逮捕。据事后统计，在这次事件中，被

打的学生在 500 人以上，重伤 20 多人，被捕 20 余人。史称五二〇惨案。同一天，在北平、天津上万名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示威的学生，也都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许多学生被打伤。南京五二〇惨案发生后，学生运动迅速波及全国。5 月下旬以后，武汉、西安、长沙、重庆、成都、贵阳、昆明、广州、福州、南昌、桂林等数十个大中城市的学生，相继举行罢课、示威游行，求生存，求和平，求自由，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暴行。坚持了为期近 1 个月的斗争，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

【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与限价政策】1948 年国民党政府面临迅速崩溃的局面，在军事上节节失败，政治上土崩瓦解，经济上严重危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整个社会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国民党政府为了挽救其财政危机，宣布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元券”以代替法币。1948 年 8 月 19 日，蒋介石使用总统特权，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又称八一九防线）。随令附 4 个办法：（1）《金元券发行办法》。规定以金元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限额为 20 亿元。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和东北流通券。以法币 300 万元兑换金元券 1 元，东北流通券 30 万元兑换金元券 1 元。（2）《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规定人民持有的金、银、外币限期到中央银行兑换成金元券。逾期不兑换者一律没收。（3）《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规定限期登记管理中国人（华侨除外）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4）《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规定各地物价冻结在 8 月 19 日的水准上，依照兑换率折合金元券出售，由当地主管官署监督执行。废止按生活指数发给薪资办法。为强行推行此令，8 月 21

日，蒋介石任命俞鸿钧、张厉生、宋子文分别为上海、天津、广州三个经济管制区的督导员，蒋经国、王抚洲、霍宝树分别协助督导，并赋予他们以行政及警察指挥大权。这项法令推行的结果是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金元券发行不到3个月，就突破20亿元的限额。通货恶性膨胀，物价猛烈上涨，金融极度紊乱，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彻底失败。金元券虽然只发行了9个多月，而国民党政府却从中掠夺走大量金、银、外币。蒋介石1949年1月下台后，还下令把中央银行收存的金、银、美钞和珠宝悉数运往台湾。上海解放前夕，又将黄金11万两、白银3亿多两运往台湾。至1949年6月金元券发行额已达到130万亿元，即为原定发行额的6.5万倍。金元券的发行量猛增，面额也越来越大，已如同废纸，被社会拒绝使用。因此，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停止其流通。“币制改革”彻底破产，促使国统区经济更加迅速地走向总崩溃，加速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在大陆崩溃。

【中共中央军委颁发全军整编令】194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中央政治局九月扩大会议精神发出通令，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的组织编制、番号作了统一规定：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野战军分为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五大野战军；一级军区共5个，即中原、华北、东北、华东及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称的西北军区。此外，还有华南游击纵队。194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指示，各野战军改为按序数排列，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依次改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华北野战军3个兵团直属中央军委。全军于2—4月先后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

山，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下辖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政委王世泰。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下辖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谢富治；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粟裕，第一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下辖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启龙；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委袁仲贤；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第一政委罗荣桓，第二政委邓子恢，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一参谋长肖克，第二参谋长赵尔陆。下辖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肖华；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政委莫文骅；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特种兵司令部，司令员万毅，政委钟赤兵。解放军总部直属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徐向前；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罗瑞卿；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委李井泉；铁道兵团，司令员滕代远，副司令员吕正操。五大军区：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习仲勋，副司令员王维舟，参谋长张经武。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司令员陈毅、李先念，副政委邓子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委饶漱石，副司令员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舒同。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副政委李富春，参谋长伍修权，政治部主任周桓。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副司令员徐向前、滕代远、肖克，参谋长赵尔陆，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整编后，全军总兵力已达 400 万人，使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建设迈进一大步。

【国共北平和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基本上被消灭。美国政府为使南京政府取得喘息时间，挽回败局，从各方面策动重开国共“和平谈判”，逼迫蒋介石下野，由桂系李宗仁出面与中共进行“和谈”。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与此同时，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主席起草的1949年元旦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谈的8项条件：（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李宗仁上台后，于1月22日宣称南京政府愿意在中共方面所提8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同日，南京政府行政院会议决议：特派邵力子、张治中等5人为和谈代表。2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与受李宗仁派遣，以私人资格来访的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达成关于国共和谈的非正式协定8点，主要内容为“谈判以中共1月14日声明及所提8点为基础”。3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同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决定，并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4月1日加派聂荣臻）为和谈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毛泽东主席1月14日声明的8项条件为基础，自4月1日起在北平同南京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团成员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燏、刘斐和顾问屈武等人，开始举行谈判。到4月12日，拟定了

《国内和平协定（草案）》。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8条24款，交给南京政府代表团。中共代表团要求南京政府在4月20日前答复。黄绍竑、屈武携《协定》飞南京复命。但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导致谈判破裂。当夜，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宣告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平骗局的彻底破产。

【绥远和平解放】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西北军政副长官、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率16个师约6万人，驻守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地区。董其武等人受北平和平解放的影响，主张走和平解放之路。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绥远国民党军队可原封不动，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在一段时间之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改编。接着，中共中央本此精神，提出了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各项具体方案。由华北人民政府和傅作义各派出代表在北平具体协商。3月23日达成了包括军队划界驻守、平绥铁路通车、在绥远使用人民币和互派联络人员等项内容的《绥远和平协议》草案。经董其武同意后，双方代表于6月8日签字生效。7月，华北人民政府组成联络处进驻归绥，协助董其武准备起义。8月26日，中共中央委托傅作义和邓宝珊赴绥远慰问董其武部，协助董其武组织起义。在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和中共政策的感召下，以董其武为首的39名绥远军政各界代表，排除国民党反动派设置的重重障碍，于9月19日通电全国，宣布起义。至此，绥远全境解放。绥远的和平解放，创造了人民解放军解决残余国民党军的一种新的方式——绥远方式。

【资源委员会起义】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是主办重工业的部级机关。它接收的日伪企业合并组成 111 个总公司或总机构，拥有生产单位近千个，职员 3.2 万人，工人 60 多万人。1948 年 10 月，资委会委员长孙越崎，在南京秘密召集资委会本部及各地重要企业负责人开会，讨论资委会的去留问题。并寻求途径与中共联系。1949 年 2 月，资委会总部由南京迁上海。资委会通过其财务处长季树农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取得联系。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之际，孙越崎、吴兆洪率领全体人员起义。5 月 27 日，在孙冶方主持下，对资委会进行接管。后来资委会创建人翁文灏、钱昌照也从国外回到北京。

【台湾重归中国版图】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自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政府失败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将台湾与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43 年 11 月，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发表宣言：确认战胜日本以后，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 月 12 日，负责处理在台日军集中及受降事宜的中国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警备司令部前进指挥所成立。10 月 17 日，国民党第七十军在基隆港登陆。10 月 22 日，第十二军在高雄登陆。10 月 25 日，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举行，日本驻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向国民政府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递交了投降书。随后，陈仪发表广播讲话，宣布：自 1945 年 10 月 25 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归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

【新疆和平解放】1949年中共中央向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表达了和平解放新疆问题的主张。与此同时，张治中也致电陶，表达了同一意向。起义从七八月间开始酝酿，至9月25日发出通电；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也于26日率政府人员通电起义。新疆宣布和平解放。毛泽东、朱德当即复电陶峙岳、包尔汉表示赞赏。中共中央军委派王震率第一兵团进驻新疆。新疆起义部队于1949年12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任政委。1950年1月，新疆民族军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9月27日，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29日，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30日下午，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180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由63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董必武、贺龙、林伯渠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通过了宣言，向人民解放军致敬电和竖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办法及碑文。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定于北平，并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10月1日下午2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宣布

就职。委员会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检察长。会议决定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同时发表公告，向世界各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愿和遵守平等互利及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下午3时，首都30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乐队奏国歌。毛泽东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并随即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完成祖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并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事宜。西藏地方政府迟迟不派出代表，并在昌都部署藏军主力。1950年10月，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和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联合发布进军西藏的政治动员令。11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分路渡过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向西藏进军。19日解放昌都，歼灭藏军主力5700余人。西藏上层统治集团迅速分化。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抵达北京，双方达成《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951年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抵达拉萨。10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进抵拉萨。

【高岗饶漱石事件】1953年中国共产党党内发生被定为反党性质的事件。高岗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饶漱石原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高、饶于1952年底和1953年初先后调到中央工作，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1953年6—8月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高岗制造党内纠纷。在同年9—10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饶漱石积极配合，展开反对党中央的活动。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胡风是长期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的文艺评论家。1952年9月25日舒芜在《文艺报》发表了揭露“以胡风为首的小集团”的言论。1952年下半年，周扬召开由中国文联、作协党组扩大会召开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帮助胡风提高认识”。1953年春《文艺报》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了全面批判。胡风于1954年3—7月写《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进行反驳。12月8日周扬作《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专讲“胡风先生的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说胡风“表现了狂热的仇视”。郭沫若称胡风的意见书是“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从此展开了批判胡风思想的高潮。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此期间，有关部门掌握的胡风致舒芜的私人通信转给了毛泽东。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表明了矛盾性质的转变。此后至6月10日又发表两批“关于胡风反革

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亲自写 20 多条按语，随后又为单行本写了序言。三批材料都是胡风和他的追随者之间的书信往来。共 168 封。信件语气尖刻，使用了许多极易被人误解的政治性言词。毛泽东据此所下的判断，则把他们定成了“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他们“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这样，由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发展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5 月 17 日胡风被逮捕。在全国各地揭露所谓“胡风分子”。这场斗争触及到 2100 多人，被逮捕 92 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 78 人，骨干分子 23 人，胡风先是被隔离审查，1955 年 8 月入狱。被判有期徒刑 14 年。1965 年 12 月 30 日获释，监外执行刑期。1966 年 2 月到四川劳动改造。1979 年 1 月获得自由。1980 年 9 月中共中央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参见第六卷中的“胡风”。

【丁陈反党集团案】 1955 年的整风运动中，丁玲、陈企霞被认为向党进攻，被错划为“丁陈反党小集团”。1957 年反右斗争中，又被划为“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丁玲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58 年遭到“再批判”，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文革”期间，受到“四人帮”残酷迫害，曾被关进监狱。1979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返文坛，并于 1984 年 8 月 1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经中共中央批准，颁发《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从而为“丁陈集团”彻底平反。丁玲又担任了中国作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并勤奋写作和参加国际文学交流活动。丁玲于 1986 年 3 月 4 日病逝。参见第六卷中的“丁玲”。

【平定西藏叛乱】1959—1962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定西藏地方政

府和上层反动集团为维护反动的农奴制度、分裂祖国而发动的武装叛乱。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包围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在拉萨的派驻机构。17日，达赖喇嘛等人逃往印度。19日夜，反动集团指挥藏军和叛乱分子向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人民解放军奉命于20日开始平叛作战，迅速摧毁了叛乱集团设在拉萨和山南的两个指挥中心。并进驻边境国防要点，控制了雅鲁藏布江以南、喜马拉雅山以北的广大地区。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至1962年初西藏叛乱全部平息。

【苏联政府毁合同撤专家】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苏共领导采取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片面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同，还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1390名，并终止派遣专家900多名。专家撤走时，把设计图纸、计划和资料全部带走，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使中国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行动，严重破坏了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给中国当时的经济建设造成巨大困难和重大损失，进一步破坏了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

【新疆伊犁事件】 60年代初期苏联在中国新疆伊犁地区制造的大规模诱骗中国居民叛逃和武装叛乱的事件。1962年4月，苏联驻中国新疆领事馆在新疆塔城等地，公开进行颠覆活动，诱骗塔城、裕民、霍城3县居民6万余人，逃往苏联。5月25日，一小撮暴徒在苏联领事馆的煽动、指挥下寻衅闹事，攻打自治州州委、人委机关，抢走大批档案文件，制造了伊犁暴乱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再三提出抗议和交涉，要求苏联方面遣返被胁迫出境的边民，但苏联政府一直以种种借口，拒绝遣返。

【毛主席语录的出版】 1964年5月正式出版。从1961年5月起，《解放军报》根据林彪的指示开始刊登毛主席语录，到1964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该报登载过的语录，加以补充，编纂成书出版。林彪自1959年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曾多次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提出了“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口号，主张“走捷径、背警句”，后来，在全国形成学习《毛主席语录》，背诵《毛主席语录》的风潮。这种作法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

【彭明敏事件】 1964年9月20日，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三人被台湾当局逮捕。彭明敏，原籍高雄，1923年出生于台中大甲。1942年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46年初返回台湾，不久转入台湾大学政治系。1948年台大毕业后在该校担任助教。50年代赴加拿大和法国深造，获硕士、博士学位。后任台大教授。1960年被选为台湾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1961年被台湾当局派任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顾问。1962年，彭明敏受蒋介石亲自召见。此

后，彭明敏经常公开讨论台湾地位问题。1964年初，彭明敏与曾是台大法学院学生的谢聪敏、魏廷朝商议将他们反复讨论形成的观点写成文件散发出去，遂由谢聪敏执笔、彭明敏指导修改写成《台湾人自救运动宣言》。宣言中提出三大目标和八点原则，并在结语中写道：“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外，从台湾选择第三条路……自救的途径。”同年9月20日，彭明敏等人受到逮捕，1965年被控“以不法手段图谋推翻政府”而受到审理，彭明敏、魏廷朝各被判刑8年，谢聪敏被判10年。1965年11月3日彭明敏被“特赦”，但仍受到24小时的严密监视。1970年1月3日，彭明敏在美国的帮助下逃脱监视网，偷渡出境到达瑞典，得到瑞典政府的政治庇护。同年9月27日，彭明敏抵达美国，遂受聘于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4年10月16日，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地区爆炸成功，这是中国科学技术的重大成果，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原子弹爆炸的同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同时，还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

【中苏论战】布加勒斯特会议后，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制造伊宁暴乱事件，支持印度向中国边境入侵。1963年7月中苏两党会谈前后，苏共领导接连公开发表声明和决议攻击中国共产党。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将中苏两党的争论公布于全世界。为了说明真相，澄清事实，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答辩。这样中苏两

党之间便开始了一场公开论战。首先，《人民日报》发表了苏共中央的上述“公开信”和苏共中央的许多重要文章、讲话和决议。随后，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陆续发表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反对了苏共领导的霸权主义，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中共党的独立自主地位。这是当时斗争所必需的。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这些文章的部分观点是不恰当的。

【三家村反党集团案】继批判《海瑞罢官》之后，康生、江青等人出于打倒彭真、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的需要而制造的迫害吴晗、邓拓、廖沫沙的冤案。1961年春，《北京晚报》邀请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主管文教方面工作）邓拓写一些知识性杂文。邓拓考虑到“北京”和“晚报”的特点，将栏目定名为“燕山夜话”。是年夏天，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也邀邓拓开辟杂文专栏。邓拓约吴晗、廖沫沙合作，各选题目，文责自负，定名为《三家村札记》，署笔名吴南星（吴——吴晗，南——邓拓笔名马南邨，星——廖沫沙的笔名繁星）。邓拓从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为“燕山夜话”专栏写杂文150余篇。后来结集成书，先后印行30万册，受到读者好评。《三家村札记》起于1961年10月，结束于1964年7月，每人各写约20篇。上述马南邨、吴南星的杂文，大多是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和调整时期比较宽松的政治空气中写的，内容广泛，具有相当高的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也有较高的写作技巧。《燕山夜话》的文章多是有感而发。有28篇还是读者出题目，作者写文章。1966年春，江青一伙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大兴文字狱。他们继埋下批判《海瑞罢官》这个导火线之后，又选择“三家村”为突破口，矛头直指北京市委。经过周密策划，5月8

日署名高炬（江青的写作班子）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一文在《解放军报》发表；关锋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署名何明在《光明日报》发表。上述两报还联合刊载了《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材料摘编”，并加了煽动性的编者按。5月10日《文汇报》、《解放军报》同时刊出了姚文元为“三家村”罗织罪名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文。5月11日出刊的《红旗》杂志又刊出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这些文章指责4月16日《北京日报》对《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是“假批判，真维护，假斗争，真包庇”。把“三家村”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邓拓是这个黑店的“主将”。诬蔑邓拓等人“无孔不入、千方百计地推行‘和平演变’”，“三家村”是“和平演变的活标本”。随之，邓拓、吴晗、廖沫沙遭到迫害，邓拓、吴晗含冤而死。1979年8月这一冤案始得平反。

【一月风暴】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等策划的以“工总司”为首的“造反派”夺取上海市党政权力的事件。在1966年冬开展的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中，林彪、江青就授意张春桥、姚文元煽动上海“造反派”集中攻击中共上海市委。11月9日成立的以王洪文等人为头目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即工总司），明确提出“我们要夺权”。此后，他们在上海不断制造卧轨拦车、武斗等事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承认其为合法组织。1月2日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调查员身份到上海。1月4日、5日上海“造反派”先后夺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权。1月6日又以32个“造反组织”的名义召开大

会批斗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市长曹狄秋，还把几百名干部揪到大会陪斗，大会发表《通令》宣布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1月8日毛泽东予以高度评价，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月16日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夺权。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把上海夺权同“巴黎公社”相比，把上海市政权称为“上海人民公社”，2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正式成立。2月24日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张春桥为主任。从此，全国各地从上到下掀起了夺权的狂风。党政领导机关几乎都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各派组织为夺权而展开武斗，许多军事机关和军事院校也受到冲击。

【二月逆流】在1967年1月19—20日军委会议和2月中旬在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同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进行的斗争，当时被诬称为“二月逆流”，实际是“文革”初期一次党内公开的抗争，应称为“二月抗争”。1月初，江青、林彪一伙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中央文革提出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并要求在军内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遭到老师们的坚决反对。最后拟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毛泽东同意照发。在政治局碰头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老师们同中央文革成员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张春桥等人整理了一份2月16日会议的记录，向毛泽东汇报。2月18日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指责这些老同志是

搞复辟、搞翻案。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开了七次批判他们的“政治生活会”，给他们扣上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风运动”等大帽子。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和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再次批判了“二月逆流”。毛泽东的看法后来有变化，1971年11月14日讲了为“二月逆流”平反的话。

【武汉七二〇事件】1967年7月20日武汉的一派群众组织和解放军一些指战员，质问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人支一派压一派，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反革命事件”，“百万雄师”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同时诬蔑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等“搞兵变”，被撤职并调到北京接受批斗。实际上，是林彪、江青为了打倒所谓“军内一小撮”，清除他们篡党夺权在军队中的障碍而制造的打击武汉军区的事件。林彪多次指使吴法宪等人在军内“揪一小撮”。5月初，中央文革的一些人对武汉的造反派头头说：“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武汉的谭震林是陈再道、孔庆德、韩东山，后台是徐向前”。7月14日周恩来、毛泽东先后抵达武汉。谢富治、王力等亦以“中央代表”身份由重庆到了武汉。后王力等人挑起两派争执，“百万雄师”揪斗了王力，被中央文革诬为兵变，陈再道等人下台，“百万雄师”被打成反动组织。据湖北省委统计，七二〇事件之后，全省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达18.4万余人，仅武汉市就被打伤打残6.6万多人，被打死600多人。197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武汉军区关于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为该事件和受迫害的人员平反。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为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制造的把薄一波等 61 人打成“叛徒集团”的错案。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一批早期参加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1932 年以后陆续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后改为北平军人反省分院）。1935 年以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掀起抗日救亡高潮。中国共产党极需要领导抗日运动的干部。当时任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的柯庆施建议，让在狱中的这批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刘少奇接受建议，做出营救他们出狱的决定并上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经研究同意这个报告，由总书记张闻天代表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并向狱中的薄一波等人做出保证：这是特定条件下从党的利益出发作出的决定。政治上和组织上党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不以叛徒论，组织上不歧视。于是，薄一波等人从 1936 年 8 月 31 日至 1937 年 3 月分 9 批在《华北日报》、《益世报》上连登监狱拟好的“反共启示”后出狱，随即参加了抗日战争。这是一件清清楚楚的事。1944 年 3 月薄一波到延安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北平草岚子监狱 5 年半的斗争。任弼时也找薄一波谈出狱问题，表示党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党中央完全承担组织上和政治上的责任。对此，康生更是清楚。但是，康生为了打倒刘少奇及一大批干部，1966 年 8 月他一面让“彭真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就此事进行调查，一面又制造所谓“群众揭发”的假象，指使红卫兵去查平津的旧报纸，一时全国各地高校中红卫兵组织中掀起一股“抓叛徒”的狂风。9 月 16 日康生为此写信给毛泽东，取得了支持。至 1967 年春，“中央文革”大造“小将们查出叛徒集团”的舆论。康生、江青也由幕后跳到前台，大肆鼓噪。1967 年 3 月 16 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

材料的批示》，正式给他们定性为“叛徒集团”、“自首叛变出狱”和“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刘少奇的这个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变的合法根据”，这些人“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批示》还移花接木，把毛泽东 1967 年 1 月 31 日对《农口运动情况的报告》写的一段话用到这里，以欺骗群众。同时，康生、江青一伙还逼迫张闻天做假证，但张闻天坚持真理，于是 1968 年 5 月 16 日被非法隔离拘禁。1978 年 12 月 16 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纠正了这一重大错案。

【全国山河一片红】“文化大革命”中，对 29 个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后的形势的概括。1967 年上海“一月夺权”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各地区各部门的党政领导机关相继被夺权或改组。同年《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了《论革命的“三结合”》的社论，转引了毛泽东关于“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权威的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的指示。至 1969 年 9 月，全国（除台湾省外）29 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作为政府机构的革命委员会。这种情况，当时被称之为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九一三事件】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等人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事件。林彪谋害毛泽东主席的武装政变计划败露后，9 月 13 日零点 22 分林彪、叶群、林立果等 9 人在山海关机

场乘民航 256 号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零点 32 分，周恩来在北京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命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1 时 50 分，飞机越出国境，从萤光屏上消失了。周恩来立即驱车至毛泽东住所报告。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2 时 30 分左右该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 10 公里处坠毁。林彪集团的另一批亲信，当日 3 时左右从北京沙河机场乘直升飞机北逃，林彪的死党周宇驰用枪口对着驾驶员陈修文，强迫他飞往乌兰巴托。陈修文发现他们要叛国时，沉着地把飞机飞回到北京郊区上空，最后在怀柔县境内降落。周宇驰枪杀陈修文。周宇驰、于新野自毙，李伟信被当地军民捕获。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国是联合国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 5 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直被无权再代表中国的“中华民国”代表占据。中国要求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遭到主要来自美国的阻挠。美国操纵联合国，先是拖延讨论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继而又提出把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作为必须由联大以三分之二多数赞成才能作出决定的“重要问题”。一系列手段失败后。于是美国在 1971 年不但伙同日本佐藤政府向第 26 届联大再一次提出“重要问题”案，而且炮制“双重代表权”案，即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入联合国，又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明目张胆地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予以揭露。同年 10 月 25 日第 26 届联大以 59 票反对、55 票赞成、15 票弃权否决了“重要问题”案。接着又以 76 票赞成、35 票反对、17 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

及利亚等 23 国所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这样，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斗争中取得胜利，1971 年 11 月 15 日乔冠华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了联合国大会。11 月 23 日中国常驻安理会代表黄华出席了安理会会议，开始履行中国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职责。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恢复后，被联合国宪章称为“专门机构”的一些组织也陆续通过决议，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

【批判影片《中国》】1972 年 1 月 30 日，《人民日报》依照“四人帮”的布置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意大利著名摄影家安东尼奥尼在 1972 年春访问中国期间，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和林县等地拍摄了 3 个小时半的纪录影片，从一些侧面纪录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反映了他的观点和立场。而评论员文章则要求彻底揭露和批判这部影片的反革命实质，并认为：这是当前值得人们十分重视的思想和政治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这部影片的出现是对新中国极端仇恨的心理反映，是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这种所谓的批判，以“高、大、全”和“假、大、空”苛求于一个外国人，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蜗牛事件】1972 年 2 月 10 日，江青为美国康宁公司送给中国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的蜗牛礼品而制造的一起荒唐事件。1973 年四机部准备从国外引进一条彩色显像管生产线，得到周恩来及其他中央负责人的批准。江青、张春桥也批示同意。该部组成考

察团去美国考察。回国前，美国康宁公司送给每个团员一件工艺礼品——玻璃蜗牛。“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后，四机部一位干部写信给江青揭发此事，认为送蜗牛是污蔑我们爬行。江青指责了这件事，说引进彩管线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壓力，是崇洋媚外。并要四机部把“蜗牛”退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去，提出抗议。外事部门根据周恩来指示，查清了康宁公司赠送蜗牛并无恶意的事情真相，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收回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但此事使彩色显像管生产线引进推迟了数年，使其他技术交流和引进工作也陷于停顿。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建交】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开始谋求同中国接触。他利用出访的机会，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转告中国领导人：美国想与中国对话。1970年1月20日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恢复，在会谈中美中双方都表达了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举行较高级的会晤并进行政府间的接触。1970年10月下旬尼克松先后同叶海亚·汗和齐奥塞斯库会谈，愿意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问中国。他在公开讲话中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11月10—14日叶海亚·汗向周恩来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周表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预，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特使来北京商谈。11月下旬中国政府进一步表示：如果尼克松总统本人愿意访问北京，会受到欢迎。12月18日毛泽东同美国友人斯诺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

游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这之后双方都采取了一些改善中美关系的步骤。1971年4月14日周恩来接见了访问中国的美国乒乓球队，说：“你们这次应邀来中国访问，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取道巴基斯坦秘密访问中国，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公告。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访问中国。28日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联合公报》宣布双方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双方郑重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双方还认为，大国相互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关于台湾问题，“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

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公报还规定了中美两国在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问题。《联合公报》的发表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两国间扩大交往开辟了前景。后经过几次谈判，1978年12月16日晚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重申了《上海公报》中双方同意的各项原则，并且指出，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在中美建交的同日，美国将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中美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中日建交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于1972年9月25—30日偕大平正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应周恩来总理邀请访问中国。9月29日双方发表《联合声明》，主要内容是：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两国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双方宣布：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布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双方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

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两国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两国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同意进行以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从1975年起，中日双方就签订和平友好条约进行了谈判。1978年8月12日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0月23日起生效。

【台湾“民族主义”事件】1973年2月17日，台湾当局逮捕台湾大学教师陈鼓应、王晓波等人。1972年12月4日，在台湾大学举行的“民族主义座谈会”上，陈鼓应、王晓波及一些学生发言，主张祖国统一，在台湾进步知识分子中掀起爱国的民族主义浪潮。此前，陈鼓应、王晓波还在台湾大学召开的“言论自由在台大”、“民主生活在台大”两次座谈会上，发言反对依赖外国，更反对搞“两个中国”和“台独”，也反对买办文化，主张坚持民族立场，依靠本民族的力量，走自己的路，并要求当局实行言论开放。这些言论反映了台湾青年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对台湾现状的不满。台湾当局不能容忍这些民主爱国言论，加之有人密告陈鼓应等“要组织读书会，阅读中共文件及毛泽东著作，借机扩大成员，搞学生运动”。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在1973年2月17日，以“为中共宣传统战”之嫌拘捕了陈鼓应、王晓波和学生钱永祥、卢正邦等数人。18日，台大学生郭誉孚为抗议有关当局无理拘捕、迫害台大师生，压制民族民主自由运动，在校门口持刀刎颈，用鲜血书

写“和平、统一、救中国”标语，围观群众达 2000 余人，群情激愤。在舆论压力下，台湾当局以查无实据，被迫将陈鼓应、王晓波等释放。但不久，包括陈鼓应、王晓波在内的台大哲学系 14 位教师被校方解聘。

【张铁生白卷事件】1973 年 7 月 19 日，《辽宁日报》按照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的指示，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案》为题，刊登了辽宁光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张铁生在 1973 年大学招生考试中，物理化学卷只得了 6 分（物理 0 分）。他在试卷背后写了一封信，为自己考试成绩进行辩护，并对“书呆子们”表示了“不服气”和“极大的反感”。信中说，“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辽宁日报》编者按说：张铁生“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案”。8 月 10 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也加了编者按。由此，张铁生成了“反潮流的英雄”，“闹而优则仕”的典型。他不仅进了大学，担任了铁岭农学院的领导职务，并被吸收为中共党员，还当上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刮起了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1983 年 3 月，张铁生因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进行一系列反革命宣传煽动活动，被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

【钟志民退学事件】1974 年 1 月 18 日，《人民日报》刊登钟志民申请退学的报告，并加了编者按语。钟志民是南京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的学员，他在报告中批判了自己“走后门”上大学的错误，并

申请退学。《人民日报》编者按认为，这反映了工农兵学员向地主阶级意识形态展开了新的进攻，要求各地教育部门组织高等学校干部和师生认真学习。2月2日，国务院科教组在《教育革命简报》上转载了这些材料，并加编者按提出，在批林批孔中，要抓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严肃检查、批判和纠正“走后门”这种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不正之风。在此以后，一些高等院校纷纷开始追查和揭发“走后门”上大学的不正之风。致使一些“走后门”进大学的学生，要求退学；一些“走后门”、“开后门”的领导干部作了检查。

【风庆轮事件】1974年9月30日，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万吨轮“风庆”号远航欧洲后返抵上海港。在此以前，交通部远洋局曾担心国产主机和雷达等“五大件”设备性能不能适应远航，为安全起见，只让“风庆”号跑近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南造船厂的工人和“风庆”轮海员贴出大字报，提出“我们要革命，风庆轮要远航”。当时并没有引起江青的注意和支持。“风庆”轮远航归来后，江青一伙便抓住此事攻击交通部，以至国务院领导人。10月13日，江青在一份内部刊物有关“风庆”轮返航的报道上批示，说有少数崇洋媚外的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这个问题表态。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并说这是路线问题。王洪文还下令把交通部派到“风庆”轮协助工作的干部扣留在上海，加以无理批斗。在10月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上，他们以“风庆”轮问题向邓小平发难，邓小平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四人帮”企图以此为借口来破坏毛泽东关于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的提议，但并没有得逞。

【四五运动】1976年清明节前后，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以首都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首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错误地定为反革命事件，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事实上，这一运动是人民心中郁积了10年的怒火的一次总爆发，是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的愤怒爆发。其直接导火线，就是“四人帮”压制人民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举国痛悼。3月5日新华社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纪念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13周年的文章，引用了周恩来当年的题词。上海《文汇报》发表这条消息时，删去了这个题词。当人们提出质问时，却受到了王洪文、张春桥的压制。3月25日《文汇报》在一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 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消息报道中，公然把周恩来打成“走资派”，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些事件，首先激起了南京人民的愤怒。南京的工人、学生走上街头，举行了反对“四人帮”的示威，并把“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的大标语刷在过往南京的列车上。在北京，从3月19日开始，人们不顾不准开追悼会的禁令，陆续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悼词、悼诗，发表演说，寄托自己的哀思，表示自己的愤怒。4月2日“四人帮”发出“清明节是鬼节”“扫墓是四旧”“不要去天安门广场献花圈”“不要上阶级敌人当”的“紧急通知”。但，通知却成了动员令，人们抬着花圈，戴着白花，拿着悼念诗词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4月4日清明节，首都人民的悼念和声讨活动达到高潮。巨幅悼念大匾、横幅

悬挂在纪念碑上，横贯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四周成了花圈的小山、白花的海洋。估计这一天到广场的工农兵、知识分子不下 200 万人次，约有 1000 多个单位送了 2073 个花圈。整个广场，秩序井然，肃穆、悲壮，激动人心。但是，中共北京市委，根据政治局意见，积极准备镇压。当晚，政治局开会，错误地认为天安门广场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决定追查谣言，“五一”前来一次大反击，立即清理广场的花圈、标语。会议决定得到毛泽东批准。4 月 5 日凌晨，广场的花圈被洗劫，自动起来看守花圈的人被审查，有的被捕。上午，几十万人在广场齐声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一辆广播车因诬蔑群众悼念活动，被人们推翻，砸坏喇叭。中午群众烧着了指挥部的上海牌轿车一辆。下午 3 时许又烧了指挥部面包车一辆、吉普车两辆。群众冲入天安门广场东侧的指挥部小灰楼内，小灰楼起火。下午 6 时 25 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发表广播讲话，声言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周总理的群众运动是“极少数别有用心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晚 9 时 35 分，早已集结待命的民兵 1 万人、公安干警 3000 人、卫戍部队 5 个营分别包围广场，在连续播放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音乐声中，用木棍毒打尚未撤出的群众，逮捕 200 余人并投入监狱。4 月 6 日晨，部分政治局委员听取了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汇报后，认为是“反革命暴动性质”。夜里广场戒严，调动警察冲洗地上的血迹。会后毛远新向毛泽东书面汇报了会议情况，毛泽东表示同意。4 月 7 日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写的“现场报告”。当晚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了两个决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

变为对抗性矛盾，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此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追查“政治谣言”，逮捕天安门事件及其他类似事件的积极参加者，勒令群众将传抄的诗词交出，交出照相胶卷。一大批无辜群众被拘捕、判刑，受株连者以万计。

【唐山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河北省冀东地区唐山、丰南一带发生的强烈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这次地震为7.8级，震中烈度为11度。累计死亡24.2万多人，重伤16.4万多人。唐山市夷为一片废墟。当天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8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派出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转达党中央、毛泽东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党中央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国务院向灾区派出了工作组，10多万解放军指战员，2多名医务工作者和数万名各方面的支援人员迅速赶赴灾区，大批救灾物资运到唐山。经过20多天的抢险救灾，抢救出大批受难人员，安顿了受难群众的吃、穿、住，初步恢复了生产和运输。

【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6日中国人民一举挫败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历史事件。“四人帮”一词，首先见于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搞宗派活动的用词，并不是指“江青反革命集团”。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问题，1975年5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批评，说“不要搞四人帮……”。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去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文武兼施。他们一方面以上海为基地利用其长期准备的“第二武装”，准备武装叛乱，一方面大造反革命舆论。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梁效

(即“四人帮”操纵的两校大批判组的笔名)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伪造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影射攻击当时党中央领导人是“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要取而代之。“四人帮”的亲信们也到处散布“10月7、8、9日将有特大喜讯”，王洪文甚至拍照了准备夺权后用的标准像。在紧急关头，华国锋同叶剑英等磋商，确定了粉碎“四人帮”的方案和具体部署，决定断然处置。10月6日下午1时发出了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毛泽东选集》第5卷出版问题的通知，并扩大参加者范围，要姚文元参加。晚8时，当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依次来到中南海怀仁堂时，华国锋宣布了对他们隔离审查的决定，当即予以扣压。与此同时，对江青、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人也采取了必要措施。7日凌晨，政治局做出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由于江青等被隔离，“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所策动的武装叛乱，也顷刻瓦解。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10月21日首都150万人集会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毛主席纪念堂落成】197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国家耗资约1亿元，于1976年10月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建造。于1977年8月29日全部建成，安放毛泽东主席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9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央军委召开隆重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1983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毛泽东纪念堂增辟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三个纪念室，同毛泽东纪念室一起开放，以表达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对毛泽东、周恩来、刘

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缅怀之情。

【中美建交】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公报重申美国政府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再次强调《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中国声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宣布1979年1月1日它将通知台湾，与之结束外交关系；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也将按照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并声明在4个月之内从台湾撤出美方余留的军事人员；表示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加以解决。中美建交标志着两国间不正常关系的结束。

【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进行审理。确认以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和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都是以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而进行阴谋活动的反革命集团，并形成了一个反革命联盟。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和已经死亡的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的。凭借他们当时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

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国家领导人，诬陷迫害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阴谋颠覆政府和破坏军队，镇压迫害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社会各阶层群众，毒害广大青少年，危害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治权。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前后共达 10 年之久，殃及全国各个地区各个领域，使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受到特别严重的破坏，使国民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遭到极严重的破坏，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特别法庭按照 198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审理他们的刑事犯罪，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特别法庭根据他们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分别依法于 1981 年 1 月 23 日做出终审判决：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 2 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判处陈伯达、黄永胜、江腾蛟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判处吴法宪、李作鹏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判处邱会作有期徒刑 16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江南事件】1984 年 10 月 15 日，旅美华人江南被人杀害的事件。江南，本名刘宜良，1949 年随国民党从大陆去台，进入“国防部政干班”学习，后被送到“政工干校”受训，毕业后投入台湾新闻界。1967 年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驻美国。1984 年夏，撰写出版了《蒋经国传》，披露了蒋氏父子一些鲜为人知的“秘闻”。对此，国民党情报当局极为恼怒，遂秘密策划，指派台湾黑社会“竹联帮”分子于 1984 年 9 月潜往美国，经过密谋策划后，于 10 月 15 日在江南住处附近将其枪杀。事情传开，引起巨大震惊，各

界纷纷发表谈话或举行集会，同声谴责这一惨无人道的暴行。一些在美国的江南生前好友及主持正义的华人学者，还成立了“为刘宜良伸张正义委员会”，要求有关当局追查凶手。台湾当局在事件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被迫改变“不承认”态度；但为逃避罪责，又改采“舍车保帅”手法，诿罪于台湾情报部门，于1985年1月13日承认陈启礼等谋杀了江南，拘押了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及该局副处长陈虎门等，逮捕了案犯陈启礼、吴敦。1985年4月5日，台湾军事法庭判处陈启礼、吴敦无期徒刑。4月19日，又判处汪希苓无期徒刑，胡仪敏、陈虎门有期徒刑2年半。

【中国政府决定裁军一百万】1985年6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论述了解放军改革体制、精简整编的根据和意义。邓小平指出了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维护和平的力量在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裁军100万，有利于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中国愿意并且用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的方案，将在今后两年内有秩序、有步骤地实施。

【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1987年5月发生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林区的特大森林火灾。1987年5月6日下午3时左右，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西林吉、图强、阿木尔和塔河4个林业局的几处林场同时起火，火势蔓延形成特大火灾，延烧20日，至5月26日

被全部扑灭。过火面积约百万公顷，森林面积 65 万公顷（根据气象卫星资料测算），烧毁贮木场存材 75 万立方米，烧毁汽车、拖拉机等大型设备 431 台，烧毁多处桥涵、路轨、通讯设备，各种房屋 64 万平方米，受灾户达 10807 户、受灾难民 56000 人，死 191 人、伤 221 人。直接经济损失 5 亿元。火灾发生后，国务院成立了由总参、林业部、铁道部、国家气象局等部门组成的扑火指挥小组，到火灾现场领导扑火救灾工作。在人民解放军、武装森林警察、干部、职工和当地群众的奋勇扑救下，在全国各地大力支援下，才扑灭了这场特大火灾。火灾后，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决定撤销犯严重官僚主义错误和有重大失职行为的杨钟的林业部长职务。撤销对火灾事故负有重要责任的董智勇的林业部副部长职务。同年 8 月，黑龙江省有关部门查处了火灾事故责任者 23 人，包括地级干部 3 人，县级干部 8 人，其中因违章操作和吸烟引起这场大火 6 名肇事者已由司法部门处理。

【西藏骚乱事件】1989 年春季，西藏拉萨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制造的一起政治骚乱事件。1989 年 3 月 5 日，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拉萨对一些商店和机关单位进行打、砸、抢、烧，并公然向公安武警开枪。骚乱中，1 名武警战士牺牲，40 多名公安武警受伤，其中，11 名重伤住院。在混乱中 60 多名骚乱分子和围观群众受伤，10 人死亡。5 日中午 12 时，13 名喇嘛、尼姑打着“西藏独立”的口号，向八廓街派出所公安人员砸石头。下午 3 时左右，骚乱分子更加猖狂，600 多人沿北京东路游行，并沿途打坏了一些机关单位的门窗玻璃，抢、砸了 20 多家商店、饭馆和旅店，放火烧了一些商品和用具。4 次冲、砸城关区委和区政府机关，砸毁交通警岗和指示灯，砸坏公安、武警、消防车 20 多辆，还打、砸救护车和医务人

员。在骚乱分子一意孤行、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公安干警被迫开枪示警，并采取果断措施，控制事态发展。3月7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国务院关于在拉萨市实行戒严的命令。3月8日零时起在拉萨市实行戒严，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1990年4月30日，李鹏总理签署命令决定：自1990年5月1日起解除拉萨市戒严。

【一九九〇年特大洪涝灾害】1990年夏季发生在江苏、安徽等地建国以来最大的洪涝灾害。5月中旬开始，江苏太湖流域普降大暴雨，水位剧涨，到7月上旬，全省已有4200多万受灾人口。6月上中旬后，安徽淮河流域连下暴雨，河水猛涨，致使全省受灾人口到7月上旬已达3400万，农作物受灾面积达430多万公顷。从6月中旬到8月上旬，浙江、四川、湖南、河南、贵州、湖北、吉林、黑龙江等地又连遭洪涝灾害。全国共有3.6亿亩农作物遭灾，其中成灾面积2.1亿亩，绝收4827万亩；因灾死亡5113人；倒塌房屋498万间；造成直接损失779亿元人民币，其中安徽、江苏经济损失484亿元，占全国水灾损失的62%。灾害发生后，党和政府极为重视救灾工作。7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署抗洪救灾。商业、物资、银行、保险、交通、邮电、卫生、民政等部门和全国各地紧急援助灾区。人民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出动人员50多万人次，车船6000余台（艘）次，组织民兵、预备役人员200多万人次奋战在抗洪第一线，还派出80多个医疗队，调拨大批物资支援灾区。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社会也纷纷捐款捐物，开展各种形式的赈灾活动。截止12月31日，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民政部和各省市区共接收境内外救灾捐赠25亿多元，中央、地方通过各种渠道安排

用于救灾的资金 200 多亿元，向灾区调拨大批救灾物资，使灾区人民重建家园，生产自救，生产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

运动·思潮·政策

【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统称。包括五四前的启蒙运动和五四后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时间从《新青年》创刊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主要倡导者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蔡元培等人。提出的口号为“民主”和“科学”。认为，民主和科学，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两个车轮。在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下，以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民主政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迷信，提倡科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打破了 2000 多年来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封建教条对人们的束缚，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思想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掀起了寻求真理、追求解放的浪潮，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思想条件。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学说和进化论思想，是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作舆论动员。文化运动未与政治斗争、群众运动相结合，在思想方法上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和形而上学。俄国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表示欢迎与向往，由效法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转而效法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由向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寻求出路，转而研究和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论文，代表了这

种思想。五四运动推进了新文化运动，此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传播，并在新思潮百家争鸣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新文化运动其性质属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五四后，许多早期宣传新文化的报刊转向以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为主要内容，宣传社会主义的团体和刊物大量出现，涌现出一批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大量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工人中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的全国工人罢工高潮。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1921年8月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北京、湖南、武汉、广州、济南、长辛店、唐山等地先后建立起党领导下的工会，领导工人开展罢工斗争，成为这次高潮的前奏。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标志工人运动开始进入高潮。4—6月上海、广州、澳门接连爆发纺织、邮政、盐业工人罢工，工人运动开始形成高潮。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全国12个城市100多个工会代表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前，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组织的总通讯机关。这次大会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普遍发展。此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又拟订了《劳动法大纲》19条，发起劳动立法运动。《大纲》实际上成了工人斗争的纲领。8月，京汉铁路长辛店3000多工人罢工。在这次罢工影响下，北方接连爆发京奉铁路山海关铁工厂和唐山制造厂罢工、京绥铁路全路车务工人罢工、正太路石家庄机器厂工人罢工、开滦煤矿

工人罢工。与此同时，在南方，7月，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8月，长江海员罢工。9月，粤汉路武长段、安源路矿和汉口扬子机械厂工人罢工。10月，长沙泥木工人、汉口英美烟厂工人、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11月，上海日华纱厂、英美烟厂工人罢工。12月，湖南水口山铅锌矿、长沙手工业工人罢工。1923年2月爆发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使高潮达到顶点。这次罢工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残酷镇压，发生了“二七惨案”。此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持续了13月，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定革命性和坚强战斗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掀起全国规模的大革命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国民会议运动】要求成立民主共和政权，结束军阀统治，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1923年7月《中共中央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商会、工会、农会、学生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代表开一个国民会议的主张。指出，只有国民会议才能代表国民，制定宪法，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在国共两党推动下，全国迅速掀起了促成国民会议的高潮。1925年2月段祺瑞召集的善后会议开场后，为了同善后会议相对抗，国共两党倡导于3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00余人，代表20余省区120余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成份包括工农群众、知识界、教职员、学生、商人、实业家、新闻记者、律师等。会议开了1个多月，4月16日闭幕。大会坚决否认段祺瑞的善后会议，讨论了不平等条约及外人特权、外国驻兵、军阀军队与内乱、人民自由、工人、农民、妇女等重大问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一再申述了打倒军阀的主张。

【关税自主运动】1925年掀起的争取关税自主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1925年10月26日，各帝国主义国家为缓和“五卅”以来中国人民强烈的反帝情绪，派代表参加由段祺瑞政府召集的关税特别会议。但是帝国主义并不允许中国关税自主，段祺瑞政府也只是希望提高一点税率以减轻财政危机。中国各界人民坚决反对这个会议，掀起了争取关税自主的运动。11月10日，全国学生总会和广州外交代表团等团体在北京组织关税自主示威运动筹备会。筹备会发动了示威运动，通电段祺瑞“下野出京”。22日，北京各界举行关税自主民众大会，到会数万人。群众高呼“反对欺骗中国的关税会议”、“打倒媚外政府”、“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北京的关税自主运动发展成为“首都革命”的大规模群众斗争。

【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土地革命由此开始。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的实践中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方法，并逐步形成了一条土地革命路线。1927年11月，中共中央通过《土地问题党纲草案》，规定无代价没收一切土地，土地归于公有，分给农民使用。这是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制定的第一项土地政策。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根据革命的具体实践修正了这一政策，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同时又规定中农是同盟者，并要争取富农中立。“六大”的这些规定基本是正确的。1928年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颁布了

第一个土地法。当时因尚未接到“六大”决议，因此《井冈山土地法》仍规定“没收一切土地”为公有，分给农民使用。1929年初，红四军进军赣南后，于4月颁布了《兴国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动。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土地没收的对象是一切出租的田地山林和富农自食以外的多余的土地，土地的分配政策是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土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的平均分配方法。不久，闽西根据地又提出“抽肥补瘦”的分配办法。1930年2月，毛泽东在江西吉安召开会议，批判了阻碍土地革命的错误倾向，加快了赣南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步伐。除此以外，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也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至1931年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实践中又进一步解决了土地分配后的所有权问题，改变了过去的土地国有、农民使用，禁止买卖的原则，变为土地一经分定，即为农民私有，租借买卖任其自由。至此，基本上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土地革命历时10年，成绩卓著。在局部地区改变了旧的土地所有制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调动了广大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

【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1934年2月，为了宣传封建买办思想和法西斯主义，配合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由国民党C.C系发起的运动。3月25日，C.C系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陈立夫为理事长。同年10月，出版《文

化建设》杂志，鼓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创刊号发表了陈立夫的《中国文化建设论》。表述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的意图，他说，中国文化偏重于精神，西方文化偏重于物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要使中西文化作“合理的配合”，形成一种“新文化”。他又说，我们要建设这样一种新文化，“须先恢复固有的至大至刚至中至正的民族特性，再加以礼义廉耻的精神，以形成坚强的组织和纪律，再尽量利用科学的发展，以创造人民所必需关于衣食住行之资料。”由此可见，陈立夫鼓吹的“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调和中西文化”的观点，不过是清朝统治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翻版。为了扩大宣传，1935年1月，C.C系王新命、何炳松、黄文山、陶希圣、樊仲云等10教授联名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言重申了陈立夫文章的观点。此后一两年间，在C.C系的鼓动下，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文章，并汇成讨论专辑出版。后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国民党C.C系不得不停止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宣传。

【新生活运动】30年代国民党提倡封建道德、实行愚民政策的文化运动。30年代初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加紧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了文化“围剿”，并发起了一场所谓“新生活运动”。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7月1日，在南昌又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会”，自任总会长，并指定陈立夫、康泽、邓文仪、杨永泰、熊式辉、蒋孝先等任总干事。为扩大新生活运动的声势，蒋介石先后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等一系列有关新生活运动的

文章和演说，国民党中宣部还为新生活运动编印了《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运动精义》等小册子。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信奉的“礼、义、廉、耻”的道德标准贯彻到人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旨在要人们按照蒋介石集团所解释的道德标准去维护其统治。蒋介石认为：“国家民族之复兴不在武力强大，而在国民知识道德之高超。”而提高国民知识道德，在于一般国民衣食住行能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蒋介石还一再声称，新生活运动就是要人们以规规矩矩的态度、正正当当的行为、清清白白的辨别、切切实实的觉悟来生活。在国民党中央的推动下，到1936年止，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广泛设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共1133个，强迫民众按照《新生活运动纲要》切实施行，但收效甚微。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生活运动逐渐停止。

【国民精神总动员】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国民党利用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来巩固其统治的行动。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确定文化政策案》规定以中国传统的伦理哲学“为国民精神教育之总纲”。1939年3月，国防最高委员会之下设立精神总动员会，蒋介石自任会长，公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国民公约及誓词》和《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5月举行全国国民精神总动员，蒋介石在重庆主持誓师大会，会后举行游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的中心口号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等。救国之道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共同之信仰是“完成建设三民主义的国家”。卫护国家的先决条件为“军令政令之绝对统一”。《实施办法》规定，省（市）县都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规定国民以同

业公会、学校、机关等为单位，每月集会一次，在会上讲解纲领的内容、宣读《国民公约》及《誓词》。国民党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抗日的，另一方面是反共反人民的。中共中央对它标榜抗日的方面予以支持，对它反动的错误的方面进行了实质性的批判。

【延安整风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整顿党内作风的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先后纠正了党内的“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将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轨道上来，使党发展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流毒并没有完全肃清。同时，抗战以来，党的队伍大发展，增加了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也带来了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这种情况如不予改变，则必然妨碍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和执行。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首先在延安，然后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最先在延安高级干部中开始，这是全党整风的预备阶段。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整风作了动员。7—8月，党中央相继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肯定了王明是路线错误，决定在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全党整风作了重要的准备。1942年2月，毛泽东分别在中央党校、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了《关于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规定了整风的方法、步骤和阅读文件。6月，

中共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学习委员会，作为整风运动的领导机关。同月，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整风运动在全党逐步展开。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整风所采取的方法是：精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基本文件，根据文件精神检查自己的思想，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析自己思想和工作中正确的成分和错误的成分，找出发生错误的原因，定出改正的方法。在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干部还对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了学习、研究和讨论。在此基础上，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此，历时4年的整风运动结束。延安整风虽受到抢救运动的干扰，但仍使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树立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抢救运动】1943年发生在延安的中共肃反扩大化运动。延安整风转入审干阶段后，由于中共中央对于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渗入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导致后来反特斗争的扩大化。1943年7月15日，具体负责审干工作的社会局领导人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并掀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10多天内搞出大批所谓“特务”，混淆了敌我，造成许多冤假错案。中共中央及时发现并于7月底开始纠正了这种“左”倾错误。

【大生产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各解放区军民开展的生产运动。1941年，解放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下，经济上发生了极大困难。194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经济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以克服困难。解放区军民响应党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抗日民主政府兴办了一批自给性的工业；军队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业和部分工商业；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自给经济；农民广泛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敌后军民坚持劳武结合，一面战斗，一面生产。解放区军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使解放区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军民的生活，为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练兵、减租和生产运动】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的指示中，提出“练兵”、“减租”、“生产”是1946年各解放区10项工作中的3项重要工作。练兵，即要求各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要利用作战间隙着重练兵。练兵的项目，以提高射击、刺杀、投弹等项技术程度为主，提高战术程度为辅，特别着重于练习夜战。练兵的方法，是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减租，即要求在所有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以提高广大农民的觉悟，并组织起来，成为解放区自觉的主人翁。在老解放区，则要求复查减租减息的工作，进一步巩固老解放区。生产，即要求各地抓紧时机，务使1946年全解放区的公私生产超过以前任何一年的规模和成绩。

【三查三整运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土地改革进行的整党整军运动。为了彻底进行土地改革，巩固后方，夺取革命战争的更大胜利，根据全国土地会议的决定，从1947年冬至1948年春，各解放区的党组织，结合土改，运用走群众路线的办法，开展了一个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三查三整运动。同时，人民解放军利用战争间隙，在部队各级党委领导下，开展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的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通过整党、整军运动，纯洁了组织，改进了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使部队的政治觉悟、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进一步提高，从而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新思潮】五四时期流传的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统称。大致可分4类：（1）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主主义思想。如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人道主义，进化论等，亦即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科学思想。（2）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各种社会政治学说与哲学流派，如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柏格森、尼采的哲学等，也在民主、科学的幌子下传入中国，被当作“新思潮”而流传着。（3）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五四后，社会主义思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许多派别都称自己是“社会主义”，或属于“社会主义”思想，均广为流传，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互助主义、合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4）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上述新思潮构成了五四时期思想解放的潮流，形成了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局面。就反封建主义而言，都有程度不同的进步作用。

【国民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国民革命”一词，最早见于孙中山在1906年所拟《军政府宣言》。宣言说，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皆负革命之责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陈独秀在9月20日出版的《向导》第2期发表《造国论》一文，对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作了进一步阐述。该文改用“国民革命”代替“民主革命”的提法。陈独秀用国民革命的提法，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主革命同欧洲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区别开来，并赋予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外一切压迫”的新内容。之后“国民革命”这一口号便成了各革命阶级的共同口号。

【省自治和联省自治】1920—1923年流行的一种改良主义政治主张。所谓省自治和联省自治，就是实行“省民自决主义”，各省自行制定省宪法，依省宪法自行组织省政府，由本省人治理本省，进而由各省派代表，组成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建立一个联省自治的共和国，实现全国的统一。鼓吹这种政治主张的有两种人，一是军阀政客，一是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改良派。前者是利用省自治和联省自治保持自己的地盘；后者则是企图依照西方国家的联邦制来改良中国的政治，消除军阀统治，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北京政权为直系军阀所独占。吴佩孚公开提出“武力统一”的主张，把势力伸向南方。各省军阀为了抵制直系军阀的“武力统一”，便大唱省自治和联省自治。湖南军阀率先宣布湖南自治之后，各省军阀纷纷宣布“自治”和“联省自治”。1921年至1923年全国掀起了一个要求“省自治”和

“联省自治”的浪潮。章太炎、胡适、丁燮林、张季鸾、周鲠生等学者、教授发表大量文章，提出种种实施的方案。但是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1923年10月以后，“省自治”和“联省自治”运动便很快消散了。

【废督裁兵】1920—1923年流行的一种改良主义政治主张。民国成立后，在全国20余省设都督为各省军政长官。1914年改称将军。1916年改称督军。这些督军拥兵割据，连年征战。频繁的军阀战争和大量的军费支出，严重破坏了民族经济，加重了人民负担。资产阶级提出了废督裁兵的主张。1920—1923年，废督裁兵的呼声遍及全国。京、沪、浙、皖、川、湘等地的一些团体，发表主张废督裁兵的宣言、通电，召开裁兵大会，举行请愿、游行示威，成立裁兵促进会、废督裁兵期成会等组织，形成了有一定声势的废督裁兵运动。主张废督裁兵的人认为，“兵祸”是中国一切“扰乱的根源”，中国要进步就要先去兵，而兵与督不可分，必须同时裁废。办法是由人民和政府，还可以请外国人帮助，组织裁兵机关，实行和监督军阀裁兵。裁撤下来的兵从事农、工矿业生产。1922年下半年至1923年上半年，孙中山在其通电、演讲中，针对直系的武力统一，提出了和平统一和化兵为工的主张。在全国废督裁兵运动中，一些军阀、政客为了欺骗人民和舆论也倡议、赞同或宣布实行废督裁兵。废督裁兵的主张，表达了资产阶级渴求结束军阀混战局面，实现和平统一的愿望。但这种改良主义的主张只能鼓噪一时，1923年后这种政治主张就消声匿迹了。

【制宪救国】20世纪20年代初的一种改良主义政治主张。提出这种主张的人认为，民国以来，大小军阀掌握中央和地方政权，兵

连祸结，民生凋蔽，人民毫无民主自由，其原因在于中国没有一部作为政治准绳的宪法。因此，今后唯一要途无过于“急速制宪以立国本”。有了根本大法宪法，就能“绝乱源，定国基”，政治即可走上轨道，国家即可强盛起来。有人主张宪法应明文规定：（1）各地方今后绝对不许有所谓督军巡阅使及其他类似制度之存在。（2）规定全国士兵总额，各地方分配之最高额，及全国每年度军费之最高额。（3）保障全国教育独立及教育经费独立。（4）赋予各省以广大自治权，使含有联邦之性质。（5）男女两性在社会上及法律上地位与待遇平等。（6）扶助国民之经济生活，确立救贫事业。有人提出宪法应规定“三个最大问题”：“采用普遍选举，规定劳动法典，承认妇女参政。”有人主张宪法应明定“国民之生存权”。主张制宪救国的人，企图用“法”来消除军阀统治，实现民主治国，不过是一种幻想。1922年前后制宪活动达到高潮，之后就很快沉寂了。

【整理国故】胡适在1919年下半年提出的一种学术主张。1919年8月胡适发表《论国故学》一文，提倡“用科学的方法去做国故的研究”。此后，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1922年5月和1923年1月，胡适先后创办提倡整理国故的《读书杂志》和《国学季刊》。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考据的方法从训诂、校勘、辨伪等方面整理古籍，然后进行系统的著述。它是胡适的实验主义在中国文化史研究上的具体运用。胡适的“整理国故”，在学术上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一定的价值。但他提倡这一主张是借此宣传其实验主义。

【好人政府】1922年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又

称好政府。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王宠惠等人联名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主张组织一个“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提出改革政治的3条基本原则：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一种“有计划的政治”。主张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出来和恶势力奋斗，组织“好人政府”，这是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1922年9月，在吴佩孚支持下，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入阁。王宠惠为国务总理。他们都属英美派，当时被认为是无党无派的“好人”，因而这个政府被称为“好人政府”。实际上它是听命于吴佩孚的“洛派”政府。这个政府为曹锟的“保派”直系军阀所不容，只存在了3个多月就垮台了。“好人政府”的政治主张也随之而彻底破产。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1923年中国思想界进行的一场论争，又称“科学与玄学”论战。论战双方一为“玄学派”的张君勱、梁启超，一为“科学派”的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人。1923年2月张君勱在清华大学作《人生观》讲演，认为人生观“无客观标准”，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只能求诸于自身。4月丁文江发表《玄学与科学》，他认为凡是心理的内容，真的概念推论，无一不是科学的材料。人生观要受伦理学的公例、定义、方法的支配。但他否认精神科学与物质科学的分别，认为物质不过是“心理上的觉官感触”。在争论中吴稚晖在其《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中提出了他的“人欲横流的人生观”，把人生内容归纳为吃饭、生小孩、招呼朋友三件事。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提出了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认为人生观是由知识经验而得出的“一个大假设”。正确说明人生观问题的是陈独秀、瞿秋白。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指出人生观是

客观环境造成的，决不是主观的意志造成的。“只有客观的物质的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1923年12月瞿秋白发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指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不同，自然界只有无意识的盲目的各种力量的相互影响，而在人类社会里活动的则是有意识的抱有一定目的的人。人们的意志和行为都不是自由的，是受因果律支配的。但这并不是说人类是纯消极因素，“正因为他们在斗争过程里不断发见历史的‘必然因果’，所以能使人类运用‘自然律’及‘社会律’同登‘自由之域’。”

【新三民主义】孙中山在1924年重新解释的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三民主义。孙中山在1924年1月于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孙中山亲自审定的国民党“一大”宣言，是阐释新三民主义的经典性文献。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对外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对内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主张直接的、普遍的、革命的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民生主义规定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个原则。平均地权是由国家制定土地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防止“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对“农民之缺乏土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后不久孙中山将上述方针归纳为“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是凡具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

力所不能办者，“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新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它克服了旧三民主义没有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和彻底的反封建纲领、特别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纲领的根本弱点，对旧三民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采取了批判态度。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一个伟大功绩。

【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革命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的总结和多方面的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毛泽东各个时期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表现。“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是王稼祥在1943年7月8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提出。在1945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被正式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毛泽东思想是在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政治思想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以其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其基本方面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思想也在解决各个领域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等诸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必须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的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

【戴季陶主义】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在 1925 年提出的歪曲篡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革命精神，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为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等篡夺革命领导权制造根据的反动理论。1925 年 6、7 月间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的发表，是戴季陶主义形成的标志。戴季陶提出“孔孙道统说”，歪曲篡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说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反对联共，要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放弃自己所信仰的共产主义；鼓吹地主资产阶级的“仁爱”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工农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破坏扶助农工的政策；反对共产党的“阶级专政”，主张建立“三民主义的民国”，“三民主义的国家社会”。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同戴季陶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

【国家主义派】20 世纪 20 年代初由一些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政客组成反动政治派别。因其鼓吹国家主义，被称为国家主义派。因其机关报《醒狮》，又被称为醒狮派。国家主义派的骨干分子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人，大都是五四时期少

年中国学会的成员。是学会中的右翼。五四前后，曾琦、李璜等赴法留学，进一步接受了反苏反共的宣传。1923年12月2日，曾琦、李璜等在巴黎成立了中国青年党，国家主义派正式形成。1924年9月，曾琦、李璜等回到上海，10月创办《醒狮》周报。之后在一些省市建立青年党的省市党部，并于1925年秋将青年党总部由巴黎迁上海。国家主义派鼓吹国家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宣扬虚伪的“全民国家论”和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鼓吹“内反中共，外抗苏俄”；鼓吹“全民革命”、“全民政治”，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们依附军阀，勾结国民党右派，反对国民会议运动，破坏五卅运动，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反对北伐战争。煽动、支持西山会议派和蒋介石分裂统一战线的活动。1925年12月，他们成立了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1929年青年党召开“四大”，发表了《公开党名宣言》。从1934年起开始与国民党合流，成为蒋介石集团的工具。抗战开始后，青年党取得了合法地位，派代表参加了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汪精卫公开叛国后，青年党一部分人附逆投敌。抗战胜利后，青年党一度以“第三者”身份参与“调解”国共谈判。1946年11月参加伪“国大”和蒋介石政权。

【人权派】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之一。因该派主要是通过《新月》月刊来阐述其政治主张，所以又称“新月派”。1928年10月，国民党公布了《训政纲领》。在训政名义下确立起来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引起了部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不满，于是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现实政治问题，并以争取人权相标榜，故称人权派。人权派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和罗隆基。1929年4月，胡

适在《新月》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一文，首先提出了“保障人权”问题。接着，罗隆基在《新月》上又发表《论人权》一文，提出要发动一个“人权运动”，“争回人权”。人权派认为，“国家的主权在全体国民”、“国民应有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要求国民党政府应赶快采取制定宪法、专家治国等措施来保障人权。人权派的主张，终为实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所不容。1930年11月，国民党逮捕了罗隆基，并对胡适发出了警告。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1930年年底，人权派被迫停止活动。

【托陈取消派】即中国托派。其成员主要由从莫斯科回国的一部分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和国内支持拥护陈独秀的所谓“陈独秀派”两部分人组成。1927年底，少数在苏联接受了托洛茨基观点并进行托派组织活动的中国学生，被遣送回国。回国后，其中一部分人即在国内组织托派小团体，出版刊物，宣传托洛茨基的理论和主张。这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之后。会议实际上解除了陈独秀在中共党内的领导职务，选举了新的中央机构。陈独秀、彭述之、尹宽和郑超麟等人，对会议持对抗态度，在中国共产党内逐渐形成了一股反对新的中央，拥护陈独秀的势力，被称之为“陈独秀派”。“陈独秀派”形成之初，他们并不了解托洛茨基的政治观点，更不知道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持有与斯大林不同的见解。随着中国托派留学生对托洛茨基政治主张的不断传播，彭述之、郑超麟等人首先发现托洛茨基的政治理论与主张，竟与自己的观点相同。于是他们不仅自己接受了托派的观点，而且还把托派的文件和刊物介绍给陈独秀，陈的思想逐渐有了变化。1929年刘仁静从国外带回托洛茨基专为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写的政治纲领——

《中国的政治状况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并通过彭述之转交给陈独秀。陈独秀终于认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托洛茨基比斯大林正确。在托洛茨基所写的“政治纲领”的基础上，陈独秀联合 81 人签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完全接受了托派的政治理论和主张。早期的中国托派，曾先后成立了 4 个小派别组织，即“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十月社和战斗社。这四个小组织各有自己的领导机构。为扩大中国托派的影响，托洛茨基曾多次给中国托派写信，要求联合起来，并多次强调必须以陈独秀的“无产者社”为核心进行“统一”。在托洛茨基的亲自干预下，1931 年 5 月 1—3 日，中国托派四个组织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正式将中国托派的组织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举成立了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并出版机关刊物《火花》。中国托派认为中国已经不是封建主义社会，而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企图以此来否定近百年以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从而推翻中共自建党以来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社会历史根据，取消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托派是一个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派别，同时它也反对中国国民党，所以遭到国民党的镇压。其中央成立不到一个月，即遭到破坏，大部分中央委员被国民党逮捕。1932 年 10 月，陈独秀、彭述之也被捕入狱。中国托派遭到了很大打击。1935 年初，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中国托派组织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抗战爆发后，在全国人民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压力下，陈独秀等人也被释出狱。陈出狱后，不再参与托派活动。1949 年，中国托派组织分裂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和“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两个派系。由于中国托派进行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其组织被取缔，其骨干分子逃亡海外。

【乡村建设派】30年代出现的一个改良主义派别，代表人物为梁漱溟。乡村建设派的前身是村治派。20年代后期，山东王鸿一在北平创办《村治》月刊，提倡中国建设应当从乡村建设入手，始成村治派。1929年梁漱溟接办《村治》月刊。同年秋天，又同梁仲华等人在河南创办村治学院。1931年梁漱溟等人在韩复榘支持下，在山东省邹平县开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乡村建设》，奠定了乡村建设派的据点。同年，中国乡村建设学会成立。乡村建设派正式形成。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等书，代表了乡村建设派的理论与主张。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没有两面相对的阶级。因而“中国没有革命的对象，只有建设的对象”。他又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文化失调”。因此，“中国根本问题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要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提倡的乡村建设运动，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建立乡农学校。乡农学校的校长和理事，由县政府礼聘和委任当地有名望的人担任。梁漱溟规定乡农学校的主要作用是：（1）政教合一，把学校与政府政权结为一体。（2）建立乡村自卫组织。（3）开发新式农业，引入科学技术，促进合作组织。梁漱溟等人自开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后，便开始了乡村建设试验。先以邹平、菏泽两县为实验区。实验区主任同时任县长，由研究院保荐，山东省政府任命。后来，研究院所指导的实验区包括3个专区90个县。1933年，国民党搞县政实验，鲁西14县划为县政实验区。于是，乡村建设实验与国民党的县政实验合二为一。梁漱溟等人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在30年代曾热闹过一时。乡村建设运动在引入农业科学技术和改良农业的实验中进行

了一定的探索和实践，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梁漱溟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幻想用点滴改良的办法来拯救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部分成员拥护“共赴国难，一致抗日”的主张，积极参加了抗日武装斗争。但也有人当了汉奸。以梁漱溟为首的大后方的乡村建设派成员，于1941年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民盟的团体会员。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由于对国民党反对派屠杀政策的仇恨和愤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而滋长起来的“左”倾错误。1927年11月，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政治纪律决议案》、《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等文件，使以盲动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们错误地分析了革命的形势，认为当时的革命形势仍在继续高涨，因而反对必要的退却，命令少数共产党员和群众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起义，在条件不成熟的农村举行农民暴动。在革命性质问题上，混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就要同时推翻资产阶级，甚至认为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障碍”。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城市中心”观点，认定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在革命行动上主张“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对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在组织上推行惩办主义的办法。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给党招致了严重损失。但这种“左”倾错误推行之始，就引起党内许多同志的批评和抵制。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批评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检讨了“玩弄暴动”和“烧杀主义”等错误。

至此，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基本结束。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1930年6至9月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以冒险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1930年上半年，红军和根据地乘国民党军阀大混战之机，发展较快，党在白区的工作和组织也有相当的恢复和发展。形势对革命极为有利。在此形势下，中共党内的“左”倾情绪又恶性发展起来。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以此为标志，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路线占据了党中央领导地位。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否认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认为当时全国各地都已经具备武装起义的条件，主张中国革命应该来个总爆发。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对资产阶级、没收私人资本企业、消灭富农并建立集体农庄规定为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强调“城市中心”，反对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强调在党内反对右倾，打击制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制定并实行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为此将党、团、工会各级领导机构合并，组成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党的各项经常工作陷于停顿。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推行，使红军和白区党组织受到重大损失，红军损失3万多人，白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损失7万多人。193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指出并停止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计划，结束了它对全党的统治。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延续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一次“左”倾错误。王明，曾留学苏

联，1930年回国，写成题为《两条路线——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后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全面阐述了他的“左”倾观点。1931年1月，经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控制了党中央。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地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比重，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与反帝反封建并列；否定九一八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把国民党统治集团看成铁板一块，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看成右倾，提出更加“左”倾的错误方针。军事上把红军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视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教育，追求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否认敌强我弱的现实，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又实行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组织上要求全党“坚决实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打着“反右倾”的幌子，实行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对持不同意见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使党和红军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党在白区的组织几乎全部丧失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90%。直到1935年1月，中共中央的遵义会议上，才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

【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企图分裂中共中央的错误思想。1935年6月14日，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红军继续北上，以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但张国焘反对中央决定，认为红军的长征“已经失败”，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低潮，处在“总退却阶段”。他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反对北上，

主张向川康边界少数民族地区退却。同时，他又自恃枪多势众，向中央闹独立性，甚至策动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7月，红军在毛泽东等率领下，到达毛儿盖。8月6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批评，再次肯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继续北上。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等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张国焘对沙窝会议决定阳奉阴违，企图篡夺中央权力。在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竟打电报给中央反对北上，要右路军全部南下。中央几次去电，令其迅速率部北上，但张国焘却悍然不顾中央指示，坚持错误，甚至企图以武力危害中央。中共中央发现了张国焘的阴谋，在巴西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脱离危险区域，率右路军的原红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9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人到达俄界。9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俄界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严肃批判了张国焘的退却路线和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并再次电示张国焘率部北上。张国焘仍坚持其错误主张，率左路军并挟裹右路军的原四方面军之四、三十军南下，向川康边境退却。10月5日，在四川卓木碉，他终于公开分裂党，非法宣布另立“中共中央”，并自封“中央书记”。对于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反党罪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6年1月22日作出了关于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立即取消非法的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右路军领导人朱德、刘伯承等在艰难的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也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36年6月，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在西康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会合后，红二、六军团编为红二方面军。两部分红军汇合

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又对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他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1937年3月23—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对张国焘的错误作了系统的清理和批判。同时给张国焘充分改正错误的机会，然而张国焘拒不悔改，于1938年4月2日只身逃出陕甘宁边区，在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将其清除出党。

【关于三民主义的论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及其御用文人之间关于三民主义问题展开的一场重大争论。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郑重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蒋介石坚持反共根本立场，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歪曲篡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38年12月，民社党首领张君勱在蒋介石授意下，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称共产党既“信奉”三民主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1939年5月，蒋介石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程序》的演讲，抛弃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构建蒋记三民主义的体系，攻击和否定马列主义和民主主义。蒋介石称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都是一偏之见，只有民生史观既不偏于精神，亦不偏于物质。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内容很不完备，都有缺点，只有三民主义博大精深，涵盖一切。要求人们按他的“体系”去研究三民主义，按他的“实程序”去奉行三民主义。同时，共产党内和一些进步学者对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在

理论上亦分不清。从1939年下半年起，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了吴黎平的《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就是取消三民主义》、洛甫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系列文章，就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阐述了以下观点：（1）正确认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2）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3）区别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4）坚持革命发展阶段论，反对“一次革命论”。通过三民主义的论争，澄清了某些混乱思想，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发展和成熟。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根据当时形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抗战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争夺东北成为中共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中心问题。人民军队进入东北，一方面要同国民党斗争，另一方面还涉及到同苏联、美国的关系；而且东北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中国共产党夺取了东北，就可以背靠苏联、朝鲜、蒙古，南面同冀热辽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有利于粉碎国民党反对派的进攻，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加速革命胜利的进程。中共中央分析了进军东北的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权衡利弊之后，1945年9月19日，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指示电，明确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为了贯彻实施这一战略方针，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摸清了东北的情况后，从各解放区调集了11万军队和2万名党政干部，陆续进入东北。林

彪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翌年初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由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林枫等人组成，彭真任书记。与此同时，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谈判中，主动提出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8个省区的解放区，配合谈判斗争，掩护“向北发展”。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为阻止和迟滞国民党军进犯华北，以保障人民军队在东北地区实施战略展开，进行了上党、平汉、平绥、津浦战役。中共中央东北局还坚决贯彻执行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具体方针，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分配土地，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民主政权，开展生产运动。到1946年初，建立起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人民军队发展到近30万人，解放区的面积增加13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3000万，解放区的城市由日本投降时的89座发展到509座，已经解放了小半个中国。这就为其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曲线救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和降日汉奸所鼓吹和实行的一种反共降日政策。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国民党抗日积极性逐渐下降，反共趋向逐步上升，反共降日现象不断增多。1938年底，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首先提出“曲线救国”理论，为其制造反共摩擦和汪精卫、柴恩波等人投降日本进行辩护。此后国民党亲日派、顽固派大肆鼓吹。所谓曲线救国在方法上是指使部分国民党官员或将领率部投降日本当汉奸，成为伪官、伪军，然后打着伪军的旗号配合日寇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以消灭和削弱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从而维持其对人民的统治。

并在日本战败后，其投降部队即宣布“反正”，乘机占领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在这种反动理论和政策影响下，从1940年起，国民党的文武官员和部队，大批投敌，形成“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从1937年7月到1943年8月，投降日寇的国民党党政要员62人（其中副总裁、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委员20人），高级将领67人，军队50余万人，占伪军总数80万人的62%。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主持与日伪保持秘密联系，策动3次反共高潮。所谓曲线救国，是国民党顽固派为其反共投敌政策辩护的理论依据。

【新县制】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在国统区推行的地方政治制度。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坚持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不断强化法西斯统治。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在个人政治权力高度扩大与集中的同时，为加强对基层政权的控制，决定推行所谓的“新县制”，强化封建保甲制度。1939年6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设立县政计划委员会。9月，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此后又颁布《警察保甲及国民兵联系办法》、《各县保甲整编办法》等相关文件，将新县制在国民党统治区强制推行。新县制的主要内容是：“县为地方自治单位”，按其面积、人口、经济、文化、交通分为3至6等，区署为县政府的辅助机关。县以下基层单位为乡（镇）、保、甲。乡（镇）之划分以10保为原则，保之编制以10甲为原则，甲之编制以10户为原则。并设县参议会、乡镇民代表会、保民大会、户长会议（必要时得举行甲居民会议）等相应各级“民意”机关。为便于国民党直接控制政权，规定县长必须为国民党党员。各县贯彻“管、教、养、卫”原则，在乡（镇）保设国民兵队，甲设国民兵班等地方武装组织，乡（镇）设中心学校，保设国民学校，

乡（镇）长、保长兼任国民兵队长和学校校长，学校教师兼任乡（镇）保干事等职，把政治、武力和教育严密结合。并规定，原由省处置的税收改由县、乡、镇处置，作为“自治”经费。据国民党统计，到1943年底，计有川康滇黔桂闽浙皖赣湘鄂苏鲁晋绥豫陕甘宁青21省已经实施新县制。国民党通过新县制的推行，把地方上的政治、经济、财政、教育、地方武装、民众的组织和训练紧紧地控制起来，强化了对人民的封建法西斯统治。

【三三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一项政策。为了继续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了使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真正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从1940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普遍实行了三三制。根据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这三部分人分别代表工农群众、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及开明绅士。在最下级的政权中，人员分配可以做某些变动，以防止豪绅地主把持政权。指示还强调，为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必使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1941年2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按照三三制原则进行了改选。以后各解放区政权也根据三三制原则进行了改选。三三制政权的建立，进一步密切了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利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也有利于对汉奸和反动派实行专政。

【减租减息】简称双筒。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或解放区实行的土地政策。为团结各阶级、阶层的人民一致抗日，减

轻农民的地租负担和高利贷的剥削，中共中央决定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政策。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对减租减息政策作了全面具体的规定：减租一般实行二五减租，即减租25%，利息减至社会信贷关系所允许的程度，一般实行分半减息，即年息为一分五厘。同时，又实行交租交息，保存地主、债主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对富农一部分封建剥削、租息照减，同时在改善雇工生活的条件下，保护、鼓励其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群众运动，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调整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精兵简政】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的裁并机构，精选人员，调整编制，简化行政工作程序，进行军队体制改革的一项政策。为了克服由于日、伪、顽对解放区的进攻和封锁而造成的解放区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困难，中共中央采纳了米脂县参议长、边区参议员、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的建议，于1941年11月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政策。12月初，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中共中央规定，各抗日根据地脱离生产的人员只能占根据地总人口的3%，其中军队人员占2%，党政民系统占1%。在陕甘宁边区，根据这一规定将裁减各机关人员达1/4—1/3。此后，精兵简政工作在各根据地广泛开展起来，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实行精兵简政以后，使部队更能适应当时的游击战争环境；机关、部队人员的减少，不但缩紧了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而且增加了生产，对克服当时严重的物质困难起了很大作用。

【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抗战胜利后，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土地政策。抗战胜利后，中国革命形势进入新的阶段，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政策。1947年12月中共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并指出这里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1948年4月1日，又明确提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它规定了土地改革的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和打击对象，及土地改革的方法步骤，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是发展生产力。而只有消灭封建制度，才能取得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这是一条完整的成熟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没收官僚资本】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后期就提出要摧毁官僚资本的任务，1947年10月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正式提出了“没收官僚资本”的口号。同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把没收官僚资本与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并列为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194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给华东局的指示》等文件，详尽地规定了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有关方针和政策。到1949年底，全国共计没收官僚资本工业企业2858个，“四行两局”（即中央银行、中国

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系统和国民党地方系统的银行 2400 多家,十几个垄断性的贸易公司以及国民党政府所属全部交通运输企业。这些企业包括了官僚资本的最主要部分,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成为新中国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

【建国初期的剿匪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解放地区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当地的地主、恶霸、会道门头子,采取各种方式进行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进行了大规模剿匪斗争。剿匪部队在地方人民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下,由当地中共党委统一领导,采取军事围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以及“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方针政策,在 1 年内,剿灭土匪 80 万以上,到 1953 年,共剿匪 220 万。

【建国初期的民主建政】人民解放战争结束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管制,是最初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同时它帮助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由于还不具备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一般地区先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即由各地军管会和人民政府邀请若干人士为各界代表,召开各界代表会,作为军管会和人民政府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随着社会秩序的安定和群众组织的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逐渐改为由选举产生,代表会议的作用也由协议性质的机关逐步过渡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有 13 个省和 3 个行政区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中 10 个省和 2 个行政区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全国 80% 以上的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成立 1 个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和 1 个中央直属的自治区人民政府（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会），4 个大行政区的军政委员会，28 个省人民政府，2087 个县人民政府。各级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地建立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奠定了基础。

【调整工商业】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把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基本条件之一。1950 年初因通货膨胀而形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等原因，发生部分商品滞销、商店歇业、职工失业增加的问题。人民政府通过扩大对私营工厂的加工订货、大量收购农副产品以提高农村购买力、调整税收负担、适当收缩国营商业、教育私营企业职工努力完成生产任务等措施，合理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把当时符合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工商业，从停工歇业中挽救过来，使之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进行正常的生产和经营。调整工作到 1950 年秋完成。私营工商业克服了困难，而且得到发展。1951 年与 1950 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增加 11%，生产总值增加 39%，私营商业户增加 11.9%，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加 36.6%。

【抗美援朝运动】1950 年 6 月，朝鲜内战爆发。中国人民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10 月 25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11 月 4 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声明，成立了抗美援朝总会，国内各民族、各阶层群众掀起了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抗美援朝运动。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学生报名参加志愿军，农民、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护人员到前线担任战地勤务和运输工作。人民群众纷纷

推行爱国公约，进行爱国捐献，慰问志愿军及志愿军家属，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开始实施，从1950年冬季起，土地改革运动开始。指导思想是有领导有步骤、分期分批进行，贯彻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总政策——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到1953年春，全国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省外，基本完成。约有3亿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及其他农业生产资料。

【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同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要求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从同年12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群众控诉和检举反革命分子，人民解放军也加紧进行剿匪作战。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到1952年底，镇反工作基本结束，1953年剿匪作战结束。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中进行的一次较集中的大规模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向北京、天津两市高等学校教师作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10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号召全国知识分子广泛开展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学习运动。运动主要内容：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

与党的方针政策，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组织知识分子参加社会各项政治运动，此外，还进行了组织清理工作。运动到 1952 年底基本结束。

【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即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自治机构。1952 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以后又在 1954 年宪法中对于民族区域自治作了进一步规定。1982 年 12 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各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强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1984 年 5 月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体现了民族自治地方自主地管理地方经济文化教育、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武训传》是孙瑜编导的，1948—1950 年摄制的一部电影。1951 年 5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同一天，《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发表短评《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并提出“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对有关党员干部要“按照具体情况作出

适当的结论”。从此，在全国掀起一个思想批判运动。6月，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发起组织一个调查组到山东的堂邑、临清、馆陶调查，写出《武训历史调查记》，于7月23—28日在《人民日报》连载。

【三反五反运动】1951年12月1日、8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两个文件，要求发动党内外广大群众大张旗鼓地检查和惩治贪污分子。从同年底开始，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的时期。人民政府没收官僚资本，并把这种经济成份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各级政府实行了重点恢复政策，首先抓了交通特别是铁路运输业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及发展。1950年3月政务院通过并公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之后，人民政府采取紧缩开支、发行公债、征收公粮和工商税以及加强市场管理，取缔投机活动等措施，接着又实行了统购棉纱的政策，通货膨胀停止，金融物价趋于稳定。1950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着重讨论了恢复国民经济这个中心任务及党的方针政策，提出了要在3年的时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

况的根本好转。到 1952 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与 1949 年相比，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 145%；农业总产值增长 48.5%。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共中央在 1952 年下半年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 年 12 月 28 日，在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中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1954 年 2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 年 9 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把这条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统购统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建国后陆续实行的对粮食、棉花、油料等有计划统一收购和统一供应的政策。1953 年 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主要措施有：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户，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即实行适量的粮食定量配售；实行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营粮食工商业进行

严格管制，并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实行在中央管理之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粮食管理。同年11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及《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农民除了缴纳公粮以外，凡余粮户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将一定数量的余粮卖给国家，不许私营粮商再向农民买粮等10项具体办法。195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国家开始对油料和食用油品实行计划收购，并在城市、工矿区实行食油计划供应；1954年9月14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对棉布和棉花也实行了统购统销。1983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规定粮食、油料在完成统购任务后，可以实行国家、集体、个人等多种渠道经营，同年12月，全国对棉布、絮棉敞开供应，实际上取消了对棉布的统销政策。之后，1985年3月25日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取消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的统购政策，实行多种渠道经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简称五项原则。1953年12月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首次提出，1954年4月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这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6月，中印、中缅总理的联合声明重申并确认五项原则为处理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并为世界许多国家逐渐接受，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运动。1951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规定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出要在自愿互利和典型示范的原则基础上，以组织互助组为主，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应有重点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初级社）。到1952年底，全国有各种互助组830万个，加入互助组的农户占总农户的40%；合作社发展到3600多个（其中有高级社10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1%。1953年12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规定以发展初级社为主，提出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的过渡形式。1954年春，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9万多个。1955年春，增至67万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15%。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同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1956年初，全国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88.9%，由办初级社为中心进入以办高级社为中心。到年底，加入高级社的农户达10700多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87.8%，还有占总农户8.5%的农户加入了初级社。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中国经济落后，手工业在工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1953年全国手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23%左右。党和国家通过合作化的途径把他们组织起来。从1949年到1952年，手工业合作社（组）员从8.9万人发展到25万人，建立了3300多个合作组织。党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在组织形式上，采取了由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形式；在方法上，从供销入

手，实行生产改造；在步骤上，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这些方针政策推动了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1954年12月8日至1955年1月6日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确定了全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1955年12月，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要求手工业必须同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一道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全国组织了约10万个手工业合作社（组），参加人数达603.9万人，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1.7%。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对私营工业采取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对私营商业采取经销、代销的办法，逐步使他们走上了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3年6月向中共中央作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的报告，提出“公私合营是最有利于将私有企业改造和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形式”。1954年9月，政务院颁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规定了公私合营企业的性质、任务及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经营管理等各方面的准则。合营企业由1952年的997户发展到1954年底的1744户，又发展到1955年的3193户。与此同时，国营商业也逐步代替了私人批发商。1955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决定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由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新阶段。1956年1月，北京市首先实现各行业的公私合营。1月底，上海、天津、西安、沈阳、重庆、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先后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至1956年底，私营工业户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利润分配，从原来实行“四马分肥”的办法，改为定股定息，按资本金额多少，分别每年

领取 5 厘定息。国家自 1956 年 1 月起至 1966 年 9 月止，每年付息 1.2 亿元。

【加工订货】在中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国家对私营工业采取了供给原料，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的办法，初步把私营工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在商业方面，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把货物批发给私营商业，使其开始执行经销代销业务。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同资本主义经济成份通过各种公私合同进行联系和合作，如加工合同、订货合同、包销合同等。根据合同，国家在企业外部进行监督，工人在企业内部进行监督，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在企业外部进行联系。加工订货 1950 年占全国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的 29%，1951 年占 43%，1952 年占 56%；占全国私营工业生产总值 1/3 的棉纺业，1950 年下半年为国家加工订货的部分占其生产能力的 70% 以上。1953 年下半年开始，国家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加工订货的范围，由主要行业发展到一般行业，由大型工厂发展到中小型工厂，由大中城市发展到小城市。

【公私合营】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分为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两个阶段。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就开始实行。通过将私营企业中的官僚资本收归国有，对经营困难的私营企业实行国家投资。公方代表（国家派遣干部）与资本家共同管理并担任企业的领导工作。企业的利润以“四马分肥”的方式分配。1955 年底，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按照地区，每个行业所有的私营企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组成一个企业单位，在国营经济的统一领导下，统一管理生产，调

配人力、物力和财力，统一计算企业的盈亏，并按清产核资所确定的股份实行定息制度，资本家不再根据每年利润进行分配，失去了支配企业的权力。到 1956 年底，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全面的全行业公私合营。

【四马分肥】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利润分配办法。从 1953 年至 1956 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前，赎买实行“四马分肥”方式，即把企业的利润分为 4 个方面：国家所得税（占 34.5%）、企业公积金（占 30%）、职工福利奖金（占 15%）和资方的股息红利（占 20.5%）。1956 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改为定息制度。

【定息制度】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国家对原属资本家所有的生产资料采取赎买的一种方式。到 1956 年 3 月底，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各地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1956 年 6 月 18 日，陈云代表国务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三次会议上宣布实行定息制度。即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不分工商、大小、盈亏、地区、行业，一律由国家根据企业合营时核定的私股股额发给私股股东固定息率（一般是年息 5%，个别需要提高息率的企业可高于 5 厘）的股息。到 1956 年底，全国公私合营的私股额共计 24 亿元，国家每年为定息付出资金 1.2 亿元。为消除工商业者的顾虑，安心改造，国家规定定息为 7 年，自 1956 年 1 月起计算，1962 年又宣布延长 3 年，到 1966 年 9 月停止支付。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共 114 万人。对原企业有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的资方人员或代理人，国家安排工作，保留他们原来的高薪。至此，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基本完成。

【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中国 50 年代中期思想界的批判运动。胡适当时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954 年 12 月初，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决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并成立了“胡适思想批判讨论工作委员会”。《人民日报》及各地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同时召开各种批判会、讨论会，对胡适的政治活动、政治立场和政治、哲学、文学、史学、教育学、考据学等学术领域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批判。1955 年 1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讲演工作的通知》。至 1955 年 3 月，全国省市以上报刊发表批判文章达 200 余篇。1955 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共 8 册，收入文章 150 余篇，约 200 多万字。1955 年 3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

【肃反运动】1955 年 5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必须更加提高警惕性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指示》，在全国开展了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同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批判了党内对反革命分子麻木不仁的右倾思想，阐述了开展肃反运动的目的和原则。10 月 24 日，又发出《关于审干工作和肃反斗争结合进行的指示》，规定了审干与肃反斗争的联系与区别。肃反工作在全国 3000 多万供薪人员中分四批进行。第一批主要是在中央和省市两级的党政和军队的领导机关干部中进行；第二批主要是在县区两级机关干部和厂矿、基建单位的职工以及中小学教员中进行，在

军队中主要是在特种兵部队和步兵营连分队、医院等单位进行；第三批主要是在县区附属单位和小学教员以及一些分散的小型厂矿、基建、企业单位中进行；第四批主要是在小学教职员、乡村干部和公私合营的企业职工中进行。在肃反过程中，针对部分地区存在的肃反扩大化，“逼、供、信”等现象，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清查对象及时进行了复查，对定性不准的进行了甄别，对错捕、错整了的人进行了纠正。第一、二、三批单位的肃反于1957年底基本结束，第四批于1958年结束。肃反运动的胜利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安全保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又称双百方针。“百家争鸣”原指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辩论的风气和局面。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借用这个成语，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当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中共中央当时把它确定为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双百”方针。双百方针主张发扬社会主义的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在人民内部，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流派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自由讨论和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在1957年夏季的反右派斗争、1964年意识形态领域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方针受到严重的破坏。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总结了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经验和教训，清算了1957年以来在这方面的“左”的错误，使双百方针同文艺和学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方针成为科学文化事业繁荣进步的根本保证。

【反右派斗争】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为适应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形势，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的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与此同时，极个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同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夏结束。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予以回击，在全国人民中间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以稳定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必要的。但反右派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对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许多正常的甚至善意的批评和建议，视为右派进攻，使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7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并对错划为右派的人予以改正。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且规定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

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忽视了经济规律，要求过高过急，助长了“左”的倾向的发展，建设规模与国力不相适应，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了损失。

【“大跃进”运动】1958年为盲目追求经济建设高速度而开展的群众运动。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加之毛泽东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庐山会议后期，由于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

【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高潮中，由小型农业合作社合并成大社的运动中发展起来的。1958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制定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的文件。会后，有的地区形成了小社并大社的热潮，并出现了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毛泽东肯定了这种组织形式，认为它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于是，各地并社的工作很快转为办人民公社的高潮。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肯定了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10月底，全国就实现了公社化，原有74万多个农业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99%以上的农户参加了人民公社。由于在运动中，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刮“共产风”，搞“穷过渡”，加上瞎指挥和浮夸风，使生产关系遭到破坏，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由于“反右倾”斗争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共产风再度泛滥。

【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50年代进行的一次错误批判活动。我国著名人口学家、北大校长马寅初在1957年7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新人口论》一文。马寅初认为，根据各方面的资料综合概算，中国人口以8亿为好。因此，他呼吁要重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1958年4月开始，北京大学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的方式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及其整个学术思想、政治观

点进行批判。此后，高等院校和一些报刊也发表大量批判文章。1959年12月，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表示坚持真理，“决不向专以压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中共中央负责人认为这是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马寅初受到不公正的批判。1960年，撤销了马寅初担任的北大校长职务。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彻底为马寅初恢复了名誉。

【八字方针】由于“大跃进”的错误，国民经济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1960年8月周恩来、李富春在主持研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八字方针所包含的主要内容有：降低高指标，停建一系列工程，大量节减财政支出，保证重点项目，弥补重要缺口，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等。制定这一方针是中共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制定的重要步骤。

【四清运动】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1963—1965年在中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运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中共先后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作为指导运动的文件。农村的社教运动，起初以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主，城市的社教运动原为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后来，都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4个方面，统称为

“四清”。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一些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党的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特别是1965年初又错误地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社教运动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止。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整的重点对象。最早出现在1965年1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在1966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极不确定，被一些企图篡党夺权的野心家利用，在“文革”中，把一大批领导干部打倒。10年内乱的历史证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是不科学的，与社会主义社会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全国学雷锋活动】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也发表题词，号召向雷锋学习。周恩来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刘少奇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朱德题词：“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邓小平题词：“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向雷

锋同志学习的活动。雷锋（1939—1962）生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的班长，他苦练军事技术，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关心帮助他人，助人为乐，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全国学雷锋活动，对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起了积极的作用。

【工业学大庆】1964年毛泽东提出全国工业战线开展“工业学大庆”的号召。1960年2月，大庆地区发现特大油田。中共中央决定在黑龙江省的大庆地区进行石油勘探大会战，会战队伍以革命加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的铁人精神，创造了三老四严、干部与群众坚持三同的管理、工作方法，只用3年多时间就基本建成大庆油田，并使原油产量保持稳产高产。“工业学大庆”就是学习大庆工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科学的管理方法，促进全国工业的发展。工业学大庆成为全国一项普遍的群众运动。1981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中指出，过去把大庆的一切经验几乎都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联系起来，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和有关上级领导，但大庆经验和学大庆运动基本上是对的。此后，这个口号不再被宣传。

【农业学大寨】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坚持走合作化道路，坚持艰苦奋斗的精神，成为山区建设的典型。此后，在全国农业战线纷纷开展了以学习大寨大队为中心内容的群众性活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有关方面一方面违背经济规律，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在大寨和昔阳制造先进典型；一方面用行政命令强行推广大寨、昔阳经验。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大寨确是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大寨运动掺有“左”的内容和虚假的成份，其错误主要应由当时的中央负责，在大寨和昔阳推行“左”的错误主要应由陈永贵负责。此后，这个口号不再被宣传。

【学术领域的政治批判】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再度发展。从1962年秋到1965年冬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对文艺界、学术界的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成为“文革”的前奏。从1964年夏季开始，始于对文艺界的政治批判扩展到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的经济思想，历史学界批判了翦伯赞、吴晗的所谓“非阶级观点”、“让步政策”等学术观点。把许多正常的学术观点说成是政治问题，无限上纲；把富有学识的知名学者说成是“反党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加以打击迫害；用政治批判来代替正常的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经过实践证明，这些被批判的学术观点和论著是正确的或者是基本上正确的。对学术领域的政治批判，不但使知识分子本人，而且使全国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损害，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突出政治五原则】1964年底林彪提出“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其他”以后，又于1965年11月18日对中国人民解放军1966年的工作提出要求，总的要求是“继续突出政治”，具体要求有5项：（1）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

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2) 坚持四个第一，特别要大抓狠抓活思想。(3) 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同时要切实搞好干部的领导作风。(4) 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5) 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同年12月28日至1966年1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以此为中心议题，并将之视为全军各项工作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政治工作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此后，军队中政治与军事统一，政治与业务统一的正常关系，变成了冲击与被冲击，压倒与被压倒的关系，使全军的各项工作受到很大损失。

【红卫兵运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大、中学生中自发产生的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为信条的“造反”运动。最早产生于北京中学生中。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一些高年级学生到圆明园旧址集会，基于他们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决定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那样组织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定名为红卫兵，用实际行动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从6月初起，北京其他中学也纷纷组织红卫兵，名称不一，有的叫“东风”，有的叫“红旗战斗小组”等。先是在校内造校领导的反。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7月4日再论，7月27日三论。在这3篇大字报中，认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革命者就是孙猴子”。他们表示“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目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激

荡的大风暴。红卫兵战士们，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像勇敢的海燕一样在这场大风暴中翱翔吧！”7月28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海淀区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会上，将前两论和给毛泽东的信托江青转给毛泽东。8月1日毛泽东复信，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说“我们支持你们，同时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毛泽东还把他们的信及大字报全文印发给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出席者。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红卫兵首次登上天安门和观礼台。毛泽东身穿军装，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从此，红卫兵组织由中学扩展到大学，由北京发展到全国各地。一个以“破四旧”、“大串连”为主要内容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兴起。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红卫兵的观点发生了分歧，由于“中央文革”直接间接地向红卫兵组织插手或操纵，遂分成了派系，仅北京就分成了3个司令部。广大红卫兵战士由狂热走向迷惑、不解和思考。

【破四旧】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内容之一。1966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八一八天安门大会之后，以红卫兵为主的一批狂热的青少年，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煽动下，纷纷走上首都街头，到处贴传单、大字报，发号施令，向他们认定的“封资修”展开总攻击。他们闯入党政领导干部、知名学者、教授及

普通公民宅院，视他们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随意揪斗，游街示众，甚至私设公堂，滥施酷刑，实行所谓“群众专政”“红色恐怖”，许多人被打伤打残和打死；他们狂热地涂抹改变原有街名、路名、店名、校名、医院名。像8月22日一篇通讯所说的，他们要“把北京彻底改造成为一个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北京”。这一切，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并扩展到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1966年8—9月间，北京市被打死1700多人，被驱逐出北京（一般是派人押送回乡）的8.5万人，被抄家的33695户，被查抄的金银及其制品按当时牌价折算为1226万元，现金、存款、外币、公债4478万元，文物、字画、陶瓷器等72万件，图书235万册。这一打砸抢行动，是造成全国大动乱的重要因素之一。

【革命大串连】“文革”初期毛泽东诉诸群众、通过青少年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措施。《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发出后，各地党委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大都与激进的学生产生对立。因此，各地“受压”的学生陆续到北京参观北大及其他院校的“革命”情形，有的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告状。早在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就提议外地学生到北京应当免费。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八一八大会，实际是号召大串连的大会。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规定来京的师生免费乘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开支。到京后的食宿由北京市安排。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各地师生及红卫兵共1100余万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都认为这是把“文革”之火

烧遍全国、冲开局面的好办法。“中央文革”又借机指派北京的“造反派”到各省市建“联络站”，煽风点火，组织冲击党政军机关。这样，北京和外地、外地和外地师生之间的串连，使交通十分拥挤，火车不堪重负，各地组织大批人力、物力成立接待站。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沉重的压力。鉴于此，中央提倡步行串连，各地师生又组成“长征队”。196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从12月21日起停止免费乘车、船。1967年3月19日中央决定停止全国大串连，各地人员返回本地本单位就地闹革命。

【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两军】三支两军指：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1967年春，“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阶段”，全国处于“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状态，地方党政组织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之中，1月23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3月19日中央军委又做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从此，军队开始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先后派出280多万名指战员参加了三支两军工作。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和《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在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和撤出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三支两军在当时对稳定局面、维护社会秩序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它在总体上也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又因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和战士思想上缺乏准备，不了解历史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经验，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插手和破坏，因而在工作中也产生了许多缺点错误，带来了许多消极后果，造成了军队和地方、军队内部的一些隔阂，影响了部

队的思想、作风、组织建设，损害了人民军队在广大群众中的声誉。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运用于对外关系领域，即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从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而逐步形成的战略思想。早在1946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时，就提出了“中间地带”的观点。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1956年苏彝士运河事件发生后，他又说：“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这些观点，后来又被概括为第一中间地带，第二中间地带（美国以外的日本、西欧、加拿大、澳洲），到60年代形成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同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对此作了阐述。他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国家过去有着共同的遭遇，今天都面临着新

老殖民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发展民族经济，建设各自国家的共同任务。”邓小平的发言，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请毛泽东审阅过，因而也可以说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毛泽东的观点。由于有这个发言，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思想开始闻名于世。这一思想，曾经成为中共中央制定和调整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当时，对于指导中国坚持反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起过积极作用，并为后来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作了一定的准备。当前，世界的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仍有其一定价值。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

【批林批孔运动】“文化大革命”后期被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反对周恩来的一次运动。1973年3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谈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提出要同时批判孔子。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全国开始“批林批孔”。24日、25日，江青擅自在北京召开驻京部队、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发表煽动性演说，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江青还采取送材料的办法，派人到部队“放火烧荒”。在江青等人操纵下，报刊上连续刊载不批林、假批孔，影射攻击周恩来的文章。同时江青等还大肆宣传吕后、武则天，为其反周组阁阴谋制造舆论。毛泽东发现江青等人的阴谋后，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三项指示为纲】最初见于1975年5月29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反对“左”倾错误的著名口号“三项指示为纲”。邓小平指出，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

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它们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并且为了阐明和宣传邓小平关于整顿的指导思想，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文章阐明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是各项工作的总纲，而发展生产，实现四化宏伟目标是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论总纲》对“四人帮”散布的种种反动观点进行了抨击。这篇文章虽然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但中心是强调要全面整顿，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事实上这是对“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纠正。

【评《水浒》运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利用毛泽东有关《水浒》的评论而发动的一场攻击周恩来等人的运动。1973—1975年间，毛泽东曾多次评论古典小说《水浒》。认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搞投降主义，后来接受了招安等。经毛泽东同意和批准，“四人帮”一伙利用他们所控制的舆论工具，在全国报刊上大量发表评论文章，歪曲毛泽东的评论，掀起了一场旨在影射周恩来等人的所谓批判“投降主义”的评《水浒》运动。1975年9月，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江青鼓吹评《水浒》运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思想战线上的又一重大斗争。毛泽东发现后，及时制止了“四人帮”利用评《水浒》诬陷打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阴谋活动。

【反击右倾回潮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划和组

织的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的活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一方面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一方面使一大批老干部恢复工作。1973年3月，邓小平复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江青等人对此极为不满。1973年10月，江青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成立“大批判组”，开始“反击右倾回潮”。1974年1月以后，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指使他们的写作班子大造舆论，影射攻击周恩来，并制造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风庆轮事件等，在全国开始了“反击右倾回潮”运动。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广大群众的抵制，这一运动没有按江青等人的企图发展下去，到1974年上半年即大体中止。然而，这一运动的开展，使初步好转的形势又趋于混乱。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等人纠正“文革”错误的作法，发动的以批判邓小平为目标的运动。1975年11月毛泽东在清华大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揭发驻校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的信上加以批示，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上，宣读毛泽东圈阅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指出刘冰等人的揭发信绝不是孤立的，是一股右倾翻案风。由此在全国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从不点名到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四人帮”乘机诬蔑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以来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是一股“右倾翻案风”，目的是为了要篡夺党政大权。这次运动，使刚刚恢复的国民经济和各个领域中的正常秩序，再次陷入到一片混乱之中。

【两个凡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方针，首先由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的。这是由华国锋在1976年10月26日听取宣传口汇报时最先提出的。他针对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提出：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免不说。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基本思想。1977年1月，华国锋又要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写进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提纲中去。以后，主管中央宣传口工作的汪东兴提出把华国锋的这个观点写进两报一刊社论公开发表。社论写作班子对华国锋的原话稍加修改移进上述社论。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在邓小平、胡耀邦领导和推动下开展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一次原则性讨论。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思想路线之争。是解放思想同因循守旧之争，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开始时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全面的拨乱反正，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等沉重的历史任务，迫切需要冲破长期形成的许多“左”的思想理论上的禁锢。在人事安排上则迫切需要恢复邓小平的职务，让他重新出来工作。但是，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华国锋，囿于“左”的束缚，严重落后于形势发展的需要，阻碍拨乱反正的进行。他坚持毛泽东

晚年“左”的错误理论和路线。在1976年10月7—14日召开的“打招呼”会议期间，他强调“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号召广大党员干部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10月26日，他在同中央宣传部的谈话时提出两个凡是错误理论，并要回避天安门事件。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该社论由汪东兴决定、华国锋批准发表）公开提出“两个凡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在3月10—22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重申这一错误方针。他认为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他是站在毛泽东的当然继承者和“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这就为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邓小平出来工作设置了重重障碍。他压制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建议。迫于一些老干部的压力，答应考虑恢复邓小平职务问题，但他要求邓小平承认天安门事件不是革命行动，被邓小平拒绝。4月10日邓小平在致党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24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更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但华国锋仍然坚持“两个凡是”。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华国锋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次重申自己的错误观点。针对这一理论，邓小平强调“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

评，开了解放思想的先河。但是，“两个凡是”的思维定式、习惯，仍然束缚着许多人的头脑。因此，要真正使党、国家和人民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非进行一场思想路线的大讨论不可了。

从1977年下半年起，一些革命老干部开始写文章，呼吁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11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主持讨论关于“文革”的研究提纲时提出：“研究历史，应该有自己的脑袋”，“应该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在他领导下创刊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探讨问题，大胆地向一些禁区冲击。1978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4月上旬，南京大学胡福明、中央党校孙长江共同撰写了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经胡耀邦审定后在《理论动态》第60期刊出，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12日起各报陆续转载。文章首先说明：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接着鲜明地论述了四个问题：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最后说：“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且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

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篇从基本理论上否定“两个凡是”的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也受到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们的责难。但是，谁也阻止不了这场讨论的深入发展。

这场讨论，尽管是讨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常识问题，但在许多人的思想被禁锢的条件下，确实具有打破精神枷锁、解放思想的作用，它使中共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可能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打下了思想基础。在当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从“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这样的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的深远意义。

【一国两制】中国政府为合理解决香港、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而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这个构想是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至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会见知名人士傅朝枢的谈话期间逐步形成的。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统一祖国的9条方针，则使其内容更具体化。其中建议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1982年9月下旬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首次使用了“一国两制”的说法。其基本含义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10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

是中国的主体。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984年5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六届二次会议通过了这一政策。根据这一构想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澳门问题。1982年9月起中英两国领导人就香港问题开始谈判，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字，1985年5月27日正式生效。联合声明规定：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在恢复行使主权后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1987年4月13日中国、葡萄牙两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字。确定：中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批判错误思潮，重申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其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的政治基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绝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重申四项基本原则，不仅有力地批判了当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而且为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保证了全国人民政治思想的统一。1982年9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党的一条政治纪律写入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同年12月，四项基本原则在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上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反对精神污染】1983年10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

会上，在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中提出的。他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要求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要进行认真的自我的批评，并且切实改正。强调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坚决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随后，中共中央邀请 270 多位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受中共中央委托，就整党和反对精神污染问题作了讲话。11 月，全国广播电视宣传工作会议讨论了如何抵制和反对精神污染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邓力群就反对精神污染的范围、政策和界限讲了话。12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确对待宗教问题的指示》。1984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发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论述了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依靠什么思想指导社会主义社会前进、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及能否用“异化”的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极现象等问题。

【生产力标准问题讨论】1984 年 10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最主要的标准”。此前，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等单位组织了关于生产力标准问题的讨论，讨论很快在全国展开。这场讨论对科学、全面、深入地认识生产力标准问题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此作了充分肯定。1987 年 11 月，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明确指出：“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初级阶段，为了摆脱贫困和落后，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中共“十三”

大前后，全国理论界和经济工作者继续深入地对生产力标准问题进行了科学探讨，并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生产力标准的理论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指导。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年12月至1987年4月，党中央针对少数学生闹事，号召全党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年12月间，合肥、武汉、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一些高校的少数学生上街游行。参加游行的大多数是高校一、二年级学生，大部分人没有明确的目的和要求，有些学生表现出偏激的情绪和行动。地方和学校方面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和疏导工作。12月30日，邓小平在就少数学生闹事问题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中，向全党提出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邓小平在当年9月中共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作过专题讲话，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否定党的领导。1987年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党员和干部、群众传达〈邓小平同志关于当前学生闹事问题的讲话要点〉的通知》，指出：邓小平的讲话指明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于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坚持改革和对外开放，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我们党的命运和社会主义前途，关系到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成败；一定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站在斗争的前列。1月13日、17日、23日，上海市、安徽省和人民日报社的党的纪检部门分别将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开除出党。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

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性质和意义、范围和重点、政策界限作了明确阐述，指出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主要反对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并提出要把这场斗争持续、健康地开展下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中提出的理论。报告指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中国社会已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社会。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个历史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这个起始阶段，而是特指中国在生产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历的特定阶段。中国从50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这时期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困、摆脱落后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之间的矛盾。因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斗，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是中共

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也是中国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概括和总结。邓小平为这一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在 1989 年 10 月，赵紫阳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中提出的。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继续、丰富和发展。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始终不渝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坚持改革开放赋予了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它的提出为中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指导思想，也为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提供了基本指导方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 8 个民主党派合作的制度，是新型的党派关系，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它是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由毛泽东、周恩来确定下来的。1949年3月5日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明确规定：“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及时地提出了中共与民主党派“两个万岁”，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个八字方针，随即被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并为各民主党派所采纳。1957年以后的20年中，这一方针受到严重干扰，尤其“文化大革命”使许多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受到冲击、摧残、迫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中共的统一战线方针也得到恢复和发展。由于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方针，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中共中央也正确估量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妥善地解决了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和处理阶级斗争问题的关系，正确估计和明确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各民主党派的性质、地位、作用，认定他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随之，中共中央又把八字方针发展为十六字方针，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中共“十三大”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把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放在了新的政治基础上。各民主党派发挥了各自的优势，积极参政、议政，参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积极开拓为四化建设、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的渠道，并加强各自的自身建设，他们的组织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战 事

【直皖战争】北洋军阀直、皖两系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争夺中央政权的一场战争。袁世凯死后，执掌北京中央政权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扩充实力，企图用武力统一西南，排斥直系，因而与英、美扶植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矛盾日益尖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英、美与日本争夺中国的加剧，直、皖两系军阀的矛盾进一步激化。1920年4月，曹锟在保定召开八省联盟会议，形成直、奉两系联合对皖系。5月，被派往湖南与西南军阀作战的直系将领吴佩孚撤防北上，通电指斥皖系“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政柄”。7月8日段祺瑞胁迫大总统徐世昌罢免曹、吴职务，在团河成立“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直系则设“讨贼军”大本营于保定，以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奉系军阀张作霖也率兵入关，援助直系。14日直皖战争正式爆发，双方各投入近10万兵力，激战于河北涿州、高碑店、琉璃河、杨村一带。开始皖系在日军支持下曾获小胜。后吴佩孚率军突袭松林店皖军司令部，皖军在西线溃败。同时奉军在东线协同直军作战，皖军遂全线崩溃。19日，段祺瑞宣布辞职。接着直、奉军开到北京。北京政权落入直、奉两系军阀手中。

【第一次直奉战争】北洋军阀直、奉两系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争夺中央政权的战争。直皖战争中直系军阀的胜利，表明英美势力在中国的加强。日本帝国主义在失去皖系军阀这个工具后，扶植另一个工具奉系军阀与直系对抗。1920年8月，直、奉两系共推靳云

鹏组阁。靳内阁亲直疏奉，引起奉系不满。1921年12月，奉系军阀张作霖进京推倒靳内阁，支持亲日派官僚梁士诒组阁。梁上台后，赦免被通缉的皖系军阀政客，同意日本要求借日款赎回胶济铁路，将该路改为中日合办。同时梁极力抑制吴佩孚。梁内阁的卖国行为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吴佩孚和直系各省督军乘机逼迫梁士诒下台，由此引发直奉战争。1922年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双方各动用兵力12万人，在长辛店、固安、马厂一带交战。5月5日直军在长辛店获得大捷，西线奉军溃败，东线奉军仓皇溃退。随后张作霖逃回滦州，率残部出关。6月17日直奉签订和约，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直系军阀独霸了北京中央政权。

【第二次直奉战争】北洋军阀直、奉两系为争夺中央统治权而爆发的第二次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北京政权为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吴佩孚在英、美支持下，推行“武力统一”政策，一面准备对东北的奉系作战，一面把势力伸向南方，同时加紧对人民压迫。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反直系的各派军阀乘机反对曹、吴。奉系军阀张作霖自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整顿军备，并与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及广东的孙中山形成反直三角联盟。1924年9月，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与直系另一军阀孙传芳从江苏、福建进攻卢永祥，爆发了江浙战争。张作霖以反对攻浙为由，于9月15日率奉军向热河、山海关进攻，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8日，吴佩孚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出兵迎战。奉系投兵力17万，直系投入兵力20余万，双方均有海空军参战。9月下旬至10月中旬，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十分激烈。10月7日，奉军下令总攻。12日，吴佩孚亲自到山海关督战。正当两军在前方相持，北京空虚的时候，直

系将领冯玉祥从热河前线秘密回师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曹锟。10月25日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吴佩孚腹背受敌，全军覆灭。11月3日率残部由大沽口浮海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

【第一次东征】1925年2—3月广东革命政府讨伐盘踞在广东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的战役。1924年冬孙中山北上后，陈炯明以为有机可乘，于1925年1月7日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分三路进攻广州。2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布总动员令，以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为左路和中路，以黄埔学生军和粤军许崇智部为右路，开始第一次东征。右路军是这次东征的主力，由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蒋介石统领，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负责战时政治工作。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帮助制定了东征计划，并参加了东征。2月4日右路军占领东莞、石龙，11日占领宝安，15日攻克淡水。27日在彭湃领导的海丰农民配合下占领了陈炯明的家乡海丰城。3月7日克复潮州、汕头。陈炯明逃亡香港。3月底陈部主力溃散，残部退往闽、赣边境。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

【第二次东征】1925年10—11月广东革命政府第二次讨伐盘踞广东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的战役。1925年9月被击溃的陈炯明部在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支持下，乘革命军回师平定杨、刘叛乱之际，重占潮州、汕头等东江一带，并集结重兵于惠州，企图和粤南的军阀邓本殷合力夹击广州。为彻底消灭陈炯明部统一广东，国民政府于9月28日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任命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全军编为3个纵队，共3万余人，10月1日出师。14日，东征军攻占了号称“南中国第一天

险”的惠州，歼灭了敌军主力。11月初占领梅县、汕头，再度收复东江，陈炯明部被全歼。

【北伐战争】1926—1927年以打倒北洋军阀为直接目的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五卅运动和全国工农运动的发展，为北伐战争准备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为北伐战争准备了可靠的后方。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中央特别会议，确定现时党的主要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和推动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并作出了准备迎接北伐的决议。5月初，以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奉命为北伐先遣队挺进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6月4日，国民党中央通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北伐动员令。7月6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国民革命军共8个军，约10万人。蒋介石为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白崇禧为总参谋次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敌军北洋军阀有3支：一是盘踞于湘、鄂、豫、陕、冀一带并控制京汉铁路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拥有兵力20万人；二是占据江、浙、皖、赣、闽5省从直系军阀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拥有兵力20万；三是占据东北和津京地区及津浦路北段，并控制北京政权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有兵力35万人。根据双方力量对比和敌人内部矛盾情况，北伐军决定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7月12日，北伐军占领长沙。8月下旬，在湖北咸宁汀泗桥、贺胜桥两次战役中击溃吴佩孚主力，10月10日攻克武昌。至此，两湖战事结束，主战场转向江西。11月5日攻克九江，8日进占南昌，歼灭了孙传芳主力。12月18日进入福州，占领福建。2月18日占领杭州。3

月中进抵上海附近。3月22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24日，北伐军攻克南京。冯玉祥于1926年9月从苏联回国，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小平帮助下，于9月17日率所部国民军在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自治区）誓师，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随后经甘肃、陕西进入豫西。国民革命军自广州誓师北伐，半年多时间，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主力，占领了湘、鄂、赣、闽、皖、苏、浙等省的全部或一部，把国民革命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影响下，西南川、滇、黔各省地方军阀也转向拥护国民政府。

【汀泗桥战役】北伐战争中的著名战役。汀泗桥位于湖北咸宁境内，为鄂南门户，是粤汉路上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隘。1926年8月下旬，北伐军连克平江、通城、岳阳、崇阳、蒲圻进入湖北，与敌相持于汀泗桥。这时在北方指挥同国民军作战的吴佩孚，闻讯星夜赶到武汉，决定死守汀泗桥待援。调集宋大霈、董振国、李倬章、叶开鑫等部及军官团共2万余人防守汀泗桥。8月23日，北伐军在羊楼司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乘敌新败而又立足未稳之际，攻取汀泗桥。第四军出崇阳、通山，第七军取蒲圻，第八军沿江而上，会攻汀泗桥。26日，担任主攻的第四军发起进攻，以十二师为左翼，十师为右翼，独立团居中沿铁路线进攻，几次冲锋均未奏效。之后改变正面强攻，在农民侦察队、向导队协助下，涉水过河，抢占了敌阵地制高点。27日黎明，北伐军全线总攻。独立团向铁桥据点之敌进攻，占领桥头。扼守铁桥北端高地之敌向后溃退，独立团将敌一部包围缴械，占领了汀泗桥，并进占咸宁。

【贺胜桥战役】北伐战争中的著名战役。1926年8月27日北伐军

占领汀泗桥后，吴佩孚亲率刘玉春、张占鳌等部及卫队团、军官团和汀泗桥溃退之敌，扼守贺胜桥。在贺胜桥以南黄塘湖至杨林垱构筑防线。北伐军以四、七两军进入贺胜桥。四军十二师及叶挺独立团担任攻击队。8月30日凌晨3时，北伐军发起总攻，四军独立团和十二师三十五团首先冲锋，在铁路沿线与敌激战。四、七军其他各部亦分途进攻。吴佩孚亲率卫队乘火车赴前线督战。北伐军反复冲锋肉搏数时，敌仍节节抵抗。叶挺独立团勇猛冲锋，首先突破杨林垱等坚固阵地。敌全线动摇。吴佩孚在贺胜桥手刃退却不前之旅、团长9人，悬首于贺胜桥上，但终难遏止前线的崩溃。吴佩孚所乘之督战车亦被北伐军炮火击中。午前9时北伐军占领贺胜桥。吴佩孚率残敌向武昌溃逃。

【武汉国民政府北伐】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四川军阀、广东军阀、奉系军阀从东西南北四面对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武汉政府造成巨大困难。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关于发展方向问题，出现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首先进行东征，乘蒋介石地位尚未巩固时，迅速出师讨蒋，然后再继续北伐；一种意见认为应继续北伐，首先进军河南，与冯玉祥会师中原，再与阎锡山联合，驱逐奉系出京津，最后解决东南问题。1927年4月18日，经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先行北伐。次日在武昌举行北伐誓师典礼。北伐军主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共6万人，唐生智任总指挥。5月中旬，北伐军集中于河南驻马店地区，沿京汉路两侧北上讨伐奉军。下旬，连克漯河、鄆城、临颖、许昌、新郑等地。冯玉祥军也于5月26日攻占洛阳，分两路向新乡和郑州进兵，奉军被迫放弃郑州、开封。6月1日北伐军与冯部会师郑州。4日占领开封，克复郑汴。

6月10—12日，武汉国民政府领袖汪精卫、徐谦、谭延闿、孙科等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决定将河南和西北的军政大权交给冯。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全部回师武汉。以伤亡1.4万多人的巨大代价取得的北伐成果为冯玉祥所得。

【二次北伐】1928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派联合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因国民党政府称此次战争是1926年北伐的继续，故有此称。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为巩固其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打出“继续北伐”的旗帜。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各实力派，为扩充实力，纷纷赞同。1928年1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进行“北伐”的决议。2月11日，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限期完成北伐”。之后，蒋介石以北伐之名，对军队进行了重新改编。把北伐各军编为4个集团军，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全军总司令蒋介石，参谋总长何应钦。共40多个军，约70余万人。北伐部署是：第一集团军沿津浦线北进；第二集团军由津浦、京汉两线间的鲁西和直南向北推进；第三集团军由京绥、正太两线向东攻占石家庄，再转京汉线北进；第四集团军沿京汉线北上，然后四路会攻京津。当时张作霖的“安国军”参战兵力约40万。1928年4月7日，蒋介石下总攻击令，各路战事同时发动。第一集团军在鲁南和津浦线进展顺利。7日发起攻击，9日占郟城，10日克台儿庄，下旬占莱芜、泰安，5月1日克济南。第二集团军发起攻击后，在直南首克邯郸；第三集团军于4月20日冲出娘子关向石家庄进攻。4月17日，日本政府决定出兵山东。5月3日，日本军队公然武装进攻济南，对济南居民和进驻济南的北伐军进行大肆屠杀，制造了骇人

听闻的济南惨案。面对日本的武装干涉，蒋介石妥协退让，命令部队撤离济南，绕道北进。1928年5月上旬，相继占领石家庄、临沂、德州等地。5月19日，蒋介石调整部署，以第一、二集团军担任津浦线、第三集团军担任京绥线、第四集团军担任京汉线，兵分三路，进逼京津。很快占领绥远和大同、张家口、保定、沧州等地。张作霖于6月3日退出北京。6月4日，在退往沈阳途中，经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军人炸死。6月8日，阎锡山部队进入北京。12日占领天津。6月15日，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蒋、冯、阎、桂联合的“二次北伐”随之宣告完成。

【蒋桂战争】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1928年春秋之际，李宗仁趁“二次北伐”之机，控制了两广、两湖，并在平津等地大量扩充军队，从而引起蒋介石的不满。1929年1月，蒋介石为削减其他军阀的兵力和地盘，在南京召开军事编遣会议。会上，李宗仁联合冯玉祥，反对缩编自己的军队。蒋桂之间的矛盾日趋明朗。这时双方都在秣马厉兵，准备战争。1929年2月19日，李宗仁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免去亲蒋的湖南省主席鲁涤平职务。这一事件成为蒋桂战争的导火线。3月25日，蒋介石下令讨伐桂系。蒋军兵分三路，设讨逆行营于江西九江。任命朱培德、刘峙、韩复榘为各路总指挥。桂系由于战线太长，内部矛盾重重，加之前线重要将领李明瑞、杨腾辉等被蒋介石收买倒戈，因此一战即溃。4月21日，桂系放弃武汉，李宗仁、白崇禧逃回广西。5月5日，李宗仁以护党救国军南路总司令名义通电讨蒋。这时，广东已为当时亲蒋的陈济棠所控制。蒋介石与陈济棠南北夹攻广西。6月27日，倒向蒋的原桂系俞作柏部进驻南宁，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被迫通电下野。蒋桂战争至此结束。

【蒋唐战争】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与唐生智之间的战争。1927年唐生智被国民党新军阀桂系打败后，借助蒋介石的势力又把军队从桂系手中夺回，暂依附于蒋介石。1929年5月，唐部驻防河北，要求调回湖南，蒋不但加以拒绝，还令唐部开赴河南前线，与正在讨伐蒋介石的西北军作战。与此同时，又将唐本人调离部队，让其出任南京军事参议院院长闲职。蒋唐矛盾顿趋尖锐。唐生智决意反蒋，尔后，唐生智与汪精卫的改组派取得联系，接受了改组派总部委任的“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指挥头衔，并暗中与石友三、阎锡山秘密串连反蒋。1929年12月1日，在石友三发动军事反蒋的同时，唐生智在郑州发表反蒋通电。在蒋介石的分化瓦解和军事威逼下，石友三和阎锡山均背弃前约出兵反唐，唐的老部下何键也倒戈拥蒋。12月20日，蒋军在平汉线发起进攻，唐军向北败退。1930年1月，阎锡山挥师攻唐。在南北夹攻的形势下，唐生智宣告下野，后化妆潜逃，经开封至天津租界隐居。

【中原大战】又称蒋冯阎大战。1930年国民党军阀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及其他反蒋派系在中原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混战。1929年内爆发的蒋桂、蒋冯、蒋唐（唐生智）战争，都以蒋派军阀势力的胜利而告结束。但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的矛盾依然如敌。冯玉祥、李宗仁等势力及汪精卫改组派等政客集团决心寻找机会与蒋介石再做较量。1930年春，上述各派势力终于形成了反蒋大联合。3月中旬，冯、阎、桂三军将领联合发出逼蒋下野的通电。4月初，阎锡山和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副总司令”。5月初，阎、冯举行郑州会议，作了具体的军事部署，同时，蒋介石也完成了军事准备。5月1日，蒋介石发表讨阎、冯

誓师词。5月8日，蒋坐镇徐州，准备亲自指挥陇海、津浦两线战事。5月11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于是，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在绵延数千里的战场上，空前的军阀大混战正式爆发。战争开始，反蒋联军南北夹攻，蒋军失利。6月底，广东军阀拥蒋出击，打败了从南向北攻蒋的桂军，解除了蒋介石的南线之忧，顿使战况发生逆转。此后，反蒋联军由主动转为被动。9月18日，东北军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随后派东北军入关，助蒋讨伐冯阎联军。10月中旬，阎、冯通电下野。11月反蒋联军宣告战败。中原大战期间，反蒋各派还联合起来，于8月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组织了排蒋的党政机构。9月，在北平宣告成立了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国民政府。扩大会议还声称要召集国民会议，并起草了“约法”。张学良入关后，扩大会议由北平迁到太原，后随反蒋联军的战败而烟消云散。

【长城抗战】1933年中国军队在长城一线抗击日军侵略的战斗。1933年1月1日，日军进犯山海关，中国守军何柱国部奋起抵抗，安德馨营300人力战殉国，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1月3日，因孤军无援，山海关沦陷。尔后，日军继续向长城一线进犯。3月初，日军侵占热河及长城喜峰口。3月9日，刚赶到接防的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先头部队夜袭了日军喜峰口营地，夺回阵地。自3月10—25日，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至罗文峪的长城线上，屡次击败日军的进攻。与此同时，驻守冷口和古北口的中国军队也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长城抗战给了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中国作战部队由于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至5月下旬，不得不相继放弃长城各口。

【第一次反“围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南部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围剿”的战役。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约10万兵力，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向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当时，驻守革命根据地的红一方面军约4万人。在毛泽东诱敌深入，歼灭敌人于根据地内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红一方面军主力转移至赣江以东，准备迎敌。11月5日，国民党军首先向袁水流域推进，扑空后，继续向赣江东岸推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红军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迟滞、迷惑敌人，主力则于11月26日全部退至东固、南垄、龙冈地区。12月1日，又秘密转至宁都县的黄陂等地，隐蔽待敌。12月中旬，国民党军由吉安、建宁一线，分8个纵队继续进攻。12月29日，敌张辉瓒部主力向龙冈推进。红军主力埋伏于龙冈附近山中，30日拂晓，红军以优势兵力向进入伏击圈的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经半天激战，全歼张辉瓒师9000余人，张辉瓒被俘。接着，红军向东韶急进，又歼敌谭道源师一半。余敌纷纷撤退。这次战役，红军共歼国民党军一个半师，缴枪1.3万余支。

【第二次反“围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的战役。蒋介石第一次“围剿”失败后，调集20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从福建建宁到江西吉安，构成400公里长的弧形战线，于1931年4月1日，兵分四路向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3万余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

敌、并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以少数兵力结合地方武装迟滞、消耗、疲惫北面之敌，主力则从根据地边缘区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一带转移到根据地内的广昌、石城、瑞金、宁都等地，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和整训部队，进行反“围剿”的准备。4月底，国民党军继续向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红军主力则迅速按预定计划秘密集结于东固、龙冈地区，待机歼敌。5月15日，国民党军王金钰、公秉藩两师由富田进入东固山区。16日，红军乘其不备，发起猛攻，经过一昼夜激战，歼灭公秉藩师王金钰师大部，取得反攻首战胜利。随后，又迅速由西向东横扫。19日，在白沙歼灭敌人第四十三师大部和四十七师一个旅的残部。22日，在中村歼敌第二十七师近一个旅。27日，攻占广昌城，歼灭守敌第五师一部。30日，直捣建宁城，歼灭守军第五十六师三个多团。这次战役，从5月16—30日，15天中，红军横扫700里，五战五捷，共歼灭敌人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

【第三次反“围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南部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的战役。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仅隔1个月，又调集30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并聘请德、日、英军事顾问，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兵分三路于1931年7月1日开始对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当时，红一方面军只有3万人左右，且刚经过第二次反“围剿”的苦战，大多分散于闽西各地，尚未来得及休整补充。面对优势的敌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采取了毛泽东提出的“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胜追歼”的作战方针，以一部分兵力结合地方武装迟滞敌军前进，主力则由闽西绕道千里，于7月下旬集中于赣南的兴国，诱敌深入，随后，又

以红三十五军和红十二军三十五师，佯装主力，将敌主力7个师引向兴国以西和西北地区。红军主力则于8月4日夜从兴国插进敌后，6日在莲塘歼敌第四十七师一部；7日在良村歼敌第五十四师大部；11日在宁都县北的黄陂歼敌第八师四个团。6天之内，红军三战三捷，缴枪逾万。国民党军主力扑向黄陂，欲寻红军主力作战。8月16日夜，红军声东击西，以一部分红军将敌人引向东北，主力则由东向西，从敌军的间隙中再次返回兴国休整。待敌人发觉后再向西进时，红军主力已休整半月，而敌人被拖得饥疲沮丧，只得退却。红军乘敌人退却之机又乘胜追击，于9月7日在老营盘歼灭第九师一个旅；9月15日，在方石峪歼灭敌人一个师。至此，国民党军全线撤退。这次战役，红军共歼敌3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这次反“围剿”的胜利，使得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拥有20余县的大块革命根据地。

【第四次反“围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南部粉碎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的战役。蒋介石三次“围剿”失败后，经过长时间准备，于1933年2月纠集50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其中中路军12个师，由陈诚率领，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分三个纵队向广昌进攻。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法，以一部兵力将敌第二、三两个纵队引向黎川方向，主力则转至敌之右翼，集中于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吴村等地隐蔽待机。2月26日，敌第一纵队3个师分别由乐安、宜黄向广昌逼进。红军先以地方武装不断袭扰和迷惑敌人，当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进至黄陂、大龙坪地区时，红军于27日拂晓突

发猛攻，经过两天激战，将敌人全部歼灭。国民党军遭此打击，改取“中间突破”的方针，于3月15日以6个师分成两个梯队由宜黄地区出发，经东陂、甘竹直扑广昌，寻求红军主力作战。红军放过敌军先头部队4个师，于21日晨向进至草龙岗、东陂地区的敌军殿后的两个师发起攻击。激战一日，歼敌第十一师大部和第九师一部，余敌仓皇撤退。在陈诚的中路军向根据地中心区域进攻期间，敌左、右两路军仅在各驻区进行所谓“清剿”，就草草收场。1933年3月底，红军基本上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歼敌2万余人，缴枪1.5万余支。

【第五次反“围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反击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战役。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邻近的湘赣、闽浙赣等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吸取以往“围剿”失败的教训，采取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企图把红军严密地封锁包围起来，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消灭红军。当时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主力有8万余人，地方红军和赤卫队也有很大的发展。如果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能正确地估计形势，灵活运用历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国民党军的这次“围剿”是有可能的。但是，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已在党和红军中取得了领导地位，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人博古和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等全面否定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错误地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反“围剿”一开始，红军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采取“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的冒险主

义进攻战略，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寸土”等错误口号。到11月中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没有能打败敌军，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1934年初，红军与国民党军在建宁、泰宁等地相持数月，终未能胜。3月，敌主力向广昌推进，红军虽杀伤敌三四千人，自己也遭受很大损失。4月广昌失守。7月，国民党军分兵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突进。在敌人处于优势情况下，“左”倾冒险主义又转为保守主义，博古、李德命令红军“兵分六路”、“全线防御”。结果红军处处设防，节节防御，完全陷于被动之中。在反“围剿”中，毛泽东曾多次提出以红军主力突进到苏浙皖赣地区或湖南中部以打破敌人“围剿”的正确建议，但“左”倾错误领导人拒不接受。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兴国、宁都、石城相继失守。从10月10日晚开始，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共8万余人，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第五次反“围剿”遂告失败。

【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1934—1937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的部队在南方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等8省坚持的武装斗争。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中共中央随即在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梁柏台为正、副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继续领导留在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在项英、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组成的中共中央分局的领导下，依靠群众，采取公开和隐蔽、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斗争策略，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在与中共中央长期失去联系处于被敌人分割包围的形势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不断地取得了反“清

剿”斗争的胜利。在国民党残酷的“清剿”中，许多共产党人如贺昌、阮啸仙、何叔衡、刘伯坚、毛泽覃、古柏、瞿秋白等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3年游击战争，保持了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旗帜，坚持了8省内14个游击区，牵制和消灭了敌人大量军队，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

【四渡赤水】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为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争取战略主动的作战行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准备北渡长江与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29日，红军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准备在四川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此时蒋介石急调重兵到云贵川3省交界地区进行围堵，并在长江沿岸构筑严密的封锁线。于是红军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乘贵州北部敌人比较空虚，挥戈东向，于2月18日、19日分批二渡赤水河，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城，并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此时，蒋介石又急调嫡系2个师从乌江南岸驰援遵义。红军在遵义地区又歼敌20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3月中旬，红军三渡赤水，再至川南。蒋介石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在川、黔、湘三省边界重重设防。当各路敌军汇集时，红军突然折返贵州，于3月下旬四渡赤水。接着南渡乌江，作出进逼贵阳的姿态，迫使蒋介石调动滇军援黔，红军却乘虚直入云南，于5月上旬在皎平渡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掌握了长征的战略主动权。

【直罗镇战役】中国工农红军在陕西郿县（今富县）直罗镇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围剿”的战斗。1935年10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抵达陕北根据地吴起镇，与陕北红十五军团胜

利会师。11月，国民党军以5个师的兵力，发动了“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争。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紧急部署：以红一军团隐蔽于直罗镇以北的石咀、凤凰头地区；以红十五军团隐蔽于直罗镇东南的东村地区；以一个连兵力在直罗镇诱敌来攻。11月19日，国民党第五十七军主力3个师沿葫芦河向直罗镇进发。20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第一〇九师进占直罗镇，红军当夜包围该师。21日拂晓，发起总攻，经一天激战歼敌大部。此役，共歼国民党军一个师又一团，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绥远抗战】1936年中国军队在绥远地区抗击日伪军进攻的战役。1936年1月，蒙古族上层反动分子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在日本关东军扶植下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5月，又成立傀儡政权蒙古军政府。11月中旬，在日本指挥官直接督战下，伪蒙古军万余骑兵，大举侵犯绥远东北地区，企图攻占绥远，进占甘肃、宁夏，扩大伪蒙领地。11月14日，国民党绥远驻军傅作义部，奋起抵抗，11月17日，将伪军击溃，并乘胜反击。11月24日，收复百灵庙。12月3日，日伪军向百灵庙反击，又被击溃。绥远军乘胜前进，歼灭伪蒙军第七师2000余人，收复锡拉木伦庙。绥远抗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各地掀起援绥热潮。

【抗日战争】1937年7月开始至1945年8月结束的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它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有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中国

东北后,中国人民就开始了武装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前,中国未能形成全国性的民族战争。“七七”之后,全国全面抗战开始。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电,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15日,中共中央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17日,周恩来等在庐山与蒋介石会谈。同日,蒋介石发表准备抗战的谈话。8月13日,日军又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坚决抵抗。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声明书。22—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同时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开赴华北、华中抗日前线。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广播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主张,对于促成全国抗战起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有两个战场,中共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开辟了敌后战场,在极端艰苦条件下,进行斗争,抗击了大量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争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强大力量。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承担的正面作战战场,初期先后进行了上海抗战以及太原、徐州、武汉保卫战。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以主要军事力量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1938年底,汪精卫等公开投降日本,后在南京建立傀儡政权。中共以抗日为最高利益,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3次反共高潮,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略防御阶段,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武汉、广

州失守；第二阶段是战略相持阶段，从1938年11月至1943年12月；第三阶段是战略反攻阶段，从1944年1月解放区战场局部反攻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中，毙、伤、俘及投诚日军527422人，伪军1186695人。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9月3日是抗日战争胜利日。

【淞沪会战】1937年8月13日，日本在上海发动军事进攻，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3个月之久的大会战。8月13日晨，日军突然对上海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14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8月14—22日，中国陆军和空军，对杨树浦以西至虹口敌司令部间的日军发动反攻，一度攻入虹口日军阵地，并打进汇山码头，但未能包围歼灭敌人。23日，约3个师团的日军由张华滨、川沙登陆，向浏河、罗店、宝山进犯，战事中心移到罗店至月浦一线。中国军队在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副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统一指挥下，分3方面御敌，浦东方面由张发奎指挥，淞沪近郊由张治中指挥，江防由陈诚指挥。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战。31日，日海空军猛攻吴淞后，步兵登陆，然后分兵进攻宝山和闸北。中国军队第十八军五十三团三营营长姚子青率部坚守宝山城，浴血奋战，500余官兵全部殉国。9月10日以后，日军增兵至10万余人。21日，第三战区改组，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将淞沪作战部队编为左中右3个集团，张发奎为右翼军总司令，朱绍良为中央军总司令，陈诚为左翼军总司令，各自指挥2个集团军，总兵力达40余万人。30日，日军发动全线攻击，突破中国军队阵地，中国军队向蕴浜南岸转移。10月7日起，日军向蕴浜南岸猛攻，中国军队苦战10余天，

25日大场失守，退守苏州河南岸。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率800官兵，驻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掩护部队撤退，孤军奋战4昼夜后，才奉命退入租界。10月底，日军从华北抽调3个多师团，从国内调来1个多师团，连同原在上海的部队共9个师团，编组了华中派遣军，取代上海派遣军作战。11月5日，日军3个师团从杭州湾北岸登陆。中国军队腹背受敌，被迫全线撤退。12日，上海失陷，淞沪会战结束。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奋勇苦战3个月，歼敌6万余，沉重打击了日军，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梦想。中国军队也受到重大损失。上海失陷对整个战局产生了不利影响。

【平型关战斗】八路军在抗战初期对日军的一次英勇而胜利的战斗。平型关位于山西繁峙县，北是恒山，南为五台山，地势极为险要，是晋北的交通要道。1937年8月，日军分兵两路南下，一路占领大同后直逼雁门关，一路由蔚县、广灵等地向前推进，企图夺取平型关，以进攻忻口。9月下旬，八路军一一五师东渡黄河到达平型关附近，在侦察到敌人的战略意图和行军路线后，决定利用险要地形，出敌不意，打一场伏击围歼战。日军进攻平型关的是其精锐部队板垣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约1000多人，前面是100多辆汽车，中间是200余辆大车，后边是少数骑兵。9月25日晨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先于24日夜冒雨埋伏的一一五师向敌人发起了总攻。经过一天激战，歼灭日军1000多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大车200余辆，缴获九二式步兵炮1门，机枪20余挺，步枪千余支以及战马和大量军用物资。平型关大捷是中国全面抗战以来第一次大胜利，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鼓舞了全国军民

的抗日斗志，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也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

【太原会战】中国军队为保卫太原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1937年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后，即向太原进攻。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给进犯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取得了平型关战斗的胜利。10月初，日军攻陷崞县、原平后，集中五六万兵力、大批飞机、坦克和大炮，于13日向忻口发动进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6个集团军，共约28万人，激战半月之久，歼敌约2万人，中国军队也伤亡重大，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骥等壮烈殉国。正当忻口会战处于相持状态时，为策应晋北日军夺取太原，河北日军的3个师团于10月下旬攻陷娘子关，接着沿正太线西进，先后占领了阳泉、寿阳、榆次等地，直逼太原。11月1日，防守忻口的中国军队全线撤退。原拟退至太原以北阵地，继续保卫太原，但在日军追击下，未进入阵地即渡汾河西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率第三十五军在太原与敌苦战3天后突围。8日，太原失陷。这次会战虽然中国方面失利，但是中国守军英勇抵抗，消灭日军2万余人，破坏了日军的河北平原会战，使平汉线中国军队得以南撤。太原失守以后，在华北战场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

【徐州会战】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路展开的一场会战。日军占领南京后，为打通津浦路，连结南北战场，并进而切断陇海路，威胁平汉路，进窥武汉，决定进行以夺取徐州为主要目标的作战。中国军事当局采取利用优势兵力进行运动战，各个击破分进运动之敌的作战方

针，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驻徐州指挥。1938年3月日军一部进犯临沂，协助津浦路北段正面进攻的日军夺取徐州。14—18日，临沂我军与敌激战，歼敌一部，残敌退却。津浦路日军于14日向滕县进攻，守军与敌激战，伤亡惨重，第一二三师师长王铭章等牺牲，18日滕县失守，日军直逼台儿庄。台儿庄战后，日军继续集中兵力进攻徐州，调华北方面军的4个师团攻击徐州附近的中国军队，调华中派遣军的两个师团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5月中旬，日军从南北两方形成了对徐州的包围。由于双方装备对比悬殊及作战条件不利，为保存实力，蒋介石下令作战部队突围撤退。19日徐州失陷。徐州会战历时5个多月，是抗战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次会战。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付出了重大代价，为部署下一阶段的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

【台儿庄战役】又称鲁南会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保卫徐州的一次外围战役。1938年3月，日军矶谷师团主力沿津浦线南进，企图占领台儿庄，进而迂回攻打徐州。国民党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按预定的计划在台儿庄附近集中了约35万人的优势兵力，准备阻击歼灭敌人。从3月23日起，中日双方军队在台儿庄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中国军队英勇抗击，至死不退。日军未能全部占领台儿庄，为国民党的外线完成对日军之反包围争取了时间。4月初，国民党军队在切断敌人退路后，即向台儿庄的矶谷师团发动攻击，并击退了由临沂增援之板垣师团。4月7日，日军被迫突围；中国军队乘胜追歼。共歼敌11984人，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台儿庄战役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次著名战役，是中国军队在抗战初期正面战场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在军事上，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武汉会战】中国军队在华中保卫武汉抗击日军的一次战役。当时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军事委员会迁至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了中国的军事、政治与经济中心。在徐州会战时，日军即决定以“速战速决”的方针攻占武汉，击破中国军队在华中的主力，逼迫中国政府屈服。1938年6月中旬，日军开始进攻武汉的准备作战，先后攻占安庆、潜山和马当要塞。7月，又攻陷湖口、九江，取得了从江南进攻武汉的据点。此后，即开始进行攻占武汉的外围战。在江南战场，敌占九江后，即分兵向南浔铁路和瑞武公路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抗击，自8月至10月下旬，先后在庐山两侧及南浔路、瑞昌、德安等处与敌激战。10月28日德安失陷。进攻南浔路之敌受挫后，于9月增调两个师团，在海、空军配合下沿长江西犯。先后攻占阳新、大冶、黄石、鄂城等地，进逼武昌。在江北战场，7月下旬，日军相继攻陷黄梅、宿松和田家镇，并继续西犯，进抵黄陂，威胁武汉侧背。江北的另一路日军于9月攻占了固始、商城、罗山等地。10月再陷信阳、麻城。这时武汉已陷于日军三面包围之中。10月24日，蒋介石下令部队撤退。25—27日，汉口、武昌、汉阳相继失陷。武汉会战历时4个多月，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的一次会战。

【三次长沙会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湖南长沙地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三次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在1939年9月中旬至10月上旬。1939年3月日军占领南昌后，调集10万余兵力从湘北、赣北、鄂南三个方向会攻长沙。第九战区以16个军20万人的兵力，利用山岳江河组织防御。9月14日，日军两个师团自赣北发动进

攻，在遭到猛烈反击后退回至原阵地。鄂南日军由通城南犯，也被击退。18日，日军向新墙河北岸中国守军阵地发动攻击，经5昼夜激战突破中国守军阵地，强渡新墙河，推进到汨罗江一线。26日，强渡汨罗江。29日，主力进抵长沙外围。10月2日，中国守军发起反击。日军遭到打击后，加之粮弹告罄，于10月3日北撤，中国军队跟踪追击，至10月6日恢复原有阵地。第二次长沙会战为1941年9月上旬至10月上旬。1941年9月，日军为消灭长沙一线的国民党政府军主力，调集4个多师团及海空军共12万余人，再次进攻长沙。驻守长沙地区的中国军队有14个军30余万人，利用湘北有利地形，逐次防御。9月7日，日军攻击大云山中国守军，双方在大云山西南麓港口地区展开激战。18日，日军主力强渡新墙河，中国守军坚守工事顽强抵抗。日军用飞机大炮猛轰守军阵地，并发射毒气弹，突破中国守军阵地。20日，突破汨罗江防线，强渡汨罗江。26日，渡过捞刀河。28日进入长沙。国民党政府军6个军在长沙东南地区进行反击，洪源洞地区中国守军南渡汨罗江，南北夹击日军。10月1日，日军突围北撤，10月8日全部撤往新墙河以北地区，双方恢复原有阵地。此役日军伤亡3万人左右，中国军队损失约10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为1941年12月下旬至1942年1月中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配合其在华南及东南亚地区的进攻，牵制中国军队南下增援英军在港九及缅北的作战，发动了第三次长沙战役。1941年12月，日军以3个师团1个旅团约7万余人，配以海、空军及炮兵、战车部队，分两路进攻长沙。另以1个师团在南浔路进行牵制作战。第九战区以14个军在湘北、赣北组织防御。12月24日，日军分八路强渡新墙河。28日，突破汨罗江防线。中国守军以一部兵力节节抵抗，主力向金井以东及铁路以西地区迂回。31日，日本进至捞刀河、浏

阳河，从三面包围长沙。1942年元旦，日军两个师团对长沙发起猛攻。守军第十军奋勇抵抗，阵地失而复得。葛先才团坚守阵地，最后仅存58人。4日，中国守军以9个军的兵力对日军反包围，发起全线反击。日军向东、北方向败退，15日撤至新墙河以北地区，长沙会战以中国军队的胜利而结束。

【黄土岭战斗】又称黄土岭包围战。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首次击毙日军中将的一次战斗。1939年下半年，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大扫荡，结果11月初的雁宿岩战斗600余人被歼。11月4日，坐镇张家口的日本“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军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亲自率领其全部兵力1000余人，出动数百辆卡车，向晋察冀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命令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指挥所部4个团、1个炮兵营和一二师特务团在黄土岭、司各庄一带隐蔽。11月6日，日军向东全部进入伏击圈内。次日拂晓，敌继续东进，下午3时全部离开黄土岭。这时，八路军两个团拦头杀出，另两个团和特务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过来，将敌包围，压缩在山沟里。战斗至8日下午，歼敌900余人，击毙日军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

【黄桥战役】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江苏泰兴以东黄桥附近粉碎国民党军进攻的一次自卫反击战。因此役对新四军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抗战的新局面具有决定意义，故又称“黄桥决战”。1939年11月，新四军陈毅部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奉命率部由苏南过江，挺进苏北。苏北在反共顽固派、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统治之下，其主力是国民党李守维的第八十九军和翁达的独立第六旅，另辖保安旅、团等，总兵力8万余人，

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李明扬、李长江的“苏鲁皖边游击总队”和陈太远的税警总团，是深受韩德勤排挤和歧视的中间势力。新四军陈毅部在苏北采取联李反韩的策略，争取了李明扬、李长江的中立。1940年7月29日，新四军解放了黄桥，歼灭韩德勤顽军2000余人。9月3日，韩德勤将部队分为右路军、左路军，向黄桥进攻。右路军的李、陈部在新四军争取下态度犹豫，进展缓慢。左路军则大胆冒进。9月6日，左路军在营溪遭到新四军打击，溃败。9月13日，新四军攻克姜堰，歼灭顽军千余人。为进一步争取中间势力，9月30日，新四军主动撤出姜堰，让李明扬、李长江接防。10月3日，韩德勤顽军分兵数路，扑向黄桥。10月4日，黄桥决战正式开始。新四军以黄桥为轴心，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在数千民兵和人民群众支持下，英勇作战，先于4日下午全歼翁旅，又于6日全歼顽军第八十九军。其他各保安旅团争先撤退。新四军乘胜追歼，占领海安。此役，新四军共歼灭顽军主力12个团，保安第十旅全部，保安第三、五旅各1个团，共计1.1万余人。10月10日，新四军苏北挺进纵队与南下的八路军五纵队会师。至此，苏北的盐城、阜宁均被新四军控制，开辟了苏北根据地，发展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百团大战】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向日本侵略军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战役。1940年8月，为了粉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打破其“囚笼政策”，并影响全国战局，克服投降危险，争取全国抗战形势好转，八路军总部决定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的破袭战。参战兵力达105个团，约40万人，由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直接指挥。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中心任务是进行交通总破袭战，破坏

和切断华北日军交通线，以正太路为重点。八路军占领了娘子关，攻入并破坏了井陘煤矿，使正太路陷于瘫痪，切断了同蒲路北段和忻县至静乐、汾阳至离石等公路。同时，对平汉、津蒲、德石、平绥、北宁、白晋各铁路线及重要公路交通线进行了破袭战。第二阶段，9月22日至10月上旬。中心任务是扩大上一阶段战果，重点进攻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根据地的日军据点。八路军进攻了涞源、灵丘、榆社、辽县等据点，再度切断同蒲路北段。华北各铁路线的日军均遭到八路军的进攻。第三阶段，10月6日至12月5日。从10月5日起，日军调集数万兵力对晋东南、晋察冀、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报复“扫荡”，八路军各部转入反“扫荡”作战。12月5日，战役基本结束。在历时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2.58万人，俘日伪军1.86万人，攻克日军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桥梁、车站、隧道等260余处，煤矿五座。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军，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但此役使用了华北八路军几乎全部兵力，过早地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导致后来日军对华北解放区实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

【中条山战役】又称晋南战役、晋南会战。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与日军进行的一次战役。中条山区位于山西南部，横亘黄河北岸，为军事要地。日本侵略者为急于结束侵华战争的胶着状态，于1941年5月调集6个师团和3个旅团共10余万兵力及172架飞机，向晋南中条山地区发起进攻。中国守军第一战区卫立煌部为确保晋南战略要地，以主力7个军的兵力配置于长约170公里，纵深50公里的中条山区内，以阻止日军进攻。5月7日，日

军分多路进攻中条山地区。集结于豫北道清路西段沁阳、博爱的日军分两个方向向孟县、济源猛攻，并以飞机轰炸。中国守军第九军伤亡较重，先后放弃孟、济两地及封门口阵地。11日以后，第九军主力渡河南撤，余部留在原地开展山地游击战。晋南阳城方面的日军于7日起向中国守军第八十九军发起攻击，守军抵抗5天，日军伤亡较大。13日，增援日军到后，董封失陷。晋南绛县、横岭及闻喜、夏县等地的中国守军经顽强抵抗，给敌人一定杀伤后，也先后败退。5月中旬，卫立煌电令各军，以一部留置中条山内继续抵抗，主力突出包围，转向日军背后攻击。至27日，会战结束。

【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入缅作战】1942年3月12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入缅甸与日军作战，拉开了中国军队与盟军联合在境外与日军作战的战幕。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方面早在1941年已组建了赴缅抗日的远征军，但在英军的阻挠下久不能入缅作战。直到仰光陷落英军企图借中国军队来掩护他们撤退才催促中国军队入缅。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由罗卓英出任，杜聿明任副司令长官，辖第五、第六、第六十六3个军9个师共10万余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军中将史迪威任总指挥。但由于英军的错误作战方针，使中国远征军从一开始入缅就潜伏下失败的危机。3—4月，中国远征军多次与日军作战，重创了日军的主力，解救了被围的英军。但在4月下旬的战斗中，由于英军的不配合，中国远征军的指挥人员之间发生分歧，使中国远征军遗失战机，遭到日军主力部队的合围和攻击，损失惨重。4月30日中国远征军分两路撤退。一路退往印度，大部分要穿过浓密的原始森林退往云南。撤退途中由于给养困难、道路险恶、疾病流传使中国远征

军第一路伤亡过半。6月29日，蒋介石下命撤消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至此中国远征军第一路遂告解体。

【浙赣战役】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同日军进行的一次战役。1942年4月，美国飞机从航空母舰起飞，首次轰炸日本本土，之后降落在中国境内。日本侵略军为破坏盟军利用浙江、江西境内的机场轰炸日本本土，遂决定组织浙赣战役，企图夺取或摧毁浙、赣境内的机场，并打通浙赣铁路。侵华日军共使用了53个步兵大队，两个飞行中队共约14万兵力。中国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指挥第三战区部队及第九战区一部分部队共4个集团军、14个军、41个师的兵力参加防御作战。5月15日，浙东日军以4个师团的兵力分三路从杭州向金华等地进犯。25日金华沦陷。6月底，日军又先后攻占了衢州、玉山、上饶、丽水。5月底起，赣东日军以两个师团为主力从南昌向东进攻，先后攻占鹰潭、鄱阳、临川。7月1日，两路日军在横峰会合，打通了浙赣线。为切断浙江的海上通道，7月11日日军又攻占温州。由于太平洋战场和敌后战场需要兵力，7月下旬，日本大本营命令日军停止进攻，除控制金华等14个城市外，彻底破坏机场，抢运物资后撤回原防。中国军队乘日军撤退之时进行反攻，至8月下旬，收复了部分地区。

【冀中五一大扫荡】1942年日本侵略军对冀中根据地进行一次大“扫荡”。1942年5月1日，日本华北方面军为实现其“确保华北、先保平原”、彻底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企图，调集了日伪军5万余人，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由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大扫荡”，实施所谓“剿灭”作战。日军采用所谓“纵横张网，对角清剿，反复合击”的战法和“三光”政

策，将冀中抗日根据地分割成 2670 个小块，建立 1635 个据点和碉堡，修公路 6182 里，挖封锁沟 3538 里，使整个冀中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格子网”。在“扫荡”中，日军血洗了 8000 个村庄，杀害数万冀中群众。冀中军民展开了英勇的反“扫荡”斗争。经过 2 个月的艰苦作战，冀中八路军共作战 272 次，毙伤日伪军 1.1 万余人。但八路军也遭受到严重损失，部队减员 1.6 万余人，主力部队被迫转移至山区。1943 年根据地逐渐得到恢复。

【豫湘桂战役】1944 年发生在中国中南地区的中日会战。1944 年初日本为确保运输线安全，摧毁美国空军基地，决定发动代号为“一号作战”的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争，中国方面称为“豫湘桂战役”。日本大本营于 1944 年 1 月 24 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作战命令，随即进行部队集结和作战物资的准备。战役由豫中会战、长衡会战和桂柳会战三阶段组成。从 1944 年 4 月 17 日至 5 月 25 日日本首先发动豫中会战（河南会战）。4 月 17 日，日军从中牟渡过黄泛区向河南进攻。22 日攻陷郑州。5 月 1 日占领许昌。25 日占领洛阳。在 38 天内，以汤恩伯集团为主的 40 余万国民党军队在日军五六万人的进攻之下，大部一触即溃，丢失城市 38 座，损失兵力 20 多万。5 月 27 日至 8 月 8 日，日军以 14 个师团 36 万余人发动长衡会战（湖南会战）。守军薛岳、张发奎、余汉谋部近 40 万人亦消极避战。5 月 27 日，日军从岳阳出发，分三路向长沙进攻。6 月 19 日，长沙守军弃城逃走，长沙沦陷。接着株洲、湘潭失守。26 日，日军占领衡阳机场，次日对衡阳发动攻击。衡阳守军顽强抵抗，打退了日军两次进攻，并予敌重大杀伤。8 月 8 日，指挥官第 10 军军长方先觉投降，衡阳失陷。从 9 月 8 日到 12 月 10 日，日军投入兵力 10 余万人，从广东、湖南、越南三路夹攻广西，发

动桂柳会战（广西会战）。11月11日，桂林、柳州同时陷落。24日南宁国民党守军弃城逃跑，日军不战而占南宁。其后，日军以少数兵力沿黔桂公路追击中国逃军，其先头部队两股约600余人，在数十万国民党军队中横冲直闯，12月2日，占领贵州独山，距贵阳仅120公里，重庆震动。10日，从南宁出发的日军与从越南北进的日军在绥淦会师，日本完成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任务，战役结束。

【解放战争】即全国解放战争，又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指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建国的迫切愿望，同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进行谈判，力求避免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和社会改革。1945年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召开了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社会贤达的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改组、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制度和内战政策。但是国民党在完成其军事部署后，于6月26日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从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先锋和主体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广大人民群众反美、反蒋的人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逐步高涨，形成了反对蒋介石统治的第二条战线，蒋介石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到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在一年的作战中，歼灭国民党军112万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主力

打到外线，在国统区作战，迅速改变了双方力量对比。10月10日，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与此同时，在解放区彻底进行土地改革，并开展了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到1948年8月，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从1948年9月12日起至1949年1月31日止，人民解放军先后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国民党军154万余人，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地区。1949年3月，召开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着重研究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夺取全国胜利以及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基本政策。4月15日，经半个月的国共谈判，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中共代表团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于20日前答复，最后遭到拒绝。21日，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一举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23日，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22年统治的覆灭。渡江战役结束、战略追击在全国范围展开后，人民解放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到1949年底，基本上解放了中国大陆。从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807万人，从根本上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对中国的统治。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阵亡26万人，负伤104万人，失踪和被俘20万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上党战役】解放战争初期，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在山西长治（古称上党郡）地区粉碎国民党军犯的战役。1945年8月中下旬，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奉蒋介石的命令，调集十九军军长史泽波部1.7万余人，向长治地区进犯。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

伯承、政委邓小平遵照中央军委“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和关于彻底消灭进犯之敌的指示，集中部队 3.1 万人，于 9 月 10 日发起上党战役。9 月 12 日攻克屯留，随后，相继攻克潞城、长子、壶关，使长治守敌陷于孤立。从 9 月 20 日起，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从东、西、南三面合围长治。阎锡山急调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领 3 个军 8 个师 2.3 万人，从太原出发南下，紧急增援长治守军。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以一部兵力继续围困并佯攻长治，主力则秘密北上迎歼援敌。10 月 2 日将援敌合围于屯留西北地区，经 4 昼夜激战，国民党军除 2000 人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长治守军于 10 月 8 日向西突围，10 月 12 日被歼于沁河以东。至此上党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灭国民军 3.5 万人，击毙彭毓斌，生俘史泽波等 10 余名师长以上将领，有力地配合了重庆谈判。

【邯郸战役】又称平汉战役。1945 年 10 月，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 3 个军约 4 万人，从河南新乡出发，沿平汉路北上，并以第三十二军和孙殿英部随后跟进，企图占领邯郸，打通平汉路，抢先进入平津，进而夺取东北。晋冀鲁豫军区集中 3 个纵队及地方武装共约 6 万人，在 10 万民兵的支援下，于 10 月 24 日将北犯之国民党军诱至漳河以北、邯郸以南马头镇，尔后突然出击，将敌包围。以一部兵力正面阻击，一部兵力控制漳河渡口，切断敌后续部队北上道路。10 月 28 日黄昏，发起总攻，激战至 30 日，歼敌一部，争取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 8 军军长高树勋率部万余人起义。随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将主力先敌移至漳河以北地区。10 月 31 日，当国民党军主力向南突围逃至该地区时，遭到预伏部队猛烈攻击，激战至 11

月2日，将敌军大部歼灭。俘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以下2.3万余人。此役，共歼敌3万余人（其中包括1万余人起义），对阻止、迟滞、挫败国民党军北犯，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掩护人民军队在东北地区实施战略展开起到重要作用。

【中原突围】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以8个整编师又2个旅22万人，于6月26日，向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发起猛烈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中原突围，愈快愈好”、“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于26日黄昏，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皮定均率领一个旅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后，向东突围；向西突围的右路由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率领，7月下旬到达豫西、陕南、鄂西北地区，创建了鄂豫陕边根据地。左路由王树声率领，8月，进入武当山地区，创建了鄂西根据地。向东突围的皮定均旅，于7月下旬到达苏皖解放区。此役，共歼敌5000余人，胜利地实现了战略转移，牵制了国民党的大量兵力。

【苏中战役】又称七战七捷。国民党军于1946年7月中旬，集中正规军50万人，向华东解放区的苏中、淮北、淮南、鲁南、胶济线等地区发动进攻。其中进攻苏中解放区的兵力为5个整编师15个旅约12万人。华中野战军集中主力19个团3万余人，在粟裕、谭震林指挥下，奋起迎击。整个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7月13日至8月3日为第一阶段。华中野战军连续进行了宣（家堡）泰（兴）战斗，如（皋）南（通）战斗，海安运动防御战。8月3日，主动撤出海安，进行短期休整。8月10—31日为第二阶段。华中

野战军连续进行了李堡战斗，丁堰、林梓战斗，如（皋）黄（桥）公路遭遇战，邵伯防御战。至此，苏中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历时45天，歼敌6个旅，5个交通警察大队共5.3万人。取得了在内线歼灭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的初步经验。

【定陶战役】1946年8月下旬，国民党军调集14个整编师、32个旅共30万人，由郑州、徐州分东西两路进攻冀鲁豫解放区。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集中4个纵队主力，首先打击由郑州方向进犯的整编第三师，另以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牵制其余各路进犯敌军。于9月3—6日，将整三师全歼于定陶以西地区，俘敌师长赵锡田。9月7—8日，野战军又集中主力于定陶、考城（今河南兰考 阳）地区，对敌整编四十七师侧背猛烈袭击，经1天激战，全歼该师。此役，共歼敌4个旅1.7万人。中共中央军委将定陶战役作为解放战争初期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作战原则的范例，向全军作了推广。

【宿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江苏宿迁北部粉碎国民党军进犯的战役。1946年12月中旬，国民党军集中25个半旅的兵力，由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任总指挥，从东台、淮阴、宿迁和峰县分4路同时向苏北、鲁南解放区发起进攻，企图把华东、华中人民解放军部分主力逼到陇海路以北。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司令部首长决定，首先以24个团的兵力围歼由宿迁出犯之敌，12月15日，发起宿北战役，野战军各路部队发起全线攻击，战至19日，全歼敌69师师部和3个半旅。与此同时，位于盐城、涟水以北和峰县以东地区的野战部队，顽强地抗击了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保证了宿北战役的胜利进行。此役，共歼敌2.1万人，敌69师师长戴

之奇自杀，副师长饶少伟被俘，开创了全面内战爆发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次歼敌 3 个整旅的范例。

【临江战役】又称“三下江南，四保临江”。1946 年 12 月，国民党军占领了安东（今丹东）、通化等地后，为贯彻其“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方针，集中 6 个师的兵力，于 12 月 17 日进攻南满解放区的临江地区，同时加强了对松花江南岸各要点的守备，以阻止松花江北的东北民主联军南下。东北民主联军针对国民党军的部署，制定了“坚持南满，配合北满，南拉北打，北拉南打”。南北满密切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主动打击敌人，协同作战，以迫使敌人南北两方面作战。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从 1946 年 12 月 18 日至 1947 年 4 月 3 日，在临江、通化地区迎击进犯之敌，连续击退国民党军的 4 次进攻，进行了四保临江的战斗，歼敌 1.9 万余人，收复桓仁、辑安（今集安）等 5 座县城；与此同时，在北满地区的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 3 个纵队又 3 个独立师，从 1947 年 1 月 5 日至 3 月 8 日，3 次向松花江南岸出击，歼敌 1.5 万余人。这就是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之战。此役，历时 3 个多月，共歼敌 4 万人（含东西满的配合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先南后北”，进而占领全东北的作战计划。

【莱芜战役】1947 年 1 月下旬，国民党军集中 23 个整编师共 31 万余人，采取以临沂、蒙阴为目标，南北对进夹击的部署，企图消灭华东野战军主力。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谭震林指挥下，采取“避敌锋芒”，“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方针，决定放弃临沂，以两个纵队在临沂附近阻击南线之敌；另以地方武装伪装主力，进逼兖州，并在兖州以西运河上架桥，造成假象，

迷惑敌人；而以主力 5 个纵队兼程隐蔽北进，以 2 个纵队向莱芜地区开进，求歼李仙洲集团。蒋介石错误地断定华东野战军将向西转移，严令北线军队迅速南下，实施南北夹击。华东野战军于 2 月 18 日到达莱芜地区，20 日发起全线攻击，至 23 日，国民党军李仙洲集团大部被歼于莱芜，李本人被俘。此役共歼敌 1 个绥靖区前进指挥所、2 个军部、7 个师共 5.6 万人，收复城市 13 座，使渤海、鲁中、胶东解放区连成一片。

【孟良崮战役】1947 年 3 月，国民党军集中 24 个整编师 60 个旅约 45 万人，在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下，向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其主力向鲁中山区发动进攻，企图压迫华东野战军退至胶东狭窄地区。5 月上旬，华东野战军调整部署，将主力集结于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隐蔽待机。5 月 11 日，国民党军主力自汤头、蒙阴、新泰、莱芜向北、向东进攻，企图逼迫华东野战军处于不利地位决战。华东野战军决定集中主力 5 个纵队，采取中央突破战术，5 月 13 日对蒙阴以东之整编 74 师发起攻击。14 日，将敌分割包围于孟良崮山区，封闭合围口。激战至 16 日，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的整编七十四师及整编八十三师 1 个团，共 3.2 万余人。击毙七十四师中将师长张灵甫。此役，打乱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战略计划，打击了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对扭转华东战局起了重要作用。

【沙家店战役】1947 年 3—5 月，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8 月 6—12 日，围攻榆林，未克，但都达到调动敌胡宗南部主力 10 个旅北上分路增援榆林的目的。西北野战军遂主动撤围榆林，以一部伪装主力掩护后方机关东渡

黄河，主力则隐蔽集结于榆林东南、沙家店西北地区。胡宗南误认为西北野战军主力正在东渡，即令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主力5个旅由绥德北进，令整编第36师师长钟松率两个旅由榆林南下，进至镇川堡再折而向东，企图夹击西北野战军于葭县（今佳县）地区。当敌军进占绥德后，刘戡率部向葭县方向急进。钟松率36师2个旅进抵镇川堡。西北野战军主力乘敌36师孤军冒进，兵力分散之有利时机，于8月19日，将其包围在沙家店地区，激战1天，到20日黄昏，全歼敌三十六师2个旅。此役，共歼敌6000余人，扭转了西北战局，结束了敌人对陕北的重点进攻。

【挺进大别山】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一、二、三、六4个纵队13个旅共12万人，在鲁西南阳谷东南张秋镇至菏泽北面临濮集的300华里地段上，突然渡河作战，发动了鲁西南战役，歼敌9个半旅共6万人，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打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南大门，为千里跃进大别山创造了前进基地。8月7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分为西、中、东三路南进。在其后20多天中，连续突破敌人防线，越过陇海路，涉过黄泛区。8月底，进抵大别山地区，迅即组织部队，实施战略展开。这时，国民党军20多个旅，已先后渡过淮河，摆出与解放军决战架势。人民解放军采取避强击弱的战法，集中一部兵力，将敌军吸引至大别山北麓。至9月底，已解放县城23座，并在17个县建立了民主政权。到10月底，共歼敌3万余人，并把全区划分为豫东南、皖西、鄂皖、鄂东4个区，建立了33个县的民主政权。开辟了大别山根据地。

【豫东战役】又称睢杞战役或开封、睢杞战役。整个战役分两个阶

段进行。第一阶段夺取开封。开封守敌为整编第66师师部率第十三旅及河南省保安第一、第二旅等，共3万余人。1948年6月17日，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纵队突然对开封4关发起攻击，至22日晨，敌一部投降，一部突围中被歼，击毙敌整编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至此，豫东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开封之战，连同阻援作战，共歼敌4万余人。第二阶段围歼区寿年兵团。解放军攻占开封后，蒋介石命令邱清泉兵团继续向开封前进，同时以区寿年兵团由民权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企图在此地区与解放军决战。华东野战军为诱使邱、区两兵团拉开距离，以便围歼其中一部，遂主动撤出开封。邱兵团占领开封后，以主力尾追第三、第八纵队。区寿年兵团进抵睢杞地区后，徘徊不前，同邱兵团拉开40公里距离。6月27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一起向区寿年兵团发起攻击。激战至7月2日晨，全歼区兵团司令部及整编75师，生俘区寿年及整编75师师长沈澄年。至7月6日，华野为保持主动撤出战斗，豫东战役结束。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9万余人。

【石家庄战役】1947年11月解放军攻占石家庄的战役。石家庄位于石德、平汉、正太三条铁路的交会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守敌为第3军第32师及2个保安团和19个县的保警队，另有1个坦克连及6辆装甲列车。1947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晋察冀军区首长关于乘清风店战役胜利形势夺取石家庄的建议。并确定“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要方法”，采取稳打稳进的方针。晋察冀野战军第2、3、4纵队和4个独立旅，在杨得志、罗瑞卿的指挥下，于1947年11月6日拂晓，首先对石家庄外围据点发起攻击，8日黄昏，对外市沟之敌发起总攻。10日黄昏，各部队

对内市沟防线开始总攻，内外爆破同时并举。11日，各部队突入石家庄市，经激战，11月12日，解放石家庄。此役共歼敌2.4万人，俘敌第32师师长兼石家庄警备司令刘英。开创了人民解放军攻占大城市的先例，使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联成一片。

【临汾战役】1948年3月7日，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第十三纵队和地方武装共5.3万人，发起临汾攻坚战役。守敌为太原绥靖公署66师、西安绥靖公署第30旅及保安团队共2.5万人。以环城外壕和城四周的碉堡群为主阵地，环城内壕、街巷工事为核心阵地，构成大纵深的环形防御体系，固守待援。经过激烈战斗，人民解放军首先扫清了敌外围据点。攻城前，用27昼夜的时间，秘密完成两条各长110米的破城坑道。于5月17日开始攻城，攻城部队先对城垣进行坑道爆破，炸开缺口，乘烟雾突入城内，展开激烈巷战，是日深夜全歼守敌。此役共歼敌2.5万人，生俘国民党军第6集团军副司令兼晋南总指挥梁培璜，使晋南全境获得解放，吕梁、太岳两解放区连成一片。

【襄樊战役】1948年6月下旬，华东野战军正在豫东作战，驻南阳、驻马店、汝南等地的国民党军北援豫东后，汉水流域中段的襄阳、樊城、谷城、老河口等地，仅有国民党军第15绥靖区3个旅和保安团共2万人防守，势孤力薄。中原野战军决心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开辟汉水两岸地区。以第六纵队和桐柏、陕南军区主力共14个团3万余人，在江汉军区部队配合下，发起襄樊战役。1948年7月2日，解放军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术，首先对老河口、谷城之敌一六三旅发起攻击。战至7月3日，敌大部被歼。6日，包围樊城。

7日，解放军开始向襄阳外围之敌发起攻击。战至10日，扫清襄阳外围大部分据点。樊城守敌一四旅惧怕被歼，撤至襄阳。7月15日夜，解放军向襄阳发起总攻，战至16日，攻克襄阳，活捉第15绥靖区司令康泽。是役，共歼敌2万余人，解放了老河口、谷城、南漳、宜城、襄阳、樊城等地，进一步巩固了中原解放区。

【济南战役】1948年9月16—24日进行。1948年8月，国民党军被迫转入重点防御后，以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所部11万人守备战略要地济南。中央军委决定，华东野战军集中全力进行济南战役。华野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采取攻城、打援同时实施的部署。以约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由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指挥；以约18万人组成打援集团，由粟裕、陈士榘指挥。9月16日晚，解放军攻城部队，向济南守敌外围防线发起全线进攻。战至18日，歼敌七十三师和八十四师各一部，并以炮火控制了机场，迫使敌人停止空运。19日晚，敌整编96军军长吴化文率部3个旅约2万人起义。22日，全歼商埠守敌2万余人，占领商埠。23日，攻占外城。当夜突破内城。激战至24日黄昏，全歼内城守敌。王耀武化装逃至寿光县境，被解放区地方武装俘虏。此役，解放军以伤亡2.6万人的代价，换取了共歼敌10.4万人（内2万人起义），俘敌王耀武以下高级将领23人，攻克济南，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和战略物资的重大胜利。济南战役的胜利，是人民解放军攻克敌重兵守备坚固设防大城市的开始，使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促进了战略决战的展开，从而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决战的序幕。

【辽沈战役】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进行。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后，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果断地正确地把决战方向首先选

择在东北战场。这时，国民党在东北全区的总兵力为4个兵团、44个师，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55万人，部署在以沈阳为中心的长春、锦州3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由东北“剿总”卫立煌指挥。作战指导上，处于犹豫动摇，或撤或守，举棋不定。东北人民解放军到8月底止，有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连同各独立师约70万人，加上二线兵团和地方武装33万人，共约103万人。东北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采取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方针，以主力南下北宁线，首先攻克锦州，争取将卫立煌集团就地歼灭。辽沈战役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攻克锦州，解放长春（9月12日至10月19日）。9月12日，战役发起，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南下北宁线，先后占领昌黎、北戴河、绥中、兴城、义县以及塔山、高桥等地，截断北宁线，将范汉杰集团分割包围在锦州、葫芦岛、山海关3个地区。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对锦州发起攻击，至15日晚，占领锦州，全歼守敌10万余人，生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及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等高级将领，封闭了国民党从陆上撤回关内的通道。17日，长春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3个师2.6万人起义。19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和新7军军长李鸿率部投诚，长春和平解放。第二阶段：会战辽西，歼灭廖耀湘兵团（10月20—28日）。锦州国民党守军被歼后，10月18日，蒋介石以卫立煌指挥不力，任命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指挥廖耀湘兵团西进，主攻锦州。蒋介石严令由沈阳驰援的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和驻锦西、葫芦岛之国民党军实行东西对进，企图夺回锦州，打开向关内通路。东北野战军迅即将国民党军包围在黑山、大虎山以东、绕阳河以西、无梁殿以南、台安以北的狭小地区。激战两天一夜，全

歼廖耀湘兵团约 10 万人，活捉廖耀湘。第三阶段：攻占沈阳，解放东北全境（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 日）。廖耀湘兵团被歼后，卫立煌见大势已去，将沈阳国民党军交由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指挥，自己坐飞机南逃。东北人民解放军迅速攻占新民、辽阳、鞍山、海城等地。11 月 1 日，向沈阳守敌发起总攻，周福成投降，2 日，沈阳解放，全歼守敌 13 万余人。同日，解放营口。辽沈战役结束。辽沈战役，历时 52 天，歼敌 47 万余人，东北人民解放军伤亡 6.9 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这一胜利，使人民解放军获得了巩固的战略后方，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共双方总兵力的对比，并为解放平津和华北准备了条件。

【察绥战役】1948 年 9 月 14 日，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为策应东北野战军作战，牵制傅作义集团发起的战役。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委李井泉率部出击绥东；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罗瑞卿在通县、密云、三河地区积极活动，牵制北平周围的国民党军 10 个师。到 9 月 24 日，第三兵团在绥东连克丰镇、卓资山、兴和等地，并包围了归绥（今呼和浩特）。傅作义集团深感其后方受到威胁，急调北平、张家口地区 10 个师兵力西援。第三兵团以一部兵力继续牵制归绥国民党军，主力至丰镇、卓资山地区阻击西援的国民党军。与此同时，第二兵团连续破击南口、怀来、宣化一线铁路。第三兵团乘机于 10 月 12 日挥师转战绥西、绥北，至 10 月 23 日，先后攻占陶林、武川、和林、萨拉齐、包头等地，于 11 月 5 日，再次包围归绥城。鉴于这时辽沈战役已胜利结束，为稳住华北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地区，以便尔后就地歼灭，第三兵团遂撤围归绥，战役结束。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 2.1 万余人，解放了绥远和察北广大地区，牵制了傅作义集

团，使其不能大量抽兵增援东北。

【太原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太原的战役。1948年10月5日至1949年4月24日进行。由徐向前指挥华北野战军十八、十九、二十等部实施。战役发起后，主要是扫清太原外围据点，占领城南和东山各要点，为攻城创造条件。至11月13日，各纵队先后占领四大要点，歼敌2万余人，紧缩了对太原城的包围圈。平津战役发起前，为稳住傅作义集团，防其南逃或西撤，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缓攻太原的电令。1949年4月20日晨，总攻太原外围战斗开始，战至4月22日，各部队已直逼太原城下。至4月24日，全歼太原国民党军12.4万人，俘敌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楚、太原防守司令王靖国等人，太原遂告解放，从此结束了阎锡山在山西近40年的反动统治。

【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为徐蚌会战。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进行。是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连云港），西至商丘，北起临城（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国民党军由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共有4个兵团、3个绥靖区部队，连同后来由华中增援淮海战场的黄维兵团等，共约80万人。解放军方面，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加上地方武装共约60万人。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以刘、邓、陈为常委，邓为书记，统筹淮海前线的一切事宜。淮海战役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中间突破，歼灭黄伯韬兵团，切断徐蚌线（11月6—22日）。11月6日，战役发起，华东野战军分3路迅即挺进陇海路徐海段和徐州外围，实施中间突破，将徐

州“剿总”和徐州以东之黄伯韬兵团割裂开。8日，第三绥区所属五十七军、七十七军，共3个半师2.3万人，由何基沣、张克侠（均为中共地下党员）率领在台儿庄、贾汪地区起义。华东野战军顺利通过第3绥区防区，向徐州以东陇海线疾进，并于10日在曹八集歼敌第七兵团先头部队1个师。11日，将该兵团合围于以碾庄为中心的狭小地区，经过激战，至22日黄昏，全歼第七兵团。在此期间，中原野战军为配合华野作战，以主力直插徐蚌线，于11月15日攻占宿县，切断徐蚌之间的联系，使徐州陷于孤立。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合围杜聿明集团（11月23日至12月15日）。蒋介石为挽救危局，急令黄维、李延年、刘汝明3个兵团与徐州守军南北对进，打通徐蚌线。11月23日，黄维兵团向北猛攻，总前委决定以中野全部和华野一部围歼黄维。25日，将黄维兵团合围于双堆集地区。黄维组织部队轮番突围，均遭失败。蒋介石令杜聿明放弃徐州，南下解黄维兵团之围。30日，杜率十三兵团李弥、二兵团邱清泉、十六兵团孙元良近30万人，由徐州向西撤退。华野即以11个纵队追击。12月1日，华野一部占领徐州。12月4日，将杜聿明集团合围于陈官庄、青龙集地区。15日，全歼敌第十二兵团，生俘兵团正副司令黄维、吴绍周。第三阶段：进行战场休整，全歼杜聿明集团（1948年12月16日至1949年1月10日）。1949年1月6日，华野发起总攻击，经5天激战，至1月10日，将敌全歼。击毙邱清泉，活捉杜聿明，李弥只身逃走。此役，历时65天，歼敌55.5万人，人民解放军伤亡13.4万人。淮海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军在华东、中原战场上的主力丧失殆尽，其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地区，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矛头攻击之下。

【平津战役】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进行。国民党方面，由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指挥的4个兵团12个军，共50多万人，部署在以平津为中心的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的千里铁路线上。解放军方面：由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两大野战部队协同作战，加上地方武装共100万人。1949年1月10日，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党的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平、津、张、唐地区的作战和接管等一切工作。平津战役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分割包围，断敌逃路（1948年11月29日至12月21日）。11月29日，平津战役发起。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向平绥路东段发起进攻，包围了张家口、新保安，切断了傅作义集团西逃的通路。东北野战军主力插向平津和津塘之间，先后占领通州、廊坊、杨村、军粮城等地，切断了平津与津塘间的联系，封闭了国民党军海运南逃道路。第二阶段：打掉两头，孤立中间（1948年12月22日至1949年1月15日）。东北、华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指示，逐次围歼新保安、张家口、天津的国民党军。12月22日，华北第二兵团攻克新保安，歼敌35军两个师。23日，张家口守军5万余人突围，被华北第三兵团和东野第四纵队歼灭。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向拒绝放下武器的天津守敌发起总攻，1月15日，攻占天津，全歼守敌13万人，活捉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等人。塘沽守敌17日乘船从海上逃跑，塘沽解放。第三阶段：傅部接受改编，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1月16—31日）。中共中央为保护古都北平，力争通过谈判，实现和平接管。同时，又要求部队不放松强攻的准备。傅作义从1948年12月下旬开始，与解放军代表正式谈判。经过双方数次谈判，以及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爱国民主人士的配合工作，于1月20日达成了

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傅部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入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历时64天，人民解放军伤亡3.9万人，取得了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人的伟大胜利，实现了就地解决傅作义集团的目标，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

【渡江战役】1949年4月20日至6月2日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在战略上已失去有效的防御能力。中共中央军委于2月3日至3月20日先后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7个兵团24个军及地方部队100万人，准备于4月间发起渡江战役，歼灭汤恩伯集团。4月3日，中央军委批准了总前委制订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整个渡江战役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突破江防，解放南京（4月20—23日）。20日午夜，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迅速突破国民党军的江防。23日，第三野战军一部攻占南京。第二阶段：追歼逃敌，前出浙赣线（4月24—5月13日）。三野主力完成合围，求歼镇江、南京、芜湖之逃敌。二野前出浙赣线，迂回敌之侧背，切断汤恩伯集团和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保障三野聚歼被围之敌。先后解放苏州、杭州、金华等地，逼近武汉。第三阶段：解放武汉，占领上海，歼灭汤恩伯集团主力（5月14—6月2日）。5月14日，四野之第十二兵团两个军，从汉口以东之黄岗、蕲春地段发起强渡，于5月16日、17日相继解放武昌、汉口、汉阳。5月12日，三野发起上海战役，激战至27日，歼灭守敌汤恩伯主力大部，残部经海上逃跑，上海宣告解放，歼敌15万余人。6月2日，解放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历时4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46个师计43万人，解放军伤亡6万余人。解放了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京和上海、武汉、杭州、南昌等大城市，以及苏南、

皖南、浙江全省、闽北、赣东北、鄂东南等广大地区，为尔后解放华南、西南地区奠定了胜利基础。

【长沙和平解放】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分中、西、东三路，挥戈南下，追击逃敌，直逼湖南。7月下旬，接连解放了湖南平江、浏阳、岳阳、临澧、津市、常德、醴陵等城市，长沙处于三面包围之中。人民解放军要程潜速派代表前往平江谈判。经过双方代表先后在平江、长沙谈判，国民党长沙绥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长沙绥署副主任唐星、李默庵，兵团副司令傅正模等人，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于8月4日，率部7万人宣布起义，长沙宣告和平解放。长沙的和平解放，对促进西南、西北地区的和平解放，加速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派第七舰队侵占中国领土台湾。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警告，要求迅速停止朝鲜战争，美国武装力量退出台湾，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美国自同年8月27日起不断派遣空军侵入中国领空进行轰炸、扫射，在公海上炮击中国商船；直接出兵朝鲜，于9月15日由15个国家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10月1日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部进攻。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8日正式组建，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协同朝鲜人民军抗击侵略者。自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10日，中朝军队连续发动了5次攻势战役，歼敌23万余人，把美国军队从鸭绿江、图们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之后双

方形成了长达两年零一个月的对峙作战局面，同时从1951年7月起，双方开始进行停战谈判。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在3年零1个月的朝鲜战争中，中朝两国军队共毙、伤、俘敌军1093839名，其中美军397543名；击伤击毁和缴获敌机12213架，坦克2690辆，击沉击伤敌舰艇257艘。同时，中国人民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保卫远东与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炮击金门】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对驻金门岛国民党军队进行的警告性炮击。自1958年8月23日开始实施，至1958年底，共击沉击伤国民党军各型舰艇24艘，击伤击落飞机37架，毙伤国民党军官兵7000余人。美国政府为摆脱被动局面，诱迫国民党军撤出沿海岛屿。中共中央决定以金门、马祖两岛拖住国民党军队。同年10月6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表《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宣布停止炮击金门一周，让国民党军恢复补给，但以没有美国军舰护航为条件。25日，彭德怀再次发表文告，宣布逢22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大小岛屿上的同胞得到充分的供应。对金门的警告性炮击，一直延续到1978年12月31日。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福建前线部队奉国防部长徐向前的命令，自即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1962年中国边防部队在西藏边境地区对印度入侵军队进行的自卫反击作战。从1961年开始，印度军队先后在中印边界的西段和东段越过双方实际控制线，侵占中国领土，并在中国领土上建立据点。中国政府多次发出通过双方和平谈判

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均遭印方拒绝。1962年9月，印度军队越过东段“麦克马洪线”向北推进，开枪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10月20日，又在东段和西段向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反击。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三项建议：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周恩来总理还亲自致函印度总理尼赫鲁，呼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冲突。但印方置之不理，11月14日起，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自11月16日起进行自卫反击，打击了印度军队的入侵，清除其设立的据点，并迫使其返回到传统控制线附近。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主动发表声明，宣布从次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自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并主动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和俘获人员全部返还印度方面。

【珍宝岛事件】苏军武装侵入中国领土珍宝岛造成的边境武装冲突。珍宝岛位于中苏边境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历来是中国的领土。1969年3月2日，苏军武装人员和4辆装甲车、指挥车侵入珍宝岛，打死打伤正在巡逻的中国边防部队战士多名。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当日，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最强烈抗议。15日，苏方又出动几十辆坦克、装甲车和大批武装部队，在飞机掩护下，再次侵入珍宝岛，并用重炮向中国境内纵深射击，制造新的流血事件。中国边防部队奋起反击，把入侵的苏军全部击退。17日，中国边防部队又击退了苏军对珍宝岛的第三次入侵，捍卫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197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击南越军队侵略中国西沙群岛的战役。长期以来，中国西沙群岛的珊瑚岛一直被南越阮文绍政府派兵占据。1974年初，南越两次派遣军舰侵入西沙群岛海域，强占甘泉、金银两岛，打死打伤中国渔民。中国军队1月19日被迫反击。海军舰艇部队同陆军、空军、民兵协同作战，收回了珊瑚、甘泉、金银三岛，俘获南越军人48名。战后中国方面将战俘予以遣返。

【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国边防部队反击越南侵扰，捍卫领土主权的战役。中越边界是中国清朝政府同法国于1885—1897年签约划定的。1957年和1958年中越两国换文确定了维持边界现状的原则。从1974年起，越南不断派兵越界巡逻、修路、开荒，干涉中国方面的巡逻和生产，甚至毁坏边界标志，在边境地区增调部队、增加边防点。1977—1978年中越双方就陆地边界问题进行副外长级谈判，因越方缺乏诚意而无进展。1978年底至1979年初，越方连续出动部队，侵犯中国领土，袭击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979年2月17日至3月5日在广西、云南边境对越南进行自卫还击作战，歼灭和重创了越军有生力量，拆除和摧毁了越方设在中国境内的据点等军事设施，缴获了大量武器和作战物资。这次自卫反击战捍卫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打击了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猖狂气焰。

【南沙群岛自卫还击战】1988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为反击越南军队侵占中国南沙群岛的自卫还击战。1988年3月14日，越南海军43名武装人员强行登上中国南沙群岛的赤瓜礁，不顾中国海军要其离礁的喊话，首先向中国海军考察人员开枪。与此同时，

越军舰船也开炮射击。中国海军被迫进行自卫还击。战斗持续 28 分钟，越军一艘运输船被击沉，另两艘船被击伤。战斗结束后，中国海军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救起越军 9 人，并允许越南船只悬挂红十字旗帜前来救护。这次还击战打击了越南侵占南沙群岛的企图，在东南亚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

军队·根据地

【黄埔军校】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创办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1924 年 1 月 24 日孙中山下令筹办陆军军官学校，指派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邓演达等 7 人为筹备委员，以位于广州黄埔岛上的广东陆军学校与广东海军学校原址为校舍。2 月 23 日，派廖仲恺代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建校，5 月 5 日第一期学员开始入学，6 月 16 日正式开学。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组成校本部，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校本部下设政治、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等部。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先后为第一期政治部主任。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李济深为教练部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何应钦为军事总教官。后又增设教育长、军法处、参谋处。军校先后聘请布留赫尔（在中国化名加伦）等苏联红军将领为军事顾问。黄埔军校是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协助下创办的。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中有徐象谦（向前）、陈赓、蒋先云、左权、许继慎、蔡申熙、王尔琢、宣侠父、周士第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学生总数的 1/10。除

周恩来担任第一期政治部主任外，恽代英、萧楚女、鲁易、熊雄、聂荣臻等共产党人先后在军校担任领导和教官。并建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黄埔军校实行党代表制和政治工作制，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开设的课程有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各国革命史、中国农民运动等。从1924年5月至1926年7月北伐前，军校招生5期，共约7400人。成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的重要力量。但军校许多实权掌握在蒋介石手中，他利用职权极力培植个人势力。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在军校实行“清党”。此后成为蒋介石培养反动军官的学校，至1930年9月停办。

【叶挺独立团】北伐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1925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领导下，于广东肇庆组建。其前身是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的成立于1924年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此外，独立团还从黄埔军校抽调一部分人员作骨干。战士多为招募的新兵。全团共2000余人。连以上干部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干部的任免、调动由共产党决定。团设党支部，直接由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领导。1926年5月作为北伐先遣队开赴两湖前线。6月5日攻占攸县，打破了吴佩孚的战略企图，稳定了湖南战局，为北伐军主力进入湖南创造了有利条件。8月27日、30日攻占汀泗桥、贺胜桥两战役和8月31日至10月10日围攻武昌的战斗中，英勇善战，屡建奇功。人民称第四军为“铁军”，叶挺独立团为“铁军”的楷模。北伐军占领武昌后，叶挺独立团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组建的中国国民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四一二事变后，变为反共反人民的军队。1926年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后，为实现军队统一，于7月6日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受中国国民党的指导与监督，管理和统率国民政府所辖境内的军队和一切军事机关。8月26日军事委员会决议将所辖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新练的军队和一部分粤军为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谭延闿所部湘军为第二军；朱培德所部滇军为第三军；在江西的粤军为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李福林所部福军为第五军。后来程潜所部湘军为第六军；广西桂系李宗仁所部为第七军。国民革命军学习苏联经验，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由共产党人担任。周恩来、朱克靖、林伯渠、李富春先后曾任政治部主任或党代表。由于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军队中的骨干作用和先锋作用，国民革命军取得了东征和北伐战争的胜利。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国民党政府军队仍用这一名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等创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江西井冈山地区，开始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1月下旬，工农革命军攻下茶陵县城，建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民主政府。到1928年2月，以井冈山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湖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5月4日，会师部队组成中国工农革命第四军（后改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多次打退反动军队的进攻。到1928年夏，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已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县和吉安、安福、遂川、酃县的部分地区，5月下旬，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至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1928年12月，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力量。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则留守井冈山。留下的红军，经过曲折的斗争，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永新为中心，包括宁冈、莲花、上犹、崇义等十几个县革命政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中央革命根据地】又称中央苏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由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汇合而成，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新的根据地。2月，红四军先后攻占了赣南的宁都、兴国、瑞金、雩都。3月，红四军挺进闽西，在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领导的闽西地方武装配合下，先后攻占了长汀、上杭、龙岩、永定等县。4月初，红四军回师赣南，利用蒋桂战争爆发的有利形势，在赣南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奠定了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5月之后，红军又两度入闽，消灭了土著军阀陈国辉和卢新铭，建立了龙岩、上杭等县的红色政权，奠定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基础。1930年3月，成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和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至此，正式形成了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1931年8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会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

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9月，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同时成立了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临时政府和中央军委在江西瑞金的成立，标志着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此后，根据地的军民进行了土地革命和经济、文化建设，扩大了红军和根据地范围。中央红军最多时发展到10万，中央根据地全盛时扩展到21个县，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也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其主力被迫于10月中旬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留下的一部分红军在项英、陈毅领导下在当地继续开展游击战争。

【湘赣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彭德怀等开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位于赣江以西，袁水流域以南，大庾以北，攸县、酃县以东地区。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留守井冈山的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在彭德怀等领导下，为保卫和发展井冈山根据地，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29年1月下旬，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分路向井冈山进犯，在优势敌人面前，留守的红军被迫突围向赣南转移。5月，红五军在彭德怀率领下重返井冈山。在当地农民武装配合下，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会剿”，恢复和巩固了永新、宁冈、莲花、上犹、崇义等10余县的革命政权。1931年8月，中共中央在永新成立了湘赣省临时省委和湘赣省工农兵

政府。至此，创建了包括宁冈、莲花、上犹、崇义等 10 几个县的湘赣革命根据地。1933 年 6 月，湘赣根据地的红军和湘鄂赣根据地的红军合编为红六军团。1934 年 8 月，红六军团奉命撤离湘赣根据地，进行西征。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黄公略等开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边界地区。1928 年 7 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了湖南平江起义，建立了红五军。12 月，红五军主力向井冈山转移，红五军另一部则改编为红军湘鄂赣边支队，在支队长黄公略的领导下留在湘鄂赣边坚持武装斗争。1930 年 3 月，彭德怀率红五军重返湘鄂赣边，与黄公略的湘鄂赣支队一起，多次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初步创建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1931 年 7 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以李宗白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赣省委。9 月，成立了由赖汝樵任主席的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是年，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发展到湖南的平江、浏阳、岳阳、湘阳、临湘，湖北的通城、崇阳、通山、蒲圻、咸宁、阳新、大冶、鄂城、黄梅、广济、蕲春、浠水，江西的修水、宜春、铜鼓、宜丰、高安、萍乡、瑞昌、靖安、万载、奉新等 20 余县。1934 年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根据地的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惨重。1934 年 10 月，中共红军主力长征后，少数部队在陈寿昌、徐彦刚、傅秋涛等领导下，在湘鄂赣边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方志敏等开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又称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位于福建、浙江、江西三省边界地区。1928 年 1 月，共产党员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

了江西横峰、弋阳农民起义，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同年10月，在中共崇安县委领导下，发动了崇安农民起义，创建了闽北革命根据地。1930年6月，中共赣东北特委成立。1930年7月，闽北划归赣东北特委领导，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赣东北、闽北两块根据地亦随之合并。1931年，又先后成立了以万永城为书记的中共赣东北省委和以方志敏为主席的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1932年底，赣东北根据地扩大到了闽浙赣三省，形成了包括福建崇安，浙江开化、江西弋阳、横峰等26个县的闽浙赣根据地。中共中央鉴于新的形势改赣东北省为闽浙赣省，方志敏任省委书记。1934年10月，红十军与方志敏的抗日先遣队合编为红十军团。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粟裕任参谋长，继续担任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1935年1月，先遣队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失利，方志敏受伤被俘。余部在粟裕等领导下，继续转战闽浙赣坚持游击战争。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徐向前等开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地区，包括黄安（今红安）、麻城、商城、光山、六安、霍山等26个县。1927年11月，共产党人吴光浩、潘忠汝、戴克敏、曹学楷等领导黄安、麻城农民起义，成立了鄂东军，建立了鄂豫边革命根据地。1929年5月，共产党人徐子清、萧方、周维炯等领导了河南商城起义，建立了豫东南革命根据地。1929年11月，共产党人舒传贤、周狷之等领导了安徽六安、霍山农民起义，建立了皖西革命根据地。1930年4月，三块根据地联成一片，组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并成立了以郭述申为书记的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和以甘元景为主席的鄂豫皖苏维埃政府。1931年5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张

国焘任书记。同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32年10月，由于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出根据地，向川陕地区转移。留下的红军组成红二十五军，与当地人民武装一起在鄂豫皖边区坚持游击战争。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等开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南、湖北两省边界地区，包括洪湖、湘鄂边、襄枣宜、巴兴归等革命根据地。1927年底贺龙、周逸群等奉中共中央指示前往湘鄂西发动革命。1928年初在监利县境内又与当地游击队会合，打起了工农革命旗帜，随后，相继领导了监利、石首、华容、南县等地的年关暴动和桑植起义。1928年4月，贺龙率部分武装力量进入湘鄂边山区开展游击战争。7月初成立了以贺龙为书记的湘西前敌委员会，当地的工农武装正式整编为红四军。1928年底至1929年春，红四军相继攻克建始、鹤峰、桑植等县城，开辟了湘鄂边根据地。与此同时，周逸群转至洪湖地区，组织中共鄂西特委在监利、华容、石首、江陵、沔阳等地领导武装斗争，并建立了分别由段德昌、段玉林领导的两支较大的游击队。1929年这两只游击队编为鄂西游击总队，1930年又改编为红六军，红六军成立后，先后攻占沔阳、潜江、石首、汉川、华容、公安等地，开辟了洪湖根据地。1930年夏，贺龙率红四军东下洪湖地区，7月初与红六军会师公安城。随后红四军改称红二军，两军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1931年3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湘鄂西根据地

扩展到汉水以北的鄂中地区。5月，红军在鄂西北开辟了均（县）房（县）革命根据地。同年底，中共中央把襄枣宜革命根据地划归湘鄂西中央分局管辖。到1932年夏，湘鄂西根据地发展到包括洪湖、湘鄂边、襄枣宜、巴兴归根据地，以及鄂西北的均县、房县、谷城、保康等20多个县的地区，红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3万余人。1932年秋，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对湘鄂西根据地的“围剿”，被迫撤离湘鄂西，转至黔东地区继续坚持斗争。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等开辟的革命根据地。位于广西西部左江、右江一带。1929年6月，中共中央派邓小平（即邓斌）、张云逸、叶季壮等到广西开展工作。同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领导了百色起义，成立了红七军。次日在平马召开了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以共产党人雷经天为主席的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红七军成立后，先后建立了百色、隆安、东兰、凤山等10余县工农民主政权，开辟了右江革命根据地。1930年2月1日，邓小平与李明瑞、俞作豫等又一起领导了龙州起义，成立了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随后红八军又占领了左江区域的龙州、宁明、靖西等10余县，初步创建了左江革命根据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左江工农民主政府实施了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等政策；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进行了土地改革。后来，强大的敌人进攻根据地，左江根据地丧失。红八军退至右江地区编入红七军。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奉命离开右江根据地，转战至湘赣，与红一方面军汇合。留下少数部队在韦拔群领导下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的人民军队。它是由中国工农革命军及其他革命武装于1928年5月后陆续改称的。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会合。5月4日，根据中共湘南特委指示，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这是中国第一支红军部队。同年7月，彭德怀等发动了平江起义，成立红五军。1930年6月，以红四军为基础，集合赣南、闽西的主力红军合编为红一军团；以红五军为基础，与红八军合编成红三军团。同年8月，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与红一军团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这就是后来所称的中央红军。此后，徐向前、陈昌浩等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贺龙、任弼时等也将长期转战于洪湖、湘鄂西的红军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另外，刘志丹等人也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武装逐步发展成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陕北红军。至1933年，红军发展到30万人。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1933年5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中国工农红军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开展了艰苦的游击战争，创建了闽赣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闽浙赣、左右江、陕甘等革命根据地，击破了国民党军多次大规模的“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除陕北红军外，各地红军主力被迫先后退出原来的根据地，突围转移。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率先开始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和指挥下，战胜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于

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10月，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也胜利到达陕北。长征的胜利，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3万余人。抗日战争开始后，根据国共两党合作协议，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浙江等8省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东北义勇军】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和部分爱国军队组织的抗日武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人民和部分爱国军队，自发组织了抗日武装，进行抗日游击战争。这些武装主要是东北军的旧部，另有一些民众组织和一些倾向抗日的地主武装。这些抗日武装，在当时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到1932年底，东北抗日义勇军曾发展到30多万人，他们战斗在黑水白山之间，曾给予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他们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特别是东北军旧部改编的义勇军，情况复杂，内部矛盾重重，因而到1933年，这些抗日武装大部分溃散。其中一部分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部分。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又称察北同盟军。1933年春，日军进犯察哈尔。原国民军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民军旧部为基础，于1933年5月26日在张家口通电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同盟军以冯玉祥为总司令，以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同盟军队伍迅速地由几千人扩大到10余万人。6月15—20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军民代表61人。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众

抗日同盟军纲领决议案》、《关于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事问题决议案》等文件，确定了同盟军的纲领及抗日的具体方案，主张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士兵生活，释放因抗日而被拘禁的政治犯，保障抗日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等为同盟军的政治纲领。大会选举了军事委员会，推举冯玉祥、方振武、佟麟阁、宣侠父、吉鸿昌等为常委。会后，同盟军兵分三路迎击日伪军，连克康保、宝昌、沽源等地，同盟军声威大振。7月，同盟军由吉鸿昌率领，与日军血战5昼夜，终于收复多伦。进而又乘胜追击，将日伪军完全驱逐出察哈尔省境。7月下旬，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了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准备进一步收复失地。但是，此时国民党当局却开始用各种手段破坏同盟军的抗日爱国行动。7月28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在庐山发表联名通电，指责冯玉祥“擅立军政名义”，“滥收散军土匪”，“妨害统一政令”。尔后，又调集国民党军16个师约15万兵力，与日伪军勾结，协同会攻同盟军。在蒋日军夹击下，同盟军处境艰难。于8月9日宣布撤销同盟军总部。随后，吉鸿昌遵照中共河北前委决定，联合方振武，通电宣布改同盟军为抗日讨贼军，继续奋战于热河、长城一带。9月底，在日蒋联合进攻下，抗日讨贼军终以弹尽粮绝而失败。

【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模范边区。北起陕西北部的府谷、横山，南达陕西中部的淳化、枸邑，东临黄河，西至甘肃的固原和宁夏的豫旺堡，南北约450公里，东西约400公里，共23个县。1931年刘志丹领导陕北游击队开创了陕甘边界地区革命根据地，1934年又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合，巩固和扩大了陕北根据

地。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协议，中共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经过普选，建立了乡、区、县各级抗日民主政府。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一直驻在陕甘宁边区。中共的许多重要会议在这里召开，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号召在这里产生并传向全国。边区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在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前线后，驻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和地方武装，守卫着几百里黄河防线，多次粉碎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骚扰，保卫着边区。边区成立了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还成立了总工会、农民会、妇女联合会、青年救国会等，组织广大群众开展抗日民主运动，为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提供了经验，在全国树立了榜样。中共还创办了马克思列宁学院，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卫生学校，为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培养了大批干部。边区还实行减租减息的经济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了工商业。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获得了大发展，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八路军进入华北抗日前线后创立的第一个敌后根据地。地跨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5省，位于同蒲路以东，渤海以西，张家口、多伦、锦州以南，正太、德石路以北。1937年10月下旬，聂荣臻率领一一五师一部，开始创建以五台山区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1月，成立晋察冀军区。1938年1月，民主选举产生了晋察冀军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为边区政权的最高领导机构。整顿和改造了县、区、村各级政权。成立了工人、农民、妇女救国会。3月，在北平郊区成立平西抗日根据地。

4月，成立冀中军区。7月，冀东建立了抗日政权。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从1938年11月起，边区军民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扫荡”，获得了发展。到1940年7月，边区政府辖有两个行政主任公署，9个专员公署，75个县政权，较之1938年1月边区政府成立时，人口增加200万，抗日的县政权增加36个。1940年至1943年，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日军大规模“扫荡”。1944年，发动了一连串的反攻，共拔敌据占1500个，恢复村庄5000余。巩固而且发展了根据地。1945年8月11日，晋察冀根据地部队开始了大反攻作战，至9月3日抗日战争结束，共收复28座大中小城市，包围了北平、天津、保定，解放了察哈尔全省和河北省、辽宁省一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以八路军一二九师为主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包括晋冀豫和冀鲁豫两个战略区。晋冀豫区包括山西的东南部、河北的西南部、河南黄河以北一小部。冀鲁豫区，包括河北的南部、山东的西部、河南的北部。1937年11月，一二九师及第十八集团军总部进入晋东南地区，到1938年4月，将敌人全部赶出晋东南，建立晋冀豫根据地，成立晋冀豫军区。同年春，一二九师一部开赴冀南，开辟了冀南区。9月，开辟冀鲁豫根据地。1940年4月，成立冀鲁豫军区，建立行政主任公署。6月，建立冀南军区、太行军区和太岳军区。8月，成立了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杨秀峰任主任，作为过渡性质的全区统一政权组织。1940年底，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到西起同浦路，东至津浦路，南临黄河，北抵石太、石德路的广大地区；拥有10万部队和2000万人口。1941年7月正式成立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政府，杨秀峰任主席，薄一波、戎子和任副主席。1941—1942年，日寇对根据

地进行频繁“扫荡”，加之连年自然灾害，根据地的斗争相当艰苦。从1943年起，全区进入恢复与再发展的新时期。1944年，根据地军民对敌展开局部反攻，把许多被分割的小块游击区变成大块根据地。1945年8月11日，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展开大反攻。至9月20日，计歼灭敌伪5万余人，收复县城59座，据点数百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当时全国较大解放区之一。全区拥有县城105座，面积1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400余万，军队近30万，民兵40余万，部队由分散到集中，并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提高了战斗力，为以后的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晋绥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开辟的较大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包括山西西北部与绥远东南部，中心区域为晋西北之兴县、临县、河曲、保德、偏关、岢岚一带。为陕甘宁边区通向华北、华中各敌后根据地的重要通道，又是阻敌西进，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1937年10月，八路军一二师一部开始在晋西北组织抗日武装，到1938年初步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8—12月，一二师部队在大青山和满汉山地区先后开辟了绥西区、绥中区、绥南区等三块游击根据地，建立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1940年，在绥远，建立了绥远区党委，绥南、绥中、绥西三个专署。在晋西北，建立了以贺龙、关向应为正副书记的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党政军各项工作。后又成立了晋西北行政公署、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和军政民联合委员会，有力地促进了晋西北地区的党政军建设。1941年和1942年，晋绥抗日根据地由于日、伪、顽的包围封锁和疯狂进攻，面积缩小了1/3，人口减少了2/3以上。1943年，晋绥军民取得了反“蚕食”、反“扫荡”斗

争的胜利。1944年，根据地军民铲除敌伸向我根据地的突出据点，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展开了对敌局部反攻。1945年，为准备大反攻，中央军委决定，晋绥军区部队统一由贺龙、李井泉指挥，并成立了吕梁、雁门、绥蒙三个地区党政军机构。8月11日，八路军在北线以归绥为中心，在南线以太原为中心在同蒲路两侧分别展开全面反攻作战。半个月内，八路军在北迄绥南的凉城，南至晋中平川的300余公里路线上收复左云、文水、离石、彭乐等县城7座及大小据点30余处，歼敌伪军5000余，解放了绥远和山西广大地区。经过八年抗战，晋绥部队发展到7个旅29个团，共6万余人的强大队伍。

【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山东开辟的抗日根据地。以沂蒙山区为中心，包括鲁中、鲁南、胶东、泰（山）西、（微山）湖西、清河、冀鲁边、鲁西北、鲁东南等数小块根据地。它是在中共山东地方组织的领导下，经过人民武装起义，发动游击战争，而初步开辟，罗荣桓领导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进入山东后，才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937年11—12月，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先后领导了冀鲁边区、胶东地区和清河地区人民抗日武装斗争。1937年底至1938年6月间，又领导发动了鲁中、泰西、鲁东南、鲁南、湖西和鲁西北地区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初步开辟了10余个抗日根据地，解放了肥城、蓬莱、莱芜、博山等15座县城，全省人民抗日武装发展到4万余人。1938年12月，一一五师师部及第六八六团在罗荣桓率领下，由晋西出发，1939年3月，进入鲁西平原。1940年，山东纵队所发展的主力和基干部队，先后扩大为5个旅、2个支队。1940年8月，一一五师主要领导同志参加中共山东分局，统一了山东地区党、政、军领导。到1940年底，

山东区八路军比 1938 年秋扩大了 2 倍，达 12 万余人，抗日根据地发展为大小 10 块，建立民主政权的有 95 个县，14 个专员公署，1 个行政主任公署，并成立了行使人民政治权力的机构山东省参议会。由参议会民主选举，成立了行使政府职权的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后改称战时行政委员会），统一了全省民主政权的领导。1941 年和 1942 年，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扫荡”。1943 年 3 月，成立新的山东军区，由罗荣桓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辖鲁南、鲁中、滨海、胶东、清河、冀鲁边等 6 个分区，实行了主力地方化，统一整编了部队。经过 1943 年反“蚕食”、“反扫荡”、反磨擦作战，扭转了敌顽夹击的不利局面。1944 年，发动了春、夏、秋、冬一系列战役攻势，从根本上扭转了山东地区对敌斗争的形势。1945 年 8 月中旬至 9 月初，山东八路军进行大反攻作战，解放了山东 108 县中的 100 县，歼灭（包括死、伤、俘）日伪军 6 万余人，切断了胶济路、津浦路、陇海路，包围了济南、青岛、徐州、连云港等城市。抗战结束后，山东八路军及时整编，将部分主力调赴东北。至此，山东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华中抗日根据地】由新四军在长江南北的江苏、安徽等省开辟的抗日根据地。1938 年 1 月，新四军总部在南昌成立。2 月，迁到皖南歙县岩寺。3—4 月间，新四军第四支队到达皖中霍山以西地区集中，第一、二、三支队先后到达皖南岩寺地区集中。5—6 月间，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和第一、二支队到达苏南，创建了茅山根据地。新四军第三支队在皖南坚持作战。第四支队到皖中、皖东，开辟抗日游击区。10 月，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挺进豫东。1939 年，新四军第一、二支队挺进苏皖边，两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为正副指挥。同时，建立苏

皖区党委，统一领导苏皖、苏南、苏北三个特委。1939年底，彭雪枫率领的游击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同时，陶铸与李先念分别在鄂中、鄂豫边组建游击队，并汇编成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黄克诚率八路军一部南下转战苏北。1940年夏，陈毅、粟裕率第一、第二支队主力渡江北上，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开辟了苏北根据地。不久，成立华中总指挥部，叶挺、陈毅为正副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1941年和1942年，新四军开展反日寇“扫荡”、反伪军“清乡”的斗争。1943年，继续反“扫荡”、反“清乡”，获得胜利。1944年，苏中、苏北新四军发动攻势作战，使两区连成一片。同时，其他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扩大。1945年大反攻开始后，华中军民从8月9日至9月2日，在长江南北解放县城32座，重要市镇近400个，歼敌伪军1.3万余人。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基本连成一片。到此，华中解放区拥有苏北、苏中、苏浙皖、浙东、淮北、淮南、皖中、河南、鄂豫皖、湘鄂等10个地区，县城40座，人口达3400余万，面积25.3万余平方公里。军队由抗战初1.2万人发展到31.8万余人，民兵80余万。

【华南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广东、海南岛建立和发展的抗日游击根据地。1938年11月，广东淡水、惠阳地区和东莞、宝安地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两支抗日游击队。1939年两支队伍会合，组成惠宝人民抗日游击纵队，挺进广（州）九（龙）路两侧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12月，海南岛的中共琼崖特委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第十四统率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后改编为总队，下辖3个大队，6个中队，共2000余人。1940年底，成立琼崖抗日独立游击纵队（后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琼崖纵队)，部队发展到 3000 人，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委，创建了琼崖抗日根据地。1941 年和 1942 年，游击队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和日军的“扫荡”。到 1943 年初，部队总数达 4000 余人。整个海南岛除中区和西南角外，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活动区。1944 年，东江纵队粉碎了日军“扫荡”，解放了的广九路以西的东莞、宝安地区，成立了东宝行政督导处，全部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广九路以东的增城、博罗等县，大部地区为共产党游击纵队控制。成立了联合办事处，部分建立民主政权。到 1944 年底，琼崖游击队在 8 个县建立县一级民主政权，在 16 个县中建立区、乡民主政权，建立了统一政权“琼崖民主临时政府”，解放区人口 150 万，部队达 5000 人。1945 年 8、9 月，华南解放区向日军反攻。东江纵队解放了宝安县城和稳平半岛。琼崖纵队解放了百余座市镇和据点，建立全岛 16 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部队发展到 7700 余人，各县区人民武装 3000 余人。

【八路军】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的简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其前身是抗日战争爆发时在陕甘宁的主力红军。1937 年 8 月 22 日，国民党当局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正式宣布将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部，下辖 3 个师，每师两旅制，每旅两团制，每师定员 1.5 万人。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改编令，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9 月 11 日，按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改称总司令，彭德怀改称副总司令。8 月 22 日至 9 月 30 日，朱德等率领八路军主力先后由陕西东渡黄河，开赴华

北抗日前线。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及有关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八路军各师主力分散深入华北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八路军从1937年抗战开始时的4.2万余人，发展到1940年的40万人，并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等大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10月以后，八路军所开辟的华北敌后战场及新四军所开辟的华中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日主要战场之一。1941—1942年，日军集中兵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反复进行残酷的“扫荡”和“蚕食”，并发动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八路军人数减少了6万，根据地面积和人口减少了一半。八路军与华北根据地人民团结一致，粉碎了日军频繁的“扫荡”和“蚕食”，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克服了困难，1942年下半年，形势开始好转。1943年，八路军和根据地进入恢复和再发展时期。1944年，八路军进行了局部反攻。1945年8月配合反法西斯同盟国军队，举行了大反攻，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共作战10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35万人以上。八路军发展到102.8万余人，建立的根据地面积近8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9000万。

【新四军】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简称，其前身是中国共产党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闽、粤、浙、赣、湘、鄂、豫、皖8省13个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统一整编南方各地区红军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建议。经两党谈判，很快达成协议。1937年10月2日，国民党政府正式颁布改编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命令。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

袁国平，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全军共 1 万余人，编为 4 个支队，9 个团。同年 4 月，新四军军部由南昌进驻皖南歙县岩寺，所属 4 个支队分别向大江南北敌后挺进。同年 7 月，新四军军部由岩寺移至皖南泾县云岭。1941 年 1 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军长叶挺谈判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军部领导惨遭杀害。同年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以后，新四军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不断粉碎日伪的“扫荡”、“清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发展和巩固了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皖中、鄂豫边、浙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到 1945 年日本投降，八年抗战中，新四军对敌伪作战达 19300 余次，毙、伤、俘日伪军 31.7 万余人，建立了地跨苏、浙、皖、豫、鄂五省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达 25.3 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 3420 余万。新四军也由建军时的 1 万余人发展到 31 万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简称抗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革命武装为核心联合其他各种抗日武装的统一战线性质的部队。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抗日，东北部分爱国官兵和群众相继建立抗日义勇军，抗击日军。同时，中共满洲省委创建了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抗日斗争中队伍日益壮大。到 1932 年一年内，即相继建立了南满、海龙、延吉、和龙、琿春等抗日游击队。为了联合一切抗日武装共同抗日，1933 年 5 月，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央精神作出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决议。1933 年 9 月至 1936 年 2 月间，各地党组织分别将抗日游击队组建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至第八各军（缺第七军），并建立起与各军相适应的抗

日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36年1月28日在黑龙江省汤原县召开东北反日联合军政治扩大会议，决定以东北人民革命军为核心联合起其他各种抗日武装力量成立东北抗日联军。2月20日，各抗日武装联合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赵尚志为总司令，李兆麟为总政治部主任。下辖7个军，后增编第八、九、十、十一等4个军。总兵力约4.5万人。1936年秋整编，第一、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由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治委员，转战辽东、辽南等地区。1938年1月，第四、五、七、八、十各军合编为第二路军，由周保中任总指挥兼政委，主要活动于西起哈长线东侧、北达松花江右岸、东抵乌苏里江畔的广大区域。1939年5月，第三、六、九、十一各军合编为第三路军，由赵尚志（后改为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在松花江下游、小兴安岭和松嫩平原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春，在敌伪进攻下部队损失较大，缩编为10个支队（或是11个），分散活动。1941年继续化整为零。1942年8月，在中苏边境地区编成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又称国际红军特别独立第八十八旅），旅长周保中、政治副旅长李兆麟，下辖5个营，约1700人，组织和派遣小分队在东北战场上打击日本侵略军。1945年8月，配合八路军和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作战，直至抗战最后胜利。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回民支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帮助建立的回民抗日武装。全名为八路军冀中军区第三纵队回民支队。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华北各地的回族群众纷纷组织起来，建立抗日武装。同年9月，从旧军队弃职回乡的马本斋在河北献县发动数十名回族青年，成立回民抗日义勇队。后又扩大为河北抗

日游击军回民教导队。1938年7月，马本斋率领回民教导队参加八路军，所部与吕正操回民干部教导队合并，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任队长。1939年12月，回民教导总队又与河北雄县、霸县一带回民大队合编，由晋察冀军区正式命名为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回民支队，归属冀中军区领导，马本斋任司令员，下辖3个大队，共1000余人。回民支队从建立到抗战胜利结束的6年间，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转战于冀中平原、冀鲁边区和冀鲁豫边区，经历大小战斗870余次，消灭日伪军3.67万余人。

【中国远征军】又称中国援缅远征军。抗日战争时期派往缅甸参加对日作战的中国军队。1941年底和1942年初，中美两国政府协议，成立了包括中国大陆、法属印度支那、泰国和缅甸在内的中国战区。同时，为了配合缅甸、印度地区的英、印军作战，应英国政府要求，中国国民党政府先派出第五、六、六十六军入缅参加对日作战，并在翌年3月中旬成立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部（原定第二路使用越南方面，后因情况变化未组建），由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史迪威指挥，中国的罗卓英、杜聿明任正副司令长官。从3月中旬到4月，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给英军以有力的配合和支援，仁安羌战役曾解救出被日军包围的7000多名英军。但由于英军没有防守缅甸的决心与准备，日军增援缅甸，远征军后方联络线被切断，结果遭到失败。4月底到5月，远征军陆续退却，由于路途艰苦，兵员损失过半，装备大部丢弃。远征军一部分撤往印度，一部分退往滇西，与日军隔怒江对峙。1943年春，退至滇西的远征军以及新增加的部队，重组中国援缅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由陈诚任司令长官，直辖部队直接接受美军的

训练与装备，至1943年8月共计5个军15个师。1944年5月11日，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攻击日军。9月先后攻克松山、腾冲，11月初进占龙陵，中旬攻占芒市。1945年1月中旬攻克畹町。27日，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原远征军撤退到印度的一部分组成）在芒友会师，打通了中印公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远征军返回国内。

【苏联航空志愿队】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支援中国抗战的空军部队。1937年8月21日，苏联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苏联政府派遣了以崔可夫将军为首的大批苏联军事专家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到中国，帮助作战。从1938年开始，苏联支援中国的轰炸机、驱逐机陆续飞到中国，先后达1000架，随同飞机而来的苏联航空志愿队达2000余人。苏联志愿空军人员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中国抗战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抗战初期，先后在武汉、广州、广东北部、海南岛及台湾上空与日本航空兵交战，给不可一世的日本空军以沉重的打击。日本侵略军中的“空中武士”、“四大天王”和木更津、佐世保等航空队都相继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苏联航空志愿队在帮助中国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有近200人献出了生命，其中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

【陈纳德飞虎队】又称陈纳德航空队。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志愿航空队、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统称。1941年4月15日，美国总统批准，美国陆海军后备航空官兵可志愿前往中国参加对日作战。8月1日，美国志愿航空队成立，由陈纳德任司令。其飞机机身上涂有鲨鱼嘴标记，被称为飞虎队。从12月20

日开始，在中国和缅甸上空参加对日作战，7个月共作战50余次，击毁日机299架。1942年7月4日，美国志愿航空队归并美国陆军，成为美国第十航空队第二十三战斗大队，又称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由陈纳德任指挥官。在此后9个月的作战中，共击落日机149架，投弹214吨，轰炸了被日军占领的汉口、香港、河内等地，取得了衡阳和广州空战的胜利。1943年3月美国决定将在中国的飞虎队升级为第十四航空队，仍由陈纳德任司令，继续在中国上空作战。从1944年11月15日至1945年5月15日的6个月中，在中国军队配合下，共击落日机1634架，并摧毁大量的日军机车、卡车、铁路、桥梁等，不仅完全掌握了对日作战的制空权，而且有力地破坏了日军供给线，迫使其后撤。陈纳德飞虎队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武装力量。前身是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及中国共产党在各地领导的武装起义后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1927年8月1日建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度拥有30万人，创建了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到达陕北的红军于1937年8月22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9月11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在南方8省的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46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3年多的时间里，共消灭国民党军队807万多人。1949年以后，经过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已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战略导弹部队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拥有飞机、坦克、舰艇和原子弹、氢弹、导弹等现代化武器装备。设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作为中央军委的办事机构和

全军的领导机关。军旗为红地，左上方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军徽为镶有金黄色边之五角红星，中嵌金黄色“八一”两字。

【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于10月8日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志愿军出国作战时共组成6个军，随后又陆续组成4个兵团，至1953年7月，总兵力达134万余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经过3年艰苦战斗，打退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迫使美国于1953年7月27日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了朝鲜人民的战后恢复和建设工作的。1958年10月全部撤离朝鲜回国。

会 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举行。来自7个地方的12名代表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参加了大会。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会议。30日晚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会议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艇上举行。大

会听取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活动情况的报告，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纲领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3人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组织和宣传工作。从而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华盛顿会议与九国公约】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共同支配中国的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乘其他列强忙于战争的机会，大力向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造成日本在中国的独占状态。巴黎和会承认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权。美国为了削弱日本，建立自己在东方的霸权，提议召开华盛顿会议。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英、日、法、意、中、荷、葡、比九国会议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各国根据战后力量对比对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一次再分割。中心议题是中国问题。1922年2月6日与会各国签订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九国公约》。公约的出发点是确认中国应为各帝国共同的殖民地。规定要“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任何一国“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九国公约的签订，打破了日本在中国的独占状态，使中国又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个帝国主义共同支配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7月16—23日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李达、张国焘、邓中夏、蔡和

森、向警予、高君宇、张太雷等 12 人。代表全国党员 195 人。大会通过了《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决议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分析了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政治状况，阐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革命对象、动力，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党的最高纲领。《宣言》同时指出，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党的最低纲领，也就是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大会指出，为了实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目标，必须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大会决定出版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最后，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大钊、蔡和森、高君宇 5 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任委员长。张国焘分管组织，蔡和森分管宣传。这次大会初步解决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问题，特别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为革命斗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大会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分清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不懂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应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 年 6 月 12—20 日在广州举行。到会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向警予等 30 余人。代表党员 420 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大会。大会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与会代表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人怀疑国共合作，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和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的“左”倾观点，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在保持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独立性的前提下，全体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和关于劳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案，发表了宣言，修订了党章，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等 9 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 5 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这次大会正确地制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促进了国共合作的迅速形成，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大会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提工人阶级应当努力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 年 1 月在广州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 165 人，共产党员占 14%。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并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李大钊、林森、谢持五人组成主席团，值日主持会议。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章程》等决议案。大会宣言分析了中国的现状，重新解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规定了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其政治原则与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基本相同，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大会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否决了国民党员不得跨党的提案，确认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 24 人，其中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林森、

邹鲁、于右任等以及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等。选举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7 人，其中有共产党员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张国焘等。在 41 名中央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 10 人。会后孙中山主持召开一中全会，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下设秘书处及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军事等部。其中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林伯渠任农民部长、廖仲恺任工人部长。这次大会使国民党有了明确的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方向，标志着国民党的正式改组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一个单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联盟。大会推动了革命的发展，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起点。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1926 年 12 月 1—26 日在长沙召开。参加大会的有 52 个县、2 个特别区的农民协会代表 170 人，代表会员 130 多万。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应邀出席大会，在欢迎他的大会上和大会闭幕典礼上，作了两次重要报告。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或者要发展工商业，都必须依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号召建立革命的联合战线来抵抗反革命的联合战线；严厉斥责了对农民运动的诬蔑和反对农民运动的理论。大会通过了减租减息、禁止高利贷、反对苛捐杂税、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组织农民自卫武装等 33 个决议案。选举了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这次大会的召开极大地推动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到 1927 年 4 月，湖南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 518 万人。

【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1927年3月10—17日在汉口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共33人。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维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加强国共合作、扶助农工运动和将政治、军事、外交、财政大权集中于党，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制的11个议案。通过了《对全国人民宣言》、《对全国农民宣言》、《对全体党员训令》。批准了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制定了“国民党要用种种方法，继续援助工人、农民和城市一般民众的革命运动”；“继续向帝国主义作战”直到“得到中国真正的政治的经济的独立而后止”；“继续对于北方军阀的革命战争，直到我们统一了中国，肃清了封建军阀势力为止”；“继续并且巩固我们对于苏联的关系”等10条国民革命的行动方针。会议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各部部长、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决定国民政府增设农政、劳工等部。这次会议发扬了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支持了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产生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政府，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限制了他的军事独裁。

【南京国民会议】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召开的旨在从法律上确定其统治地位的一次会议。1927年4月，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为应付人民的民主要求，同时也为其统治制造所谓的“法统”地位，南京国民政府曾多次声言要召开国民会议。1930年11月，中原大战一结束，南京国民政府即发表通电，宣布于1931年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1931年3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由王宠惠、吴稚晖主持的约法起草委员会。3月19日，又推定戴季陶负责起草

国民会议组织法。4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开会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草案和《国民政府组织条例》草案。1931年5月5日，“国民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会上致开幕词，他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英美的民主主义，公然主张法西斯主义。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其中心内容是加强蒋介石集团的统治效能，用国家大法的形式确定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会议通过了《昭告全国拥护和平统一案》，确定了蒋介石集团今后的基本方针就是消灭异己军阀，巩固独裁统治。会议还规定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当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扑灭赤匪”，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议于5月17日闭幕。

【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李震瀛、陆沉。此外还有监察委员、团中央代表、两湖代表、军委代表及共产国际代表等，共20多人。会议由李维汉主持，只开了一天，主要议程是：（1）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报告；（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报告；（3）改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体党员书》、《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及《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重要文件。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会议成立了以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并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举行秋收起义。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极大地振奋了全党的革命精神，

明确了党在新形势下的斗争方向。开始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新时期。但八七会议也有不足，会议在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没有主动防止党内已经开始滋长的“左”倾情绪，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代表党员4万多人。瞿秋白、周恩来、向忠发等19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周恩来任大会秘书长。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到会作了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及关于苏维埃组织问题、土地问题、农民问题、职工问题、军事问题、民族问题等决议案，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向忠发当选为总书记，李立三当选为中央秘书长和宣传部长，周恩来当选为组织部长和军委书记。这次大会正确地肯定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十大纲领。大会指出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革命低潮，党的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大会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同时也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这次大会制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使全党在革命的主要问题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统一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大会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是对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错误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肃清。

【编遣会议】1929年1月1—25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胡汉民、李济深等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各集团军司令40余人出席会议，主要讨论裁减全国军队问题。会议通过了《国家编遣委员会条例》、《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等议案。由于各派军阀都想保存自己的实力，并不执行会议所作的裁军决定，此次会议非但没有达到裁兵的目的，反而激化了蒋、冯、阎、桂等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矛盾，直接引起了军阀混战。

【古田会议】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举行，故名。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毛泽东和朱德分别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会议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强调要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人民军队。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共分8个部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员问题和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决议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的方法，强调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同时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决议阐明了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规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决议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重大任务；决议还强调必须在军内外建立正确的关系。会议最后改选了红四军前委，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古田会议不仅为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对全党全军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遵义会议】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于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造成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重大损失。在中共和红军处于极其危险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5—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洛甫；政治局后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还有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及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会议经过3天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会议还对中央机构作了人事上的调整。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中国红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共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秦邦宪、邓发等10余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会议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和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认为，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吞并全中国。这一情况必将重新改变和继续改变着中国政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都有采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参加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可能。因此，共产党的策略路线应该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决议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指出，为了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党的领导权，必须同党内“左”倾关门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会后，毛泽东根据《决议》的精神，在中共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

【洛川会议】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为了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战胜日寇的纲领、方针和具体政策，1937年8月22—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的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共产党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

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而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要点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这个纲领是中共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它全面概括了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会议决定了共产党在现阶段的具体行动方针：第一，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二，以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第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第四，红军实行战略转变，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洛川会议在历史转变关头，指出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规定了共产党的战略任务和具体政策，对争取抗战的胜利和建设一个新中国，具有重大的意义。

【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指1937年11月召开的第八届九国公约国会议。在此之前，1922年2月美、英、日、法、意、中、荷、葡、比9国在华盛顿为签订《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曾举行过首次会议。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幻想依靠英美等国的干涉和国际联盟的援助，制止日本的侵略。1937年8月30日，国民党政府向国联提出关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声明，9月7日又送交补充声明。13日，出席国联第18届常会的中国代表团提出正式申诉，并发表长篇宣

言，陈述日本侵华之经过，要求国联采取适宜及必要的行动。国联将中国的申诉提交由 23 国组成的中日问题咨询委员会讨论后，通过一项建议书，承认日本侵华事实，认为日本违背九国公约及巴黎非战公约，建议召开签订九国公约各国的会议，讨论中日问题。1937 年 11 月 3 日，由国联倡议召开的第八届九国公约国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日本拒绝出席。苏联应邀参加。国民党政府对会议寄予很大希望。会上中国代表提议对日实行经济制裁，但未被采纳。苏联代表提议对日本实行制裁，也未通过。24 日，会议通过《九国公约会议报告书》，建议中日双方停止战争，改取和平程序。随即宣告休会。会议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1938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在武昌召开，大会的主题是“抗战建国”。大会的宣言说：此次“抗战之目的，在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以救国家民族于垂亡。”为获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决不辞任何之牺牲”。又说：“吾人此次抗战，固在救亡，尤在使建国大业不致中断”，“抗战胜利之日，即建国大业告成之日”。但同时又希望日本“幡然变计，放弃其侵略主义”，谋求同日本侵略者实现“合于正义之和平”。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纲领总则规定：“确定三民主义及总理遗教”为抗战建国之“最高准绳”；“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对外政策，主张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否认及取消一切伪组织。对内政策，军事上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之一致为国效命；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规军配合作战；在敌后发动普遍的游击战。政治上组织国民参政会；改善各级政治机构。经济上进行以军事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民众运动方面，在不违犯三民

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之保障。大会决议确立领袖制度，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

【国民参政会】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成立的咨询机构。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抗日和政治改革的要求下，于1938年3、4月间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规定要设立国民参政机关。4月12日，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条例第一条规定“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规定国民参政会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关，它只有听取国民党政府施政报告及询问建议之权，它的决议对国民党政府没有任何约束力。条例规定参政员总额200名，具体人选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后，由国民政府公布。在200名参政员中，国民党员88人，共产党员7人，中国青年党员7人，国家社会党员7人，社会民主党员1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委员1人，余为无党派人士。国民参政会基本上是国民党独占的机关。但是，设立这个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各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的政治机构是过去所没有的，这是一个进步。它给了各党派和各界人士一个公开发表政见的场所。1938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随后迁往重庆，1947年5月在南京举行了第四届第三次会议后宣布解散。成立之初，由于国共两党和其他党与无党派人士的努力，国民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党转而利用国民参政会混淆社会视听，制造反共摩擦。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国民参政会上同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

争，团结了广大中间势力，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更加广泛的支持和拥护。抗战胜利后，国民参政会成为国民党推行反共政策、鼓动内战、粉饰独裁的御用工具。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国民参政失去其作用，只好草草收场。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1939年1月21—30日在重庆举行。武汉失守后，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移向敌后解放区战场。国民党政府也逐渐将其政策的重点转移到反共反人民方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整理党务”和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和《整理党务之要点》的演讲。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演讲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并设立“防共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以指挥党政军各机关，蒋介石任委员长，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五院正副院长、军委会委员及由委员长提出的人员担任。委员长有“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还决定要彻底清查与整理户籍、保甲，健全保甲制度。规定要以保甲为单位，强制民众推行“国民抗敌公约”，宣誓“服从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领导，尽心尽力，报效国家”等。会后，国民党根据会议确定的方针，相继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等一系列反共文件。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改变政策，逐渐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

日，在延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 547 人，候补代表 208 人，代表 121 万党员。4 月 21 日，在大会的预备会议上，决定此次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毛泽东主持大会、致开幕词并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关于军事报告的决议案》和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还通过了《关于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议》。大会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方面、军事方面、统一战线方面的经验，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阐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敌战区、解放区的任务，制定了党的纲领和政策。大会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大会一致认为，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党的最低纲领，在条件成熟后，还要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党的最高纲领。大会明确规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并写入新党章。大会选出 44 名中央委员和 33 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最后，毛泽东以《愚公移山》为题致闭幕词。接着，召开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政治局主席，任弼时为秘书长，建立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结束前夕，在两种中国之命运斗争日益尖锐的重要关头，确定了正确的政治方针和指导思想，进一步团结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奠定了基础。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前夕，于1945年5月5—21日在重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包括三青团代表）600人，国民党中央正式和候补执监委员149人，列席162人。蒋介石致开幕词并作《本届代表大会应有之反省与努力》、《党员确立革命哲学之重要》及《革命军人与革命党之关系》等讲演。吴铁城作党务报告，吴鼎昌作政治报告，翁文灏作经济报告，程潜作军事报告，白崇禧作续军事报告和中共问题报告，何应钦作部队整编和湘西会战经过的报告，潘公展作特种报告。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拒绝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的建议，坚持一党独裁，加强反共力量，准备内战。为此大会通过了《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关于宪法草案案》等决议案。大会指责中共“武装割据，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宣称“与中共之斗争，无法妥协”。确定于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但国民大会“仍应以国民政府公布之五五宪法草案为讨论基础”。会议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总章》、《本党政纲政策》，此外会议还通过了《劳工政策纲领》、《农民政策纲领》、《土地政策纲领》、《农业政策纲领》及《工业建国纲领实施原则》等一系列文件，作出土地国有、耕者有其田、国营实业、扶助民营企业、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等许诺。大会“选举”蒋介石连任总裁，选出222名中央执行委员，90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04名中央监察委员，44名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监委员会。

【政治协商会议】又称旧政协。是根据1945年《双十协定》规定

召开的会议。1946年1月10—31日在重庆举行。参加会议的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共38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担任会议秘书长。会议分为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军事问题等5个问题进行讨论协商。会议上斗争的焦点是军队问题和政权问题。在军队问题上，国民党坚持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实行政治民主化；中国共产党提出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是国家民主化与军队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根本方案是国共双方的军队应同时交给民主联合政府。在政权问题上，国民党企图以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派几名代表到政府中做官的办法，来继续维持其一党专政的统治，并且要中共交出解放区；中共则坚持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并提出实行地方自治制，得到了民主党派的支持。会议先后开大会10次，于1月31日大会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协议。这次会议，由于中共代表和其他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国民党方面作出一定让步，从而使会议通过了在不同程度上否定国民党独裁制度和内战政策，有利于和平、民主，有利于人民的决议案。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1946年3月1—17日在重庆召开。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中央执、监委员331人出席。中心议题是统一党内的认识和行动方针，推翻政协协议。蒋介石致开幕词。会上，吴铁城、林蔚、翁文灏、孙科、张群等人分别作了关于党务、军事复员问题、经济问题、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商定停止军事冲突经过的报告。会议同意张继等152人关于纠正政协会议修改宪法原则的意见，通过对宪法草案的5点修正原则：（1）制定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基本依据；（2）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用

集中开会的方式行使“建国大纲”所规定的职权，其召集的次数应酌量增加；（3）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4）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5）省无须制定省宪。这些修正原则，推翻了政协修改宪法草案的原则，破坏民主宪法的产生，反映了国民党坚持的仍是个人独裁的中央集权制，反对政协关于改组政府问题的协议，全面推翻了国民党所同意过的政协协议。

【制宪国大】国民党政府违背政协协议擅自召开的制定宪法的国民大会。按照政协协议，国民大会必须在政协协议陆续付诸实施后，由改组后的政府领导始能召开。但是，国民党却违背政协协议，于1946年7月3日，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大。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后，蒋介石于当天下午正式下令如期召开国大。11月12日，又宣布国大延期3天，于11月15日召开。声称是为了等候中共交出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名单。国大于11月15日至12月25日在南京举行，大会制定和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故称为“制宪国大”。出席大会的代表1381名，绝大多数是国民党员。青年党、民社党也派代表参加了国大。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和国民党中的民主派采取了反对的态度。国民大会于12月25日闭幕。1947年元旦正式公布了《宪法》，并规定自同年12月25日起实施。

【全国土地会议与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刘少奇主持了会议，朱德致开幕词。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7月17日至8月底。主要是学习文件，各

地代表汇报贯彻执行《五四指示》以来的土地改革情况。第二阶段，8月底至9月13日，讨论制定土地政策。会议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共16条。《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大纲》规定，分配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土地。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经营，不受侵犯。

【小河会议】1947年7月21—23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举行的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贺龙、张经武、陈赓等。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周恩来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一年（1946.7—1947.6）歼敌112万人的伟大战绩。会议着重讨论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问题，决定战争第二年的作战任务是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毛泽东根据战争第一年的战果，首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5年（从1946年7月算起）来解决的设想。

【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25—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出席会议的除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外，还有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负责同志参加，

共计 19 人。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人民解放军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报告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土地改革、整党、经济、统一战线等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了今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任务。报告在总结了人民解放军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会议上，周恩来作了人民解放军 18 个月以来所取得的胜利的总结。会议着重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和他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会议认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是在中国民主革命伟大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在政治上、思想上和一系列政策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行宪国大】所谓行宪，就是开始实行所谓民主宪政，并按照宪法规定选举出总统、副总统。蒋介石为使其统治合法化，决定 1948 年为“行宪年”。1947 年 11 月 22 日，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以孙科为主任的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国民党中央也成立了选举指导委员会，并确定了选举日程，具体负责大会代表的选举和筹备事宜。1948 年 3 月 29 日，“行宪国大”在南京开幕，出席代表 1679 名。蒋介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称这次大会是“中华民国实行民主宪政的开始”。会议期间，蒋介石、白崇禧、俞鸿钧等人就政治、军事、财政、外交等作了报告。4 月 19 日，国民大会举行选举总

统大会，投票时，代表增至 2765 人。蒋介石以 2430 票当选总统，居正仅得票 269 张。其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经过激烈的争夺，国民大会经过 4 次投票，于 4 月 29 日选出李宗仁为副总统。5 月 1 日，国民大会闭幕。5 月 20 日，蒋介石、李宗仁就任总统、副总统。其后，组成了行宪后的首届政府。由翁文灏、孙科、王宠惠、张伯苓、于右任，分别任行政院长、立法院长、司法院长、考试院长、监察院长。

【中共中央九月会议】 1948 年 9 月 8—13 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讨论了 1947 年 7 月小河会议提出的军事计划，即用 5 年左右的时间（从 1946 年 7 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此，要求作战方式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确定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地区作战，要求各战略区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会议认为，必须有支持战争的强大的人力和物力，要求一方面，将战争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大量地从国民党方面和国民党区域获取；另一方面，必须用一切努力恢复和发展老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会议还专门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再次要求全党加强组织纪律性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全军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各项决定，对即将开始的战略决战，夺取全国胜利，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 1949 年 3 月 5—13 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 34 人，候补中央委员 19 人。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作了报告。会议集中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

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在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即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问题。规定了在全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和解决土地问题之后，中国还存在着国外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国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两种基本矛盾，着重规定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阐明了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问题，告诫全党同志，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号召全党必须警惕党内的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的决议。会议还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防止对个人的歌功颂德。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为夺取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和建设新中国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解决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原称新政治协商会议，以区别于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在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正式提议：“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9年6月15—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以毛泽东为主任，

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的筹备会常委会，选举李维汉为秘书长（后由林伯渠代理）。9月17日，召开了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基本通过了各小组分头起草的政协组织法草案、共同纲领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因起草宣言和国旗、国歌、国徽建议案工作没有完成，会议决定将这两议案移交政协第一次会议解决。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今北京）召开，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9月29日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30日选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0月1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1950年6月6—9日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等分别就土地改革、外交与统一战线工作、财政经济、部队整编、税收等问题作了报告。毛泽东提出：党在今后3年左右时间内的中心任务是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完成这个中心任务需要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毛泽东指出：“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党在当前总的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54年9月15—28日在

北京举行。出席代表 1211 人（当选代表 1226 人）。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大会听取和通过了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宋庆龄等 13 人为副委员长，彭真为秘书长，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大会决定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名，大会决定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等 10 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全国知识分子会议】1956 年 1 月 14—20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 27 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 1279 人到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报告批评了党内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强调给知识分子“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报告还提出“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

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技术水平而奋斗。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已经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作人员”，“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9月15—27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026人，代表着全党1073万党员。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列席了会议。代表大会的议程是：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在预备会议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又在代表大会开幕时致开幕词。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成就是：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国家工作方面，八大要求进一步地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继续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逐步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健全国家的法制。八大还强调要加强党的建设，要求全党都要坚持民主集中制，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偏向；反对个人崇拜，避免个人专断。在随后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新的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

朱德、陈云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1958年8月17—30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有关部门党组负责人。会议通过了《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37个文件。会议决定1958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即比1957年的产量535万吨增加1倍。同时规定1959年钢产量的指标为2700万吨至3000万吨。会议预计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将使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6000亿斤至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至90%，全国人均占有粮食1000斤左右。会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为这一目标而努力。会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

【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湖北武昌召开。84名中央委员、82名中央候补委员出席会议，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席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李富春作《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人民公社的兴起给予极高评价，同时阐述了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并不是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强调人民公社应该实行

按劳分配和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会议提出“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的口号，初步降低了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的1959年工业生产的高指标。会议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和反右倾运动】1959年8月2—16日在江西庐山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同志14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反“右倾机会主义”。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决定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调离原工作岗位，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决议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会后，反右倾运动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场斗争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建设上给党和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

【七千人大会】1962年1月11—2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约7000人，故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会上作重要讲话，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产生失误的原因。毛泽东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周恩来、邓小平也表示对几年来党

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承担责任。这次会议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克服经济困难，起了很好的作用。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未能清醒地认识几年来经济工作中的“左”的错误的性质及其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1962年9月24—27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82人，候补中央委员88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自治区党委负责人33人列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国际、国内形势和目前的任务。毛泽东在开幕式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如何对待党内修正主义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提出从现在起，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泽东还在会上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邓子恢、彭德怀、习仲勋等受到错误的打击并被立案审查。全会接受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观点，并向全党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全会还讨论通过了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关于商业工作等几个决定以及人民公社六十条的修正草案，决定继续贯彻执行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十中全会以后，在经济上调整和恢复的任务基本上还能按原计划继续进行，但在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进一步严重发展，到后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66年5月4—26日由刘少奇主持在北京召开的，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一

次会议。出席 76 人，包括中央“文化小组”（即会后正式成立的“中央文革”）提议增加的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 8 人。毛泽东未出席会议，由康生负责向他汇报。但会议的主题是他确定的，各项文件是在他指导下准备的。会议做出两个决定：（1）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批判以及关于他们的组织决定。5 月 16 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及根据会上所谓揭发而整理的 6 个附件。5 月 23 日决定：停止彭、陆、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候补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长职务。5 月 24 日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所谓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问题。（中共中央已先后于 1979 年、1980 年为他们平反）这是毛泽东为扫除“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障碍而采取的组织措施。（2）通过“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组织指挥机构。1966 年 4 月，在毛泽东主持下，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为主，在上海组成起草文件小组，为五月会议准备文件，主要是 5 月 16 日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通称的“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正式撤销“二月提纲”和起草它的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通知》列举“二月提纲”十条“罪状”，逐一批驳。同时，从对党内和国内形势的错误估计出发，要求全党“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

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通知》断言这些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错误论点和估计，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和根据，也是后来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内容。这次会议的召开和《通知》的通过，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发动，也表明“左”的错误路线和方针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毛泽东的个人领导实际取代了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1—12日在北京由毛泽东主持召开。到会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列席者中包括首都高校师生代表。会前，“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中央在如何对待这次运动上也发生了意见分歧。6月初，在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为了对混乱的局面加以约束，决定由中央各部向首都高等院校派出工作组，由团中央向中学派工作组，并作了“内外有别”“大字报不上街”等8条决定，向各校传达。但许多学校都发生了“造反”学生同工作组的对立，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连续发生六一八、六二〇事件。对于派工作组，毛泽东原来没表示反对。7月18日回京之后改变了态度。7月25日明确支持江青、陈伯达等人“由群众选举成立文化大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的建议，主张撤工作组。毛泽东认为要发动“文

化大革命”就必须排除“阻力”，特别是来自中央的“阻力”，所以决定召开中央全会。会期原定5天。8月1日刘少奇口头报告十中全会以来的各项工作，承担了派工作组的责任。毛泽东插话严厉批评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说工作组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写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及他们的大字报。8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十分激烈的讲话。他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他再一次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刘少奇当即作检讨。由此改变会议日程，由各组传达常委扩大会内容。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会议转入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及对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批判。8月8日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文件是《五一六通知》的继续，它基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把广大干部当成革命对象；混淆了敌我关系；将群众划分为左、中、右，在党内和群众中制造分裂，并使派性合法化；提倡“不要怕出乱子”“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给乱打乱斗等违法行为提供了合法根据；这个文件的通过，正式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指导方针。会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相继遭到诬陷和迫害，全党上下都以“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划线，造成严重恶果。最后一天，进行了中央领导机构的补选和选举：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

委。林彪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主席副主席，但刘、周、朱、陈的副主席职务，以后不再提及。

【中国共产党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1968年10月13—31日由毛泽东主持在北京召开。原97名八届中委，有一半以上因受到各种诬陷而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经补选后才勉强超过全体中委的半数。候补中委73人中，只有9人到会（不包括递补为中委者）。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人员等74人出席会议。以后发现，出席会议的成员中，有一人不是共产党员。这是在中共党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此次会议从一开始便是一场闹剧。会议一开始，康生、江青等人，以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要求讨论“文化大革命”是否必要为借口，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分组围攻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已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利）等，以及朱德、陈云，给会议制造了极不正常的紧张气氛。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审议由江青、康生、谢富治所控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采用种种非法手段，通过刑讯逼供，制造大量伪证，捏造诬陷材料拼凑而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1968年9月提出《审查报告》及附件。这次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条件下予以通过（在有个别同志拒不表示同意的情况下“一致通过”），并据此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离奇决议。刘少奇本人，1966年冬被隔离、批斗，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1967年，江青一伙又以迫害王光美折磨刘少奇。面对广大干部被迫害和国家混乱的状况，1月13日刘少奇曾提出两条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

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但未被理睬和允许。此后，批斗逐步升级，王光美入狱。刘少奇被折磨得身患重病。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决议，最后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手续，制造了全国最大的冤案。1969年10月17日，根据林彪“一号手令”，将“随时都可能发生突然死亡”的刘少奇，用担架抬上飞机转移到开封。11月12日晨6时45分去世。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残酷迫害，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涉及对全党全国工作的估价，牵涉到成千上万的党政军干部，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以前的统计，仅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被定为反革命判刑的案件，即达2.6万余件，2.8万余人。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1980年2月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为刘少奇平反昭雪。5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9年4月1—24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党的各级组织尚未建立，广大党员还未恢复组织生活。出席会议的代表，大多是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或由上级指定的。有的人在被确定为九大代表之后才赶办入党手续，或在火车上突击入党的。实际筹备工作均被中央文革把持。大会有三项议程：（1）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2）修改党章；（3）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大会自始至终是在“左”倾思潮和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笼罩中进行的。林彪的政治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论述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过程、经验，强调“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把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论断，正式概括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新修改的党章，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把林彪法定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同时去掉了“党员权利义务”的条文，使党员在党内只有“必须”执行的义务。取消了党员的预备期，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和监察委员会等机构。在组织上，林彪、江青集团的一些骨干和亲信进入了中央委员会。选出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委109人。在4月28日的九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5人：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它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它不但没有如毛泽东所期望的开成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反而潜伏下更深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1970年8月23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在全会开幕会议上，林彪抢先发表了蛊惑人心的长篇讲话，称赞毛泽东是天才，反对所谓有人否认毛泽东是天才，还以曲折的形式坚持设国家主席。随后在小组会上，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分别在各组同时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过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

陈伯达抢先作了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会后，陈伯达等人炮制了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对“有人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最大、最强烈的愤慨”。从而引起了一场混乱。25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全会在挫败林彪集团的突然袭击之后，仍按原定议程进行。经过讨论，会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并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作必要的准备工作，以便在适当时候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全会在9月6日闭幕。毛泽东在闭幕会上主要讲了高级干部的学习和党内外团结问题。周恩来作了总结，并代表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九届二中全会给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打击。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3年8月24—28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代表1249人，代表着2800万党员。代表中工农兵代表占67%。台湾省籍在全国各地的党员选出的代表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1973年3月恢复了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军委办事组撤销，成立了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因此，各方面工作都有了转机。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了这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并向大会提出章程（草案）。政治报告是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毛泽东审定，由周恩来宣读的。报告分关于

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三部分。报告虽然揭发批判了林彪集团的罪行，和他们的两面派的本质，但由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以完全肯定九大路线。王洪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新党章，虽然删去了关于林彪的一段话和“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字样，但总的方面仍继承了九大的党章，并增加了一些错误内容。如把“文化大革命”概括为“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将已清查出来的林彪集团成员清除了，把在“文革”中受排斥、打击的一批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李葆华、廖承志等，重新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但也使一些野心家、投机分子、帮派骨干乘机进入。在选拔接班人时，仍采用了由个人指定的办法，从而使王洪文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选出中央委员 195 人，候补中央委员 124 人。在 1973 年 8 月 31 日举行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有 9 人：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及政治局委员 21 人和候补委员 4 人。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77 年 8 月 12—18 日由华国锋主持在北京举行。代表 1510 人，代表着 3500 多万党员。华国锋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大会通过了上述报告，最后选出中央委员 201 人，候补中央委员 132 人。8 月 19 日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以上 5 人为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政治局委员 23 人，政治局候补委员 3 人。这次大会的政治报告宣告了历时 11 年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仍然完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认定党内有“走资派”，“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新党章亦未能从根本上否定九大、十大党章的“左”的错误。因此，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错误的影响，十一大未能从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 年 12 月 18—22 日在北京举行。12 月 13 日邓小平在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全会根据工作会议讨论的问题及邓小平讲话，确定了思想、政治、组织上的重大决策。(1) 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为端正思想路线是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而解放思想是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前提。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着重指出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他的卓越领导，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的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我们要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2) 全会确立了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及时地、果断地宣布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 1979 年 1 月起把全党的工作

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3) 全会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决策。(4) 全会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出的错误结论。(5) 全会讨论了民主和法制问题，提出了健全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会议认为，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6) 全会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为副书记。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决定采取临时措施，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决定：中央设秘书长、副秘书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胡耀邦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乔木、姚依林为副秘书长。宋任穷任组织部长。汪东兴不再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毛泽东著作编委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组长等职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战略决策和一系列决定，表明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指导思想，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解放了出来，不但结束了1976年以来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而且将中国的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引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中国国民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国民党第十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于1976年11月12日在台北市阳明山举行。出席代表1310人，会期7天，共举行11次会议。它为蒋介石去世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由蒋经国主持。大会中心任务是制定所谓“革新”和巩固国民党、建设台湾复兴基地、组建海内外反共救国联合战线方略。蒋经国在会上作行政报告，除强调“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坚定民主阵营”的“基本立场”外，还提出与大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主义。会议通过六大议案：《中国国民党党章修正案》、《中国国民党政纲案》、《强化党的建设案》、《反共复国行动纲领案》、《加强三民主义思想教育功能案》、《全党奉行总裁遗嘱决议案》。会议决定国民党中央不再设“总裁”，而改设“主席”职位，并推举蒋经国出任。会议除蒋介石原聘任的中央评议委员115人外，蒋经国又聘任张发奎、李宗黄、余俊贤、周至柔等69人为中央评议委员，严家淦等130人为中央委员，洪寿南等65人为候补中央委员。11月19日，召开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严家淦、谷正纲、谢东闵、孙运璿、蒋彦士、沈昌焕等22人中央常务委员，张宝树为秘书长。这次会议确定了蒋经国在国民党核心中的最高地位。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四中全会】1979年9月25—2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召开前，中共中央召开了理论务虚会，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论来自“两个凡是”的和来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都必须纠正。还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专门研究了经济建设，提出了新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即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在这个基础上，四中全会作出三项决定：（1）讨论通过了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讲话中，强调“无产阶级取得了全国政权，特别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除非发生国外敌人的大规模入侵，决不能因为出现这样那样的干扰而离开我们的工作重心”。（2）讨论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3）会议决定增补王鹤寿等12人为中央委员，选举政治局候补委员赵紫阳和中央委员彭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1980年2月23—29日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进一步解决组织问题的全会，做出5项决定：（1）决定提前召开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2）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3）决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4）决定免除或提请免除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5）为了有利于消除

不安定因素，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 45 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 年 6 月 27—29 日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主持了会议。1980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5 日中央政治局连开了 9 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准备向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变动方案。在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要求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其他职务，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最后政治局决定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职，选胡耀邦为中央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六中全会前暂由胡、邓分别主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工作。会议还决定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进行修改。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 32 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的辞职请求，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均为中央主席和副主席），增选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次中央全会是总结历史经验的

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2年9月1—11日在北京举行。这是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和在组织上实行新老交替的大会。邓小平致开幕词。胡耀邦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还实事求是地阐明了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部署及一系列方针政策。这个报告全面地勾画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蓝图。大会审议、通过了胡耀邦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新党章在组织制度上有重要改变，即不设中央主席、副主席，只设总书记；在中央、省市自治区设立顾问委员会，以便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替；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设纪律检查委员会。大会选举出中央委员会委员210人，候补委员138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32人。9月12日、13日十二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会批准了中顾委、中纪委人选，邓小平为中顾委主任，陈云为中纪委第一书记。

【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1986年底部分城市发生学潮后召开的。1987年1月16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20人，中央书记处书记4人，中顾委委员17人，中纪委负责人2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胡耀邦在会上检查了他担

任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总书记职务。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会议决定：（1）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2）一致推选赵紫阳代理党中央总书记；（3）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4）继续保留胡耀邦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会议要求全党继续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各项内外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了这次会议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系统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据此制定全面改革纲领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大会。邓小平宣布大会开幕。赵紫阳代表中央作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分为七个部分，主要说明深化改革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逆转；说明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它的初级阶段。这是中国在生产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坚持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努力建设民主政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建设精神文明。党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报告将

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大会通过了这个报告，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中顾委、中纪委的工作报告。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175人，候补委员110人。中顾委委员200人，中纪委委员69人。11月2日十三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为：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第一副主席赵紫阳，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全会批准了中顾委、中纪委人选。中顾委主任为陈云，中纪委书记为乔石。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1989年6月23—24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会议认为，赵紫阳同志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特别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鉴于赵紫阳同志的上述严重错误，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

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全会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重要讲话（6月9日），一致认为，这个讲话是我们回顾过去，思考未来，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纲领性文件。全会强调，要继续坚持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要毫不动摇，始终如一地加以坚持和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1989年11月6—9日在北京举行。全会之前中央政治局于10月30日至11月3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研究了经济问题。这次全会的重大决定是：（1）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1990年1月17日在报纸公开发表）；（2）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杨尚昆为第一副主席，刘华清为副主席，杨白冰为秘书长。决定增补杨白冰为中央书记处书记。（3）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9月4日邓小平向政治局交了请示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信。信中说：“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

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的革命历史和卓著功勋，指出“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经过中共十三届四中、五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了交接。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92年10月12—18日在北京举行。2000名代表，代表着5100万党员与会。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应邀列席。这次大会是在中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取得重大成就，在1992年春季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鼓舞下，全国人民进一步更新观念、解放思想掀起改革热潮的情况下召开的，也是在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既有挑战，更有机遇”的条件下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江泽民代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这个报告分为四部分：（1）14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2）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3）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外政策；（4）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他高度赞扬邓小平对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的历史贡献和他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

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的事业能够经受风险、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坚持基本路线，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同时要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在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问题上，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提出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被一些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束缚自己的思想和手脚。接着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运用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上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为了加速改革开放，他提出了“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他着重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而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这次代表大会对党章作了部分修改，主要是在总纲中写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从这次大会开始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大会选举中央委员189人，候补中央委员130人，中纪委委员108人。1992年10

月 19 日召开了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为：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江泽民，副主席刘华清、张震，委员迟浩田、张万年、于永波、傅全有。中纪委书记尉健行。

组织·机构

【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组织的北洋军阀临时政权。1924 年 10 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政权后，成立了黄郛摄政内阁，遭到长江流域各省直系军阀的强烈反对。冯玉祥为防止直系势力北上，联皖制直，接受让段祺瑞组织政府的建议。11 月 10 日，冯玉祥、张作霖分别到天津，在段祺瑞寓所举行会议，决定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执政。24 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职，发布临时执政府条例及各部人选，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宣告成立。段祺瑞政府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结合，对内镇压人民革命斗争，对外向帝国主义屈辱妥协。它一再向各帝国主义宣布“尊重条约”，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承认。为使其统治合法化，抵制孙中山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政治主张，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于 1926 年 2—4 月召开善后会议。3 月 18 日，北京各界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会后 2000 多群众前往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段祺瑞的卫队向群众开枪射击，打死群众 47 人，打伤 200 余人，造成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抗，无法继续维持统治。4 月 9

日，鹿钟麟率国民军包围执政府，宣布段祺瑞的罪状，段祺瑞及皖系政客逃匿东交民巷。国民军退出北京后，段祺瑞又出面执政。4月18日，吴佩孚电令拘捕安福系政客，监视段祺瑞。20日，段祺瑞下野退居天津。

【广州国民政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建立的政权机关。1925年6月1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根据国民革命发展的需要，决定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它采用委员制代替大元帅府的一长制。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张静江、古应芬、谭延闿、许崇智、于右任、程潜、孙科、伍朝枢、戴季陶、林森、张继、徐谦、朱培德为委员，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为政府主席。下设军事、外交、财政等部。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国民政府宣布它的职责是履行孙中山遗嘱，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消灭帝国主义，对内开展国民革命运动，消灭军阀势力。为此，积极整顿内部，实现了军政、民政和财政的统一。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为北伐战争创造了条件。1926年底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武汉国民政府】从1926年12月国民政府从广州迁都武汉，至1927年7月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统称武汉政府时期。武汉国民政府设委员28人，以汪精卫为主席，下设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农政、劳工、教育、实业、卫生等部。武汉政府初期，在国民党左派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领导下，继续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斗争。它发布和实施的一些政策、命令，推动了革命的发展。武汉国民政府执行支持工农

运动的政策，新成立了农政部、劳工部，由共产党人任部长，以加强对工农运动的领导。为了发展农民运动，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了以毛泽东、邓演达等为委员的全国土地委员会。1927年3月，发表了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委毛泽东、邓演达等提出的《对农宣言》，指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基础，必须推翻这个基础，建立乡村农民政权。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国民党应当帮助农民进行夺取土地的斗争。武汉政府执行革命的外交政策，依靠人民力量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他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5月，武汉国民政府举行了第二次北伐，打败了奉系军阀的进攻，并筹划东征讨蒋。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继续高涨。但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四川军阀、广东军阀、奉系军阀对武汉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武汉国民政府的危机越来越严重。武汉政府中号称“左派领袖”的汪精卫等逐渐右转。开始公开压制工农运动和攻击中国共产党。7月15日汪精卫进行反共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由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政权变为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建立的中央政权机构。1931年11月7—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了毛泽东等64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

民委员会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朱德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到1932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属7个省苏维埃政府，即江西省、福建省、湘赣省、湘鄂赣省、闽浙赣省、湘鄂西省、鄂豫皖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中国领土内同国民党政权性质根本不同的政权，是第一个以工农兵和劳苦群众为主体的中央政府。它的建立，推动了根据地人民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和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又称福建人民政府。1933年11月18日，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高级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在福州鼓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公开反蒋。是为福建事变。11月20日，反蒋派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建立人民革命政府的提议，并推定了政府委员人选，决定以福州为首都。11月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宣告成立，公举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等11人为政府委员，李济深为主席，下设三会两部一院一局，分别由李济深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冯玉祥兼经济委员会主席（未到任，由余心清代理），陈铭枢兼文化委员会主席，陈友仁兼外交部长，蒋光鼐兼财政部长，徐谦兼最高法院院长，李章达兼政治保卫局局长。下辖闽海、兴泉、龙漳、延建四省和福州、厦门两个特别市（均在原福建省境内）。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宣言及政纲，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与中国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1934年1月，由于蒋介石派兵围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被迫解散，一些领导人相继出走海外。

【满洲国】通称伪满洲国。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制造的傀儡政权。成立于1932年3月1日。定都长春（后改称“新京”），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任执政，年号大同。第一任国务总理由郑孝胥担任。1932年9月15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它使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一切大权。1934年3月1日改称“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国务总理改由汉奸张景惠担任。溥仪名为皇帝，实为囚徒，言行均受日本人监控。由日本人任厅长的总务厅，总揽了伪政府的一切大权。伪满洲国统治中国东北13年，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人民实行残酷殖民统治的工具，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伪满洲国即被摧毁。

【冀察政务委员会】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而在华北建立的政治组织。1935年华北事变后，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日本侵略者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则日见猖獗。国民党决定改变华北行政体制。1935年11月26日，南京政府下令撤消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成立冀察绥靖公署，任命宋哲元为公署主任。12月7日，又提出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方案。冀察政务委员会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北平、天津两市。12月11日，经南京政府代表与日本代表秘密协商，决定宋哲元、王揖唐、王克敏、曹汝霖等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宋哲元为委员长。12月18日，宣告正式成立。该委员会名义上虽仍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为半独立性质机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将华北危机推向了极点。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建立的伪政权。1935年11月24日，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日军唆使下，在通县宣布独立，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25日，又改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下辖冀东22县，即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滦县、乐亭、丰润、遵化、玉田、宁河、蓟河、宝坻、平谷、三河、香河、武清、密云、顺义、怀柔、昌平、通县。殷汝耕任自治政府长官，池宗墨任秘书长。下设民政、财政等五厅。各厅县均聘用日本人担任顾问或秘书，其实权实为日本人所操纵。1935年底，冀察政务委员会建立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名义上归其领导，实际上仍是一个独立的政权。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中国蒙古族上层反动分子组织的傀儡政权。1937年10月14日，日军侵入归绥不久，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和伪蒙古军也进入绥远。在日军支持下，10月27日在德化（现名化德）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决定把1936年成立的伪“蒙古军政府”改组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定归绥为“首都”，将归绥改名为厚和浩特（现名呼和浩特）。1938年4月第一任主席云端旺楚克（云王）死去后，由副主席德王和汉奸、蒙古军司令李守信分任正副主席。该伪政府下辖锡林郭勒盟，巴彦塔拉盟、察哈尔盟、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以及厚和市公署和包头市公署。所辖地域，北与外蒙古相连，南到陕西、宁夏两省省境，包括察北和绥远的大部分地区。人口约270余万。1937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与察南、晋北两个伪自治政府联合组成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由日本人统一管辖三个伪政权。1939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任命德王为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总务委员长。9月，在日本人的策划下，由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演变

而来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正式成立。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原察南、晋北两个伪政府改为两个政厅，直隶伪政务院；原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建制撤销，所辖的巴、察、锡、乌、伊五个盟，也直隶于伪政务院。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日本侵略军扶植的蒙疆伪政权彻底垮台。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北沦陷后，由日本侵略军在北平（今北京）策划成立的地方性汉奸政权。日本侵略军侵占华北以后，为推行“以华制华”政策，于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下设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分掌行政、立法、司法职权，设立行政、治安、教育、赈济、实业、司法六部。以北洋军阀时期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发表《政府成立宣言》，日本政府通过与之签订《政治技术指导协定》和派遣顾问等方式，进行全面控制。伪临时政府及其各部的一些重大施政措施、人事调动，须由日本顾问提出意见，日本特务机关制成方案，再由伪临时政府推行。所辖区域，随着日本侵略军在军事上的进展，逐步扩大到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省及北平、天津、青岛三市。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根据汪日协定，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布解散，1940年4月成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于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实际上是在日本驻华北陆军控制下具有很大“独立性”的地方政权。它负责处理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京、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范围内的防共、治安、经济及其他伪国民政府委任的政务，并监督各省市。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被国民党政府接收，华北伪政权完全解体。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组织的傀儡政权。1938年3月在南京成立。参加的汉奸有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傅筱庵等。梁鸿志任行政院长。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后，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宣布并入汪伪政权。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精卫集团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的傀儡政权。1938年12月，汪精卫等逃离重庆，飞往越南河内，公开投敌叛国。1939年5月底，汪精卫等到日本，与日本首相平沼及陆军、外交等大臣会谈，取得日本政府支持他们建立伪中央政府的保证。8月底，汪精卫等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国国民党政纲》，通过了“以反共为本党之基本政策”，“根本调整中日关系”等提案，承认日本“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宣布以“和平反共建国”为投敌卖国的纲领。9月5日，伪国民党召开六届一中全会，成立伪中央党部，以汪精卫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2月30日，汪精卫集团与日本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承认日本侵略中国“既成事实之存在”，来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之下设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等五院，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地方政权机构有华北政务委员会、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广东等省政府，及南京、上海、汉口三个特别市政府，一个以徐州为中心包括22个县的“苏淮特别行政区”（后改为淮海省）。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汪精卫任委员长。汪伪政权成立后，与日本签订了一系列卖国协定，出卖了国家民族利益。帮助日本侵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

地进行残酷扫荡，在沦陷区进行“清乡运动”，企图肃清敌伪占领区的抗战势力，巩固其对占领区的统治。汪伪政权通过发行伪币和统制物资手段，大量搜刮民财和粮食、棉布等“战时物资”。此外，还依靠特务组织和特务武装进行法西斯特务统治。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死于日本。12日，陈公博任行政院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8月16日，汪伪政府宣布解散。抗战结束后，陈公博、周佛海等以汉奸罪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

【新民学会】五四时期的进步社团。1918年4月14日由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发起，成立于湖南长沙。学会发起人赞成梁启超在《新民是当务之急》一文中对新民的解释：所谓新民就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以建设中国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给学会取了“新民”的名字。学会起初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1918年夏开始组织部分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学会活动分为两支。一支在国内，主要是湖南；一支在国外，主要是法国。到1920年底，会员由最初的14人发展到70余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新民学会是湖南反帝反封建的核心组织，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1920年夏以后，在毛泽东、蔡和森的影响带动下，大多数会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会的宗旨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并对建党、建团问题进行了讨论。许多会员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学会实际上停止了活动。

【觉悟社】五四时期的进步社团。1919年9月16日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等于天津发起成立。其宗旨为：“本着

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规定新社员入社须有社员3人以上介绍，并经社员全体同意。社员用抽签办法决定个人代号，代表各人对外姓名。邓颖超抽的是1号，因此别名逸豪；周恩来抽的是5号，因此别名伍豪。1920年1月出版不定期刊物《觉悟》。觉悟社主要活动为研究新思潮，探讨社会改造和中国出路问题，领导天津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1919年9月21日，邀请李大钊到天津讲演，介绍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周恩来等11名社员到北京与少年中国学会等五社团成立“改造联合”。11月，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等主要领导人赴法勤工俭学，国内社员陆续求学就业，觉悟社停止了活动。半数以上的社员以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的早期组织。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建立中国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开始酝酿成立共产党组织。同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陈独秀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问题，并具体帮助陈独秀等进行建党准备工作。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推陈独秀为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11月定名为中共北京支部，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等。李大钊任书记。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陈

公博等在广州，先后成立共产党组织。此外，在日本、法国也有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主义组织。中共早期组织的名称不统一。如上海的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北京则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把中共早期组织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最早见于陈潭秋为纪念中共诞生十五周年在1936年6月7日发表的《回忆党的“一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就习惯地一律被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活动是：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论战；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创建统一的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国共产党早期从事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1921年8月成立于上海，张国焘任主任。又先后建立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武汉分部（主任包惠僧）、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广东分部（主任谭平山）和山东支部（主任王尽美）。1922年8月，总部由上海迁到北京，主任改为邓中夏，将北京党组织创办的《工人周刊》改为机关刊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要活动是出版指导工人运动的通俗刊物，开办文化补习学校，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建立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领导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在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2年5月，在广州发起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前，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运动的总通讯机关。1923年二七惨案后转入地下活动。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解散。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主办的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全称为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它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1924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定建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同时委派彭湃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主任。从1924年7月3日农讲所正式开办，到1926年9月结束，共举办了六届。第一、五届主任为彭湃，第二届为罗绮园，第三届为阮啸仙，第四届为谭植棠。1926年5—9月的第六届，由主任制改为所长制，聘毛泽东为所长，招生范围也由以广东为主扩大到全国20个省区。学员除了学政治理论外，还进行军事训练，做社会调查和参加实际斗争。周恩来、萧楚女、瞿秋白、陈延年、林伯渠、吴玉章等共产党员，都曾为学员讲授主要课程或作报告。农讲所培养了772名毕业生和25名旁听生。学员毕业后分赴各地从事农民运动，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1925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地下。1948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决议，决定恢复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全国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这标志着中国职工运动发展的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1983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新的《中国工会章程》。规定新时期工会工作的方针是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为职工说话、办事，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加强对职工的思

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技术教育，建设一支有理想、有文化、守纪律的职工队伍，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发挥联结党和职工群众的纽带作用，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社会支柱作用，发挥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到1984年底，全国工会会员已发展8000万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报为《工人日报》。

【西山会议派】1925年底结成的国民党右派集团。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中的老右派分子谢持、邹鲁、张继、居正、林森、石青阳、叶楚傖等12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上通过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鲍罗廷解雇》、《决定本党今后对于俄国之态度》等反革命决议案。发表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的党籍告同志书》等反动文告。公然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公开制造分裂。因开会地点在西山，所以也称西山会议。而参加这次会议的国民党右派也就被称为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后，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另立中央，在北京等地设立地方党部。并于1926年3月在上海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发表的宣言和纲领否定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对国民党“一大”宣言与决议作了全面修正。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集团合流。

【第三党】中国现代民主党派之一。初期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为俗称。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以邓演达为代表的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不满意蒋介石集团对政权的壑

断及其内外政策，决心另组新党。1927年11月初，邓演达等人在苏联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旨在反对南京、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此宣言在国内曾得到一部分坚持孙中山三民主义者的响应。1930年，邓演达自海外回国，于8月9日召集各地代表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会议通过了第三党题为《政治主张》的决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反蒋的口号，主张进行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实现耕者有其田。会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干事会，邓演达被选为总干事，负责编辑《革命行动》月刊。会后，第三党在全国13个省市正式建立了组织，秘密地进行推翻南京政府反动统治，复兴中国革命的斗争。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其组织机构遭到严重破坏。1933年福建事变发生时宣布解散。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八一宣言》鼓舞下，章伯钧、彭泽民等人召集原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于11月10日在九龙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恢复组织，并将党名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会议选举了以黄琪翔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机构。抗战爆发后，该党积极宣传抗日，并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民盟的团体会员。抗战胜利后，为进一步争取和平民主统一，该党于1947年2月3日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通过了章伯钧的《党务报告》，通过了关于党章、党名和党纲的决议，决议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选举产生了以章伯钧为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以彭泽民为主席的中央监察委员会。1949年9月，该党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9年11月，该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

国干部会议，决议以“共同纲领”为自己的政治纲领，确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并确定该党组织发展对象主要为医药卫生界和文教界知识分子。从此，该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是1928—1931年间在国民党内一度出现的一个在野反对派。其领袖是汪精卫，核心人物多为武汉时期国民党内的汪派人物，如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王乐平等。1927年底，汪精卫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失败。特别是1928年2月由蒋介石把持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对汪精卫派的打击，更为汪派难以容忍。1928年5月，陈公博在《贡献》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国民革命之危机和我们的错误》和《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两篇文章，提出了要求“改组”国民党的口号。进而他们在1928年5、6月间相继创办了《革命评论》和《前进》等刊物，当年冬天，他们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设在上海，下设总务、组织、宣传三部，并且在全国各省市陆续建立了15个支部，在香港、日本、越南、新加坡、法国等地还建立了海外支部。他们的政治主张：（1）反对“腐化势力”，反对蒋介石独裁；（2）提高党的权威，实行党的专政；（3）恢复农工政策，代表农工小市民的利益，确定工农小市民阶级的联合战线；（4）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建设民生主义国家；（5）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和第三国际。改组派是一个既反蒋又反共的政治派别。他们的政治主张，一时蒙蔽了不少“苦闷”而不明真相的青年知识分子，一些既害怕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又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相继加入了改组派。最多时，成员达1万

余人。改组派的活动中心主要是在上海和南京。改组派的反蒋活动，遭到了蒋介石的严厉镇压。上海、南京的机关相继遭到破坏，1930年3月29日，蒋介石的特务在上海刺杀了改组派的实际负责人王乐平，《革命评论》和《前进》等刊物也相继被查封。改组派的领导机关被瓦解，随之基层活动也停止了。1930年8月，在中原大战进行当中，改组派头目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曾联合阎锡山、冯玉祥等在北平召开反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但随着阎冯军事上的失败，“扩大会议”烟消云散，汪精卫等人绕道逃往香港。至此，改组派组织彻底瓦解。1931年1月，汪精卫在香港宣布解散改组派。

【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蓝衣社。国民党特务组织系统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民主运动的浪潮使蒋介石集团感到惶惶不安。为了稳固其独裁统治，刘健群上书蒋介石，建议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和希特勒的褐衫党，建立一个效忠蒋介石的秘密组织。1932年3月，蒋介石指使贺衷寒、戴笠、康泽等人成立。蒋介石兼任社长。下设中央常务干事会和检察会，干部人选由蒋介石核定。核心为“力行社”。经蒋介石指定，干事12人，为：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侯志明、戴笠、赵范生，以贺衷寒、康泽、滕杰3人为常务干事。检察5人，以周复为检察会书记。干事会设书记及组织、训练、军事、特务、总务等处。滕杰兼任书记，康泽兼任组织处长，邓文仪任训练处长，桂永清任军事处长，戴笠任特务处长，李一民任总务处长。中华复兴社标榜国家只应有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只有在领袖的领导下，生聚教训，加强团结。它所信奉的教条是“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它的行动纲领是拥蒋反共。

中华民族复兴社成员以黄埔军人为核心，其活动范围起初主要是国民党的军事系统，后来发展到经济、文化各个部门。侦查、绑架、审讯、暗杀、残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是他们的专门职业。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时，蒋介石宣布取消国民党内一切小组织，同时又提议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和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组织，于是中华民族复兴社分子全部被网罗在三青团和军统之内。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30年代初期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反抗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实行法西斯暴行而发起组织的一个进步团体。1932年12月17日在上海成立。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主要成员有鲁迅、邹韬奋、林语堂、胡愈之、伊罗生等。总会设在上海，在北平设有分会。该同盟“以唤起民众努力于民权之保障为宗旨”。同盟的任务是：（1）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反对在国民党统治区盛行的监禁、酷刑和处决制度；（2）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调查监狱的状况和公布国内剥夺民权的事实，以唤起舆论的注意；（3）争取公民权利，争取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同盟在宋庆龄的领导下，致力于营救被捕的民主人士和革命志士的工作。先后组织营救牛兰夫妇、陈赓、廖承志、罗登贤、丁玲、潘梓年等活动。1933年3月8日，该同盟与30多个工人、学生、作家、知识界、商人等团体成立了国民御侮自救会，积极参加民众救亡运动，这更加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端仇视。1933年6月18日，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此后，同盟被迫停止活动。

【CC系】国民党特务组织系统之一。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南京中央政府为桂系李宗仁控制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所把持。蒋介石的嫡系亲信，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果夫以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为名，把留在上海的各省市党部负责人组织起来，取名中央俱乐部。CC是其英文名称“Central Club”的缩写。总负责人为陈果夫。1928年，蒋介石在南京复职后，中央俱乐部自行解散，但原来参加这个小组织的成员在陈果夫的组织下，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929年，国民党召开“三大”后，陈果夫的胞弟陈立夫当上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国民党党务部门始为陈氏兄弟所操纵。从此，国民党内有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因此也有人把CC解释成“二陈”的英方缩写。1933年初，以二陈为中心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这是CC系的核心组织。该会以蒋介石为会长，以陈果夫、陈立夫为正副干事长，常务干事是张厉生、张道藩、余敬塘、叶秀峰、徐恩曾。这个核心组织成立后，中央干事即分赴各省市秘密组织分会，到1933年底，全国各省市党部及其基层的国民党组织，基本上为CC系所控制。从国民党“三大”到“六大”，CC系的重要分子先后都当上了中央执行委员。除此以外，还逐渐建立了许多秘密的公开的外围组织，全国性的有“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等，地方性的有南京的“青年社”，北平的“诚社”，上海的“上海协会”等。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宣布解散国民党内一切小组织，但随即又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及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组织。CC分子都被网罗在中统之中。

【生产人民党】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后，领导事变的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李济深、黄琪翔等人召开会议，决定解散

或脱离原有的党派，以集体签名的方式共同组织生产人民党。会议通过了生产人民党党纲，并公推陈铭枢为生产人民党总书记。会后，当时在福建地区的脱离国民党的分子，已解散的第三党成员，少数的中共脱党分子以及十九路军的中级以上军官均参加了生产人民党。马来西亚、越南等地的一些华侨也到福州加入了该党。生产人民党成立后，并没有开展大的活动，在福建人民政府中也不起核心领导作用。福建事变失败后，该党曾转移到香港，存在一段时间即自行解体。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救国会。1936年在上海成立的全国性抗日救亡团体。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上海知名人士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200余人，于1935年12月12日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发起救国运动，随后上海又成立了妇女救国会、文化救国会等救亡团体，并于1936年1月28日正式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救国运动的影响下，北平、南京、武汉、天津、广西，山东等地的文化界和妇女界相继成立了救国团体。于是，在宋庆龄、沈钧儒等人的号召下，1936年5月31日全国20余省60多个救国团体的代表在上海集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会，选举了宋庆龄、何香凝、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14人为常务委员。成立大会还通过了救国会宣言和《抗日救亡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宣布救国会的宗旨。“全救会”成立后，在华南、华北、西北和南京、济南、武汉等地先后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旅居海外的华侨在各地也成立了各界救国会。抗日战争时期，救国会成员的主要活动是创办刊物，宣传抗战。抗战胜利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改称中国人民救国会。全国解放后，鉴于救国会的历史任务已完成，遂于

1949年12月18日在北京宣告解散。

【新民会】日本侵略军为配合所扶植的伪政权进行殖民统治而建立的伪民众团体。1937年12月，由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操纵，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其宗旨是：“维护新政权”、“开发产业”、“发扬东方文化道德”，“参加反共战线”、“善邻缔盟，建设东亚新秩序”等。总部称中央指导部，下设总务、组织、宣传、训练四科，城郊各区设办事处，同时，设立各种职业分会。1943年，市总会直属机关的部门由科改成处，各区办事处改称分会，唯城郊仍称办事处。在沦陷区华北各省、市、县设立分会，创办新民学院、新民中学、新民小学以及新民图书馆、教育馆、识字班、体育会、妇女会、青年团、少年团等社会团体。会长是华北汉奸子王克敏，汉奸缪斌任中央指导部部长。新民会宣扬所谓“中日亲善”和“大东亚新秩序”，推行奴化社会教育，毒害沦陷区人民，并从事特务活动。随着日军的失败，新民会消亡。

【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国民党利用青年、控制青年的组织。1938年3、4月间，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1938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复兴社为核心在武昌成立，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任书记长。三青团成立后，举办“干部训练班”，调国民党党部人员（CC派）、各级政治部（政训处）政工人员（复兴社分子）、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人员（陈诚派）共约200人受训。这些“干部”受训后，即赴各地，建立各级组织。中央团部下设支团部、区团部、分团部、区队、分队各级组织，并借社会服务之名，建立“青年服务队”等各种外围组织。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将

三青团并入国民党。

【大民会】日本特务机关扶植下的一个汉奸组织。1939年9月成立于上海，总裁为梁鸿志，温宗尧兼会长，孔宪铨为本部部长。1940年3月3日发表《更新宣言》，声明拥护和响应汪精卫和平运动。1940年12月，大民会发表解散声明，宣布参加汪精卫伪国民党。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现代中国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1939年10月，国民参政会中的几个小党派的参政员和无党派人士黄炎培、张澜等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对共产党军事进攻、政治压迫，对各民主党派也实行高压政策。为加强团结，调解国共冲突，谋取自身生存，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它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协会及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在成立大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央常务委员会，初推黄炎培、后由张澜任主席，同时讨论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等文件，以贯彻抗日、实行民主、结束党治、实施宪政为号召。1941年9月，在香港创办了机关报《光明报》，宣传同盟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目标。10月10日，在香港正式发表成立宣言及纲领。1943年5月后，陆续在云南、四川、广东、广西、陕西等地建立了省支部。积极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宪政运动。1944年5月，发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对国民党排斥异己、拒绝民主的态度进行批评，为解决团结、外交、军事、经济与财政等问题提出了有益的意见。随着形势发展和内部成员发生变化，1944年9月19日，在重庆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决定改

组为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11月，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下，同盟总部一度被迫解散。1948年1月，同盟领导机关在香港重建，同时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1949年9月，同盟主要领导人张澜、沈钧儒等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民主同盟做为中国一个重要的民主党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全国妇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族工农劳动妇女、革命知识分子中的妇女及其他劳动妇女、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妇女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妇女的群众组织。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在北平（今北京）召开了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妇女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和《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章程》，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简称民主妇联。何香凝、张琴秋、康克清等51人被选为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何香凝为名誉主席；蔡畅当选为执委会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为副主席，区梦觉为秘书长。1957年9月中国妇女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改称今名。1983年9月，召开了中国妇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规定：妇女联合会的全国领导机构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其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全国妇联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书记处书记，具体领导全国妇联的工作。1993年9月1日在北京人大会堂召开中国妇女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会议代表1100人。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启璪向大会做了《全国妇团结起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向大会祝词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妇女

“七大”三次全体大会上做了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报告。在全国妇联七届一次执委会上选举了妇联的领导机构，陈慕华继续提任全国妇联主席，选出副主席 13 人：黄启瓌、张帼英、林丽韞、赵池、聂力、阿沛·才旦卓嘎、玛依努尔·哈斯木、郝治纯、何鲁丽、孔令仁、韦钰、王淑贤、刘海荣。会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常委会成员 28 人。全国妇联的机关刊物是《中国妇女》。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我国重要的人民团体。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原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它是 1919 年五四运动的重要产物。1920 年夏天，中共发起组（即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同年 8 月，首先在上海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 10 月，毛泽东在湖南准备建党的同时，也开始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此前后各地在准备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时，相继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中共直接领导下，于 1922 年 5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了一大，成立了全国统一的组织。1925 年 1 月，在团的全国三大上，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5 年 11 月，中共为着团结一切抗日青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决定把共青团组织改造为民族解放性质的抗日救国的青年团体。自此，全国先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青年抗日救国团体。在国民党统治区，有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武汉青年救国团、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和抗日战争后期的民主青年同盟等，在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敌后根据地，有青年救国会和青年抗日先锋队。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中共中央于 1946 年 10 月提议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责成各中央

局、分局在东北、华北、华东、西北试办。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成立团中央机构。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2月，成立了以任弼时为首的全国筹备委员会。4月11—1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今北京）召开。出席的正式代表340人，代表全国19万团员。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纲领》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正式宣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团章》规定，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大会选举任弼时为团中央名誉主席，选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冯文彬任团中央书记，廖承志、蒋南翔为副书记，并决定出版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1957年5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1988年5月共青团召开了十二大。1993年5月3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召开。团中央的机关报刊是《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核心力量的各青年团体的联合组织。1949年5月4—11日，在北平（今北京）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总会。1953年6月改名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1958年4月改称今名，简称全国青联。是我国各族青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其基本任务是：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团结教育各族各界青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

断提高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觉悟，学习现代化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把中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祖国统一，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奋斗。1983年3月23日，全国青联六届一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章程》。

【全国青联七届一次会议】于1990年8月19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鹏到会祝贺，共青团第一书记宋德福祝贺词。8月23日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新一届领导机构。44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刘延东再次当选全国青联主席，选出副主席13人。洛桑、李源潮、张宝顺、李克强、吴英辅、倪以信、盛承发、张蓉芳、策墨林·单增赤列、秦大河、关牧村、霍震寰、杨岳。会议还选举了全国青联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92名。由主席提名，决定俞贵麟为全国青联七届常委会秘书长。大会通过关于修改《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章程》的决议。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由原国民党民主派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创建的一个民主党派。是它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和中国统一事业的政党，是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的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为了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权，1945年10月，由谭平山、柳亚子、王昆仑等人组织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6年春，国民党内民主分子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人组织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1946年7月，全

面内战爆发后，民促、民联都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开展反蒋斗争。1947年国民党内各民主组织的领导人和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先后到达香港。11月12日至1948年1月1日，在香港举行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联合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等16人为常务委员，朱学范、梅龚彬等71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柳亚子、李锡九等18人为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监察委员，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时发表宣言，明确提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1948年5月，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1949年9月，民革、民促、民联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共同纲领的制定。同年11月，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代表会议，决定将民革、民促、民联和国民党其他爱国人士进一步统一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民促宣告结束），团结推动所属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促进祖国统一贡献力量。民革现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有党员约4万人。朱学范、侯镜如、孙越琦为名誉主席，现任主席为李沛瑶。民革中央机关报为《团结报》。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以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是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前身为1939年冬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月改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同年10月10日于重庆正式宣告成立。由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名为民主社

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协会及其他人士联合组成。其政治纲领主要是贯彻抗日、实现民主、结束党治、实现宪政。黄炎培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会临时主席。不久,黄炎培辞职,由张澜继任主席。1944年9月,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取消“政团”二字,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参加。1945年10月,民盟在重庆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追认为民盟史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民主同盟纲领》等文件。1946年1月,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10月,国民党政政府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地方组织和成员转入地下。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成立临时总部,恢复领导机构,公开宣告与中国共产党一道为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同年5月,通电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1949年3月,民盟总部由香港迁到北平。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民盟主席张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盟制定了接受中共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确定了其工作和发展的对象主要为从事文教工作的知识分子。民盟现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有盟员约10万人。现任主席为费孝通。民盟中央机关刊物为《群言》杂志。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主要是由经济界人士及有关专家学者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是

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成立。发起人有黄炎培、胡厥文、施复亮、章乃器、孙起孟等。1946年4月，总部由重庆迁到上海，在重庆和上海分别设立分会。民建成立后，积极投入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5月，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1949年9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建确定了接受中共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组织推动会员和所联系的民族工商业者进行学习和自我教育，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1955年4月，民建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准则。民建目前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现有会员5万多人。现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为孙起孟，副主席为陈邃衡等11人。朱元成兼秘书长。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由从事文教、出版、科学和其他工作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政党，是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主要发起人有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等。民进“以发展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积极参加了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1月，民进发表《对于时局的宣言》，并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建议书》，强烈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民进与上海市67个人民团体联合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1947年底，被迫转入地下。1948年5月，积极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进于1950年4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接受中共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团结推动会员和所联系的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为文教、科学、出版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民进目前在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现有会员4.8万余人。现任名誉主席为谢冰心，主席为雷洁琼，中央参议委员会主席为赵朴初。民进中央主办的刊物为《民主》杂志。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主要由医药卫生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界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所组成，具有政治联盟的特点，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是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农工党的前身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于同年11月在苏联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在国内，谭平山、彭泽民、章伯钧等与邓演达相互呼应，积极进行组织第三党的活动，并在1928年春组织了中华革命党，选举正在海外的邓演达为中央总负责人（由谭平山代理）。并公布了《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1930年5月，邓演达自海外回国到达上海。8月9日，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把党的名称正式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俗称第三党。通过决议《我们的政治主张》，成立了中央领导机构，邓演达为中央干事会总干事，负责主编《革命行动》月刊。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1933年组织宣布解散。1935年11月，在中共《八一宣言》的鼓舞下，章伯钧、彭泽民等人在九龙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恢复党的组织，并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

委员会”，选举黄琪翔为总书记，由章伯钧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3月，在汉口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发表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推定章伯钧为总联络人。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7年2月3日，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易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选举章伯钧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彭泽民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其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被迫转入地下，总部迁至香港。1948年5月，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宣布接受中共领导。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现任名誉主席为周谷城，中央委员会主席为卢嘉锡，中央咨监委员会主席为沈其震，中央机关刊物为《前进》月刊。

【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党。以归侨、侨眷和与海外有联系的代表性人士、专家、学者组成的、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政党，是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其前身是美洲洪门致公堂。辛亥革命时期，侨居在美洲的洪门致公堂曾追随和资助孙中山，对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作出了贡献。1925年10月，以洪门致公堂的人员和在港、澳的洪门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举行洪门团体代表会议（洪门恳亲大会），决定以美洲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组织成立华侨政党——中国致公党。1931年，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在香港设立总部。抗日战争时期，致公党号召各地组织积极支援抗战。1947年5月，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宣言和告海外同胞书，决议参加以中共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主张为中国政治民主化而奋斗。大会选举陈其尤为副主席（主席为李济深，未公开）、陈演生为秘书长，

主持中央党部日常工作。1948年5月，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致公党在国外的成员主要是在美洲和东南亚的爱国华侨，他们对祖国的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斗争给予了积极支持。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1950年4月，致公党在广州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接受中共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路线，决定把总部由香港迁至广州。1952年11月，致公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致公党发展组织的对象主要是归侨、侨眷，并决定将总部迁到北京。目前致公党在全国归侨、侨眷比较集中的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党员1万多人。现任名誉主席为黄鼎臣，主席为董寅初。

【九三学社】由科技、文教、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是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原名“民主科学社”。1944年底，在重庆的许德珩等一批爱国的学术界人士，为坚持团结抗战和争取民主，组织成立了“民主科学社”。1945年9月3日，为纪念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决议改名为“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代表50余人，选举潘菽、张雪岩、褚辅成、许德珩等16人为理事，卢于道、侯外庐、黎锦熙、梁希等8人为监事。同年10月，九三学社中央迁到北平。在重庆、上海、南京等地设有分社。解放战争时期，九三学社积极参加了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成为在北方活动的重要民主党派之一。1949年1月，北平被围期间，九三学社发表宣言，响应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

和平主张，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同年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现任名誉主席为严济慈、周培源，主席为吴阶平，参议委员会主任为王淦昌。中央机关刊物为《民主与科学》杂志。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由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台湾省籍人士组成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是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1947年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后，由一部分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的台湾省籍人士发起，于同年11月12日在香港召开台盟筹备会第一次会员代表会议，通过了台盟的纲领、章程等文件。12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其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一切阴谋活动，反对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实行人民民主制度。1948年5月，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8月，台盟总部成立，谢雪红为总部负责人。1949年台盟在北平设立了办事处。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台盟由一个地方性的政治组织成为中国的一个民主党派，制定了接受中共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团结推动盟员和所联系的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反对外国侵略台湾而奋斗。台盟中央由香港迁大陆后，初设于上海，1955年迁至北京。现台盟在台胞较多的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福建等13个省、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在台湾省籍的人士中发展盟员。盟员中多数是文教、科技、医药卫生界的知识分子。现任台盟中央名誉主席为苏子蘅，主席为蔡子民，评议委员会主席为李纯青。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全国工商联。是中国工商界组织的人民团体，民间的对内对外商会，各级工商联的全国性组织。是中国爱国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1949年，工商界作为一个方面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51年10月，周恩来提议成立工商业联合会。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规定了工商联的组织构成和基本任务。1953年10月23日至11月12日，全国工商联举行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宣告全国工商联正式成立。陈叔通当选为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李烛尘等13人为副主任委员，沙千里为秘书长。1979年10月，召开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胡子昂为主任委员，并修订了章程。1988年11月，召开全国工商联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工商联是统一战线组织和对内对外民间商会。它的主要特征是统战性、民间性和经济性统一。全国工商联现有会员50多万人，建立的县以上地方组织有1700多个。现任主席为荣毅仁。主办的出版物有《工商时报》和《中国工商》杂志。

【李顿调查团】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际联盟派往中国东北地区调查中日军事冲突的组织。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日军侵略，却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把事件的解决寄托在国联的“调停”上。为保障西方帝国主义在华利益，11月21日，国联大会通过了派遣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的决议。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五国派员组成，由英国前代理印度总督李顿任团长，故称“李顿调查团”。国联组织调查团的目的是防止日本独占中国东北，力图把中

国东北变成国际帝国主义共管地区。李顿调查团来华后，经过半年多的活动，于1932年10月2日公布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报告书承认了若干基本事实，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行也作了一定的揭露，但其主要内容却是提出了一个对中国东北实行“国际共管”的方案。报告书的发表，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0月6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政府即发表《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号召“全国的民众武装起来，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之下，以革命的民族战争来撕碎李顿的报告书”。全国各大报刊，除国民党的报刊外，对报告书几乎是一致反对。然而，国民党政府认为报告书“明白公允”，并于10月26日，命令中国出席国联的代表对报告书原则表示接受。由于中国人民的反对，以及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国际共管中国东北的方案未能实现，李顿的报告书成了一张废纸。

【美国军事顾问团】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政府为了援助国民党政府进行内战而派遣来华的军事组织。于1946年3月19日在南京正式成立。麦克鲁任团长，由美国陆军750人、海军250人组成。全团官兵共约1000人。负责对国民党政府军队的陆、海、空军和后勤部队施以美式装备和训练。美国还派遣9万多名海军陆战队驻扎在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地，最多时达11万人。为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运送蒋军54万人至内战前线，装备蒋军45个师，训练蒋军达15万人。1948年11月，扩大为驻华美军联合顾问团，人数增加到1万人左右。到1949年1月27日，宣布“停止工作”。随后撤出中国大陆。

【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解放战争初期国共双方根据停战

协定组成的调处军事冲突的机构。规定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政府代表各一人组成。三方代表有同等的表决权，由美方代表任主席，一切事宜均须经三方一致通过。军调部设立于北平。下设若干执行小组，仍由三方人员组成，分赴各冲突地点对国共双方的争执进行调处。1946年1月14日军调部在北平正式成立，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中共代表叶剑英、美方代表罗伯逊三人组成。军调部的执行机构为执行科，以美方白罗德为主任。军调部派往各地的执行小组先后达36个。由于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的政策和美方处处偏袒国民党，军调部无法有效地对各地的军事冲突进行调处。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8月10日，马歇尔表示“调处”失败，军调部随之名存实亡。1947年1月29日，美国宣布退出，军调部随之结束。

【中统】又称中统局。全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国民党CC系陈果夫、陈立夫控制的全国性特务组织，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发展而来。1926年5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陈立夫任科长，专门收集有关共产党的情报。1932年，改为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同年4月，蒋介石为统一特务组织，将党务调查处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合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辖第一（党务）、二（军警）、三（邮电检查）处。1938年3月，经蒋介石提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以第一、三处为基础，建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同年8月正式建立，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任局长，徐恩曾为副。中统以党政机关、文化团体和大中学校为活动重点，以国民党各级党部为活动基地，在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和铁路、公路特别党部内设立各级组织，建立广泛

的“党务调查网”，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国民党内的不同政见者及不满国民党统治的民主人士进行调查、监视、逮捕和审讯等特务活动。1947年4月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1949年3月又改为内政部调查局，后迁台湾。

【军统】 又称军统局。全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蒋介石设立的规模最大的特务机构。前身为1932年3月建立的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1932年4月，蒋介石为统一特务组织的管理，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辖第一、二、三处，复兴社特务处改为第二处（军警处）。1938年3月，经蒋介石提议，将第二处扩大，仍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同时第一、三处改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同年8月，军统正式成立，贺耀祖任局长，戴笠为副局长，负实际责任。1940年戴笠升任局长。军统内勤组织设有各种处、室和委员会；外勤组织在各地设立办事处、区、站、特别组及直属情报员。在国外亦设有站和组。抗日战争时期，军统特务组织发展迅速，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拥有各种武装特务五六万人，渗透到国民党政府机关、军队、警察、交通运输各机要部门，并打入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内部，从事情报搜集、监视、绑架、关押、刑讯、暗杀、造谣、挑拨离间等活动。1943年，与美国海军情报署合作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重庆磁器口、贵州息峰、陕西西安、江西上饶等地设立监狱和集中营，囚禁和杀害了大批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及进步青年。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死后，郑介民继任局长。同年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军统的公开组织成员与军委会军令部第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郑介民任厅长。其秘密核心

部分则组成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为局长。1949年撤退台湾。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或中美合作所。抗日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政府镇压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联合特务机构。1942年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美国海军情报署决定合作组织联合情报特务机构。次年4月，军统头目戴笠和美国特务梅乐斯主持签订第一次合同。5月，中美合作所在重庆磁器口杨家山正式建立。戴笠任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中方参谋长李崇诗，美方参谋长贝乐利。1944年秋，双方签订补充合同，由美方给军统提供大批新式器材、武器，并帮助训练特务。中美合作所下设军事、情报、心理作战、气象、行动、交通运输、经理、医务、总务等9个组和一个总办公室、一个总工程师处。在重庆磁器口的白公馆和渣滓洞设有庞大的集中营。在福建建阳设有东南办事处，辖上海、闽侯、定海、漳州4个情报站。并先后在全国各地设有训练班，训练装备特务5万多人。逮捕、囚禁、残杀了大批中国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美国通过中美合作所获取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情报及气象水文资料。1946年3月宣布撤销，所属集中营全部移交给国民党特务机构。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毛泽东提议于1964年7月成立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面对批判《海瑞罢官》以来思想理论界的形势，1966年2月3日五人小组由彭真主持召开有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参加的扩大会议。彭真首先说明：已经查实吴晗与彭德怀、《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无关系。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对待。会议讨论了目

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放”的方针、学术工作队伍、左派要相互帮助等问题。2月4日许立群、姚溱根据讨论结果整理成《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2月5日刘少奇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予以通过。2月7日电告在武汉的毛泽东。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2月11日彭真在武汉代中央起草了转发该提纲的批语，12日晨连同提纲一起电传中央。经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传阅后，即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这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遭到批判时被简称为“二月提纲”。提纲认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在边争、边学中锻炼出一支又红又专的学术队伍”；主张在讨论中摆事实讲道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在讨论中还要划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在报刊上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提纲的意图，是想对学术批判运动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的约束，把运动置于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以此为指导，中共中央宣传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五一六通知》说这个提纲是彭真一个人的，是他背着康生等人制造出来并盗窃中央名义匆忙发给全党的。这个指责完全不符合事实。

【二月提纲】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中央文革】根据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直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文化大革命”指挥机构。1966年5月28日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同年8月2日中共中央又任命陶铸兼任顾问并排在康生前面。组员后来又补充4人，即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分别代表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个大区中央局。他们只在运动初期参加文件起草时的会议，日常工作仍在原单位。8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在陈伯达病假或离京期间由江青代理组长。1967年8月以后，由于陶铸、王任重、刘志坚先后被“打倒”；谢、尹、穆被排挤；王、关、戚被隔离审查，所以中央文革小组只有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5人。1967年2月之后，它逐步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掌握了很大一部分权力。1969年中共“九大”后停止了活动。

【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地方临时性权力机构。1967年，各地方政府相继被夺权，5月，毛泽东发出了“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的指示。这种机构的形式曾被1975年和1978年宪法确认，将原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称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修正宪法的若干规定，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五七干校】1968年5月7日，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他们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10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经验，并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各地纷纷办起各种形式的“五七干校”，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到干校参加体力劳动，进行所谓的思想改造。这种以歧视知识分子，片面强调体力劳动意义的“五七干校”，不仅造成人力物力的大量浪费，消耗了大批专家学者的宝贵时光，而且给林彪、江青一伙以可乘之机，在许多单位变成迫害异己、惩治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停办“五七干校”的通知，各地“五七干校”从此陆续撤销。

文 献

【新青年】五四时期杂志。月刊。1915年9月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刊并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为本名。以反对封建主义，提倡民主科学为办刊宗旨。1917年迁往北京，积极倡导新文化运动。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鲁迅等

参加了刊物编辑、撰稿工作。1919年迁返上海。1920年9月第八卷起改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刊物。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在广州复刊时改为季刊，由瞿秋白主编，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1925年4月起出不定期刊，1926年7月停刊。

【湘江评论】五四时期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出版物。毛泽东创办和主编。1919年7月14日创刊。内容分湘江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新文艺等。发刊主旨是宣传最新思潮。刊物文章大都为毛泽东所写。他在第2、3、4期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掀起的世界革命高潮，号召人们无所畏惧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封建伦理道德，提出以民众的大联合来改造黑暗的社会。《湘江评论》虽在长沙创刊，但影响及于全国。创刊号2000份，当日即售一空，又重印2000份。从第2号起，改印5000份。北京的《每周评论》曾对《湘江评论》加以评介说：“《湘江评论》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2、3、4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湘江评论》共出5期，另有《临时增刊》第一号1张。第5期末及发行即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

【训政时期约法】南京国民政府颁行的“训政时期”的根本大法。为了从法律上确定其统治的“法统”地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1928年8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就提出了制订训政时期约法的主张。但因不久连续发生了国民党各派新军阀的混战，约法的制订不遑顾及。1930年蒋介石集团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正式作出决定，于1931年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随

后，成立了由王宠惠、吴稚晖主持的约法起草委员会。5月1日，国民党召开三届中央第一次临时全会，审议通过了约法草案。5月5日至17日，国民会议在南京召开，全案通过，并交国民政府于1931年6月1日公布施行。训政时期约法共8章89条。其核心是“第三章训政纲领”，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所有法律的制定、行使以及解释权均属于国民党中央。约法对“人民之权利义务”也作了规定，虽也有“人民之财产非依法律不得查封或没收”；“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等条款，但实际上国民政府可以随意制订具体法规剥夺人民权利而不受约法的束缚。约法还规定三民主义为教育根本原则，所有公私教育机关均有推行三民主义义务。训政时期约法的制定及公布，使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政治体制用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淞沪停战协定】 又称《上海停战协定》。1932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政府在上海签定。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驻防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战。蒋介石却采取不抵抗政策，在英、美、法等国“调停”下，于3月3日宣布停战。3月14日，中日双方代表在英国领事馆进行谈判。5月5日，南京政府代表郭泰祺与日本特命全权公使重光葵分别代表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双方自签字之日起停战；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第十九路军撤防，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而日本却可驻兵上海。《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

【塘沽协定】1933年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关东军在塘沽签订的停战协定。1933年4月，长城抗战失败，日本关东军进入华北，直逼平津。5月31日，国民党政府的代表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茨在塘沽进行谈判，并签订了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其主要内容为：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上述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地区为非武装区域，中国不得驻扎正式军队；日军为确认第一项实行的情形，可随时使用飞机或其他方法视察，中国方面应予保护并提供方便；日军在确认中国军队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线追击，并自动归还于长城之线。协定的签订，国民党政府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及热河的占领，并使中国失去对绥东、察北、冀东的完全统治权，打开了华北门户，加剧了华北危机。

【何梅协定】国民党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经过会谈订立的秘密协定。1935年，日本侵略军为进一步控制华北，借口天津两家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系中国人所为，同时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因而由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于5月29日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并进行武力威胁。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觉书”，限三日内答复。经何应钦与日方秘密会谈后，达成《何梅协定》，于7月6日复函梅津，全部承诺日方的无理要求；取消河北省内及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解散国民党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并禁止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平津两市市长等。何梅协定使中

国丧失了河北省大部分主权，扩大了日军在华北的势力。

【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共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发表的宣言。1935年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确定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于8月1日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再次向全国同胞呼吁：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倡议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一切愿意抗日的军队共同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实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言号召全体同胞总动员，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武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八一宣言首先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上刊登，后辗转传入国内，在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抗战建国纲领】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纲领。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昌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纲领除前言外，分为总则、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等7项，共32条。总则规定：“确定三民主义及总理遗教”为抗战建国之“最高准绳”；“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对外政策，主张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否认及取消一切伪组织。对内政策，军事上：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之一致为国效命；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

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规军配合作战；在敌后发动普遍的游击战。政治上：组织国民参政会；改善各级政治机构。经济上：进行以军事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民众运动方面，提出在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之保障。这个纲领，对于抗战初期的民主运动和推动抗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为了团结抗战，利用和发挥国民党的抗战力量，中国共产党对该纲领表示赞助，并力争使其向进步的方向发展。

【论持久战】毛泽东论述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基本问题的著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统治区大片国土沦陷，使一部分群众产生了对抗战的悲观情绪。国民党政府中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宣扬“再战必亡”论。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则希望依赖外力的援助或日本国内的变化，迅速结束战争。速胜论也使一些共产党人产生轻敌思想。共产党必须彻底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给全国人民指明胜利的前途。为此，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讲演。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战争双方基本特点，是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策和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毛泽东预见持久战的发展过程。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战略进攻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指出抗日战争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对全国军民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发动其全部积极性，这样

才能争取最后胜利。此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也是重要的军事哲学著作。

【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日,阴谋反共的反动文件。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的政策,逐渐将其主力移向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政府也将政策的重点转到反共反人民方面。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方针,设立“防共委员会”,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反人民的文件。指出要在军事、党政和行政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府,严禁第十八集团军的发展,取缔共产党的抗日民众运动及所组织的抗日群众团体,禁止共产党进行抗日宣传和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不许共产党所办的报纸、杂志、书店及印刷所等继续存在,等等。在反共文件指导下,国民党政府加紧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大造反共舆论,加派军队封锁陕甘宁边区,增派军队前往冀鲁等地以限制共产党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论述中国革命的著作。1940年1月,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妄图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又在舆论上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应中国国情”,要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专制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幻想走“中间道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了粉碎国民党的进攻,驳斥其谬论,打破民族资产阶级的幻想,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指出,中国从五四运动后,无产阶级成为一个党

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中国革命已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是新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革命领导权必须是属于无产阶级，而不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相互关系。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革命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纲领，即：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纲领；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并促使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实行“节制资本”的经济纲领；发展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它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指导中国人民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强大思想武器。

【日汪基本关系条约】即《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汪伪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卖国条约。1940年11月30日在南京签署。条约以日本近卫首相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为基础，以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在上海与日本秘密订立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内容为标准。在“两国共同防共”口号下，规定日本“在所要期间内”得“驻屯所要之军队于蒙疆及华北之一定地域”，实际上就是要把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和内蒙地区

的侵占永久化。在“为确保两国共同利益”的口号下，规定日本“在所要期间内”“得驻留其舰船部队于中华民国领域内之特定地域”，主要是“长江沿岸特定地点并华南沿岸特定岛屿及其关联地点”，而且“日本国船舰得自由出入并碇泊于中华民国领域内之港湾水域”。规定在“长短相补、有无互通”的原则下，“应行两国间之紧密的经济提携”，即允许日本任意开发“华北及蒙疆之特定资源，尤其国防上必要之埋藏资源”，在这些资源的利用上应“予日本国及日本国臣民以充分之便利”。《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实际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附属国的关系条约。

【中英新约】全称《中英关于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特权之条约与换文》。1941年，太平洋局势日趋紧张，美国为利用中国力量拖住日本，减轻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决定取消在华特权，并就此事与英国磋商，取得英国的同意。1942年10月，美国公布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有关特权的文告后，中、美、英就订立新约问题进行谈判。同时，日本为加强汪伪政权的欺骗性，决定将九龙香港以外的租界、治外法权及其他各种特殊事项，予以迅速调整以至废除。1943年1月9日，日本与汪伪政权签订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销和废除治外法权之协定》。日本的举动使英美加速与中国谈判的进程。1月11日，在中美双方签订《中美新约》的同时，中国代表宋子文与英国代表黎吉生、薛穆在重庆签订《中英新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有：英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取消英国及他国政府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与中国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终止该条约及附件中给予英国政府的一切特权；北平使馆界、上海和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与管理权，天津和广州英租界的行政与管理权，移交给中国政府，终止上述租界内英国

政府之一切权利等五项条款。《中英新约》和《中美新约》只是把由于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眼看不能再继续保留的不平等条约及其特权放弃，并借此来抬高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地位。而且英国政府坚决不肯放弃根据不平等条约攫取的香港和九龙的主权，所谓的“平等新约”并没有改变中国与英美帝国主义之间的不平等的实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政治地位仍旧没有改变。

【中美新约】全称《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美国为了利用中国的力量抗击日本，减轻自己对日作战的损失，提高国民党蒋介石的国际地位，以维持其对中国的统治，决定放弃在华特权，改订新约。1942年10月9日，美国副国务卿约见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面交其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有关特权的文告，并于次日公布。经过两国代表谈判，1943年1月11日，魏道明和美国国务卿赫尔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华盛顿签署《中美新约》。条约的五项条款，只是美国被迫将由于中国人民的长期斗争和日本的侵略而化为乌有的美国在华特权放弃，国民党蒋介石大肆宣传，把它说成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但文字上废除不平等条约，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实质。美国在以后又通过新的不平等条约，将国民党蒋介石牢牢控制，借以继续压迫和掠夺中国人民。

【中国之命运】书名。陶希圣执笔，1943年3月10日以蒋介石名义由重庆政中书局出版。全书共8章，是蒋介石系统地阐述其世界观、伦理观与政治主张，宣扬法西斯独裁思想的代表作之一。该书曲解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鼓吹大汉族主义，认为“中

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极力歪曲中国近代历史，把“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大害”、“建国失败的主要原因”，仅归结为与列强订立不平等条约。提出“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企图转移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书中大肆宣扬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思想的合理性，声称封建伦理道德是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重提蒋介石所谓心理、伦理、社会、政治、经济“五项建设”的老调，并把封建时代的乡社作为“建国的根本”。作者吹捧蒋介石的“诚”的哲学（即力行哲学），把建立力行哲学说成是“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宣扬“一个主义”“一个党”，认为蒋记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宣称“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没有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攻击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说共产主义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是有害于国家民族的。称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诬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是“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扬言要以武力解决中国共产党。《中国之命运》宣扬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自由主义，集中反映了蒋介石集团极端反动的政治思想和主要政策，为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提供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起了极其反动的作用。

【双十协定】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重庆举行谈判。通过谈判，双方于1945年10月10日签署协定，故名“双十协定”。《会谈纪要》列入12个问题，即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关于人民自由问题；关于党派合法问题；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关于释放政治犯问

题；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关于奸伪问题；关于受降问题。其中仅少数几项达成协议。在军队、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双十协定”公布不久，即被蒋介石公开撕毁。虽然如此，但“双十协定”的签订仍有其意义，它教育了广大人民，特别是中间势力，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使国民党当局陷于被动。

【停战协定】即《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协议。1945年《双十协定》签订后，在国内外要求停止内战的呼吁下，1946年初，国民党政府表示同意中共代表团1945年12月27日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提议，派出代表张群、邵力子、王世杰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在重庆进行商谈。1月5日，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由张群、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宣布：一切战斗行动立刻停止；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所有阻碍该项交通线之障碍，应即拆除；为实行停战协定，应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政府三方面代表组成。与此同时，蒋介石、毛泽东分别向所属部队颁发了定于1月13日午夜12时起生效的停战令。

【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又称《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颁布，故又简称为《五四指示》。“指示”决定将抗战胜利后继续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

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五四指示》全文共 18 条，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 1—10 条，规定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总原则和有关政策。这 10 条可以说是 1 条批准，即批准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其他 9 条是对围绕这一总原则所要实施的各项具体政策作了规定。第二部分是第 11—12 条，分别规定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和分配果实的办法。第三部分是第 13—18 条是在解决土地问题运动中及土地问题解决后其他有关政策规定。《五四指示》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坚决地支持和引导广大农民群众，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把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而占有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由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一个时期的削弱封建剥削向变革封建土地关系、废除封建制度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重要改变。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1946 年 11 月 4 日签订。由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署。共 30 条。其主要内容是：双方国民可以在对方领土境内享有“居住、旅行及经商自由”；双方商品在彼方享有与该国商品的同等待遇；双方船舶包括军舰可以在彼方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条约》名为“平等”、“互惠”，实质上是不平等的。《条约》的签订，使得经济、军事和运输力占有绝对优势的美国获得极大的利益，美国的人员、商品和轮船、军舰在中国领土、领水上可以任意横行；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由于经济、军事实力落后，根本不可能享受《条约》规定的权利。《中美商约》签订后，国民党政府又同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航空协定》（又称《中美空中运输协定》）以及海军、农业、铁路、教

育等一系列协定，把《中美商约》进一步扩大和具体化，中国的主权被国民党政府出卖得一干二净，用以换取美国对其经济与军事上的支持和援助。

【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12月25日在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国民大会上通过的一部资产阶级宪法。1947年1月1日公布，同年12月25日开始实施。《宪法》全文共14章175条。这部宪法，完全违背了政协决议精神，虽然表面上写进一些民主的词句，但实质上是1936年《五五宪草》的翻版，是一部独裁的宪法。《宪法》只是表面上规定了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权利，实际上利用补充条款一笔勾销了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宪法》违背了政协决议的联合政府责任内阁制的原则，实行总统独裁制，赋予总统以无限的权力。《宪法》违背了政协决议关于中央与地方“采均权主义”，“省长民选”，“省得制定省宪”的原则，坚持中央集权制。《宪法》表面上维持着立法院对行政院的“同意权”和“不信任权”，实际上在国民党控制了行政院，而立法委员中绝大多数又是国民党员的情况下，立法院对行政院起不了制衡作用，行政院只能是总统个人意志的执行机关。这部宪法其实质是以根本大法的形式，为蒋介石的独裁披上“合法”的外衣。这一部由国民党反动派一党把持，代表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利益、个人独裁、反共反人民的伪宪法一出笼，即受到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及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与抵制。

【戡乱总动员令】即全国总动员令。又称《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1947年7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通过，7月5日正式公布。“总动员令”的基本内容是攻击、诬蔑中

国共产党“拥兵割据，扰害地方，武力叛国”，“拒绝参加国民大会”，“拒绝政府派员赴延商洽和平之建议”等。重申国民党政府“戡平共匪”的决心，要求“全民一致奋起”，“全国军民集中意志，动员全国力量”，“扫除民主宪政之障碍，达成和平建国之目的”。国民党政府颁布“总动员令”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挽救其军事上的失败，加强国民党反动统治，更大规模地搜刮民财民力，乞求美国的援助。之后，还相继发布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等项法令。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发表此文。它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的经验，阐明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以及新中国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指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权。并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唯一的路，只能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它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纲领，奠定了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这篇文章和同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构成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政治基础。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又称《双十宣言》。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0月10日，由毛泽东起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八项基本政策。《宣言》号召：“全军将士必须提高军事艺术，在必胜的战争中勇猛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它既概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又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根本愿望，因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同中国，特别是1944—1949年期间的关系》的白皮书。这是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一场关于对华政策失败责任争吵的产物。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崩溃，宣告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破产。以麦克阿瑟为首的反对派攻击和责难当权的杜鲁门、艾奇逊“援蒋不力”，应对此负责。杜鲁门、艾奇逊等人为了替自己辩护，被迫抛出中美关系“白皮书”。“白皮书”以1949年7月30日艾奇逊给杜鲁门的信为序言，概述了该书的主要思想。“白皮书”正文共分八章，另有186个附件。叙述从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中美望厦条约》以来，直到1949年初的中美关系，其中特别详细地披露了1944—1949年美国实施扶蒋反共政策，干涉中国内政遭到失败的经过。“白皮书”中除公布了一些有关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南京政府进行内战的材料和指责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之外，还极力美化美国侵华的历史，把100多年来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说成是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援助”，诬蔑和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宣扬唯心史观，并寄希望于中国

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这样，“白皮书”的发表，客观上便成为美国侵华罪恶的自供状。为教育全国人民，毛泽东从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连续为新华社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5篇评论文章，驳斥了“白皮书”对中国革命的歪曲和诬蔑，揭示了中国革命发生、壮大直至胜利的原因，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的经验 and 重大意义，号召人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共同纲领】 全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共同纲领》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负责起草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共同制定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奋斗的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基础。《共同纲领》除序言外，共有7章60条。“序言”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宣告结束。中国人民由被压迫阶级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各章分别为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及各项政策的总原则。《共同纲领》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所建立的统一的部队；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使存在着的5种经济成份能够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文教政策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发展科学文化；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互助，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外交方面，以保障国家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共同纲领》是人民革命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的大宪章，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在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前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是中国政府和全体人民的行动准则。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951年4月下旬，原西藏地方政府派出阿沛·阿旺晋美等5名全权代表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等举行谈判。经过多次协商，就和平解放西藏达成了协议。5月23日，双方在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共17条，主要内容是：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现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

【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为改变财政经济困难状况，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

而做出的决策。1950年2月13日—25日，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财政经济会议，3月3日，政务院第二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并颁布《决定》，要求：第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使国家收入中主要部分归国库，集中使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第二，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所有的重要物资集中由中央管理使用；第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把所有属于政府但分散在各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从而减少市场上货币流通数量，增加国家能够使用的现金。《决定》的实行使国家掌握了主要的财政收入、资金和重要物资，掌握了财政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由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颁布命令，6月30日公布施行。共6章40条，主要内容有：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工商业，不得侵犯；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财产、保护中农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受侵犯；此外，对山林、鱼塘等特殊土地问题的处理，对土改的执行机关和执行方法，以及对违抗或破坏土改法令的罪犯的审判与处分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1953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经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规定了基本任务：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

展手工业合作社，以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以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到1957年底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底提前完成了计划规定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1952—1957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28%，年均增长18%；农副业总产值增长25%，年均增长4.5%。粮食总产量由1952年的3088亿斤增加到1957年的3700亿斤，钢产量由135万吨增加到535万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社会制度的根本大法。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共4章106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和根本政治经济制度、国家机构的活动原则、公民的权利义务等。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写入了总纲。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第二部宪法。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颁布了第三部宪法。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于1954年10月16日为两个年轻人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而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人员的信。1954年秋，两个青年人李希凡、蓝翎合写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写信问《文艺报》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该报未答复。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9月号发表了他们的文章。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0月10日《光明日报》副刊

“文学遗产”又发表了李、蓝二人合写的批评俞平伯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毛泽东的信，对二人的文章给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并对阻拦“小人物”的“大人物”进行了严厉批评，指责“大人物”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决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并且说“《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信的最后，毛泽东指出：“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此信下达后，文艺界掀起了批判俞平伯的热潮。报刊上展开讨论。作家协会、文联召开批判会。《文艺报》主编冯雪峰作了检讨，《文艺报》编委会改组。1955年2月俞平伯被迫做了检讨。

【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根据此前中央主要领导人听取各部门工作汇报和多次讨论的精神，在讲话中讲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十大关系。随后，在5月份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又作了进一步阐述。这十大关系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1975年，中共中央对讲话进行了整理，经毛泽东审定后，于1976年12月26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 1957 年 2 月 27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经整理、修改并作了若干补充后，于同年 6 月 19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讲话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充满着矛盾的，社会主义社会要在揭露和解决矛盾中前进。毛泽东还提出了要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学说。讲话规定了在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等一系列重要的方针政策。

【彭德怀致毛泽东的信】1959 年 7 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错误。14 日，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对于会议未能透彻地解决问题和统一认识深感忧虑，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他的信在肯定 1958 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党的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理解和支持，以利于会议总结经验教训。16 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全体与会同志讨论。23 日他在会上指责彭德怀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的问题。会议开始对彭德怀等人进行批判。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定为“右倾反党集团”。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文件，将彭、黄、张、周调离工作岗位，并在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

【毛泽东对文艺的两个批示】一是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上作的批示，即《关于艺术工作存在的问题给彭真、刘仁的批示》。批示认为：各种艺术形式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根据这个批示，文艺界主要是文联和各协会进行了整风。第二个批示是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作了批示。毛泽东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两个文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论准备。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由姚文元署名的政治批判文章。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著名史学家吴晗，为响应毛泽东学习海瑞精神的号召，于1960年底写成剧本《海瑞罢官》，1961年1月由北京京剧团演出。该剧主要是宣扬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为民除害的精神。在1962年以后大抓阶级斗争的“左”的路线指引下，江青、康生不断向毛泽东诬告《海瑞罢官》有政治问题，同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有关。1965年江青到上海同张春桥、姚文元秘密炮制了这篇文章。该文把剧中的退田、平冤狱同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

系起来，上纲到“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视为“一株毒草”。毛泽东支持该文发表，并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该文在上海发表后，在一段时间内全国各大报纸未予转载，中共北京市委进行抵制。至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时加了强调“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的按语。《人民日报》仅在第五版的“学术讨论专栏”刊登，并加了根据彭真意见写成、由周恩来修改过的按语，强调平等地进行学术讨论。北京的态度和做法，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该文的发表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号。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原名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外逃而死后，改为现名。1966年2月2—20日，江青受林彪委托在上海邀集在部队工作的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座谈部队文艺工作后整理成会议纪要，由陈伯达、张春桥整理、修改定稿。经毛泽东3次审阅、修改。3月22日，林彪为此写信给中共中央军委常委，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要求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4月10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纪要》全盘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文艺事业，认为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

‘时代精神汇合论’等，就是他们的代表论点”。认定文艺作品中，“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提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的估计和他准备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纪要》首创的“黑线专政”论，从文艺扩展到教育、出版、体育、卫生、公安等各条战线，说各条战线都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黑线占主导或统治地位，造成了更大的恶果。1979年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同年3月26日关于撤销《纪要》的请示报告，要求对受《纪要》影响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要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

【五七指示】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内容是对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的批示。通称“五七指示”。信中说：“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

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这封信在1967年5月7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中，都被称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是完成斗批改这个伟大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实则既体现了毛泽东对即将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设想，又反映了毛泽东对“从批判旧世界”中所建立的新世界、新社会蓝图的一种构思，是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上所产生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曲折反映。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1966年5月25日下午2时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署名在校内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点名攻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诬陷他们传达上级指示提出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是“制造种种清规戒律”“压制群众革命”，“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煽动人们起来“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张大字报，是康生的妻子曹轶欧，按照康生的“北大点火，往上搞”的意图，以“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的名义到北大同聂元梓等人策划出来的。大字报贴出后，遭到北大大多数师生员工反对。当夜，当时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派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部的负责人到北大，重申中共中央关于运动中

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等五点指示及周恩来的四点补充指示，实际批评了聂元梓等人违反原则，扰乱中央部署。在这种情况下，康生暗地里指派曹轶欧急急忙忙要走了大字报底稿，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毛泽东支持这张大字报，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晚，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张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在“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下，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同时刊登了关锋等人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章称北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大党委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党”，声称“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都要“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这张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开了一个颠倒是非，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利用“四大”进行政治诬陷与人身迫害的先例，对“文化大革命”在各高校及全国的发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造反派”们“踢开党委闹革命”开了先例。

【炮打司令部】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文件印发给与会者，8月17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它不是什么贴在墙上的大字报，而是用铅笔在6月2日《北京日报》边角上写的一段话。而后注明日期是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将之誊写在两页信纸上。在誊写稿上，毛泽东改动了几个字，并加了这个标题。它的全文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

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短短 200 多字，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和打击的锋芒所向，虽未点名，实际认为党中央存在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要在中央全会上揭开盖子。这张“大字报”除指责 6 月的派工作组问题外，还指责了所谓 1962 年的“右倾”和 1964 年形“左”而实右的做法。

【五二〇声明】1970 年 5 月 20 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有 50 万军民参加的北京“支持世界人民反美斗争大会”上，发表了由林彪宣读的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声明是在印度支那三国——柬埔寨、老挝、越南人民反美斗争不断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的形势下发表的，声明着重指出：“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571 工程纪要】林彪之子林立果主持，于 1971 年 3 月制定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的名称。“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1969 年中共“九大”之后，林彪自以为反革命集团已经形成，便阴谋夺取最高权力。先是 1970 年 8 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难，用“文”的一手企图当国家主席，被毛泽东识破。而后又使出“武”的一手，阴谋发动武装政变，以谋害毛泽东为主要目标。组成了以林立果（时被吴法宪安排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为头目的法西斯组织“联合舰队”。根据林彪的旨意，1971 年 3 月 21 日在上海由林立果召集“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周宇驰（空司办副主任）、于新野（空司副处长）、李伟信（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密谋制定反革命政变计划。林立果分析，林彪接班（夺取最高权力）有和平过渡、被人赶下台、以武装起义提前接班三种可能。他们按第三种可能制定计划，林立果定名为《“571”工程纪要》。3 月 22 日至 24 日拟出，全文分为九部分，即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纪要》定的基本策略是：打着 B—52 的旗号，打击 B—52 的力量（B—52 是美国的战略轰炸机，此处是他们诬蔑毛泽东的代称）。确定的谋杀手段是“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等）。他们强调，要学习日本法西斯海军“江田岛精神”破釜沉舟，以达到夺取“全国政权”或造成“割据局面”的反动目的。3 月 31 日林立果召集死党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在上海密谋成立了反革命政变的指挥班子。此后，他们伙同在北京的另一些死党，进行了以谋害毛泽东为目标的阴谋活动。1971 年 8 月 14 日毛主席出巡南方，9 月 3 日到杭州。9 月 8 日林彪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命令实施“571”工程计划，

谋害毛泽东。但是，毛泽东于9月8日午夜，命令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专车趁夜转移，经上海直返北京。在车上同北京部队和北京市负责人谈话两个多小时。9月12日黄昏专列驶进北京。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消息，粉碎了林彪的政变梦。他先是决定南飞广州，形成“南北朝”形势，提出条件，同北京谈判。晚11时，林彪决定改南逃为北飞叛党叛国，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

【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1973年6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1972年12月20日，福建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其子女上山下乡后的生活困难。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说：“寄去300元钱，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1973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印发了《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再次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检查和领导，并印发了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和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同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国务院派出12个调查组，分赴各地调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情况，并责成有关部门着手筹备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军队要整顿】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的讲话，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邓小平指出，我们这个军队有个好传统，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可是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军队被搞得相当乱。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有的单位派性严重，军队的纪律性很差，有好多

政策没有落实。他指出，我们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恢复优良传统。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本身首先要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不消除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军队战斗力也一定会削弱。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他还指出，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军队的整顿，成为邓小平领导的 1975 年全国各条战线整顿的起点。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决议》回顾了60年的战斗历程，总结了建国32年的基本经验，正确评价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科学分析了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以及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地位，指出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议》系统而精辟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并列述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具有创造性的理论贡献的6个组成部分；它的3个基本方面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民族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决议》阐明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否定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总结和阐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

路基本点的 10 个方面，指明了党和国家继续前进的方向。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书名。邓小平著。1984 年 12 月出版。全书共 22 篇，以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为开卷篇。此书反映了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解决不断遇到的实际问题，而提出和阐述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主张。收入此书的最后一篇是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1987 年 3 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增订本出版，新增加了 22 篇新文稿，其中一个突出内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增订本全部文稿反映了邓小平一贯倡导和坚持的基本观点和主张，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为 1986 年 9 月 28 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全会认为，这个决议，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是新的历史时期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全党同志必须从这个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

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决议》指出，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中国建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理想，来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要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纪律的教育；要普及和提高教育科学文化。

人 物

【廖仲恺】（1877—1925） 国民党左派领袖。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原籍广东归善（今惠阳），生于旧金山华侨家庭。少年在美国就读。1893年回国。1896年赴香港求学。1899年与何香凝结婚。1902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攻读政治经济。1903年在东京拜会孙中山、随即参加民主革命活动。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总部外务部干事。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府参议兼理财政。1914年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总部财政部副部长，协助孙中山从事反袁、护法斗争。1919年与朱执信等在上海创《建设》杂志。同年10月，任中国国民党财政部主任。1921年任军政府财政部次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1922年陈炯明叛变，被囚禁60多天，经营救脱险。同年代表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会谈，翌年发表《孙文越飞宣言》。1923年任陆海军大元帅府财政部长、广东省长。10月，受孙中山委托同李大钊等5人负责筹备国民党改组事宜，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先后担任国

民党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广东省长、大本营财政部长和秘书长等职。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又兼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等职。孙中山逝世后，坚决执行三大政策，同共产党亲密合作，积极支持工农运动。1925年8月20日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著作编有《廖仲恺集》等。

【徐树铮】（1880—1925）字又铮。江苏萧县人。1892年中秀才。1901年冬结识段祺瑞，被任为书记官。1905年由段保送去日本士官学校。归国后，先后任第六镇军事参议，第一军总参谋。1912年任北京政府陆军部军学处处长、军马司司长兼管总务厅，并创办《平报》。任“讨逆军”总部参赞，随段讨伐张勋复辟势力。段复任国务总理后，任陆军部次长，积极主张进攻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企图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同时借参加欧战之名，协助段编练参战军，扩充皖系势力。1918年初，赴奉天策动张作霖攻打护法军，自任奉军副司令。同年春，与王揖唐等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成立安福国会。不久被段任命为参战处参谋长兼西北国防筹备处处长，忠实地执行亲日卖国外交政策。1917年调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1920年皖系兵败，被通缉查办。1922年初，代表段入桂会见孙中山，策划孙、段、张（作霖）结成反直“三角联盟”。同年10月，潜赴福建延平联络皖系余部，组织建国军改制置府，自任总领。事败后逃上海。1924年10月，江浙战争爆发，集结皖系余部，自称浙沪联军总司令。所部被歼后被迫出国。1925年1月，北京政府委派为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同年12月回国，30日离京赴沪途中被冯玉祥派人捕杀。著有《建国论真》，后人辑有《视昔轩遗稿》、《徐树铮电

稿》等。

【郭松龄】（1883—1925）字茂宸。奉天（今辽宁沈阳）人。早年入奉天陆军速成学堂、北洋陆军第二镇随营学堂。后考入北京陆军大学。1916年毕业后，历任北京讲武堂教官、粤赣湘边防督办公署参谋、驻粤滇军韶关讲武堂教官、奉天督军署少校参谋、奉天讲武堂战术教官等职。1920年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团长。1921年8月任奉军第八混成旅旅长。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任第一梯队副司令，指挥奉军精锐三、八旅参加东线作战。战后，奉军整军经武，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代参谋长张学良行事。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任第三军副军长兼第六师师长。1925年10月以东北军参观团团团长名义，赴日本参观秋季军事演习。在日期间，得知奉系与日本商定密约进攻国民军，非常不满，回国后即表示罢战主和，并于11月22日举兵反奉，将所部5万余人改编为东北国民军，自任总司令。12月23日兵败被捕，旋即被杀害。

【王尽美】（1898—1925）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原名瑞俊，字灼斋。山东莒县北杏村（今属诸城）人。1918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1919年在济南参加五四运动，为山东学联负责人之一。1920年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被发展为外埠会员。11月与邓恩铭等发起组织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1921年初建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中共山东区支部书记。1922年，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在苏联参观学习。同年6月回国，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二次全国

代表大会。“二大”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书记。山东支部并入北方分部后，任北方分部副主任。在山海关、秦皇岛、唐山地区从事工人运动。领导了山海关京奉铁路工人、秦皇岛开滦码头工人和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任中共山东地委书记。1924年参加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在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任职，帮助建立山东省国民党的基层组织，积极从事革命统一战线工作。8月，领导成立山东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年底孙中山北上路经天津时约见，以个人名义委派为特派员，在山东省负责宣传和筹备召开国民会议。是年创办并主编《现代青年》。1925年初前往青岛开展国民会议运动，成立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与邓恩铭等一起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并取得胜利。3月赴北京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4月发动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罢工。5月抱病到上海参加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病逝。

【顾正红】（1905—1925） 江苏阜宁人。1922年入上海日本纱厂作工。1924年入中共主办的工人补习学校学习。1925年2月参加中共组织的上海日商纱厂的同盟罢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中旬日本资方以停工关厂威胁工人，在工厂制造矛盾，顾于15日带领工人进厂交涉，当场被日本厂长枪杀。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索。

【李大钊】（1889—1927） 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人。少年读乡塾。1905年考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东渡日本，次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日期间，积极参加

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16年春发表长篇论文《青春》，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5月回国，任北京《晨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6月与王光祈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任《少年中国》编辑主任。不久又担任《国民杂志》社指导、《新潮》社顾问。12月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以“常”、“守常”、“明明”等笔名发表对重大问题的评论文章。从1918年下半年起，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讲演和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中，是主要组织者领导者之一。1919年8月发表致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潮。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在北京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发起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北方各地党团组织的建立都与其有关，与陈独秀有“南陈北李”之称。自1920年7月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在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中共北方区负责人。领导北方各地工人运动。1922年8月参加中共西湖会议，会后到上海会见孙中山，说明中共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1923年6月在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三大后，多次与孙中山会谈，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5个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后组建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北方分会，领导北方的国民党工作。1924年6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

会。同年冬回到北京，负责中共北方区委工作，领导了国民会议运动和关税自主运动，并派中共党员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领导内蒙人民的革命斗争。1925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6年领导北京人民开展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和段祺瑞卖国政府三一八运动。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被害。主要著作收入《李守常文集》、《李大钊选集》。

【萧楚女】（1893—1927） 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治活动家和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原名树烈，学名楚汝，字秋。湖北汉阳人。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1919年在武汉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加入恽代英等组织的利群书社。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四川任教，主编《新蜀报》。1924年秋任中共中央四川特派员，领导青年团的工作和四川的革命斗争。同年10月，与杨闇公等创建四川平民学社。1925年在上海与恽代英共同主编《中国青年》。同年8月到河南参加中共豫陕区工作，主编《中州评论》。不久返回上海，著文批判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派。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二大”。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协助代理部长毛泽东主办《政治周报》。5—9月任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专任教员。年底，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被聘为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政治顾问。1927年4月在广州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被捕遇害。

【越飞】（1883—1927） 俄国克里米亚人。1900年在德国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后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与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编辑《真理报》。1912年在基辅被捕，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

“二月革命”后获自由，再度与托洛茨基合编《前进报》，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任苏俄政府驻德大使，参加苏德议和。1922年任苏俄政府赴华特使，8月抵北京，同中国政府谈判缔结商约、俄国庚子赔款的使用、外蒙及中东路等重大问题。同年9月赴长春参加日俄谈判，谈判破裂后回北京。其间，多次致函孙中山，取得联系。1923年1月，以治病名义南下，在上海会晤孙中山，共同发表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继又与孙中山代表廖仲恺在日本热海秘密会谈，讨论苏俄援助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具体内容。1923年7月返回苏联，继续从事外交工作。后因与托洛茨基见解相近，被停止政治活动。1927年11月托洛茨基派反政府示威被镇压后，因剧烈神经痛卧床不起，15日深夜自杀。

【李汉俊】（1890—1927） 原名书诗，又名人杰。湖北潜江人。1902年赴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918年回国，在上海从事写作、翻译工作，传播新文化及马克思主义。1920年与陈独秀共同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创办《劳动界》周刊，并赴武汉帮助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代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回武汉从事革命活动，曾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教育主任委员。后因意见分歧，脱离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赴上海任教。后回武汉，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省党部青年部长。同年12月17日被桂系军阀逮捕后杀害于武汉。

【张太雷】（1898—1927）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共广州起

义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张曾让，又名泰来、椿年。江苏武进人。1916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1919年五四运动中，任天津学生的联合机构评议会会长，领导讲演团活动。1920年大学毕业之后，赴北京从事革命活动，参与创建北京共产党小组，并与邓中夏等人创办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曾两次去莫斯科参加国际东方局的工作，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回国后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的翻译，对沟通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起了重要的作用。1922—1925年曾多次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参与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至第三次代表大会，先后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常务委员和团中央书记。1925年秋奉命赴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同时兼任区委机关报《人民周刊》主编。1927年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调中共湖北省任省委书记。同年7月，与瞿秋白等人组成中共临时政治局。8月，参加八七会议，当选为中共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并根据八七会议精神，深入潮州、汕头等地组织群众，准备武装暴动。1927年11月，抵广州组建中共广东省委军委，并兼任书记，开始策动广州武装起义。12月11日，与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府（广州公社）代理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次日在与国民党政府军作战中牺牲。主要著作收入《张太雷文集》。

【陈延年】（1898—1927） 又名遐延。安徽安庆人。系陈独秀之子。1919年冬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与周恩来等在巴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编辑机关刊物《少年》。同年8月加入法国共产党。后转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之一。1923年初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

习，任中共旅莫支部干事。1924年9月回国。同年11月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区委书记。1925年参加领导省港大罢工。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并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6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7月4日在龙华就义。

【赵世炎】（1901—1927） 号国富，笔名施英。四川酉阳人。1915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同年7月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旅法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6月与周恩来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同年参加组建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1923年赴苏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后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周刊主编，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革命斗争。1926年任中共江浙区委兼上海区委组织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江浙区委第二书记，参加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6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7月2日因叛徒出卖被捕，19日在上海就义。有《赵世炎文集》行世。

【黎元洪】（1864—1928） 字宋卿。湖北黄陂人。幼读私塾，1883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在海军服役，曾参加中日甲午海战，投两江总督张之洞，受到器重。1905年底任湖北新军第二镇第三协统领官兼护该镇统制官。1906年4月任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此后，带兵镇压湖北灾民起义，并多次破坏革命党人

秘密活动。1911年武昌起义时被起义士兵强制推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大都督。1912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仍兼鄂军都督。旋即成立民社，自任理事长，分裂南京临时政府，结好于袁世凯。袁世凯篡夺政权后，仍委任黎元洪为副总统，与袁相互勾结，图谋复辟。在湖北实行恐怖统治，镇压革命势力。并于同年8月与袁合谋制造了杀害张振武案。1913年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解散国会、破坏临时约法。1913年底被袁迎到北京，并与袁结成儿女姻亲；但即受袁的监视与控制。1914年出任御用的参政院院长。1915年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拒不接受袁册封其为武义亲王。袁死后，以副总统继任大总统，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在权力和参战等问题上发生“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凭借国会，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后被段借张勋复辟逼其下野，寓居天津英租界。1922年直奉战争后，在直系支持下复任总统，次年6月复被直系军阀驱走。从此在政界消失。晚年曾任山东中兴煤矿董事长，又在武昌购有大量田产出租。1928年6月因脑溢血死于天津。

【张作霖】（1875—1928） 奉系军阀首领。字雨亭。奉天（今沈阳）海城人。早年曾读私塾、学兽医。后由医马和赌博，结交绿林，在地方组织“保险队”，为绅商富户保镖，渐成马队。1902年被清政府收编，任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1906年任盛京将军赵尔巽所属巡防队前路统领。1911年辛亥革命时，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1912年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后，被任为第二十七师师长。1916年任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任奉天督军兼省长。1917年初，拥段祺瑞反黎元洪，一度宣布奉天“独立”。1918年9月被段祺瑞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次年7月在

日本支持下，迫使吉林、黑龙江督军让位，控制东三省，成为奉系军阀首领。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后，率兵入关助直倒皖，与直系共同把持北京政府。1921年5月兼蒙疆经略使，节制热河、绥远、察哈尔三特区。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退回关外，被北京政府免去本兼各职。随后在日本支持下，操纵东三省议会通电推其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独立”。1924年9月入关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与冯共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1925年春任东北边防督办。同年奉军沿津浦路南下，占领安徽、江苏，势力达于上海。11月，在日本支持下，平息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事件。1926年2—3月间，联合吴佩孚、阎锡山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12月，任安国军总司令，宣言“反共讨赤”。1927年4月，在北京派兵搜查俄国使馆，逮捕并杀害共产党李大钊等20余人。6月，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自称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1928年6月，在国民党新军阀“北伐军”进攻下败退关外，其专车途经沈阳西郊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埋设的炸弹炸死。

【向警予】（1895—1928）原名俊贤，笔名振宇。湖南溆浦人。土家族。1915年毕业于周南女校。后回溆浦任县立女校校长。1919年参加新民学会。同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并在法国同蔡和森结婚。1921年回国。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后又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曾主编《妇女周报》。1924年领导上海丝厂女工罢工和南洋烟厂工人罢工。1925年赴苏入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在武汉总工会宣传部和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工作。七一五政变后，留在武汉，负责中共湖北省委宣传工作，任《长江》刊物主编。中国共产党第二、第三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3月28日因叛徒出卖在武汉法租界被捕。后“引渡”给武汉国民党当局。同年5月1日就义于汉口余记里空坪刑场。

【罗亦农】(1902—1928) 原名善扬。又名罗觉。湖南湘潭人。1920年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到广东，任中共中央驻粤临时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到北京主持党校工作。1926年1月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后兼任中共江浙区执行委员会军事特别委员会主席和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参加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曾任上海临时政府委员。1927年4月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以后历任中共江西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任中共长江局书记。同年11月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央组织局局长。1928年4月15日由于叛徒出卖，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同年4月21日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上海龙华。

【陈乔年】(1902—1928) 安徽安庆人。陈独秀之子。1915年在上海先后入法语补习学校和震旦大学学习。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在巴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赴苏联学习。1924年回国。后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北方区委组织部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湖北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同年6月6日在上海被杀害。

【周文雍】（1905—1928） 广东开平人。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任青年团粤区执行委员会执委。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参加省港大罢工。1926年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兼青年委员，青年团广州地委书记。1927年任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主席，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同年12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中共广州市委工委书记，工人赤卫队总指挥。起义后，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劳动委员兼教育部长。后因起义失败转赴香港。1928年1月返回广州。同年1月27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2月6日在广州就义。

【夏明翰】（1900—1928） 字桂根。湖南衡阳人。早年入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学习。五四运动中，曾任湖南学生联合会总干事。1921年到毛泽东创建的湖南自修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后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长沙地委书记。曾积极主张建立农民武装。1927年任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兼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平浏特委书记。1928年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同年3月被捕，20日在汉口余记里就义。临刑前写下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著名诗作。

【苏兆征】（1885—1929） 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苏吉。广东香山县淇澳岛（今属珠海市）人。1903年到香港外轮上作杂役。1908年在孙中山影响下加入同盟会。俄国十月革命后，曾随船到海参崴等地，受到十月革命影响。1921年2月与林伟民等在香港成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1922年1月

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任罢工总办事处总务部主任。海员工会代理会长。5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192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6月，与邓中夏、李启汉等领导省港大罢工。任罢工委员会委员长。1926年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春到武汉任国民政府委员兼劳工部部长。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同年12月在广州起义时，被选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未到职）。1928年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这两个组织的执行委员。在苏期间参加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1月回国，2月在上海病逝。

【杨宇霆】（1886—1929）字麟阁，亦作领葛。奉天（今辽宁）法库人。早年在奉天（今沈阳）读书，后赴日留学，进日本士官学校第八期学习军事。回国后先进驻扎于奉天及长春一带的曹锟的陆军第三镇任职，民国建立后曾在陆军东北讲武堂任教官。1916年张作霖执掌东北军政大权后，得到张的信用，先后任奉天盛武将军公署参谋长、奉天督军公署参谋长、奉军司令部参谋长、东三省巡阅署总参议、东三省兵工厂督办等要职。曾参与指挥奉军的几度入关和在关内的征战。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当奉系极盛之时曾于1925年10月出任江苏军务督办，但旋即被孙传芳逐走。后任奉军参谋长，1928年兼任奉军第三、四方面军联合军团军团长。张作霖死后，图谋取代张学良执掌东北军政大权，与日本勾结。1929年1月11日与黑龙江省主席常荫槐一起被张学良处决。

【彭湃】(1896—1929) 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原名汉育，又名天泉。广东海丰人。1917年赴日留学，次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1921年回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任海丰县教育局长。1922年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创建赤山约农会。1923年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惠州农民联合会，当选为会长。同年7月，惠州农民联合会改组为广东省农会，任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4年4月到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第一届农讲所主任。同年5月当选为青年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农工委员。9—10月间，当选为中共广州地委委员，稍后又当选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1925年任广东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中共海陆丰地委书记。1926年1月发表《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书。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1927年3月任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秘书长。4月，在武汉参加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农工委员会委员。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领导海陆丰农民起义，建立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和东江特委军委委员，在海陆丰开展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1928年11月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并兼任中共中央军事领导工作。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年2月，兼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和省委军委书记。4月遭国民党逮捕，8月30日被杀害。遗著编有《彭湃文集》。

【袁文才】（1898—1930） 江西宁冈人，又名选山。早年参加农民武装。1926年秋率部参加起义。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宁冈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在宁冈领导农民军与地主武装斗争，1927年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率农军接受红军的改编。后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团团团长兼一营营长、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团团长、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红四军参谋长等。1930年7月在江西永新被错杀。

【杨开慧】（1901—1930） 又名霞，字云锦。湖南长沙人。1920年入长沙福湘女中学习。同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与毛泽东结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担任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1923年后随毛泽东在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回到长沙板仓从事中共地下工作。1930年10月被叛徒出卖后遭逮捕。同年11月14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被杀。

【向忠发】（1880—1931） 又名仲发。湖北汉川人。早年在汉阳兵工厂做工。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部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年在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上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主席团委员。1931年6月22日在上海

被捕叛变，24日在龙华被国民党当局枪杀。

【林育南】(1898—1931) 又名毓兰，号湘浦。湖北黄冈人。1917年在武昌参加恽代英组织的互助社。五四运动时，与恽代英等领导武汉的爱国学生运动。1920年考入北京医专。1921年7月弃学回到武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秘书长。是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1924年任《中国青年》主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1927年1月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宣传主任，曾与刘少奇等领导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同年4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代理省委书记。不久到上海，参加领导全国工人运动。1930年任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被捕，同年2月7日在龙华就义。

【邓恩铭】(1901—1931)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原名恩明，字仲尧，曾用名黄伯云。水族。贵州荔波人。1918年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被选为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主编一中校报。1920年11月与王尽美等组织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1921年初与王尽美等成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中共山东区支部委员。领导济南、青岛及淄川、博山、张店矿区工人运动。1922年1月，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参加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去淄博矿区开展工人运动，组织淄博矿

业工会，建立洪山矿区党支部。年底被派往青岛工作，任中共青岛支部书记、青岛市委书记。中共“三大”后，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参加组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和青岛市党部工作。1925年2月，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4月发动和领导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罢工。8月任中共山东区委书记。11月被捕入狱，1926年春因病保外就医。同年夏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1927年4月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应邀到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回到山东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共八七会议后改组山东省委，任省委委员。1928年春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是年夏调回省委，被派往淄博矿区负责党的工作。12月在济南被捕。1931年4月5日在济南就义。

【周逸群】(1896—1931) 中共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字立凤。贵州铜仁人。早年留学日本。1923年回国后在上海联络同乡组织贵州青年社，创办《贵州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黄埔军校，发起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任主席。曾领导青军会声援上海工人运动。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历任北伐军左翼军宣传队队长、第一师政治训练部主任、独立第十五师政治部主任、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三师师长等职。1927年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到上海。1928年1月，奉中共中央调遣，与贺龙一起到湘鄂边界，组织农民暴动。曾领导了桑植起义。1928年至1931年间，历任中共湘西北特委书记，鄂西特委书记，湘鄂西联县政府主席，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1931年3月，在坚持“左”倾错误的中央代表打击排挤下，被迫离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931年5月，在岳阳地区遭国民党军队伏击，不幸牺牲。

【黄公略】（1898—1931） 中共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湖南湘乡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第三团连长，第二师三十团团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遵中央指示回湖南，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三团三营营长。1928年7月，与彭德怀等一起组织平江起义，参与创建红五军，任红五军第十三师副师长兼第四团党代表。率部转战于平江、浏阳一带，开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同年12月，彭率红五军主力赴井冈山后，率余部留守湘鄂赣边境，坚持游击战争。1929年4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湘鄂赣边境支队长兼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常委。同年秋，红五军主力回师平江后，任红五军副军长。同年冬，奉命赴赣西南任新编的红六军军长。1930年红六军改称三军，仍任军长。1931年9月15日，奉命率红三军向瑞金转移，途中遭袭击，中弹牺牲。

【邓演达】（1895—1931） 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第三党创始人。字择生。广东惠阳人。早年追随孙中山。1919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0年参加孙中山组织的粤军，历任营长、团长，参加讨伐陈炯明。1923年孙中山重建大元帅府后，负责大本营警卫工作。1924年担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黄埔军校成立后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1925年赴德国研习政治经济。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担任黄埔军校教育长。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攻克武昌后，兼任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职。1927年2月和徐谦、吴玉章等五人在武汉组织行动委员会，反对蒋介石擅自迁都南昌。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农民部长，并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同时还兼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负责人，与毛泽东一起举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曾被蒋介石下令通缉。6月底致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谴责蒋介石、汪精卫，随后秘密离开武汉，流亡苏联。11月与宋庆龄、陈友仁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提出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然后在欧亚10几个国家考察。1930年回国，8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组成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干部会，当选为总干事。9月创办《革命行动》半月刊。1930年夏秋间在上海秘密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策动黄埔系军人反蒋。1931年宁粤分裂期间，从中活动力图建立第三种势力和第三种政权，遭蒋介石忌恨。同年8月在上海被捕。11月29日被秘密杀害于南京。著作编为《邓演达文集》。

【恽代英】（1895—1931） 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字子毅。祖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武昌。1917年发起组织进步团体互助社。五四运动时为武汉地区主要领导人。1920年发起创办利群书社。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在安徽、四川等地任教。1923年到上海，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上海大学教授，主编机关刊物《中国青年》。1924年国共合作后，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1925年参加领导五卅运动。1926年1月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兼军校中共党团书记。5月在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兼任教员。11月到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

学校武汉分校常务委员，主持校务，并担任总政治教官。同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省政府委员、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兼职教员。在1927年4月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兼财务委员会委员、宣传委员会代主席。1927年12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中共六大后到上海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宣传部秘书长，主编党刊《红旗》。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30年任中共沪东行动委员会书记。同年5月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次年4月29日在南京遭杀害。著作编为《恽代英文集》。

【蔡和森】（1895—1931） 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原名泽膺，字润寰，号和仙，学名蔡林彬。湖南双峰人。1913年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1915—1917年就读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文史专科。1918年4月与毛泽东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同年参加发起和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筹备活动。1920年初抵法勤工俭学。8—9月间，提出创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10月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国。年底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党中央从事理论宣传工作。1922年5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至1925年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首先公开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在中共第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3月任中共北方区委委员，兼任秘书。5月出版《社会进化史》一书。1925年5月参与组织和领导五卅运动。10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会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在莫斯科。1927年

3月回国参加党的“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央宣传部长。会后又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8月参加中共八七会议，会后被指定为中央特派员，赴天津协助建立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机关。1928年6月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回国，在《顺直通讯》上发表《党的机会主义史》。1929年1月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1年初回国，被派往香港指导中共广东省委工作。同年6月被捕，8月被杀害。著作收入《蔡和森文集》。

【韦拔群】（1894—1932） 中共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广西东兰人。壮族。早年到贵州参加讨袁护国军，曾入贵州讲武堂学习。后受五四运动影响，1921年回到家乡开始从事革命斗争。1924年秋到广州，翌年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毕业后返回东兰专门从事农民运动，任东兰县农民协会军事部长，并开办了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大革命失败后，在右江地区积极组织农民进行斗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与邓小平等一起领导了百色起义。任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三纵队纵队长、红二十一师师长。1930年10月红七军主力开往江西后，继续留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任右江独立师师长。1932年10月在东兰被害。

【邓中夏】（1894—1933） 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原名邓康，字仲澥。湖南宜章人，幼年读私塾，后入长沙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1918年与许德珩等发起成立国民杂志社，出版《国民》杂志，任编辑股干事。1919年3月与廖书仓等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任总务干

事。5月参加北京学生五四集会游行，后任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7月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先后任执行部副主任、主任。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与高尚德、何孟雄等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开始在长辛店从事工人运动。1921年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主编《劳动音》，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负责北方分部工作。1922年5月，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7月出席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中，参加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等，起草《劳动法大纲》，在全国发动劳动立法运动。1923年二七惨案后，前往上海，参加创办上海大学，任总务长。6月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8月，参加在南京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后任团中央局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参与创办和编辑《中国青年》。1925年2月参加领导上海22家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5月到广州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后留在广州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和党团书记。与苏兆征等发动和领导省港大罢工，任中共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罢工委员会总顾问、工人纠察队训育主任、法制顾问和劳动学院院长，主持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此外，还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1927年4月参加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8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28年初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同年6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会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

选为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在苏期间写成《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1930年7月回国，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政委。1931年冬受王明“左”倾路线打击，回到上海。1932年任中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9月21日在南京就义。遗著编为《邓中夏文集》。

【杨杏佛】（1893—1933） 名铨。江西玉山人。上海中国公学肄业。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总统府秘书，后去美国留学，入康奈尔大学学习机械工程，毕业后又入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科。1924年11月随孙中山北上，任秘书职。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任总理丧事筹备处总干事。1927年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合作，支持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任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常务执行委员。1928年任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团结抗战。1932年“一二八”抗战时，协助宋庆龄举办伤兵医院，支援十九路军抗战。是年底与宋庆龄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执行委员兼总干事。通过向《申报》等新闻机构提供消息，揭露了国民党特务非法捕人、杀人的罪行，采取各种办法及时营救政治犯，保护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和“剿共”卖国政策。1933年6月18日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遗著有《杏佛文存》、《杏佛讲演录》。

【赵博生】（1897—1933） 直隶（今河北）黄骅人。1917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派赴北京任北苑参战第一师连级见习军官。1923年冬转入冯玉祥西北军。1926年擢升三十一军参谋长，参加五原誓师，响应北伐，转战河南。其间，结识在西北军中担任政

治工作的刘伯坚等共产党人，颇受影响。后投奔郑州吉鸿昌第二十二路军，旋应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聘，赴山东任该路军参谋长，襄理军务。1931年，所部调江西“剿共”前线。10月，经该军中共地下特别支部讨论、中共中央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经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是年12月14日，和董振堂、季振同等率该军1.7万人在宁都起义，全副武装开赴苏区，参加红军，所部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任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1932年率红五军团开赴赣州外围，配合红三军团攻城，亲临前线指挥，屡建战功，获红旗勋章。1933年初，在黄狮渡反“围剿”战斗中，率军官突击队发起反冲锋，中弹牺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

【段德昌】（1904—1933）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湖南南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在南县、华容、石首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任中共湖北公安县委书记，领导公安年关暴动。此后，与周逸群等一起在湘鄂西各县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创建工农武装，成立工农民主政权。历任鄂西游击大队大队长，游击总队参谋长，独立第一师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副军长、政委、军长等职，率领所部在江陵、石首、监利、华容等县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权。在1933年湘鄂西的“肃反”中被诬陷，5月1日在湖北巴东县金果坪遭杀害。

【卢永祥】（1867—1933） 北洋皖系军阀。字子嘉，山东济阳人。曾任浙江督军、浙江军务善后督办。1924年江浙战争中战败下台。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任苏皖宣抚使，不久又被奉系排挤下台。后在

天津病逝。

【张敬尧】（1880—1933）北洋皖系军阀。字勋臣，安徽霍丘人。曾任湖南督军，在湖南人民斗争和湘军逼迫下退出湖南，不久在吴佩孚、张宗昌、张作霖部下任司令、军长。后投靠伪满政权，在北平被刺死。

【陈炯明】（1878—1933）广东军阀。字竞存，广东海丰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被推为广东副都督。后任都督。1913年讨袁失败下台。粤桂战争后，任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1922年6月发动兵变，背叛孙中山。1923年被击败退守东江，1925年所部被革命军消灭。后在香港病逝。

【史量才】（1880—1934）名家修。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1901年秋考入杭州蚕学馆。后到上海，曾在育才学堂、南洋中学等校任教。1904年创办女子蚕桑学校。1907年参与保护路权运动，被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1911年辛亥革命后，与陈其美等主办沪关清理处、松江盐务局，曾任《时报》主笔。1912年接办《申报》，后自任总经理。1932年后出版《申报年鉴》，创办《申报月刊》与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申报流通图书馆，成为上海报业巨头。“九一八”后，主张团结抗战。曾捐巨款支持十九路军“一二八”抗战，被推为上海地方维持会（后改称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他聘请爱国进步人士参加《申报》工作，支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刊载宋庆龄、鲁迅等批评国民党当局的文章，发表抨击蒋介石对内、对外政策的时评。引起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的仇视。1934年11月在沪杭公路海宁县翁家埠附近

遭国民党特务的枪击而遇难。

【吉鸿昌】（1895—1934）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将领之一。原名恒立，字世五。河南扶沟人。1913年入冯玉祥部当兵，后任连长、营长。1952年任内蒙特别区绥远督统署骑兵团长兼警务处长。翌年任国民军第三十六旅旅长、第十九师师长。1927年参加北伐战争。1929年7月任第十军军长兼宁夏省政府主席。1930年任第二路军副总指挥，率部参加反蒋的中原大战。战后，被南京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1931年8月，因拒绝执行进攻红军的命令，被解除军职，携家眷出国考察。1932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与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察哈尔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前敌总指挥，率部收复多伦等地。失败后，被迫潜入地下从事抗日活动。1934年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任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出版《民族战旗》报，号召反蒋抗日。同年11月9日在天津被捕，11月24日在北平就义。

【方志敏】（1899—1935） 中共赣东北根据地创建人之一。江西弋阳人。1919年考入南昌江西省第一甲种工业学校。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国共合作后，曾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部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主席等职。大革命失败后，回赣东北地区，重建中共组织，组织武装暴动。1927年11月，在弋阳窑头村发起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共产党代表会议，决定在赣东北发动农民举行年关暴动，并成立了五县共产党委员会和农民起义总指挥部，当选为书记和总指挥。1928年1月，与黄道、邵式平一起领导弋（阳）横（峰）农民起义，创建工农革命军第二军（1928年夏改称江西红军

独立第五团，1929年4月又改称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成立中共弋阳中心县委。随后，率工农革命军转战于信江流域，开辟赣东北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闽北根据地并入赣东北，赣东北红军与闽北红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任军长。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兼任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2年底，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1934年10月，任红十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率抗日先遣队北上，1935年1月至皖南遭国民党重兵围困，被捕后押往南昌。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同年8月6日在南昌被秘密杀害。

【何叔衡】（1876—1935）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谱名启璿，学名瞻岵，字玉衡，号琥璜。湖南宁乡人。1913年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就读。后在长沙楚怡小学和第一师范附小任教。1918年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1919年参加领导驱张（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1920年与毛泽东等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同年9月，被湖南省教育委员会派为省通俗教育馆馆长，主办《湖南通俗报》。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与毛泽东一起回湖南开展建党活动。8月，与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22年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后，任组织委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创办的湘江学校校长、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湖南省法院陪审员、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成员、省中山图书馆馆长、水口山矿局监理、《湖南民报》馆馆长、中国济难会湖南总会执行委员兼财务委员等职。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离开湖南前往上海，与谢觉哉、徐特立、毛泽民等创办中共的印刷机构聚成印刷公司，

任经理。同时担任上海互济会书记。1928年6月赴苏联，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7月回国，在上海任共产国际救济总会和全国互济会主要负责人。1931年秋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工农监察部部长、内务部代理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在福建上杭县水口镇附近突围时牺牲。

【刘伯坚】（1895—1935） 红军将领。原名永福，又名永固。四川平昌人。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西北国民军冯玉祥部总政治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长征后留在赣南坚持斗争，1935年3月同国民党军作战中负伤被俘，不久在大庾（今大余）牺牲。

【阮啸仙】（1897—1935） 名熙朝，字瑞忠。广东河源人。1918年进广州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学习。1919年在广州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春加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筹组社会主义青年团两广区委，并任书记。1923年创建青年团外围组织新学生社。同时还组织广东反基督教大同盟，参加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后任国民党广州临时区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委。还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农民运动工作委员会书记。1925年参与创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第三届主任。1927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参加了广州起义。1928年赴苏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34年任赣南省委书记、赣南军区政委。中央红军长

征后留在南方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3月在江西会昌地区与国民党政府军作战时牺牲。

【瞿秋白】（1899—1935）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理论家和宣传家。江苏常州人。1917年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与郑振铎等组织社会实进会，出版《新社会》旬刊。1920年初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赴苏采访。在新闻界最早有系统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苏俄情况。1922年2月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初回国，担任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6月参加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主持起草党纲，参与制定国共两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战略决策，当选为中央委员。7月与邓中夏筹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和社会学系主任。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不久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25年1月在上海参加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执委委员。5月参加领导五卅运动，主编《热血日报》。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7日在汉口主持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曾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八七会议前，与周恩来等一起参与决定和指导八一南昌起义。会后，与毛泽东等一起参与决定和指导湘、鄂、赣、粤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及其他地方的起义。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及政治书记处成员。此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8月回国。在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排挤出中央政治局。此后在上海与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1934年2月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江西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水口镇小迳村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同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就义。遗著编为《瞿秋白文集》。

【孙传芳】（1885—1935）北洋直系军阀。字馨远。山东历城人。曾任福建军务督理，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后其主力被北伐军打垮，投奔张作霖。1928年奉系失败，孙的残部被阎锡山收编。1935年在天津被仇人刺死。

【鲁迅】（1881—1936）幼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树人。笔名鲁迅。浙江绍兴人。1898年进南京水师学堂，次年转入铁路矿务学堂。其时主要受进化论思想影响。1902年去日本东京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学习，1904年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1906年弃医学文，在东京参加光复会。1909年回国，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中华民国成立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北京政府教育部佥事等职。1918年初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5月发表中国现代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和礼教。1920年，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兼课。1918—1926年间，先后支持和组织了语丝社和未名社，出版《语丝》等刊物，主编《国民新报》的文艺副刊，并相继出版了《呐喊》、《彷徨》等八种专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1926年8月因支持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运动，被北京政府通缉，南下赴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到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

四一二事变后，目睹优秀青年、共产党人被屠杀愤而辞职。从此，同情并赞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同年10月定居上海，研究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先后编辑了《萌芽》等多种刊物，并提倡新兴木刻艺术。从1928年起，陆续参加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遭到国民党政府通缉。与此同时，领导左翼文艺界，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进行论战。1936年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1927—1936年间，出版了小说集《故事新编》、杂文集《而已集》等八种；翻译了法捷耶夫的《毁灭》等多种小说；辑录了《会稽郡故书杂集》等四种辑本。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作大量出版，北京、上海、绍兴、厦门等地建立了鲁迅纪念馆、博物馆。1981年出版《鲁迅全集》新注释本。参见第六卷中的“鲁迅”。

【夏曦】（1901—1936）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字蔓伯。湖南益阳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任湖南学联干事部主任。同年赴苏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4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1925年当选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1927年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委员，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当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赴苏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0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1931年增补为候补中央委员，并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1932年因犯肃反扩大化错误，被撤销领导职务。后任红军六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川鄂黔省委委

员和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35年随红二、红六军团参加长征。1936年2月28日在长征途中牺牲。

【赵一曼】（1905—1936） 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四川宜宾人。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宜宾妇联和学联党团书记。次年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同年9月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冬回国，在江西、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奉组织安排赴东北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在沈阳大英烟草公司和纺纱厂做女工工作。同年秋到哈尔滨任满洲省总工会组织部长。1933年10月后兼总工会代理书记。1934年7月任中共珠河（今黑龙江尚志县）中心县委委员、县委特派员和妇女会负责人。1935年春，任中共铁北区委书记，领导侯林乡农民组织抗日自卫队，开展游击战争。是年秋，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委。同年11月15日，在与日伪军作战中受伤。22日被俘，次年8月2日在珠河小北门就义。

【刘志丹】（1903—1936） 红军将领，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陕北保安（今志丹）人。1922年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曾当选为榆林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加入旅京陕西学生进步组织“共进社”。1924年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赴广州入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随军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东征后奉命回西北入国民联军第四路军中工作，任该军党代表兼政治处长。大革命失败后，深入陕甘边区。1928年4月与谢子长、唐澍等一起发动渭（南）华（县）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6月，率革命军进入陕甘

边界的兰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1929年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和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西北反帝同盟军在陕西组建，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不久，反帝同盟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任总指挥。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任军长。开辟了陕甘革命根据地。1934年在陕北“肃反”运动中，被关押审查。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获释。同年，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五军、二十七军合编成十五军团，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此后，历任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等职。1936年4月，率红二十八军东征抗日，在山西境内遭国民党军队阻击，在晋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

【毛泽覃】(1905—1935) 字润菊。湖南湘潭人。毛泽东胞弟。1918年到长沙读书。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入湖南自修大学学习。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青年团长沙地委书记处书记。还曾在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1925年到广州工作。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被朱德派往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系。于1928年4月接应朱德和陈毅的部队上井冈山。后历任红四军三十一团营党代表、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红三军政治部主任、中共永吉泰特委书记兼红军独立五师政委。1932年任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曾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打击迫害。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1935年4月25日在江西瑞金红林战斗中牺牲。

【胡汉民】(1879—1936) 原名衍鸿，字展堂。广东番禺（今广州）人。早年中举人，后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评议

部评议员、书记部书记、《民报》编辑等职。曾多次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南京临时政府秘书长。1914年任中华革命党政治部长，主编《民国》杂志。1917年任护法军政府交通部长。1919年在上海参与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任非常大总统府总参议。在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9月孙中山率北伐军至韶关，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兼广东省长。1925年7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外交部长。8月廖仲恺遭暗杀，被列为重大嫌疑犯拘留审查。9月间以出使苏俄名义被逐出广东。四一二与蒋介石合作，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立法院院长等职。参与制定《训政纲领》、《国民政府组织法》等文件。1931年2月被蒋囚禁于南京汤山。九一八事变后获释。此后回广州与两广军阀结合继续同蒋介石南京政权对抗。1933年在香港出版《三民主义月刊》。1935年12月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936年5月在广州病逝。

【董振堂】(1895—1937) 宁都起义领导人之一。河北新河人。192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任西北军师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30年任国民党政府军二十六路军旅长。1931年被调到江西“剿共”前线，同年12月与季振同、赵博生、黄中岳率部在宁都起义，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红五军团总指挥、军团长。1934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并率部担任后卫。1935年任红五军军长。1936年参加红军西路军渡河西征。1937年1月20日在甘肃高台与国民党军

战斗中牺牲。

【佟麟阁】（1892—1937）原名凌阁，字捷三。河北高阳人。1908年，在高阳公署任缮写。1912年参加冯玉祥部队。任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1931年，主持国民党二十九军教导团。“九一八”事变后，与宋哲元率先抗日，于1933年5月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喜峰口。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佟麟阁等十四名将领联名通电响应。此时，又任察哈尔省主席和抗日同盟军第一军军长，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常委，与吉鸿昌、方振武紧密配合，指挥所部向张家口北部的日军出击，将其赶出康保、宝昌、沽源，并收复多伦。8月，抗日同盟军被蒋介石撤销，佟麟阁隐居北平香山别墅。不久，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驻守在南苑。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命令：“誓与卢沟桥共存，不得后退一步。”7月12日，日军进犯南苑，受到佟部有力打击。7月20日，日军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调集陆、空军协同作战，向南苑发动新进攻。佟麟阁在劣势的情况下指挥部队痛击敌人。受重伤而牺牲。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北京西城一条街被命名为佟麟阁路。

【赵登禹】（1898—1937）字舜臣。山东菏泽人。少年当兵。1914年，投奔西北军，以武艺出众受到冯玉祥赏识。1916年始任冯玉祥随身护兵。1926年任梁冠英师旅长，参加西安解围战役。后率部到陕西凤翔剿匪。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讨蒋，任第四路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是年秋，所部缩编为第一〇九旅，任旅长，隶属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驻山西辽县（今山西左权）。“九一八”事变后，常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为题，发表演讲，宣传

抗日。1933年3月，奉调至长城喜峰口迎敌，把日军杀得惨败。5月，一〇九旅扩编为一三二师，赵登禹任师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宋哲元令赵登禹一个团进驻北平，赵师集中永定河以南。当赵师一个团到达南苑南时，遇敌截击，伤亡过半。赵率余部与佟麟阁死守南苑。7月28日，日军重兵向南苑进攻。当日军行至我军阵地前200米处，亲率部队挥舞大刀，向敌冲杀，战斗中，身中五弹，壮烈殉国。赵登禹牺牲后，国民政府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北京西城区的一条街被命名为赵登禹路。

【八女投江】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妇女团8名女战士壮烈牺牲的事迹。1938年初，日寇调集7个步兵师团，3个混成旅团及装甲部队、飞机等，企图把活动于伪满三江省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由抗联第四、五、七、八、十军组成）一网打尽。4月，二路军总部为迅速跳出敌人包围，避免被敌聚歼，决定抗联第四、五军主力向老爷岭以西出击，进行西征。为便于行动，四、五军被服厂的女同志组成二路军妇女团，随第五军第一师活动。7、8月间，西征军在日伪军重兵围堵下，连战失利，第四、五军部队遂分开活动。9月初，第五军一师进入五常县境，遭数倍于己的敌人包围，经过苦战，仅百余人突出重围，妇女团只剩8人。10月上旬，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畔柞木岗，部队再次遭日伪“讨伐队”包围，妇女团指导员冷云，率领班长胡秀芝、相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李凤善（朝鲜族）、王惠民、安顺福（朝鲜族）等7人，为掩护主力突围，顽强抗敌，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宁死不屈，一起跳入乌斯浑河激流。

【八百壮士】淞沪抗战中在四行仓库抗击日军的800名官兵。1937

年12月26日，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副团长谢晋元奉命掩护闸北国民党主力部队撤退。26日深夜，谢晋元将分散在附近的第一营四个连的800余人集中在东西两翼，布置阵地。27日晨，与日军交火，边战边撤，退到四行仓库（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和中南银行共同投资的四行储备仓库）。四行仓库西边、北边是中国地界，已被日军占领。东边是西藏路，属于公共租界，南边是苏州河，过河即是公共租界。27日下午2时，日军开始进攻四行仓库，八百壮士英勇抵抗。28—29日，日军又多次进攻，均被击退。30日，日军继续猛攻，因八百壮士顽强抵抗，四行仓库工事坚固，敌人没有得逞。下午，中国方面得知当晚日军将发动总攻，遂令谢团撤离。晚7时，日军总攻开始，八百壮士顽强应战半个多小时后，从东边越过西藏路，撤入租界。谢晋元和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同日军对峙四昼夜，击退日军数十次进攻，坚守了阵地，毙敌200余人，自己只阵亡9人，伤20余人，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谢团进入租界后，被迫解除武装。

【范筑先】（1881—1938） 原名金标，字夺魁。山东馆陶（今属河北省）人。1904年投入北洋陆军第四镇当兵。后入天津北洋陆军讲武堂炮科深造。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师参谋长、旅长等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所部改编为中央陆军第四师，调驻沪杭路。1924年江浙战争失败后，将部队遣散，改名“竹仙”隐居，后以“筑先”为名。1926年入西北军张维玺部任参赞。1936年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卿城县县长。1937年春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统战关系。抗日战争爆发后，不甘忍受日军的蹂躏，在中共鲁西特委协助下，积极建立抗日武装和政权，动员民众抗战。在鲁西一带多次击退日军进攻。1938年9月，与

徐向前签订冀南、鲁西北抗日联防协定，欢迎八路军入鲁。创建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主持召开军政联席大会，接受由中共鲁西特委提出的《山东第六区抗战行动纲领》，将 30 多个支队编为 4 个纵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战。1938 年 11 月 15 日在聊城保卫战中壮烈殉国。

【刘湘】（1888—1938） 字甫澄。四川大邑人。1908 年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1910 年入四川陆军讲武堂。1912 年任川军营长，后参加对护国军作战。1918 年任川军第二师师长，为“速成系”首领。1920 年任川军第二军军长，参加对滇系唐继尧作战。次年任川军总司令。1922—1925 年北京政府委为四川善后督办、川滇边防督办、川康军务督办等职。1926 年任改编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1927 年 4 月，拥蒋反共，被蒋介石委为第五路军总指挥。1928 年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兼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主任委员。1932 年爆发与刘文辉争夺四川统治权的战争，战胜后，控制了全川。1933 年任四川“剿匪”总司令。1934 年任四川省政府主席，阻止长征北上的工农红军。1935—1937 年蒋刘为争夺对四川统治权，展开了尖锐斗争。1937 年 8 月，蒋介石令川军出川抗战，后被委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守卫南京。1938 年初，与韩复榘密谋封闭入川通道，阻止蒋军入川，事泄。1 月 23 日因胃溃疡复发，忧惧吐血死于汉口。

【韩复榘】（1890—1938） 字向方。直隶（今河北）霸县人。1910 年辍学投军，在陆军二十镇冯玉祥营当队官，参加过滦州起义，后随冯的升迁，升至营长。1924 年北京政变后，由团长升任国民军第一军第一师旅长、师长。1927 年 6 月，冯部整编，任国民革命

军第二集团军第六军军长。7月，代方振武任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与奉、鲁军作战。1928年4月任河南省主席。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被蒋介石委任为讨逆军第三路总指挥，率部讨桂。及桂系失败、冯玉祥策动反蒋，被蒋以巨款收买，通电拥蒋。1930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爆发，任蒋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在山东境内与晋军作战。后任山东省政府主席。1932年9月，指使省府参议郑继成在济南刺杀前山东督军张宗昌。西安事变爆发，通电支持张、杨，为蒋所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持观望态度。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山东军事，承担黄河防务，但只派少数部队与日军周旋。12月，弃济南、泰安、济宁，退至鲁西南钜野、曹县一带。与刘湘密谋，阻蒋入川，并派人联络宋哲元，策划刘、韩、宋联合倒蒋，为蒋侦破。翌年1月，前往开封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时被蒋逮捕。24日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罪名遭处决。

【米夫】（1901—1938） 苏联乌克兰人。原名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费尔图斯。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党）。1918年参加红军。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支持王明等人在苏联的活动。1926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提出《中国问题提纲》，即《米夫提纲》，认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将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小资产阶级政权。从事过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研究。1927年来华到上海、广州、武汉等地考察并出席了中共五大。回国后著文指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是因为中共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1928年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同年出席中共六大，并参与起草文件。1930年底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来华。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支持王明上台，后回国。1936年

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1938年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处决。

【加伦】（1890—1938） 苏联雅罗斯拉夫人。原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1914年应征入伍，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荣获乔治十字勋章和乔治勋章。191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任苏俄红军敖德萨布卫戍司令、远东军总司令，远东共和国陆军部长、军事委员会主席等。1924年受苏军事委员会派遣来中国，任广东革命政府军事顾问。1925年回国。1926年再次来华协助孙中山主持军务和改组国民革命军。在组建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中有较大影响。1927年8月回国。1929年任苏联红军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1934年当选苏共候补中央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37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病逝。

【谢持】（1876—1939） 字慧生，四川富顺人。中年时参加中国同盟会。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与邹鲁等人发起西山会议，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30年8月（中原大战期间）和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一起，参加了在北平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并被选为扩大会议常务委员，成立了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对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上海去四川。1939年4月在成都病逝。

【白求恩】（1890—1939） 全名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胸外科医师。生于加拿大安大略州雷文斯特镇。多伦多大学医科毕业。1936年曾率医疗队为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西班牙人民服务。1938年，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

党派遣，率加美援华医疗队到中国。5月，前往晋察冀边区。为八路军进行医疗救护工作。著《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及一本关于游击战争中医疗工作的著作。在一次为伤病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伤手指被细菌侵入感染恶化，终因医治无效，于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完县黄石口村逝世。1939年毛泽东曾为其题写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毛泽东撰写《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中国共产党党员学习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

【吴佩孚】（1874—1939） 北洋军阀直系头目。字子玉。山东蓬莱人。1896年考中秀才。1898年在天津投入淮军当兵。1902年进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学习。1906年任北洋军第三镇第十一标第一营管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随第三镇统制曹錕镇压革命，升为炮兵第三标标统。1914年升为第六旅旅长。1916年随曹錕入川镇压护国军。1917年任代理第三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在湖南与护法军作战。1918年8月在湖南衡阳前线发表通电，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主张南北议和。1919年五四运动中，以“爱国军人”姿态通电、上书，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取消中日密约。1920年5月违抗段祺瑞命令，领兵北撤，通电指斥皖系“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政柄”、“破坏统一”。7月在直皖战争中联合奉系打败皖系。9月任直鲁巡阅副使。1921年任两湖巡阅使。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将奉系赶出关外，直系独掌北京中央政权。1923年2月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造成二七惨案。10月曹錕贿选总统后，升任直鲁巡阅使，驻洛阳，控制鄂、豫、直、陕等省。在川、浙、粤、黔等地挑起战端。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因直系将领冯玉祥回师北京发

动政变而大败南逃。1925年10月在汉口建立“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1926年6月与奉系同时发表通电，双方化敌为友，共同“讨赤”。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其主力在汀泗桥、贺胜桥、武昌等战役中被歼。1927年由河南逃往四川，依附四川地方军阀。1932年回到北平当寓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拒绝出任伪政权头目。

【张自忠】（1891—1940） 中国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字荃臣，后改荃忱。山东临清人。1911年考入天津法政学堂。1914年从军，后转至冯玉祥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时，与宋哲元奉命主持华北政府。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二十九军抗敌伤亡极大，宋哲元决定率部撤离北平。行前，委任张自忠代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北平绥靖主任兼北平市长。日军逼张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张化装潜回天津，又经烟台去南京，任五十九军军长。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率军与其他部队互相配合在临沂与日军两战两捷。临沂战斗后，又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和第一次随（县）枣（县）会战，屡建战功，升任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5月，第二次随枣会战中，受伤殉国。死后灵柩运至重庆，国民政府为其举行了国葬，追晋为陆军上将。延安各界举行追悼会，毛泽东题挽词“尽忠报国”。

【杨靖宇】（1905—1940） 中国共产党抗日英雄。原名马尚德，字骥生。河南确山人。1923年考入河南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确山农民起义和刘店秋收起义，创建确山农民革命军，任总指挥。之后在开封、洛阳等地从事中共地下工作。1929年春奉中共中央派遣

赴东北，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同年秋被捕。九一八事变后，经营救出狱，历任东北反日救国总会会长、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领导抗日。1933年初，任中国工农红军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政委。9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师长兼政委。1934年初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同年任南满抗日联合军总指挥、中共南满临时特委常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1936年初，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仍任第一军军长兼政委。同年6月任中共南满省委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由抗联第一、二军组成）总指挥兼政委，率部活动于京（长春）图（图们）路南、南满路以东地区，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濛江（今靖宇）保安村附近被日军包围，坚持战斗，壮烈殉国。

【宋哲元】（1885—1940）字明轩。山东乐陵人。1912年参加陆建章左路备补军，入随营学校。1913年后在冯玉祥部任连、营、团、旅、师长等。1925年底至1926年4月任热河督统。1927年入陕，任北路军总指挥、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中原大战失败后入晋，任陆军二十九军军长。九一八事变后，通电全国，请缨抗日。1931年任东北政府委员。1932年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3年任第三军团总指挥，曾率部参加长城抗战。1935年任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河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七七事变后，所属军队奋起抗战。1938年因病辞去职务，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

【狼牙山五壮士】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北狼牙山战斗中的八路军战斗

英雄。1941年9月，日本侵略军数千人，集中于河北易县狼牙山周围，企图消灭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占领边区东部制高点狼牙山。当时，一团主力已奉命转移，在狼牙山只有七连负责掩护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和数万群众及地方机关转移。完成任务后，七连留下六班坚守阵地。9月25日，六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5人，与日军激战一天，毙敌90余人。但敌人继续进攻，情况紧急。为了迷惑敌人，五位战士主动将敌人引向悬崖绝路。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先后打退了敌人10几次进攻。最后，宁死不屈，砸坏枪支，相继跳下悬崖。其中，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三壮士光荣牺牲，葛振林、宋学义两壮士被悬崖下的树枝挂住，遇救后回到部队。

【陆宗輿】（1876—1941）字润生。浙江海宁人。1899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02年归国后，任进士馆及警官学堂教习、巡警部主事。1906年冬随载泽出国考察宪政。1907年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次年升任候补四品京堂。1909年进京任宪政编查馆馆员。1910年10月，被选为资政院议员。次年秋任交通银行协理、印铸局局长。武昌起义后，任度支部右丞并代副大臣。后任袁世凯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同年12月被任为驻日公使。1915年初由袁世凯派遣，与陆徵祥、曹汝霖一起与日方谈判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6月8日，由他在东京与日本换文批准该条约。1917年8月，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理，多次经手向日本借款。1919年4月19日，任察哈尔龙阳铁矿（今属河北）公司督办。五四运动中，与曹汝霖、章宗祥同被群众斥为卖国贼。6月，被罢免。1925年后一度出任临时参议院参政。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被聘为行政院顾问。

1941年6月1日病死于北平。

【方振武】（1885—1941） 原名运策，字叔平。安徽寿县人。辛亥革命时率部参加起义，随即参加进攻南京的战役。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1914年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后奉命返国在徐海一带联络旧部，组成别动支队，任司令。1924年任奉军张宗昌部第二十四师师长。1926年率部加入冯玉祥的国民军，任第五军军长。同年9月五原誓师后，出任联军援陕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军司令。1927年任第三方面军总司令。1928年改隶蒋介石指挥，任第四军团总指挥、济南卫戍司令。1929年潜赴山西，组成抗日救国军，北上抗日。1933年5月率部赴张家口，与冯玉祥、吉鸿昌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北路军总司令，在察哈尔东部地区，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抗日战争初期，曾在桂林参加抗日工作，后由于蒋介石的胁迫出走香港。1941年日军进占香港，在离港途中遇害。

【项英】（1898—1941） 原名项德隆，化名江钧、张成。湖北武昌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干事、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参与领导二七大罢工。1925年参加领导沪西日商纱厂工人罢工。1926年任湖北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党团书记。中共第三、四、五、六届中央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28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7月赴苏，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30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931年起，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兼中央政府党团书记、劳动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

委员会代理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兼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18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委司令员兼政委、中央军委（中区）分会主席。与陈毅等共同领导南方游击战争。抗战时期，任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在江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41年皖南事变时，没有坚持中共中央方针，使新四军遭到巨大损失。后率部突围。同年3月14日在泾县赤江坑蜜蜂洞被叛徒杀害。

【左权】（1905—1942） 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将领。湖南醴陵人。1923年考入广州湘军讲武堂。1924年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在校参加秘密革命团体火星社。毕业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排长、连长。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奉中共中央之命到中央苏区工作，任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教官。同年5月，在龙岩任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校长。1931年任红军总前委野战司令部作战科长，6月任红军总前委参谋处长。12月，奉命与王稼祥、刘伯坚等到宁都附近配合国民党第二十六军举行宁都暴动，暴动成功后，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任第五军团第十五军政委、后任第五军团第十三军军长、红二十一军军长、红五军团政委、红一军团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参加红军东征。5月回师后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兼参谋长，与聂荣臻一起率部参加西征。11月参加指挥山城堡战斗，歼胡宗南主力第七十八师。12月，率红一军团开赴陕西云阳镇，援助张学良、杨虎城。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副参谋长，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委员。9月，

随朱德、任弼时等东渡黄河，开赴太行山抗日根据地。1940年参加八路军“百团大战”的组织、指挥工作。1942年5月，驻辽县麻田镇的八路军总部遭到日军袭击，左权率八路军三八五旅主力掩护八路军总部进行突围。6月2日，在战斗中牺牲。

【陈独秀】（1879—1942） 新文化运动主要倡导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幼年在家乡读私塾。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西方思想文化和康、梁维新思想。1901、1907年两次东渡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前，创办《民国日报》、《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建立反清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武昌起义后，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再次去日本。1915年从日本返回上海，创办并主编《新青年》，倡导新文化运动。1917年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北大文科学长。1918年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发表文章，对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起了鼓动作用。五四运动中因散发革命传单被捕入狱83天。五四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联系函约在北京、武汉、长沙等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三大”前后，提出“二次革命论”。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投降主义，导致了革命的失败。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进行改组，停止其领导职务。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我们的意见书》。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为总书记。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于

南京。1937年8月出狱，主张抗战，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1942年5月病逝于四川江津。著作编有《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戴安澜】（1905—1942） 中国国民党爱国将领。字衍功，号海鸥。安徽无为入。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1926年毕业后参加北伐，任连长、营长。1933年任国民党第十七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第一四五团团团长。在长城抗战中曾率部抗击日本侵略军。七七事变后，升任第七十三旅旅长，参加平汉线保定漕河战斗、彰德漳河争夺战。1938年参加台儿庄战役，擢升第八十九师副师长兼三十一集团军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并获国民政府颁发的华胄荣誉奖章。同年8月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任机械化部队的第五军第二师师长。同年9月参加长沙保卫战，11月参加昆仑关战役。1942年春，所部编入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5月，殉国于缅北茅邦村。7月，美国国会授予军团功勋章（武官级）。10月，国民政府追晋为陆军中将。

【柯棣华】（1910—1942） 国际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原名德瓦卡纳特·桑塔拉姆·柯棣尼斯。抗日战争时期的印度援华医疗队队员，1910年10月9日生于印度孟买省绍拉普尔（今属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1938年9月，加入贾瓦哈拉·尼赫鲁派遣的援华医疗队。1939年1月到延安。8个月后到达山西武乡琼山谷八路军总部。1940年，前往晋察冀根据地。9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柯棣华率医疗队赴前线。10月，毛泽东曾给他发来电报，要他取道延安回国。但他没有回国。不久，任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外科教员、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1942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42年12月9日，因积劳成疾，绦虫病引起的癫痫再次发作，抢救无效，在河北唐县辞世，终年32岁。

【陈潭秋】（1896—1943）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原名陈澄，字云先，又名秋荪，化名徐杰。湖北黄冈人。1916年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学习。1919年在武汉参加五四运动。同年秋，与董必武等筹办武汉中学，翌年任该校英文教员。1920年秋与董必武发起建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参与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2月创办《武汉星期评论》，同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中共武汉区委主管组织工作。1923年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同年6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到安源担任中共安源地委及路矿工人俱乐部领导工作。1924年任中共武昌地委书记。1925年1月出席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秋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与董必武等建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组织部长。1926年任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兼组织部长。1927年4至5月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历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共顺直（今河北省）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0年12月在哈尔滨被捕，经营救于1932年7月获释。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粮食人民委员（粮食部长）。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委员。1935年2月在闽西南负伤，7月去上海医治，曾参与指导“左联”的工作。后被派往苏联，参加了少共国际六大中国青年代表团的领导工作，后入列宁学院研究班学习，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的工作。1939年5月回国，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次年9月27日被秘密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

【毛泽民】（1896—1943）字润莲。湖南湘潭人。毛泽东胞弟。1921年秋到湖南自修大学任职，同时参加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学习。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曾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总社总经理。1925年4月到广州参加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1931年7月到闽粤赣革命根据地，任军区经理部部长。1932年2月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家银行行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1936年初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受中共中央派遣，到新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代理厅长、民政厅厅长。1942年9月被军阀盛世才逮捕。1943年9月27日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被秘密杀害。

【林森】（1867—1943）字子超，号长仁。福建闽侯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后策动九江新军宣布独立，成立九江军政府，任民政长。同年冬作为江西代表赴上海、南京开会，参与制订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921年1月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议长，主持制定《临时约法》。1913年到北京，被选为参议院全院委员长。同年冬东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1914年赴美国旧金山，任为筹饷讨袁组织的民国维持会会长，并被选为国民党美洲总支部支部长。1916年离美到北京参加国民会议。1917年随孙中山南下广东，任护法军政府外交部长。1918年被选为护法国会参议院议长。1921年任非常国会议长，代表国会为孙中山就任非常

大总统授印致词。1922年任福建省省长。1923年任大本营建设部长兼治河督办。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1925年11月与谢持、邹鲁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任主席，通过一系列议案，被选为西山会议派中央常务委员兼海外部长。1927年秋任南京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副院长。1929年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1年任立法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1932年任国民政府主席。1937年11月随国民政府迁往四川重庆。

【马本斋】（1902—1944） 抗日英雄。河北献县人。回族。东北讲武堂毕业，曾在旧军队中任职至团长。在家乡组织回民义勇队，抗击日本侵略军。1938年初，又将回民义勇队扩大成立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7月，率队参加八路军，与吕正操领导的冀中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合并，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任总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回民教导总队改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任司令员。转战于冀中和冀鲁豫平原。次年初，率部挺进深县以南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1942年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三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指挥所部参加多次反“扫荡”战斗，取得重大胜利。1944年2月7日，因积劳成疾在山东莘县逝世。

【邹韬奋】（1895—1944） 记者、出版家、政论家。字恩润。原籍江西余江，生于福州。1919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1926年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开始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民主运动，撰文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发起支援

抗日的募捐运动。1933年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执行委员。杨杏佛被杀害后，被迫出国。1935年回国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香港相继创办《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1936年与沈钧儒、陶行知等人联名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1月，与章乃器、李公朴等七人在上海被国民政府逮捕，是为“七君子事件”。七七事变后获释。于上海、汉口、重庆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宣传抗战。1940年生活书店被国民党查封，流亡香港，复刊《大众生活》。1942年入东江抗日根据地。1943年赴上海治病。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病逝。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认为中共党员。主要著作汇编为《韬奋文集》。

【汪精卫】（1883—1944） 名兆铭，字季新。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长，《民报》主编。1910年在北京谋炸摄政王载沣被捕，武昌起义后获释。后参与组织国事共济会，主张南北议和。1912年去法国。1917年回国投奔孙中山。1919年在上海参与《建设》杂志创办工作。1921年任广东教育会会长。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同年11月随孙中山北上。1925年7月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兼军委会主席。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被迫离粤赴法国。1927年4月回国，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928年冬，陈公博、顾孟余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奉之为改组派首领。1930年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各派联合反蒋，主持北平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被推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中原大战失败后逃往香港。1931年5月回广州，联合

反蒋各派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另组广东国民政府。1932年1月与蒋介石合作，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主张对日妥协。1936年2月辞职出国。西安事变后回国，继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抗战爆发后，组织“低调俱乐部”。1938年3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副总裁。此外还担任国民参政会议长、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等职。同年12月率曾仲鸣、周佛海等由重庆逃到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元旦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同年8月在上海召开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推为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后即以此身份进行组织伪中央政府活动。年底与日本签订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3月在南京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任主席和行政院长，并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职。11月，与日签署《中日国交调整条约》、《中日满共同宣言》，承认伪满洲国。1941年3月成立清乡委员会，任委员长。在其统治区进行反共清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日本参加《国际防共协定》，对英美宣战。1943年10月与日签订《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同年11月出席日本召集的大东亚会议。1944年3月赴日本就医，同年11月10日病逝于名古屋。

【彭雪枫】（1907—1944） 原名修道。河南镇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考入北平民国大学。1930年夏到红区，曾任红八军大队政委和第六师政委、红三军团二师政委、江西军区政委、红军大学政委等。参加了长征。后任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红一军团四师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处长、新四军驻河南

确山竹沟留守处主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新四军六支队司令员、八路军四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等。曾参与领导创建豫皖苏根据地，主持创办拂晓剧团和《拂晓报》。1944年9月11日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指挥作战时牺牲。

【虞洽卿】（1867—1945） 名和德。字瑞和，后字洽卿。浙江镇海人。早年到上海当学徒，后升跑街。1894年后，任德商鲁麟洋行买办，华俄道胜银行买办。1903年独资开设通惠银号，发起组织四明银行，同时捐得候补道台衔，以官吏、商人双重身份从事金融、商业活动。1908年创办宁绍轮船公司，发起成立旅沪宁波同乡会。1911年结识同盟会中部负责人陈其美，资助反清武装起义。1914年退出宁绍公司，独创三北公司。1920年合伙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任理事长。1923年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淞沪市政会办。后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1927年4月，积极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清党”。1936年西安事变时，发表意见书，主张继续“剿共”。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租界工部局支持下组织“上海难民救济会”，自任会长，以救济为名免税进口洋米，牟取暴利，有“米蛀虫大王”之称。1940年秋，经香港去重庆，组织“三民”、“三北”运输公司，运输军用物资。1945年4月在重庆病逝。

【史迪威】（1883—1946） 美国佛罗里达州人。1904年毕业于西点军校步兵科，任美国驻菲律宾第十二步兵团少尉。1916年任纽约州普拉茨堡训练营教官，升上尉。1917年派往法国，任美国远征军第四军团情报官。1920—1923年，奉美国陆军部军事情报司派遣来中国。1926—1929年再度来华，任美国驻天津第十五步兵

团少校营长，代理参谋长、司令官。1929年返回美国。1935—1939年调任美国驻华武官，升上校。主张援助中国抗战。1939年5月返美。1942年以美国总统代表身份来中国，任中国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的参谋长，同时担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1943年10月，盟军东南亚司令部成立，任副总司令。担任过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公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等职。要求将所有中国军队置于美国军官指挥下。不满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与蒋发生矛盾，于1944年10月被召回国。遗著编为《史迪威文件》一书。

【陈公博】（1892—1946） 祖籍福建上杭，生于广州。早年毕业于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毕业后返回广东，执教法政专门学校，并和谭平山等创办《广东群报》，任总编辑。1921年经谭介绍参加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投奔广东军阀陈炯明，后被开除出党。1923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1925年回国，任广东大学教授。随即加入中国国民党，曾任广东省农工厅长、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训练部主任等职。1927年3月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工人部部长。后追随汪精卫实行“分共”。5月创办《革命评论》，宣扬改组国民党的主张。该刊被查封后改出《民众先锋》。同年底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成为改组派首领之一，负责总部宣传工作。1929年9月和汪精卫、顾孟余等以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讨伐蒋中正宣言》。1932年初蒋汪妥协，遂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抗战爆发后，任国民党中央执委民训部长，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等职。后追随汪精卫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成为汉奸。1940年3月后，任汪伪政权立法院院长，上海市市长。1944年11月汪死后，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军委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日本投降后，按照蒋介石密令，控制伪军继续反共。后逃亡日本。在全国人民舆论压力下，被提解回国，监禁于南京。1946年6月在苏州被处死。著有《四年从政录》、《我与共产党》、《寒风集》等。

【王若飞】（1896—1946）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原名王运生，字继仁。贵州安顺人。后改名若飞。1918年赴日本留学。1919年回国参加五四运动。同年冬，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和李立三、赵世炎等发起组织“勤工俭学学会”。1922年，和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等人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冬，转入中国共产党，组成中共旅欧支部。1923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后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江苏省省委常委、省委书记。1928年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会后，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1年奉调回国，负责开展陕甘宁绥农村工作。10月，在绥远包头被捕。1937年5月出狱后，历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党务研究室主任等职。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8月，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重庆谈判。1946年1月，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4月8日，由重庆飞回延安途中，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因飞机失事遇难。

【叶挺】（1896—1946） 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字希夷，号西平。广东惠阳人。1912—1918年，先后在广东陆军小

学、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学习。1919年参加孙中山创建的粤军，任第一支队副官，并加入国民党。1920年任粤军第一师参谋、工兵营营长。1921年任孙中山总统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乱时，率部抵抗叛军，保护孙中山脱险。1923年任大元帅府宪兵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一营营长。1924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由苏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独立团团团长。1926年5月率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挺进湖南。在汀泗桥、贺胜桥和攻克武昌的战斗中，屡建奇功。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任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副师长兼七十五团团团长。1927年4月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5月，率部击溃夏斗寅叛军。8月，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12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总指挥部总指挥、工农红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去欧洲，与中共失去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新四军军长。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挺进敌后，坚持敌后抗战的主张。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当局扣押。先后关押在上饶、桂林、重庆、恩施等地。在狱中写下名诗《囚歌》。1946年3月获释。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8日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戴笠】（1896—1946）字雨农，谱名春风。浙江江山人。早年入浙军周凤岐部。后到上海，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1926年春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旋转第六期骑兵科。同年夏，随军北上，任蒋介石侍从副官。1932年任国民党中华复兴社（又名蓝衣社）特务处处长，专门从事特务活动，策划一系列暗杀、绑架事件。1938年特务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任副局

长，在海内外遍设特务机关，摧残民主，破坏抗战。1942年兼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1943年兼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局长。1946年3月在北平乘飞机飞往南京途中于江苏江宁坠机身亡。

【罗炳辉】（1897—1946） 原名德富，字宿星。云南彝良人。1915年加入滇军，参加讨袁护国战争。后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役。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九师二十五团二营营长。1929年在江西吉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率部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独立第五团团团长。1930年先后任红六军二旅旅长、红十二军军长。1933年12月任红九军团军团长。1934年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一支队副司令员、第五支队司令员、第二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开辟苏皖边抗日根据地。1946年4月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同年6月在山东兰陵病逝。

【闻一多】（1899—1946） 本名家骅。湖北浠水人。1913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留学，在学习美术的同时，研究文学和戏剧。1923年和1928年出版诗集《红烛》和《死水》，表现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黑暗现实的不满。1928年参加新月社。以后任教于青岛大学和清华大学，主要从事中国文化遗产的研究，在《周易》、《诗经》、《庄子》和《楚辞》的研究中有相当成就。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3年以后，痛恨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和腐败，积极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云南支部负责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积极参加争取

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反对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7月15日，发表演讲，控诉国民党特务杀害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的罪行。当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其著作由朱自清等编成《闻一多全集》。参见第六卷中的“闻一多”。

【李兆麟】（1908—1946） 原名李操兰，又名张寿笈。辽宁辽阳人。1930年，赴北京求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加入北京“抗日救国会”，赴东北从事抗日救亡的组织发动工作。1933年8月，任中共奉天特委军委委员。1934年，组织珠河游击队，发展成为北满抗日联军。1935年1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部主任。1936年1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委员。1937年初任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6月兼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建立小兴安岭根据地。1939年4月，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常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由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组成）总指挥。1940年，率第三路军主力开辟龙江和嫩江流域抗日游击区。1942年7月任中共东北地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副旅长。1945年8月，任东北抗日联军驻哈尔滨办事处负责人。同年10月，任松江省政府副主席、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1946年3月9日被国民党杀害。

【李公朴】（1902—1946） 爱国民主人士。原籍江苏扬州，生于镇江。1924年考入沪江大学。1926年赴广东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留学美国。1930年回国后致力于民众教育事业，在上海主编《读书生活》杂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和社会教育活动,曾创办《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1934年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1936年参与发起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执行委员。同年11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等7人一起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为“七君子”之一。抗战爆发后出狱,在武汉与邹韬奋合编《全民抗战》周刊。1944年在昆明创办北门书屋,出版进步书刊。同年10月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云南支部执行委员。抗战胜利后,历任民盟中央委员、救国会中央委员、社会大学副校长。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国民党暗杀。著有《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华北敌后——晋、察、冀》等。

【关向应】(1904—1946) 原名致祥,又名应稟。满族。辽宁金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赴苏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回国后,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1927年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负责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工作。1928年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当选为共青团中央书记。1930年参加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1932年到湘鄂西,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红三军政委。1934年任红二军团副政委、湘鄂川黔军区副政委。1935年参加领导红二、红六军团长征。1936年任红二方面军副政委、总政委,曾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过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师政委兼晋西北军区政委、晋绥军区政委、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7月21日因病在延安去世。

【邓发】（1906—1946） 原名元钊。广东云浮人。1922年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1925年参加省港大罢工，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队长。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广州起义。后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香港市委书记、广东省委组织部长等职。在中共六届三中、五中、六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1934年长征时任中央纵队政委。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抗日战争前夕曾去苏联。1938年回国，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1939年秋到延安。1940年初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45年9月代表中国解放区职工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被选为世界职工联合会理事和执行委员。1946年1月回国。同年4月8日，由重庆乘飞机返延安，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因飞机失事遇难。

【秦邦宪】（1907—1946） 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1925年入上海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苏留学。1930年回国后，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总负责人。曾积极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1933年到江西中央苏区后，又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1936年底曾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赴西安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长、南方局组织部长。创办和主持了《解放日报》、新华社。是中共七届中央委员。1946年2月以中共代表身份到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宪法草

案审议委员会会议。同年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遇难。译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卡尔·马克思》等。

【李鼎铭】（1881—1947）原名丰功。陕西米脂人。清末廪生。长期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致力教育改革。1923年任榆林道尹公署顾问、科长等职。1926年因病返里，潜心研究中医学，为家乡父老乡亲服务。1937年“七七”事变后，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主张，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成为陕北著名的开明绅士。1941年，当选为陕甘宁边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和边区参议员。同年11月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提出“精兵简政”提案，为中共中央采纳，成为当时克服解放区严重困难的“十大政策”之一。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及新民主主义纲领、政策。抗战胜利后，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政策。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时，不顾年高体弱，随边区政府转移。同年12月，因突发脑溢血逝世。

【续范亭】（1893—1947）山西崞县（今原平）人。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并参加辛亥革命。1925年任冯玉祥国民军第六混成旅旅长。1932年任国民党政府兰州绥靖行署主任参谋长。1935年12月在南京中山陵因抗议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剖腹自杀，未遂。西安事变中，积极拥护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1937年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第二战区保安司令。后任山西新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1940年任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1941年后因病在延安及晋绥边区疗养。1947年9月12日在山西临县逝世。临终前

提出入党申请。次日被中共中央复电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著作编为《续范亭诗文集》。

【刘胡兰】（1932—1947）山西文水县人。1945年11月任文水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区妇救会干事，积极带领群众参加土地改革和支前工作。1947年1月12日在国民党政府军袭击该村被捕后，拒绝投降，并从容躺在刚铡死六个农民的铡刀下，英勇就义。同年毛泽东为其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松井石根】（1878—1948）日本爱知县人。1897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九期，继入陆军大学。1904年参加日俄战争，任步兵联队中队长。1906年陆军大学毕业后，曾任陆军参谋本部中国班班员，步兵第二十九联队长，关东军司令官副官，步兵第三十五旅团旅团长，日本驻广州、上海武官、驻华公使馆武官，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长，陆军第十一师团师团长。曾在1932年调任驻台湾日军司令官，翌年晋升为大将。1935年被编入预备役，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重返现役，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侵占上海、南京等沿海、沿江大城市，对日军在南京的血腥大屠杀负有重大责任。迫于舆论压力，1938年3月，被日本政府召回东京。不久复员任内阁参议，继续从事侵华活动，主持“大政翼赞会”、“兴亚联总部”、“大亚细亚协会”等法西斯组织。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被定为甲级战犯，为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逮捕归案。1948年11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当年12月23日在南京执行。

【冯玉祥】（1882—1948） 国民党爱国将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原名基善，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生于直隶（今河北）青县，长于保定。行伍出身。11岁挂名当兵，15岁正式入伍。1902年改投袁世凯新军。1910年任北洋第二十镇第八十标第三营管带（营长）。1911年武昌起义后，参加发动滦州起义。1914年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1915年奉令入川，反对袁世凯称帝，暗中与蔡锷联络，并促成四川独立。1917年7月参加讨伐张勋复辟。1918年在湖北通电主和，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被段免职。不久复职，兼任湘西镇守使。1920年7月在直皖战争中参加直系军队与皖系军队作战。1921年7月入陕，任第十一师师长、陕西督军。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出陕援直，转任河南督军。10月调任陆军检阅使。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推翻直系军阀政权。将所部改称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11月5日，驱逐溥仪出宫。1925年1月前往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将国民军第一军各部统辖于西北边防督办署，改称暂编西北陆军。1926年1月通电下野，赴苏联考察。4月加入国民党。8月离苏回国，任国民军党代表、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9月抵五原（今属内蒙古自治区），组织国民联军，被推为总司令。五原誓师，宣布全军集体加入国民党。在苏联和中共帮助下整顿队伍，任命共产党人刘伯坚为政治部副部长，采纳李大钊建议，进军甘、陕。1927年5月在西安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6月占领郑州，与北伐军会师。后曾参与蒋介石的反共“清党”活动。1928年4月与蒋介石、桂系、阎锡山三派新军阀联合举行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北伐”。10月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不久因军队编遣问题与蒋介石发生冲突，离开南京，举

兵反蒋，先后爆发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战败通电下野，西北军瓦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1933年5月与中共合作，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将日伪军驱逐出察哈尔境。后在蒋日联合进攻下失败。1935年重返南京，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37年2月与宋庆龄、何香凝等13人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后被蒋介石免职。抗战胜利后，主张和平民主，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1946年9月出访美国。在美组织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反对美国援蒋内战。1948年初，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兼政治委员会主席。7月，响应中共号召乘船由美国前往苏联，准备绕道回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9月1日途经黑海时因轮船失事遇难。著有《我的生活》、《冯玉祥日记》、《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等。

【土肥原贤二】（1883—1948）日本冈山县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样，曾参加日俄战争。1915—1928年，任北洋军阀政府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的助手。1928年，任奉天（今沈阳）督军顾问，1931年8月任奉天警务司令官，参与制造九一八事变。事变后，出任奉天（今沈阳）市长，曾至天津挟溥仪赴东北，组织伪满洲国。同年11月，任哈尔滨警务司令官。后到华北进行“蚕食华北”的阴谋活动，1935年11月，策划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妄图组织伪华北国。1938—1940年任日军驻东北第五军司令官，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1939年，曾指挥部队参加进攻苏联的诺门坎战争。1941—1945年，历任日本陆军航空总监、东部司令官、驻新加坡第七方面军司令官、军事训练总监等职，积极策划

和参与太平洋战争。日本投降后被列为战犯，1948年11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陈布雷】（1890—1948） 原名训恩，字彦及，别号畏垒。浙江慈溪人。幼年在家乡读私塾，后在慈溪县中学堂、宁波府中学堂肄业。1906—1911年在浙江高等学堂就读。毕业后一度赴上海，在戴季陶主编的《天铎报》任记者。1912—1920年间，先后在宁波、绍兴中学教书。1920年到上海，参加商务印书馆编译《韦氏大字典》工作。不久，与潘公展办《商报》，任编辑主任，撰写时评，支持当时在广东兴起的国民革命。1926年冬赴南昌采访、报导国民革命军进展情况，受到蒋介石赏识，被留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与草拟文件的工作，随即任蒋介石私人秘书，并由蒋与陈果夫介绍加入国民党。后被任为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自1927年以后，长期追随蒋介石，为蒋草拟文件，并写有大量鼓吹蒋介石领袖地位的文章，被称为蒋的“文胆”。1929年在国民党“三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不久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1930年12月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次年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1934年在蒋介石的南昌行营任职，成为蒋的心腹随从，旋即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任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1939年起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1948年11月，在国民党统治行将崩溃之际，在南京服安眠药自杀。著有《陈布雷回忆录》。

【周佛海】（1897—1948） 湖南沅陵人。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1920年暑假回国省亲，应陈独秀邀请，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9月正式脱离共产党。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1929年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总政治训练部及行营总政治训练部主任等职。1931年在国民党“四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国民党“五大”上继续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兼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民政府大本营第二部（政略）副部长。1938年春，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同年冬，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历任汪伪政权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警政部长、上海特别市市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1945年日本投降后，为阻止共产党及抗日武装收复失地，曾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1946年9月，蒋介石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将周交付法庭审判，判处死刑。1947年3月被蒋介石特赦，改判无期徒刑。1948年2月，因心脏病死于南京狱中。

【董存瑞】（1929—1948）河北怀来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因对敌作战勇敢而立大功4次。1948年5月25日在解放隆化的战斗中，为保证大部队按时发动总攻，手托炸药包炸毁敌人的“桥型碉堡”而壮烈牺牲。后被追认为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1950年9月被追认为全国战斗英雄。

【杨杰】（1889—1949）又名漱石，字耿光。云南大理人。1913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归国后在云南、贵州军中任团长、旅长，在四川任重庆卫戍司令等职。1916

年参加护国运动。1917年任云南讲武堂教官。1920年春再次东渡日本，入陆军大学深造。1924年毕业回国，先后在奉军、国民军任职，1927年4月以后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六军、第十八军军长，军事委员会常委兼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洛阳行营主任兼第十军军长、长江要塞总司令。1930年中原大战中先后任第二炮兵集团指挥官、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为蒋介石迅速击败冯、阎军立下战功，成为蒋介石得力军事幕僚。1932年起任陆军大学校长、教育长，主办陆大第十至十五期，为国民党培养大批高级军官。抗战爆发后，率中国实业考察团赴苏，组织转运苏联援华物资。1938年5月出任驻苏大使。由于对苏联的认识为蒋介石所不容，1940年被免去驻苏大使职务。回国后在重庆任闲职。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与亲美反苏政策多所不满。此后开始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与谭平山、陈铭枢、王昆仑等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抗战胜利后反对蒋介石内战政策。1948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此后策动国民党高级将领反对内战，为后来的川康、云南起义起了一定作用。1949年9月应中共中央邀请赴北平参加新政协，在途经香港时于19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生前著有《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孙子浅释》等军事论著多部。

【杨虎城】（1893—1949） 国民党爱国将领。陕西蒲城人。早年在家乡发起组织中秋会，自任领袖，以“打富济贫”相号召。1911年辛亥革命后，率领中秋会成员参加陕西民军，与清兵作战。1915年率众参加陕西护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1917年参加于右任、井勿幕为首的靖国军，反对段祺瑞政府及陕督陈树藩。1924年1月加入中国国民党。此后任冯玉祥之国民军第三师师长。1929年投

归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1930年中原大战中，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率部攻入西安，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35年改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1936年12月12日，与东北军首领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后，后被蒋介石逼迫离开军队出国考察。抗日战争爆发后返国参加抗战，在南昌被蒋介石扣留，后遭长期囚禁。1949年9月，被蒋介石杀害于重庆松林坡戴公祠内。

【戴季陶】（1891—1949） 名传贤，字选堂，又字季陶，号天仇。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1905年留学日本。1909年回国任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教习。不久改任《天铎报》编辑、总编辑。1911年因宣传反清思想被通缉而逃往日本，任《光华日报》编辑。同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上海参与创办《民权报》。1912年9月任孙中山机要秘书。1914年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任浙江支部长。1917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1918年任大元帅府秘书长。1919年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1920年曾在上海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些活动，不久即退出。同年与张静江、蒋介石、陈果夫等合股设立“恒泰号”，成为证券物品交易所经纪人。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和宣传部长。此后在国民党第二至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反对国共合作，形成了“戴季陶主义”。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当选为国府委员。1926年到北京，支持西山会议派的主张。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1948年任国民党政府国史馆馆长。1949年2月在广州自杀。

【戴传贤】即“戴季陶”。

【马占山】（1885—1950）字秀芳。祖籍河北丰润，生于辽宁怀德（今属吉林）。1911年投靠清军统领吴俊升，因功升至骑兵旅长。1928年后，任张学良东北军黑龙江陆军步兵第三旅旅长、剿匪司令、骑兵总指挥、黑河警备司令。“九一八”事变后，受南京国民政府命出任黑龙江代理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副司令。11月，率部在嫩江桥奋起抗击日军。12月，任黑龙江省主席。1932年2月，妥协投降，就任伪黑龙江省长。3月，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4月，在黑河通电反正，继续抗日。组成东北救国抗日联合军，自称总司令，但终因势单力薄，于12月退入苏联境内。1933年回到上海，后寓居天津英租界。1936年12月去西安，支持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的爱国行动，在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上签名联署。1937年抗战爆发，被任为东北挺进军司令，率军在绥远抗战，吸收共产党人和东北大学学生参加挺进军。1940年5月，重庆国民政府委任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设省府于陕西榆林。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委员。次年9月，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1948年底，力劝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事宜。1950年11月在北京病逝。

【任弼时】（1904—1950）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原名培国。湖南湘阴人。1919年在长沙求学时开始参加爱国活动。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到苏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回国后在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任教。1925年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兼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1926年任团中央

代理书记，主持团中央日常工作。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此后，曾两度被捕入狱。营救出狱后历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武汉行动委员会书记。1931年1月在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江西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1933年5月任中共湘赣边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1934年7月任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师，任中央分局书记，随后与贺龙一起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二方面军组成后，任政治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1938年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40年回国后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43年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随毛泽东留守陕北，协助毛泽东组织全国的解放战争。1949年春，筹备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推为青年团名誉主席。1950年10月27日病逝。

【杨根思】（1922—1950） 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江苏泰兴人。1944年参加新四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作战勇敢顽强，曾荣获战斗模范、爆破大王、华东三级及一级人民英雄称号。1950年9月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同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1月29日，在朝鲜咸镜南道长津郡下碣隅里围歼敌人的战斗中，他带领一个排坚守小高岭阵地，打退敌人多次反攻。当战斗到只剩他一个人时，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猛拉雷管，炸死众多敌人，自己壮烈牺牲，完成了切断敌人退路的任务。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

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称号，他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

【鲍罗廷】(1884—1951)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联顾问。全名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曾用名格鲁申贝格。前俄国威帖布克人。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年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9月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派驻中国国民党代表，到广州帮助孙中山推进国民党改组。10月被聘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参与国民党“一大”文件的起草。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参与筹建黄埔军校。11月伴随孙中山北上。1925年4月同冯玉祥会谈，促使冯决心参加国民革命。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被聘为高等政治顾问。1927年中共“五大”上，同陈独秀提出把革命根据地转移到西北去的主张。6月中旬，被国民党中央解除顾问职务。7月汪精卫公开叛变后，同其他苏联顾问一起返回苏联。1951年5月死于伊尔库茨克附近的劳动营。

【杜月笙】(1888—1951) 原名月生，又名镛。上海浦东人。父母早亡，浪迹上海街头。早年在一家水果行当学徒。1911年加入青帮“八股党”，以贩毒为生。并被法租界巡捕房雇用为包打听，得捕房督察长黄金荣赏识。遂与黄、张（啸林）结拜为把兄弟，成为“青帮”三大亨之一。1925年三人联合开设“三鑫公司”运销鸦片，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1927年4月，组织“中华共进会”，支持蒋介石“四一二”反共“清党”，杀害共产党员与革命志士多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任陆海空

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及法租界公董局华董、顾问。1929年与徐懋堂等开设中汇银行，自任董事长。1932年一二八抗战时，被推为上海地方维持会副会长。同年组织“恒社”，1934年充任上海地方协会会长。在此期间配合戴笠逮捕杀害进步群众，并向特务组织提供经费。抗日战争初期，参加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策划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任主任委员，建立淞沪别动总队司令部（后改编为“忠义救国军”）。上海沦陷后，拒不降日，逃往香港，任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常委兼第九区赈济事务所主任，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暗杀、策反等活动。1939年冬到重庆，成立“人民动员委员会”，网罗各路帮会分子。1941年冬建立恒社总社，在西南诸省发展势力。开设中华实业信托公司、与戴笠合营通济公司，大发国难财。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利用“接收”，先后任70多个部门的董事长、理事长、会长。1948年春被推为“国大代表”。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携家逃往香港。1951年8月病逝。

【陈果夫】（1892—1951） 原名祖焘，字果夫。浙江吴兴人。出生于吴兴世族。早年就学私塾，1905年随其三叔陈其采赴长沙，入明德学校肄业。1907年进杭州陆军小学学习，1911年加入同盟会。毕业后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在此应其二叔陈其美之嘱，组织同盟会分会，参与秘密活动。1913年曾赴日本治病、游历，旋回国参加二次革命，1915年底参与上海讨袁活动，在此期间与蒋介石结识。1918年转入上海金融界活动。1920—1922年间与张静江、蒋介石等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为交易所经纪人之一、茂新号经理。1926年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不久应蒋

介石之召赴广州，“整理党务案”通过后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代理部长，同时兼任中央组织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委员及中央政治会议秘书，从此逐步掌握国民党组织人事大权。“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时，在上海积极支持蒋介石“清党”反共。1928年起与其弟陈立夫成立中央俱乐部（简称C·C），后又成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控制国民党党务、组织和特务系统，成为蒋介石嫡系中的一个重要派系。从1939年7月至1945年10月，任蒋介石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主管国民党党政人事安排，并利用这一职务与其弟陈立夫继续发展C·C系势力。在1945年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常委。抗战胜利后，活动重点由党务转向经济，先后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国民党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等职，利用政治特权，巧取豪夺，聚敛财富，支持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1948年12月去台湾养病，1951年8月病逝于台北。

【杨连弟】（1919—1952） 天津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曾在修复陇海路八号高桥时，荣获“登高英雄”称号。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5月15日在朝鲜平安南道抢修清川江大桥时牺牲。后因功绩卓著，被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追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连弟连”。

【邱少云】（1931—1952） 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四川铜梁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2年10月11日在朝鲜金化反击敌占三九一高地的战斗中，他所在的排奉命在夜间潜伏在距敌60余米处的山脚，待次日傍晚配合大部队发动进攻，以便突袭敌人。12日中午，他身边的野草被敌人投掷的燃烧弹引着，烈火烧身。为了不暴露部队埋伏地点，他忍着剧痛，坚持不动，直到壮烈牺牲，保证了整个战斗的胜利。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黄继光】（1930—1952） 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四川中江人。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2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2年10月20日在朝鲜江原道金化郡上甘岭战役中，他所在的部队奉命夺取某高地，当部队被敌人一个集团火力点所阻时，他主动要求担当爆破任务，冲向敌人地堡。在连续打跨几个火力点后，发现还有一个火力点在顽抗，严重影响部队前进，他忍着重伤剧痛，从地上爬起来，毅然直扑上去，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正在扫射的机枪枪孔，保证部队完成攻克高地的任务，壮烈牺牲。根据他生前的申请，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称号。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汤恩伯】（1898—1954） 本名克勤。浙江武义人。毕业于闽浙军讲武堂，后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6年回国参加北伐。1931年任国民党政府军第八十九师师长，参与了对江西中央红军的围剿和镇压福建十九路军兵变。抗战初期，曾任第十三军军长、第

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等职。是花园口决堤惨案的执行者。参与了南口、保定、娘子关和台儿庄等战役。抗日战争结束后，任南京卫戍司令、陆军副总司令、代理陆军总司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等。1949年上海解放战争中去了台湾。后任台湾国民党“总统府战略顾问”。

【黄金荣】（1868—1953）字锦镛。祖籍浙江余姚，生于江苏苏州。1880年全家迁上海，曾在裱画店当学徒，后混入流氓行列。1892年到法租界巡捕房当“包探”，卖身投靠租界当局，备受赏识，升为法租界警务处唯一的华人督察长。其间，广收门徒，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培植帮会势力，并与杜月笙、张啸林等合办三鑫公司，包揽法租界烟、赌两项特种事业，聚敛财富，欺压人民。1927年“四一二”政变中，积极追随蒋介石，和杜月笙等组织“中华共进会”，从事反共活动，指挥流氓武装袭击工人纠察队，诱杀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蒋介石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抗日战争时期，执行曲线救国政策，派遣门生参加汉奸组织和汪伪政府，为日军运销烟土充作军饷。抗战胜利后，又以当地绅耆身份受到蒋介石接见，以其帮派势力为巩固国民党统治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上海军管会教育下，呈交自白书，登报检讨自己罪行。1953年病死上海寓所。

【邹鲁】（1885—1954）字海滨。广东大埔人。1903年入潮州韩山书院，1905年到大埔教书，加入中和堂后加入同盟会。1908年和1911年两次参加广州起义。1913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袁世凯解散国会后，逃往日本，进早稻田大学。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不久回香港，积极策划反袁斗争。1916年袁死后，复任国会议员。

1917年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财政次长。1920—1921年任两广盐运使。1922年受孙中山命，策动桂军讨伐陈炯明，旋任广东省财政厅长。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同年夏，出任广东大学校长。终因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孙中山决裂，并密令组织反动社团与共产党组织的团体对抗，1925年逃离广州，纠集谢持等于11月间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形成“西山会议派”。在北京等地设立地方党部，并在上海另组“中央党部”。次年3月，在上海召开非法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任中央执行委员，企图分裂国民党。后被广州国民党“二大”开除党籍。中山舰事件后，向蒋介石拍发贺电。1932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1935年转为拥蒋，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常委及国府委员。“七七”事变后，先后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委员。1949年退往台湾。次年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54年2月死于台湾。著有《中国国民党史稿》、《回顾录》、《邹鲁文存》等。

【高岗】（1905—1954） 陕西横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红二十六军政委和红二十七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曾参与创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抗战时期，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区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理政委、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兼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

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被揭露与饶漱石一起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后自杀。1955年3月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开除党籍。

【张澜】（1872—1955） 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之一，字表方。四川南充人。1894年中秀才，不久补廪生。1903年赴日本留学，进东京弘文书院。次年因提出西太后退朝、还政于光绪，被清政府驻日公使派人押送回国。1911年6月，以南充代表出任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临时会副会长，参加保路运动。武昌起义爆发后，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1913年4月当选为国会议员。1916年任嘉陵道尹。1917年11月，被北京政府任为四川省长。1925年12月，任成都大学校长。1930年离职回南充。1934年任四川安抚委员会委员长。翌年秋，在成都与邵从恩等发起组织“四川省乡村建设期成会”，提倡推广乡村建设运动。抗战爆发后，被聘为国民参政员。1939年11月，和黄炎培等在重庆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月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继黄炎培后任主席。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任主席。1946年以民盟代表身份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11月，带领民盟拒绝参加伪国大，将参加伪国大的民社党清除出盟。1948年1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主张与中共密切合作。1949年6月，赴北平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2月继续当选民盟主席。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2月在北京病逝。著有《说仁说义》、《四勉一戒》和《墨子贵

义》等。

【谭平山】(1886—1956)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之一。号鸣谦。广东高明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入北京大学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发起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中共广东支部支部长。1923年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在中共第四、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农民部长。大革命时期，曾作为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任组织部长。1927年3月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任国民政府委员兼农政部长。8月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被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11月在中共临时中央政局扩大会议上被开除党籍。1930年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3年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任主要负责人。1948年1月在香港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务委员。同年9月进入解放区。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和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等职。1954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3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黄敬】(1912—1958) 原名俞启威。浙江绍兴人。1931年秋入青岛大学物理系。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同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任山东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后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1933年夏，因叛徒出卖被捕。经多方营救，当年秋出狱，回上海家中治病。1935年秋，入北京大学数学系。积极发动和领导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爱国救亡运动。1936年1月，与彭涛、姚依林等人在西山开会，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4月任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学委书记。1937年2月，任北平市委书记。1946年，任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主任、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1947年11月，参加解放石家庄战役，负责接管工作。1948年5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部长。天津解放后，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天津市市长。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一机部部长。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杜凤瑞】（1933—1958） 河南方城人。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参加渡江战役，并在西南剿匪战斗中立二等功。1952年3月调入空军预科学校学习。1955年毕业后，分配到某飞行部队作驾驶员。195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10月10日凌晨，驾机随所在部队在福建龙田上空与台湾国民党空军展开激战，在敌机偷袭机队时，为援救战友，单机冲入敌机群，受重创后仍击落两架敌机。后在跳伞时被敌机击中牺牲。

【李济深】（1885—1959）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人。字任潮。原籍江苏，生于广西苍梧。1903年至1914年先后在黄埔陆军中学、陆军速成学堂、陆军讲武堂、军咨府军官学校（后称陆军大学）学习。1920年任孙中山军政府属下粤军第一师副官长。1921年任第一师参谋长。1923年任第一师师长。1924年1月在中

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6月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1925年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在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留守主任。1926年4月任黄埔军校副校长。7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常务委员。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曾参与广州四一五大屠杀。5月兼任广州政治分会主席。不久又兼广东省政府主席。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1928年2月任国民政府委员，3月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副校长。其后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汤山。1931年被解禁，继续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任训练总监。1932年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兼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1933年11月联合十九路军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当选为革命政府主席。并宣布退出国民党，组织生产人民党。1934年1月事变失败后到香港，领导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35年参与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国民党军委会委员、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军委会西南办公厅主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曾到敌后组织抗日武装，并参与筹建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创办《文汇报》，1947年出走香港。1948年1月1日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选为主席。5月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并于12月北上。1949年1月到达东北解放区，与其他民主人士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接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0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1月继续当选为重新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1954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马歇尔】（1880—1959） 美国外交官，军人出身。20年代初次来华，在驻天津美军中任职。1939—1945年，任美军总参谋长。1945年11月以杜鲁门总统特使身份再次来华，支持司徒雷登为美驻中国大使，以军事调停美方代表身份，为国共和谈奔走。后调停失败，1947年1月奉召回国，出任美国国务卿。同年6月他提出援助欧洲经济复兴的计划，即“马歇尔计划”。1950—1951年任美国国防部长。1959年病故。1976年美国编辑出版了有关他出使中国的回忆录《马歇尔使华》。

【卫立煌】（1896—1960） 字俊如。安徽合肥人。早年在粤军中服役。1926年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十四师师长。1929年起任第四十五师师长、第十四军军长。抗战时期，先后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山西前线抗战时和八路军接触较多。解放战争后期，任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因作战不利，被蒋介石撤职查办，软禁于南京。1949年获释后出走香港。1955年3月由香港到北京，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等职。

【林伯渠】（1886—1960） 名祖涵，号伯渠，字邃园。湖南临澧人。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加入同盟会。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参加护法战争。1920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在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参与安排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俄代表越飞同孙中山的会晤，以及陈独秀、李大钊同孙中山的会晤。1924年1月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参与举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5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

员会委员兼监察委员。不久递补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被蒋介石排挤出国民党中央，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并随军北伐。1927年8月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财务委员会主席。1928年赴苏联，在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院学习。1932年回国。次年3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长和办事处主席。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任红军驻西安联络处的红军总代表。1937年7月与周恩来、秦邦宪前往庐山同蒋介石谈判，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共出席国民参政会7名参政员之一。1937—1948年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林祖涵】即“林伯渠”。

【阎锡山】(1883—1960) 晋系军阀首领。字百川。山西五台人。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5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年回国，历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习、监督，新军第四十三混合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标统等职。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省长。1927年通电服从三民主义，归附国民党政府，并在山西进行“清党反共”，1928年2月，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随

后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等一起，进行了北伐张作霖的战争。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北平分会代理主席兼平津卫戍总司令等职。1930年，联合冯玉祥、汪精卫等人，结成反蒋联盟，进行“中原大战”。失败后逃居大连。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返晋，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不久恢复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1936年在中共影响下，同意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并出任会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同意在山西省内建立青年抗敌决死队，进行抗日，1939年底，发动反共“十二月事变”。1941年与日本达成共同防共的《汾阳协定》。抗战胜利后，参与蒋介石发动的内战。1949年6月3日在广州就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同年12月18日去台湾。曾任国民党当局总统府资政等职。

【陈嘉庚】（1874—1961） 中国现代爱国华侨领袖。福建同安集美村（今属厦门市）人。早年在家乡读私塾。1890年赴新加坡随父经商。1910年，在新加坡加入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募款支持闽省革命党人和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13年在家乡创办集美学校。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1928年在新加坡组织华侨成立“山东惨祸筹赈会”，被推选为会长。抗日战争爆发后，组织“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被推选为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0年，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抗战将士和进行视察。同年12月返回新加坡。后任南洋闽侨总会主席、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主席等职。1942年2月，日本侵占新加坡后，避居印度尼西亚的爪哇。1945年10月返回新加坡。1946年11月创办《南侨日报》，任报社董事会主席。1947年5月，领导新加坡华侨组成“星

州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并任主席。1949年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同时继续担任南侨总会主席。1950年2月，回到新加坡，旋即回国定居于集美。1953年1月，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1961年，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并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届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曾称誉他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陈赓】（1903—1961）原名庶康。湖南湘乡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担任副队长。1926年赴苏联学习。1927年回国参加南昌起义，任营长。起义失败后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1930年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红四方面军十二师师长。后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军步兵学校校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任军委干部团团长、红一军团一师师长。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太岳军区司令员、太岳纵队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二野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中央委员，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李克农】（1899—1962）安徽巢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在上海从事中共中央保卫工作。1931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西安事变时，任中共赴西安谈判代表团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央情报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军委情报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胡适】（1891—1962） 现当代学者。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幼年在家读“程朱之学”。1904年到上海，先后就读于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留美官费生，先入康奈尔大学农科，后改文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17年1月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为文学革命的发端。7月回国，被北京大学聘为文科教授，次年被选入北大评议会，任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和英文科教授会主任。同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倡导新文化运动。1919年2月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7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提出“好人政府”的主张。1923年在北大创办并主编《国学季刊》。1925年曾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1927年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兼秘书、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国民政府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委员。与徐志摩、梁实秋创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1928年任中国公学校长。1930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次年任北大文学院院长。1932年创办《独立评论》。九一

八事变后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教育、农村复兴等委员会委员。1935年接受香港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以后共接受欧美各大学授予的35个名誉博士学位。抗战爆发后应邀参加国民政府国防参议会。1938年9月出任驻美大使，曾代签《中美互助条约》。1942年9月改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3年被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1945年5月任中国代表团团员出席联合国成立会议。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校长。参加“国大”并任主席团成员，参与起草《中华民国宪法》，领衔提出《戡乱条例》。1949年赴美。此后曾任台湾国民党“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等职。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病逝。著有《白话文学史》、《胡适文存》、《胡适文选》、《胡适论学近著》等。参见第六卷中的“胡适”。

【龙云】（1887—1962）原名龙登云，字志舟。云南昭通人。彝族。1914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曾任滇军唐继尧部军长，1927年发动兵变，逼唐下台。1928年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1935年任“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黔滇绥靖公署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陆军副主任。1945年被蒋介石免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46年底潜往香港，支持反蒋民主活动。1949年8月13日在香港联合黄绍竑等44位国民党知名人士发表声明，宣布起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50年1月到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

席。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以后平反。

【司徒雷登】（1876—1962） 美国人。生于中国杭州。父亲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896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州汉普登—西德尼学院。1904年返华在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并在中国传教。辛亥革命时期，任美联社驻南京特派通讯员。1919年开始任燕京大学校长。1929年任校务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军拘禁于北平。日本投降后，重任燕京大学校务长。1946年7月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离华返美。1954年在美国发起“自由中国基金”活动。

【章宗祥】（1879—1962） 字仲和。浙江吴兴人。1903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后在清政府民政部任职。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1914年任司法总长。1916年任驻日公使，在段祺瑞指使下，曾多次与日本政府签订秘密协定，出卖国家主权。五四运动期间，被斥为卖国贼，后北洋政府被迫将其免职。1920年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1925年出任北京通商银行总经理。抗战时期，任伪华北政府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和电力公司的董事长。1945年后迁居上海。

【胡宗南】（1896—1962） 字寿山。浙江镇海人。1916年毕业于湖州中学，曾任小学教员，后出走上海。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参加第一次东征战役，任营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编遣会议后，任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第一旅旅长，积极追随蒋介石参加同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等部的军阀战争。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中，任第一军第一师副师长、代理师长。1932年参加对“围剿”鄂豫皖苏区的“围剿”，翌年进驻陕西

陇南。1935年率部入川阻挡红军长征北上。是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次年擢升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第十七军团军团长，投入淞沪会战。1940年后，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屯兵西北，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1945年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曾在郑州主持日本受降仪式。1947年3月，率部进犯延安。受到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强有力的打击。翌年任川陕甘边区绥靖主任。1949年调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退守四川、西康等地，企图阻挡人民解放军南下，遭全歼后由成都去海南岛。旋奉蒋介石命，回西昌整顿残部，“戴罪立功”。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进军西昌后，退往台湾，曾任台湾“总统府”战略顾问、澎湖防守司令官。

【赫尔利】（1883—1963） 赫尔利·帕特里克·杰伊。美国人。军人出身。1929—1933年胡佛总统时期，任美国陆军部长。1931年曾来华访问。1944年8月以罗斯福总统代表身份来华，后受命继高思为美国驻中国大使。大力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1944年11月7日到延安同中共商讨和国民党政府成立联合政府事宜，并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后未能实施。1945年11月27日宣布辞职，后回国。

【沈钧儒】（1875—1963） 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字秉甫，号衡山。浙江嘉兴人。清朝进士。早年留学日本。1907年回国后从事立宪运动，曾参与组织立宪国民社。1912年5月参加同盟会。此后，历任浙江教育会会长、国会参议院浙江省候补议员、北京参

政院秘书长等职。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在浙江积极开展民治运动。1927年被国民党逮捕，后经营救获释。1928年在上海法科大学任教，同时兼行律师职务。1932年参加宋庆龄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5年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在国统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5月与邹韬奋等人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同年11月，与邹韬奋、李公朴等7人被国民党逮捕，为“七君子”之一。1937年七七事变后获释。此后，继续从事抗日救国运动，曾在武汉筹组抗敌救亡总会，并创办《全民》周刊。1941年倡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抗战胜利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后，任救国会主席。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第一至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主席等职。著有《宪法要览》、《制宪必携》等。

【罗荣桓】（1902—1963） 原名慎镇。湖南衡山（今衡东）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鄂南暴动和秋收起义。后历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一师一团特务连党代表、红四军第二纵队党代表、红四军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1935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大学一科政委、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期间，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政委、代师长、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委、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东北野战军政委、第四野战军第一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

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中共“七大”中央委员、“八大”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欧阳海】（1940—1963） 湖南桂阳人。1958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次立功受奖。1963 年 11 月 18 日随部队行军经过铁路时，见驮着炮架的马被驶近的客车所惊，突然跨上铁路，在火车与马行将相撞之际，奋不顾身，跳上铁路将马推出铁轨，壮烈牺牲，避免了一起重大事故。后被所在部队追认为“爱民模范”，生前所在班于 1967 年 1 月 22 日被国防部命名为“欧阳海班”。

【于右任】（1879—1964） 原名伯循，字右任，别署刘学裕，笔名神州旧主等。陕西三原人。1890 年入私塾读书。1903 年中举人，任商州中学堂监督。1904 年因讥刺时政，遭清政府拿办，亡命上海，入震旦学院。1906 年赴日本，加入同盟会。次年归国，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任社长。后又创办《民呼日报》、《民立报》，宣传革命。1912 年，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1913 年宋教仁被刺后，致力于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8 年返陕西，任靖国军总司令。1922 年与人创办上海大学，任校长。1924 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同年底随孙中山北上，任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委员。1927 年初，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策应北伐军。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常委、军事委员会常委、审计院院长。1931 年后长期任监察院院长。1938 年任最高国

防委员会常委。1949年以后居住台湾。在书法诗词方面颇有建树，有《右任诗存》、《右任文存》、《右任墨存》、《牧羊儿自述》等行世。

【陈诚】（1898—1965） 浙江青田人。字辞修。早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1922年该校第八期毕业。1924年后，曾任黄埔军校炮兵队队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预备第一师第三团团团长、六十三团团团长、第二十一师师长、军事委员会军队厅副厅长、南京警备司令、第十一师师长、第十八军军长。曾经参加第三、四、五次对工农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围剿”。1935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陆军整理处主任及峨眉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1936年任军政部常务次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前敌总指挥、武汉卫戍总司令兼湖北省政府主席、珞珈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远征军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司令、东北行辕主任等。抗战胜利后，历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兼海军司令。先后指挥国民党军队进犯山东和东北解放区，被击败后辞职。1948年去台湾，任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司令、“行政院”院长、“行政院”设计委员会主任、“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

【柯庆施】（1902—1965） 原名柯尚惠，笔名怪君。安徽歙县人。1920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出席莫斯科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4年春到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同年赴海参崴做华工工作。1926年回国后，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

记。1929年秋参加组织大冶兵暴。后任红军五纵队政治部秘书长、中共中央秘书长。1933年到张家口任中共前线委员会书记，参与领导抗日同盟军工作。后历任中共河北省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石家庄市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市市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支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批判《海瑞罢官》的阴谋。“文革”前在四川病逝。

【陈铭枢】（1889—1965）字真如。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毕业。后加入中国同盟会。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1926年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总政治部副主任。1929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30年所部改编为第十九路军。曾参加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后，任京沪卫戍司令。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1933年福建事变时，参加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政府委员。抗战期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员、国民外交协会主席，在汉口、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民主运动。1943年与谭平山筹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1945年被选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常务干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

【罗隆基】（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于192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英国留学，获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先后任光华、南开、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新月》杂志主编，北京《晨报》社社长，天津《益世报》主笔等。1931年与张君勱组织再生社，翌年改组为中国国家社会党。1941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代表民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民盟在1947年被迫解散，曾被国民党在上海软禁。1949年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四届政协委员等。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改正。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现代爱国民主人士。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1902年应江南乡试中举。次年因遭缉捕而逃亡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同盟会上海总干事。辛亥革命中参与策动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省教育会副会长、省议会议员。1917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发起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为十九路军筹募物资、款项。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时，组织上海地方协会。抗日战争期间，为国民参政员。连任第一、二、三、四届参政员。1940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为第一任主席。1945年底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1946年1月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1948年主持民主建

国会理事会，推代表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1949年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

【李达】（1890—1966） 哲学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人。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8月回国，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主编《共产党》月刊。1921年3月担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负责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宣传主任。同年9月创办中共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任主编。1922年出席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应毛泽东邀请到湖南任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1923年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激烈争论，离开党组织。1923—1926年任湖南政法专门学校教授。1927年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和代理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国民党湖南省党校教育长、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1928年到上海创办昆仑书店。1930—1931年任上海政法学院及暨南大学教授。1932—1937年先后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兼经济系主任、中国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并受中共党组织委托多次到冯玉祥将军处私人讲学。1938年到桂林任广西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39年再度到重庆冯玉祥处。1941年9月后困居家乡并受到国民党当局监视。1947—1949年任湖南大学教授。1949年5月到北京，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2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和常委、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中国法学会理事、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等职。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同年8月在武汉去世。1980年被平反昭雪。主要著作收入《李达文集》。

【冈村宁次】（1884—1966） 日本人。战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曾留学欧洲。1905年参加日俄战争，1923年任陆军参谋本部中国班班员和中国课课长。1925年任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1928年任日本步兵第六联队队长，是济南惨案主凶。1932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后任关东军副参谋长。1933年代表日本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1934年任日军参谋部第二部部长。1937年历任日本第十一军、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在中国实行了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1945年8月延安公布的日本战犯名单中，被列为首要战争罪犯。解放战争期间，充当蒋介石的秘密军事顾问，为蒋策划向解放区的进攻。1949年1月被国民党政府宣判“无罪”，释放回国。1950年又被蒋介石聘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

【陈叔通】（1876—1966） 浙江杭州人。晚清翰林。1894年赴日本留学。晚清戊戌变法时，是维新派人物。辛亥革命后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后任商务印书馆董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抗日战争中积极参加各种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参加筹备上海各

界人民团体联合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等职。

【曹汝霖】（1877—1966） 字润田，上海人。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次长、交通总长、财政总长。因出卖国家主权，五四运动时被国人斥为卖国贼，北洋政府被迫将其免职。抗战时期，曾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1949年去台湾。

【吴玉章】（1878—1966） 原名永珊，号树人。四川荣县人。1903年赴日本留学。追随孙中山积极参加反清民主革命活动，190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被选为评议部评议员，并负责主持《四川》杂志。1911年回国。武昌起义前夕，领导荣县起义，并建立荣县革命政权。1912年应孙中山之邀，到南京政府秘书处工作。1915年与蔡元培等倡办留法勤工俭学会。1922年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23年曾与杨闇公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国共合作时期在国民党二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同年10月去莫斯科学习。后任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1938年回国后，任陕甘宁边区宪政促进会会长、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1945年12月随周恩来到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后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华北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并兼任中国教育工会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著有《辛亥革命》等。

【白崇禧】（1893—1966）字健生。广西临桂县人。回族。早年曾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军事。毕业后回广西，在旧桂系部队任下级军官。1924年与李宗仁、黄绍竑联合组织“定桂讨贼军”，任参谋长、前敌总指挥，接连击败陆荣廷、沈鸿英，结束了旧桂系在广西的统治，成为与李、黄齐名的新桂系三巨头之一。1924年11月任广西绥靖督办署参谋长。1926年3月，任由桂系军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参谋长。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兼任淞沪警备司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积极支持蒋介石。南京政权建立后，参加新军阀宁汉战争，击败唐生智部，控制两湖地区。1928年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率部参加讨伐奉系张作霖的第二次北伐。1929年桂系在蒋桂战争中失败后，与李宗仁长期退处广西。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参与淞沪、徐州和武汉等重大战役作战和指挥。1938年11月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会桂林行营主任。1940年10月与12月，直接参与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解放战争初期曾受蒋介石之命率兵镇压台湾二二八起义。后历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华中“剿匪”总司令、军政长官等职。1948年底曾通电逼蒋介石下台。李宗仁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后，力主拒绝《国内和平协定》，破坏国共和谈。1949年底退往台湾。在台湾任蒋介石“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66年12月在台北去世。

【黄绍竑】（1895—1966）字季宽。广西容县人。早年入广西陆军小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6年后，在桂军中任排、连、营长。1922年任广西自治军第三支队司令。是年被孙中山委为广西

讨贼军总指挥。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与李宗仁、白崇禧等一起成立定桂讨贼联军，在击败陆荣廷、沈鸿英等旧桂系势力，统一广西大业中起了重要作用，并任广西民政长。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党代表，北伐时，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兼留桂军军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湖北省政府主席。1949年4月，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与张治中等到北平参加国共和平谈判，商定《国内和平协定》。16日受代表团委派回南京劝告李宗仁和国民政府其他要员接受《和平协定》。在南京方面拒绝签字、和谈破裂后，愤然宣布离宁赴港，联合44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士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毅然宣布与国民党当局决裂。同年8月，应邀到达北平，以特别邀请人士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邓拓】（1912—1966）原名中子健、中云特，笔名马南邨、向阳生等。福建闽侯人。1930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的反蒋爱国斗争。1937年到晋察冀边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中共中央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党报委员会书记和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中华全国新闻联合会主席、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

记、《前线》杂志主编、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文化大革命”初与吴晗、廖沫沙被污蔑为北京市委的“三家村”，受到惨酷的政治与人身迫害，1966年5月18日含冤去世。主要著作有《中国救荒史》、《燕山夜话》、《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等，与吴晗、廖沫沙合写有《三家村札记》。

【周小舟】（1912—1966） 原名怀求，字元诚。湖南湘潭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入北平师范大学学习。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曾任北平民族武装自卫会宣传部部长、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宣传部长。后赴延安，曾任毛泽东秘书。1938年后，任中共冀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冀察一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北岳区党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副书记、第一书记兼湖南省军区政委、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中共八大候补中央委员。1959年被错定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受到错误处理。“文革”中又受到迫害。1979年中共中央予以平反昭雪。

【李立三】（1899—1967） 中国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原名隆郅。湖南醴陵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往湖南工作。同年11月以办平民教育名义到安源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先后创建中共安源煤矿党支部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并任支部书记和俱乐部主任，与刘少奇等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从事恢复和建

立党组织的工作。1924年1月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5年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同年冬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1926年4月回广州参加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同年9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武汉办事处主任、湖北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参加领导了收回汉口、九江租界的斗争。1927年4月参加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工人部部长。6月，出席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7月与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张国焘五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取代陈独秀领导工作。8月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广州起义失败后，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28年6—7月在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8年冬至1930年秋在上海党中央工作，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兼秘书长、宣传部长。1930年6—9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以后在实际工作中认识并改正了错误。1931年去苏联学习。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并担任《救国时报》主编。1938年2月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被捕。1939年11月获释。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1月回国，先后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东北三人小组中共方面首席代表、中共中

央东北局敌工部、城工部部长。1948年8月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49年到北京，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劳动部部长等职。1955年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1960年起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政协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1967年6月22日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1980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蒋光鼐】(1887—1967)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字憬然。广东东莞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副师长、第十一军副军长。1927年后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淞沪警备司令，率部驻防上海。1932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上海时，率十九路军英勇抗敌。不久被蒋介石调往江西与红军作战，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绥靖主任。1933年11月，因不满蒋介石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人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反蒋。失败后出走香港。抗战爆发后，任国民政府第四战区参谋长、副司令长官，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1946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常委、纺织工业部部长、民革中央常委等职。

【溥仪】(1906—1967) 清末皇帝。满族，爱新觉罗氏。1908年

登位，年号宣统。1912年2月退位。1917年张勋扶其复辟，旋即失败。1924年被废除皇帝称号，逐出紫禁城，后移居天津。1932年任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改称“满洲帝国皇帝”。1945年8月被苏军俘获，后移交给中国政府。1959年被特赦释放。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著有《我的前半生》。

【孔祥熙】（1880—1967）字庸之。山西太谷人。1901年留学美国，毕业于耶鲁大学。曾参加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阎锡山顾问。1924年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厅长。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任武汉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后历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部长、财政部部长、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等职。长期控制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大权，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一。1948年后定居美国。1967年病逝于纽约。编有《孔庸之先生讲演集》。

【陈昌浩】（1906—1967）湖北汉阳人。1926年7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11月回国。后转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4月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中央分局书记。同年9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委，11月任红四方面军政委。1933年1月到达川北地区后，兼任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4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后参加长征。1936年10月参与率领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西路军政委。同年12月任军委委员。1937年3月返回延安。1939年8月去苏联养病。1952年回国，任中共中央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徐特立】（1877—1968） 原名懋恂，又名立华，字师陶。湖北善化（今长沙县）人。早年曾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辛亥革命后任湖南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曾赴日进行教育考察。后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五四运动时期，提倡并亲自参加留法勤工俭学。1924年夏回国。后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校长，并创办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8年赴苏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代部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自然科学学院院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员、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等。主要著作有《徐特立文集》、《徐特立教育文集》等。

【蔡廷锴】（1892—1968）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之一。字贤初。广东罗定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副师长、第十师师长。1930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兼军长。1932年1月日军侵犯上海，率部奋起抵抗。不久被调往福建和红军作战。曾与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1933年11月，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发动福建事变，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出

师讨蒋。失败后赴香港。1935年与李济深等人一起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抗战爆发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在两广指挥作战。1946年，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8年，在香港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等职。

【邵力子】（1881—1967） 原名闻泰，又名夙寿，字仲辉。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1910年后任上海《民立报》、《民国日报》编辑。1919年参加国民党。1920年在上海参加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与柳亚子等人发起组织新南社。1924年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农工委员和农工部秘书。1925年离沪抵穗，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7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届执委扩大会议。1927年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中央监察委员、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抗战期间，曾任军委会战地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驻苏大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作为国民党政府代表参加国共重庆谈判。1949年4月任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代表在北平同中共谈判。《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被南京政府拒绝后，留于北平。同年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中苏友协副会长等职。

【许广平】（1898——1968） 笔名景宋。鲁迅夫人。广东番禺人。

1923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1926年毕业。1927年与鲁迅结婚。1937年与郑振铎等编辑出版《鲁迅全集》。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7年任上海妇女联谊会主席、《民主》周刊编辑。1948年底经香港转到东北解放区。1949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有《欣慰的纪念》等。

【廖耀湘】（1903—1968） 号建楚。湖南邵阳人。1925年入湖南陆军第三师当兵。1926年到广州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六期骑兵科学习，1929年毕业。1930年赴法国学习机械化骑兵。回国后，在中央军校任教。抗日战争期间，参加了南京保卫战，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二师参谋长、中国远征军新二十二师长、新六军军长等。并随远征军去缅甸、印度与日军作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东北“剿总”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官、辽西兵团司令。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61年被特赦释放。后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委员。

【曾希圣】（1904—1968） 湖南资兴人。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二师的团党代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长江局军委秘书长。后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总司令部科长、中央军委二局局长，负责情报工作，在反“围剿”战争和红军长征中成绩卓著。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七师政治委员、皖江区党委书记，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解放

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国统区工作部部长，第二野战军副参谋长，豫西军区司令员，皖北区党委书记，南征北战，为解放全中国作出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华东局第二书记，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程潜】（1882—1968）字颂云。湖南醴陵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1921年任孙中山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时随孙中山登永丰舰应变，后任讨逆军总司令。1923年任孙中山大本营军政部长。1924年攻鄂军总司令。1925年率部参加平定杨、刘叛乱。7月任国民政府委员，后任东征军第三纵队纵队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7月率部北伐，两次攻占南昌。1927年1月任江右军总指挥，进军安徽、江苏。3月占领南京后任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宁汉合流后，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讨唐（生智）第四路军总指挥。1928年2月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后被桂系软禁于武汉。九一八事变后重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1935年任参谋总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曾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1939年任西安行营主任、天水行营主任。1940年任军委会副总参谋长兼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1945年任武汉行营主任。1946年任武汉国民政府行辕主任。1948年3月参加“副总统”竞选，后任长沙绥靖主任兼湖南省主席。1949年8月与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率部起义，湖南宣告和平解放。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南省省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张君勱】(1887—1969) 原名嘉森。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人。1903年进南京高等学堂学习。1906年公费留学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次年加入梁启超在东京组织的政闻社，并继梁启超主持东京社务。1909年创刊《宪政新志》，宣传君主立宪。1910年夏毕业回国，辛亥革命爆发后，任宝山县议会议长。1913年赴德国留学。1915年回国，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1917年任冯国璋总统府秘书。1918年赴欧洲游历，在德国从唯心主义哲学家倭铿学哲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方面继续反苏反共，同时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也有所指责。1929年遭蒋拘禁，经章炳麟、杜月笙等担保获释。不久被迫再赴德国，任教于耶那大学。抗战爆发后，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8年底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诬蔑陕甘宁边区为“封建割据”，八路军、新四军是“自立军制”。1939年代表国社党加入黄炎培等发起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次年与陈布雷合办“民族文化学院”，自任院长。1941年与黄炎培等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常委。1944年赴美国出席太平洋学会会议。翌年受国民政府委派以中国代表团成员名义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并任联合国宪章大会组委员。1946年，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回国出席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是年8月将国社党与民主宪政党合并，取名中国民主社会党。同年11月，受蒋介石拉拢，不顾民盟劝阻，向蒋递交了民社党出席国大代表名单，遭到谴责，被责令退盟。民社党亦由此分

裂。1947年任民社党主席。1949年11月去印度讲学。1951年到美国。1955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作所谓“中共政治”研究。1958年后，先后到德、日、意、英、印度、南越、新加坡等国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游说。1969年2月病逝于美国旧金山。

【贺龙】（1896—1969）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军事家。原名贺文常，字云卿。湖南桑植人。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1916年率青年农民持菜刀袭击芭茅溪盐局，夺取枪支组织农民武装。1922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讨贼联军第九混成旅旅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率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192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奉命回到湘鄂西地区组织和领导武装斗争。1928年初，在湘鄂西相继领导监利、石首、华容、南县等地的年关暴动和桑植起义。后在湘鄂西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至1929年夏，初步形成了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秋，率部去洪湖地区，与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红六军合编为红二军团，任总指挥，并使湘鄂边、洪湖两根据地连成一片。1934年6月，率部进入贵州，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同年10月，与任弼时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师，任红二、红六军团总指挥。随后又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并兼任中共湘鄂川黔军分会主席和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1935年11月率部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1936年9月，红二、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成红二方面军，任总指挥。长征途中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斗争。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深入敌后开辟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1938年12月挺进冀中，打破日军

多次“扫荡”。1940年2月返回晋西北，6月，连续进行了一个月的反“扫荡”战斗，作战250余次，歼灭敌人4500余人。同年11月，成立晋西北军区，任司令员。1942年6月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1945年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晋绥分局常委兼晋绥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西北军政大学校长、西北军区司令员、西安市军管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等职。1954年起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在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和人身摧残，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著有《南昌起义与我军建设》、《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等。

【刘少奇】（1898—1969）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绍选，字渭璜，曾用刘士奇、赵之启、胡服等别名。湖南宁乡人。1919年在长沙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转为中共党员，任中共旅俄支部委员。1922年夏返回上海，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不久被派往湖南，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参加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5年5月作为汉冶萍总工会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会后到上海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同年底在长沙被湖南军阀赵恒惕逮捕入狱。1926年1月获释，前往广州，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参加领导省港大罢工。5月在

广州参加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秘书长。后到武汉任湖北省总工会组织部长、秘书长，参加领导武汉地区工人运动。1927年1月与李立三领导武汉工人收回汉口英租界。4月，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在上海、天津、东北、华北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曾参加中共顺直（即河北）省委领导工作。1928年7月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审查委员会（即检查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0年3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员。同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委员长。1934年4月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第五军团党代表和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到达陕北后，继续领导工会工作，任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1936年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领导了山西新军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工作。1938年10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参与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1939年4月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中共中央华中军分会书记。1943年回延安，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5年4月在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7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1945年8—10月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兼任中央军委总

政治部主任。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后，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与朱德一起转移到华北，负责党中央委托的工作。7—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主持召开中共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战争时期，还兼任过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中央马列学院院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世界工联副主席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1959年4月、1965年1月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逝世。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主要著作收入《刘少奇选集》。

【李宗仁】（1891—1969）字德邻。广西桂林人。1910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护国、护法战争。1921年任桂军统领。不久接受粤军改编，任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司令。1922年改称广西自治军，任第二路司令。同年秋改任第五独立旅旅长。1923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兼广西陆军第一军军长。1925年与黄绍竑、白崇禧击败旧桂系沈鸿英部，统一广西，开始了新桂系在广西的统治。1926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候补监察委员。3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同年7月率师北伐。先后参加汨罗河、贺胜桥等战斗，在武昌攻城战中任总指挥。1927

年3月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参与蒋介石策划的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后任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委员兼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打败唐生智占领两湖地盘。1928年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随后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一起进行对奉系张作霖的二次北伐。同年10月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1929年3月在蒋桂战争中失败，出走香港。后返广西任护党救国军南路司令，与蒋、粤军交战，再次失败。1930年春与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被推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出兵湖南，参加中原大战。失败后退回广西。1931年5月与广东陈济棠结成反蒋粤桂联合战线，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第四集团军总司令。1932年被任命为南宁绥靖公署主任兼第九路军总指挥。1936年与陈济棠发动抗日反蒋的六一事变，任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总司令。不久失败，与蒋介石达成妥协，任广西绥靖公署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1938年3—4月间指挥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徐州失守后，督师转战于鄂西、豫南，在桐柏山、大洪山创立游击基地。1943年任军委会委员长汉中行营主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军委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1946年9月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1948年4月当选为南京政府副总统。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引退后任代总统。4月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5人代表团前往北平与中共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后飞往广州。年底经香港赴美国。1954年被蒋介石免去副总统职务。1955年在美国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反对“台湾托管”、“台湾独立”。1965年7月返回大陆。1969年1月30日在北京逝世。著有《李宗仁回忆录》。

【张治中】（1890—1969） 字文白。安徽巢县人。1916年保定军校毕业。1917年到广州追随孙中山，先后在粤军、桂军、川军中任职。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参加黄埔军校创建工作，任黄埔军校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学生总队长、军官团团团长，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及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航空局局长、航空学校校长等职。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赴欧洲考察。1928年回国后，历任国民党军委会军政厅厅长、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第五军军长、第四路军总指挥。1932年参加一二八上海抗战。1933年12月参加镇压福建事变。抗战时间，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参加八一三抗战。后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兼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抗战胜利后，参加国共重庆谈判。1946年1月，任最高军事三人小组国民党方面代表。后调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1949年4月1日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与中共谈判，形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和平协定被南京政府拒绝后，留居北平。6月，被国民党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6月20日，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69年4月6日在北京病逝。著有《张治中回忆录》等。

【章伯钧】（1895—1969） 安徽桐城人。1922年赴德国留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党代

表。南昌起义时任起义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起义失败后赴香港，遂脱党。参与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因失败流亡日本。抗日战争时期，任一届、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1947年当选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1948年在香港主持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后赴东北解放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交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一、三届常委、二届副主席、四届委员。1957年被定为“右派”，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予以改正。

【陶铸】（1908—1969）原名剑寒。湖南祁阳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回湖南从事兵运工作。1929年起先后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中共漳州特委书记、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创建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人民武装力量，组织和指挥了厦门劫狱斗争。1935年5月，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1937年经党营救出狱，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政委，参加领导创建鄂中游击区，积极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武装。1940年到延安，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任辽宁省委书记、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在平津战役中受中共中央委托，化装进入北平与傅作义谈判，后负责改编起义部队。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56年9月中共“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兼政治局书记处常务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打击和迫害。于1969年11月30日在合肥逝世。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

【许光达】（1908—1969） 原名德华。湖南长沙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1927年在宁都参加南昌起义部队，任排长、代理连长。1929年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曾任红六军参谋长、红十七师师长兼政委、红八师师长。1932年赴苏联学习。1937年回国。后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和教育长、抗大三分校校长、中央军委参谋部长兼延安卫戍区司令员、中央情报部一室主任、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八路军一二九师独立第二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三军军长、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人民解放军甲兵司令员兼装甲兵学院院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斯特朗】（1885—1970） 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全名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早年就学于奥伯林学院。190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多年从事儿童福利和社会工作。1921年到苏联，写了许多报道向世界人民介绍苏联革命成就。1925年首次来华，报道并支持省港大罢工。于1927年访问湖南农村，赞扬中国农民运动。1930年协助苏联政府创办英文《莫斯科新闻》，任主编和特约撰稿人。抗日战争期间曾两次来华，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

革命斗争和解放区军民的抗战活动。1946年第五次来华并访问了延安。1958年第六次来华访问，并定居中国。1970年在北京逝世。著有《斯大林时代》、《我为什么在七十二岁时来中国》等。

【马叙伦】（1885—1970） 又名夷初，字彝初。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早年受孙中山革命影响，参加柳亚子等发起组织的“南社”。1911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以后又参加反对袁世凯和南北军阀的斗争。曾任《大共和日报》总编辑、北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时，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参与发起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亲任书记、主席。并发动“索薪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先后担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部次长。“九一八”事变后，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组织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从事爱国民主活动，发表大量演说和文章，谴责抨击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1945年底同王绍鏊、周建人、林汉达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随后起草发表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提出停止内战、实现民主的八点要求，对当时的爱国民主运动起了积极影响。1946年6月23日，参加上海各界群众的反内战游行示威，被推举为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团团长，在南京下关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殴伤。揭露国民党当局残酷镇压人民，实行白色恐怖的法西斯统治。是年11月，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由香港到东北解放区，以后又到北平，参加筹备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建国大计的协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和高教部部长，曾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一、二届常务委员，全国政协第一、二、三

届常务委员、第四届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唐生智】（1889—1970）字孟潇。湖南东安人。1914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战争。1923年任湘军第四师师长兼湖南督办，和广东革命政府及中共湖南省委发生联系。1926年3月任湖南省代省长。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湖南省政府主席。1927年2—4月，先后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力主东征讨蒋。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出席庐山分共会议，指挥武汉政府军沿江东下讨蒋。11月与桂系之战失败后逃亡日本，所部为桂系改编。1929年蒋桂战起，接管旧部，被蒋介石委为讨逆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同年12月联合石友三反蒋，失败后匿居天津、香港。1931年参加粤方反蒋，任广州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常委。1932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1934—1939年历任训练总监部总监、军委第一厅主任、南京卫戍司令、军委会运输总监。此后在湖南东安及重庆闲居。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东安办学。1948年11月赴南京、上海，向蒋介石上书主张停战议和，并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有所联系。1949年4月到长沙与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商议湖南和平解放，曾出任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后，任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及政协湖南省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常委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等职。

【熊克武】（1884—1970）字锦帆。四川井研人。原四川地方实力派首领。早年留学日本东斌陆军学校。曾参加同盟会。1911年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后曾任四川军政府第五师师长、川东讨袁军总司令、川滇护国联军总司令、重庆镇守使、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督军、讨贼（曹锟、吴佩孚）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徐海东】（1900—1970）原名元清。湖北黄陂（今属大悟）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代理排长。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后，历任黄陂县赤卫军大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团长、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师长和第二十七师师长、红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师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师长和军长、红二十八军军长、中共鄂豫陕省委代书记、红十五军团军团长等。1934年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华中局委员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是中共八届、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70年3月在郑州逝世。曾主持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

【王进喜】（1923—1970）甘肃玉门人。1938年入玉门油矿当学徒。1949年后，在甘肃玉门石油管理局勘探公司三大队任工人、钻井队长。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率钻井队创造月进尺

5000 米的最高纪录。1960 年率 1205 钻井队赴大庆参加钻探石油大会战。历任钻井队队长、大队长、钻井指挥部副指挥、大庆油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4 年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6 年率 1205 钻井队奋战 11 个月，突破进尺 10 万米大关，创造了当时世界钻井的最高纪录。工作中身先士卒，被称为“铁人”，他所代表的工作精神，被称为“铁人精神”。1969 年 4 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谢觉哉】（1884—1971） 又名焕南。湖南宁乡人。1921 年参加新民学会。曾主编《通俗日报》、《湖南民报》，宣传革命思想。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任湖南特别法庭委员。1928 年到上海，负责编辑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和《上海报》。1931 年秋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湘鄂省委政治秘书长、《工农日报》主编兼文化部副部长、省委党校校长等职。1933 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毛泽东秘书、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部长。1934 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35 年 10 月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部长、司法部部长、代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审计委员会主席。七七事变后，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代表。1939 年后，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党团书记、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解放战争期间，任法律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长兼政法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宋子文】（1894—1971） 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人，生于上

海。宋嘉树（耀如）长子。早年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国学习。1915年哈佛大学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供职纽约国际银行业公司，又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17年回国，任汉冶萍煤铁公司上海总办处秘书。1923年10月应宋庆龄邀南下广州，帮助孙中山负责财政事宜。1925年任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商业部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为蒋介石筹措军费。1932年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1933年底在财政问题上与蒋介石发生分歧，辞去政府职务，出国游历考察。1934年6月成立中国财经开发公司，次年4月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其间，凭借其政治权力聚敛财富，逐渐与蒋介石、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形成官僚资本的“四大家族”。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力主保蒋、和平解决，偕宋美龄前往西安参加同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周恩来的谈判，达成六项和平协议，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努力。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全国航空委员会代主席、保卫中国同盟会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代理行政院长等职。1945年4月以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资格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议论制定《联合国宪章》。回国后任行政院院长。又赴莫斯科多次会见斯大林，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有关协定。1947年3月辞行政院长职。9月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绥靖主任。1949年1月辞职抵达香港，转而到欧美治病，从此在美国隐居，拒绝到台湾出任政府职务。1971年4月在美国旧金山病故。

【林彪】（1907—1971） 原名育蓉，又作毓容。湖北黄冈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期间，在国民革命军叶挺领导的第四军独立团任见习排长、连长，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后曾任红四军团长和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后任红军大学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指挥过平型关战斗。1938年去苏联治病。1942年回国，协助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抗战胜利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任中南军区司令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组织反革命集团，以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妄图谋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阴谋败露后，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中共中央在1973年作出决定，将其开除出党。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反革命集团主犯。

【叶群】（1917—1971）福建闽侯人。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去延安。在延安与林彪结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任职。“文化大革命”中，参与了林彪集团一系列阴谋活动。1967年后，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副组长，林彪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组员等职。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70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与林彪等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

权未遂，即与林彪密谋，派儿子林立果组织制定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1971年9月与林彪合谋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9月13日与林彪、林立果等乘飞机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决议，被永远开除党籍。

【高崇民】（1890—1971） 辽宁开源人。1919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明治大学。1936年参加西安事变，后任张学良、杨虎城的政治参议机构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41年主持东北救亡总会工作。1946年任安东省主席。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司法部长、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院长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是一届、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二届、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文革”中遭错误监禁，1971年死于狱中。

【斯诺】（1905—1972） 全名埃德加·斯诺。美国作家、新闻记者。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26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进入哥伦比亚新闻学院，1927年起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来华，曾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芝加哥论坛报》驻华南记者、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1929年应孙科邀请游历中国。1933年到北平燕京大学任教。1936年6月访问陕甘宁边区，成为在苏区采访的第一个西方记者。先后为英、美报刊撰写了多篇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后编辑成《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在伦敦出版。向美国和世界人民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事迹。1938

年该书被译成中文出版流传。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报》驻华战地记者。1939年曾再次访问延安。1941年因报道皖南事变真相，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被迫回国。1942年以后，任美国《星期六晚报》军事记者赴世界各地采访，后任该报主编之一。1960年移居瑞士。曾三次访问中国，写了许多报道介绍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1972年2月15日在日内瓦病逝。遵照他的遗嘱，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谢富治】（1909—1972） 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于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历任班长、排长、副连长、连指导员。团、师、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期间，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七七二团政委、三八五旅政委、太岳军区副司令员和代司令员。抗战胜利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政委、第四纵队政委。后任第二野战军三兵团政委。建国后，历任川东区委书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2年3月26日病逝在北京。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悼词。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确认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了林彪、江青等人的阴谋活动，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

【李德全】（1896—1972） 北京通县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后

任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干事。1924年与冯玉祥结婚。曾创办北京求知中学，任董事长。抗战期间任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抗战胜利后，创办中国妇女联谊会，任主席。1946年随冯玉祥赴美，曾代表邓颖超出席世界妇女代表大会。1948年回国，任北平师范大学保育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卫生部部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国家体委副主任等职。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邓子恢】（1896—1972） 闽西起义主要领导人。福建龙岩人。早年留学日本。1918年春回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龙岩县委宣传部部长。1928年4月，在龙岩发动农民举行起义。随后又和张鼎丞一起在永定县发动农民起义。1928年7月中共闽西特委成立，任宣传部长。1929年1月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领导闽西工农武装，配合红四军入闽作战，参与创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此后历任龙岩革命委员会主席、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政委、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财政部长等职。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任苏区中共中央分局委员、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1939年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皖南事变后又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与陈毅等一起领导新四军创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书记兼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三书记兼华中军区第二政委等职，参与领导淮海战役和解放中南的战役。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南军区第二政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领导了中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其他民主改革运动。1953年后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

【陈毅】(1901—1972) 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字仲弘。四川乐至人。1919年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因参加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被强行遣送回国。1922年在重庆任《新蜀报》文艺副主笔，并由蔡和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在北京中法大学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曾任北京学生总会的党团书记、中国国民党市党部的中共代表，在北京从事青年运动。1926年从中法大学毕业后，被派往四川万县在川军中进行革命活动。1927年春到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中共党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1月，与朱德一起领导湘南年关暴动。同年4月，与朱德一起率部进军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合，先后任新创建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并被选为中共湘赣边特委委员。1929年初，随毛泽东、朱德率部转战赣南、闽西。同年6月，主持召开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后赴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军事会议。在周恩来主持下，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后协助毛泽东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此后，在中央根据地历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红二十二军军长、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赣西特委书记、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转战闽、浙、赣等省，坚持游击

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此后，率部挺进苏南，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率部北渡长江，在江北指挥了黄桥战役。同年11月，华中总指挥部成立，任代理总指挥，统一指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的抗日斗争。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与刘少奇等一起重建新四军部队，任新四军代理军长。统率新四军，抗击日伪军的“扫荡”和“清剿”。抗战胜利后，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率部抗击了国民党军队对华中、山东地区的进攻。解放战争开始后，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率部连续取得了宿北、鲁南、莱芜和孟良崮等战役的胜利。1947年秋，率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豫皖苏，有力地配合了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1948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同年11月，参与组织和指挥淮海战役。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重新整编后，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4月率部横渡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和广大东南地区。上海解放后，为第一任市长，此后相继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区司令员等职。1954年后历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在党内，他是中央第七、第八、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其诗文收入《陈毅诗词选集》。

【何香凝】（1878—1972） 原名谏，又名瑞谏。广东南海人，生于香港。1897年与廖仲恺结婚。1902年赴日本留学。1903年结识孙中山，1905年加入同盟会，从事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民国以

后，参加讨袁、护法运动。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任国民党妇女部长，在共产党人帮助下积极开展妇女运动，并出版《妇女之声》旬刊，宣传反帝反军阀主张。1925年8月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暗杀后，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继续担任妇女部长。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当面指责蒋介石。5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对蒋介石打击共产党人的整理党务案提出强烈抗议。7月随军参加北伐，组织慰劳队、救护队，并与宋庆龄一起组织红十字会。1927年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与宋庆龄、邓演达、吴玉章等坚持国共合作的革命原则，限制蒋介石的权力。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回广州办仲恺工农学校。1929年出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并辞去中央委员之职。1932年1月积极支持十九路军抗日。1934年4月与宋庆龄等1779人签名公布《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1935年签名响应中共中央发布的八一宣言。1937年2月与宋庆龄、冯玉祥等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6月参与发起救国入狱运动，抗议蒋介石逮捕“七君子”。抗日战争期间，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和为抗日战士筹募医药、衣物与款项。1946年在广州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8年与李济深等联合国民党各民主派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副主席。1949年6月参加新政协的筹备会。9月出席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第二、第三届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第三届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等职。1960年8月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同年被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著作与作品有

《双清文集》、《何香凝诗画集》等。

【孙科】（1891—1973） 字哲生。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孙中山之子。早年赴美留学。1916年回国，任广东大元帅府秘书。1917年任广州非常国会和外交部秘书。1918年兼非常国会书记、《广东时报》总编辑。1921年后，任广东治河督办、广州特别市市长。1924年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常务委员、广州市市长、广东省建设厅厅长、广东省代理省长、国民党青年部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1927年7月后，任国民政府建设部长、财政部长、考试院副院长。1931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1938年以国民党特使身份三访莫斯科。1945年任国民党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常委。1949年3月辞职去美国。1965年回台后，任“总统府资政”、“考试院”院长。

【张云逸】（1892—1974） 原名张运镒。广东文昌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在香港、广州等地从事秘密工作。1929年奉中共中央之命，与邓小平一起到广西组织武装暴动。是年12月，同邓小平、韦拔群等一起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长，率部创建了右江革命根据地。1930年10月率红七军离开广西，进入江西，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在中央苏区期间，先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军总司令部作战部部长等职。1934年参加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总指挥、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

长、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校长等职，与陈毅等一起，领导新四军在大江南北与日军周旋，参与开辟了华中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华东局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在中国共产党第七至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同时还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蒋鼎文】（1895—1974） 字铭三。浙江诸暨人。早年入绍兴大通学堂、浙江讲武学堂。1915年到广东，任职于援闽浙军总司令部。1921年5月，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部副官。1924年5月入黄埔军校，任区队长、教官、教导团副营长。1926年“中山舰事件”时，为蒋介石效命，强行收缴总工会枪械，监视苏联顾问。同年7月跟随蒋介石参加北伐，南昌战役中负伤，升任总司令部直属伤兵团团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南京警备团长，浙东警备司令兼宁波市公安局局长。1929年在讨桂战争中，擢升第二军军长。1930年中原大战时，兼任陇海路西段警务司令。1931年8月，率第四军团参加围剿中央苏区。1933年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时，任“剿匪军”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二路军总指挥。是年11月，调任左路总指挥，进攻福建，“讨伐”发动反蒋抗日事变的十九路军。次年2月，改任东路“剿匪”总司令。杀害了共产党著名领袖瞿秋白。1935年1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西安事变时随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抗战爆

发后，任西安行营主任兼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陕西省主席。1941年冬，改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进驻洛阳。抗战胜利后，弃官经商。1948年2月参加“国民大会”，被任命为蒋介石总统府战略顾问。1949年3月去台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1974年1月在台北病逝。

【王明】（1904—1974） 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1924年入武昌商业学校就读。1925年赴苏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中山大学支部局宣传干事、书记，曾在该校副校长米夫的支持下组织宗派小集团。1929年回国，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30年9月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后，以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为名，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进行宗派活动，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发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比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更为“左”倾的政治纲领。同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倚仗参加会议的米夫的支持，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形成以他为代表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后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同年9月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后仍通过博古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又推行右倾投降主义，主张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让给国民党，使南方地区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1939年9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党刊委员会主席、中央妇委主席。1941年后因病长期休息。1945年当选中共七大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1956年去苏联就医，同年当选中共八大中央委员。后长期居住苏联，并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等写了许多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章。1974年在莫斯科病逝。

【陈绍禹】即“王明”。

【李德】（1900—1974）德国慕尼黑黑人。本名奥托·布劳恩，在中国时化名李德，笔名华夫。早年参加德国共产党。1929年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毕业后，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1933年9月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并在军事学校授课。积极支持并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反对红军与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联合抗日，反对游击战争，使红军遭到很大损失。1934年跟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遵义会议上被撤消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职务。抗战初期，任中共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1938年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授。1939年夏回莫斯科。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加入苏联红军。1954年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定居，并从事著书及翻译工作。

【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4年初当选为中共六大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遵义会议后曾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东北局城工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等职。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八大、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滕代远】(1904—1974) 湖南麻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在长沙从事工农运动。1928年7月，与彭德怀等一起领导平江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党代表，参与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1928年12月，与彭德怀一起率红五军上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此后，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军队“围剿”中央苏区的历次斗争。1930年6月，红五军和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任军团政治委员。1934年去苏联。1935年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7年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抗战期间，历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央军委铁道部部长等职，曾协助周恩来与国民党、美国代表谈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铁道部部长、党委书记。是中共第七至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傅作义】(1895—1974) 字宜生。山西荣河(今临猗县)人。1915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8年毕业后入阎锡山部，任晋军独立炮兵十团见习官、第四旅第八团团团长、第四师师长等职。1928年参加国民党军二次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失败后移防绥远。1931年后任第三十五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1933年率部参加长城抗战。1936年发动绥远抗战，取得百灵庙大捷。抗日战争期间，历任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第八战

区副司令长官、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等职。1945年日本投降后，曾代表国民党政府在绥远、察哈尔、热河受降。1947年任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率部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部长、水利电力部部长等职。

【彭德怀】（1898—1974）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彭得华。湖南湘潭人。早年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在湘军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与滕代远、黄公略等发动和领导了湖南平江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此后，率部转战于湘鄂赣边，开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1928年12月，与滕代远一起率红五军主力进军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的红四军会师。1929年初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后，率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1930年6月，红五军和红八军合编成红三军团，任总指挥。此后，率部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战争。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分裂红军的活动。后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即陕北支队）司令员，和毛泽东等一起率部首先到达陕北。1936年奉命先后组织抗日先锋队和西北野战军，进山西、宁夏。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总指挥，和朱德一起指挥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1940年指挥百团大战。1942年任中共华北局代理书记。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同时兼任西北野战军（后改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为打破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在1947年进行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等战役中，连战皆捷。1949年率部解放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任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等职。1950年10月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师援朝。1952年回国后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7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上书毛泽东主席，陈述1958年以来党所犯的“左”倾错误，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遭到了错误的批判。被免去了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又遭诬陷迫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著有《彭德怀自述》。

【王树声】（1905—1974）原名宏信。湖北麻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区、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长。1927年参加领导黄麻起义。后任鄂东革命军第二路军副司令员、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红二十五军军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红三十一军军长等职。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1936年任红军西路军副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中原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嵩岳军区副司令员、鄂西军区司令员等职。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湖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军总军械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八、第九、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李富春】（1900—1975） 湖南长沙人。1919 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旅欧总支部领导人之一。1925 年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和代理书记、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和代理书记。1931 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中央江西省委书记。长征中，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团政委、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到陕北后，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财政经济工作部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委。1949 年以后，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中共第七至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书记处书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饶漱石】（1903—1975） 曾用名梁朴。江西临川人。1923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1929 年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曾代理满洲省委书记。

1932年后，任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5年赴莫斯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战期间，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和代理书记、新四军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第三野战军政委兼华东军区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53年与高岗一起进行分裂党并阴谋篡党夺权，1954年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被揭露和批判。1955年3月被开除出党。曾是中共七大中央委员。

【张志新】（1930—1975）天津市人。1950年考入河北师范学院教育系。抗美援朝中报名参加志愿军，被选送解放军军事干部学校。后转入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学习。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到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因坚持马列主义原则，揭露林彪、江青等人的反革命罪行而遭残酷迫害。1968年被下放辽宁盘锦五七干校监督劳动。1969年9月被捕入狱。狱中仍坚持斗争。1975年4月4日惨遭杀害。1979年3月中共辽宁省委为其平反昭雪，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董必武】（1886—1975）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原名贤琮，号壁五，学名用威，笔名碧梧。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03年中秀才。1911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后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4年和1917年两次东渡日本攻读法律，并参加中华革命党。回国后曾任律师。五四时期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与陈潭秋等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

会后回湖北，负责建立和发展湖北的中共党组织。历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汉口地委书记、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后，参加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持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年1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会后返回湖北，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湖北省政府常务委员兼农工厅长、《楚光日报》社社长、《汉口民国日报》社社长。发动和领导湖北的工农群众运动，成为湖北地区革命运动的重要领导人。1928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列宁学院英文班学习。1932年回国后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教务长和副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临察委员会副主任、代主任。1934年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代理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主要领导人之一，协助周恩来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领导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1944年南方局改组为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任工委书记。此外，从1938年7月起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代表中共常驻参政会。1945年4月，代表解放区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抗战胜利后，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5月随代表团由重庆到南京与国民党继续谈判。11月接替周恩来领导中共代表团。主持中共中央南京局。1947年3月率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随后前往华北，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任。1948年8月，主持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华北人民

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1954年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同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2月，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1959年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66年1月任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自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起，当选为历届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起当选为历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董必武选集》，诗词收入《董必武诗选》。

【蒋介石】（1887—1975） 中国国民党领袖。原名周泰，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1906年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1907年留学日本，入振武学校炮兵科。在日期间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回到上海，被派往杭州指挥光复之役。后任陈其美沪军第五团团团长。曾奉陈之命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1913年在上海参加二次革命。1914—1916年多次参加反袁起义。1916年6月，被孙中山派往山东居正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参谋长。1918年参加护法战争，任粤军陈炯明部作战科主任、第二支队司令。自1916年8月至1922年，大部时间在上海从事投机买卖，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虞洽卿等经营恒泰交易所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后，从上海赶到广州护卫孙中山，得到孙中山信任。1923年2月

任广东军政府大本营参谋长。同年8月，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1924年5月任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1925年2月率军校学生和教导团参加第一次东征。6月，回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出任广州卫戍司令。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0月，任东征军总指挥率部举行第二次东征。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同时兼国民革命军总监。3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把共产党人排挤出第一军。4月，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5月，提出《整理党务案》，将共产党人排斥出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其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开始形成其个人独裁。1926年7月离广州进行北伐。11月建大本营于南昌，提出迁都南昌，挑起迁都之争。1927年4月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并在各地实行“清党”。4月18日于南京另立“国民政府”。8月，在国民党各派系争权斗争中宣告下野。1928年2月重新上台，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举行二次北伐，打败控制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之后宣布实行“训政”。1929—1930年，经蒋桂、蒋冯、中原大战等新军阀混战，打败了反蒋各派系，建立了自己的独裁统治。1930—1934年，对中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军事“围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本武装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继续进行内战，镇压抗日民主运动，建立复兴社等特务组织，在全国推行保甲制度，发起新生活运动。并利用政治权势，垄断金融和工商业，形成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1936年12月在西安事变中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

被迫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发表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1938年4月任国民党总裁。1939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兼国民参政会议长。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指挥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9月再次任国民政府主席。11月出席开罗会议，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发表了《开罗宣言》。抗日战争胜利后加紧部署内战。1946年7月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11月召开“制宪国大”。1948年3月召开“行宪国大”，当选为“总统”。1949年1月宣告“引退”，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控制国民党。同年12月，由成都逃到台湾。1950年3月在台北重任总统。此后又四次连任“总统”。在国民党七至十大上，继续被选为“总裁”。1975年4月在台北病故。其言论编有《蒋介石全集》、《蒋总统集》等。

【蒋中正】即“蒋介石”。

【康生】（1898—1975）原名张宗可，字少卿，曾用名赵容等。山东胶县（今胶南）人。早年在上海大学学习。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沪中区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和秘书长。1930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长。1933年赴苏联莫斯科，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之一。共产国际“七大”被选为候补执委。1934年初，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曾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1937年11月后回到延安。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社会部长、情报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任

中央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以“抢救失足者”为名，制造许多冤案，诬陷了大批革命干部，严重干扰了整风运动，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政委、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九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当选中央副主席。曾与林彪、江青等勾结在一起，采用阴谋手段，捏造罪名，陷害国家和党的领导人。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神化党的领袖，制造个人崇拜，为反革命集团制造夺权的理论根据。1975年12月16日在北京病故。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悼词。

【周恩来】（1898—1976）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胡必成。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1910—1912年在奉天府（今辽宁沈阳）第六丙等小学堂学习。1913年入天津南开中学。1917年9月赴日本留学。1919年4月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成为天津学生界主要领导人。9月，与郭隆真、邓颖超、马骏等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出版《觉悟》。1920年1月，领导天津学生向直隶省公署请愿被逮捕。1920年冬至1924年夏，先后到法国、德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6月出席在巴黎举行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4年8月返国，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

1925年1月，与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一起领导军校学生进行第一次东征。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第一军副党代表。10月，参加第二次东征，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东江行政委员。11月，主持建立叶挺独立团。1926年冬赴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1927年3月，与罗亦农、赵世炎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军事部长。7月，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8月1日，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1928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务委员。后在上海坚持党的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此期间实际上是中共中央主要主持人。1931年12月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与朱德一起领导、指挥红军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12月作为中共全权代表与秦邦宪、叶剑英等去西安解决西安事变。1937年2月至9月，作为中共首席代表同国民党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进行六次谈判。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宣传部长和军事部长、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等职。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从事中共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45年4月，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6

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8月，陪同毛泽东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此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12月，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代表中共同美国代表马歇尔、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组成三人军事小组，负责指导停战及谈判整军问题。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同时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和毛泽东一起转战陕北。1948年9月后，参加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1954年后，任国务院总理，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主席、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此外，还兼任过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在中共第八届、第九届和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6年1月8日在北京病逝。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

【张闻天】（1900—1976） 又名洛甫，上海南汇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遵义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代替博古负总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中共第七、第八届代表大会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的正确主张，在长达数小时的发言中从理论上系统地批判了“左倾”错误，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与彭德怀等人一起定为反党

集团。会后，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其冤案彻底平反。主要著作收入《张闻天选集》。

【洛甫】即“张闻天”。

【朱德】（1886—1976）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字玉阶。四川省仪陇县人。幼年入私塾。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冬加入同盟会。1911年从讲武堂毕业后，被派入云南新编陆军，历任副班长、司务长、连长，秘密向士兵宣传同盟会纲领和各地反清起义情况。率部参加云南武装起义反对清王朝。后参加援川军，支援四川起义。1912年返回昆明，任讲武堂军事教官。1915年参加反袁护国战争，任滇军步兵团长。1917年任滇军旅长，在四川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1922年，为寻求真理离开云南经北京、上海转赴德国，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两次被德国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出境。又到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夏回国，受中央派遣到四川军队中进行革命活动。同年11月，和杨闇公、刘伯承组成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领导了四川泸（州）顺（庆）、起义。1927年初，奉命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1927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其主力在潮汕地区被反动军队击败后，率领余部转战至湖南省南部，继续组织武装暴动。1928年1月，与陈毅一起在湖南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发动宜章、郴州、耒阳、永兴、资兴等县的年关暴动，建立湖南苏维埃政权。同年4月，率部进军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初建时称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任军长。1929年初,与毛泽东一起率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12月,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参与制定了古田会议决议。1930年6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任总司令。随后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与毛泽东一起领导红一方面军连续战胜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围剿”。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3年春,与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挫败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同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与毛泽东一起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的胜利。在长征途中,对张国焘分裂活动进行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总指挥(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总司令),并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军事委员会分会书记。1938年3月,兼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一年后又改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0年5月,返回延安,参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战争。1945年4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战争中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47年国民党攻占延安后,同刘少奇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同年秋,参与指挥了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9年4月,和毛泽东一起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作战的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党内曾任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央副主席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76 年 6 月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

【刘文辉】（1895—1976） 字自乾。四川大邑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毕业。历任川军师长、成都卫戍区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川康边防总指挥、西康省主席、四川省主席、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西康省党部主任委员。1944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任中央委员。1948 年任民革中央川康分会主任委员。1949 年 12 月率部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林业部部长。还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范汉杰】（1895—1976） 广东大埔人。1925 年入黄埔军校学习，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1926 年参加北伐战争。曾任粤军第一师第一旅参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师二十九团团团长、浙江警备师师长。1928 年赴德国留学。回国后曾任第十九军副参谋长、第一军副军长。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主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二十七军军长、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陆军总部副总司令、山东第一兵团司令。1945 年还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8 年任东北“剿总”中将副司令兼锦州前线指挥所主任。同年 10 月在辽沈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60 年 11 月被特赦释放。后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毛泽东】（1893—1976）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字润之。湖南湘潭人。1911年武昌起义后不久，参加湖南新军。1913年春到1918年夏，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其间，曾深入长沙、宁乡等五县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主办工人夜校。1918年4月，与蔡和森等成立新民学会。8月，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到北京。同年冬在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五四运动爆发后，主编《湘江评论》，并组织领导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1919年12月，率驱张代表团第二次到北京。1920年后，在长沙发起组织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作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湖南工团联合会总干事。1923年6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局秘书。1924年1月，参加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委员兼文书科主任和组织部秘书。1924年冬因病返湘休养，创立20多个农民协会。1925年9月到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创办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并任总编辑，同时兼任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主任理事、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等职。1926年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初到武汉，担任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和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务委员等职，领导以两湖为中心的农民运动。1927年4月，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

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6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8月7日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任中共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10月，到达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党代表和前委书记。同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开创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革命道路。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主持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了正确的建党建军路线。1930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前委书记等职，与朱德等一起领导中央红军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1933年1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常委，随后又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遵义会议后确立了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率领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

1936年12月，被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43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以后在历届中央委员会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4月，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政治路线。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的和谈骗局和内战阴谋，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1945年8月，与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蒋介石等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指挥人民解放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于1947年7月转入战略反攻。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解放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同年6月，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任务和方针。9月，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全国政协主席。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国后，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恢复国民经济，进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运动。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系列方针、政策。1954年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并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6年9月，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但这一方针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没有得到认真执行。1957年2月，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同年夏，发动反右派斗争。1958年，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在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上，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1960年冬以后，领导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方针。1963—1965年间，发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

1966—1976年，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在对外工作方面，从50年代末开始，领导党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作斗争。1974年，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开创了对外关系的新格局，并开始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

【陈望道】（1890—1977）原名参一。浙江义乌人。早年赴日本留学。1919年回国后，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1920年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译本。同年参加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任《新青年》杂志编辑。1923年后在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1934年参加发起大众语运动，主编《太白》半月刊。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以后，曾任安徽大学教授、广西大学中文科主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和文学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长、复旦中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语文学会会长、《辞海》编委会主编。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1977年10月29日在上海病逝。著有《修辞学发凡》、《中国文法研究》等，有《陈望道文集》行世。

【潘汉年】（1906—1977）江苏宜兴人。1924年参加创造社，主

编刊物《洪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革命军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中共江西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等。曾代表中共同鲁迅建立联系，组织左翼作家联盟。1936年被中共中央正式任命为与国民党谈判的代表。1937年9月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上海等地领导对敌地下斗争和开展统战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部长和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和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1955年4月3日因莫须有的“内奸”问题被判刑。1977年含冤病逝。1982年8月被中共中央平反昭雪，公开恢复名誉。

【林枫】（1906—1977） 黑龙江望奎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河北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1936年后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刘少奇秘书。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工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八路军晋西支队政委、晋西区党委书记、晋绥分局副书记和代理书记、晋绥军区政委。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长、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东北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国务院业余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

【章乃器】（1897—1977） 原名埏，字金烽。浙江青田人。1918年毕业于浙江商业学校，后从事金融工作。曾在上海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中国征信所董事长，中国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创办《新评论》月刊。1935年任光华大学教授，参加上海救国会。1936年11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抗战初期获释。任安徽省政府委员、财政厅长。后赴重庆，创办上川实业公司任总经理，并任迁川工厂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工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45年底参与发起中国民主建国会。1948年底到东北解放区。1949年9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粮食部部长、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80年平反改正。

【郭沫若】（1892—1978） 原名开贞，号尚武。四川乐山人。1913年底赴日本东京学医。回国后从事文艺活动。五四时期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运动。1921年出版新体白话诗集《女神》，并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1924年后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倡导革命文学。1925年五卅运动时，为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起草了《五卅案宣言》。1926年3月离沪到广州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在随起义军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旅居日本千叶县，从事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1930年加入左联。抗战爆发后回国，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抗敌救亡工作。曾任《救亡日报》社社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

会理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曾创作了《屈原》、《虎符》等历史剧和大量诗文，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政策。1944年为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发表《甲申三百年祭》，被毛泽东定为解放区整风学习文件之一。1949年北平解放后，被选为全国文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病逝。另著有《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等，并有《沫若文集》、《郭沫若全集》行世。参见第六卷中的“郭沫若”。

【罗瑞卿】（1906—1978） 四川南充人。原名其荣。1923年考入南充中学。1926年6月就读于成都实业专修学校。1926年10月赴重庆。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考取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闽西游击大队大队长，红四军参谋长、纵队政委、师政委、军政委，红一军保卫局局长，中央红军先遣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中央苏区红军大学教育长、副校长。1934年秋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晋察冀军区政委、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炮兵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长兼公安司令员、政委、北京市公安局长。1959

年以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常委。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为第一、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四人帮”的政治及人身迫害，至使其身体受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治上得到平反，又当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及中央军委秘书长。因赴德医病，不幸于1978年8月3日病逝于原联邦德国。

【包惠僧】（1894—1979） 曾用名包晦生，别名鲍一德，笔名栖梧老人。湖北黄冈人。1917年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1919年在北京大学文学院旁听。返回武昌后曾做过教师和报社记者。1920年10月与董必武、陈潭秋等组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7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二大”后，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1924年初任中共武汉地委委员长。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政治教官。1925年先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后方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十师党代表等职。1926年任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政治教官、战时政治训练班主任，后到武汉任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1927年初调任独立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脱离共产党。1931年后历任国民党武汉行营参议、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军委会秘书、中央军校政治教官、防空委员会编审室主任等职。1947年任国民党政府人口局长。1949年脱离国民党政府前往澳门，年底由澳门回到北京。1950年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研究员、参事。1957年起任国务

院参事。

【周士第】（1900—1979） 广东乐会（今海南琼海）人。1920年中学毕业。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毕业，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营长、团参谋长、代理团长。参加指挥汀泗桥、贺胜桥、攻占武昌等战斗。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团团长。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第二十五师师长。起义失败后去香港。1929年参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央军委干部团上级干部队队长。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参谋长，协助指挥直罗镇战役。1936年红军东征时，任河口渡河司令员。同年冬，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师参谋长兼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校长、晋绥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北野战军司令员兼副政委、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太原前线指挥部副司令员，协助徐向前等指挥了晋北、晋中、太原等战役。1949年任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率部向西南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西军区司令员兼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市长、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部长，当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著有《周士第回忆录》。

【苏振华】（1912—1979） 原名苏七生。湖南平江人。1928年初参加平江农民暴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工农红军营、团、旅、

师政委。1934年参加长征。抗战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教导第三旅政治委员、鲁西军区政委、八路军第二纵队政委、冀鲁豫军区副政委。解放战争期间，任晋冀鲁豫一纵队政委、五兵团政委、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第一政委、中央军委委员、军委秘书长、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张国焘】（1897—1979） 又名特立，字凯音。江西萍乡人。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在党的二、四、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1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1935年在四川懋功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军总政委。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1937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1938年4月借祭黄帝陵之机逃往武汉，随即被开除出党。参加国民党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特务活动。1949年冬寓居香港，后移居加拿大多伦多。著有《我的回忆》一书。

【安子文】（1909—1980） 原名志翰，字浩然。陕西绥德双湖峪（今属子洲）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河南省委交通科长、中共中央北方局交通科长、顺直省委秘书长。曾四次被捕入狱。在狱中坚贞不屈，与

敌人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1936年由中共中央营救出狱后，到华北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中共太岳工委书记、晋冀豫省委统战部长、太岳区党委书记。1943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工委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全国政协常委。“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迫害。1979年后，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

【杜聿明】（1905—1981） 又名光亭。陕西米脂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1926年参加北伐。后任国民党政府军装甲兵团长，第二〇〇师师长，第五军军长。1942年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副司令长官，率部赴缅甸抗击日军。1943年出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东北保安司令。淮海战役中，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59年被人民政府特赦释放。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曾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

【张鼎丞】（1898—1981） 福建永定人。早年参加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与邓子恢等一起领导闽西农民的武装起义，参与创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1929年后历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军委书记、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土地部部长、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与邓子恢、谭震林等一起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36年西安事变后，组建了闽西南抗日

义勇军第一支队。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此后与陈毅等一起创建了茅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人民政府主席、福建省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四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政法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是第四、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宋庆龄】（1893—1981） 国际政治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孙中山夫人。原籍广东文昌县，生于上海。早年在上海中西女中读书。1908年到美国佐治亚州威斯理安女子大学学习。1913年毕业回国。任孙中山秘书，追随孙中山，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1915年10月与孙中山结婚。1922年在孙中山与中共代表磋商合作及与列宁所派使节交谈中，做了大量工作。1924年11月随孙中山北上。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的遗嘱。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共产党紧密合作，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四一二政变后，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及共产党员毛泽东、董必武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武汉汪精卫政府公开叛变前夕，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同年8月1日，和毛泽东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行为。八一南昌起义时，被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同年8月下旬赴莫斯科。1929年被选为世界第二次反帝同盟大会名誉主席。1931年回国后，拒绝

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任何职务。1932年与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何香凝、柳亚子等率先响应。1936年“七君子事件”发生后，到苏州向“高等法院”要求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与冯玉祥、何香凝等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广州和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向国际人士及海外侨胞募捐，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创建中国福利基金会，给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物质援助。1948年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

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12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7年11月，随毛泽东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959—1965年，连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5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曾代表国家多次参加国际活动。先后被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三次被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从1951年11月起，一直担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国福利会会长。并长期主持中国救济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年5月1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1981年5月29日在北京逝世，遗著编有《宋庆

龄选集》。

【王世杰】（1891—1981） 字雪艇。湖北崇阳人。北洋大学法律科毕业。1912年加入国民党。1913年起赴英国、法国留学。获法学博士。1920年回国后，先后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等职。1927年任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29年任武汉大学校长。1932—1938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国民党五届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等职。1939年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政府中央设计局秘书长。1943年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兼外交部长，参加国共重庆谈判。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王亦去职，后转赴台湾。1950年后，曾任“总统府”秘书长、中央评议委员、政务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总统府”资政等职。1981年4月在台北病逝。著有《比较宪法》等。

【沙千里】（1901—1982） 原名重远。江苏苏州人。早年毕业于上海法科大学，任律师。1926年参加国民党在上海的秘密工作。1935年与沈钧儒等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响应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主张。同年任《生活知识》杂志主编。1936年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执行委员。同年被捕入狱，是著名的爱国民主斗士“七君子”之一。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华民主青联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轻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王洪文】（1935—1992） 吉林长春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

愿军，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到上海棉纺织十七厂当保全工人。后任厂保卫科干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任工总司负责人。后任上棉十七厂革委会主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政委、上海市总工会主任。1969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2年调到中共中央工作。1973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76年10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1977年被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与了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1982年7月因患肝炎在狱中病逝。

【刘斐】（1898—1983）字为章。湖南醴陵人。早年入桂军。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作战参谋，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又入日本陆军大学，1934年毕业。回国后任第五路军少将高参、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教育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调任国防专门委员会委员，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1938年参加台儿庄战役。历任第五战区临时参谋团成员、参谋处处长，军事委员会第一战区组组长、军令部第一厅厅长。1940年冬任军政部次长。抗战胜利后，历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曾被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参加北平国共和平谈判，当国民党当局拒绝和平协定后，通电反蒋。1949年9月以特邀人士出席首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国防研究小组副组长、国

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水利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1981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

【彭述之】（1896—1983） 化名张次南、陶伯。湖南宝庆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当年赴苏联学习。1924年回国，在上海大学任教，并编辑《新青年》、《向导》杂志。在中共中央任宣传部长、中共第四届和第五届中央委员。大革命后期他积极执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1929年与陈独秀等人建立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并任临时委员会常委。同年被中国共产党开除。1931年5月在托派小组统一大会上当选为常委。同年10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后任托派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到香港。1983年11月在美国逝世。

【廖承志】（1908—1983） 广东惠阳人。早年留学日本。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赴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四军总政治部秘书。参加过长征。1937年赴香港主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青联主席、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华侨大学校长、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中华全国归侨联合会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八至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黄永胜】（1910—1983） 湖北咸宁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师长。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团长、军分区司令员、教导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纵队司令员、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南军区、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九届政治局委员。1971年因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活动被撤职。1973年被开除党籍。198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

【杨勇】（1912—1983） 湖南浏阳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红军三军团五师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第四师十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一、四师政治委员。1934年参加长征。抗战期间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六旅六八六团副团长、团长兼政委、独立旅旅长兼政委、鲁西军区副司令员兼三四三旅旅长、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教导第三旅旅长、延安军事学院高干队队长、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等。解放战争期间，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第一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贵州军区司令员、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副秘书长。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谭震林】（1902—1983） 湖南攸县人。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1932年，历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和县委书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红四军第二纵队党代表、第四纵队政委、红一军团第十二军政委、福建军区司令员。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闽西，任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长、副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支队政委、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苏浙军区政委、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兼中共淮南区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委、华中野战军政委、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兼第七兵团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浙江军区政委、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主任。是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八、十、十二届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五中全会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又任中顾委委员、中顾委常委、中顾委副主任。

【杨秀峰】（1897—1983） 字秀林。河北迁安人。著名教育家、法学家。1920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早年曾参加五四运动。1929年赴法留学。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领导留法学生和

华侨反帝同盟。后赴苏联学习。1934年回国，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天津河北法商学院任教。并在平、津文化界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后，组建冀西抗日游击队，任司令员，并任冀豫区党委委员、河北抗战学院院长、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华北人民检察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河北省委常委、高教部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和法制学会名誉会长，是中共“八大”中央委员。

【周建人】（1888—1984） 浙江绍兴人。鲁迅之弟。辛亥革命前后，在家乡教书。1920年入北京大学攻读哲学。1921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兼任《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助理编辑，《自然》杂志编辑，主张妇女解放，普及科学知识。1923年应瞿秋白之请在上海大学讲授进化论，并先后在神州女学、上海暨南大学和安徽大学任教。1927年“四一二”后，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统治。经常同鲁迅和共产党人、进步人士一起学习马列主义，讨论中国社会问题，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留居上海，和文教爱国知识分子组织马列主义读书会，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45年底，和马叙伦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当选为中央理事。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撤离上海到达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1949年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代表之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浙江省省长。曾当选为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主席。1984年7月在北京逝世。著有《回忆鲁迅》、《科学杂谈》等书。

【李维汉】（1896—1984） 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早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18年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一起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与周恩来、赵世炎等筹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后改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25年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5月任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7月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八七会议后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期间，与任弼时一起留守中央。“六大”后任中共中央巡视员。1929年，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书记等职。1930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此后，受到王明等人的排挤，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撤销在中央的职务。尔后，赴莫斯科学习。1933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任职。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共定边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陕甘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群众工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北公学校长等职。1942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

部长。1946年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1948年底起，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直至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兼任全国政协秘书长、政务院秘书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等职。是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4年8月11日在北京逝世，著有《回忆与研究》等书。

【罗迈】即“李维汉”。

【贺子珍】（1909—1984）江西永新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妇女协会组织部长、为中共永新县委负责人之一。1927年组织参加永新武装暴动后上井冈山，参加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后与毛泽东结婚。1934年，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1937年冬赴苏治病和学习。1947年8月回国在东北地区疗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杭州妇联工作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前后，多年受到江青及“四人帮”的迫害，病情日益加重，于1984年4月19日在上海病逝。

【粟裕】（1904—1984）湖南会同人。字裕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任红六十四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教导师政委、红十一军参谋长、红七军团参谋长、红十军团参谋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闽浙军区司令员。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

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二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指挥和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和代政委、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和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和第一政委、中央军委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八届至十一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常委。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胡风】（1902—1985） 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1920年在武昌上中学时受新文学影响。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秋入北京大学预科，开始受到鲁迅影响。1929年秋赴日本留学，曾参加日本普罗文学运动和日本反战同盟，并加入日本共产党，1933年因在留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捕，同年7月被驱逐回国。回到上海后，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先后任“左联”宣传部长、书记。1936年在鲁迅的倡议和支持下，主办《海燕》文学刊物。鲁迅逝世后，为整理、出版和翻译、介绍鲁迅著作做了大量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在武汉、重庆出版《七月》文艺刊物。解放战争时期，主办《希望》杂志。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遭不适当批判，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长期受到监禁。1980年9月得到平反。当选为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文联四届委员，任中国作协

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有《胡风评论集》、《胡风译文集》出版。参见“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和第六卷中的“胡风”。

【王昆仑】（1902—1985） 江苏无锡人。早年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学习。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爱国学生运动。1922年被推为学生代表之一南下上海寻求各界支持，北京学生抗议北洋政府委派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在上海拜见了孙中山，并加入中国国民党。1926年到广州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政治教官，后随军北伐。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任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秘书长，因不满蒋介石内外政策，愤而辞职，在国民党内部积极从事反蒋斗争，在上海发起组织“再造派”，主编《再造》旬刊，做为抨击、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阵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力主抗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的卖国政策。1933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兼任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1941年皖南事变后，与王炳南、屈武等在重庆发起成立中共领导下的革命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1943年又与谭平山等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大”上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伪，制造分裂，策划内战的阴谋。抗战胜利后，继续团结国民党内爱国民主力量，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方针，当选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临时干事会常务干事。1947年为避国民党当局迫害赴美考察，是年11月协助冯玉祥在纽约成立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被选为执行委员。1949年1月经苏联回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北京市副市长。当选为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民革中央第二、三、四届常务委员，第五届中央副主席、代主席、主席，第六届中央主席。著有《红楼梦人物论》。

【许世友】（1905—1985） 河南新县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后到吴佩孚部队当兵。1926年在武昌参加国民革命军，任连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时期历任红十一军营长、红四方面军团长、红九军副军长兼第二十五师师长、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后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胶东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东线兵团司令员、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华东军区么三副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第九、第十、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肖华】（1916—1985） 江西兴国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少共国际师政委。参加中央苏区的一至四次反“围剿”，并于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任红军一军团二师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三四三旅政委，参与指挥平型关战役。1938年任八路军东进抗日

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率部深入敌后创建冀鲁边区根据地。1939年后任鲁西军区政委、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等。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委、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参加过四保临江·辽沈和平津等重大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总干部部长、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兰州军区第一政委、中共甘肃省委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十、十一、十二在中央委员。

【史良】（1900—1985） 字存初。江苏常州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7年毕业于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30年代起，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1935年参加救国会，为上海妇女救国会常委。1936年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她坚贞不屈，后经营救获释，为现代史上著名“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民主运动。1938年后，任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联络委员会主任，第一、第二届参政员。1942年加入民主政团同盟，任民盟中央常委、重庆市支部组织部长。并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任民盟华东执行部主任，在国统区的法西斯统治下，从事民盟地下工作。1949年9月，应邀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司法部部长。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至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副主席、主席，全国妇联中财执行委员、副

主席。

【陈永贵】（1914—1986）山西昔阳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以后，带头组织合作社，积极带领干部和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修梯田，改变家乡面貌。曾任大寨村生产委员、中共大寨村支部书记、农业社主任，并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所领导的大寨一度被中共中央树为全国农民学习的样板。1958年以后长期任中共大寨大队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以后，相继担任大寨公社、昔阳县、晋中地区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1969年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78年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后不再参加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工作。1983年任北京东郊农场顾问。

【刘伯承】（1892—1986）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四川开县人。早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学堂。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参加过护国、护法战争。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在四川参与发动泸州、顺庆起义，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1927年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后赴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8年6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0年夏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同年12月奉命到上海，协助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31年赴中央苏区，任红军学校校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长，曾参

与指挥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任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率部深入敌后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1940年秋，参加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947年底，与邓小平一起率10万大军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1948年11月，参与指挥淮海战役；1949年4月，参与指挥渡江战役；同年11月，参与指挥西南战役。率部直接解放南京、皖南、浙西、闽北及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南京解放后，任南京市市长，并兼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在中国共产党第七至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是中共第八至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2年后，辞去党、国家、军队的领导职务。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病逝。著有《回顾长征》、《我们在太行山上》、《千里跃进大别山》等。

【胡愈之】（1896—1986） 浙江上虞人。早年创建上海世界语学会。1920年和沈雁冰等成立文学研究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与邹韬奋共同主持《生活周刊》，创办《文学》、《妇女生活》等杂志。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为救国会发起人之一。抗日战争后与陈嘉庚创办《南侨日报》，在新加坡建立民盟支部。1949年出席第一届政协会议。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四、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叶剑英】（1897—1986） 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原名宜伟，字沧白。广东梅县人。1917年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追随孙中山投身于民主革命。1922年任海军陆战队营长。陈炯明叛乱时，率部护卫孙中山脱险。1924年初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参加创办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1925年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新编第二师师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兼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与张太雷、叶挺等领导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1928年冬赴苏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下半年回国。1931年初到达中央苏区，历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闽赣军区和福建军区司令员、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参与指挥二、三、四次反“围剿”战役。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红三军团参谋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和军委参谋长。1936年12月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八路军参谋长、八路军驻南京代表。1937—1941年，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委。1939年2月参与创办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1941年2月返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对日作战。1945年12月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重庆进行停战谈判，出席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赴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1947年2月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

1948年5月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1949年初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8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1954年回到北京，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长等职。1976年以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一中全会和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出版著作有《叶剑英抗战言论集》、《叶剑英诗词选集》等。

【黄克诚】（1902—1986） 湖南永兴人。又名时暄。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营政治指导员。1928年初参与领导永兴起义。后任红四军团长、红五军师政委和军政治部主任等。1934年10月参加了长征。历任红一军团四师政委、红一方面军和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抗战爆发后，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委、第二纵队政委、第四纵队政委、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1941年后，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苏北区委书记、七届中央委员等。解放战争时期，任西满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

和政委、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和政委、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9年庐山会议上，因坚持正确主张，被错定为反党集团成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改正。1977年12月后出任中央军委顾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和第二书记、全国政协常委。

【何应钦】(1889—1987) 字敬之。祖籍江西，生于贵州兴义。1908年留学日本，先入振武学校，后入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在上海陈其美沪军司令部工作。二次革命失败后，再次东渡日本入士官学校完成学业。1914年回国到贵州，先后任黔军团长、旅长、军参谋长。1922年任云南讲武堂教育长。1924年赴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高级参谋。6月任黄埔军校总教官，后兼教导团第一团团团长。10月率黄埔学生军平定商团叛乱。1925年2月率教导一团参加东征。7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10月率部参加第二次东征。1926年1月任第一军军长，后兼任黄埔军校教育长。7月任北伐军东路总指挥，率部攻占福建、浙江，曾兼浙江省主席。1927年4月追随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1928年任国民党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编遣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训练总监部总监等职。1929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担任海陆空军司令部参谋总长。1930年3月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此后任“剿共”军队前线指挥，参与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二、四次“围剿”。九一八事变后，

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别事务委员会委员。1933年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5月与日方签订《塘沽协定》。1935年6月又同日华北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暂代国民党军队总司令。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次年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1941年1月同蒋介石策划皖南事变。1944年任中国陆军总司令。1945年9月9日在南京接受日本侵华军司令正式投降。1946年5月任重庆行营主任。1948年3月任南京政府国防部长。1949年3月任行政院院长。8月随蒋介石去台湾。1950年5月任台湾国民党“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后并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及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等职。著有《八年抗战》、《中国与世界前途》等。

【季方】（1890—1987） 江苏海门人。字正威。早年就学于保定军校。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任李烈钧部警卫营长。1921年加入国民党。1924年任黄埔军官学校特别官佐、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师党代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中将指挥。1930年参加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期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和爱国民主运动。任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1940年进入苏北抗日根据地后，任新四军苏中第四军分区司令员、苏中行署主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华东解放军军官教导总团团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交通部副部长，江苏省副省长，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名誉主席。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二届政协委员，三、四届政协常委，第五和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何长工】（1900—1987） 原名坤。湖南华容人。1918年毕业于省立长沙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在北京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同年

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曾任中共华容区党委书记兼军事部长。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曾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三十二团党代表、红四军二十八团党代表、红五军第五纵队党代表、红八军军长、红十三军政委、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任红九军团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任两延河防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和副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政大学代校长兼通化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军工部长兼军械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长期担任地质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受到江青“四人帮”的政治迫害，1975年以后，才重新开始工作。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刘仁静】（1902—1987） 湖北应城人。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五四时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曾被拘捕，经营救后获释。1920年先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共产党小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7月往上海代表北京小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参加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的编辑工作。1922年11月随陈独秀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3年8月再赴南京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9月被推为团中央委员长。1927年赴莫斯科学习，参加托洛茨基派组织。1929年回国途中专程赴土耳其君士坦丁堡拜见已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被托洛茨基约为中国通讯员。回国后，在上海与王文

元、宋逢春等另组“左派反对派”，组织十月社，出版《十月》杂志。不久退出十月社，以“老托代表”资格独自活动，编辑出版《明天》刊物。是年1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被中共江苏省委开除党籍。12月在托洛茨基提议下，与陈独秀、彭述之等组成“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编辑《民主与统一》刊物。1948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刘亦宇。在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出版社等单位工作。

【谭政】（1906—1988） 原名世铭。湖南湘乡人。1927年春参加国民革命军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红四军前委秘书。1929年后，历任红四军军委秘书长、红四军政治部训练部部长、红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一师政治部主任。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红一军团一师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一师政治部主任等。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区第三政委、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副书记等职。1954年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6年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并任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1960年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遭到8年监禁。1975年出任中央军委顾问。1980年被中共中央正式予以彻底平反。曾当选为第一和第二届全国

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和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蒋经国】（1910—1988） 浙江奉化人。1925年赴苏联留学，先后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红军中央军事政治研究院。留苏期间曾加入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苏联共产党。1937年回国后曾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副处长、江西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处长、江西第四行政区警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团部筹备主任。1940年创办干部训练班，自任主任兼赣县县长。1943年底赴重庆，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1945年随宋子文赴莫斯科谈判，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同年底任国民党青年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外交特派员。1949年去台湾，任国民党台湾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国防部”副部长、部长等。后又任“国家安全会议国家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行政院”副院长、院长。1952年后，当选为历届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常务委员。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后，当选为国民党主席。1978年5月起任台湾国民党政府“总统”。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独”，主张国家统一。1988年1月13日在台北病逝。

【梁漱溟】（1893—1988） 原名焕鼎，字寿铭。广西桂林人。早年参加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佛学。1917年应北京大学聘请主讲印度哲学。1924年到山东自办教育。曾任河

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当选民主政团同盟中央委员并任机关报《光明报》社长。1946年参加政协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等。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教育论文集》等。

【纪登奎】（1923—1988）山西武乡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鲁西区党委青救总会组织部部长、冀鲁豫地委委员、民运部长、豫西区党委工作团书记兼鲁山县委书记。1949年后任中共河南许昌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洛阳矿山机械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洛阳地委第一书记、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候补书记兼秘书长。1968年后，任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是第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2月，根据本人要求，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免去他所担任的职务。1983年后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缪云台】（1894—1988）名嘉铭。云南昆明人。1913年赴美国留学。1920年回国，任云南锡务公司总经理、国民党云南省政府委员兼农矿厅厅长、劝业银行经理、富滇新银行行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勘探和修筑滇缅铁路。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立法委员、处理美援物资救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参加过政治协商会议，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救国。1949年赴香港，1950年转赴美国。1979年回国定居。任对外贸易

部特约顾问、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是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届政协副主席。

【钱昌照】（1899—1988） 江苏常熟人。1919年赴英留学，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1922—1924年在牛津大学研究经济。1928—1930年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秘书、国民政府秘书、教育部常务次长。1932—1947年任资源委员会副秘书长、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委员长等职。1948年曾赴美、日考察。1949年经香港来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曾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兼计划局副局长。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届至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法案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

【陶峙岳】（1892—1988） 湖南宁乡人。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任湘军营长、团长。1926年参加北伐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军第四十军三师师长和八师师长、第七十军军长，曾率部参加淞沪抗战。后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河西警备司令部总司令。1947年任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新疆警备总司令。1949年9月在新疆率部通电起义。1949年以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四、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乌兰夫】（1906—1988） 又名云泽、云时雨。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人。蒙古族。1923年入北京蒙藏学校学习，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1929年后任中共西蒙工作委员会书记、蒙旗独立旅地下党委书记。1942年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历任绥蒙政府主席，中共内蒙古工委书记，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军事部长，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军政学院院长，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国务院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和政协主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并先后当选为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八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十届中央委员，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83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胡厥文】（1895—1989） 又名保祥。江苏嘉定人（今上海市）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任职汉阳铁厂。不久，赴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接替德国人管理该校机、电、木实验工厂。1921年变卖祖传土地，创办新民机器厂，信大、恒大纱厂，长城机制砖瓦公司，石城窑厂，黄渡电灯公司，大中机器厂等民族工业企业，任总经理、厂长或董事长。为促进民族工业发展作出贡

献。1927年以后十余年中被推为上海机器业同业公会主席、上海市棉布市场理事长。1932年一二八抗战时，联合同业拆迁机器到沪南，赶制弹药，援助十九路军抗击日军。1937年“八一三”后，动员工厂内迁，在重庆、桂林、祁阳等地创办机器厂等企业，任中南区工业协会理事长、迁川工厂联合理事会会长。积极广泛地团结民族工商业者，大力开展抗日民主活动。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副市长。当选为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主席、名誉主席，民建上海市主任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萧劲光】（1903—1989） 湖南长沙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军事学校学习。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后任国民革命第二军六师党代表。1926年参加北伐。1937年入苏联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红五军团政委、建黎泰警备区司令员兼红二十一军政委。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后任红三军团参谋长、中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中央军委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兼政委、陕甘宁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一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十二兵团司令员和政委。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司令员、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78 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随后召开的中顾委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中顾委常委。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38—1989) 青海循化人。藏族。俗名贡布慈丹。1941 年被选定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1949 年 6 月经国民党政府批准为十世班禅。同年 10 月 1 日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1951 年率班禅堪布会议厅主要官员来京参加关于和平解放西藏事宜的谈判。1954 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后历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一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文化大革命”期间遭错误监禁达 9 年。1979 年后增选为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七届人大副委员长，六届、七届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院长。

【胡耀邦】(1915—1989) 湖南浏阳人。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共青团区委委员、中央苏区反帝拥苏同盟宣传部长等。1933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长征中在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军团政治部从事民运和青年工作。后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纵队政治委员、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任中共川北区委书记兼行署主任等职。1952 年后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

1956年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1962年带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1964年调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1975年任中国科学院中央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1977年后，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职。曾被选为中共八届、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届五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十一届六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十二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7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十三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4月在北京病逝。

【李井泉】（1909—1989）江西临川人。早年就读于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南下的南昌起义军。后任共青团东江特委秘书长。1930年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政委办公室主任，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后曾任红三十五军政委、红军独立第三师政委、红三军团四师政治部主任等。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曾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红二方面军四师政委等职。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三五八旅副旅长、政委、大青山游击队支队司令员兼政委、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秘书长、延安抗大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解放军第二十兵团政委。1949年以后，任中共川西区党委书记兼川西行署主任、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四川省军区第一政委、西南军区副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成都军区政委、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四川省政协主席等职。

是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十、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在第十二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顾委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和常委。

【韦国清】(1913—1989) 广西东兰人。壮族。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了百色起义。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七军连长、瑞金红军学校军事教员。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任红军干部团营长、红军教导师特科团团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副校长、新四军三师九旅旅长和四师副师长等职。解放战争期间，曾任华东野战军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苏北兵团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十兵团政委。1950年任驻越军事顾问团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回国后，曾先后任广西省省长、公安军副司令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包尔汉·沙希迪】(1894—1989) 新疆阿克苏人。维吾尔族。1912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同年回国，在新疆省政府工作。1928年又赴德国学习和旅行。1933年赴苏联莫斯科学习，并参加革命。1934年回国后，参加新疆反帝会，并任新疆反帝会民众部部长。

1938 年被捕入狱。1944 年出狱后，参加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革命，相继任新疆三区革命联合政府副主席、新疆省政府副主席、主席，为新疆和平解放做了大量工作。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新疆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等法院院长、新疆大学校长、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1955 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当选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中国政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突厥语研究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第二、三、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陈伯达】（1904—1989） 福建惠安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苏联学习。1929 年回国。1937 年赴延安任毛泽东政治秘书。中共七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九届二中全会上因参加林彪抢班夺权阴谋活动被隔离审查。1973 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被定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并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76 年被捕。1981 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 18 年。

【许德珩】（1890—1990） 字楚生（僧）。江西德化（今九江市）人。1908年入九江中学堂。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李烈钧主持的九江都督府秘书处秘书。1913年7月参加湖口讨袁之役。失败后到上海，入中国公学英文系。1915年转入北京大学。1918年5月参与发起成立学生爱国会，创办《国民》杂志。是年夏参加李大钊发起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后与邓中夏、黄日葵等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为学生领袖之一，负责起草宣言。五四当天，与其他31名青年被段祺瑞政府逮捕。获释后南下上海，1920年初赴法勤工俭学，1927年初回国，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是年底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到上海，任大陆大学、暨南大学教授，参加中共外围组织中国社会科学界联盟。1931年7月再到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九一八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因反对蒋介石不抵抗的投降政策于翌年12月，与马哲民、侯外庐被国民党宪兵三团逮捕，后经宋庆龄等营救出狱。1933年初当选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执行委员。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被推为联络部副部长。1946年5月九三学社成立，当选为理事。不久回北平，继任北京大学教授。积极参加爱国民主斗争。1949年代表九三学社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是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水产部部长。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名誉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主席。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2月在北京逝世。著有《社会学讲话》、《中日关系及其现状》和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等。

【蔡畅】（1900—1990） 原名咸熙。湖南湘乡永丰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转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后，历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书记、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事兼妇女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兼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湖北省委妇女部部长。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中央妇委委员。1931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妇女部部长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陕甘省委委员、统战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妇女部部长。1941年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1945年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执委。1946年领导筹建东北解放区妇联。1948年当选为世界民主妇联副主席。同年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委、妇女部部长。1949年主持召开第一届全国妇女大会，并当选为全国妇联主席。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全国妇联的领导工作，任全国妇联第一、第二、第三届主席。1975年后，连续当选为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8年被推举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徐向前】（1901—1990） 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象谦，字子敬。山西五台县人。1919年考入山西国民师范，参加五四运动。毕业后曾任小学教员。1924年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任排长。曾作为孙中山的卫队成员到韶关誓师

北伐。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一次东征。后被调离黄埔去河南冯玉祥部国民军第二军工作，任教官、参谋、副团长等职。1926年冬到武汉，任南湖学兵团指导员、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一队队长。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率学生队参加反击叛军夏斗寅的战斗。大革命失败后，被中共中央军委派往广州，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队长，参加广州起义。起义部队在花县整编后，先后任四师十团党代表、四师参谋长、师长，与澎湃等领导红军和地方武装坚持东江的游击战争。1929年6月由中央军委派遣，到大别山区，先后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委主席等职。领导红军粉碎敌人对鄂豫边根据地的三次“会剿”。1930年春，任红一军副军长兼一师师长，指挥所部连克云梦、光山、罗田等县城。1931年初，任红四军参谋长。7月任红四军军长，与政委曾中生率部连克英山、罗田、浠水、广济四城。11月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红四军军长。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春，指挥广（元）昭（化）、陕南、嘉陵江等战役。后率部长征。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8月再次率军北上，指挥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后，奉中央军委命令，率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奉中央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指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协助刘伯承、邓小平领导开辟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参与指挥了广阳、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1938年4月率部分主力挺进冀南地区，巩固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6月到山东，任八路军第

一纵队司令员。1940年返延安，先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校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太原前线司令员兼政委。连续组织指挥了运城、临汾、晋中、太原四大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担任了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逝世。著有回忆录《历史的回顾》。

【张群】（1889—1990） 国民党要员，字岳军。四川成都人。1907年入保定军校学习。1908年被保送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1913年参加讨袁，失败后再度赴日。1916年回国。1917年任广州大元帅府参军。后任成都警察厅长、开封警察厅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兼军委委员。1927年宁汉分裂，蒋介石下野，离职随蒋去日。1928年蒋介石复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议等职。1929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后任上海市长。1932年任鄂豫皖“剿总”党政委员。1933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1935年任外交部长。1937年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时期，历任军委会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1945年8月，参加国共重庆谈判。1947年任行政院院长。1948年改任总统府资政。1949年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西南长官公署军政长官。去台湾后，仍

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秘书长、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等职。1990年12月14日在台北病逝。著有《中日关系与美国》、《谈修养》、《我与日本七十年》等。

【江青】（1915—1991） 原名李进，字云鹤，曾用艺名蓝萍。山东诸城人。1930年到山东实验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学戏。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电影演员。曾在上海被捕入狱。1936年曾与唐纳结婚。抗日战争爆发后赴延安，相继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任教。1939年与毛泽东结婚。后任鲁迅艺术学院教员、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1949以后，曾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1964年成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年2月在上海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全盘否定十七年文艺界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和代理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成为实际领导全国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69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十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年10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1977年在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上被定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定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因而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认为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依法减为无期徒刑。1991

年5月自缢于保外就医的寓所。

【屈武】（1898—1992）字经文。陕西渭南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被推为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会长、赴京请愿代表。是年6月到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工作，受孙中山接见。翌年与于右任长女于兰秀结婚。后入北京大学学习。1925年初，受孙中山派遣赴西安宣传国民会议宗旨。次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不久赴苏联，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陆军大学学习。1941年在重庆与王昆仑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在国民党内开展抗日民主活动。1943年初，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兼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1946年春，任陕西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后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市长。1949年4月国共北平和谈时，任南京政府代表团顾问。是年9月，协助陶峙岳、包尔汉在新疆起义实现新疆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迪化市市长，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副主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孙中山研究学会名誉顾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代理主席、主席、名誉主席。

【聂荣臻】（1899—1992）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与领导人之一。四川江津人。1917年考入江津县立中学。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就读于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同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

委员、训练部副主任。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任国民党驻巴黎通讯处处长。1924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2月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同年9月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参与创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1926年7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特派员，参加北伐战争。北伐军攻占武昌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四一二事变后，被派往上海，协助周恩来将工人纠察队转入秘密活动。5月参与中共中央军事部领导工作。1927年8月参与组织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1928年初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30年初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同年5月后在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工作。1931年1月任中央军委参谋长。1931年底进入中央苏区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曾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3月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同年4月作为红军东路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漳州战役。1932年冬以后，率部参加第四、第五次反“围剿”。1935年参加长征，过金沙江后，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到陕北后，率部参加直罗镇战役和东征、西征战役。1936年11月，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同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平型关战斗。1937年11月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深入敌后在晋察冀边区创建抗日根据地。1939年夏初起，指挥所部取得大龙华、雁宿崖、黄土岭等歼灭战的胜利。1940年8月参加百团大战。1941年秋，指挥北岳、平西根据地反“扫荡”。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1949年1月，参与指挥平津战役。2月兼

任平津卫戍司令，9月兼任北平市市长、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1954年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6年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58年兼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领导岗位上担任要职。1985年请求退出中央委员会，1987年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1992年5月14日在北京逝世。著有《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回忆录》。

【李先念】（1909—1992）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2岁起在家乡和汉口学木工。1926年10月参加农民运动，任乡农民协会执行委员。1927年11月率领家乡农民参加黄（安）麻（城）起义。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秋，率游击队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第五大队，任副班长，参加了反三次“会剿”战斗。1929年底转入地方工作，任中共高桥区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黄）陂（黄）安南县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10月率300余名青年加入红军，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1932年7月任第十一师政治委员。同年12月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7月任第三十军政治委员。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参加长征。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期间，抵制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活动。率先遣军与红二方面军一道北上。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任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后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统一军事指挥。1937年底到达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11月任中共豫鄂边区省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部长。1939年初，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进入豫鄂边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6月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11月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1941年2月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43年1月兼任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书记。1944年10月任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45年10月任中原军区司令员。1947年5月任新的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7月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从晋城南下，11月同刘邓大军会师。1948年5月任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1949年5月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2年2月兼任武汉市委书记和市长。1953年1月任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调到中央工作，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1957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书记处书记。1976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是主要决策人之一。1977年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1979年3月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从1981年春至1988年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1988年4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1992年6月21日在北京逝世。

【邓颖超】（1904—1992） 原名邓文淑，又名邓咏通，化名逸豪、李杨逸。祖籍河南光山县，生于广西南宁。1913—1920年先后在北京平民学校、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在天津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任执委兼讲演队队长。并与周恩来等一起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1925年在北京、天津任小学教员。1923年组织女权运动同盟。1924年参与组织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任特支宣传委员。1925年3月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同年8月，调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1926年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四一二事变后，从广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1928年5月赴莫斯科列席中共“六大”。10月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1932年5月赴江西中央苏区，曾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机关总支书记。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任中央机要科科长、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内政司法部秘书。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2月被派往武汉，先后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妇女组织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1938年1月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首次理事会，当选为常务理事。同年3月同各界妇女组织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任常务理事。6月任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参政员。1939年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委书记。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妇委副书记兼解放区妇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被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1946年1月作为中共代表团代表到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并先后在重庆、南京、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

工作。1947年3月，任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1948年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1949年3月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并任党组副书记。曾作为团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妇女代表会议。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中共“八大”至“十二”大的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

【胡乔木】（1912—1992） 江苏盐城人。早年曾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1930年在北平上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北平西郊区委书记、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1935年后任中国科学家联盟书记、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书记、中国江苏省临时工委委员。1937年后，任安吴青训班副主任、中共中央青委委员、中国青年联合会办事处宣传部部长。1941年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1945年参加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8年任新华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新闻总署署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5年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1977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名誉院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党史研究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顾问。1981年主持起草《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当选为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共产党第八、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并继而当选为中顾委常委。著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等。

【王震】（1908—1993）湖南浏阳人。1922年到长沙当铁路工人。1924年后任粤汉铁路工会长岳段分工会执行委员、工人纠察队队长。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长沙工人暴动，后任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区区委书记、游击支队队长、政委，红军湘东独立一师党委书记，湘赣苏区红军独立一师政委，红八军代理政委，湘赣军区代理司令员等职。是湘赣苏区创始人之一。1934年8月任红六军团政委。10月与红二军团会师，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委员、中央军委分会委员、代理军区司令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1941年初率部奉调到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1942年兼任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卫戍司令员。1945年10月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46年冬，任中共晋绥吕梁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晋绥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1949年2月任第一野战军第二军军长兼政委。后任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率部解放青海后，奉命进军新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委。1953年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1955年任人民解

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委员。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任农垦部部长。1975年1月至1980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77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8年3月增补为常务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他是中共八至十二届中央委员，一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副主席。